近代中国帮会内幕

JINDAIZHONGGUOBANGHUINEIMU

青帮



上卷

近代中国帮会内幕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编

上　卷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编　审：曾昭余
主　编：徐俊元
编　辑：石玉新　杨小波

前　言

帮会，是对旧中国封建性的民间团体的总称。帮会一般源出于封建时期按同业或同乡关系结合的各种组织，为谋求生活上的互助并借此反抗自身所受的剥削与压迫。随之发展，则与一些政治势力和政治派别相联系，以至成为其中属部。某些帮会创建之始即有自身明确的政治主张，也曾在历史上起过一些进步作用；但由于帮会这种组织的封建落后性，很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操纵和利用，其反动性和破坏力更为昭彰。

本书所言近代中国，特指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叶，即从晚清戊戌变法至新中国成立约半个世纪的时间。一方面，此为本书选收的全国各地人民政协提供的文史资料的征集时限；更主要的，则是于此五十年间，始自清初的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近代中国的几个主要的帮会，由盛极而至衰败，其间主要活动、重大事件、代表人物以及对社会和历史的影响，确实值得总而录之。

本书所说近代中国帮会，主要是清帮与洪帮（包括哥老会）。清帮又称青帮，还有俗称家理；洪帮实为洪门，亦称红帮；哥老会又曰哥弟会。同一组织，因地而称谓不同。本书为尊重历史客观而保留各地的习惯称谓，不作强求统一。

洪帮为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是明末清初民族斗争的产物。清朝入关后，明朝遗臣以反对异族统治为号召，建立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组织，因以明太祖洪武帝的“洪”字为代称，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洪帮长期在珠江、长江流域秘密活动，并鼓吹起义反抗清朝统治。迄至辛亥革命，有些地区的派系受同盟会的领导，率先发动起义，对推翻千年帝制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洪门支派的哥老会，则主要活动于西南及西北地

区。清亡后，洪帮、哥老会的政治斗争失去意义，逐渐蜕化变质，大部成为阻碍中国革命的反动力量，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的一种恶势力。

清帮也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之一，起始较洪帮为晚，是清代漕运水手的一种行会性秘密组织。传说发源于明代的罗教，至清雍正四年，由翁雍、钱坚、潘清组织南北运河的漕运船夫为清政府承办漕运，规定帮规和仪式，按辈分收徒弟，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后因漕运改为海运，遂在东南沿海各大城市和长江下游其他通商口岸流为游民组织，进入民国后，清帮头目纷纷与帝国主义、新老军阀相勾结，镇压革命，残害人民，烟赌娼盗，无所不为，成为令人发指的黑势力集团。

本书所收内容，除对各帮会源流进行追溯，对几乎遍布全国的各地的帮会组织及活动予以如实记述外，还介绍了许多帮会的重要人物和各帮会的帮规帮法。如清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洪帮首领司徒美堂、谭人凤、王泉山等；如清帮之摆香堂、炉香证书、海底，哥老会的打红棍、令词及茶碗阵等。对于洪帮的一个分支理门和由洪门一支系“东震堂”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最大的反动会道门一贯道，也予以了详实的记述。

由于近代中国的帮会都是秘密组织，局外人对其内幕很难了解清楚，今天的读者对其所知更少。本书所收文章，大都为当时人忆当时情、帮内人记帮内事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可靠，可使读者详览其内幕，同时也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珍贵史料。

让读者能从另一侧面认识中国近代历史，从而更加热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珍惜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这正是我们编辑此书的目的所在。

《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

目　录

民国帮会面面观 ……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1）
漫谈清洪帮 …… 杨方益（71）
我在清、洪两帮 …… 向春亭口述　杨方益整理（104）
我所知道的清洪帮 …… 崔锡麟（111）
贵州帮会五十年记略 …… 蓝克安（157）
清洪帮在萍乡的活动 …… 徐桂生（169）
我所了解的兰州清洪帮 …… 范楚材（178）
张掖帮会素描 …… 张友贤　王秉德（187）
武冈清洪帮概述 …… 杨运炳（192）
凤台清洪帮内幕 …… 德　俊　张济锦（201）
我所知道的帮会情况 …… 周声远（208）
武汉帮会在汪伪时期的活动 …… 张孟青（213）

清帮早期组织考略 …… 李世瑜（219）
清帮的源流及其演变 …… 姜　豪（239）
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 …… 薛畊莘（255）
张仁奎与仁社 …… 洪维清（275）
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 …… 程锡文口述　杨展成整理（282）
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 黄振世口述　何国涛整理（309）
蒋介石拜师黄金荣内幕 …… 黄振世（335）
关于杜月笙 …… 范绍增口述　沈醉整理（340）
杜门话旧 …… 黄国栋口述　罗醒泉整理（388）
我所知道的杜月笙 …… 郁咏镇（407）

张啸林的一生 …… 朱剑良　许维之（422）
我所知道的张啸林 …… 俞云九（427）
上海三大亨的勾结和斗争 …… 石　君（430）
从三光码子到清帮头目的金廷荪
…… 洪宽笙口述　觉　人整理（437）
“潮州大亨”郑子良 …… 凌　雷（448）
清帮在天津的流传 …… 李世瑜（451）
天津清帮见闻杂记 …… 周恩玉　刘炎臣（467）
张逊之其人 …… 胡君素　李树蓁（480）
绥远清帮和伪蒙疆民生会 …… 卢健飞　王明远　刘吉悌（489）
江苏安清帮记略 …… 张华光（542）
清帮在杭州 …… 章寒樵（548）
郑州清帮内幕点滴 …… 大梁郑二（553）
清帮头子张树声 …… 孙玉田（561）
记张树声二三事 …… 王冶秋（564）
安庆的清帮 …… 李帆群（568）
芜湖、桐城清帮见闻
…… 杨邦太　金　里　金仲平　胡景翼（574）
蚌埠清帮记略 …… 石留霞（581）
嚣张一时的南陵清帮 …… 季　方（587）
我参加清帮的片断回忆 …… 李连生口述　徐桂生整理（593）
安清帮在济南的活动概况 …… 段子涵（597）
我所知道的济宁安清帮及安清道义会 …… 李鼎茂（612）
王春台剿捕临沂安清帮始末 …… 夏传玺（620）
阳泉清帮三义堂 …… 刘建功　李庆祥（624）
关于清帮摆香堂详情 …… 张俊德（626）
清帮“炉香证书”的式样及内容 …… 张风云整理（629）
清帮双凤帮海底 …… 温州市政协文史委供稿（633）

民国帮会面面观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

一、帮会概述

谈起帮会，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大上海的清洪帮。帮会黑势力与政界、租界洋人相勾结，私运军火，制造伪钞，贩卖人口，包运鸦片，设台放赌，绑票暗杀，逼良为娼，……真是无恶不作，令人发指。

其实，旧中国的帮会，并不仅限于上海，可以说遍布全国，尤以东南沿海、长江南北为甚。帮会之种类，也不是仅有清洪两帮，而是有洪、清、汉、礼、白五类。只不过清、洪两帮势力更大、为害更烈罢了。

清帮之起源与演变

清帮早期组织乃是清代漕运（运输“皇粮”）水手的一种行会性秘密结社，约建于清雍正初年，为清王室沿运河护粮，被称为“安清”。通常所谓“青帮”，实为“清帮”之误。

清代时，统治者从江淮各省把粮食搜刮来之后，主要经由运河运往北京，每年运到北京的粮食有400多万石，运粮的船只有42000多艘，水手有10万户，大约二三十万人。清王朝为了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些船只和水手，他们仿照明制，设立了一个“漕

运总督”。又把各地漕运组织分成许多卫、所，下面是联，联下是帮，这套组织就统为“粮帮”或“粮米帮”。据传雍正三年，清政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便是这股臭名昭著黑势力的代表。

洪帮之起源与演变

洪门是明末清初民族斗争的产物。明朝覆亡，清兵长驱入关，明代遗臣不甘明朝败亡，遂秘密结社，企图利用群众的力量恢复旧业，这样便创立了洪门。通常所谓“红帮”，乃为“洪帮”之误。

洪门究竟始于何时，创于何人，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洪门内的秘密文件中普遍流行这样一个近于神话的传说：

明崇祯四年（公元 1631 年）进士洪英，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清兵南犯时，洪英偕门人南下投史可法。其时史可法正督师扬州，抵抗清军，命洪英至燕京侦察虚实。洪英一路联络抗清志士顾炎武、王夫之、黄梨洲等人，从事抗清活动。后史可法在扬州殉难，洪英至安徽芜湖，投奔明将黄德功。黄战败自刎，部众溃散，洪英招抚黄部 2 万多人，继续武装抗清。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屡战屡败，公元 1645 年洪英卒于距芜湖 60 余里的三汊河。

此后，洪英的儿子洪旭与洪英门人蔡德忠等至杭州投奔明潞王，不料潞王降清，他们就投奔郑成功。公元 1661 年，蔡德忠等随郑成功据守台湾。郑成功为了加强将士团结，效法梁山，开立“金台山”、“明论堂”，此为洪门最早的“山”、“堂”组织，为了发展大陆上的反清秘密组织，郑成功派原洪英旧部蔡德忠等 5 人化装至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投方丈智通为僧。此 5 人在洪门尊称“前五祖”，世传洪门的祖师是和尚。

雍正年间，有一奸臣进奏谗言，谓“少林寺内教授法术，意图谋反”。雍正便派兵 3000 火烧少林寺，一夜烧死 110 人，幸亏云端上来了一位达摩尊者救出 18 人，最后只有蔡德忠等 5 人走脱。

蔡德忠等辗转到达湖北。其时，万云山万云寺的方丈万云龙和陈近南结义，共图反清复明。万云龙原是明潞王部将，在山东

起义失败至此。陈近南是清王朝翰林院学士，因反对清帝焚烧少林寺，力谏无效辞官云游，回到湖北故乡，就在白鹤洞修道，自号“白鹤道人”。他同情少林寺僧众的遭遇，为图替僧众报仇，改装江湖卖卜，结交天下豪士。一日途遇蔡德忠等，就迎至家中，把他们安顿在附近的下普庵红花亭。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7月25日，由陈近南主香，在红花亭结义。他们用两个花盆，对之祈祷：“若能为被害的少林寺弟兄报仇，若能反清复明，二花盆落地不碎！”他们把花盆掷于空中，落地后果然不碎。然后饮血酒为盟，以先来者为兄，后来者为弟。其中有个朱洪竹，据说是明崇祯帝的孙子，大家因他是明帝后裔，拥戴他为盟主，并以“洪”字为结盟之姓，以“红花亭”为兄弟出生之地，“结盟日”为兄弟诞生之日，把“洪”字拆为“三八二十一”，作为会中暗号。这次集会称为“洪家大会，“洪门”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后洪门在湖北为清兵所败，伤亡惨重，不得已改变战略，分散部众，到各地自行开山立堂，以图日后发展，临别时以一诗作为日后相会时的证词，其诗云：

“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与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乾隆十四年（公远1749年），洪门在广东惠州高溪庙集商举义。其时，陈近南已殁，乃由苏洪光主持。众推苏为主帅，他改名天祐洪，定其组织为“三合会”，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月为姊妹，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一之义。起兵反清，连战皆捷，声振东南七省。后有明总兵周遇吉侄周豪率部来归，遂以史可法之侄史鉴明为军师，女侠关玉英为女军统领，尊朱洪竹为先皇，大举入蜀。清四川总督王春美见三合军势大，就派其心腹符、田二人诈降，天祐洪信以为真，竟加信任，将符排第四，田排第七，任副军师。军抵重庆，与清军接战，符、田内应，使三合军

遭到大败。天祐洪中流矢负伤，全军溃退白虎山，幸而符四、田七被擒获处决。从此，洪门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四、七两排忌男子，只安插女将，称“四姐”、“七妹”。并重订规章，严防奸细。

此后，洪门不断起义反清，可谓前仆后继，屡败屡起。但由于清廷镇压，难以在城市立足，就向南洋各埠及内地各省发展秘密组织，或开山据寨，或秘密结社，均自立名称，如九龙山、三点会、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等，扩大力量，待机再起。清末镇南关起义、黄花岗起义中，洪门会徒踊跃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四川、陕西、湖南、浙江等地均由洪门率先发动，对于推翻清王朝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清朝灭亡以后，“反清”、“安清”都失去意义。丧失了斗争目标的洪门逐渐蜕化变质。各地组织多数为帮会头目所利用，勾结帝国主义、贪官污吏和流氓势力，包赌、包娼、包鸦片，哄吓诈骗，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的一种恶势力。

其他帮会之起源及演变

民国时期的帮会，除了清帮、洪帮外，较有影响者尚有汉流、礼门、白门等组织。

汉流，系汉族流民之意。传说为顾亭林所创立。明亡，顾亭林在陕西云台山讲学，以民族大义感化诸生，仿洪门秘密结社，举义倒清复明，顾为首领，组织“汉流”，亦称“汉流哥老”、“袍哥”，以大哥、大爷、二哥、么哥相称呼。其组织成分比洪门复杂，相传有惊（相命）、培（草药）、飘（变相行乞）、猜（赌局）、风（骗局）、火（炼金）、爵（卖假官）、耀（骗局）、僧、道、隶、卒、戏、解（卖艺）、幻（神道巫术）、听（音乐）等等。因此，汉流发展甚快，组织遍及大河南北、西北西南，直至山海关外东北地区。清康熙、乾隆年间，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响马和保镖大都为汉流支系，如窦尔敦就是一支。民国成立后，汉流反清目标

已经实现，许多组织遂告瓦解。而在四川、西康一带的汉流则仍然控制一方，人称“袍哥”，作恶多端，跟土匪无异。

“礼”为“礼门”，系洪门的一个分支。洪门反清，被查出要抄家灭族，活动困难，于是借戒烟、戒嫖、戒赌、戒酒为号召，设礼门公所，有师有徒，是为礼门。在江淮涟泗一带有一定势力，但总的来说号召力不大。

“白门”以神道设教，繁殖面广，如白莲教、红灯会、大刀会、小刀会均属之，对于鼓动农民反对清朝统治起过一定作用。清朝末年，支系繁多，其中有一支系叫“东震堂”，于光绪年间改名为“一贯道”。民国期间，一贯道由一个较小的迷信秘密团体逐渐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最大的反动会道门。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以后，在民族斗争中发展、兴盛起来的帮会组织，进入了一个蜕变、衰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由于帮会失去了民族斗争的内容，就逐渐变为藏污纳垢的躯壳，成了帝国主义、新老军阀的帮凶，成了扰乱社会、残害民众的黑势力集团，其中势力尤大、为害尤烈者为清帮、洪帮，以及从白门演化而来的一贯道反动集团。

二、帮会组织之膨胀

帮会本是在明末清初民族斗争尖锐之时应运而生，却并未在民国时期随着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应运而亡。它在政治上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在组织上反而恶性膨胀起来。许多帮会头目招收门徒时越收越多，越收越滥，动辄成千上万人。比如上海清帮“大”字辈帮首张仁奎，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3万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各色人等。张的徒弟、上海第一号“闻人”杜月笙，共收南北门徒数万人。闻名上海的杀人魔王、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曾拜黄金荣为师，他自己也收徒1万余人，包括上海两

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尚武曾任海宁路汇司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此人身在清洪两帮，有徒弟2000余人。专贩女孩的后台尤阿根，曾任当时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清洪两帮，收徒5000余人，在北方活动猖獗的一贯道头子，同样是遍地“开荒”（到没有一贯道的地区去吸收道徒立佛堂），广收道徒。一贯道大头子张天然在七·七事变以后，在日寇支持下，在华北各大都市扩大组织，仅在天津市就设立了18个“坛”，并设立了一个“总坛”。此后，又派了很多“点传师”到东北、华北等地“开荒”。如“点传师”齐国瑞、郭长福等到塘沽及连云港等地“开荒办道”，就先后骗入3000多道徒，建立了30多处佛堂。据说，从抗日战争以来，通过这样的“开荒下种”所骗入的道徒足有数十万人。

民国时期的帮会，上与达官要人勾结，下向社会各界渗透，成为吞噬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

“开香堂”奇观

清帮中人收徒，必须例行一种隆重的而又戏剧化的典礼，名曰“开香堂”。何谓“开香堂”？这就得从入帮的程序说起。

凡是“空子”（帮外人）想进门槛，必须先行觅得帮中人带领，开明履历，经引见师批准之后，再备了正式帖子去拜师。帖面上写明“信守”二字，内面写“敬拜某某老师门下”，下面写“自心情愿”字样。在师父名字旁边，要写三代姓氏，末后署名“某字辈门生某某谨具”，旁边写“引见师某某押”，“传道师某某押”，其郑重程度，可比作过去田契纸上的卖主与中保具名一般。

开香堂地点大都在偏静的庙宇中，事先必须禀明老头子，正中供定翁、钱、潘三位师祖的神位，在上面挂起罗祖像，各点香烛一副，桌下又点五支香，两头都用红纸包着，叫做“包头香”。庙门外又设“陈四主爷神位”，也点一副香烛。“陈四”者，据说

是第一个进门槛的人，因为犯了帮规，逐出山门，后人念他入帮最早，所以在开香堂时也给一副香烛，但又因此公已被逐出帮外，故将其神位设于山门之外。

开香堂大典时，凡是老头子的前人，和一般同参兄弟，都要到场，名叫“赶香堂”。赶香堂的越多，老头子面子越大。万一开香堂时没人赶香堂，或赶香堂的人很少，那个老头子就倒了楣，不但人家瞧他不起，连徒弟也觉得见不得人了。

待到香堂布置妥当，候补的人挨次进入，便传命紧闭山门。老头子居中坐定，赶香堂的人分立两旁。然后由引见师引领各“空子”到罗祖和翁、钱、潘三主爷神案前各磕三个头，再到老头子面前也磕三个头，然后向六部各师父前同样磕头，同时在赶香堂的各人面前，也得磕上三个头。总而言之，须是逢人便磕。如果老头面子大，赶香堂的人多至千儿八百，有些新徒弟就得磕上两三千个头。

徒弟们磕头之后，引见师便命他们在檐下排成长龙，司香的执事就把桌下的包头香划开，分给众人拿在手里。赞礼的人便高呼下跪，大家便黑压压跪了一地。这当儿另有执事端上一盆清水，要每个人呷一口，谓之“净口”。净口毕，老头子便在上面厉声问道：“你们是自愿入帮，还是有人教你们入帮？”“入帮并没有什么好处，你们知道吗？”“十大帮规要遵守，你们知道吗！”众人便在下面齐声答道：“入帮自心情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老头子便再谆谆训诲一番，在末尾说道：“如果违犯帮规定须家法从事，办得到么？”众徒弟也齐声答应。之后，便由传道师给各人分发一本小折子，上面写着三帮九代的名称，以及各种“海底”盘答方法，这是帮中最重要的东西，徒弟们必须秘密珍藏，不得让门外人阅看。至此，仪式就算完毕，众人再向祖爷、老头子各磕三个头，分班侍立两旁，老头子便安排筵席，跟赶香堂的各前人各兄弟，欢呼畅饮，赶香堂的人也要向老头子道喜，然后入席。这一

顿大嚼，费用概由新进门槛的徒弟分摊。经过此番典礼，“空子”就变成帮中人了。

洪帮收徒仪式，也叫“开香堂”。一定要上过香，才算正式入门。香堂分两种，一称“大香堂”，一称“小香堂”。开“大香堂”适用于人数较多时，其礼节也繁杂得很。大体是凡欲入帮者，要预先到帮中专事发展组织的头目那里报名登记。等到积有数十或上百人之后，由山主（洪帮组织一般称某某山）派一头目专门负责开香堂的工作，称之为“老大”。老大奉令后，乃选择一个偏静的庙宇，作一番布置。

大香堂布置，有称为“红花亭”的。正中设关帝位，上悬“忠义堂”匾额，中间设置供桌三层供祖师牌位，各用红纸或黄纸书写。堂中又另设大方台一张，右供大片子（大刀）一把，左供小喷筒（手枪）一支，下右焚起一炉香，一对烛，台口又置有线香一束。另外还张红灯，外层 3 盏，中层 8 盏，内层 21 盏，意把“洪”字拆开为“三八二十一”。

香堂布置毕，便命新入帮会徒鱼贯入内，并请山上资格较深的各位大爷同时参与盛会，谓之“赴蟠桃”。照例是不准有帮外人参观的，即庙中僧道亦须驱赶出去。然后紧闭山门，传令各新徒向祖师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礼毕，则有一位大爷向帮徒详解种种帮规，按条宣读。接着便将台口线香执于左手，右手则握供于台上的大片子，怒目环视众徒道：“以后各位如有不遵山主命令，不能严守帮规者，即以此香为例。”说话时高擎大片子，猛砍线香，一刀两段，斩香既毕，即将所有断香分授新徒，每人身藏一支以为纪念，亦资警戒。然后令各帮徒立成一大圈，聆听大爷向他们朗诵入帮诗一首，复令同帮兄弟按规矩各行一礼。最后一个仪式是入会问答。主香人问：“天地日月，如何称呼？”众会员答：“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拜日为兄，拜月为嫂。”又问：“你们能严守帮规吗？”答：“能！”最后一一发给“票布”，令各珍藏。至此开

香堂方告完毕。

随着帮会收徒愈来愈滥，入会形式也日趋简化，但大体上不脱帮会旧习。如杜月笙30年代创“恒社”，入社先要填一张祖宗三代的“履历表”，并备一份与本人身份、财产相称的“入社费”，由杜的总帐房万墨林递进去，这当然也要先送一份厚礼。等杜点了头，或单独，或集体，要举行一次见师典礼，最初还是叩头，以后“现代化”了，改成三鞠躬。如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老师”还拱一拱手，说声“不敢当”。经过这番手续后，理事会才开会“审查”，发给社证。

利益——帮会膨胀的秘密

民国期间，帮会组织何以能急剧膨胀？要解开这个谜，须弄清两个问题：一是帮会头目为何大张旗鼓地滥收门徒？二是社会各界为何有许多人急于挤进帮会门槛？

关于第一个问题，先让我们看看黄金荣收门生的故事。

在帮会头子中，黄金荣收门是比较滥的一个。晚年退居以后还是不断收纳，多多益善，以致闹出了“爬香头”的笑话。

何谓“爬香头”？原是清帮师徒相承，最初以20字定辈份，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20个字。到了清末，20字用完了，又添了“大通悟觉”4个字。民初辈份最大的帮会分子是大字辈。黄金荣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在清帮中称为空子。按规矩没有进过香堂，就不能开堂收徒，所以，他收的帮徒是没有字辈的门生。只因他位高势大，无需再去投师拜祖，自有一批流氓头子尊他为“老太爷”，反比几个大字辈的吃得开。他自己也常得意地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划。”

虽然如此，在黄的门生中，却有不少是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这些门生再开堂收徒，按理说就是黄金荣的徒孙辈了。而这些徒孙又辗转请人介绍，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一来，徒孙们

就和他原来的老头子成了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叫做“爬香头”，是一件犯忌的事。可黄金荣管它犯忌不犯忌，还是照收不误。因为这里头的好处大着呢。

黄退隐后，想将黄家祠堂扩建为花园。钱从哪里来？在黄门子弟中募捐。各人视经济力量大小，分别出资，少则三四十元，多则千余元。募捐所得，除付出黄家花园的全部建筑费外，尚得几万元余款。

自从60岁生辰后，黄金荣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借祝寿为名，公开向门生敲竹杠。门生中稍有地位的人，至少送100元礼金，多的往往送500或1000。因他性好阿堵物，门生摸透他的脾气，故凡黄宅婚丧等事，大都以现金相赠，不送礼物。这样每年一次的寿诞，除去办酒席等各项开支，至少可赚一两万元。

黄门子弟每年三节要送节礼孝敬。这三节是端午、中秋和春节。一个门生通常都要送上几百元的节礼，黄门子弟众多，加起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由此可见，多收一个门徒就多了一条财路，安得不滥？

这种情况不独清帮如此，别的帮会亦然。一贯道的师尊张天然利用迷信不知骗取了道徒多少钱财。1946年他去四川时，用飞机就运去1500条黄金。北京的一个点传师韦玉林，原来很穷，当了点传师后，用骗来的钱买房80多间，他得意地说：“我发财，全靠老佛爷。”

一贯道的《碑文》里，专门有一段赤裸裸向道徒伸手要钱的话：“众神天空站，站在空中把帐算。哪个该，哪个欠，哪个还。你们把钱收到不行功，到那时后悔迟，阎王叫你三更死，想活四更也难言。就有金银也拿不去，满堂儿女要丢完。你们要好好尊师，效法前人，快点行动，以后加倍还。”一句话，威胁加劝诱：“拿钱来！”

一个初进道的道徒，都要立愿“三施”：一曰财施，即出钱；

二曰法施，即出力；三曰无畏施，即舍身办道，服从指挥。立了“三施”后，就要经常缴纳各种费用。这些费用分两大类。即功德费和财施。

功德费是道徒必须交纳的。它有一定数目，由各地道首任意规定，逐级上交。包括：入道费，即入道时交纳的手续费，少则数元，多则一二十元；超拔费，又叫渡亡灵费。道首欺骗道徒说：“已死的亲属尚在地狱，必须超拔，才能升入天堂。”申请超拔亡灵的道徒必须交一笔超拔费；渡大仙费，这是欺骗富裕道徒超渡无名鬼魂成为大仙时交纳的费用。

财施又名行功费，是平时对道内应尽的某些义务所出的钱财，名目繁多，包括月助、供果费、了愿费、尽考费、开荒费、献心费、免冠费、印书费、求寿费等等，此外还采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训练班”的办法，搜刮道徒的腰包，要道徒们“牺牲财产净尽，为大义”。

沈阳广化坛，在1948年内，仅行功费就收入4.45亿多元，银元360多块。张天然在北京渡大仙，几天之内就收入钱财折合面粉达4000多袋。一贯道的骗财机构北平“中华善书局”，在日伪时期每天收入18条黄金以上。北京点传师刘景泰骗取道徒1.5万斤玉米。上海的潘华玲称为“渡仙大王”，有一次在上海渡了一个大仙竟骗取道徒20条黄金。1939年天津有个姓娄的道徒渡了一个“毛遂大仙”，竟花1万银元。有人说，一贯道办的是道，供的是佛，要的是钱，一点不错。难怪道首们那么热衷于遍地“开荒”了！

直接以帮徒作为榨取钱财的对象，这只是一条生财之道。还有一条更重要的生财之道：旧社会有句流行的话，叫做“有势就有财”。对于帮会头子来说，徒多则势大，势大则财多。为何如此呢？因为民国时期的帮会，多从事不法营生，什么贩卖鸦片啦，拐卖人口啦，包赌包娼啦，划地为霸啦，没有一帮势力勾结起来就

干不成。比如说吧，西南各省军阀贩卖鸦片，用轮艚把烟土从重庆运到上海，先雇洪帮头目沿途保护，因为洪帮势力范围主要是长江中游一带。船到上海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再交上海清帮集团接运。船上的服务员及码头上运货的小工头，又大多数是洪帮成员。这样相互依赖，相互勾结，才能把事情办成，人少了是不行的。所以，帮会头目谁收的徒多，谁的势力就大，谁的“经营”就发达，财路就宽广。这也是帮会头目滥收门徒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从门徒这方面来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想跨进帮会门槛呢？这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有些新老军阀、官僚入帮，为的是借帮会为号召，扩张自己的势力。大军阀韩复榘曾拜清帮老头子张仁奎为师。有人问韩的入帮介绍人葛光庭：韩有权有势，为什么要拜一个无权无势的张仁奎？葛解释说：“过去左宗棠出兵新疆，当行军到平凉的时候，忽然三军勒马不前，向左宗棠要求暂停一日。左问他们什么原因，答是要迎接大龙头（军士多是帮会成员）。你看，以左帅之威，军令之严，官兵甘冒军法，宁愿得罪左帅，要去迎接大龙头，可见老头子的威力，祖师爷的规矩，入人心之深了。左后来也拜了老头子，于军法之外，用帮规约束部队，因此加深了和将士的关系，取得了用兵的胜利。韩复榘拜了张老太爷（张仁奎），他就可以自开香堂、自立门户了。”

二是有些富户殷商，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还想沾点便宜，于是送重礼，找门路，进帮门，寻求保护。上海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板是浦东人。他发了财，想在家乡盖一幢别墅，以便周末、假日去享享田园之乐。不料，有个姓黄的当地大亨硬说破坏了他家的“风水”，侵越了他家的祖基，先是率众破坏，继而向法院起诉。绸布老板请人调解，不成；提出赔偿损失，对方索价愈来愈高。这时，有个朋友向这个绸布店老板进言：“你与其求小鬼，何

如求菩萨？如果你能拜杜先生为师，那就谁都不敢再碰你了。”于是这位老板托人向杜的当家大徒弟万墨林送了一大笔钱。过了几天，回话来了，说“杜先生”先是不愿意收这个徒弟，后来活动了，建议“打铁趁热”，先送一份“起眼”的礼。于是，他花了近1万元，打了“福、禄、寿”三尊金像，装潢好送去，承蒙“笑纳”了。不久即来了消息，说杜已定期行收徒礼，但一切从简，见面时三鞠躬好了。开香堂那天，礼节果然简单，杜坐在正中，他进去鞠了三个躬，杜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以后是一家人了，有事多找墨林谈谈。你的委屈，墨林给我谈了，你去找章大律师，他会办好的，我已关照了。”前后不过5分钟，“典礼”完毕。章大律师开的“手续费”要5万元，说一不二，他也只得如数交纳。果然不几天开庭，败诉改判为胜诉，对方不服上诉，也被驳回，而报纸记载，也一百八十度翻转过来，描绘他是一直受冤枉、被欺侮的受害者。他后来对人说：“气是出了，官司打赢了，钱可花了不少。原来黄某只想诈1万元，这下连打点、送礼加上律师费，共花了我近10万元。”而这位大律师则暗中向他说明：“这5万元，要送杜先生3万，给你在法院上下‘铺路’约花5000，应酬新闻记者5000。我实得的1万元，还要分些给助手和写状子的。”

三是有些吃江湖饭的人，包括一些艺人、江湖医生等，拜老头子是为了跑码头时有个靠山，好比请了一尊门神，“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比如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拜黄金荣为师，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有个文武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开设的天蟾舞台演出全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卖座颇盛。顾竹轩对待被聘的演员一向不肯出大包银。常春恒以天蟾生意好，要求增加包银，顾不许。常乃提出辍演的要求，顾暗中指使其门徒将常打死，续聘周信芳在天蟾演。后来周又因不愿受顾竹轩的剥削，期满不肯续演，顾对人扬言要置周于死地，旁人都为周的生命担忧。周信芳也知道顾蛮不讲理，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投拜黄金荣为师。黄接受

周的请求，特地把顾竹轩召到黄公馆，对他说："信芳现在是你自己兄弟，今后要照顾他。"顾竹轩虽然是有名的恶霸，但一来曾拜黄为师，二来其势力不如黄远甚，只得遵命。自此以后，才得相安无事。周深恐顾乘机暗算，急忙离开上海，到北方去游码头。三年后，始重返申地，先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三天，使顾不敢侵犯。

四是一些实业家加入帮会，为的是借重老头子的牌头，保护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些实业家常常有钱无势，每每成为各种帮会恶势力敲诈的对象，如果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那就只能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了。1929年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绑受伤，不治身死，曾哄动了上海银行界。事情是这样的：朱成章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到静安寺电车站终点的一段地皮，准备建造市房出租，并已办定了一切法定手续。稍后，上海三大闻人之一的张啸林也要租这块地皮，静安寺和尚与朱成章当然不允。一天早晨，朱带自己的女儿和护士从寓所坐汽车外出。汽车刚出弄口，忽然有绑票匪向朱开枪，勒令停车。朱小腹上中了一枪，并被绑架而去。中国国货银行得知后，四处探得线索，用重金把朱赎回，送医院抢救，终以伤重不治而亡。此事一出，银行界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请出了清帮老头子张仁奎来"压邪"。实业界人士由此事接受教训，辗转托人拜在张氏门下的不在少数。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葆竹是经过开香堂、拉台子（请客）的礼节拜张仁奎为师的。他说："象我这样吃水上饭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没有张老太爷的牌头，就玩不成了。"

第五种情况是大批流氓、把头等专吃"白相饭"的人，拜老头子是为了仗势称霸，仗势欺人，仗势干那些伤天害理的黑营生。这在帮会中人数最多，为害最大，是帮会黑势力的主体。仅拜在黄金荣门下的知名流氓头子就有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法租界粪大王马鸿魁、大包作头谢彬衡、好莱坞等赌场老板朱顺林、烟土贩子刘怡章、大世界总管闵采臣、流氓律师许福宝和金立人、徐

家汇大流氓顾玉书、大世界经理水果荣生、日新池老板舒长泰、杭州大流氓王五权、星相把头孟禄久等。象杜月笙原本是十六铺一家水果店的学徒，生活穷困不堪，他得了个诨名，叫“水果月生”。只是巴结上黄金荣后，才逐步发迹起来。此后，他又成了另一批流氓赖以发迹的靠山。如此陈陈相因，互相利用，遂使帮会组织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综上所述，无论是师收徒，或徒拜师，除少数被欺压者寻求保护者外，多数是把帮会作为实现其私利的工具。在旧中国那种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帮会曾使许多流氓无赖一变而为大亨巨富乃至党国要人，使许多穷困潦倒、游手好闲之徒飞黄腾达，享不尽荣华富贵。这便是帮会组织急剧膨胀的社会根源。

应当提及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些大都市的工人参加帮会者甚众。如上海邮局职工参加帮会者约占职工总数的20%，全市职工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这种现象的出现，根源于我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职工大众生活无着，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很多人以为帮会能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而不懂得，参加帮会，会被反动分子和社会恶势力所利用。但这部分人参加帮会，跟前面几种人参加帮会，情况是有本质区别的。

义气——帮会之内聚力

利，是帮会巩固和发展的真正基础。除此之外，帮会所以能在几百年间聚而不散，实因维系于一种强有力的传统观念——“义”。

清帮中流行这样两句话：“铁树不开花，安清不分家。”意思是凡同帮者即自家人，均须以“义”相待。除非铁树开花，同帮才会分家。这种观念，在洪帮中也很牢固。洪帮中人把入会视为“义结金兰”，有所谓烧“三把半香”之说，即“头把香，羊角哀、左伯桃结生死交；二把香，刘、关、张桃园结义；三把香，梁山

宋江有仁义；半把香，雄忠至死忠刘王。”在开香堂仪式中，要恭迎关帝圣驾。“拜把令”一首这样说：“今朝拜把结同心，关圣当前作证盟，谨守十条和十款，自然事事吉星临。”可见洪帮的传统中，也是很重义气的。

在早期的帮会中，义气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下层群众的互助观。清帮原本是漕运水手们秘密结成的互助组织，按照清帮帮规，帮徒穷困，老头子须救济资助；老头子有难，各帮徒亦须救助供养；同帮弟兄，也必须互相救济，以义相投。这种情况，在清帮早期组织中确是存在的。如清代的一份官方文件曾这样记载：“以先入者为长辈，次入者为幼辈。已及五七辈。辈不知若干人，均以口号字第为凭，随地联络。所至不携分文，可得居处饮食。遇事群起应之，口号所通，趋救立至，不必素相识也。”清帮帮规甚至规定，假如帮中某甲将拆帮外人的梢，被拆梢者如是帮中某乙的同胞或亲戚好友，则乙仍不得护卫，否则就叫做“保牛子过关”，犯了家法。其理由为既然甲乙同在帮，就都是自家人。而拆梢的对象是“空子”，故视为“牛子”，理所当然地应供帮会之敲诈。所以，帮徒们若遇自己亲属被帮中人敲诈，应当站在同帮兄弟一边，或虚张声势以恫吓，或假充好人以解劝，直至达到目的，这样才叫做讲“义气”。

在洪门的义气观念中，也是首重互助精神的，洪门帮规就有“互信互助”一条。值得一提的是，洪门的互助观是与其平等观相联系的。有一条“通令”云：“任你在朝中官居极品，结盟后就不论富贵贫穷。”入洪门者不论职位高低，入会先后，一律以哥弟称呼。既为哥弟，虽属异姓，无殊同胞。兄弟有难，则必视如自己的事，全力以赴，不得袖手旁观。这种观念，突出地反映在洪门的“三十六誓”中。如第27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凡二京十三省过州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到尔家中，须当以礼相接。如有不法之人，不认兄弟者，一月内，死在七孔流血而亡

（查出打七十二棍）。”36誓云：“入洪门后，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来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关，不得阻挡。如有不法之人，不肯救兄弟出关，以及阻挡者，五雷打死，拖尸而亡（查出打一百〇八棍）。”第25誓云：“入洪门之后，洪家兄弟若有被外人富强大族欺负，务要通知众兄弟，出力报仇。如有不法之人，见兄弟被人欺负，不肯出力相救者，死在妇人之手而亡（查出打十八棍）。”从这些誓言中体现的互助观和平等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层被压迫群众的愿望与要求。

但是，这种“义气”所维护的，仅仅是帮会团体内部狭隘利益，而对于帮会外部的同样是受压迫的群众，则一点也不讲“义气”，甚至干出种种为害群众、扰乱社会的坏事来，诸如群殴斗狠，或盗或窃，杀人越货，以及在生活上任意花销，吸毒聚赌等等。时人对早期清帮这样记载：“安徽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劫为非，声气甚广。”正因为如此，许多本来是纯朴的劳动者入帮之后，就渐渐沾染了流氓无产者的恶习。他们既在帮会义气的维系下抱成团伙，又在这些恶习的支配下逞凶肆虐，直至完全堕落成为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集团，充分暴露了帮会义气的反社会性质。

民国期间，随着帮会组织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以及整个帮会的逐渐变质，原在帮会内部实行的互助精神逐渐削弱，而为帮会头目之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所代替。当时苏北有个洪帮组织叫春保山，山主叫保三，表面上义气不离嘴，但见到哪位兄弟强过他，必设计谋杀而后已，因此而致死者不在少数。他下面有个头领叫王得标察知他的祸心，悟到“此人不可与共安乐，只可与共患难！”便暗约心腹弟兄若干人不辞而别，到葵花岗另立山头。保三怀恨在心，便重贿一名心腹李某前去刺杀王得标，并答应事成之后再赏千金。李某效《三国演义》黄盖的苦肉计，割断一根臂筋，包好伤痕，带一心腹直奔葵花岗见王得标说：“我跟保三共

患难五六年，今为一点小事就割断我的臂筋，忍无可忍，特来投奔山主，万望收容。”王得标不知有诈，待李如同上宾，朝夕相聚，深为投合。一天早晨，岗中适有事等王得标处理。谁知日上三竿，王犹未起。推门一看，只见一把白刃刺入王的咽喉，早已气绝身亡，遍查同门，仅缺李某，方知他是保三派遣而来，但已追之不及了。那李某行刺得手之后，兴高采烈地连夜返报保三，领取酬劳。保三如约付予千金，且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又派他到邻县办事，一面却于暗中另遣一心腹于要路等候。当李某经过时，一声枪响，李应声倒于血泊之中，保三杀人灭口之计又得逞了。当时各地的帮会在“义气”的漂亮幌子下，演出了多少互相残杀的闹剧！

当然，有些帮会头目曾获得“讲义气”、“够朋友”的美名，上海的杜月笙便是其中之一，有人甚至把他捧为“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那么，杜的所谓“讲义气”是怎么回事呢？

杜的一个特点是肯花钱结交人。但是这种结交有个前提条件：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并有很大赚头。倘符合这个条件，他总是能很快答应别人的请求。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对人帮助有其特有的一套手腕：自己往往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更加感激，到处宣扬他的“义气”。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也使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扬，这样就可以掩护他放开手脚经营种种“特种事业”了。这正是：花钱买义，以义生财，实乃一本万利的生意经。用杜月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

杜月笙还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那一

路人干的，只要他出面便可平安无事，但他却碍于“义气”从来不答应做这种事。而对于帮助同帮兄弟发横财有时却非常之“够朋友”。1946年，国民党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即能发横财。杜的一个朋友找杜商量，杜果然为之谋划，且亲自出面说情，终于顶到一个仓库，使他的朋友一次赚黄金3000多两。从这里可以看到，杜的所谓“义气”，乃是他勾结各种黑势力的手段。

1927年4月11日夜，杜月笙跟黄金荣、张啸林等，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告天地，喝酒结义。次日晨，他们便指挥清洪帮的徒子徒孙们攻打上海工人纠察队各据点，为蒋介石的“全面清共”建立了殊勋。这里的“义”，完全是帮会头子为屠杀共产党人所结成的反革命之“义”了。

家法——帮会之强制力

帮会的巩固和发展，不但在思想上依赖于“义”的维系，而且在组织上依赖于“法”的强制。如果说义气是帮会的内聚力，那么家法则是帮会之强制力。二者都是帮会封建性的典型表现。

清帮有着极严格的家法制度。相传翁、钱、潘三人领导时期，虽有家法刑杖，很少使用。其后，潘清得意门徒石士贤肇事潜逃，乃订家法十条，并以香板为刑杖。清乾隆帝南巡时，在金山寺皈依佛门后，化装到杭州，看了清帮家庙及粮帮公所，认为管理有方，传谕嘉奖，并钦赐盘龙棍一条，上书“违犯常规，打死无罪”八字，以为帮中镇山法宝，供奉佛堂香案。

清帮施用家法时，还有一套仪式。先由犯规弟子的本师，会同传道师和引见师，并传到本门弟子若干人，开设香堂，如同收徒时的开香堂一般。将“家法”（或板或棍）供于香案上。接着是上香、上烛、请祖、参祖一套仪式，完毕之后，便传犯规弟子前来，命跪于香案之前，询问事由。待到把犯规情节问清楚了，本

师即请执法师、护法师等，议处应得的罪名，再问犯规者是否心服口服。犯规者承认之后，就请家法，由执法师向家法行三跪九拜之礼，将家法棍顶在头上，口念诵词云："家法森严鬼神惊，乾隆钦赐棍一根，汝既犯规当责打，下次再犯火烧身。"念毕，即派人执刑。执刑人进前参拜，跪接家法，顶在头上，立起站于左上首。又命犯规者跪听宣布罪状，完毕即命趴在地毯之上，双腿交叉靠紧，由四人分别撤住上下身。执刑人即对犯规者说："我与你一无仇，二无怨，今天你犯了祖师爷的帮规，我奉执法师的命令，责打你几十盘龙棍。一要你心服，二要你情愿。"犯规者须答："心服情愿。"执刑人再念诵词道："法师堂上把令行，手执家法不容情，谁人如把帮规犯，不论老少照样行。"念毕，即举棍责打。打完，又诵词："祖传帮规十大条，越理反教法不饶，今天香堂遭警戒，若再犯法上铁锚。"念毕，将家法送交执法师，置于原处。犯规者爬起叩头谢罪。由两名帮徒扶至堂下，执法至此完毕。

清帮的十条家法，包括对违犯帮规者、忤逆双亲者、不遵师训者、不敬长上者、侵占帮中财物者、殴打帮中老少者、不务正业者、奸盗邪淫者等的处治办法，表面看来，也似乎是惩恶所善，实际上却是帮会中的"把头"们欺压、凌虐帮徒的工具。他们的"香堂"就是私立的"公堂"，"家法"就是私刑，老头子们可以随意动用。清代的一篇《刑部咨文》里，曾记录这样一件事：嘉庆帮的一个刘把式指使他的徒侄赵玉，借口一件小事对一名水手严会生动用私刑，把他的左耳割掉。《咨文》对此评论道：各帮水手结党后，"一切任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这种风气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例如抗战胜利后，天津一个号称"四霸天"的清帮头子王家保兄弟4人，曾因工人抗议其剥削沉重一事，而将6名工人"手足捆绑，倒悬马棚，鞭棍交加，神魂数绝。经工人亲属再三跪求，何二说项，立誓悔改，始释绑饶命"。于此可见清帮把头凶恶嘴脸之一斑。至于帮徒因触

犯帮规或得罪了老头子因而被暗中处死的事，也是屡见不鲜的。

洪帮的家法制度比清帮更为完备，也更为严酷。其规则有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十八律书、十条、十款和议戒十条等等。兹举十条为例，可见其纪律之大概。十条的内容是：一、尽忠报国；二、孝顺父母；三、长幼有序；四、和睦乡邻；五、为人正道；六、讲仁讲义；七、叔嫂相敬；八、兄仁弟义；九、遵守香规；十、互信互助。按照各种帮规，凡违反者，处罚甚严。依据犯规情节轻重，分为“五刑”：极刑，凌迟或刀杀；重刑、挖坑活埋或沉水溺毙；轻刑，三刀六眼或四十红棍，降刑，降级或挂铁牌；黜刑，抓去光棍或降入生堂，永不复用。

洪帮的这些家法可不是虚设的，执行起来至为酷烈。江苏洪帮组织春保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个小头目率领20余名帮徒到海滨贩盐，行至半途，遭到10余只缉私船围攻。这个小头目率死党10余人力战得脱，而舟盐及银两均被夺无遗。他们深知返山报告势必获罪，便结成一个小团体流落江湖，专在长江轮船上做些鼠窃狗偷的营生，帮中黑话谓之“跑底子”。一日，忽与帮中派出的一名探子遇见，这个探子立即返山密报山主。等到轮船靠码头时，立时围而捕之，无一获免，解至春保山中。专司赏罚的老五问道：“帮规第三条你们忘了吗？”犯规者同声战栗而答道：“不敢忘，临阵逃脱者斩。”又问：“第六条你们忘记了吗？！”又同声叩头答道：“不敢忘，吞没水头者斩。”那老五拈须冷笑道：“好一个不敢忘！你们临阵脱逃，擅跑底子，一次也没有回山禀报，是何原故？”那几个犯规者犹欲申辩，老五突然对两旁的值日兄弟道：“去，放了他们，快放了他们！”出言未毕，即有专门负责“放人”者捉之而去，不问情由，头颅已滚滚而下，10余人无一幸免。复将各尸体分成数段，以芦席卷成一束，抛于江中。并立时布告全帮，以警其余。原来，洪帮所谓“放人”，并非把人释放，乃杀人之谓也。

洪帮还有一条帮规，即不许外人冒充。帮内流行这样两句话："冒充进红，一刀两洞。"汉口就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一个乡下人到汉口，在法租界燕子窠吸鸦片，他放烟枪的位置，插烟签的位置，放茶壶的地方，拿茶杯的手法，吸香烟的姿势，斟茶的派头，俨然是大哥身份。小么（小兄弟）看见了，报告大哥，说是什么山头的大哥到这里来了。当时，洪帮头目、湖北饭店经理王静哉听了禀报，就去招待他，同他辩道（盘问底细），但此人所答非所问。就问他为什么胆敢冒充洪帮大哥，他说没有；问他为什么胆敢扯洪帮大哥的旗号，他说没有。一切一切，都是巧合，他根本不知道帮里的规矩、手法、姿势、位置等。几个洪帮头目经过研究，还认为他是有意冒充，犯了帮规。乡下人叩头求饶，结果，死罪虽免，还是割了一只耳朵。

洪帮本是反清秘密组织。严格的家法制度是为了严防奸细的需要。后来，反清斗争结束，家法制度就完全失去了原先的意义，纯粹成为帮会头子控制、凌虐其会徒的工具了。

三、帮会经营的特种事业

民国时期的帮会，在各种大小头目的控制下，聚众结伙，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们一不做工，二不务农，三不从事正当的经商活动，却常常日进斗金，挥金如土，有一批头目成了百万巨富，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

那么，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的生财之道，便是经营各种不法的"特种事业"，主要有：烟毒"保险"、贩卖人口、占地为霸、庇护私商、包揽事件、绑架勒索、开码头、包做人等等，这里一一加以揭露，以见"黑社会"之黑，"恶势力"之恶。

烟毒"保险"

民国时期的鸦片，流毒全国。而上海又是当时全国贩运鸦片的主要集散地之一。一大批清洪帮头目及其控制下的流氓组织，靠运销从国外和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来的鸦片和其他毒品，而大发横财。其中获利最大的要数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合开的上海垄断性大土行——三鑫公司。

谈到三鑫公司的由来，得从上海的"水老虫"说起。

旧上海贩卖鸦片的生意，原以广东潮州帮为主，靠贩卖鸦片起家的大商号有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那时码头上的流氓众多，其中有一批叫"水老虫"，为首的叫范高头。这批流氓专靠在水中偷盗为生，每当英国轮船装运成千上万箱鸦片驶进上海港口时，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必须用小划子从轮船上将货物驳运，当轮船上一箱箱鸦片装进小划子向码头行驶时，常常会发生翻船事件，使鸦片深入江底，这就是"水老虫"作怪。他们把小划子弄翻，然后又将沉在水中的鸦片箱捞起，用小划子偷走，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窃。

杜月笙做鸦片生意的早期就曾干过这种勾当。他不仅运销毒品，还派他的手下去查夺别人的"私土"。1923年的《时报》，就登载过这样一段新闻："有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余两，分装两个大皮箱，及其他行李一件，附搭日清公司（日商）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不料事被当地土匪帮杜某等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突于是夜二时许，纠集党徒十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候。雷等未及预防，冒然登轮提土，再经运上划船，即被杜某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雷以势力不敌，又无力赔偿，不得已于昨日向警厅告发。当经侦缉队长派队士吴荣福等渡浦，按名拘拿，若辈已杳然无踪迹，仅获划船夫一名带厅押候审讯。"同

年，《时报》还刊载，杜的徒弟曾持械至大通路李家，劫去价值2.4万元的烟土数箱，装汽车而逃。

这些盗窃勾当使郑洽记等黑货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白天黑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告失踪，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面。

后来，法租界捕房的头头法国人沙利，指定黄金荣设法破案，实际上这些事都是他的狐群狗党徒子徒孙干的，黄金荣只能拖延敷衍。但终非久计，于是和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商量，决定组织一个公司，象保险公司那样收保险费。做鸦片生意的商号将烟土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这样一来，这个公司就成了总揽租界里鸦片运销的总公司，而潮州帮的十大烟商，以及非潮州帮的十家大土行，实际上成了它的“子公司”。这个总公司便是臭名昭著的“三鑫公司”。三鑫者，取义于“三大闻人”合资而“日进斗金”也。当时《民国日报》曾译载英文报纸的一段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据可靠消息，沪上潮州帮土商，乘工潮澎湃（即“五卅”惨案激起的罢工浪潮）之际，已联合约二十家，组织一大公司，专贩烟土，资本银二百七十万元，设总机关于某租界，其运土等事，由警察及海陆军保护，每箱烟纳贿甚巨云。”

报道中说“由警察保护”，确系事实。当时黄金荣打着三鑫公司的旗号，安排捕房派几百名安南巡捕，并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运鸦片进入库房。这几百名安南巡捕的费用，由黄金荣从保险费中开支。开始时，法租界捕房名义上派出500名安南巡捕去保护码头，每月开支数万元，实际上由于法捕房头头沙利等都吃空额，并不足500人数。后来鸦片运进越多，法捕房头头也水涨船高，吃空额由500到1000、2000，每月开支从数万元增加到一二十万元。但这并没有使黄金

荣等为难，因为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三鑫公司收取的保险费出在贩卖鸦片的那20来家大土行身上，而鸦片商人付出的保险费就出在吸鸦片的人身上。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总在数千万元之巨，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分赃。大三股就是杜、黄、张，中六股是他们的6个合伙者，小八股是杜、黄的几个大徒弟。除此之外，当然要分一大部分给法租界的外国官员，分一部分给上海的官员们。另外，还要分给他们的徒子徒孙以及在帮的新闻记者一杯羹。

三鑫公司除了收取巨额保险费外，还用其他方法对鸦片商人进行敲诈。公司总经理杜月笙每逢一年三节，照例要把潮州帮的十家老板找来，开口要一笔钱。那些大烟商就互相商量了凑够给他送去。谁也不敢讨价还价，更不敢说半个不字。他要的这个数，也是经过调查研究的，既要得多，又让这些人拿出，还给他们留下相当厚利。杜月笙也懂得，对大烟商们不能杀鸡取卵。

尽管三鑫公司索价甚巨，鸦片商人还是视之为保护伞。当时，三鑫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租界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这样一来，鸦片买卖就由秘密转向公开化、合法化了。大土行有大批货物到埠，可以放心派车公开去运。这些车辆，租界的巡捕都是熟悉的，不但不会拦阻检查，还加以保护。这样果然避免了鸦片失窃事件，收到了保险的效果，而烟毒也就迅速传播开来。上海鸦片烟馆一度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俗称“燕子窝”）。于是，该公司又乘机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每支烟枪收取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那时一个烟馆至少有十几支烟枪，大的烟馆有几十支，仅法租界内就有烟馆一两万家，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各处烟馆大都少报烟枪数，而三鑫公司则用几百名检查员，专门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迷 信 诈 财

在各地帮会的形形色色的“特种事业”中，利用迷信手段诈取钱财，可谓历史最久的“传统经营”。民国时期，南方的“江相派”集团，北方的“一贯道”，都是为害尤烈者。

“江相派”是旧时广州语系地区内的一个以迷信诈财为职业的秘密集团。这个集团自号为“江相”，意为江湖上的宰相。其成份非常复杂，既有相命先生、神棍、庙祝、道士、僧尼，也有江湖贩药者、骗子、流氓、小偷等。这个集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洪门会的会员，构成集团核心的头子，即所谓“师爸”、“大师爸”等，都是洪门会的所谓“大学士”、“状元”、“进士”等等。所以，“江相派”的迷信诈财活动，实际上也就成了洪门的一种“营业”了。

这个集团在旧中国存在200多年之久，而且代代的大师爸们都是有“法”有“术”的大相士、大神棍，他们凭借师门传下的“法”和“术”，更运用帮会组织的力量，不断舞神弄鬼，制造“奇迹”，以欺骗和愚弄群众，诈取钱财。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

广州市东水关濠畔从前有座仙童庙，祀奉的是和、合二仙童，相传是南极仙翁的两个徒弟。由于年深日久，早已破落不堪，很少有人来参神了。忽然有一天上午，有一队抬着粉亭、供奉香烛和三牲的仪仗队，鸣金奏乐地走来，仪仗队后边，还有一大群手捧戒香、口诵经文的信男信女。这伙人到达仙童庙前，就停了下来，引得当地的住民都跑出来看热闹。那仪仗队为首的一人向群众宣传道：“我姓冯，是个神功会的案首。前10多天的晚上，我忽然梦见有两个仙童打扮的孩子，一个穿红、一个穿绿，都头梳双丫角髻，吩咐我说：某月某日午时是我们升天的日子，你可到东水关仙童庙前来迎接，不得有误。我初时还半信半疑，把这个梦对道友们说了，不料有两个道友做了同样的梦，所以我们今天

特地前来迎接仙童。”

这个人说犹未了，便跟着来了第二、第三、第四队，都说是来迎接仙童、待候他们升天的。而且他们之间，又说是互不相识，其中有一队人，还自称是来自南海县的。这一来，就传播开去了，弄得东关一带的信男信女，都纷纷携香备烛前来迎接仙童。

是日正午时分，当人们等得焦急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那是旧历初七、八时分，正是水退的时候，突然在东水关濠水面上，不知从何处漂来两具童尸，年纪都在十一二左右，一具身着大红色锻衣，束带、黄绸裤，一具着深绿色锻衣，束带，白绸裤，都头梳双丫角髻，脚踏新麻鞋，打扮活象画里所绘的和、合二仙一般。最奇怪的，就是这两具童尸，不是顺流漂下，而是双双并在一起，不先不后，不快不慢，齐齐逆着水流，向着仙童庙这边浮过来。就在此时，神功道友中有人喊：“仙童来了！逆水浮尸，仙家才是这样呵！”

于是，姓冯的道首立即命人鸣鼓奏乐，焚香放炮来迎接仙童，跟着又叫几个熟水性的道友跳下濠去，把这两具童尸捞起来，立即焚化，着匠工把“仙体”的骨灰掺入陶土里，重新塑造两具仙童神像；一边又发起募捐，重修仙童庙。姓冯的和几个道友自当庙祝。这样一来，“仙童升天”的神话不胫而走，两三天内就传遍广州及其附近的乡村。许多愚夫愚妇争着前来膜拜，有时一天多达五六千人。单是香油钱的收入，每天也有三四百两银子，而神签费、卖香烛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到两个月，那几个庙祝就已各捞了一大笔。同时，重修仙童庙的捐款也募集到了。不久，就修建成一座宽阔壮观的新庙。许多知名人士、富商巨贾都送来匾额、楹联祝贺，更增加了庙宇的声价，这新庙又出现了几宗“奇迹”，成了庙祝们诈钱的工具。不仅那些迷信的人们齐声称颂仙童的灵验，还有些好事的文人把此事写进自己的著述中。

那么，所谓“仙童显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穿了一文不

值。原来，那个冯道首乃是江相派的“大师爸”之一。他们在外地收买了两个10岁左右的小乞儿，养了几个月。在“升天”前两天带到广州来打扮好了，活活淹死在水里，用铁锚和绳子把尸首系着，沉在仙童庙下游不远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只大船；另叫助手在上游停泊两只小艇，从艇头放下两根篾缆，末端系以重物，不使浮出。宣传仙童升天那日，大船上的人拉开锚绳，浮起尸身，小艇上的人暗将篾缆绞入一拉，尸身便逆流而上。轰动一时的“奇迹”，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江相派”用迷信诈财之“事业”，于此可见一斑。

北方的“一贯道”诈财手法，与“江相派”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基本手段有两种：一是“仙佛降笔”，又名“扶乩”、“扶鸾”。就是借口“仙佛”附在“乩手”的身上，借“乩手”的手所写的训示。“乩手”又名“三才”，即“天才”、“地方”、“人才”。“三才”要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和秘密演习，以掌握那套骗人手法，认为合格后，就当众举行“扶乩”。“扶乩”前，由点传师告诉“天才”开坛的目的，“天才”根据其意图，事前编好辞句，届时在沙盘上写出，是为“坛训”或“神训”，道徒应绝对服从，骗财的目的就可以借助“神训”而实现。

另一种手段叫“仙佛借窍”。所谓“借窍”，就是伪装仙佛附在“天才”身上，用“天才”的嘴说话，用“天才”的手打人或表演魔术。表演“借窍”的时候，“天才”突然伪装倒地，昏迷不醒，数分钟后，从地上爬起来，根据仙佛身份的不同，表演不同的角色。如果张飞临坛，就气势汹汹，举止粗暴；观音临坛，就一副慈祥面容；济公临坛，就变成疯颠模样。手拿木棍或藤条，训戒道徒，或斥责，或表扬，或考问道徒如何行动、立愿、渡人、办道等等。凡遇“借窍”的时候，道徒十分紧张，稍有随便或对答不上，就要挨“天才”毒打。在北京的精化坛和道化坛举办的仙佛班中，假“借窍”手段用藤条打死的道徒，仅知的就有5人。道

徒们为免遭毒打，表示诚意，纷纷捐献财物或立愿办道，这样道会头子诈取财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贩 卖 人 口

贩卖人口，在旧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江湖黑话，称专贩男孩，叫“搬石头”；专贩女孩，叫“摘桑叶”；贩卖妇女，叫“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洋，叫“贩猪仔”。民国时期，帮会流氓大批加入这项“特种事业”，遂使贩卖人口的活动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

在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是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身在清洪两帮，与虹口吴淞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一部分人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的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养的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事业的大权给他继承，故绝大多数男孩均被贩往广东。尚武在解放后被处以极刑。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当过旧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清洪两帮。他将在上海拐到的女孩，大部分卖到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福州路的一些妓院。尤阿根本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巨利，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擢升为总探长。法租界方面还有一个贩卖女孩的总头目，即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收门徒1000多人，他的后台则是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警探出身、当时任法捕房刑事科长的苍郎打。这些被贩卖的女子大都是苏北籍。具体进行这项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他们把拐到的女孩大都卖给上海的一些妓院，其中有不少人被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充当“咸水妹”。

还有一些帮会头子专门从事“贩猪仔”的勾当。他们与华侨中的极少数败类相勾结，与外国在华招收华工的一些专门机构合谋，宣称如愿到外国做工者，每月可得工资若干，安家费若干，临行时又可预支薪金若干。工作限期满后，尚有若干个月工资作为

酬劳，以充回国之盘川云云，吹得天花乱坠，不少人信以为真，纷纷报名应募。岂知临时各人净得者仅仅百元，但因各人先期领得的定洋早已用光，这时虽想不去，已不可能，只得立下契约："某某家贫，得雇主预付赏助金若干，自愿订立条约，执行佣工义务若干年"，云云。"猪仔"签"十"字，押手印，从此便沦入不能解脱之苦难，而从事贩运猪仔勾当的帮会头目则获巨资。例如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三合会曾于1930年至1936年间，贩运5万多男女青年至南美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对汕头流氓每诱出一个劳动力，则付给100美元的报酬，这伙流氓累计共得美金500万！

此外，还有一种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者，称"国际护照贩"。当时，旧中国在反动派统治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青年农民男的擅长石刻，女的缠足，他们被用"贩黄鱼"的方法，通过澳门葡籍流氓，诱骗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干石刻劳动，女的被带到马赛等地表演"扭跳小脚舞"。所谓"贩黄鱼"，因中国人属黄种，在运葡途中，万一死在船上，即被扔入大海，如扔死鱼一般，因此贩卖中国人被称为"贩黄鱼"。

当时，干这种勾当有个极为神通广大者叫陈鹤鸣，此人是温州人，杜月笙的门徒。他勾结青田县政府、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并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卖人口的流氓，和旧中国派驻这两国公使馆中的败类，诱骗中国青年出国，从中渔利。其方式是，凡被骗者，每人发旧西服一套，但要付给陈鹤鸣旅费法币450元至500元（当时值黄金数两），由陈统购船票。实际上，陈并不购买船票，而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货舱里，每次每船最多20多人。船抵马赛港，由法国流氓接待，可定居三个月。男的由当地流氓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印章或人像，每枚可赚5—25法郎不等。三个月中，除一切简单生活

开支外，每人平均可余5000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三个月约可余8000—10000法郎。三个月期满回葡都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纳1500法郎，称“树上开花”。这样来去循环不已，轮番前往法国，陈鹤鸣从中赚得巨利，而当时中国政府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欠付使馆经费，故亦赖此维持生计。

这种变相贩运人口的活动造成很大危害。有些青年农民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出旅费，被迫出卖房地产，甚至把妻子“出租”；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照片。再者，因上船后不买票，被迫藏于煤堆中。如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货船时间过长，常有窒息致死者，尸体即抛入海中。当时，日本新闻记者专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于日本报刊以污辱中国。那时史量才先生主办的《申报》曾对此事进行揭发，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奉令彻查，在南市将陈鹤鸣逮捕，后判刑5年，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从1936年起，这种有辱国格之事才告终止。

占 码 头

帮会经营之不法事业，虽然名目繁多，大而分之，则不外乎两大类：流动派和固定派。走私贩运、兜跑底子、开放码头等，皆为流动派，占据码头、划地为霸等，是为固定派。

长江中下游各省，大至都市，小至乡镇，凡市面稍稍繁盛一点的，大多为帮会势力所及。他们分疆划界，各不相犯，每一码头必有一帮会头目为首。凡此势力区域内种种不法营业，莫不为他们所包揽，从而坐享厚利，此为“占码头”。这些占码头的帮会头目就成了各种流氓恶霸。例如，当时的上海就有这样一些“霸”：

赌场霸。20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等，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一种“俱乐部”，实为变相赌场。那时最著名

的俱乐部有福熙路180号、同孚路181号等。都派有专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赌场内，中西赌具一应俱全，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上万元。赌场除了靠赢钱外，还用见十抽一的方法来抽头。杜月笙每月从一个赌场就可以拿到三四万元。

码头霸。上海开辟租界后，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外轮、沿海及内河轮船装卸货物的码头，码头上雇佣了许多“码头小工”搬运货物。这些码头多由外商经营，他们为了便于管理，指派一些人做包工头。包工头本身都是流氓，多以洪帮为主，他们即码头霸主。每件货物从船上搬至码头，或进仓库，轻者200斤，重则600斤，每件运费霸头抽取60%，而卖苦力的搬运工只得40%，实际上还要支付种种开销，逢年过节，或把头婚丧喜庆，都要工人分摊送礼。这些码头霸同属帮会，互通声气，某个码头工人只要一个码头霸主不用他，则其他码头也难进门。一个码头，忙时雇一两百人，把头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他们又雇佣小工头，对工人严加监督，层层剥削。解放前，最大的码头霸主有：沈关生，杜月笙的同门弟兄，又身在洪帮；李茂龄，顾竹轩的徒弟；张春宝，苏州河内河码头霸主。他们都以码头恶霸起家，大发其财，在上海置有大批房地产。

粪霸。旧上海有卫生设备的房屋比较少，多数家庭均用马桶，不论雨雪阴晴，专门有人拉粪车到里弄挨户代倒马桶，每月收费两角。粪车装满后，拉到粪码头，把一车粪加水分成两车，出售给农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都有粪霸即包粪头，向租界当局承包，付规定的承包金。法租界历年的粪包头是黄金荣的姘妇叫阿贵姐，共有粪车400辆，付给粪车夫每人每月拉车费8元，另给法捕房与卫生处有关人员小费6000元外，每月可净赚1万到1.2万元左右。除了每晨派一人在码头登记出售给农民的粪车数外，不参加任何劳动，坐收其利。

扒窃霸。这是一种专事扒窃的秘密组织，有500多人，分细

窃与粗窃两种。细窃是特等扒手，7 岁起即开始训练，超级能手称“小山爷”。该组织内的纪律很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即遭杀害。这个扒窃组织还与租界捕房相勾结。1934 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家居民中搜出一张名单，发现公共租界捕房有 65 人，法租界捕房有 17 人，都与扒窃犯有牵连，每人每月领取非法津贴，以上 82 人后全被开革。

此外，还有渔市霸、菜场霸、走私霸、黄包车霸等各种霸头。以上各霸都是以业为霸，姑名之曰“专业霸”。还有一种是以地为霸，一地一霸，姑名之曰“地方霸”。某地若被某帮中头目霸占之后，即独揽其中一切不正当营业之经济收入，一码头不得有二人同占。俨然有“国无二主”之概。因此，与占码头相伴随的，是互相残杀的争码头的惨剧。

上海浦东地区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洪帮头目丁某与孙某因占码头之事暗中争斗。两人表面互相谦让，不露痕迹，而内里各怀你死我活之决心。因此，双方平时出入都要带上五六个或十来个亲信随行保护，互相戒备。一日，丁某忽邀孙某至某处赴宴，孙明知对方不怀好意，但又不肯示弱，遂带上吃斗兄弟 20 余人，各各暗藏武器，应邀赴会。丁某亲自出迎，请孙上坐。酒至半酣，忽有五六十人突然闯入，各举武器。孙某知道不妙，飞起一足踢翻桌椅，同来兄弟也各出武器准备迎敌。这时，丁某说道：“孙大哥今日屈驾光临，已为瓮中之鳖。但因我众你寡，杀掉你不为本事。我今要向大哥告借一物，如蒙允许，我当送大哥出险。”孙某道：“好，请说吧。”丁某道：“欲向老哥借用枣子一双（洪帮称眼珠叫“枣子”），请老哥自己取下为妙，免得弟兄们动手。”孙某应道：“兄弟从命，但恳请丁大哥，能否给我暂留一只呢？”丁某也答应了。说罢，孙某立即举刀自取右眼一珠，掷于桌上，但已痛极而晕倒。他带来的弟兄在旁只好相顾无言。丁某道：“好，另一只眼暂留与你，去罢。”言毕，率领徒众一哄而散。孙某醒来后，同行

弟兄同声问道："老大何不让我们与他拼个你死我活？"孙某答道："你们懂得什么！今天我牺牲的，只是一只眼珠罢了。如果与他们打起来，他人多，我人少，他为主，我为客，我们20余人，恐怕一个也不能活着出去。何不暂留一目，以待后用？"自此之后，丁某即于该码头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以为孙某从此再不能与他相争了。然而事有不测。起初，孙某果然退避三舍，而实际上却在暗中积蓄势力。半年之后的一天午夜，丁某突然与孙某的徒众遇于途中，而被活捉捆绑，带到船上，扬帆启航至一村庄。那少掉一只眼睛的孙某开言道："大哥到这里来做什么哉？难道半年前一目之赠尚未使满意，还要来第二次'借枣'吗？"丁某道："不要废话了，既已至此，一切唯命是从，即使要我再加一枣，还你双倍利息，也无不可。"孙某道："好来！"两旁即有武装少年数人，拔刀而出，猛地向丁某肩膀两腿等处连戳数十下，一时尚不致死。丁某受此巨创，刀孔密若蜂窝，但咬牙忍受，不作半句求饶的话。但已血流满地，呼吸如丝，半响方醒。孙某问道："我今天放你回去，你还想报仇吗？"丁某道："如得生还，誓必报仇，还请你杀我为是！"孙某张开他的一只眼微笑道："誓必报仇，好呵！我今天本想杀了你，但因尚要报仇，故不杀你，倒要看看你日后复仇的手段，你快去吧！"丁某回家后，请名医治疗，三月后痊愈。而独眼龙孙某虽当时自充好汉，放丁回家，实口硬心虚。后来听说丁果然未死，怕他来报复。便在风头最紧之时，每夜迁移住宿的地方。如此冤冤相报，闹得沸沸扬扬。后来此事为上海流氓头子范高头所知，便出面约定日期，为双方讲和，帮中人名曰"叫开"。叫开之后，双方订立攻守盟约，分领浦东一带各码头，互相策应，至此，孙、丁二人争码头一案才算了结。

浦东还发生过另外一件争码头案：该地有两个著名的洪帮恶棍，一个诨名"小铁墩"，一个绰号"小黄牛"，二人为争码头斗的不可开交。有一天，黄牛一人在茶馆吃茶，铁墩突然纠集一帮

人找来。黄牛明知狭路相逢，寡不敌众，然而躲避又以为不齿，便坦然而出与铁墩相见。铁墩一声令下，铁棍铁尺如雨点般打将下来，数分钟便打得黄牛体无完肤。后经多人劝解，未伤性命。但已当街横卧，不能行动。稍息片刻，只得手脚并用，爬到茅厕坑，饱饮小便一顿，而后仰卧坑旁，等人来救。不多时，地保赶来问道："不碍事吗？"黄牛答道："不妨不妨，自家人互相耍耍儿戏罢了？"又问道："打你的人你认识吗？要不要为你禀官查办？"黄牛忿然答道："倚官仗势，假公报私，黄牛不做这样的事。"地保送他回家之后，事隔三月．黄牛又强壮如初。铁墩得知以后，害怕今后会冤冤相报，便邀请了几个著名的帮会头目来"叫开"。黄牛说道："我们本是一家人，请诸位老哥不必干预此事。而且我与铁墩既属同门，又共过患难，以前他打我想必是受了坏人愚弄。所幸的是他尚未置我死地，足见我们是患难弟兄，并没有不共戴天之仇。当时他若要取我性命，易如拾芥。我有今天，都是铁墩所惠赐，哪里还敢存报复之心呢？"讲话时显得很诚恳的样子。来人见黄牛并无报复之意，便据实告诉铁墩，铁墩就一笑置之，不以为意了。哪里知道黄牛存心刻毒，只不过因为势力不足，暂时不敢发作罢了。从此以后，黄牛带领亲信弟兄匿居他处，潜养势力。有一天，铁墩来到某码头收陋规，正巧黄牛住在那里，而铁墩却不知道。铁墩带邻三五兄弟沿街勒索，被黄牛兄弟所见，急忙返回报告。黄牛立时传知众兄弟密议，大家听说铁墩至此，无不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刻将铁墩处死。黄牛却说道："弟兄们的热心，我很感激。只是本处为县治之地，倘若大庭广众之中将他放倒，事关人命，必然获罪。我们还是稍等几天。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良机方可下手。"次日，铁墩收陋规完毕，带领四五个弟兄径出北门，打算一路敲诈而去。行不数里，忽见密林深处跳出大汉 10 余人，或持短棍，或握利刃，拦住去路，大呼"留下买路钱来！"铁墩举目一一辨认，竟无一个认识的人，不禁狂笑道："这真是强盗遇贼

了！快去罢，某山某堂某老大铁墩在此，谁敢胡闹？”话犹未毕，左边林中又冲出一个人来，对襟褂裤，手持单刀，几步跃至铁墩面前。铁墩一看，见是黄牛，不觉大吃一惊，急欲转身逃跑，已无退路。黄牛大声喊道：“铁墩大哥，黄牛恭候已久了！”铁墩闻言，自知难以逃脱，只得应道：“黄牛哥别来无恙？”黄牛道：“承蒙您铁尺教训以来，贱体反而日益强壮，实在是老哥所赐。今天老哥既到此地，不可没有东西孝敬，敢请老哥饱饮一顿清水，以报昔日之恩，如何？”铁墩举目向左一看，但见银涛滚滚，波浪滔滔，黄浦江奔腾而去，听得“饱饮清水”一语，知道黄牛必要把他送到海龙王宫中，求也无益，只得应道：“悉听牛哥尊命！”当时铁墩同来的徒众，一齐为铁墩乞怜，无奈黄牛心坚如铁。即命部下将铁墩绑缚于一大石上，连人带石，抛入黄浦江中去了。这铁墩占码头逞强半世，遂被黄牛“种荷花”（洪帮中人将活人投于江中，称为“种荷花”）了事。

开码头

占码头是帮会固定“经营”，开码头则为帮会之流动“事业”。诸如演戏法、卖拳头以及巫医、相命等一切走江湖之辈，帮会中皆谓之开码头。一般地说，此辈虽难免有不轨举动，但强诈勒索尚不多见。而独有“收丐捐”一幕，堪称“开码头”中的奇观，不可不多花费点笔墨。

每年旧历二、八两月，总有一批批乞丐结队成群，纷纷至各内地乡镇，向各店铺强打秋风，勒索商民，帮中谓之“收丐捐”。奇怪的是，当时政府对此辈非但不加过问，还实行保护政策，许多县都设有“丐头”一职，由当地有面子的帮会头目充任，特许其每年收丐捐两次。凡纳了捐的店铺，丐头就发给红纸黑字的“丐条”一张，各自粘贴于大门之上。若问这丐条有何用处？用处大着呢！凡门上贴有丐条的，每逢二、八两月，管保没有强叫花

子上门勒索钱财，真象贴了门神一样灵验。

收丐捐之时，各地丐头公然带了伙计，各个肩背钱袋，挨家逐户收取。交了钱，随时即换贴新的丐条。大有一番“新桃换旧符”的气象。若遇一时无钱交纳的，也可以通融欠帐，约期付款，先贴丐条。但如果遇到有意取巧不付的人家，他们决不肯善罢甘休。待到二、八两月，乞丐们陆续而来，络绎不绝，丐头必指使他们终日登门，强索硬要，务使你家宅不安，鸡犬不宁，最后解围之法，还得请求丐头帮忙。这下好机会来了，丐头必然乘机敲诈，特别“开讲”，比原定要交的丐捐数目，要高出好几倍，方肯挥令让乞丐们退去，否则就推托不管。大凡商铺住家，经营这番骚扰和损失，下次收丐捐时，自然唯命是从，左邻右舍亦必引以为戒，再不敢取巧了。因此凡城镇中等以上人家，没有人敢不纳丐捐的。这一来可把各地的丐头们养肥啦。

即使有一两户未交的，也很难侥幸漏网，因为逃过初一，逃不过月半，下次收丐捐时，帮徒们必先将大街小巷巡视一遍，看看各家大门上有无丐条。若没有，勒索的机会又来了。或则以铁镖飞掷至店家柜台中，声称“过路镖客，流落贵地”；或以刀枪剑戟等诸般武器列于商店门前，逐一使弄；或则口唱京调昆曲，高拉胡琴，请主人聆听其雅奏，戏演完，即伸手要钱若干，且须立付。如有拖延，即口出恶声，并加倍勒索。若有某店主就是顶住不给，能奈我何，他们也有办法。因为他们人多，第一批刚走，第二批又来，第三、四批复至，可聚到数十人之众，环绕门外，闹闹嚷嚷，在商家则生意停顿，在居户则惊恐万端。相持有时，最终获胜的，还是这些蛮横的丐头，广州有个著名的乞丐集团，叫“关帝厅人马”，势力最大时发展到5万多人，总头目叫陈起凤，就是靠收丐捐起家的。过去广州民家对于红白喜事的“喜钱”（即丐捐），懂事的人家，是在事先送到关帝厅的丐头处去，领回一张写着“附城花子陈起凤”的丐条归来贴在门口，借以避免乞丐们滋

扰。至于丐捐的数量，富户大约四五元，中等人家约二三元，贫苦的也要交一块数角。如果不懂事，等到丐头亲自上门来“恭喜”时，可就麻烦了，他认为“唔俾面”（不赏脸的意思），就会加倍勒索，若不能如愿以偿，他们就会纠集群丐来闹个没完没了。有一次，广州河南有家富户，因办丧事时未能满足“关帝厅”的要求，在一个晚上陈起凤就传令集合起二三千人马，在事主门口捣乱生事，警察没有办法制服，官厅也一时干涉不了，结果事主还是给钱道歉了事。根据关帝厅的惯例，收来的丐捐分作五份：丐头占一份，群丐占三份，其余一份归当时的那个段警。在你办事期间如有外人来干扰，他们就会代你赶跑，保证无事故发生。其他各地丐捐都有其一定的分法，不再赘述。

帮会中收丐捐者势力之大，踪迹之广，遍及许多省市。江浙两省100多个州县中，几乎无一县不见他们的踪迹，无一县不发生上述之怪状。在一县中又不限于一乡一镇，凡乡村中稍有市面的，都有他们的“分丐头”，相当于县丐头派出的驻外伙计。凡有收丐捐的帮徒惠顾，由他们负责招待食宿。故每当二八月开码头之时，各帮徒众逢镇过村蜂拥结队而来，其声势之壮观，宛如乞丐大游行。

虽然如此，各帮徒众开码头并不乱跑，各有一定的地点。甲帮所跑的码头，乙帮不得再跑；乙帮所跑的码头，丙帮也不得插足。因此，某县某乡某镇应到若干组，均有一定界限，并不互相干扰。而跑码头的帮徒，对于他所跑之码头，不啻视为自己的不动产，其保管码头的办法非常严格。如有他人私自乱跑，则必立即驱逐，甚或置之死地，如同占码头的帮徒经常争码头一样，开码头的帮徒也经常演出争码头的闹剧。

苏南某镇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帮私跑码头的徒众五六人沿街勒索，已经交纳了丐捐的各户还要再交一遍。他们既至东村，复到西镇，商民们被扰乱得没有办法，只得向县丐头求援。

县丐头来到镇上，得知是一伙私跑码头者，就命令他们离开此地。谁料那伙人竟置若罔闻，挥之不去，依然沿街纷扰不休。县丐头见丐法不行，武力又不敌，只好听其胡闹。当时全镇商民哗然，以为此次丐头何以威令不行，面子大丢？次日，天尚未明，忽听外面“救命”之声大作，商民们挑灯起视，只见有五六人一丝不挂地被绑缚着，为10多人簇拥向东市而去。过了片刻，天已大亮，又见昨天来镇的那个县丐头率领了一大群乞丐，耀武扬威地由东向西而去。有人大着胆子问县丐头发生了什么事，丐头说，昨天私跑码头、违抗命令的一批强叫花子，今早被“活种”了！

何谓“活种”？原来此辈将生人沉入河中叫“种荷花”，活埋土里叫“活种”。商民们听说那五六个叫花子都被“活种”了，个个吓得说不出话来。那丐头越发自鸣得意，详述了事情的经过：“昨儿那几个私跑码头的乞丐，被驱之后理应到别处去，怎奈他们不畏丐法。我只好回到县里找各处过境的兄弟商量，大家都说，要保镇上安宁，并杜绝私跑现象，除活种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于是我连夜带领20多个兄弟带绳索、铁锹来此，到各个客栈把几个私跑码头的一一绑缚起来，送到镇东的一块墓地，挖了两三个地穴，逐一把他们活埋了完事，我这就要回县报告帮中的老大去。”商民听罢，莫不大惊失色。有几个胆子大的，跑到东市，想看个究竟，果然于累累荒草野冢之中，又添几处新坟！

收陋规

凡一码头上种种不法事业，如抽头聚赌、贩卖鸦片、秘密卖淫、拐卖人口等，若为帮徒所经营，自然受到帮会组织的庇护；若为帮外流氓无赖所经营，也必须借重帮会中有面子的头目做靠山，以求保险。不用说，那是要交一笔数目可观的保险费为代价的，帮中人称之为“收陋规”。

比如说，有一个帮外流氓某甲打算邀集赌客抽头聚赌，他就

必须在事前将聚赌的地点选定了，先到占码头的帮会头目那里挂号，交上一笔挂号费。挂号之后，帮中就派一个善于说话应对的门徒到该赌场去作为常驻代表，专门负责应付外来“寻铜钱”的流氓（帮中把拆赌场之梢称为寻铜钱），复派“吃得做得打得死得”的“四得”兄弟10余人，分布赌场四周，严加保护。而后，该赌场方可安心聚赌，不致发生意外。

万一有官中差役前来捉赌怎么办？那也不怕，因为帮会中的那位“常驻代表”与官中差役是互通声息的。捉赌之人未至，而通风之人先到，场主与赌客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从从容容地逃之夭夭。因此，“挂号”又号“保险”，确是名副其实的。当然，要请帮中保险也不容易，场主必须向码头霸主预先声明，保险费完全由场主负责支付。如果场主不走运，赌场生意不佳，弄得入不敷出，保险费也不能短少分文。因此，场主做这种大生意必须反复掂量，如果没有充分把握，是不敢贸然向帮中请保的。

也有些赌场场主，既垂涎于聚赌之厚利，又害怕请保之后，入不敷出反致亏本，就偷偷地做起不挂号的生意。但这样一来，种种不测之祸便接踵而至了。一则帮中兄弟探知某处有个赌场没有挂号，必定互相报信，源源而来勒索小费，每人至少要给个二三角钱。假如场主摆下脸来不给，那么“四得”兄弟就会把他们那套“打得死得”的功夫一一献将出来，甚或逢人便打，灭灯抢钱，闹得天翻地覆，再发达的赌场经过这番折腾，也不能安然聚赌了。二则当地没有入帮的流氓无赖，总是与帮徒狼狈为奸。他们如果得知某处有这样一个不挂号的赌场，而且帮徒们已经前往索费，他们岂肯错过良机？也必定是三五成群，紧随帮徒之后。如果每人也以二三角计算，他们一呼百集，叫你给钱又给不起，不给他们又闹个不休，你这个赌场也就没法开下去。还有一层，官中差役与帮会徒众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凡挂了号的赌局，均须提一定的保险费分给差役。那些未挂号者，则帮中人一边去拿开销，一边

又去通知差役前去“排炮”。差役一到，总是张牙舞爪，声称“奉宪捉赌”，场主无可奈何，势必又要拿出若干金钱了结。如若不然，他们就来个弄假成真，当场将场主及赌客一齐抓走。因此各赌场无不畏之如虎，惟命是听，只求免得吃官司。因为这样三层原因，帮会经营的赌场“保险”事业，得以兴旺发达，且帮外无人能与之抗争。

然而，在此帮与彼帮之间，帮内这个山头与那个山头之间，为了“收陋规”也常会发生残酷争夺的。20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勾结租界中外头目，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俱乐部”作为变相的赌场。当时，有个潮州帮三合会的头子郑子良，属洪帮，仗着会员都谙拳术，居然向黄、杜提出要求每月5000元的津贴，当然遭到拒绝，因此常派人到几个赌场捣乱，投掷自制的香烟罐头手榴弹，造成伤亡。这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有时，“寻铜钱”者当场被赌场保镖捉住，用“种荷花”方式扔入吴淞口外海中灭迹。如此惨死者，每年有10多人，谁也不敢过问，法捕房也熟视无睹。

此外诸如秘密卖淫、串贩人口等项不轨事业，帮中均无不收其陋规。其手续与赌场“保险”大同小异，其精义不外乎“予之则安，拒之则乱”而已。具体收法，则可分为月规和节规两大类。收月规的办法是双方先订好价格，由帮中占码头者按月前往支取。有些进项不大的小生意不能月月奉敬的，则按节开销，是为节规。假使有人秘密私做，如能永远保密则已；倘若有朝一日为帮中所知，大则捉将官里吃官司，小则纠缠不休永无宁日。久而久之，仍需按月开销或按节奉敬，并且会追加临进陋规若干。当然，交了陋规，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好处”：遇有外来流氓欺侮，帮中可以出力保护；如被官差拆梢，帮中也可出面说情。总而言之，帮中得人钱财，就负有保护之责，通风之任。无怪乎各经营不法事业之私商倚之为“长城”，恃之为护符了。在过去没有帮会庇护时，虽有少数不法分子冒险尝试，但不敢明目张胆地干；自从各码头

有帮会包办之后，就敢于堂而皇之地公开经营，并且几乎无处不有了。

包揽事件

占码头的帮会流氓在一地势力之大，简直与第二个行政衙门无异。其所管之事件，办事之性质，诸如断曲直、伸冤屈、或使两仇讲和、或加严刑峻法，都与衙门讼事相类似。这样，占码头的帮会头目，就得以把一切与讼事性质相似之厚利，装到自己腰包里了。

江浙两省交界的某县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曲折离奇的案件：

该县富商于某是个暴发户，有个儿子很没出息，惯与下流为伍，人称老八。这个于老八癖性好淫，遇到稍有姿色的女人，总要千方百计弄到手。本地不远处的尼姑庵里有个小当家，年方二八，称艳一时，于老八垂涎三尺，每逢初一月半，必然前往烧香，正是：一度复一度，烧香望尼姑。女尼都是清心寡欲之人，但也有个别不惯过寂寞生活的。久而久之，小当家居然被他勾搭成奸。

在此之前，这个小尼姑已被另一个宫宦之子、外号叫“小丁香”的人所诱惑，并被拉下水。自从与于老八搭上之后，自不免对小丁香冷淡了些。丁香大疑，于是秘密察访，知道了事情原委，立时对于老八恨之入骨，几乎要拿性命相拚。幸好他的一个好朋友朱某从中调解，事情才暂时搁下。他哪里知道，朱某正是该县洪帮中之头面人物，早就垂涎于小丁香和于老八家的钱财，眼下二人为一个小尼姑闹起来，正好给他提供了发财的良机呢。

一天晚上三更时分，明月当空，尼姑庵中，于老八正搂着小尼姑在一张床上睡觉。忽闻外面人声鼎沸，庵堂大门已被冲开，突然涌入 10 几条大汉。“捉奸！捉奸！”响成一片。老八大惊，急忙披衣出房，已被众大汉团团围住，为首一人，乃是小丁香。老八一见，恍然得知这伙人光临的缘由了。当时，小丁香复指挥来人，

将老八与尼姑二人面对面绑做一处，口口声声要送县里查办。老八与小尼慌忙告饶，情愿处罚了事。主庵老尼等也相继而出，跪着求情。事主丁香有点退步了。但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同来大汉都是帮中流氓，岂肯就这样了结？当下声言道：如要私了，也很容易。我们半夜三更来到这里办事，必须偿我们一夜不眠的损失费100元。否则，只有送到官中查办，以清佛地。那于老八被缚已久，手足麻木难耐，一听此言，知有转机。急忙大声说："请赶快把我放了！这么一点钱，好商量。"那些大汉听说，便将二人松了绑。于老八立即写了一张便条，遣人回家，把100元如数取来，付给各大汉了结。

那于老八事后寻思，此事都是小丁香指使的，今日受了他的敲诈，必定要设法报复，以泄我心中愤恨。主意既定，次日也跑到帮会头目朱某那里去，将昨晚情形，一一申诉，并求帮中公断是非曲直。朱某闻言，也吃了一惊，因为昨晚的事正是他包办的呀，于老八被敲诈的100元现在还留在他那儿呢！

不过，于老八的请求并未使朱某为难，他立即欣然答道："一个漂亮的小尼姑，难道就该小丁香一人独占吗？你不要怕，我一定为你出这口气。"老八欢喜无限，说道："仰仗你的大力，事成之后，必有厚报。"朱某道："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只须如此这般就行了。"老八满口应允而去。

过了三天，于老八亲自率领一大帮人，气势汹汹地去寻觅小丁香。他自恃人多，要与丁香决一雌雄。走到一座庙前，正逢小丁香也率领一帮人过来，似乎对方早有准备。双方正好在庙前戏场上相遇。一声令下，戏场变作战场。双方各各亮出武器恶斗起来。丁、于两事主一为官宦出身，一为富家子弟，都是胆小如鼠之辈，何曾见过这样场面？吓得如筛糠一般。于是双方各有帮徒四五人，保护大驾远远退避。交战片刻，有人来向老八报告道：某某受伤了。不一会儿，又来报：某某将死了。吓得老八大惊失色。

对面小丁香所得报告，也与这边相同。再过片刻，又有人来报：已将小丁香那伙人打散了，但我们这边有好几个人负了重伤，现已送去医治了。至此，于老八才稍稍放心下来，由保驾的小帮徒们送回家中。

过了不久，朱某来了，叹息道："唉，不知小丁香何以备了这么多的人为他保驾，使我们不能得手。但他那边负伤的人比我们多。我们这边仅少数几个人负有重伤，但不至于死。此外轻伤10余人更不足虑。但打蛇不死，必有后患。此次肇事之后，更难保丁香不下毒手，你可要及早谋划呵。至于这次帮忙费用，未伤的每人3元，我已代你开销了。轻伤的另加医药费3元，也已付讫。但还有四五名重伤者暂留在我那里请医调治。究竟如何处置，听你裁决，我的看法还是各给医药费让他们回家医治为妙。"于老八听此一席话，不觉又怕又恨，又惜金钱，又无别的办法，只得忍痛掏腰包，出大洋数百给朱某携之而去。

可怜一个小丁香，一个于老八，都以为朱某是帮着自己的，是大好人。殊不知他们两人都蒙在鼓里，真正在戏中唱主角的，正是这个帮会头子呢。原来，他为于老八出谋划策的时候，早有成竹在胸了。一方面怂恿老八带一帮人去找丁香复仇，同时却命一个帮徒到丁香处报信，告诉丁香道："老八对你极为嫉恨，已约了一帮打手，要于某日某时置你于死地。"丁香心想，你于老八既夺了我的小尼姑，又要取我性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又是立即找他的好朋友朱某商量，决定召集数十名吃斗之徒，与老八对敌。其实，双方所召集的打手，都是朱某手下的帮徒。朱某私下吩咐道："今日两方面都是自家人，只须在事主面前各出武器交过排扬完事，千万不可当真。"当下朱某邀丁香同行。丁香深信今日必有一番恶斗，唯恐危及自身安全，不想同去。朱某却说："蛇无头不行，你如胆小，可多派些人保护。"丁香无奈，只得勉强随行。到了庙前戏场上，果见老八带领一群武夫昂然直冲而来。既相遇，一声

令下，双方打手立即蜂拥而上，互相目视、暗中会意。丁香一方先分出一小队挟着丁香离开战场，余下的人高擎武器，直取老八，口中大叫：休得走脱！老八那方见势，也立即分出一批人拥着老八逃窜。把双方事主吓跑之后，余下的都是帮中自家人，于是乎就仿效戏台上的武打，表演一番之后便停锣歇鼓，各自散去。所苦的是两个事主，既被愚弄，又破大财，每人损失各在千金以上。

然而，帮会头目的欲壑仍未满足。从此以后，朱某又密令门徒分头向丁香、老八两方挑拨恫吓。对丁香则说老八还要如何如何与你为难，你的生命如何如何危险，目下最妥善的办法不如请托帮中有面子的人物，出面为双方讲开。到老八处也说同样的话。好在两人已被他们闹成不世之仇，永无会面交谈之日，故一经他们危言挑拨，就更加堕入五里雾中，但知你忌我恨，誓不两立，哪里会有不遵从之理？双方果然托朱某讲开。讲开的酬劳金以及各种花费，又不下千余金。

经过以上三番敲诈，事情仍然没有结束，帮首播弄之手段反而更加升级了。讲开之后不久，有一天朱某秘密跑到丁香处说道："老八居心不良，现在名虽讲开，其用心仍然险恶。你如想长久安宁，唯有把他做脱（帮中杀人之谓），方可绝了后患。"岂知丁香本一文人，前几次虽受愚弄，无非为求自保。今听朱某竟提出要包办人命，不觉大惊，当即严词拒绝。朱某见此方未能得逞，复转向老八处，亦用同样的话播弄。老八一听大喜，当场付2000金，托朱某"包做"。此后一天晚上，丁香果在回家的途中被杀。朱某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2000金之卖命钱！后来此案被县衙侦破，朱、于二人伏法，案情因此而大白于世，笔者不惜笔墨，详加披露，目的是使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以见旧中国黑社会之黑。民国时期之社会昏天黑地竟到如此之地步！

包 做 人

洪帮对于秘杀仇人，称为“做人”。“做人”者，杀人之谓也。“包做人”，包办杀人的意思。这也是帮会黑势力的特种营业之一。谓予不信，有帮中流行的一句黑话为证，叫做：“不杀不要钱！”

民国时期，该帮包办杀人之营业，一度非常发达，最盛时几有应接不暇不势。其承接的事务大致有这样几项：一、奸杀，二、仇杀，三、政杀。其中以奸杀、仇杀二者为常见。

兹举一例：河北省有个艺人，以青衣闻名于艺坛。他的大老婆有狐臭，被这位艺人所冷淡。后来这个艺人到上海演出，娶了一个名妓做小老婆。但这个小老婆却不大规矩，乘丈夫酣歌醉舞之时，常常外出勾引英俊少年，有一次竟把一个走江湖卖拳头的男人引入家中。艺人得知后怒不可遏，就找了他的一个洪帮中朋友商量，决计把那个卖拳头的除掉，二人还立了一份包做人的契约，代价是500大洋。

某日清晨，一艘轮船即将离开码头，忽有一人匆匆上船，把肩上的一只背包和手中一只竹篮放到舱内，即返身上岸，声称要取其他东西。当时正好有一警察局的探员在船上，见其包裹沉重神色慌张，怀疑他带了危险物品。偷偷把背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两只胳臂，两条腿，和一具躯干，血肉淋漓，斧痕犹新。再把竹篮打开，竟是一颗带发辫的人头！探员骇极而号，立即到岸上捉拿凶手，已杳无踪迹。后来，该凶手因醉酒被获，吐出实情，原来包裹中的尸体，就是那个与艺人的小老婆通奸的卖拳头者。这便是包做奸奸之一幕。

如果以为“包做人”这样的黑生意，仅仅是帮会下层流氓的专利，那就错了。事实上，一些上层有面子的大流氓也会干出这样的勾当。1934年，国民党要人宋某同维也纳舞厅的一个姓张的舞女发生关系，舞女受孕，多次向宋要求一笔10万元的津贴，宋

不给，把事情交给杜月笙办理。杜在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楼召见这个舞女，却预先布置下4个流氓（都是赌台保镖），俟舞女一到即将她劫持，用汽车送到吴淞口外，用“种荷花”的方式把她扔入大海“做脱”，连同胎儿一齐毙命。1936年初，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风闻这一案件，亲自进行调查，得知一切内情。因事关国民党政府要人宋某，法租界当局请示巴黎政府处置办法，后因中日战事发生，不了了之。

帮会所经营之特种事业，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各项。如绑架勒索，也是他们常用的手段。1933年黄金荣的徒孙王文奎绑架上海颜料巨商贝某的幼子。后由黄出面“讲斤头”，贝家花了2万银元才将小孩赎回，还另送了黄一辆汽车。黄金荣还曾唆使他的心腹徒弟丁永昌绑架荣德生，一下子就敲诈了几十万美钞。这些都是当时著名的绑架案。此外，还有贩卖军火、秘密卖淫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四、帮会与各种腐朽势力之勾结

在旧中国，帮会流氓势力经营种种不法事业为何能畅通无阻呢？他们不务正业何以能日进斗金，有些人还成了百万富翁呢？旧上海滩上，为什么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青皮流氓而能成为“上海闻人”，后来又一变而为“党国要人”呢？这是因为帮会流氓势力巧妙地利用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特殊社会条件，运用各种手段，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场人物相勾结，与军警界的势力相勾结，结果便造成了帮会流氓势力前所未有的神通，而成为民国黑社会的控制力量。

各种黑暗势力相勾结的大检阅

为了能对帮会流氓与各种黑暗势力的勾结有一个完整的印

象，我们从杜月笙的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说起。

杜家祠堂是从1930年初开始兴建的，地点在杜月笙的家乡浦东高桥。据当时报纸介绍，是五开间三进，第二进为正厅，第三进则为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之所，大门前则雄踞着两只石狮子。看来并不怎么特别壮观。

然而，在整个社会引起轰动的，并不是杜祠本身，而是杜祠的落成典礼。1931年6月9日晨，法租界嵩山路、华格臬路一带，到处是各种仪仗，彩旗飘扬，金牌林立。9时，大队从杜公馆出发。最前面的仪仗大队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4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的边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的金匾的匾亭，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匾亭等。还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紧随其后的5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以及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殿后的是蒋介石送的一篇祝祠彩亭。

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杜月笙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轿后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头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6个仪仗大队，从杜公馆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3个多小时，所经马路交通全部断绝，一路上汽车相接，爆竹声轰鸣不绝，看热闹的有几十万人。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10里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杜祠前面，搭着一座五层楼高的大彩

牌坊，四周搭起100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上海邮政局还在那里设了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杜月笙肖像，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凡去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可以去看戏吃饭。

举行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21响。首先由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载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看，一个帮会头子的家祠落成，堂堂的国民政府竟派代表道贺！

公祭典礼由吴铁城、宋子文等人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共1万多人参加典礼。南北京戏第一流名角也云集上海，从10日到12日连演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为之轰动。一万枚纪念章早已发完，临时还加添了几千张入场证。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预先熬好的5000两鸦片膏，第二天就抽光了，又赶熬3000两，才勉强应付过去。

杜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曾查过许多代祖先，也没找到一个可以给他撑点面子的先人。这次祠堂落成，吴佩孚送了他一面特大金匾，题了“武库世家”，这样，其他的人也跟着送了些“武库家声”、“武库经纶”等金匾。经吴佩孚这么品题一下，杜月笙一下了成了晋朝名将杜预（时人称为杜武库）的后裔了。

据说，这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大出丧”。勉强可与“媲美”的，是清朝末年大官僚、大买办盛宣怀的

出丧，和外国“冒险家”哈同的大吊葬。然而，就是那个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也未能组成那样一个仪仗队。杜祠落成之后不久，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绋，在中国四大家族中她的子婿占了三个，也没有杜祠落成那样的排场。事后杜月笙说，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大的场面。最使他感激的，是法国主子准许他那样大摆威风。正如当时报上特别点出的，中国的武装军警，租界是从来不许通过的，连蒋介石去上海住法租界公馆时，也只能带便衣警卫，那天，却整队整队，全副武装，鱼贯而过，说明帝国主义如何给杜月笙以“法”外的殊荣！

难怪多少年后，杜在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得意非凡，视为他的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应该说，这是帮会流氓头子与各种反动势力相勾结的一次大检阅。

帮会与官场之勾结

与官场相勾结，依仗官府的势力为非作歹，这在某些帮会，例如清帮中，是有其历史传统的。清帮创始，本来就是为漕廷漕运服务的，帮首及各级头目，均有职有饷，这就使其有条件与各类官场人物由相接近进而相勾结。再加上清帮所立十大帮规，也明明有不许奸盗邪淫之条，恪守仁义忠信之语，这就使得一些政府官员以为该帮宗旨与他们信奉的“仁义道德”那一套并不违背。因而官员入帮并不罕见。清帮“通草”里的《前人题名录》、《同道题名录》等所列举的数千个老头一类人物的名单中，有10%左右为粮帮时代的守备、千总、武举、文牍之类的官员。

尔后漕运既废，清帮生计断绝，无所事事，种种横行不法行为于是滋生起来。而此时官员入帮人数已日渐众多，久而久之，官员通帮之事就一幕幕地发生了。

清末民初，某县有个地方叫十八段，方圆数十里，几乎全为

帮会世界。该会徒众聚集于此为数超过万人，为首者名叫顾三五子。他部下统有男女帮徒数千人，分居于各村庄各乡里，每段派有男女帮徒上百户，分界居住。段的四周筑有土城，厚五六尺，高二丈余，且辟有东西南北四门。墙垣之上，造有更楼，筑有炮位。帮徒居于其中，无事时也从事耕织，并开有各种杂货店，以贩卖本地土产。有事时一声令下，就变为四处抢劫的土匪了。类似这样的段，共有18处，因此此地就叫“十八段”。各段平时守望相助，都备有当时最新式的枪械。因而附近驻扎的政府军队，除了与之勾通一法，也没有别的办法与他们对抗。

各段中的徒众（以洪帮为主，清帮次之），开始时劫夺行人，抢掠邻近地面，弄得商旅视为畏途，富户都迁往别处，连小商贩也逐渐绝迹了。后来，帮会就逐渐扩张其势力，合队远出，到其他县境抢劫，干起了不折不扣的土匪勾当。因为帮匪众多，每月每段出去抢掠一次，就有18次。因此邻近各县官厅，今日闻报被抢，明日闻报被劫，自然申报上级，要求会拿帮匪。省警厅看到各县详报，就命某长官率军警1000，驰赴犯案地点，相机剿办。谁知该军既到之后，十八段帮反而如虎添翼了，因为这个带兵的长官乃是在帮的会徒。他与顾三五子会见之后，始知为同参兄弟，从此严守帮规，猫鼠合为一窝，双方“有福同享”了。于是，该长官与顾三五子立约，此后不得在本州境人犯案。如顾三五子要派段中兄弟外出“开武差”，必定事先通过该长官，得到允许方可“出差”。从此以后，附近10余县果然盗风顿息，而那位带兵的长官因此而声威大振了。

然而，奇怪的是，此处盗风虽然暂息，彼处却从此鸡犬不宁。原来，自顾三五子与该长官洽谈以后，便派段中兄弟远出，至该长官管辖范围以外去从事劫掠，因而盗案发现大都在数百里之外。并且定下章程，一县之内，一月不得犯案两次。即其他被劫的远处各地，所受“待遇”似非常公允，一县一起，循环往复，而不

至于多少不均，甘苦不一。

这个办法可谓止于至善了，但久而久之也露出了破绽。有一次，州官细查境内各盗案之申详文件，每每看到“尾得各盗携赃窜入十八段而去”等语，忽然忆及以前犯案本以十八段一带为多，何以现在竟无一次告劫？此中真相，不能无疑。于是就派了一名委员秘密到该处调查。岂知一到十八段，耳闻目睹，竟是一片对那位长官的颂扬声。再逐段考察，则果然一派“升平景象”：男子执犁于田，妇女采桑于野，孩童则牧牛而吹笛。和风蔼蔼，暖日融融，何异于世外桃源！该委员一路行来，不觉啧啧称羡。他哪里知道帮会世界内部组织之完善若此？每每是抢劫得手，则三三两两，秘密回段，披蓑戴笠，从事农耕。加之不扰近邻，不劫本地，近处居民得以安居无扰，对于帮匪就没有什么恶感，那个委员当然调查不出真相了。唯有一端，他曾引起注意，即各段土城筑得非常坚固，且置有炮位，各住户又都藏有快枪。他就查询几家住户，问其武器从何而来，都这样回答：“委员大人，你难道不知道此地过去是盗风最盛的地方吗？我们农民从前因没有枪械，因而时时被抢。故而今天为了自卫，特严装以待。各地盗匪都知道到此地劫掠不易，近几年才保得个太平无事。”该委员再到别段查询，所答众口一词，毫无破绽，只得如实上报。而那个长官通帮匪之事，竟长久未得泄露。这一幕可谓当时帮官勾结之缩影。

民国时期，是清帮洪帮等帮会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帮会上层分子与新老军阀、官僚政客进一步互相勾结的时期。一大批著名的官僚政客如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江朝宗、袁克文、杨宇霆、陈调元、张之江之流，都是清帮著名的老头子。而帮会内原先是一般分子的，一旦做了老头子，也莫不竞相向上层趋附，走上帮会流氓政客化的道路。其中，上海三大闻人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交往，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交往，便是民国时间帮官勾结的集中表现。

蒋介没有发迹的时候，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甚微。为了找个靠山，就托人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1921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出面代为了结。不久，黄又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前往广州。因为有这一段历史，所以，作为“帮首”的黄金荣与后来作为“党魁”的蒋介石，建立了特殊关系。

1926年至1927年期间，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到上海后，蒋由虞洽卿陪同，特地去黄家探望。黄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子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蒋介石谦虚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的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对这只金表。极为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出来炫耀一番。

尤其使黄感到荣幸的，是他八十寿辰的庆典上，蒋居然亲自前来拜寿。1947年农历十一月四日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次日下午蒋介石果然光临，他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一批门人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搬了一张红木大椅，陈希曾上前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并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以后黄金荣不住夸赞

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当然，蒋介石如此厚爱黄金荣，既非出于徒弟对老师的尊重，也不是因为这个总统特别讲义气，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利害关系。从上海滩混出头的蒋介石，当然比谁都更清楚在当时的特殊社会条件下，帮会流氓势力具有多大的能量。在其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曾经一再巧妙地利用过这种黑社会势力，为其反共反人民的事业效力。

蒋阴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就曾派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组织起一支二三千人的流氓武装队伍，并以“中华共进会”的名义，在报上刊登反共启事。接着又与第二师刘峙部策划，由黄派出便衣流氓数百人，持械围攻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工人纠察队总部。正在捣毁袭击之时，刘峙部队突然又将共进会分子赶走，对被害的工人纠察队假意慰问。临去时，邀请工人纠察队全体到北站广场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工人纠察队不知是计，竟去践约，被预伏的反革命部队包围缴械，接着就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抢夺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果实。为了表彰黄金荣及其徒众的反共殊勋。蒋介石委任黄、杜、张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从此三人就成了“党国”新贵。黄金荣一直以此为荣，杜也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这一事件在清洪帮发展史上，也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它标志着帮会由社会黑势力演变为政治黑势力，而帮会上层流氓则走上政客化的道路。

此后，蒋介石曾一再指示把帮会流氓组织起来搞特务活动。1937年淞沪抗日战争发生，戴笠就秉承蒋的旨意，借抗日的名义，利用杜月笙把上海清洪帮的力量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建立了一支拥有5个支队、2万余人的别动军。这支别动队与日作战一触即溃，残部经蒋批准改称“忠义救国军”，

归军统局领导，成了一支特务武装部队。抗战胜利前夕，忠义救国军所属各支队先后由中美合作所分批抽调训练，全部换发美式装备。截止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从未和日军作战一次，而在日本投降后，却首先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协助蒋军抢夺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

蒋介石必须利用清洪帮，清洪帮更须投靠蒋介石。流氓政客化的过程，也就是他们政治地位提高、权势增长的过程。而“有势就有财”，权势的增长意味着财源的茂盛，意味着他们原先经营的种种不法事业可以得到权势的保护而畅通无阻，并且可以勾结官场的上层人物共同经营。比如杜月笙就曾乘日寇侵略和投降之机，一再勾结孔祥熙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一再勾结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做贩运鸦片的生意，关键时刻还一再从蒋介石那里求得保护。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闹了一次大吗啡案：这里一家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杜月笙叫他的徒弟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分赃不匀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这一连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下令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杜知道追查下去，必然会查到他的头上，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一面自己见蒋，请求不要彻查下去。于是，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子，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另一件事是杜月笙最有钱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抗战那年在上海和官僚资本勾结，做棉纱交易，引起了市场上一次轩然大波。蒋介石命令戴笠在上海逮捕徐。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刻飞到庐山去见蒋，请求不要将徐逮捕。蒋同意了杜的请求，叫戴笠和他商量办理。而戴笠和杜是拜把兄弟，对杜更是言听计从，加之此案以后又牵涉到孔祥熙的老婆，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帮会与军警之勾结

民国之前，差役入帮者已屡见不鲜。民国时期，随着帮会组织之膨胀及势力之增长，军警入帮者就越来越多了。而按照帮规，凡出了事情，在帮的军警负有通风报信的责任。这样，帮会徒众犯下盗案、命案、赌案或其他案件，被警厅、捕房追捕时，因有在帮军警通风报信，作案者轻易就能逃脱，等到军警虚张声势列队而至，则早已不知去向了。因此，各地帮会经营种种不法事业，无论是“开文差”，还是“开武差”，更觉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了。

当时苏南有一镇叫望平桥，东西街长约2里多，市面繁盛，居户众多。镇北有条纪家弄，居户较少一点。弄内终年设有一种赌台，叫摇宝台，即以四粒骰子分输赢。赌台多时有10余处，均在空地上搭起席棚以避风雨。每棚两台或三台不等。赌台之主都是清洪帮里的光蛋。以此为生者，每日不下数十人。他们日则在棚内聚赌，夜则在自备的船上住宿。因此江中光蛋们的船只，多至百余艘。船中均备有新式快枪，以备不测。而且他们初至该镇，所设赌台全是崭新，故镇中喜赌之人都往这里聚集。不数月，赌名大震，远近数十里的赌徒闻风而至，雇船乘车而来者，每日数十起，镇中各种营业居然借此而发达起来。两三年内地方官厅也就听之任之，从未过问。久而久之，该镇及附近一带的居民中，因报效赌台弄得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该镇镇长李某就向县里密告，县警长亲自带领数十名兵士前来捉拿。谁知到了镇上，但见这一天各赌棚内无声无息，赌台亦不复见，仅有10余处空棚而已。警长遂命兵士举火焚之而去。再到江边查看，光蛋船只也已杳无踪影。及至警长回城之后，镇上依然狂赌如故。于是，镇长又请兵捉拿，如此此来彼往，彼往此来，警长疲于奔命，而该镇之赌台依旧，从来没有一个光蛋被拿获过。其中奥秘，都是因为在帮之军警通风报信的原故。后来，镇长访得实情，一一禀告警长。警

长就在第一天晚上只命一队军警出差，而不告诉他们出发地点，使其来不及通风。次日黎明，大队军警突然来到镇上，各光蛋尚在梦中，及至闻警跃起执械抵抗，已经来不及，当场被捉10余人，从此各光蛋在该镇绝迹了。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因为这次捉赌，在帮之兵警都怀故纵之念，因而仅抓获光蛋船只五六艘，大部均被逃脱，安然驶入太湖之中。从此，这伙漏网之光蛋对镇长李某衔刻骨仇恨。不久，这伙光蛋会合大队帮匪船只夜间驶至该镇登岸。五更时分，即明火执仗向李家村进发。李村虽然也有数十杆快枪以资防卫，但终究寡不敌众，被匪徒冲进庄来，大肆枪杀掳掠，李镇长亦被击毙。临末，忽有一人声言："李某屡次请兵烧我们的席棚，今日何不以火报复？"该匪一言，李村数百户房屋就被付之一炬了。烧毕，安然上船出发。数小时后，号角响起，捉拿帮匪之军警浩荡而来，例行公事地沿湖追击一番，举枪乱开，仿佛为匪船送行。这便是军警捉拿帮匪之战功！

长江沿岸许多州县、码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反映了帮会与军警勾结之密切程度。

何以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呢？因为军警职在破案，而在帮会势力盘根错节之处，犯案者必定是帮中人物为多。如使帮外人经办其事，就理不着头绪，宛如"瞎子摸竹园，一世摸不清"了，势必百案而难破其一。如果军警在帮，则犯案之人，多为军警所熟识，案发之后，只须略加查询，就可以知道此案为谁所犯了。正因为如此，帮会头目都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神通。这里略举几例：

约在1928年春，英国政府派一外交官携带重要文件，由伦敦专程来华，轮船到上海外码头，这位外交官年纪较轻，初次来华，稍不留神，手臂所夹一公文包不翼而飞。当时他惊得面容失色，包里钞票是小事，一份英国政府给上海领事馆的国际性密件一旦遗

失，非同小可。他赶紧向领事馆报告公文包失窃的情况，整个领事馆人员也急得手足无措。只得通知巡捕房立即出动探捕，限三天侦破。

英国人明白，上海五方杂处，人口众多，英巡捕人生路不熟，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中国侦探来破案。因是密件，不敢告诉中国上海市政府，任务落到了捕房华探长身上。这位华探长侦查了一天一夜，音讯全无，于是不得不到成教路季公馆，请老头子帮忙。

老头子是谁，无锡人季云卿也，他是20年代著名的清帮老头，常居上海，门徒众多，能与上海三闻人分庭抗礼。这位英租界巡捕房的华探长便是他的大徒弟。那一天，他听到大徒弟报告的案情，觉得问题严重，决定从摸底入手。原来，上海那些“跑生意”的扒手、小偷等，绝大多数是清帮的徒子徒孙，且各有门头，设小头目管理，一有所获，须向头目汇报，将物件或现金交出，然后分配，帮规如此规定，谁也不敢违反。于是他命大徒弟派出手下探员，分片通知季家门下包括南市、闸北、浦东等中国地界所有小头目，晚8时，集合于季公馆排情况，是谓摸底。

当夜季公馆灯火通明，各地小头目50余人准时而来，等于开了一次小小的“香堂”。华探长先向大家说明了案情，季云卿接着说：“我们先从家门里查起，不要惊动黄金荣、杜月笙那帮人，你们在这两天中，曾否有小角色在外滩做到生意，是一只黑色羊皮的公文包？”大家听得老头子一说，各人自己排，一小时内，都保证自己所辖地区内，没有得到这只公文包。这是老头子可以绝对信任的，因为帮规规定不得欺师灭祖，否则受到“三刀六洞”的严惩。大家一直讨论到深夜，竟毫无线索，季云卿只得命大家回去，进一步向下层侦察，捕房人员向大小旅馆、妓院、燕子窝等处查探。次日仍无消息，季云卿一夜沉思，找寻线索，决定到汉口去一趟。

第二天，季云卿带着贴身小徒前往汉口。师徒二人下轮船后

走向江边一家大茶馆“得意楼”。二人吃过点心，上楼找一沿窗座位坐下。原来，这得意楼乃是汉口一个清帮老头子杨某所开。此人在汉口、武昌一带很有势力，门徒甚众，很讲帮会义气，凡有清帮中人路过或犯事逃亡出来，总是留宿三天，给以盘缠，打发离去。茶馆里的做手，都是杨的门徒，以此会友。当下，季云卿坐定后，就将茶壶茶杯摆出清帮中会友的格局，果然跑堂的一看是自己人，就对了一通“海底”，得知是上海鼎鼎大名的清帮老头季云卿驾临，马上领他到杨老头子家里。

杨某也久仰季的大名，一见之下十分热情，问起来汉口何事，季云卿径直相告：“为破失包案，不得不亲自出马，一来到此访友，二来看看长江沿线情况，大哥若有线索，还请多多指教。”

事有凑巧，杨老头当即表示：“东西在我这里，既是季大哥的事，原物奉还。是我的三个小角色，路过上海，在外滩顺手牵羊而来的。”中午，杨某设宴招待季云卿师徒。席散后，季云卿又说出了苦衷：“光是赃物交差，本人就犯嫌疑，故须人赃交差。至多吃二三个月官司，姓季的保证安全回来，如有损伤或性命出入，按照帮规抵命。”杨老头儿果然当场叫来那3个徒儿，吩咐明日跟季师伯到上海投案自首，老头子一句话，徒儿唯命是从。次日买好船票，一行5人，带着公文包原件返回上海。捕房和领事得到消息，一块石头落地，检查公文包果然原封未动，称赞中国人破案迅速。人犯押进提篮桥西牢，因是自首，判处三个月徒刑，就此结案。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姓杨的，曾任福建督军周荫人的秘书长。卸任时，以历年搜刮所得，装了6个大皮箱，其中全是珠宝古玩，派人押运到上海，准备在租界做寓公。不料船抵上海时，发现6个箱子全已不翼而飞。杨得讯后，即来沪请护军使何丰林代为查访。何毫无办法，乃转请杜月笙帮忙。杜只用3小时，就全部追回了。他究竟如何破案，外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由于帮会与军警勾结，在那个社会里建立起一套效率极高的情报网，这就使这位帮会头子几乎无所不能了。

从这类故事就可以明白“差役不进帮，饭碗端不长”的原委，那么，又何以“帮会不通差，生意敲不成”呢？这道理也明白得很，因为帮会流氓的所谓“敲生意”，都是经营种种不法的“特种事业”，倘或军警认真起来，岂不是要处处受阻？设若帮能“通差”，且军警之中帮徒甚众，那就可以合伙“敲生意”了。常有这样的事情：帮会流氓要开武差，就先通知在帮之军警，协商妥当以后再去作案。如果是外来的帮徒要在本码头开武差，必先投帖求见本地在帮之军警头目，陈明来意，先挂上号。军警对于挂号之帮徒，不但不去捉拿，反而按照帮规供其食宿，并且告知本地情形，诸如谁家可以偷盗，谁家可以绑票，谁家势力大断断不可惊动，等等，此等报告叫做“衬底”。帮徒得到衬底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于当晚行事。第二天大早，必定满街传骇人消息：某大家巨款被盗，某大家珍宝被窃。被盗者纷纷向警厅报案，他们哪里知道盗贼就藏在军警家中呢！事过之后，所获赃物帮警按一定规矩分成，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事了。

也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失主以大帽子强压警厅非破案不可，这时警官就会找一个小喽罗来，命他限期破案，十天一催，半月一问，到期不破案，就要挨板子，再给他少数金钱作为挨板的酬劳。有些瘪三专以代人挨板子为业，这个差使叫做“拍豆腐”。何谓“拍豆腐”？原来清代衙役都要练就一种打板功夫，但闻板子响，被打者不觉痛。练时以老豆腐一方，日夕鞭打，功夫到者，能使豆腐不失原状。本是衙役徇私舞弊的方法，一直沿习下来。那瘪三挨过板子后，就哀求警官道：此案实在难破，否则，小人断不肯以血肉之躯，受这般痛苦，这一来，案子也就常常不了了之。

如果失主还是不肯了结，以种种权势压下来非破案不可，那也有办法对付。办法就是与窃贼商量，花点钱叫帮会中的一个小

盗犯（谓之“边风子”）到堂了案。“边风子”到案后，只须略认一二犯罪事实。如果逼令交出全部赃物，就这样对答：此案是三四个人一起作的，他们早已逃跑了，我得的就这么一点。于是警厅叫失将这点赃物领去，判这个“边风子”一年半载的徒刑了结。军警于是塞责，而犯案者安然无恙，一如既往地经营其种种“特种事业”。

正因为帮警勾结对于帮警双方都是利害攸关，所以，到了民国时期这种勾结日益密切了。其密切程度，从黄金荣在上海军警界的门生名单中，就可以管窥一斑了：

法捕房督察长　金九龄

法捕房政治部主任　程子卿

法捕房探目　陈三林　丁永昌

法租界强盗斑探目　曾九如

英捕房督察长　陆连奎

英捕房探长　尚　武　冯志明

英捕房探目　汤　坚　马德荣

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　韦钟秀　乔松生　卢　英

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　张　荣（副队长）　董明德（分队长）　周相成（秘书）　宋云涛（指纹科）

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　曹安昌

浦东保卫团团总　许宝铭

伪公安分局局长　张志清

这份不完全的名单已可表明，帮会头子在军警界具有多大的势力了。

帮会与洋人之勾结

旧中国帮会势力得以膨胀，帮会上层人得以发迹，一个特殊条件便是在上海这样一些大都市租界的存在。一些帮会头子正是

以租界为靠山，与洋人相勾结而横行不法的。

象上海“三闻人”这样一些帮会头子，原本是上海街头的小瘪三，穷困潦倒，到处流浪，他们后来得以发迹，首先在于他们识破了并利用了这样的“天机”：帝国主义势力在租界的统治秩序，需要利用中国的鹰犬来维护。当好洋人的鹰犬，便是迈上了“发迹之路”的第一步。

就说黄金荣吧，原本是苏州书画店裱画出身。初到沪时，流落在郑家木桥一带当小瘪三，结识了南汇县农民出身、摇柴船的丁顺华和程子卿。三人气味相投，结拜为清帮兄弟。法租界当局为了收拾这批郑家木桥小瘪三，用以毒攻毒的办法，雇佣黄金荣为刑事科包打听。黄就把大部分小瘪三收为徒弟，作为耳目。每天上午，他就到他徒弟开设的“聚宝茶楼”，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泡上一壶茶，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就纷至沓来。他指挥码头上的“三十六股党”、租界里的“八股党”和他手下的“一百〇八将”，侦察、追索了不少案犯，为租界当局效了力。有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谛带着他的妻子到太湖游玩，被横行太湖的土匪绑走。法租界当局要黄设法营救，黄就派与太湖匪首有联系的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匪首“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分文不取，交出一对法国“肉票”。还有一次，法国天主教神甫姚主教带着几箱银洋，由上海乘火车到天津去开办教堂。火车行驶到山东临城时，遭到军阀张宗昌部队拦车抢劫。此便是轰动国内外的“临城劫车案”。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捕房动员所有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毫无线索。黄金荣却利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姚主教的下落，并以重金派人买通看押姚主教人员，又按照预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赶到临城将姚主教营救脱险，安然返回上海。这一来，法租界当局对黄金荣大为赏识，称他为“租界治安的长城”，将他破格提拔为华人督察长，还专派 8 个安

南巡捕保护他的安全。

在旧中国，一登洋门，则身价百倍。对于这样一个昔日衣衫褴褛的小瘪三，人们刮目相看了。政界、商界、军警界的要人名流，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他当华探督察长后不久，一次就收了200多个徒弟。于是，他有靠山，有势力，一举承包了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当然，他身为督察长，不便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后操纵，让杜月笙和金廷荪公开经营。从中获得的巨额收入少不得要拿出一份来孝敬法国主子。不但法捕房的法籍头目坐地分赃，连驻沪法领事、法军舰官员，也参加朋分。有时法国舰队司令来华，招待法国将军等项费用，也从贩土进项中出帐。有些法籍探目见利眼红，居然不顾主子身份，拜黄、杜为“老头子”了。由于帮会和洋人的勾结，致使当时法租界的东新桥、郑家木桥、八仙桥一带，成了烟、赌、娼集中的闹市，和邻近英租界的烟赌场联成一片，数十年中，成为帝国主义在上海藏污纳垢的中心。

烟赌业的发展，更增加了帮会对洋人的依赖性，使之不得不对洋主子的旨意唯命是从。1930年，上海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1000余名工人，要求适当增加工资，资方不同意。在徐阿梅领导下，工人发动罢工，长达一个多月，资方企图收买徐阿梅，遭拒绝。当时法捕房总巡找杜月笙：如果不能帮助解决工潮问题，我将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俟工潮平息后，再考虑重新开禁。杜即找罢工领袖徐阿梅，表示愿收他为徒，并每月津贴他300元。徐不从，杜乃勾结法捕房探目，共同策划，事先仿制印有鼓动性内容的共产党传单数百张，在某天晚上由法探目马慕雅率众30余人，到徐阿梅家搜查，乘机把传单塞入徐的卧室，即将徐押解法租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判徐徒刑10年。事后，法商工会领导权为杜的门徒所把持，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就被镇压了。

帮会一些上层分子不仅与英法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而且在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情况下，置民族气节于不顾，与日帝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比如，1939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授意下，张啸林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门徒到四乡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在军需品的补给上为日本主子效劳。而在日本主子庇护下，张放开手脚贩烟土，开赌场，生意越做越大，乘机大发其财。

曾在“淞沪抗战”期间高呼“共赴国难”的杜月笙，也不肯把事情“做绝”，而是寻找机会与日本“亲善”，并曾导演过“物资交流”的丑剧，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沦陷了，大后方所急需的纱布等物资来路断绝。到了1942年，财政部战时物资管理局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机构，设法从沦陷区运进纱、花、布和其他战略物资。这个建议，经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批交军统局办理。戴笠看到这事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大可借题发挥，就和杜月笙商量，成立了一个官商合营机构，取名为“通济公司”。顾名思义，大概是和敌方互“通”有无、互“济”匮乏吧。由杜出面任董事长，总公司设在重庆。在上海，则由杜的代理人徐采丞先和日本特务机关联系好，再得周佛海的全力支持，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民华公司”，资金3亿伪币，据说全部是由日本特务机关拿出来的。读者难免生疑：为什么中国方面要购运的战略物资，敌人不加查禁，反而如此支持？原来，敌人也有战略物资要抢运，内地生产的锌、锑、锡等物资，是他们生产军火迫切需要的，猪鬃等土特产乃至鸦片，转手可获大利。更重要的是，那时日本在南进中遇到困难，加紧诱惑重庆政府单独媾和，这样的物资交换，是为此开辟了一条捷径。从那时起，大批大批的花纱布匹就不断由民华公司运出，堂而皇之通过封锁线，由通济公司接收，再运往重庆。而内地的“土”特产、军火原料也循这个途径，源源运往上海，交日本特务机关。日本使用中国的原料造成军火再来屠杀中国人。从1943后到1944年间，大规模的“物资交换”有三批。

而随着“物资交换”的频繁，蒋与日的秘密和谈也加紧了。

帮会流氓勾结各种人物之手段

帮会流氓能够与各种黑暗势力相勾结，除了有政治上互相利用、经济上互相依赖的条件之外，与帮会流氓善于运用各种巧妙手段也很有关系，这里略述一二。

“烧冷灶”。其中又有两种情形：一是结交下台政客、失意文人、落魄军官。譬如灶已烧过，冷了，他人投以白眼，独我报以青睐。1923年6月，黎元洪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后，南下活动，经上海时，作为黄金荣的客人驻留三个月，黄派杜月笙及其小八股党保驾。使这位前总统十分感激，特制10个纯金奖牌分发有关人员以示感谢。杜月笙也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文人充当他的谋士，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不但每月给以高薪，而且执礼甚恭，表现出虚心求教的样子，使这些自鸣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其服务而不自觉。另一种情况是结交一些暂时穷困潦倒、将来可能发迹的人物，好比灶尚未烧，还是冷的，而我独烧一把火，出人意外。黄金荣结交蒋介石，便是识蒋于患难之时，他不但代蒋了结数千元债务，还资助蒋一笔旅费，使蒋得以投奔广州。杜月笙结交戴笠也是如此。戴从小是个无赖，告摆赌摊骗钱度日，为警察所追捕，后来混到上海，也是在流氓群中做些无本“生意”。其时，杜月笙已跨进黄金荣的大门，与戴一见面就认为戴是个“人才”，倾心结纳，不久就结为兄弟。后来戴仕途遇阻，一度陷入一文不名的困境，就去求杜帮忙。那时，这位“三哥”已是首屈一指的上海闻人了。居然顾念旧情，一次给了他50元。用完了，杜又给他50元。对杜的“慧眼识英雄”，戴念念不忘，在他后来也炙手可热、杀人不眨眼的时候，不时对部下提起往事，称道杜的“古道热肠”，是他生平的知己之一。每次去沪，必和这位盟兄亲密聚首，共商“党国大计”。当然，“烧冷灶”也

不是逢冷灶就烧，而是放出眼光，择其素有资望者，或将来必有起用之日者，殷勤结纳，时相探望，慰其寂寥，解其困难，使彼心中感动，当你是“雪中送炭”的君子。有朝一日，“冷灶”变热，政客上台，帮会流氓便能如愿以偿。先前的投资，便可大获厚利了。

“趋热门”。就是结交正在得势的权门显贵。对于帮会流氓来说，“冷灶”不可不烧，“热门”尤须要走。因为走热门更加近便，可更快奏效，便难度也更大。第一条是要舍得花钱。比如杜月笙一听说某某官员来看他，就从抽屉里捡出庄票，袖着去会客，视来人的声望、地位，多则奉赠万元，少则三五千元。有时不但要舍得花钱，而且要预先探听贵客嗜好，以便投其所好。好古玩者则送以金石书画；好宝物者则投以珠玉宝器；有阿芙蓉癖，则奉赠上好烟土等等。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他立刻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杜又买一架飞机送他。在当时，送人飞机是很稀罕的事，所以报纸上为此事大吹特吹，正好达到他趋热门和出风头的两重目的。其他象送人以汽车、小老婆等，更是平常事。好些国民党军政要人在上海公馆用的汽车都是杜月笙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杜也送给汽车等物。

捧场面。就是拍马屁。善于广为结交各种人物的帮会流氓，都精于捧人之艺术。其高超之处在于，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杜月笙捧孔祥熙就是一例。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便转而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此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只要把这笔钱交与向传义等就行了，但他偏绕个弯子，借此机会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代办，请

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地听他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吃饭。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忙之类的话，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这样，为四川募捐救灾这件事，就变成是遵孔祥熙之命办成的了。"乌鸦吹捧杜鹃是为了杜鹃吹捧乌鸦"，杜捧孔换来的是孔捧杜。1947 年杜的两个儿子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孔当证婚人。孔当着参加婚礼的 1000 多人的面，赞扬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其实，杜月笙的烧"冷灶"，也不尽是指望这些人日后飞黄腾达，而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以低廉的代价换得失意者对自己的捧。抗战时在香港，他供给吴佩孚的秘书杨云史人参、药品和家用，死后为其营葬。还招待过苏州耆宿张一麐等。此类事甚多。杜曾这样自我表白："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偿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的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

行贿赂。帮会流氓在经营不法事业的过程中，若遇到障碍，就常常用行贿的手段打通关节，解决难题。黄金荣的门徒史雨春曾是上海糖业的领袖，伙同糖商从台湾运来食粮，多次逃税，被伪税务局查获。伪税务局将粮行老板扣押，抄走了 200 包蔗粮，还要罚款 5 亿元，查处史雨春。史就找黄金荣想办法。黄金荣便派人陪史雨春的妻子一起到周佛海的小老婆家中，送去 3 万元现钞，5 根金条。第二天，周佛海就打电话给黄金荣，叫黄今夜就派人到仓库去把 200 包糖搬走，税务局方面他已通知，只要补税，就不罚款了。后来黄就按周佛海的办法处理，事情果然顺利解决。再举一例，抗战期间，杜月笙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贩子谈生意，一次就接洽 3000 万元的定款。戴笠做的坚强后盾，保证把大量烟土

护送出口。但他承揽的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无法交货，他便去重庆找戴笠，催促他履行合同。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通过。在蒋管区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大宗毒品运出蒋管区，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而财政部长孔祥熙和戴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一直没有弄到这张护照。杜到重庆后，得知这一情况，便开了一张500万元的支票派人送给孔祥熙。孔接过支票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得孔祥熙收下支票，立刻用电话通知戴笠："货物马上准备起运。"同时与孔联系，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就到手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辆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广西镇南关交货，这便是贿赂的神通！

讲"义气"。"义气"不仅是帮会的内聚力，也是帮会流氓广为结交社会各种人物的手段。自然，"义气"也不是空谈，首先表现在肯花钱上。"黑心钱大家用"，这是帮会义气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点上，杜月笙比起其他流氓头子，似乎高出一筹。就说春节发压岁钱吧，每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银行的帐房就给他预备2000个"红包"，200个金"四开"。春节一大早，就门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恭作揖的。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了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喜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每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不到年初三，2000个"红包"就发完了，还得补上800来个，方能应付。这样光压岁钱每年就花几万元。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还有这样两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和范绍增打牌消遣。范原是四川军阀刘湘部下实力最雄厚的军人，刘死后投靠蒋的，一夜的"方城之战"，范输了近千万元。当时的法币还相当值钱。这一来，范在银行的存款，就要空去大半。范尴尬地开了一张支票，递给正在烟榻上过瘾的杜。杜笑着说："白相相，

老哥怎么认真起来，太见外了。”说毕，就在烟灯上焚毁了。还有一次，杜和川帮一个大财阀打牌，一场交锋，那个财阀输了二三百万元。支票递到杜手中，杜连声说：“笑话，笑话！”就手撕成碎片。此类事件传开以后，重庆的官场泛起一片赞扬声：杜月笙真“四海”，够朋友，真是经过大场面的！

经营不法事业造成的经济实力，辅之以在流氓社会练就成的巧妙手段，遂使帮会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宛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了。

（选自《民国黑社会》）

漫谈清洪帮

杨方益

一、我最初知道和接触过的一些帮会人物

这里所说帮会人物，主要是指靠帮会活动吃饭“混世”，发展势力，甚而因之起家发迹的。这些人物也分布于当时的上、中、下流社会里，人们常常提到“上八洞神仙”，或“中、下八洞神仙”，就是对他们社会地位高低的评价。

我世居镇江五条街之一的梳儿巷，童年就知道五条街有些比较特殊的人物，被人称为“十二属”。我喜向年长者寻问，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懂得这“十二属”并不是指他们的生肖属“鼠”、属“牛”等等，而是指在五条街一带“混世”的12个地头蛇。这些人都拜了清帮老头子，仗势欺人，软敲硬诈，以后这些人由老而死，但竟也新陈代谢，逐步形成了“新十二属”。那时镇江城里关外，都知道并常谈论五条街的新老十二属，但我进出五条街数十年，也请教过多少人，从来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新老24人究竟是谁，而且也从来没有人承认过自己是“十二属”之一。这新老24人虽说不清楚，但别人是有点数的，如我就知道其中还有一个至今健在，已年近九旬的人。而这些人直到解放前后，如问到他们是不是“十二属”，不但矢口否认，甚至还面红耳赤，认为是对他的污辱。这大概因为“十二属”在当时属于下流社会，在清帮中

是“下八洞的神仙”，以后他们中有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连他们自己也耻于承认了。

我在21岁时，认识了一个清帮人物顾华堂，是清帮通字辈，是靠帮会“混世”吃饭的人。他对清帮帮规、人物，异常熟悉，而且对清帮的行话“海底”背诵如流，因而成为清帮中知名的“传道师”，常常受到江南江北各地帮会中人的邀请。他属于清帮内的中流人物，是“中八洞的神仙”。我每遇到他，总喜欢拖他闲谈，问长问短，因而知道了不少关于清帮的知识和一些趣闻琐事。我由于好奇，曾千方百计地要求他带我看一看清帮开香堂收徒弟的实况，但因他遵守帮规，始终未肯满足我的要求。

我24岁时，有两个上海清帮中有名的大字辈人物曹幼珊、李琴堂，算是“上八洞神仙”了。他们路过镇江，一时高兴，要在镇江收几个徒弟（因他们辈份较高，在上海已不能收了），便在大埂街某宅大厅开香堂。我通过关系想去参观，但由于帮规是不准帮外人——“空子”闯入的，就拒绝了我的要求。但邀约我参加他们的晚宴，可以让我看看事前的布置和准备，并参加一些谈话和询问。到半夜开香堂之前，退到大厅前一进屋内住宿。事实上是让我隔着窗棂观看，因此，可以说我是亲眼看见过开香堂仪式的。此后，我曾借阅过一本书，是上海某书局的石印本，大致是《安清帮规大全》，记载着清帮历史来源、香堂仪式、帮规、海底等等，是由一个清帮较有名的大字辈人物付印的数百册，分赠“家里人”，并不公开发售。由于以上这些情况，加上以后到中年时也接触过一些清帮人物，我总算对清帮有些了解。

二、清、洪两帮名称的由来

据传清洪两帮都来源于明王朝覆灭以后。清王朝的顺治、康熙年间，民间逐渐形成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族组织，并

有传说是明末遗老或剑侠之流所领导创建的，其目的是企图保存一些反清力量，待机而动；而领导的人并能借这股势力的掩护，隐姓埋名，出没市井之间进行活动，而不被清王朝的官吏爪牙所察觉。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个“反清复明”的目的并未能达到，逐渐被遗忘了，并演变成一个并无鲜明政治目的，时间连绵近300年，地域扩散达十数省的松散帮会组织。

清帮初期原是秘密组织，开始是在运粮船上，以船上执事、水手和纤夫等为对象。当时清朝皇室和政府，以及黄河以北的八旗驻军所需大宗粮米，必须完全取之南方，尤其是长江下游。并特定数千艘大粮船负责在大运河——由杭州到天津向北运输，故这条运河又名漕河，即运输漕粮之意。清王朝并设专职重臣“漕运总督”负运漕粮之责。总督之下，又分设二品衔大员的“分巡道”，分段督运。可见这条漕（运）河，实为清皇室和政府命脉所在，是生死攸关的运输线。而志在反清的清帮在这方面建立根据地，一旦发难，全线响应，就可以切断粮饷，危及京畿。清帮既然以粮船职工为主要对象，并就在船上开设香堂大收徒子徒孙，自然发展很快，闹得轰轰烈烈。于是，原来的秘密组织不能保密，不久也被清王朝得到消息，立即敕令漕运总督严查法办。当时的漕督，深知帮会势力已蔓延到运河全线的所有粮船上，考虑到如贸然采用压力手段，很可能激成事端，反为不便。乃召集清帮头目，反复晓以利害，劝令他们不要有所举动，偃旗息鼓；一面向清室复奏，说他们实名“安清帮”，拉拢师徒关系，目的是为了顺利地运送漕粮，并无不轨行动。这样，一场风波平息了，这个帮会组织也逐渐淡忘了原来宗旨，并习惯地自称“安清帮”了。以后以讹传讹，误以“安清帮”为“安庆帮”，说是发源于安徽，这绝非事实。久之几代相传，既不知原始的反清宗旨，也不赞同安清字样，改简称“清帮”，因行驶运河，取“风平河清”之意。最后再误“清”为“青”，习惯称为“青帮”了。

关于红帮，原称“洪门”、“洪帮”，据传也是明亡后的一个反清组织。顾名思义，“洪”是指明王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则“洪帮”、“洪门”明明有复明的含义了。以后也和清帮一样，年代久远，面目全非，演变成被某些人利用、有很复杂成分的帮会组织，结果竟成为混世吃饭、交朋友、成家立业、发财致富的工具。有的依仗它扶植自己的势力，招兵买马，做军长，当司令，有的借以啸聚英雄好汉，占据山寨，打家劫舍，当上无本生涯的山大王；他们已完全不知道原来的“反清复明”的性质了。

关于两帮名称演变的由来，以上所传似有一定的理由，姑志之以待考证。

三、清、洪两帮发展区域以及“充”和“赖”的问题

清帮既起源于运粮船，由船发展到岸上，再沿运河两岸逐渐扩散，于是京、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上海当时属于江苏）、浙江等省市，再溯而西上，安徽、江西以至两湖都逐步打下基础。洪帮据传发源于四川，亦即人所共知的“四川袍哥”。云南、贵州等省，也颇有发展。但两帮有两个不同的特点：第一，清帮是“准充不准赖”，而洪帮则“准赖不准充”。既然清帮准许冒充而不许抵赖，其活动自然比较公开，发展也比较快速而广泛；洪帮可以抵赖而不许冒充，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要严守秘密，帮规也比较严峻，当然也就发展慢而范围较小了。这是就两帮比较而言。如单谈洪帮，除西南几省外，也发展到大江南北。不过它的成员，一般遵守“赖”的原则，严守秘密，故不易为人所知。例如，向春亭是清帮有名的“站山头”人物，远近皆知；但他曾在民国13年（1924年）又加入了洪帮，而且是位尊的“袍哥大哥”，那时他

从不随便和人谈洪帮的事，基本上也无人知道他也是洪帮中人物，直到1939年，他在四川、云南一带受命办理驮运业务，必须利用“袍哥大哥”的身份进行活动，这时他才为少数同乡所知。即使到抗战胜利后，我曾偶然和他谈到帮会并询问洪帮的内幕，他说：洪帮帮规较严，还是少谈为妙。可见他还是有所顾忌的。所以洪帮真实情况，帮外人所知极其有限，本文实际上也只能偏重于谈清帮资料了。

两帮第二个明显不同的特点是：既有无辈份问题。清帮是一辈一辈地传下来，在民国初年以后的近40年中，是“大”、“通”、“悟”3个字辈的时代，已经是清帮的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代了。而洪帮则没有辈份，都算同辈，最尊的称作“大哥”，其次是“老三”、“老五”以至“老么”，地位各不相同。

四、清帮的开香堂和赶香堂

关于清帮收徒弟要开香堂举行仪式，据我所知，抗战以前，清帮早已发展到十几省的广大区域，规矩礼节，基本上是一致的。抗战开始后，大片地方陆续沦陷，一些清帮中站山头、有名望的人物，不惜直接落水当汉奸，有的迁居西南后方，有的寓居香港、澳门；也有很多暂时迁移别地，隐迹潜踪，不肯公开活动。于是剩下一批更下流的帮会中人，甚而一些冒充的“空子”也开香堂收徒弟，俨然成了站山头的清帮老头子。这些新兴的清帮老头子，和日伪勾结，为非作歹，根本不注意帮规仪式。而他们开香堂收徒弟，也不一定有通晓帮规仪式的“传道师”来主持，无法“引经据典”，就随意安排。

开香堂在清帮中确是一件郑重其事的大事，他们进行时是非常严肃的。香堂一般利用朝南厅堂，堂内上首正中摆设供桌是供天地的，牌位上则写着“天地国亲师”5个大字，是从封建君主时

代相沿承袭下来的，将“君”字改为“国”字而已。距天地供桌以南一米许处，正中又设一供桌，设3个牌位——翁、钱、潘三位祖师；而在香堂东偏间还放着一张较小的供桌，供的是“小爷”的牌位。据说，翁、钱、潘三人创立清帮，是结拜过的异姓兄弟，以后遭遇变故，帮的活动停止了（很有可能即前面所说清王朝诏令漕运总督查办而暂停活动时期）。过了一段时间，才有三房潘祖爷的一个后代“重整家园”，继续开堂授徒，逐渐恢复了清帮的活动。因而以后对这个“中兴”的祖师，称为“小爷”，另设供桌，以示尊崇。有人说，此后清帮子孙，都是三房潘祖师爷的后代，翁、钱两房，就算中断了。所以清帮中人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有人简单地说：“他也头顶一个潘字”，或“我也是潘家子孙”，双方就都明白是“家里人”了。

开香堂授徒时，必定有三个师父，主要是“本门师”（常常被误称为“本命师”），这时正式投拜的老头子；其他两个是“引进师”和“传教师”（常常被误称为“川跳师”）。引进师是介绍人之意，而传道师则是香堂的灵魂，负责仪式的正常进行，并传授帮规“海底”。至于帮口问题，由于清帮发源于粮船，就按照粮船的行驶，分面36帮半，说是象周天365度；而帮名则按“江淮”、“兴武”、“嘉卫”等各由一排到十二。以后各帮收徒传孙，发展各有不同，有些帮口已默默无闻，而有发展的只有“江淮四”、“兴武六”等八九个帮口。当开香堂时，本门师所邀约的其他两师，都必须不同属于一个帮口。在开香堂的仪式当中，有一项就是三个师父要分别各自交代其本人的帮口和三代的姓名籍贯，因为三个师父不是一帮，所以称做“三帮九代”。然后再由传道师交代“十大帮规”。这个“三帮九代”、“十大帮规”，每一个清帮中正式拜过师的人都必须熟记，而遇到某些场合都必须能交代出来。我看到有一篇史料上写的是“四个师”、“帮规十二条”，这很可能是汪伪时代，有一个汉奸常玉清，组织了一个什么“安清同盟会”所

订的一些“制度”。

开香堂行礼，帮里称作“孝祖”，不管什么字辈，都严肃地站立在各自的行列，字辈再大也无坐下的。在参加的人进入香堂按班肃立以后，由传道师点烛烧香，发号施令；而每一动作，比如烧每一炉香，传道师都高声朗诵几句似诗非诗、似赞非赞的词句，而且熟读如流，这也都是传道师的看家本领之一。香烛点烧齐后，仍在传道师指挥之下，先由本门师等先后向三张供桌叩拜，继而所有参加和赶香堂的人按字辈依次叩拜，最后方由新投师孝祖的人叩拜。而这些刚“进山门”投师孝祖的叩拜方式，和其他已进山门的叩拜方式是不同的，在进入香堂前传授演习过了。他们必须先微微弯腰，将左手按在左大腿上，再将右手加在左手背上，然后先跪右腿，继而放开两手，再跪左腿。双膝跪齐后，三次叩首，起立；再这样跪拜，共计三跪九叩首，在三处供桌前都是如此。拜过牌位后，再向三师进行一跪三拜。接着站在三祖师香案前，由三师各自交代三代，再由传道师交代“十大帮规”及简单传授清帮中互相查核的行话——“海底”。而传授“海底”，更是象征性的，一时哪里能记住，都只有随后和“三帮九代”、“十大帮规”一并传抄背诵了。

其实，一般清帮中人，除一些专门当传道师的以外，很少有人能背诵帮规和大量“海底”，而最主要的、基本的则是“三帮九代”，必须熟记，因为有时碰到“家里人”，特别是长一辈的“前人班子”，不一定有恶意或故意盘问，也会随便问道：贵前人（指本门师）是哪一位？那就不能随便答姓甚名谁，而必须按照“家里规矩”，用一定的方式回答了。

香堂在交代帮规等以后，正式仪式已算完成，最后由本门师介绍“赶香堂”的前人班子和同辈的“家里人”。因“先进山门为大”，投师者都必须一一叩拜，长辈还辑，同辈回叩。这时投师者已经过“孝祖仪式”，其叩拜方式和其他人一样了。投师者的香堂

仪式完毕，就算正式清帮中人。行这种仪式，也叫做“上大钱粮”。

开香堂时，除了三师和投师的人以外，其他参加的人都称做“赶香堂”。但赶香堂的人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属于“帮场架势”的，大多和开香堂的老头子有交情来往，或虽无交情，甚而并不相识，经特别邀请而来；也有开香堂的人名头大，虽并不相识，特主动赶来表示祝贺，借以拉拢的。这些人当然都是为了“帮场架势”而来。另一种是对开香堂的不满意，或因故有了隔阂，闹矛盾，甚而有的因为开香堂的不知名，怀疑其混充，意在抢占山头的。这些人是居心挑剔寻衅，而且都是直接闯进香堂。他们到达后，当然双方都紧张，但都要保持礼貌，找机会进行对话。实则用内行话即“海底”进行问答，一方面找岔儿，另一方面使出解数，都是暗藏机锋，一着不让。经过认真交锋，结果也各有不同。有的看到开香堂的或传道师确是有“道行”的“家里人”，又有许多有名望的“够味儿”的朋友在场，仪式也很正规，无懈可击，自然涣然冰释，互相拉交情了；也有各不相下，经过在场朋友“拉场”，顺水推舟借以下场的；有的虽然来势汹汹，终敌不过坐地老虎，不得不夹着尾巴走路的；也有互相挑剔，各不相让，冲打一场，以致仪式不能继续进行，只好半途而废。这样的老头子，自然就站不住脚，只好另开码头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闯来的人也并不准备闹到这种地步，逼人太甚，一般总是经过斡旋，言归于好。

开香堂一直是被人注目的事，不管是在北洋军阀或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被禁止而不能公开进行的（敌伪时期可能是例外）。故总是选择乡村庙宇或城市深宅大院，并在深更半夜进行，以免泄露遭到干扰和破坏。即使这样，还需要有周围层层密布暗哨，一遇风警，立即掩蔽或转移。

香堂仪式既在半夜进行，一般在事前即隔晚办一餐酒席，事

后，即凌晨一餐是点心，茶水烟酒（多数还须供鸦片烟），香烛纸马，加上外地客人车船川旅食宿等等费用，总数也颇惊人。这表面上都由收徒弟的老头子一手包销了，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取之于徒弟；师父是不会蚀本的。因为徒弟拜师另外还要写帖子，照例要付上一个“押帖费”的红纸封套，数目并不一定，小的十元八元，大的几十上百、上千也是有的。上海黄金荣搞什么“四教堂”落成时，十分铺张，哄动全市，甚而将全国京剧名演员都邀来参加堂会，以示庆祝，并乘机大收徒弟。这些徒弟，所花的押帖等等费用，都是成千上万，令人咋舌。杜月笙也建造一个“杜祠”，富商之子黄××投帖拜师，押帖费送了一艘轮船为赞敬礼，价值5万元，以供贺客到浦东的轮渡（以上这些数字都是物价正常币值稳定时的数字，有人说黄××押帖费是50万元，那过分夸大了），后得被派为扶香亭的执事，诩诩自得，引以为荣。

老头子拿到徒弟的押帖费来开销香堂一切费用，往往是颇有盈余的。何况，还有赶香堂的“老老少少”、“爷儿们”、“哥儿们”，照例都必须致送“香仪”、“贺敬”，他们都是江湖混世的朋友，多的也会几十上百，以显示手面，拉拢交情，这些都是老头子的额外收入了。所以开一次香堂，开支不小，收入也很可观。

五、“小钱粮”、“开山门”、“关山门”和“灵前孝祖”

开香堂收的徒弟，称为“上大钱粮”，这是和“上小钱粮”相对而言的。开一次香堂，必须收一批徒弟，其中还要有几个能多出钱的，还要邀请引进、传教两师和很多帮场架势的人，所以就只能偶一为之。不在开香堂时期，若有人希望向有名望的老头子投师，也可以向师父投递一个帖子，附上押帖费若干元，再加上一两桌酒席，邀请师父一些朋友和同门兄弟，这就叫做“上小钱

粮”。这种徒弟，没有另外两帮师父，谈不上“三帮九代”，也不严格传授帮规海底。按照清帮认真地说，叫做“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遇到有人“参教”时（询问盘查之意），可以老实回答：“曾在某太爷门下，上过一份小钱粮”，对方即可谅解，不再寻根究底了。清帮对上过大、小钱粮的人，都认为是“家里人”；同一个师父则称为“同参兄弟”或“同山弟兄”。“同参”是一同参拜祖师之意，“同山”则是指一个山头。对帮外人都称为“空子”，但有一些“空子”很接近帮会人物，而且娴熟帮规礼节，帮里对这种人也很尊敬重视，称为“玲珑空子”。

一个帮会中人，从投师孝祖、交结朋友、闯荡江湖，到逐渐有了名气，这才有资格并敢于收徒弟。最初要挑选一个够条件的——包括能混，有手面，最好是能花钞票的作为第一个，称为“开山门”的徒弟。以后陆续收了徒弟，这个“开山门”的大师兄，家里人都称之为“小老大”，在同山兄弟中有相当的权威，往往可以代表老头子发号施令，也常常可以代表老头子招待迎送江湖朋友，逐步培养成为下一代的老头子了。有时对同辈弟兄也称之为“小老大”，但这都是表示亲昵而尊重的称呼，和前面所说的开山门的“小老大”有所不同。老头子的亲生儿子要投师孝祖，必须另行投师，不允许对自己的生父上大、小钱粮。

一个人开山收徒弟若干年后，徒弟多了，也有的徒弟有资格收徒孙了，于是就应当关山门停止收徒，否则新收的徒弟，一进山门就成为那些徒孙的“前人班子”，很尴尬。这时常常再挑选一个有条件的作为一个最后的“关山门”的徒弟。这个关山门的人也比较特殊，同山的兄弟，都应当多加照顾，亲昵地称为“老巴子”；而一般家里人，即使不是同山，也要看其老头子的面子而另眼看待。其时，有些老头子已关过山门了，遇到特殊情况，主要是遇有条件比较好的徒弟，也有重开山门、再关山门的。总之，不管“小老大”、“老巴子”或重开山门，这个对象一定要很能干，或

有钱，或特有势力，或兼而有之，才能为老头子发生一点作用而被重视。

老头子死了，他们叫做“过世”，即使没有关过山门，也自然关了。何况有许多早在生前关过山门的，但也并不排除再开山门收一两个特殊的徒弟，其方式就是采用“灵前孝祖”。一般由这个已死老头子的徒弟们做主，并征得和老头子同辈的前人班子同意，于开香堂时，除设前面所说三张供桌之外，再于香堂下首设一供桌，供上这个已死老头子的牌位，也就是说靠这个灵牌收徒。行礼时，由资格较高的一个同山弟兄代表老头子传授本门师的帮口三代；另外再请两个帮口不同、和师父同辈的人分作引见、传道两师，如没有适当的人，也可以请下一个字辈的代表其师父分别交代帮口三代和帮规等。所以“灵前孝祖”一定要具备几个条件：（一）这个被投拜的已死人物，一定在当时字辈较高，名望较大，提出来很响亮；（二）这个投师的人，一定也要有相当名望或其他较好条件（如有钱、有势等），对同山弟兄和已死师父都有利；（三）一定要多数同山弟兄和帮里有地位的人共同支持，并来参加香堂仪式。这种香堂规模较大，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北洋军阀直系头子吴佩孚在一败涂地之后便躲在天津诵经拜佛，约在1932年左右，大概又动了尘念，忽然想当起清帮老头子来了。也许是想以此结交朋友，蓄积力量，以图东山再起。但清帮的第二十代理字辈早已死亡净尽，又不能做第二十二代的通字辈，也只有用“灵前孝祖”的方式了。于是清帮中人多处邀约，据说当时全国大字辈尚存37人，竟请到了近20人；有名的通字辈也到了很多。据传香堂规模相当大。本门师的代表为谁，已忘了，引进师、传道师的代表，则为上海有名的大字辈曹幼珊（原籍江都）和李琴堂（原籍镇江，蒙族）两人。前面第二节所说有上海几个大字辈路过镇江，收了几个徒弟一事，就是他们相约北上参加吴佩孚投师仪式去的。

六、“海底”、“通草”、“参教”以及字辈

各种帮会，一般都编造许多隐秘的对白或诗歌，作为内部对话标准，或对是否是“家里人”的考验，逐步形成了它一套内部通行语言，有人将这些整理记录下来，加上一些帮规仪式等等，称为“海底”，也有人称为“通草”。据我所知道的看到过的这类海底、通草，有很多种，有繁有简，虽然主要内容有某些相同，有的却差别很大。有人说清帮称为“通草”，洪帮称为“海底”，也并不是这样截然分开的。我前面提到所看过的《安清帮规大全》，系经清帮中有文化的人加工整理过的；又听说有张镜湖写印过《通草》，当然也是整理过的。但我问过清帮中熟悉帮规有“海底”的人，却不承认那些公开印行的东西，说都是一些“玲珑空子”搞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公开材料，并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其实，他们所认为宝贵的“秘本”，也各不尽同，究竟他们祖师爷所“真”传下来的《海底》是怎样的一本，也无从考查和确认了。

“参教”一词，在清帮中是很有分量的。如果两个初会的江湖朋友，或是初次暗示自己是帮会中人，提出“我们来‘参教参教’”，就必须郑重对待了。这一词表面上是请教之意，事实上也就是按照“海底”、“通草”进行对话，并加以考核的意思（《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初见座山雕时的问答，就属于“参教”）。“海底”的内容，很多牵涉到船上的词语，将这些江湖话称为“海底”，可见是由于起源于运粮船帮的原因。所以，一些自命为正统的传道师，只承认“海底”而不承认那些流传的“通草”。

一般说，“参教”是为了弄清楚是不是真正的“家里人”，象那种穷追猛打、盘根究底的“参教”，则是不相信对方是“家里人”，或者双方有了“核子”（矛盾），借“参教”问倒对方，“霉”对方，拆对方的台，而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一般查问一下

“三帮九代”，能熟练地交代出来，也就可以算是交卷及格，彼此就可谈家常讲交情了。而在“参教”交代“三帮九代”时，也有一定的形式和说法，稍一差错，就被对方看“翘”了。两人对面而坐，态度严肃，两手分按桌角，互相奉茶、奉烟等等都有一定的规矩。例如倒茶要右手执壶把，左手微按壶盖茶嘴之间。请酒赴宴或便饭时，敬酒奉烟、敬菜送菜以至吃完后打招呼，都有一定的方式。在正式发问时要两手按桌角，微微欠身起立，说：“请问老大（这时不明字辈，故一律互称“老大”）哪一座宝山？”回答者也要手按桌角欠身起立，说：“好说好说，敝帮是×××（兴武六、江淮四之类的帮名），敝家师上某下某（这是表示不敢直呼“前人”之名，而将两字拆开来称，如系单名，则说“单名一个某字”），他老人家是某省某府某县人氏。”其实，自辛亥革命后，早已废掉“府”一级政权了，但交待三帮九代时，相沿一定要说明某省某府某县，不能马虎。接着，不须对方发问，交代：“敝师……”、“敝师太……”，和前面一样，但不须再交代帮口，这就算交代了一帮三代。如此，再继续交代引进师和传道师的帮口三代。“三帮九代”交代完毕，彼此打个招呼，就算“参教”结束，而互相承认是“家里人”，可以随随便便谈话了。但如有一方发现对方字辈比自己大，是“前人”班或师爷班子，就一定要用“海底”上的话打招呼，表示在此地还不便，等以后再补“家里的规矩礼”。如你在屋内都是“家里人”，还必须按“家规”进行叩拜。

谈到清帮字辈，“大”字辈以上还有“理”字辈，是一般人皆知的。我20岁左右时，还认识镇江一个拳师任小斗，就是“理”字辈，当时一些“大”字辈都尊重他。他善拳术，精于医治跌打损伤，藏有祖传秘方，近30年来镇江著名的伤科医生许春华，就是由任传授拳术和医道，最后将秘方也交给许了。许是向任学拳学医的徒弟，和清帮无关。实则“大”字是清帮的第二十一代，一般人都知道那时一些站“通”字的较多，往往说：“我头顶二十一，

脚踏二十三”，就表明是“大”字辈的徒弟。我所记得的，三祖师以下，第一代为“罗”字，就是：“罗、祖、真、传、佛、法、玄、妙、普、门、开、放、万、象、依、归、园、明、性（不是“心”字）、理、大、通、悟、觉、嘉、律、传、宝……”宝字下面还有，我记不得了。这样，对于文义也较通顺的。

有人提到，“参教”时如发现“空子”冒充，可能要吃“三刀六个眼”，在清帮是不会这样的，因为清帮是“准充不准赖”，遇到“空子”冒充，还和别人“参教”，被戳穿了，给一个“下没趣”，不准其“混充好汉”，最多逼着“另开码头”，滚开就算了；如真是“穷光蛋”，还可多少给点“盘费”，以示江湖义气。至于“三刀六个眼”，是洪帮的口头语，遇到争执，互相搞翻了，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用匕首在自己腿上狠戳三刀通心过，就成了“三刀六个眼”，使对方服贴。这种传说是不是事实，无从考查。至于清帮为了整肃帮规，私设公堂，罚输钱财，棍棒吊打，甚而捆绑之后，投沉江河，也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

七、抗战前的一些清帮人物

抗战前，我还在中青年时代，接触面还不广，对当时清帮头面人物并不熟识，仅就当时所闻作一回忆。

清帮发展到中上层社会，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年间，而其鼎盛时期则在国民党统治以后到日寇入侵以前，即 1927 年到 1937 年的 10 年间。清帮这时已由“反清复明”的宗旨逐步蜕变为毫无政治目的、松散的民间帮会组织，当时官吏、豪绅，认为帮会就是青皮、流氓，即使并未参加帮会，也可以加上帮会帽子，至少也要打板子，坐班房，枷号示众的。然而帮会特别是清帮，采取了掩蔽秘密方式，仍然大量发展于下层阶层中。它不仅发展在青皮、流氓、土匪、大盗中，也发展在医卜、星相、卖艺、卖药

等各种走串江湖为生的人当中，也发展在码头、驿站挑抬搬运卖苦力的劳动人民当中，甚而还发展到官府近侧为官府耳目、爪牙的禁捕、役吏当中。民国和清王朝的专制体制毕竟不同，随便抓人、打人、枷号示众现象，多少有所顾忌。帮会方面，虽然不能公开开香堂，但已可较为自由地发展了。原来的帮会人物，经济状况有的逐步上升，也经营某些行业；加上茶馆、酒店、戏馆、旅馆、浴室、轮船运输等等行业，要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情形比较复杂，往往需要利用帮会，便也成了当时帮会的发展方向。帮会也进入社会的中层，甚而中层偏上了。这些行业，有的本是官绅资本，他们参加帮会以减少麻烦，有的还请了帮会中有声望的人担任"外照"，表面上成了行号的负责人，实则并不过问业务，只是担个名义为行号"挡挡风水"而已。后来军警界人物，也有打出旗号公开参加帮会活动的。例如在1920年左右，当了多年旅长兼南通镇守使的张镜湖（张大胡子），就是有名的大字辈，并曾广收门徒。他以清帮头子交结江湖朋友而知名。前面提到有一种清帮的"通草"本，就是他整理印行的。由此清帮头面人物地位逐步上升，也能和当时上流社会接触交往了。

如果说清帮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逐渐发展，而到1927年以后国民党统治时，成为它的极盛时期，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和蒋介石利用清帮反共分不开的。当蒋介石决心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利用了上海清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共进会"，聚集他们的徒子徒孙，向共产党首先发难，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在蒋介石政权巩固以后，他们都是有功之臣，身价倍增，原来被人贬称的"麻皮金荣"，逐渐为"黄金荣先生"所代替，以后又大兴土木，建造厅堂楼阁。竟有些无耻文人，将他的广收门徒，比作孔子的弟子三千，为他的建筑题名"四教堂"（取《论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之意），作序上匾，大大热闹了一番。"杜先生"不甘人后，也建造了一所雄伟壮观的"杜

柯”。他们两家先后的“盛会”，不仅轰动上海，各地帮会和知名人物，甚而工商界、军政界人物也云集上海，大肆庆祝，还将全国有名的戏曲家、艺人招致上海，为他们作堂会。这样，清帮在国内社会地位更加提高，在上海及江、浙、皖一带大为发展。

谈到黄金荣等人在清帮的字辈，据我所知，只有张啸林站“大”字，黄金荣系站“通”字，杜月笙还要小一辈，以后“爬楼子”爬成“通”字。所谓“爬楼子”，是因清帮中人原来字辈较低，后势力发展了，帮内地位增高了，就另行投拜一个高一辈的“前人”班子，或由帮内有影响的“好朋好友”帮衬架势，证明他原来是某人的“下巴壳子”（即徒弟，如说“上眼皮”即师父），就自然而然地爬上一层楼了。外面传说他们三人都是“大”字辈，是不符合事实的。在那个时期，清帮中人多方联系访查，全国的“大”字辈，只有37人左右，黄金荣邀集他们到上海为“四教堂”落成祝贺，只到17人，并曾摄影留念，而这些人多数是在沪、苏、皖、浙一带。那时上海居住的“大”字辈有5人，除张啸林外，最著名的有曹幼珊、李琴堂两人。曹幼珊人称曹三爷，李琴堂人称李二爷，他们原来在镇江没有正当行业，就先后去上海“混世”，凭清帮关系，也“混”得家成业就，并收了不少徒弟。但他们对收徒弟颇有选择，主要是以服务娱乐等行业以及某些工商业的老板、经理为对象，而这些徒弟，大多是为了“借一步走走”，借老头子的声势站住脚，以免被人欺负；他们决不会惹事、闯祸，为老头子造成麻烦，而且四时八节对老头子孝敬丰富。曹、李二人不仅在上海帮里帮外而且在长江沿岸、直到武汉以至平、津一带的江湖朋友方面，都颇为知名，镇江、扬州一带就不用说了。但黄、杜、张等效忠蒋介石反共建功之后，地位剧升，曹、李等考虑不能再收徒弟了，因他们所收门弟，站“通”字辈，和黄、杜平起平坐，而且还是黄、杜所收的徒弟的“前人班子”，是颇难相处的。久后必然要和黄、杜一帮矛盾激化，说不定会出什么乱子。

于是他们“关了山门”以示好感。这样，避免了和黄、杜的矛盾，并赢得了他们的尊重而相安无事。这也说明黄金荣并不是“大”字辈。至于说曹、李“关山门”，也是骗人的，前面不是说到他们北上路过镇江，又收了一批徒弟吗，就又“开了山门”。好在这些新收的“通”字辈，不会和上海方面发生摩擦的。

由于上海是四方荟萃、华洋杂处的水陆码头，帮会的发展比较快，易向下传，字辈自然就比较小。当上海“大”字辈退居，“通”字辈站山头做世面的时候，镇江、扬州一带，则仍然是“大”字辈当令，还在大收“通”字辈徒弟（一些资格较老的“通”字辈，也在开香堂收徒弟了），所以曹幼珊、李琴堂可以在镇江收徒。而其时镇江“大”字辈最“吃得开”、名字最“响”的，则是朱炳元，曹、李和他也是颇有来往、互相帮衬的。

朱炳元，人称朱二太爷，早年所收徒弟，大多是江边码头、车站的工头和工人，以后家成业就，名气大了，在这些范围内，就让徒弟去收徒孙。他自己收徒弟很慎重，选择一些年岁较大的殷实人家子弟或商业老板、小开之类。他逐渐和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交往，以后又担任苏浙皖卷烟查验局镇江分所负责人，而成为半官人物。于是工商团体和商业行号人士，又不得不和朱接触。他的社会地位也就逐步上升，虽还未能跻于士绅之林，至少已不将他看成一个帮会头子而鄙视了。其时传说朱的最得力大徒弟是闵芝贵和向春亭，闵的情况我不清楚，而向的师父实是清江冯守义。冯常来镇江，和朱关系密切，早年将向托给朱照拂，朱就培养提拔。向对朱也十分尊重，他们关系亲密，有些人就以为他们是师徒而传开了。但向以后的成功，也确是和朱分不开的。

当时镇江的“大”字辈，除朱炳元外，还有杨善之、魏子荣、胡小望、步长生等。杨善之人称杨二太爷，住排湾，所收徒弟多在排湾以西以至高资桥头一带，主要是一些乡镇保长以及农村中的尖子人物，地域范围似乎与朱炳元是楚河汉界，各不相扰，虽

未正式签过协定，大概是互相默契的。而以后句容、丹阳、金坛、溧阳一带农村，多有慕杨之名来投师者，以后杨也多次去这些地方开香堂收徒，势力颇广，甚而有时在这个区域内，能对竞选发生相对的影响。胡小望原是镇江蒙族人，所以徒弟主要在镇江南乡官塘桥、西麓、上党一带，这里当时是土匪出没之处，他的徒弟较为复杂就可想而知了。在市内南门大街五条街一带，也收了一些徒弟，多是一些下层青皮、"十二属"之类，还有一些是原镇江旗营里已经没落的满蒙籍八旗子弟。步长生人称为步侉子，住陋园巷，所收徒弟多为附近小孟湖、黑桥一带拉人力车、挑抬的苦力。这一带也较为复杂，有些兵痞、土匪出没于此。他们有时在省保安团、县保安队吃饷当兵；有时利用枪支拦路抢劫，可说兵匪不分，其中有无步长生的徒弟，也很难说。魏子荣情况记不清了，他和朱炳元、杨善之都可以和中上流社会阶层交往，而胡小望和步长生则不能，他们各个势力范围的分布也有所不同。

以上一些"大"字辈的清帮人物，是当时镇江各阶层中都知名的，其他还有在苏北站山头、经常往来镇江而知名的，有清江的冯守义，人称冯二太爷；扬州的阮慕伯，人称阮五太爷；朱钧甫，朱炳元之弟，人称朱五太爷，以及瓜洲的樊葆臣等。另外还有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当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的扬州人王柏龄。扬州商会会长王敬亭也都是大字辈，不过他们厕身于军政界或工商界，不以"混世"身份出现，也不开香堂收徒，只是有这么一个关系而已。

如说当时清帮的"大"字辈，全国只剩37人，前面所涉及的，包括上海张啸林、曹幼珊、李琴堂等已有12人，而且大多在苏、沪、浙、皖一带。至于当时的"通"字辈、"悟"字辈，也很活跃。尤其是"通"字辈中较有基础的人，其中向春亭、江炳堃已在镇江广收门徒，而向更为佼佼。入清帮"混世"的，也都知道并非正道，某些混得较有声势的人，就想到要成"正果"才行。他们

对江湖朋友就力求“四海”、“够味儿”（意味着不吝金钱广为结交，并尽量满足别人的要求），对帮外社会中上层人士，也多方联系结纳，争取一定的声誉，最后能跻于绅士、名流之林，这就算是成了“正果”，而向春亭就是这类的一个典型人物（见向的口述《我在清、洪两帮》）。

八、沦陷时期的镇江清帮

镇江沦陷前，清帮的一些“大”字辈、“通”字辈的头面人物，大多离开本地，有的辗转迁徙后方，有的避居苏北或农村。据我所闻，前面提到的沪镇一带清帮知名人物，除张啸林意欲“下水”，即被狙击而死外，其他基本上都没有投敌投伪，甚而不久即返回镇江居住的汪炳堃，虚与敌伪周旋，坚持不接受一官半职，不参加活动，保全了民族气节。但也有些无耻之徒勾结日伪无恶不作。上海有常玉清，自命为清帮总头目，成立什么“安清同盟总会”，重行整理订立章程、帮规等等，并于各地成立分支机构，俨然以清帮最高领导者自居，当时敌伪报纸上也有片断新闻报道的（大概是1942年以后的事）。镇江于沦陷后，很快就出现了抢站山头的“通”字辈老头子邱凤仪、胡春潮等人。但不管是上海、镇江或是别的沦陷区域，都直接听命于日本军部特务机关而受其控制。

邱凤仪又名逢宜，据说是广东人，镇江沦陷前是江苏省建设厅的办事员，又传是“大”字辈排湾杨善之的门徒，是上过“大钱粮”或“小钱粮”还是冒名顶替，无从查考；但以后杨门弟子都承认他是“同山弟兄”而互相利用。他很可能是早已接受日本特务联系，秘密潜伏的汉奸，以一个很远的异乡人，沦陷时逗留镇江，很快就参加日本宪兵队宣抚班，而且十分重用，不久，又委为丹徒县（包括现在的镇江市区和丹徒县全部）财政局长。邱

既是日军心腹，可以直接出入军部并和大小“太君”接触，又是伪府官吏，地位仅次于伪县长，同时又成为清帮站山头的老头子，真是炙手可热。当时有人称他左右逢源，无往不宜，于是就又自名“逢宜”。

胡春潮，镇江的蒙籍旗人，是以五条街南门大街到镇江南乡*作为势力范围的“大”字辈胡小望的儿子。在抗战前，他鬼混浪荡，曾在保安队、警察队当过起码的差遣，属于“下八洞”一流人物。沦陷前后和日本特务挂上了钩，靠他父亲在帮名义，以“小老大”的身份号召颇有影响。日本人当然要利用他，因而也当上了丹徒县警察局长，仍然在他父亲那个势力范围内，收了不少下一辈的徒弟。以后又兼任了蒙籍救济院院长，俨然成了镇江蒙族领袖。加上他父亲的徒子徒孙的捧场，在帮会中也“吃得开”了。

邱、胡两人字辈相同，“官”阶相同，然而气派、声势、场面，胡则比邱大为逊色，这不仅因为日本人对邱支持，胡的应付“手面”也大不如邱，自然在各方面都相形见绌了。邱是宣抚班成员，日军部及特务机关可以直进直出，直接谈话；而胡则必须借助于翻译王佑喜（日军翻译兼伪丹徒县府科长，原以理发为业）。至于“手面”，是江湖帮会中人讲交情、讲义气，“够味儿”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无条件的交情义气是没有的，总还夹杂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归根到底，还是互相利用。因而他们不仅会弄钱，还要会大手大脚地用钱，以这个标准衡量，胡春潮就不如邱凤仪远甚。

镇江沦陷后，我举家辗转避居到上海，其时对胡、邱两人并不相识。1941 年 8 月，因我岳父在镇病危，不得不和我妻仓猝返镇探望。为了避人耳目，略为化装并乘较晚火车，于傍晚 6 时抵镇，在南门站下车步行回家，沿途并未遇见熟人。是夜 12 时左右，竟有人敲门，说是警察局局长派来的。家人均感祸事临头，乃开门询问后，来人系伪警官曹××（已忘其名），持有局长胡春潮、督察长严竹君名片，说傍晚我被中正桥（现解放桥）岗警所见。胡、

严特邀约明晨在宴春酒楼早点。我感到身入虎口，姑允应约，以观究竟。次日如约前往，严竹君是我早年认识的，代为与胡介绍之后，都表示为了交个朋友，并无别意。讲些客套话之后，胡并告知曾打电话约邱凤仪来见面陪客，因他有事不能来，最好去拜望一下。正谈话间，邱凤仪送来请柬，邀约当晚到其家中“便酌”。这时我感到为难，而胡、严两人说：“你们杨家在镇江是有名气的，你在上海同乡、朋友多，他（邱）完全是为结交朋友，绝无他意；而且你来镇江，也可能碰到麻烦，你必须吃他这一顿，万一有事，他必能为你解决。”于是我决定当晚赴约。

邱凤仪家住在京畿岭西大院一幢楼房内，楼上有四大间通敞的客堂，布置得富丽堂皇。邱请来了一个曾和我多年同事的时任伪县政府主任秘书兼第一科科长的潘佑之作陪；还有一些工商业者，特别是五洋业的江步泉、朱容生、杨利生等和清帮人物江炳堃也请来了，共计两桌，颇为丰盛，还招歌女来唱“堂会”。席后，邱将我和潘佑之拉到一边，说：“我知道你虽非家里人（指不在帮），但希望你能下水（指当汉奸）。潘秘书兼着科长，希望让出一个职务来给你。郭县长必然也欢迎。胡春潮也想让你当他警察局的科长，不要理他。”我即告诉他，系为岳父病危而来，现病势已无指望，一俟丧葬完毕，即需返回上海。邱又说：“你既不愿下水，决不勉强，希望以后常回镇江，安全问题可以放心。”我只有表示谢意，以后我问潘佑之，欠下这桩人情怎么办？潘说你不用为此介意，他这是例行的普通招待，几乎天天如此，遇到招待特殊客人时，那个场面，你还没有看见呢。这真使我为之咋舌。

以后日伪联合“清乡”（约1943年），日寇想借以消灭潜伏活动的共产党和游击队，而伪方人员则意在敛财肥私。为了“清乡”，撤销了伪专区公署、县政府两级建制，成立了两级“清乡”机构。人们都知道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严酷的“清箱”运动，殷实富户和稍有资财的人都感到自危，而原任的一些伪官、新贵，箱

子里是比较有油水的。于是刚刚卸任的伪党务专员、伪县长、处局长、科长等，都迅即另开码头，离开镇江，以避“清箱”之锋，胡春潮也走开了。唯邱凤仪有恃无恐，固然因他和“皇军”有直接联系，可倚为靠山，同时也自信“手面”可以解决问题。“清乡”主要新贵，有镇江区清乡公署专员袁殊、秘书沈无捐、丹徒县清乡公署主任张修明、秘书汪家桢；而最活跃弄权炙手可热的则为沈无捐。据闻邱凤仪摸底后，有一次专门宴请沈无捐，不仅酒席丰盛，而且用一套真银特制的台面。全副台面用银虽仅近百两，而精工细制的费用要几倍于银的价值。这些汉奸们都啧啧称羡，邱当场就说赠送给沈，次日即将全套台面洗擦干净，并加上一套进口的西餐餐具亲自送去。以后，邱不但在“清乡”中稳住了脚，且沈无捐又把自己兼任的模范区（今市区及近郊区范围）区长让给邱凤仪兼任。于是邱凤仪即成了“皇军”信赖的鹰犬，又是“清乡”的新贵，再加上是站镇江山头的清帮老头子。这时他就大量收徒弟，来者不拒，其中有一部分原本就是痞棍流氓，投入邱门之后，很多安插在邱所兼任所长的“检问所”里当爪牙，更是欺压行人，无恶不作。但也有不少城乡小康人家的子弟，农村有田产的，城市有房子的，以及商号经理、小开等，也向邱凤仪投帖拜师。这一些徒弟，主是要借这块“金字招牌”作护身符，避免或减少受人敲诈、欺压而已，而邱凤仪这时因胡春潮已远避他方，几乎是独占山头，除笑纳大宗投师的押帖费外，还可四时八节享受“孝敬”。他之所以有“手面”，能够挥金如土，这也是其小小来源之一。

清帮“准充不准赖”，这时指帮里互相关系而言。如在一般场合，尤其是在中上层社会中，都是遮遮掩掩，实际上大多数还是在“赖”。而在沦陷时期，一般不掩蔽这种关系，甚而以此沾沾自喜。镇江邱、胡两人以“局长”身份，广收门徒，事实上已完全公开；而“安清同盟会”则更成为公开的“法团”了。而按照清

帮的帮规、仪注、习惯行事，正式开香堂收徒弟，传授“三帮九代”、“十大帮规”和“海底”、“通草”等等，就非常之少了。据说以后根本就不开香堂，徒弟们递一个拜门帖子，附押贴费和礼物，并请上几桌酒，就算师徒关系确立了。互相之间的来往，可以直来直去，由别人或自我介绍，说是某人的徒弟（当时有“在某某会下”的说法），站什么字，以后就直接谈话，根本也谈不上“参教”、“盘海底”了。

镇江沦陷时期的清帮势力，初期分属邱、胡两人，而后期则全属邱一个人。此外，也有其他较有名的通字辈如江炳堃，曾收过一些徒弟，并听说开过香堂；而四乡方面，也有各站山头的，听说有高资的吴某某（大字辈杨善之的徒弟），上党的谈朝宗（据说曾拜过大字辈胡小望）。

沦陷八年当中，镇江两个横行的清帮头子，胡春潮早于“清乡”开始前销声匿迹。邱凤仪则在抗战刚刚胜利时潜逃了，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才在上海拿获，毙于镇江看守所中。闻胡春潮亦被拿获处决。

九、抗战胜利后的镇江清帮

1945年日寇投降后，镇江清帮的局面也大大不同了。原来投拜在邱凤仪、胡春潮等门下的徒子徒孙，纷纷改换门庭，另行投师，以免被指为汉奸。他们绝大多数投入了中统特务、黄色总工会理事长祁仰希的门下。其时清帮头面人物，除祁仰希外，还有向春亭、步渔邻、谈朝宗、赵庆棠等都有多有少地收过徒弟，但情况和祁仰希不同。

清帮有资格的人物要推向春亭，他参加清帮到抗战胜利时已有近40年的历史，他是按照清帮正规仪注在香堂里拜师孝祖的。他交游广阔，不但在沪苏一带江湖朋友中享有盛名，即在长江上

下流及西南几省，也相当知名；不仅是清帮头面人物，而且兼为洪帮的“大哥”。他这时的社会地位，更比抗战前大大提高，故而总是有意识地冲淡帮会色彩，自然就更不愿大张旗鼓地开香堂收徒弟，即使是上“小钱粮”递帖子，也极其慎重地选择。以他当时的声望地位，找人引荐上门投师的自然不少，而他一般都谢绝，只有极少的几个较大字号的老板、经理递过帖子。外传他徒弟很多，其实都是抗战前所收的，而且大多是江边一带行业，尤其是轮船业方面的经理、小开、老大（相当于船长）、老轨（相当于轮机长），以至水手等比较多。由于向是属于成“正果”的，就爱惜名声，对徒弟们就不肯放纵，因而较少为非作歹的。

向春亭之所以能成“正果”，和他广交朋友、有手面也是分不开的。例如抗战期间，他在西南时和云南有名的龙三公子（龙云的儿子）结上朋友，有了洪帮关系；抗战胜利后，龙三公子在南京陆军大学受训，向去南京邀约来镇、扬一带游览。龙邀约了团长以上的陆大同学 20 余人来了，向殷勤接待，约了十几个本地人士作陪，借复卢俱乐部盛筵款待，借汽车，放专轮，漫游金、焦；又专轮直送扬州，邀请扬州知名人士作陪。回镇之后，又和路局打交道专包一节车厢，亲自送到南京。前后三四天，所费惊人，而向则毫无吝啬。由于他比较正派热情，当时各方面人物都比较重视他，镇江“三老”冷御秋、陆小波等也经常和他商量关于地方的一些问题。在 1948 年镇江商会最后一次改选时，向春亭亦被选为仅次于陆小波的商会领导人之一；解放时，他陪同陆小波和其他地方人士迎接大军渡江，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向主要以经商、做生意（也做过私贩烟土生意）以维持其庞大开支，没有那种唆令门徒敲诈勒索、收取规费、作恶多端的行径。

和向春亭作风相反，清帮头子祁仰希，不仅是作恶多端的流氓，而且是个汉奸特务。他青年时，是火柴厂的工人，闹过几回工潮，成为工会骨干，地位逐步上升。沦陷期间，参加了汪伪特

工，又和蒋方特工挂上钩；胜利后，以中统专员身份出现，并当上黄色总工会理事长。一面以清帮“通”字辈老头子身份大收徒弟，其范围大多数是想找靠山的所属各产业、职业工会的骨干和工人，但也有一些属于资方的，如理发、饭菜馆、浴室、人力车等行业的老板、小开等。还有一些日伪时代的汉奸、翻译、特务小爪牙投奔到祁仰希门下来“改换门庭”。据说他的徒子徒孙有两三千人之多。他既是黄色总工会理事长，还担任一个参议员的名义，俨然列于“地方人士”之林。祁仰希本来就有中统、帮会两个方面的恶势力，再加上这么一个法团领袖的身份，可以随意出入大小机关衙门，参加各种集会、活动，就更容易吸引一些爪牙，聚成一股恶势力任意横行了，成千徒弟的孝敬馈赠，足够他的挥霍。遇到劳资纠纷，更是他的生财之道，一般资方不得不买他的帐。如遇双方都是他的徒弟，必然都向他许愿；他等火烧起来之后，出面料理，很快就解决了。真是左右逢源，无往不利。

祁仰希原已有一妻一妾，后又纳了一个比他小20多岁的妓女为妾；吸食鸦片烟已不够刺激提神，天天非打吗啡针不可，随身带着器具自己注射；手枪不离身边，有时凭空放上两枪，似乎借作消遣，实则给人以一种无形的威胁。一切都表现了一个十足的流氓工贼面目。

祁仰希在清帮站“通”字，其“前人”是谁，已难考查，但绝不是冒充的。因他出迹于黄色工会，和低层社会有频繁交往，尤其各产业、职业工会里的一些工头，多数是帮会中人，如想混充，并且充的是辈份较高的“通”字辈，是不可能的。他对三教九流，确实是有一套的。例如，江湖上有一种强讨恶化的一帮，学会一种方法叫“开塘”，在强讨未达目的时，用讨饭碗在自己额上一拍，顷刻血流满面，用以讹诈。而祁仰希竟颇擅此道，我也曾两次亲见他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演过“开塘”手法，一次用瓷碗，一次用玻璃杯，用力向前额一拍，碗、杯立即粉碎，而额上毫无伤痕。如

要血流满面，可以随心所欲，而且伤势不重，一两天即可恢复，不带疤痕。这种“技能”也必须经过投师传授，且非一朝一夕所能练就。清帮和其他帮会一样，本属三教九流，为各层人物都有的大杂烩，就这一点而言，祁仰希也确在清帮下流层里“滚”过一阵子。他是属于不想“成正果”的一类。

步渔邻是清帮大字辈步长生的儿子。据我所知。他并没有拜过老头子，但“家学渊源”，对清帮情况可能知道一些。我曾问过他什么叫“三帮九代”，他微笑不答，估计可能是答不出了。他中学毕业后，曾在杭州之江大学读过书，1927 年以后，一直在国民党镇江县党部当县党部委员，创办了《东南晨报》，自任社长。抗战胜利后，恢复了《东南晨报》，又任县参议员、县农会理事长，当时是锋利而为人所畏的风云人物，但看不出“混世”的清帮头子味道。后来他忽然自称是“通”字辈，收起徒弟来了，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也没有人怀疑。大概也只收了几十个，除个别渔行小开、报馆职工外，大多数在第三区（今丹徒上党一带），其中有一个叫侯铭富，于解放前不久，由步推荐任第三区区长。解放后，步由上海秘密去舟山联系，弄了一个“反共救国司令”之类的名义，即令侯在第三区活动，步则在上海遥控，结果双双在上海被捕，解到镇江处决。

还有两个在乡区以清帮名义收徒弟发展恶势力的典型，就是三区（上党）的谈朝宗和六区（宝埝）的赵庆棠。

谈朝宗在敌伪时期就当上了三区区长，胜利前和国民党镇江地下县长李守之联系上，委为地下区长，故胜利后仍得继续蝉联。由于曾任汉奸区长，经常被人攻讦，地位不稳，以后更加大收徒弟以培植个人的恶势力。终于在 1948 年冬，被中统以他案逼令法院予以逮捕，而区长一职即落入侯铭富之手。谈朝宗收徒不少，据闻没开过香堂，照种种迹象看，他多半是“空子”冒充的。

赵庆棠原系知识分子，教育学院毕业，宝埝区人，参加了国

民党地下工作，被任为六区（宝埝）区长。胜利后还继续任职一个时期，改任镇江干部训练所教育长。赵庆棠颇有野心，想先当上国大代表，然后再图发展。他想以干训所和宝埝区两个基地培植党羽，发展势力。但宝埝区土势力相当复杂，你争我夺，各不相下，赵庆棠乃大收徒弟，以期取得这一块地区的控制权。他先在宝埝区的范围，后再向金坛的直溪桥、丹阳的延陵一带，与谈朝宗产生的矛盾，谈不敢与之争衡。赵冒充是镇江杨善之的徒弟，号称有徒众6000之多。我问过他，他说估计在三四千之间。自己承认根本没见过杨善之，而且也没听到过香堂怎么开法，有关帮会的常识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对清帮一无所知的冒牌“老头子”。

抗战胜利后的清帮，继承了敌伪时期的一套，日趋下流，而成为极端反动的道会门。

十、几个“混世”人物

还有几个“正宗”的清帮人物。我所说所谓清帮“正宗”，是意味着完全靠清帮混世、吃饭，甚而起家的人物，以我较熟悉的，于上、中、下流中各举一二人，可见一斑。

江炳堃，在他中年到晚年的近40年当中，不仅在帮会里，而且在社会上都很知名，我和他尽管年龄相差近30岁。也有相当交谊。

江炳堃在辛亥革命前，被援引到县衙门里充当一名差捕。当时衙门口“办公事”的差捕吏役，一般都有帮会关系，否则也站不住脚。他投何人为师，我已忘了。当时有一个老资格、有办法的捕头，人称老钱二，他对江培养教导，因而江在江湖上逐渐知名。在民国初年，江得到知名人士的支持，战胜了对手蒋某，由当时的县知事张鹏派为县公署的政务警警长。政务警有别于一般警察，专为执行行政勤务以及行政方面的传唤、拘捕等有关违犯

行政法规的事项，实际是由前清的捕头演变而来。几年后又派兼县公署留置所所长，该所相当于拘留所或看守所，是违犯行政法令或欠缴钱粮捐税，弄到这里的人是还没有到违警或违法的程度，不够送警察局或法院的。江炳堃的这两个有联系的职务，一直保持到1937年沦陷以前。这20几年中，由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由县知事、县公署到县长、县政府，经过十几任，而江的这两个名义始终不变。旧时期这种属于差役性质的名目，是常常为人所瞧不起的。但历任的知事、县长及其僚属，以至地方绅士，都是请他坐下来谈话，给予相当礼遇。而当时一般差役及其头目，在上级面前，是不能坐着谈活的。他办事周到，手腕圆滑，于此可见。

他在清帮站“通”字，早期也收一些徒弟，主要分布在政务警、催征警（县政催交钱粮的）、司法警（法院执行业务的）和警察、侦缉队里，如担任多年司法警长的刘益昌、侦缉队长崔少卿等都是。

他的处世哲学是力求圆滑、不得罪人。他常说：“结交一个朋友很难，断绝一个朋友很容易。”又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意思是不敲诈勒索，要让人家心甘情愿地送钱。又常说：“热锅膛不必多烧，冷锅膛一定要常烧。”意思是说，在台上有权势的，你拍马也不起多大作用，而对台下无权的，你多加照拂关顾，以后他上台了，必然报答你。事实上确是如此，旧官下台或某些人因事进入留置所，甚而有些官吏因事被省政府送县政府临时关押的，江炳堃都是竭力周旋照顾。他这种“雪中送炭”的手法，不仅博得了对方好感，而且也颇收实惠，较之一般恶煞神似的狱吏高明多了。他还常说：“我们蹲在缺德的场所，但要做修德的事”，也就是“公门中好修行”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刽子手的技能，用刀砍头时，要恰巧在关口上，不须再砍第二刀。此外，还要善于“堂绑”，对死刑犯用一根绳子由两肩绑到背后，打一个活扣，只须半分钟左右。即无法摆脱，虽然枭首只用过一两次，而枪决、堂

绑，则经常有的。他说：杀人和堂绑，不是我们能作主的，但能杀得痛快，绑得不难受，也是可以积德之处。他晚年家里布置一个佛堂，吃斋、念佛，恐和这也有联带关系，可能是一种忏悔吧。

江炳堃虽然帮会出身，而名声较好，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以后又在大西路以西开了中等五洋烟纸店，加上徒弟们的孝敬，享受其小康而安定的生活。

沦陷时，江炳堃短期避苏北即回镇江。日寇、汉奸不肯放过他，于是他虚与委蛇，坚持不下水。以一个江湖上有名的清帮头子，在日伪权力范围内，周旋八年，最后还能保住民族气节，这也是不容易的。在这期间，闻汉奸清帮头子常玉清，曾叫江炳堃任“安清同盟会”镇江分会副会长，我未闻他在这方面有所活动。又知他曾按照老规矩开香堂收过少数徒弟，都是小开之类，没有肯将地痞、流氓和特务收入门下。

胜利后，冷御秋、陆小波两老先后由渝沪返镇，他们得知江炳堃八年中能保存名节情形，相当重视。两老都曾到江炳堃家中探访慰问，这固然是对于他不作汉奸的赞赏，还由于冷老早年创建伯先公园和办理镇江塘坝工程时，江也出过一点力气。建国后，他 70 岁时去世。

以清帮混世、吃饭，在帮里打了一辈子滚的人物，只有前面提到过的传道师顾华堂了。顾在帮里站“通”字，因几乎是以传道师为业，所以上海以至苏南苏北的帮会中人，不管上中下流都认识他，人称为“顾四爷”。他本姓罗，右眼皮有点外翻，许多人背后喊他为“罗四瞎子”，这浑名在帮里也是无人不晓的。他的师父传给他一本“海底”，他识字很少，只有死记硬背，背熟后再去认字，顺藤摸瓜，很有进步，后可以看看简单的书信，但还是不能写。他对这部“海底”十分珍视，认为是传“家”之宝，平时不肯轻易示人。为避麻烦，他将“海底”用油纸包裹，盛以木盒，砌在墙壁内，说将来传给关山门徒弟。某年因修缮墙垣，不得不

将木盒暂时取出，我特往纠缠后，大略地看过一下，是那时的一种“毛边纸”，用墨笔抄朱笔圈点，字不工整，但是蝇头正楷，内容极为丰富。如香堂如何布置，仪式进行程序，十大帮规，进行仪式时每一动作，如点烛、烧香、磕头、传授帮代、帮规等应吟颂的诗句，都有详细记载；对在各种场所吃饭、喝茶，座位如何安排，茶杯碗筷如何安放，两手如何动作都有定式；对在各种场所互相接触往来，或办理交涉，如何问，如何答，有的用暗语，有的用诗句，都有十分详尽的规定。比我所见过的其他“通草”、《安清帮规大全》等都多几倍。试提一两处向顾询问，他都能滚熟对答，一字不讹。因他有这种本领，各地特别是镇江一带开香堂授徒时，大多请他当传道师，如辈份、帮口不合，不能由他当传道师，亦必请他去指导一切。所以他那时经常离家“出差”，不仅有吃有喝，临行时还须送一笔丰厚的程仪，若干年中基本上以此为生。据说那时开香堂，如顾四爷没有到，往往被怀疑是不是合乎正规。

顾华堂还有一个特殊本领，即赌钱是“活手”。一副 32 张的“牌九”，只要摸三五遍，他就可以从背面侧面全部认识，想要什么牌就能拿到什么牌。而别人看着他是按规矩顺序拿的，实则他是挑的，只是手捷眼快而已。如一副 136 张的“麻将”，他只要看过几副牌，就至少已识清三四十张，有这样许多“明张”，他要做大牌，还不得心应手！我也曾缠他表演过，例如牌九的四门八张牌，其中最大的两张牌他已看清在第三路，而掷骰子后应拿第二路，他抢先拿到第三路，同时以四五两指将原第二路推下去和第四路联结，这样偷梁换住，任何人也看不出来。而麻将则主要是换牌，在摸牌时以四五两指勾着一张废牌，用拇、食、中三指明摸牌时已将废牌换了一张需要的牌回来。

旧社会抽头聚赌，引诱富家子弟倾家荡产是不稀奇的。据顾华堂说，虽说学会了这一手，从未正面用过，但在反面用过几次。

据他说，他最反对软赌害人，所以特学会一这手，是费了若干年的功夫练出来的。他常常闯入聚赌的场所观看，如其是“硬赌”，就不去管它；如是“软赌”，见他到了，往往一轰而散。但有时也遇到一些不明底细的人，继续搞花样，他就不客气地坐下去加入赌局，使出他“活手”的绝技，将那些小“活手”搞得一干二净；有些不知趣的，还想动武动枪，但一明白这就是顾四爷，也只得自认晦气了。

我之所以和顾华堂熟识，是由于南门大街有几家中等商店请顾华堂照料，我经常去其中的一家五洋店而逐渐和他相熟。所谓照料，不过是经常去这些商店坐坐，喝杯茶而已，这就使当地一些小流氓、地痞不敢去罗嗦了，而他每逢过年过节，也必为商店向这些流氓“开销”一些，两面讨好一下。这也就是顾华堂混世的一种方法。但很少看到他赌钱，有时三缺一被拖上，他是每场必输，从未赢过。我也问过，他说：我这是不得已凑一角，为了陪客，不为兼钱，如我常赢，知道我是“活手”，我还能做人吗？

顾华堂常说：混世混光棍的，也不可丧失良心，要有义气，要正派，才不会受天老爷的惩罚。但他实际上究竟如何，由于我当时是为了好奇而和他接触的，并不深入了解。

镇江沦陷后，立即成为豺狼当道的世界，贩卖鸦片烟土大有油水。于是一些痞棍亡命之徒大跑烟土生意。烟土本来就是秘密买卖，而且要通过日寇和国军的控制线，情形就更加复杂，这就必须有组织地进行了。他们找到顾华堂，奉为头头，顾欣然“出山”，领着大做烟土生意。但仅仅两年左右，顾华堂这个名字就从沦陷区的镇江社会里消失了，具体原因是什么，至今 40 余年了，仍不得而知。

帮会中也有一种既无一技之长，又没能混出江湖名气，而依赖帮会为生，到处流浪，混充“朋友”，来度其寄生生活的人。例如 1932 年左右，有一名叫邱占奎的寄寓镇江一家中上旅馆几个月

之久。他首先拜访了镇江一些较有名气的帮会中人，交代了几句江湖话，知道是“家里人”，对方不得不酒食款待，并去旅馆回拜。以后流露盘川短缺，为了江湖义气又不得不慨赠一二十元或三四十元。以后他就利用一些回拜的名片证明和某人是朋友，到处自我介绍是“头顶潘字”，目的是借川资，十元八元甚而三元二元也行，最后竟投名片去拜会镇江县县长张鹏。张早有所闻。立即开庭讯问。当时县政府虽不兼理司法，但遇有违警或违犯行政法令的可以开庭判处罚金或15日以下的留置（相当于拘留）；如系违法，也可预审后移送法院；邱老实承认没有正当职业，是以“走江湖”为生的，甘愿即日离开，并具结退庭。其实，邱占奎另开码头之后，仍然打着清帮招牌，继续这种“混世”方法。这在帮会中是被视为下乘而瞧不起的。

还有一种人，也无一技之长，入帮就是为生活为发财，又不愿遵守江湖规矩，专以凶横、强讨、敲诈为事。他们认为一定要比别人凶，否则即被人欺。这一类“混世”方法也是不少的。例如五条街有一个小“青皮”罗志沄，常横行于附近一带，以后又投拜“通”字辈严竹君（敌伪时期警察局督察长）。罗投拜之后，为其师父跑腿颇为殷勤卖力，严也非常照顾他，罗的生活环境逐步改变，对严的需求也逐步升级，严无法应付时，只得婉言射绝，使罗颇为恼怒。某日，罗竟约了严的许多朋友和徒弟说：我拜严某为师，磕过许多头，大家都看见的，现严某无情，他应当着大家对我磕头还给我，欠帐扯直，解除师徒关系。弄得严哭笑不得，以后虽经劝解，罗还是直接间接向严敲诈。按帮规说，这是“欺师灭祖”，不能容许的，却也无可奈何。据说日伪时期，还是由严将他安排在侦缉队里鬼混；由于到处发狠，混不出什么名堂来，1948年，他宣称要一心一意做生意了。他之所谓做生意，既不设牌号店面，更没有伙计职工，他的办法，就是对某些有限价而实际黑市价格已涨得很多的货物，特别是五洋香烟等强买强卖，看

中某家商号，就强买某种货物，再一转手去大赚其钱，实则等于强抢，一些商号对他都侧目而视。象这种类型的“混世”方法，在帮会中也认为是不屑一提的。

1983年6月26日

（江苏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在清、洪两帮

向春亭口述　杨方益整理

我原名向启华，生于1890年，江都县仙女庙东乡向家庄人，8岁丧母，寄养在亲戚朱仲明家。1905年16岁时，由朱带到镇江，介绍到利记轮船局，由经理马冠千安排在永吉小轮船上做学徒。1911年利记结束，由马冠千带到泰昌小轮公司，先派在码头上照料，后又派上航船当押水，因而有机会认识清江的清帮“大”字辈冯守义，并投拜为师，和他学会了“混世”方法，并逐步善于应付了。1924年35岁时被调升为公司协理，以后又升为副经理、代理经理，直到抗战时止。

我加入清帮之后，1924年又加入了洪帮。因为洪帮是“准赖不准充”的，我就保密，所以当时没人知道。我在清、洪两帮中不仅学会“混世”方法，而且懂得许多处事的道理和经验，由一个小职员逐步升到代理经理的地位。又因拉上多方面的关系，并担任了航政局顾问、水上公安第五区侦缉队长和镇江县政府捐税征收处主任等职务。抗战后，还在西南负责过交通部的驮运所工作，又当上了参议员、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镇江商会常务理事，自己还创设了轮船公司，算是家成业就，名利双收。我这大半生的发展，和帮会关系是分不开的。

帮会是一个总称，不管清帮、洪帮以及其他，都叫做“混世”的。“混”的方式方法，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但必须混得“光彩”，各方面“吃得开”，大家都说这人“有味儿”，“够朋友”，这

样逐渐就“混”出去了，并且逐渐增加声势，列于“地方人士”，甚而成为大、中码头的“知名闻人”。这才是“混世”中最上等的。“混世”有个信条：“讲交情走遍天下，讲狠处寸步难行。”帮会中有很多人是讲狠处的，要显示他的狠，什么都干，不顾一切，到处兴风作浪，敲诈勒索，抽头聚赌，打架斗殴，偷吃扒拿，甚而当土匪做“瓢把子”，当乌龟吃娼门饭，都顶着帮会招牌，搭上帮会关系。这些“混世”的，我瞧不起，帮会中人一般也看不上眼的。我从十几岁到镇江码头，就开始学“混世”，接触过许多前辈老头子。我的师父冯守义，以及前人班子朱秉元、杨长富等，都勉励我要向上，不要做下流事。又看到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等家成业就，也很受影响，就一心一意想“混得光彪”，向上爬，希望成为士绅闻人，以后总算是慢慢爬上去了。

我经常想：要“混”上去，必需有钱有势，更主要的是要有钱。有了钱，善于用，就可以造成声势，成为有钱有势的知名人物。怎样找钱呢？我从少年时到镇江来，就吃轮船饭，单靠薪水收入是不行的，又不屑做那些敲诈勒索、打架斗殴的事，而且这样也弄不到大钱，还可能吃官司倒霉。考虑做生意，自己又不会做，就加入股份请朋友代做，朋友也欢迎我这样的人参加。做生意，要拣有把握、赚钱多的。利润最高的算是大烟土，故我在最初就参加了李长义的烟土买卖。我出资1000元，他们照顾我，和其他每股3000元的同样分拆盈利，利益自然更优厚了。以后，陈果夫当省政府主席时，鸦片公卖，我也参加了晋昌土膏行股份，也同样给我特别优厚的红利。这都是因为我已逐渐有声势，可以为他们所利用而已。另外，还参加了一些普通商业股份和临时的囤货生意。

做生意后，收入多了，手头活络了，声势也随之大了。但反过来开支也大了，逐渐感到不够应付需要了，于是考虑必须进一步建立自己的行业，完全由自己控制，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经济

基础，造成更大的声势。我决定成立自己独资的轮船公司，后得到实现；还计划着经营和轮船业务有连带关系的，如仓库、燃料、运输行等业务，企图逐步成为多种业务的“托拉斯”组织。终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局动荡不定，并且很快解放，我的计划未能实现。

前面说声势造成，收入增多，但开销也随着加大。江湖上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既然是靠帮会起家，上门来“求帮”的人，尤其外地来的人，日益增多，都要分别应付。因为大多是小一辈的，他们大都进门后就磕头，也就是还了家里的规矩礼，再交代了他自己的帮口，以确认是“家里人”，那就要观察其目的和要求了，一般是不肯直截了当地提出的。有的路过这里缺了盘川，就给买一张到达目的地的车、船票，再给十元八元的零花钱；有的是慕名来拜望结识，甚而带了别码头朋友的介绍信，这就须看来的身价，酌情招待一番，不可稍有吝啬；有的要求介绍职业，有的要求协助解决什么问题，都须看人看事，分别对待。而对外地来的，最低限度必须请吃一顿肴蹄蟹包的早茶，再派一名徒弟陪着逛逛金山、焦山，致送一二十元的川资；有的住两三天的，还需包销旅馆饭食。总之，既上了门，必须招待周到，使其满意而去。其中也不免有少数是冒充“家里人”的，只要不过分无赖下流（清帮是“准充不准赖”），也就不揭穿他，还多少给一点钱，不让他完全失望。还有一些外地知名的“家里人”，专程或路经镇江，都必然要来看望我，这就必须盛筵款待，还投其所好——嫖、赌、吃、喝，招待周到，不能稍有吝惜之意。我几十年就是本着这种作风应付的，久而久之，各方面都传开来，说镇江向某人“够朋友”、“有味儿”。这就是我远近知名的原因。我不但交结了许多江湖朋友，而且互相援引，也和许多中高级军政人员攀上交情（整理者按：向春亭在解放前的10多年当中，和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有来往，并有相当交谊，如当过交通部长的张嘉璈，当过国民

代表大会秘书长和社会部长的洪兰友，四川、云南的一些军、师、旅长，江苏省政府的一些厅处长等），必要时对我也是有用处的。

前面谈过，我除参加清帮外，还有洪帮关系。洪帮即洪门，一直比较隐蔽，而且和清帮相反，是“准赖不准充”的，所以知道我参加洪帮的人极少。而我大半生都在清帮关系活动为主，只有抗战期间，在四川、云南参加驮运工作，则是靠洪帮关系活动的。

由四川叙府到云南昆明，约500余里，交通不便，货物运输完全依赖驼马输送，战时国民党交通部特设驮运管理所专司其事。这一路盗匪较多，驮运货物时有被劫事件，交通部部长张公权要我负责驮运工作，我是由于杨管北的关系和张熟识的。我表示不愿担任所长或副所长名义，就派我为高等顾问，所址设在宜宾。我又介绍叙府人卓甫臣，要求也派为高等顾问，我们一同打通这条路线。卓是洪帮的“袍哥大爷”班子，在四川路上很“吃得开”，所以我援引他参加。卓就派人和我一同沿线活动。近津有一个江沄洲，担任着一个什么队长之类的名义，实际上是土匪头子。我先去拜会他，谈“自己人”的关系，拉拢好了，再由他知照沿途各方，谆嘱维护抗战物资，对驮运所多加协助。江沄洲同意四川由叙府到云南边境，由他负责。又为我们介绍侧鸡镇的“舵把子”张政卿，经联系后由云南边境到昆明一段由张负责。这样，由叙府到昆明的驮运业务便畅通了。以后由驮运所每月致送江沄洲、张政卿各1000元，没有给名义。我和他们能够打好交道，表面上是谈了抗日的大道理，实际还是以谈“道义之交”联系成功的。

所谓“道义之交”，在洪帮不是泛泛的一句应酬话，而是非常重视的。主要是让这个当地的“山主”、“舵把子”能识别并相信你确是“自己人”，接着就必须承认是“道义之交”，那一切问题就比较好办了。“自己人”是洪帮的说法，和清帮说“家里人”是一样意思，但不能混淆说错。这在清帮还无所谓，在洪帮就“黄”了。“黄”包含着“错误”、“丢人”、“黄台”之意，在洪帮

是很犯忌的。既认定是“自己人”，就要顾全“大义”，在这方面，洪帮比清帮要重视得多。如何识别呢？主要就是靠一套刻板的仪注和呆板的江湖口头话，也就是“切口”而已。例如我拜会江沅洲时，由卓甫臣派他的“管事三爷”唐铁珊，拿着卓的介绍信陪我一道去，到达后即正式举行“拜山”，将“锦囊子”（信）和“荷叶子”（名片）递进去，即使“自己人”随便谈话时，也必须说“切口”。如“锦囊子”、“荷叶子”说成“信”、“名片”，那又“黄”了。这一“黄”，你不是真“自己人”，而是“空子”假冒的，事就办不成，还可能讨没趣，因洪帮对“充”是很犯忌的。当我的名片和信递进去后，“山主”知道有来头，随即小跑迎出大门。，这时拜山的人一见到面，就要抢上去说：“金码头、银码头，久闻大哥隆贵宝码头，久仰贵码头山清水秀，五谷丰登。”“山主”回答：“好说，好说，请进去坐。”随着进去后，拜山的人仍必须抢上去说：“愚下（不能自称“我”或“兄弟”）来得很晚，没有到大哥龙虎宝帐站班护卫，今后辕门候令。”一面说着，一面就要“甩拐子”。这个“甩拐子”很重要，是帮内江湖礼节，“山主”也必须回礼。这时双方都聚精会神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动作，都在这时可以认清对方在帮里的真正身份地位，而动作熟悉与否，也可以鉴别对方资格深浅，并且和以后讲“道义之交”进行联系、磋商，大有关系。我在洪帮是“袍哥大哥”，就要显示“大哥”的身份。“甩拐子”时，两腿斜开，右腿在前略屈，左腿在后略直，这叫做“前弓后箭”。右膀前伸，四指微曲，伸竖大拇指向对方三起三落以表示敬意；左手食指内曲，大指斜伸，余三指并伸，“大哥”身份则按在左胸乳部，指尖微向下斜。如系“管事老三”，则按在右膀上部，其余“老五”，以至“老么”，所按部位和形式都略有不同。见面“甩拐子”，即以此表明自己在帮内地位，对方也在注意你“嗨”的什么了” “嗨”读若“吼”，洪帮切口，似“站”字之意。这样抢着说并“甩拐子”，对方“山主”必定回说：

“好说，好说。”并回“甩拐子”，此后即可坐下并正式说明来意了。（整理者按：当年向春亭谈到此处时，曾做了示范动作，将“甩拐子”情形，加以解释，经整理根据其动作记录，并经向看过同意的。向提到“袍哥大哥”和“管事老三”及其余老五以至老么。当时未注意询问洪帮在“大哥”之下，是否二、三、四、五……顺数下去？“老么”是否即“老十”？“管事老三”之外，其他是否都有职称等等。对于洪帮，我所知甚少，希望知情者今后补充。）

我对“山主”江沄洲的“拜山”，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一切都比较顺利，于是坐下来谈到正题。看江的态度也确将我看作“自己人”了，就告知“拜山”目的，一面讲“道义之义”，一面也谈些抗日爱国的大道理，要求协助。在谈话中，也不可完全和普通人谈话一样，还必须适当地运用江湖“切口”，以显示是道道地地的“自己人”。最后临告别时，也要照例打招呼：“愚下背住你大哥的威武旗，请大哥打个‘好字旗’。”这就是请他立即采取措施之意。他回答：“一切放心，愚下负责。”这就完全落实了。还必须讲一句：“谢谢大哥金言。”“山主”回答：“好说，好说。”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问题谈妥告别时，“山主”也必定会约时间邀请“便饭”，这决不能客气，一口就回答：“一定叨扰。”其实所谓“便饭”，就是大摆筵宴，“山主”也一定会将附近一方知名的“自己人”请来作陪。三桌五桌不算事。在客人到齐之后，经“山主”介绍，“拜山”的人也必须“甩拐子”满打招呼，交代几句，而全体陪客，也必须一一回礼。在他们回礼“甩拐子”时，也可以看出各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在席上喝酒吃菜时，互相谈话之间，亦必须适当运用“切口”，碗、筷、杯的摆放和使用，都有一定的规矩，不容稍乱。这两场——“拜山”和赴宴应付过去，不“黄腔”（没有说外行话和不适当地运用“切口”），不失仪（没有在“甩拐子”和赴席时有不合规矩的动作），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真正的“自己人”，一

切就都关顾照应了。

我就利用这洪帮的“袍哥大哥”身份关系，将这500百多里的道路打通了。沿途虽然有许多“山头”，许多“瓢把子”，但都知道名义上是官方的驮运所，实由“自己人”负责的，大家为了“道义之交”不予阻挠，有时还给予照顾。此后驮运所就能安安稳稳地做那买卖和运输紧缺的货物，业务是相当顺手和有丰厚利润的。张公权找我的目的达到了，异常满意，我也不过问具体业务，除按月送给高等顾问的车马费外，遇有和“自己人”的来往交际等费用，实报实销，一切都较正常安定。大半年后，我看任务已圆满完成，因自己有别的打算，乃辞职而离开了驮运所。

1965年

（江苏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所知道的清洪帮

崔锡麟

一、我参加洪门的经历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组织了伪满洲国以后，每思雪此国耻，还我河山，无奈我手无寸铁，自惭无助于收复失地，总想成立人民团体，组织在野力量参加东北义勇军的活动。但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许你救国图存，而且救国有罪。我想到明末郑成功创立洪门组织，开山立堂，招揽天下英雄抗清的丰功伟绩，又想到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时，利用洪门组织的“反清复明”思想在辛亥革命斗争中起的作用，联想到当时全国各地仍有洪门与清帮之组织的现实情况，感到这是积聚抗日力量的一个机会。于是我便决定加入清、洪帮。为了同时利用清、洪两帮已成的组织力量，我先拜上海清洪帮首领张仁奎（字镜湖）将军为师。张将军是江淮洪门“春宝山”坐堂大爷，又是清帮大字辈，曾参加辛亥革命起义，任过扬州都督，旋改任南通镇守使，膺陆军上将衔。我加入清帮后，便准备加入洪门。1934年我到上海与清帮弟兄张竹平、蒋光堂、熊少豪、董显光等人从事新闻工作，在上海《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申时电讯社》四社总管理处，担任总发行部主任，这是我搞清、洪帮接近群众的有利地位。上海十里洋场，在租界内搞

新闻事业、搞帮会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是无法干涉的。

我于1934年加入上海洪门“五圣山”，山主是向海潜，湖北人，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久居上海。山堂哥弟很多，大部分是中下层人物。我由清、洪帮弟兄黄华（字叔巍，广东人，是五圣山的心腹大爷，抗日前任广东某县县长）推荐，加入五圣山。在向山主住宅设小香堂，举行了入门扎根的宣誓仪式，向关公像行了跪拜礼。向山主封我为一步登天的心腹大爷，位列内八堂大哥，是穿靴子上山的袍哥。从此我便在上海利用办新闻事业之余，大搞清、洪帮的活动，上海清、洪帮头头，我接触到不少。

我有几个清、洪帮的好弟兄好朋友徐逸民、范文藻、杨宝璜、邱汉平、韦敬周等人，他们都曾经留学美国，在上海都有一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如韦敬周是财政部造币厂厂长，杨宝璜是英国怡和公司上海海洋轮船部经理，徐逸民是名医外科专家，范文藻是上海著名的建筑工程师，邱汉平是有名的大律师（1947年当选国民党立法委员）。徐逸民诸兄与我在一起聚谈时常说，我们这些拿笔杆的纵然不能拿枪杆子打日本鬼子，收复东北三省，但我们不能甘心等着做亡国奴，我们都是清、洪帮的上层人物，应该发扬我们洪门老祖宗郑成功先贤“反清复明”的精神，创立一个新的洪门山堂，团结文武英雄志士，打倒日本鬼子，收复东北三省。徐逸民、杨宝璜两位大哥和我首先表示赞同，其他几位大哥也同意。于是，就由我们六弟兄担任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大约从1934年冬天开始）。徐逸民大哥是广东人，心直口快，他夫人是美国人。徐兄爱国热忱很高。这次开山堂大部分筹备费用是他掏的腰包。

徐兄提议新创山堂定名为“五行山”，取意用金木水火土的物质力量来消灭日寇，收复东北。徐兄又提议拥戴一位年高德劭的老洪门大哥汪禹臣老前辈（他时已70多岁了，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五行山”山主，以资号召（汪的儿子汪英宾也是美国

留学生，当时与我在《时事新报》同事），我们兄弟们担任副山主兼内八堂职位。徐兄又提议请汉口的一位老洪门山主白玉山（时在上海怡和洋行工作）做“五行山”副山主，以利指导洪门规章制度，并利于邀约邻省邻县各山头堂口的弟兄来沪参加“五行山”的成立大会。我们大家一致同意徐逸民大哥的提议，决定1935年春节后，找一个寺庙举行开山立堂的大会。其他五位大哥当场公推我拟订“五行山”山、堂、水、香名称，并起草出山柬檄文，以便分发三山五岳的袍哥，俾资联络号召。我当然义不容辞。隔了三天后，我们又碰头了，我便拿出拟订的山、堂、水、香的四柱名称和出山柬檄文，我订名为“五行山、卫国堂、团结香、保家水”，这是洪门袍哥所称的本山四柱。我所草拟的出山柬檄文的全文已回忆不全，原文起首与结尾的一些重点词句有：

> 呜呼，九一八，一二八，我大好河山竟被日寇侵略，东北沦陷，沪江喋血，倭奴小鬼，俨同野兽，鲸吞我土地，劫掠我财富，杀害我同胞，奸淫我妇女。我无辜人民，白骨如山，血流成河。……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石达开有言“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虏；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我洪门哥弟皆炎黄之子孙，不能坐以待毙，爰创立“五行山”，高举义旗，联合中原之豪杰，聚合天下之英雄，誓扫东夷，还我河山。为此呼吁三山五岳之袍哥，协力同心，浴血奋战，灭此朝食，痛饮黄龙。谨此柬告。

在这次碰头会上，我们决定于1935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夜晚在上海法租界某寺庙中（我忘其寺名）开成立大会。因民间说法，农历二月初二是龙抬头的日子，是吉日，故选择这天开山立堂。由逸民大哥请汪禹臣、白玉山两位大哥分头邀请邻省邻县以及上海各洪门组织推派代表前来参加“五行山”成立大会。

在开会前五天，专门预定了旅馆房间和饭馆，由白玉山大哥

专司招待任务，并准备了开山用的一些香烛纸马和宣誓用的雄鸡白酒等等。

徐逸民又请托黄金荣跟捕房打个招呼给予保护，实际请捕房不要来打扰我们开山的活动。黄金荣原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前督察长，是我们清帮上海“仁社”的老同参弟兄，当时上海三大亨之一。在租界里开山立堂，就不必象前清时代要派兄弟放哨几十里，防范清兵侦捕。在上海只要跟租界巡捕房打个招呼就万事大吉。上海是清、洪帮的世界，巡捕房里的中国巡捕多数都是清、洪帮组织成员。

在举行开山大会以前，徐逸民专门托缝衣匠人缝制6套明代服装，方巾帽子，圆领长袍，都是黄色，以便正山主和五位副山主于开山时穿戴。

农历二月初二日夜9时，参加成立大会的哥弟们从各方面陆续来到开山的寺庙（不用集体行动以防引人注意）。这天晚上，法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带手枪在寺外流动巡逻，以防有人来捣乱。这四位便衣巡捕也是洪门某山头外八堂的小兄弟。

大约到夜11时，由汪禹臣老大哥宣布大会开始。此时汪大哥仍以普通袍哥身分出场，尚未穿新制的明朝装——黄袍。黄华大哥担任司仪，按成立大会秩序单宣读。在宣布开会以前，神台上已供奉着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按：这是自撰之字）五祖之神位，墙上贴着“五行山”成立大会顺序单：

一、净面净手：由预定的山主、副山主及内八堂大哥挨次进行。

二、燃烛焚香：净面净手燃烛等，均口念诗句，司仪宣布净面，山主第一个净面时，司仪口念“金盆打水亮铿锵，照见汉家日月长，反清复明来净面，（此时山主将手巾在水面反复一次）——恭迎五祖鉴忠肠。”以下司仪不再念诗句，各人挨次净面。

燃烛诗由当家三爷燃烛时宣读：“高烧红烛照山堂，洪门义气

万年长，中华儿女心如火，民族前途放异光。”

焚香诗由当家三爷焚香时宣读：“五祖堂前万载香，同心合力定家邦，凯歌高唱班师日，痛饮黄龙喜更狂。”①

三、全体哥弟朝拜五祖，行三跪九叩首礼：跪！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凡三呼）。

四、拥护汪禹臣老拜兄荣任“五行山”山主。

五、拥护徐逸民、杨宝璜、范文藻、韦敬周、白玉山五位大哥荣任“五行山”副山主。

在宣布正副山主以后，管家三爷当即将预制的黄袍、方巾给正副山主穿戴齐全。

六、全体哥弟向正副山主行祝贺礼：向五祖神位行跪拜礼，一跪三叩首，正副山主立神台前作揖还礼。

七、请汪山主封本山内外八堂各位大哥勋位。在封内外八堂哥弟前，汪山主指定徐逸民、杨宝璜、范文藻、韦敬周四位大哥为今晚被封内外八堂勋位之大哥以及兄弟伙被提升的成员，担任恩承保荐四大盟兄（湖南洪门组织称恩、盟、拜、证四大盟兄。洪门有些山主自兼坐堂，统称恩兄，有单独设坐堂者，都以坐堂为本山恩兄。“五行山”以后吸收兄弟伙成员，都以坐堂大爷为恩兄，大约在七·七事变前，汪禹臣老山主病故后，即公推徐逸民大哥继任山主兼坐堂大爷）。

八、司仪传令称：奉汪老山主命令，封副山主徐逸民大哥兼本山坐堂大爷；

封副山主杨宝璜大哥兼本山陪堂大爷；

封副山主范文藻大哥兼本山文堂大爷，加封崔叔仙大哥为文

---

① 据白玉山说：开山堂时，净面净手，燃烛焚香，以及烧纸马送祖，洪门原有传统诗句，这次本山为适应抗日宗旨，由汪老山主亲自编写，交当家三爷宣读。——作者

堂大爷；

封副山主白玉山大哥兼本山武堂大哥并兼礼堂大爷；

封副山主韦敬周大哥和韦颂冠大哥为本山粮堂大爷；

封邱汉平大哥为本山刑堂大爷；

封梁其田等大哥为本山心腹大爷。

九、全体哥弟向内八堂各位大哥行祝贺礼向五祖神位行跪拜礼，一跪三叩首。正副山主和内八堂各位大哥立神台前作揖还礼。

十、请山主封本山外八堂各位哥弟的勋位。由司仪传令称：奉汪老山主命令（根据预定名单，除心腹已封外）：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三哥担任当家三爷；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五哥担任红旗五爷；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六哥担任□□六爷；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八哥担任□□八爷；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九哥担任□□九爷；

封某某等为“五行山”十哥为担任执法么爷。①

十一、全体山主、内外八堂兄弟行礼，向五祖报喜，行跪拜礼一跪三叩首。

十二、请山主宣读本山头的山、堂、香、水名称。山主宣读本山头是“五行山、卫国堂、团结香、保家水”，并说明山、堂、香、水是本山最秘密的组织暗号，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只作串连暗号。

十三、请坐堂大爷宣读《五行山出山柬》檄文。

十四、请刑堂大爷宣讲洪门纪律。十条十款如下：

十条：一、打倒日本小鬼；二、继续反清复汉；三；收复东三省；四、消灭满洲国；五、反对投降卖国；六、铲除一切汉奸；

---

① 外八堂原有十堂职位，后因四、七堂哥弟犯错误裁减了，称为外八堂。其中三个职位名称作者记不起来了。

七、反对外国侵略；八、不做外国奴隶；九、义气团结，互相帮助；十、有福同享，有祸同挡。

十款：一、不准杀害无辜；二、不准奸盗偷窃；三、不准营私舞弊；四、不准扶强欺弱；五、不准出卖山堂；六、不准屈服投敌；七、不准私通敌伪；八、不准泄漏秘密；九、不准卖友求荣；十、不准私立山堂。

按照洪门五祖纪律，如有违犯本山十条十款者，"光棍犯法，自绑自杀。"①

十五、歃血同盟。由红旗五哥左手缚着雄鸡，口中念道：杀尽倭奴还我血，同心合力复河山。右手举起钢刀，将雄鸡头斩断。鸡血流入一大型瓦盆中，由五哥把鸡血与白酒搅和，由山主汪大哥领头排队，由五哥舀起一碗血酒，各人挨次饮一口血酒，表示万众一心消灭日寇，恢复东北三省，痛饮黄龙。

十六、全山哥弟宣誓。由坐堂徐逸民大哥宣读誓词一句，全体哥弟同声宣读。誓词曰：义气团结，誓灭倭奴，如有违背本山纪律，甘愿自裁，此誓。宣誓后，真是鸦雀无声，异常严肃。

十七、请副山主白玉山大哥讲洪门简史，讲全国洪门组织，讲洪门串连暗号、码头接待规矩等等。这时已到深夜3时左右，白大哥讲了一些以后，说时间来不及了，将来定期专讲这一问题。

十八、坐堂徐逸民大哥宣布明天下午6时在某某餐馆酒会，共庆本山胜利成立。我记得次日的酒会，有20多桌。说明这次参加大会者约有200多兄弟。

十九、全山兄弟团拜，庆贺"五行山"成立大会胜利完成。由山主、副山主、内外八堂全体哥弟分班列队向五祖神位行跪拜礼，一跪三叩首，以示庆贺。

二十、恭送五祖。仍由山主、副山主、内外八堂全体哥弟分

① 这十条十款，并非《海底》的条文，而是邱汉平根据洪门纪律精神拟订的。

班列队向五祖神位行跪拜礼，一跪三叩首。最后由汪禹臣山主捧着五祖神位放在纸马上燃烧焚化，送祖回天，以免留下五祖遗迹，被空子利用。焚纸马送祖时，山主口念："五祖神前盟誓愿，洪门义气万年长，今天送祖回宫阙，全仗灵威复旧邦。"

大会结束已是日上三竿，大家陆续分散，以避免外人注意。这是我第一次亲身参加洪门上海"五行山"开山立堂的经过。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抗日战争以后，我又在重庆参加创立洪门"丽华山"，那是我第二次亲身参加洪门成立大典。

八·一三上海开战，冯玉祥将军指挥上海抗日第一线战斗，其旧部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字蒂民，早年是冯将军的卫队旅旅长，我曾在此部队工作过，与王旅长有八拜之交）率全师人马开到上海大场附近与日寇浴血作战。王师长深夜从火线上赶来上海找我（当时我住上海法租界斐地澳路蒲石路103号），请我参加军队抗日。这是我的夙愿，义不容辞。王师长请我担任该师少将参议兼三十二师司令部驻沪办事处处长，专驻上海为该师劝募抗日军用物资。我欣然允诺（这一工作对我在抗日阶段策动清、洪帮抗日，起了不少作用），便辞去上海新闻工作和矿业公司工作投军抗日。那几年为组织抗日力量，我在上海联络了许多清、洪帮的上层分子。组织了清帮"仁社"和洪门"五行山"，本来就是为抗日组织力量的，这下我就用上了"仁社"和"五行山"的弟兄们。这两个组织的成员极大部分有相当财力物力，爱国之心不落人后。我请他们出人力物力来抗日，弟兄们听说我担任三十二师的驻沪办事处处长，专为劝募抗日军用物资，各洪门、各清帮弟兄就源源不断地送抗日军用物资到我办事处，托我运送前方。送来的物资有大小汽车、大量石油及军用电器器材、无线电器材，以及军用服装（棉背心有几万件）和大量罐头食品。同时主持上海市地方协会的负责人（即抗日后援会）黄炎培、钱新之、杜月笙等原是我的熟人和老朋友，我向黄老等请发军用物资，从没有拒绝过。因

为三十二师是冯先生的老部队，又特别照顾。我记得在上海一个多月血战期间，我交副官押运送到前方的军用物资有20多卡车。我虽未能亲临前线杀敌，而能弄来一些抗日军用物资，于心稍慰。

上海保卫战失败后，1938年春节前我经香港转移到武汉。

我到了汉口以后，王修身师长因我在上海战场上给他军队劝募到大量物资，对我非常感激，特地从老河口（此时三十二师在老河口休整补充）赶来汉口，在一处酒家设宴为我接风。是晚席间有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字仿鲁）、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字景湘），还有其他一些军官（都是冯玉祥将军的老部下）。在酒席筵前王师长代我吹开了，说我是上海“仁社”的才子，上海报馆的名记者（其实我做报馆总发行部主任，并未做过记者），为人义气，交满天下等等。

我记得这次晚餐后第三天，王修身来旅馆看我（我住在汉口太平洋饭店），王对我说：“孙仿鲁总司令和萧景湘军长均想聘请你担任他们司令部的少将参议，代表他们司令部向国府各部接洽事务，并请代他们司令部劝募一些抗日军用物资。”经王一再劝说，我想担任3个军部少将职务，等于代10个师的部队进行一些活动，这对我抗日的初衷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应允了。几天后，我接到第二集团军和第二十六军的聘书，担任少将参议。军师部供给我住房，拨给了我小汽车，关于交际费，3个军师部准予实报实销，这就有利于我展开交际活动。此时我还兼福建省府专员。为拉清、洪帮的上层兄弟为我抗日部队服务，我代表部队在汉口办外交工作。

为方便工作的开展，我加入了汉口洪门“太华山”。山主杨庆山是汉口的地头蛇，当时任汉口市稽查处长，在汉口有相当的恶势力。同时我把上海“仁社”和“五行山”撤退到武汉的哥弟们团结起来，每逢星期四晚间举行聚餐会，借以联络互助，帮助逃难困难的哥弟们解决问题。由于我担任了少将职务，接触面更广

了，加上清、洪帮哥弟的协助，我在武汉募到的抗日军用物资并不比上海少。有一次我向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募到一批后方医院用的美国产医疗器械计 25 大箱，内中大小型 X 光机就有 5 大箱。因我托洪门有力哥弟韦作民同张竟立（交通部会计长）同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讲了一句话，许委员长便将原封未动的 25 箱医疗器械全部批赠给三十二师后方医院。后来王师长对我说，经后方医院医生估计，这 25 箱医械在当时至少值 10 万美元。我今天记上这一笔，说明清、洪帮组织，在抗日阶段也尽过一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力量。

1938 年 9、10 月间，日寇包围武汉，我转移到重庆，仍旧代表军师部对有关方面联系和继续进行劝募抗日军用物资。

我到了重庆后，决心要搞一个全国性的清、洪帮组织以帮助抗日工作。大约在 1938 年 11 月间，我受福建省银行董事长徐学禹、总经理邱汉平的聘请，担任福建省银行重庆分行经理，并兼总行顾问。徐、邱两兄都是留学生，徐是我上海“仁社”、邱是我上海“五行山”的最要好的兄弟。他们力劝我搞金融事业，以利于发展帮会上层组织，发展经济力量，对抗日可以增加实力。从此我做了金融工作，虽兼军师部少将参议名义，但不再受军队报酬。我做了银行经理以后，利用金融地位和军队关系，很顺利地联系到了全国清、洪帮上层骨干人物。当时我在重庆住在一位清、洪帮上层领导大哥韦以馥（字作民）家中。作民兄是我清帮上海“仁社”八拜盟兄，他是洪门内八堂字号大哥。作民原是清末秀才，曾到美国学习交通事业，在重庆时任交通部技监。作民的清帮徒弟学生和洪门弟兄，遍及全国交通系统，而且交游广阔，参加过许多社会团体，因此各界朋友众多。且作民为人忠实仁厚，助人为乐，素有韦陀菩萨之称，而与我特别友善。当时我住在韦家，朝夕讨论如何创造全国性洪门最高山堂，来统一全国洪门志士，整顿洪门，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作民主张我们自己先创立山堂，然

后才能有地位，才能联系全国各山堂的山主或各山内八堂大哥来组织全国最高山堂，统一全国洪门组织，整顿洪门，为中华民族持久抗日进一步作出贡献。

大约在1939年春，我已迁出韦宅，在重庆山王庙路5号租了三层楼住宅，是年夏，作民与我决定在重庆创立洪门“丽华山”（命名用意是要使洪门百花齐放，胜利地收复中华民族的锦绣河山）。本山堂宗旨是根据洪门“反清复明”的传统精神，“反对日本异族，还我河山”。作民决定在初夏清和之日，就在我山王庙的住宅内举行“丽华山”成立大会，约了清、洪帮在重庆的上层成员近百人来参加成立大会。其中极大部分成员是军政人员，如孙桐萱（军长）、张汶（字景贤，副师长）、蒋锄欧（字诉心，铁道铁甲车总司令）、钱公南（交通部技正）、壮智焕（经济部司长）等人，其中有两位朝鲜人参加，一名李青天，一名李范奭。李范奭当时担任国民党重庆中央训练团教官，抗战胜利后，任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的国务总理。李青天曾任李承晚的陆军总司令。

作民因我曾经在上海参加过成立“五行山”的大会，请我拟订“丽华山”成立大会的节目和山、堂、香、水与出山诗。

我拟的四柱是《丽华山》、《抗日堂》、《义气香》、《四海水》。我拟的出山诗两首是：

（一）

东夷日寇逞猖狂，犯我河山夺我疆。
关外沦为新傀儡，南京屠杀血汪洋。
强抢财物伤人命，奸淫妇女剖胸膛。
黄帝子孙齐努力，誓把倭奴一扫光。

（二）

大好河山遭掠夺，中华儿女忾同仇。
妻离子散抛园宅，国破家亡泪横流。
愿献此身驱日寇，拼将一死救神州。

今朝歃血同盟后，不灭倭奴誓不休。

关于开山立堂的程序节目，我就抄写“五行山”开山立堂时的20个程序和洪门纪律十条十款，经作民大哥和蒋锄欧大哥（内定的未来正副山主）过目审核，一律同意。

作民大哥通知他的清帮徒弟、重庆市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军统特务）派便衣警卫，在山王庙5号前后左右布防，保护“丽华山”开山立堂。

开山立堂的日期，是1939年初夏，但确实日期我忘了。是日夜11时开始，由钱公南（原是作民清帮徒弟）司仪，按照我抄来的20个程序逐个进行。

按第四项节目，拥护韦作民大哥荣任“丽华山”山主兼坐堂大爷。

按第五项节目，拥护蒋锄欧大哥、崔叔仙大哥为“丽华山”副山主兼陪堂大爷。（本山山主以下内八堂都称大哥，以示进一步民主。）

接着韦作民大哥指定，蒋锄欧、崔叔仙、李范奭，庄仲文为四大盟兄。

封蒋锄欧大哥兼武堂大哥。加封李青天、张景贤为武堂大哥。

封崔叔仙大哥兼文堂大哥。封李范奭大哥为刑堂大哥。封庄仲文大哥为礼堂大哥。封钱公南大哥为粮堂大哥。封胥惜吾（也是作民的清帮徒弟）为心腹大哥。

外八堂受封的哥弟，我多半是初相见，记不清楚了。

作民山主在会上谈了一些洪门纪律与串连暗号。

成立大会的第二晚上，我们全山弟兄在重庆某酒家聚了一次餐。此后由韦作民山主携带山、堂、香、水的印刷品布票和出山诗，分送给在重庆的和外地的全国各山头、堂口的山主、舵把子，“丽华山”到此胜利成立了。此后本山内八堂的几位大哥便积极研究召开全国统一性的最高山堂的组织，以谋进一步抗日救亡，多

半在作民家或山王庙5号晚间聚会，讨论联络各山堂山主、内八堂哥弟以及四川各堂口舵把子。四川洪门组织称袍哥，大山首领称舵把子，堂口有班辈之分，分仁字号堂口、义字号堂口，仁字号比义字长一辈，但都属于袍哥组织。当时在重庆仁字号堂口的老舵把子名田得胜，已70岁左右了。据田自称曾参加四川辛亥革命起义。田得胜在四川袍哥中岁数较大，资格较老，对四川各县的舵把子联系颇多，吃得开，叫得响，是我们联络的对象。我们又联络了在重庆的洪门山主，如“长白山”山主张树声、“五圣山”山主向海潜、“太华山”山主杨庆山等人，由作民大哥设宴聚会一次，讨论组织全国统一性的洪门组织，以谋共同抗日救亡。不久，我们的活动被特务头子军统局局长戴笠知道了，他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说：“洪帮要统一组织起来抗日，万一被‘异党’利用，不堪收拾。四川遍地是袍哥，势力很大，必须控制四川袍哥的各县头头，至于外省外县的洪门山主、清帮老头子在重庆逃难，并没有自己的地盘，没有群众，无关重要。但对四川各县的袍哥组织，必须控制，要用软的手段，不能硬来。”于是戴笠去找上海帮会头头杜月笙设法组织全国清、洪帮大联合，也说是为了增强抗日力量。杜月笙在上海是清帮闻人，但班辈并不高，而且杜又不是洪门哥弟，要同四川袍哥拉洪门关系，就必须加入洪门。据说杜在这一时期为帮助特务头子做工作，才在重庆加入洪门的。嗣由杜月笙以清、洪帮两重身分和戴笠两人具名在重庆交通银行（当时杜是该银行常务董事）邀请田得胜、张树声、韦作民、向海潜、杨庆山等人宴会，提议全国清、洪门大团结，组织“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由政府协助加强抗日。被请的客人心中有数，实际是把清、洪帮的头头骨干组织起来，加以监视和利用（是年秋在重庆市海关巷7号成立了“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在杜月笙、戴笠联名请客的第二天，韦作民召集“太华山”内八堂各位大爷会谈，详细地谈了杜月笙与戴笠提议组织“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

内情秘密，要我们赶快收起组织全国性的最高山堂的计划，以免受害。我记得作民兄最后说了一句："杜月笙无耻，又一次出卖帮会。"

二、洪门纪律

洪门纪律是非常严格的，但各山堂的哥弟不管犯了洪门什么规章制度，没有开除出洪门组织的制度。因洪门组织是秘密团体，怕被开除的哥弟脱离洪门组织以后，会泄漏洪门内部的秘密。洪门对违反纪律的哥弟处罚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轻刑——"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自己戳。第二种是死刑——"自绑自杀"。

关于"自绑自杀"的例子，万武回忆时曾有一段记述：1904年黄克强（黄兴）、彭希明、陈少芝、曹亚伯等为在长江准备起义，公推万武与刘道一（都是洪门大爷）前往湘潭策动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共图大业。我们动身去柳州的前两天，马福益有个结义兄弟叫马龙标的，少年英俊，办事能干，颇得马福益的宠信。因他生得漂亮，会中一个兄弟的妻子和他勾搭上了。按照洪门纪律，对于"穿红鞋"（指与会中弟兄的妻子通奸）是杀无赦的。那件事给马福益知道了，就将他交刑堂提讯，讯问明白后，判了死刑。到了执刑日期（就是我们动身去柳州的前两天），马龙标当面托马福益照顾他的母亲，然后慷慨自赴刑场。我还记得那天夜晚是苦雨凄风，送他的人约六七个，我与刘道一也一同前往。马福益依依不舍地对他说："兄弟呀，你不该生得太体面了，所以送了你的性命。"说罢就向刑场走去，龙标在前，马福益在后，第三是我与刘道一并肩而行，一行七八人，鸦雀无声，气象惨淡，正走时，忽闻马龙标用极悲惨的声调叫了一声："大哥，地下滑得很，前面又有一条小水沟，你留心一点啊！"大家听了都不觉泪下，尤其是马

福益忍不住泪流满面，叫了一声："兄弟，谢谢你，祝你十八年后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说话之间，已经到了刑场。我留心看那刑场如何布置，原来一无所有，只见前面无去路，对着我们的是浩浩荡荡的大江。那时马龙标高叫了一声："各位兄弟们，一齐少陪！"说毕只听得咚的一声，人已不见了，但见水波荡漾而已。马福益默祷了半晌，才率领一行人回到家中。这就是"自绑自杀"的纪录史实。

三、洪门暗号

洪门的暗号很多，如语言，动作等等。据洪门老前辈传说，对本山堂的四柱——山、堂、香、水的名称，和四大盟兄——恩、承、保、荐四位大哥的姓名，必须牢牢记住，便可遍行天下，到处有洪门兄弟招待照顾，帮助办事。但四柱名称和四大盟兄的姓名，必须绝对保密，不可对洪门兄弟以外的非洪门组织成员泄露，而且上不能对父母讲，下不能对同胞手足和妻子儿女讲，这是洪门组织绝密的暗号。它主要用在洪门各山堂之间的联系问答。所传说详载洪门《海底》暗号颇多，而我未见过《海底》。据前辈年长者所谈的一些暗号，略记于下。

洪门各山堂为了彼此联系，在某些城镇或地区设立码头，内部称为"方首"。在前清时，某山堂在某城镇或地区设立码头"方首"，必须通报全国洪门各山堂，以便联系。到了晚清年代，没有全国性洪门组织，联系的面不广了，大致一省的洪门组织都有联系，互通"方首"所在地点，用茶馆酒店为联系地点，将茶馆酒店名称地点，互相秘密通告对方。

各山堂互相联系，接洽工作，原则不用书面联系，怕在途次被清廷查获受罚，所以用暗号与对方联系。对准暗号就是自己人，便可谈私话。否则冒充洪门哥弟，就要吃苦头。联系码头的"方

首”（是一方之首之意），必须是“红旗老五”主持（或由执法老么代行），要非常熟悉洪门的规章制度，以及各山堂的四柱——山、堂、香、水的名称和各山堂的山主和坐堂大爷的姓名，以利盘问前来联系的洪门哥弟。

到外码头联系的洪门哥弟，如系组织派遣的，组织会告诉他要联系的外码头所在地点，以及茶酒馆的名称，使去联系者易于寻找。有些过路的洪门哥弟缺了路费或发生困难，因不知“方首”所在地点，就得在码头上到处找茶馆酒店，去摆暗号讲暗语，可是有些码头未设“方首”，则这位过路哥弟只好失望。因为洪门是秘密组织，不好到处问人。违犯洪门纪律是会受处罚的。

凡是洪门哥弟到某码头联系“方首”，到茶馆酒店时，不管是否知有“方首”红旗老五，来客进门应用右脚向前跨门槛。如此店有红旗老五，总要留心来客进门是右脚还是左脚。来客坐下将两手分开扑在桌边，口称请堂倌泡茶，即在酒店，也先称请堂倌泡茶。

堂倌问先生要什么茶，来客答要红茶。如是红旗老五，必须用盖碗茶杯送茶来（茶叶红、绿均可，并不一定是红茶，讲红茶与洪字同音，有找洪门兄弟之意），同时堂倌拿一双筷子给来客，客将筷子放在茶碗左首桌上，同时将茶碗盖子仰放在筷子左首。堂倌又问先生要吃什么，客答我要吃粮（原是入洪门者称为前来吃粮就是当兵之意）。堂倌又问先生从哪里来，答从山里来（由山堂来之意）。堂倌又问先生到哪里去，答从水路回家（从山堂香水访自家人）。此时堂倌如系“方首”的红旗老五（有时是执法老么代理），便换称呼您哥子府上哪里，答家堂头乡（香）下（于此来客已暗言山堂香水四字）。堂倌又问您哥子尊姓大名，昆仲几个，答兄弟姓某名某弟兄八人，我是长房老几，或二房老几（八人指内外八堂，长房指内八堂，二房指外八堂，老几指担任的职位）。

到此，堂倌——红旗老五在来客的动作和问答的言语中，已

初步认定来者是洪门哥弟，此时还未来点心或酒菜，堂倌对来客说，您哥如要解手，便所，我可领您去（便所暗示，可以方便谈话所在）。来客要说谢谢五哥（这表示来客已认定堂倌是洪门自己人了，称一声五哥）。随即跟着堂倌去便所。凡设“方首”的茶酒馆，都预备一个空房间，可为秘密谈话的所在地。

此时，红旗老五根据来客答话某房老几，判断来客在内外八堂的地位。如系内八堂的便称他为大哥，如系外八堂的便称他为您哥子。红旗老五在室内低声问：你宝山的四柱？老寨主尊姓大名？答的是山、堂、香、水的名称和山主的姓名。老五如认为四柱和山主姓名对上布票，便说晚间几时请到某处找兄弟细谈。到此，双方握手，认为是自己人，请来客入座吃东西。如在茶馆，由客人要点心多少，加数送上。如在酒馆，由堂倌送上二菜一汤，酒一壶，饭随量。吃毕来客说：请结帐。堂倌红旗老五说一声记帐了。来客不能言谢，这又是暗号。来客晚间遵守约定时间，去访红旗老五，谈来此任务以及见“方首”、“舵把子”等大哥接洽公务，均由红旗老五领见；如因山堂公事来访者，本“方首”尽量招待，不管住多长日期，临走时送路费；如系个人路过私人拜访者，本“方首”招待食宿三天，临走时送到达下一有“方首”码头的路费。过了三天，送过路费，再不招待。

以上是洪门成员一般联系用的动作与语言暗号。

四、清帮组织以及我参加清帮的经历

清帮是一个纵的组织，所谓纵的组织是按班辈分前辈后辈，如家庭中之高、曾、祖、父、子、孙等长幼辈份一样。参加清帮拜师如父，收徒如子，所以清门有这样的口号：“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所谓兄弟如手足者，凡同拜一个师父的徒众称为同参弟兄，称清帮前辈为师“父”，不是称师

“傅”。

清帮的口号：“义气团结，互帮互助。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师父领进门，交情在各人。”这就要求同参弟兄义气互助，完全如同家族式的组织。清帮组织，每一辈份有一个字代表，前有16个字，后有24个字，就是前十六代，后二十四代，共计四十代。大约在抗日前，我在上海听说，清帮后24字辈已经延续到“觉”字辈。我不知道这前16个字，后24个字辈是“元明心理，大通悟觉，普门开放，万象依归，罗祖真传，佛法玄妙”。据我的“师父”张镜湖先生说：“从晚清开始，由后24个字排辈，到上海‘仁社’成立（1935年）为止，已经延续了前8个字辈份，即‘元明心理，大通悟觉’。”镜湖先生的师父，是理字辈，人称扬州沈二太爷（名字我忘了）。镜湖先生本人是大字辈，我是通字辈。

投奔清帮，有二道手续。第一步上小香堂，先拜师父做门生，是入清帮的外围，这是师父考核门生的阶段，要经过三年或者更长些才能转为徒弟。第二步，师父认为门生可靠，便准许门生上大香堂，行收徒弟的大礼以后，才能称为徒弟，这才算是内围子弟。帮内的语言，在未上大香堂以前，叫做徒访师三年，师访徒三年，又称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下面谈谈我亲身加入清帮的经过，借以说明清帮组织的一系列手续与仪式。

前面讲过，当时先加入洪门者，就不能再入清帮，加入清帮者可以加入洪门。我为了联系清帮、洪门的在野力量来抗日，就先加入清帮，后加入洪门。加入清帮，必须由你要拜的在那位师父的徒弟二人介绍，经那个师父同意后，才可以办入门手续，举行拜师的大礼，即上小香堂。

大约是1933年，我在原西北军二十五路总指挥部工作。有一位师长戴潘周（字介屏，蒙城县人），谈到上海清帮大字辈张镜湖老太爷（这是清帮小辈对长辈的尊称，一般称师父或称老头子）。

张镜湖先生已70多岁了。因他是清帮大字辈，便专收清帮徒弟，不搞洪帮。他是当时中国清帮中最有威望的首领，全国各省市都有他的门徒，有些是省长、军长、师长。戴师长说："我也是张师父的徒弟。"我便要求戴师长介绍我先加入清帮，拜张老太爷为师。戴说介绍入门，要有二位门徒介绍才行，答允我再另找一位门徒——杜凤举军长作介绍人。杜军长住上海，戴师长先函托杜向张师父介绍我是军中人士、学者，张师父同意了，杜军长给戴师长回了信，戴师长复谢，并说我就去沪拜师。戴师长给我去沪出差机会，给我介绍信去上海看杜军长，杜教我写拜门贴子，用红字写，格式如下：

门生崔叔仙（是我在军中用名），三十二岁，江苏省高邮县人，承杜凤举军长、戴介屏师长介绍，自愿拜在张老太爷镜公麾下为徒，终身聆训，听候驱策。

三代：曾祖崔福、祖崔阳春、父崔瑞亭。

门生崔叔仙叩呈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日

门生帖子上写"拜麾下为徒"，是因张老有上将军衔，尊称"麾下"。次日我遵杜军长指导，备了贽敬礼——鸦片烟土二球（这是张老嗜好之品）连同门生帖子交由杜军长领我到张师父家拜门。

张镜湖先生住上海市华山路范园，自建三层楼洋房，宽大宏敞。我来张府前，已先有张门老门徒罗鑫泉（上海牙医）在客厅内等我们了。我们到后，罗到楼上通报张老，张老才入客厅，杜军长与我二人就地向张老行了一跪三叩首见面礼（这是杜军长事前同我言明的见面礼节）。张老便问我大致经历，军中情况，家庭情况。罗鑫泉已在佛堂前燃烛焚香，入客堂，请我们入佛堂上香（这是小香堂，简单得很）。罗司仪口称崔老弟向祖师爷行大礼，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首。又称：崔老弟向张师父行拜师大礼（张师父立香案左首并未坐下），我仍向佛前三跪九叩首。又称：向师兄

杜大哥行大礼，我面向佛前一跪三叩首。接着杜凤举说向罗师兄（指罗鑫泉）行大礼，我即向佛前一跪三叩首，入门礼仪完毕。接着罗鑫泉领我到楼上见了师母，当面行了一跪三叩首的大礼。

以上是初次收门生的经过。

大约未过三年，记得是1935年春，我在上海做新闻工作时，参加了张师父家的大香堂，成为张老先生的正式门徒了。

我参加大香堂的经过和仪式回忆如下：

据同门兄弟讲，上大香堂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大约在开大香堂以前10天左右，张门下各省的徒弟和门生都先后赶到上海来参加盛会。所有的门生和徒弟都给张师父送贺仪，一律送钱，视各人能力，不论多寡，多的有百元千元者，少的有十元数十元者。名为送礼，实是作此次开大香堂的费用。张师父是山东滕县人，是滕县最大的地主，全滕县的土地有十之五六系张师父的私产。

清帮组织的规章制度，均载在《清帮通草》（是一本清帮法规）中。我见过此书，内容记不清了。张门这次举行的大香堂的仪式，据说是按照《通草》所规定的传统仪式办理的。清帮开大香堂，按传统规定，应在市外寺庙中举行，因为张师父年高70以上，未到郊区寺庙举行。张师父住宅宏伟宽大，就在上海海格路（现华山路）范园张宅举行了。这天来参加大香堂的门生徒弟有100多人，多半是京沪附近徒众（据闻张师父门生与徒弟在全国各省有二三千之众），军政界人占多数，如外省的蒋鼎文、韩复榘、陈铭枢、黄琪翔、孙桐萱等人委托同参弟兄代表送礼参加。杜凤举、戴介屏、王修身由我代表参加，南京韦作民、张竞立，上海警备司令杨虎、黄金荣、陈佛生（又名陈世昌，杜月笙的师父），还有上海新闻界的张竹平、熊少豪、董显光、汪英宾、郑希陶以及工商、金融界的季自求和一些资本家，都于晚8时前来范园集合。

香堂的布置，堂正中悬罗祖画像，是明代衣冠，文人装束。供

桌上设黄纸书写的翁祖师爷之神位（置中），钱祖师爷之神位（置左上首），潘祖师爷之神位（置右下首），神位前供干果四包，荤素菜八件。沿供桌置香炉烛台，桌边设桌帏，桌下又置一香炉，在门外又用黄纸写上“陈四小祖之神位”，设香炉烛台供四菜。据说陈四是第一位进清帮的，因犯帮规逐出门，后人念他入帮最早，在开大香堂时，给他一份香火，以示纪念，但因是被逐者故将他神位设在门外。

众门生与徒弟随张师父（称本命师）和传道师樊锦臣、引见师高士奎进入香堂，先进山门的老徒弟排在前面，新进山门的门生排在后面。张师父属江淮泗帮，樊师父属嘉海卫帮，高师父属新五六帮。因为翁、钱、潘三位祖师原各有一帮组织，收徒弟时，三位师父要同到香堂受礼。如翁收徒应由钱、潘分任引见师和传道师，钱、潘收徒弟即以其他二师为引见师与传道师，这样某一师父收的徒弟，也等于其他二位所收徒弟。门内话叫做“一师皆师，一徒皆徒”。凡清帮徒弟，必须认真牢记上大香堂时，本命师父传授的三位师父的帮头和三位师父的三代姓名，这叫做三帮九代，是清帮最秘密的暗号。

张、樊、高三位师父入堂以后，有二位先进弟兄担任香堂执事兼司仪。燃烛焚香，又焚五束香（用红纸条裹着）插在桌下的香炉内，名为五指抱头香，表示帮中弟兄抱头团结，共讲义气。接着又焚了一束香，插在门外陈四小祖神位前。司仪口称：请本命师张师父孝祖，在翁、钱、潘三祖师神位前三跪九叩首。接着引见师樊师父、传道师高师父相继孝祖，都是三跪九叩首，然后司仪请三位师父到门外陈四小祖神位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礼。

三位师父回入香堂，坐在香案上首（即香案左边），司仪口称：各兄弟孝祖。这时堂前100多徒众，全体跪在堂前地毯上，面向祖师神位行三跪九叩首大礼后，司仪者口称：向门外小祖行大礼。各人原地面向门外三跪九叩首后，立在堂前。

这时司仪者请张、樊、高三位师父移坐在香案前正中坐着。司仪口称：各位先进老大参师，新进弟兄陪拜。于是全体跪下，面向三位师父，三跪九叩。起立后，先进老大立于两旁，我们新上大香的立于正中。司仪口称：各位新兄弟行拜师大礼，三跪九叩首。（三位老师都坐着。）

1. 向本命师张师父行拜师大礼，三跪九叩首。2. 向传道师樊师父行拜师大礼，三跪九叩首。3. 向引见师高师父行拜师大礼，三跪九叩首。之后，司仪口称：各位新兄弟跪下受训。于是全体跪下，由司仪执事把桌下的五指抱头香提起给每一位新上大香者各持一支香跪着听训。张师父训示：

问：你们是自愿入帮的，还是受人指使入帮的？

同声答：（这是事前由司仪执事教导过的）我们是自愿入帮的。

问：十大帮规，你们能遵守吗？

答：自愿严格遵守，誓守十大帮规。

接着张师父说一声：请引见师、传道师训话。

高师父训话说：师父领进门，交情在各人，清帮弟兄都要讲义气，讲互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

樊师父训话，讲了十大帮规内容，我当时也记不全，上香后由司仪执事给了我们各人一份油印的十大帮规。

三位师父训话后，司仪要大家起立，挨次将手上拈的那支香恭恭敬敬地插入香案上的香炉内，而不是插回桌底下的香炉内，这也是清帮秘密暗号之一，各人仍回堂前向三位师父面立。

本命师张师父将印好的三帮九代的名单吩咐司仪执事给新收的徒弟每人发给一张，张师父随即指示说：这是我们门里的绝密之宝，要妥为保存，不得对外泄漏，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你们要记牢三帮九代，腰中不带柴和米，走遍天下有饭吃，这就是你们的终身饭碗，切记切记。

司仪等张师父讲话后，便口称：各位新兄弟向三位师父谢恩，

三跪九叩首。传道与引见师起立，仍移坐香案上首。司仪口称：各位新兄弟向各位先进老大行见面礼，一跪三叩首。接着各位先进老大（连同二位执事）一同高呼向三位师父道喜，行大礼三跪九叩首。

司仪焚纸马宣布礼毕，继称：各位新老兄弟上楼拜见师母并道喜。新弟兄在前走，老弟兄在后走，司仪领新兄弟拜见师母行大礼，就地板三跪九叩首。接着老弟兄口称向师母道喜，也就地向师母行一跪三叩首的大礼。此时已近午夜子时了，大香堂到此圆满成功。司仪对大家说：师母已备好元宵汤团，请大家入席团圆。吃元宵时，有些先进老大对我们说，今天幸好没有邀请其他大字辈的前人班子来赶香堂，若是来了十位八位的大字辈师父，对每位大字辈师父，新老兄弟都要行三跪九叩首大礼，那会把头叩昏晕的。司仪又对大家说：明天中午师父请各位兄弟们来范园吃团圆酒。次日上午 11 时，各路弟兄已陆续来到范园张师父家中，新老同参弟兄俨同手足，亲若家人。这天张师父家楼上下摆了 12 桌酒席，佛堂正中三位师父坐在首席，其他都是有社会地位的陪席，如韦作民、杨虎、黄金荣、张竞立、钟秉锋、张竹平、熊少豪、董显光、季自求等人。大约在下午 2 时散席。司仪执事即席传达二事：一、明天下午 6 时，新受栽培的全体徒弟在新利查饭店设宴向三位师父谢恩，并请全体先进老大作陪，不另具请帖，务恳准时光临。二、今天午宴后，大家请三位师父到花园摄影留念。三位师父坐正中，先进老大坐在师父两旁，或坐在师父后面，新受栽培的徒众立在先进老大后面，摄影后各散。

次日，新利查饭店的晚餐是西餐，设了 120 个坐位，三位师父当然是首坐，由新兄弟推举一位年岁大的同参大哥坐主位，代表大家做主人。可是那晚杨虎与黄金荣及其他十几个并未到新利查饭店晚餐。张师父说他们来对我说过，因公事忙不能来了。当晚宴会的餐费约 300 多元，原则由新弟兄共同负担，这次 50 多位

新弟兄，贫富不等，师父有命，各人量力纳费，不足之数，指定三位新徒（均为大资本家）包办。这三位是英商怡和公司经理韦颂冠、英商怡和公司海洋轮船经理杨宝璜、财政部造币厂厂长韦敬周。一般经济力量不足的新徒至少出纳5元或10元、20元，不足之数由韦、杨、韦三位包办了。

张师父的门徒，大部分是社会上层人物，多半有自备汽车。散席后，有汽车的弟兄们，跟在三位师父后面把三位师父送回家中。这次香堂的经历到此结束。

在这次晚餐会上，有好多门徒提议组织上海“仁社俱乐部”，以利同参弟兄聚会，联络感情，互助事业。张师父点头同意。大约几个月以后，“仁社俱乐部”实现了。因张师父名“仁奎”，故以“仁社”命名。

五、清帮的秘密和暗号

清帮的最主要的秘密是“三帮九代”，这是绝密的暗号，也是清帮中成员互相联系的暗号，你如答得对上号，码头大哥便知道你是自己人，立刻会以礼相待，招待你食宿三天，临行还会送你路费到下一码头。这是在帮兄弟困难时跑码头混饭的重要法宝。所以在上大香堂时，师父在发给“三帮九代”时对徒弟们说：这是“终身饭碗”。

师父发给的我的油印品——“三帮九代”。上面写着本命师：江淮泗帮，张上镜下湖，祖师沈上某下某，曾祖师某上某下某。传道师嘉海卫帮，樊上锦下臣，祖师某上某下某，曾祖师某上某下某。引见师新五六帮，高上士下奎，祖师某上某下某，曾祖师某上某下某。此即清帮的“三帮九代”，并不是三位师父家族三代，我因从未跑过码头，对“三帮九代”姓名未记牢，因此写不出曾祖辈师父之姓名。

谈到清帮成员因事联络外帮，或跑码头混饭吃，平时又不相识，就得用清帮言行的暗号来打交道，略谈一些如下：

帮中成员，到外码头寻师访友，初到一个码头，不知谁是码头负责的老大（帮中人对帮中人一般称老大，这是船上工人的称呼），又不便到处打听，以免暴露清帮成员身份。可是清帮规定，在各城镇，特别是沿杭州至大沽口之间的大运河两岸的城镇，都设立茶馆酒店作为清帮码头的联络点，这是因为清帮组织原来是组织船帮代清廷沿大运河运粮，所以在沿运河两岸设茶馆酒店，作为清帮码头联络站。因此帮中人到外地，要联络接头，就先到茶馆酒店挂牌。所谓挂牌，就是在茶馆酒店里，摆出帮规的动作，讲出帮规的语言。帮中人入座以后，招呼堂倌（就是招待的服务员），泡盖碗清茶。这就表示要找清帮道友。堂倌如系本码头负责人，便要注意来客的一切动作和语言，以便迎接自己人。

茶倌立刻泡来一盖碗绿茶送给客人，客人随即将碗盖取下，放在茶碗左首，茶碗盖顶朝外，盖底朝里。这时堂倌送来一双筷子，竖放在茶碗右首，客人随即将筷子横放在茶碗前面。这两手，就是挂牌动作的暗号。

堂倌初步知道来的是帮中人，便来打招呼盘底了，问答都应说帮中语言暗号。堂倌问：老大尊姓？贵地何地？客人答：在家姓（潘），敝家师赐名（某某），与敝家师同住某城某市。（本来原不是与师父同县同乡，也要说同师同籍。这为了盘问三帮九代时，就不必一一交代师父籍贯，这是帮规的规定。）又问：老大可有门槛？这时挂牌人要起立恭恭敬敬答称，不敢占祖爷灵光。再问：贵前人帮头上下？挂牌人仍恭立答称，在家子不能言父，出外徒不敢言师，敝家师是江淮泗帮，张师父上镜下湖，祖师某上下，曾祖师某上下。连续把传道师、引见师三代分别答完，这叫做交代"三帮九代"的绝密暗号。堂倌知道是自己人，请老大坐下来用茶用餐，以便细细领教。这是表示将招待自己人。挂牌人根据堂倌

的动作和语言，了解到堂倌确是自己人，便起立请问老大尊姓上下，贵前人尊姓上下，堂倌答称：自己人不客气了。便简称敝姓某名某某，敝家师某上某下某。这时挂牌人了解到是谁在此站码头，于是在茶馆里便饮茶吃点心，在酒馆里便饮酒吃饭。吃完以后，堂倌走到客人面前招呼一声，代老大记帐了（意思不必付钱），请跟兄弟舍下谈。来到茶酒馆另一空房坐下，堂倌又开始深入盘问：老大顶哪几个字？按后24个字排行，如果是通字辈，便答称：头顶二十世，身背二十一世，脚踏二十二世。码头老大便知来者是“通”字辈。来者回问：（因客主地位不同，问答语言各异）请问老大烧那炉香？堂倌答：（不说第几世）头顶二十一炉香，脚踩二十三炉香，手提二十二炉香。来者便知对方是“悟”字辈，比自己小一辈。但家门规矩，仍称对方老大。这时堂倌已知自己比来客小一辈，便改口称：请问某（来者姓氏）师父到此有何贵干？答称：到此接洽家务（公事），或到此寻师访友（私事）。不管是办公事或私事，码头老大立即送来客到码头招待所住下，供应三天食宿，临行送路费。如办公事，应领来客拜见站码头的管家师父，由管家师父通知招待，如何招待，也不限定三天。从此码头老大便把来客当作自家人一样遇事相助。

清帮《通草》上记载的帮内暗语暗号，还多得很，例如，盘问船有多长？船头多宽？船尾多宽？船上有多少板？有多少钉？桅杆有多高等等，这是在怀疑对方是“空子”，是寻衅地盘问“通草”内容。我都未留心记，上面所谈的是清帮主要秘密暗号。

六、清帮的纪律

清帮最主要的纪律，是十大帮规：

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扰乱帮规。四、不准江湖乱道（就是不准泄漏帮内秘密）。五、不准扒灰倒笼。

六、不准引水带线。七、不准奸盗邪淫。八、必须有福同享。九、必须有难同当。十、必须仁义礼智信。据《通草》规定，违犯十大帮规者，轻者三刀六个眼，重者九刀十八疤，要自己拿刀自己在大腿上戳。最严重者死刑，用石板捆绑犯规者从船上投入水底。

辛亥革命以后，不守帮规者，所在多有，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清帮头目，在上海形成流氓集团，其作奸犯科，危害人民的行为，都是违背十大帮规的，但我并未听说有谁被帮内处死者。据说辛亥革命以前，清帮纪律还是很严的。

张镜湖先生在20年代以后，所收的门生徒弟，极大部分是社会上层人物，且多知识分子，多半是谋互助为发展个人事业而加入张门清帮组织的。这些人能讲义气，但也不能说很少违犯帮规。

七、上海清帮“仁社”

张镜湖先生举行大香堂以后，新门徒在新利查饭店备谢酒请张师父等举行宴会时，席间有人提议把张门的徒弟用社团法人的形式，组织“仁社俱乐部”，以谋团聚互助互利。但因当时匆匆酒会，张先生虽表同意，却未定何时办。

因我已成了张师父的正式徒弟，是内圈成员，存心要推动“仁社”组织，好拉拢同参中的军、政、商、学界的上层分子，为我个人事业的发展，有利我组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我鼓动同参中的老弟兄张竹平、韦作民、徐逸民（上海名医）庄铸九（盛宣怀的女婿，资本家）等积极带头推动组织“仁社”。由张竹平、韦作民、徐逸民等去请示张师父同意后，便由张竹平、韦作民、徐逸民、庄铸九、季自求、陈守志、崔叔仙等7人为筹备委员，在《时事新报》馆举行首次会议，决定推由张竹平、韦作民、徐逸民在交通便利处租一幢房屋作为社址，推季自求草拟“仁社”赞，推崔叔仙草拟“仁社”章程，准备送社会局备案。

没有几天，张竹平对我说（时我在四社报馆工作，与张终朝见面），“仁社”社址房屋已租妥了，在福煦路383号（现在的延安中路），此处房屋原是孙科（前立法院长）一帮广东人的俱乐部，内部家具俱全，连同房屋顶费，一并由“仁社”出价接收。这笔房产与家具要花几十两黄金，是由几个有钱的弟兄解囊相助的。象我们搞文化职业的穷小子无力资助，也不要我们花钱。这就体现了义气互助的清帮精神。

社址由庄铸九、陈守志、徐逸民、郑希陶、汪大燮（上海市警察总局的督察长）等负责管理，雇了一位事务员名刘公坡，二位工友，一位厨师，办理日常事务。从此每天晚上6时，社内开一桌晚餐六个菜，老弟兄可随时来晚餐，所有餐费、职工开支，暂由几位有钱的弟兄掏腰包。“仁社”正式成立后，由社员缴纳会费以供开支。

在“仁社”筹备阶段，多半是几位筹备委员来晚餐，借开碰头会。没有几天，季自求的“仁社”赞写好了，并用玻璃镜框装好，准备“仁社”开成立大会时悬挂客堂中。季自求是南通市人，长古典文学，学者风度，当时他任中国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的主任秘书。该总局局长也是张师父的门徒，名字我想不起了。我起草的“仁社”章程也写好了，交张竹平拿到筹备会通过，又送给张师父看过，而后送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备案。此时上海市市长是吴铁城，吴也是张师父的门生，“仁社”备案是毫无问题。可是张师父从未公开向徒弟们说过吴是门里人，因为吴尚未上过大香，只是算门生，不算是徒弟，还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大约在1935年5月，“仁社俱乐部”拿到政府批准立案的通知以后，便有“仁社俱乐部”新社址举行了成立大会。从此会员们都称“仁社”，不称什么俱乐部。大家以为“仁”字是张师父的名字，称“仁社”似乎亲热些。会员须经社长批准，张师父是全体门徒早经决定的“仁社”社长。在成立大会以前，有几位老兄

弟，如张竹平、韦作民、徐逸民、季自求、庄铸九等人去到张师父处要会员名单。我要说明一下，“仁社”表面上是俱乐部，章程上也写的民主制度，实际上“仁社”实行的是张师父的家长制，所有会员都必须由张师父指定的，而且理事长、副理事长、各理事也是张师父指定的。这次张竹平等人取来的会员名单只有200多名，据一些老兄弟说，张师父在全国各地徒弟门生，有三四千人之多，但张师父未全部写出来。这次拿来200多名的单子都是社会上层人物，文职有特任、简任、荐任以上者，武职有将校以上者，以及社会名流、资本家，有少数是他30年代的徒弟。名单上还有20多位是门徒还未上过大香，但他们有社会地位。张师父并指定了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名单，我们早知吴铁城和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都是张师父的门生，但并未列名。张师父不愿将那些地位较高的或地位较低的门生徒弟列为“仁社”会员，怕有诸多不便。张竹平等征得张师父同意，这次算开成立大会，每年会员大会在张师父生日（大约是10月间）召开，以免外埠会员往返多次。

八·一三战事爆发，上海各界热心抗日，都向上海地方协会（黄炎培等主办）捐献抗日军用财物。

时崔叔仙任陆军三十二师驻沪办事处处长，又因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副师长戴介屏是“仁社”会员，在上海的“仁社”会员大量捐献了军用物资，如大小汽车、汽油、电讯器材、棉背心、罐头食品等，交由崔叔仙运送前方，赠送给三十二师，大大鼓舞了抗战士气。这是“仁社”对抗日的小贡献。

八·一三上海周围沦陷后，我化装乘英轮经香港到武汉，继续抗日工作，上海“仁社俱乐部”的活动情况我便不知道了。此后在汉口和重庆都由我通知在后方的“仁社”会员，每月聚餐一次借资联系。1941年我去兰州做农民银行经理后，重庆“仁社”会员的每月聚餐会，由镜湖先生的三儿子张叔良做联系工作，时张

叔良在重庆做保险业务。

上海清帮“仁社”以外，在上海还有一个“仁社”组织，那是从外国留学回国后的留学生组织。

在“仁社俱乐部”成立以后，1936年初，大约是八·一三日本侵华前一年春季，蒋介石侦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有反蒋阴谋。蒋知韩复榘和韩的几位师长都是张镜湖先生的徒弟，遂托吴铁城（当时的上海市长）和钱新之（当时的交通银行董事长，是镜湖先生的把兄弟，钱住宅与镜湖先生住宅紧邻，张、钱平时往来颇密）请镜湖先生去南京与蒋见面，谈山东问题。镜湖先生以国家为重，答允去南京，蒋遂挂专车接镜湖先生。蒋在中山陵官邸门口迎接张老，蒋见到张老用清帮规矩，称呼“张老太爷”。蒋与张老深谈国家安危大计，请张老太爷去山东一趟，力劝韩以国家为重，不可内乱，免起战祸，使人民遭殃。蒋表示韩如不动，我保证对韩增加协饷以示诚意。张老允之，蒋又派专车送张老去山东见韩，力劝打消反蒋阴谋，以利害说之，韩兵不过10万左右，而蒋嫡系军队有百万之众，且装备坚利，韩反必败。况且蒋允增加协饷，张老对韩表示负责担保蒋介石绝不食言，也不怀恨。韩认为蒋虽有百万雄师，但都牵制在“剿共”阵地，无法调兵山东，故始则不同意。继因韩手下的四位师长也都是张老门徒，一致同意张老的劝告，韩只好同意，打消反蒋之谋，张老又向南京答复蒋介石，要蒋绝不能食言，不能怀恨韩，不能向山东开刀。蒋坚决表示，一定听老太爷的吩咐。此事系张老之子张叔良对我亲口言之。

八、上海和其他地方清帮社团组织

自从清帮老前辈张仁奎上将在上海组织了清帮“仁社俱乐部”以后，上海和南京立即组织了清帮“荣社”、“兴中学会”、

“恒社”、“文社”等社会团体。

“荣社”是黄金荣领导他的徒众所组织的社会团体，组织成员都是黄金荣的徒弟和门生。这些人大部分是中下层人物，有捕房探员和中小商业主，除特色的门徒蒋介石以外，很少有军政界上层人物。“荣社”设在上海市曹河泾黄家花园（黄金荣的私宅），“荣社”的日常事务由黄的得意门徒唐家鹏主持。黄的门徒我很少认识，但我知道他的特色门徒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的一些史料。据我的“仁社”同参弟兄朱景芳（黄金荣大世界的经理，是黄的亲信）对我说过：“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纱布交易所做拍板工作。当时蒋在交易所还未得发，便托人介绍拜黄金荣为师，写过门生帖子。蒋借黄的关系，在交易所内曾一度发了财，不久又失败了。为了避债曾到外码头混了一段辰光。而后又回到上海，与他的情妇陈某住在十六铺‘孵豆芽’（上海话就是不得意在家无聊之意）。后来由陈其美给蒋写介绍信到广州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做副官，蒋因此得发，做了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有了军事力量的本钱。中山先生去世，他表面上仍同共产党合作北伐，做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到了上海，黄金荣和杨虎、陈群、杜月笙等人，帮助蒋介石搞四·一二大屠杀，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与共产党分了家。蒋到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黄金荣认为蒋介石等于做了‘皇帝’，便把蒋介石以往给他写的门生帖子送还给蒋介石。”

大约在1936年春秋佳日，黄金荣过60岁，在曹河泾黄家花园里大宴宾客，来宾都是清帮中人。特别是张镜湖先生的门徒，因与黄是同参兄弟，所以凡在上海的同参兄弟都给黄送寿礼，到黄家花园拜寿。作者是办报的穷文人，因系同参弟兄，也送了10元寿仪。在黄金荣举行午宴时，黄对各来宾宣称：“蒋总司令（蒋介石）送给我2万元寿礼，我不能收，我准备拿蒋总司令的2万元到杭州为清帮祖师父罗祖建立家庙，征求大家意见。”全堂贺客都拍手欢迎。这是我在场亲耳听到的事实，说明蒋介石虽贵为国民

党的国家主席，仍不忘“十大帮规”，尚能尊师重道。这次蒋送2万元寿仪，还因为黄金荣在四·一二政变中为蒋做过帮凶，所以一并感恩图报。

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失败以后，在上海“孵豆芽”年代，曾经利用清帮身份跑外码头混饭吃，那时他熟谙《通草》帮规，到处讲“义气”，但只是要别人讲义气，要清帮码头供他食宿而已。等到戴上总司令、国府主席、委员长、总统和国民党总裁等桂冠，除对黄金荣有所孝敬外，对任何人他未承认过是清帮“悟”字辈，这在“十大帮规”中叫做“扰乱帮规”。因此“荣社”社员名册不敢列入蒋介石三字，但是“荣社”社员中知道蒋入帮情况者，颇不乏人。

“兴中学会”是杨啸天的清帮组织，会址设在上海浦东大厦（即杜月笙的浦东同乡会的大楼，杜月笙的“恒社”也设在此大厦中，地址在现在的延安东路接延安中路的交界处）。

“兴中学会”由杨的得宠门徒王寄一主持会务，听从杨的命令开展会务。杨的其他门徒，我相识不多，但王、杨有二项小故事，值得记一记。

大约1940年我在重庆做福建省银行经理时，王在重庆社会部工作。有一天王来找我，说因公事要到南京汪伪组织去找伪政府军政部长杨揆一商量一件事，要我写一封介绍信去南京见杨（王知我与杨是“仁社”前辈，而且私交好），并说这是秘密公务，“请崔老师不要对任何人讲起”。我知王是去沦陷区活动，定是爱国行动，就亲笔代写了介绍信。不久韦作民清帮“文社”有些学生来对我说，王寄一到南京做了汉奸。我似信非信，置之而已。可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在镇江做农民银行经理时，大约在1947年冬季，杨啸天领着王寄一来镇江看我，住在我家里。我问王寄一现在何处工作，他说仍旧在社会部工作。我就问起他从重庆到南京见杨揆一的往事。我内心在揣摩为什么王寄一由重庆以国民党身

份到南京与汉奸鬼混，抗日后又回到国民党工作？这还不算奇怪。大陆解放后，我响应政府号召，起义从香港回上海工作。1951年在我家门口（乌鲁木齐南路145号）见到王寄一，寒暄了几句。王说，他现在北京交通部担任专员工作。我思想翻腾了。认为王寄一是怪人。在解放前利用帮会先搞国民党工作，又到沦陷区周旋于汉奸之间，抗战胜利后又搞国民党工作，解放后，又做了北京人民政府的专员。我觉得费解。此时我在上海市公安局做反特工作，我立即用书面将王寄一以上的一切政治行动，向市公安局作了汇报。

另一件事是杨啸天亲口对我谈的。1939年我在重庆做银行经理工作，家住大梁子山王庙5号。杨啸天住上清寺范庄（范绍增的住宅）。杨虽仍挂着上海警备司令的头衔，可是个光杆司令，除身边有一位少年副官外，手下没有一个兵。终日无聊，三天两天到我家来晚餐，作方城之战（因我银行厨师会做上海、广东菜，杨颇赏识）。在1939年至1941年初，杨与我经常见面，常常表示对蒋介石不满。有一次杨说民国11年在广州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杨与蒋同时担任中山先生的副官，杨与蒋同一卧室，与蒋曾经换贴，有八拜之交。杨、蒋二人都是作客他乡，未带家眷，都喜欢吃“碱水面”（即广州珠江的船妓）。杨说蒋常去珠江逛船，又怕中山先生叫他。蒋出门时把床帐放下，床前放一双鞋子。有一次中山先生差另一副官来叫蒋，杨说他身体不好，睡了，那副官看帐子放着，床前有鞋子，就去回禀孙先生。杨说：“我同蒋在广州年代里，是真诚对蒋。蒋却专耍手段，不讲义气。就不谈帮会关系，也要顾到把弟兄的关系。可是抗战以后，蒋专听戴雨农的话，说我有二心，不给我实权，给我这空头司令头衔，每月领一个中将饷，过着困难生活。蒋还骗我说，等抗战胜利后，仍让我做上海市警备司令。我知他又在耍手段，他一辈子不讲信义，总有一天要失败的。”抗战胜利以后，杨啸天并未继任上海市警备司令，

于是在上海大搞他的“兴中学会”组织反蒋。

“恒社”是杜月笙的清帮组织。关于杜月笙的发迹史，据“仁社”会员陆桂山（黄金荣的亲信）说：杜月笙的老头子（即清帮师父）陈佛生是没有能力的人，杜月笙的发家。全靠黄老板（即黄金荣）一手提拔。那时黄老板是法捕房的督察长，杜月笙还是小瘪三，在十六铺水果摊上捡些破烂水果，拎水果篮子，在南市（中国地界）串弄堂、卖水果。杜在小瘪三中吃得开。黄老板有一天要向南市某户某人侦探情况并逮捕他。因捕房侦探人员不能到中国地界侦查或捕人，黄老板对陈佛生（南市一带清帮头头）说，在南市找几个小弟兄，到南市某户侦探某人行动，设法把某人绑进租界，送到法捕房。佛生说这不难，十六铺一带我有好些小家伙，其中杜月笙等人每天在南市一带串弄堂卖水果，要小杜乘某人出门时，叫几个小家伙把某人绑进租界来，大哥（指黄）派几个巡捕在租界边上接应。

陈佛生的这个计划很灵，三天以后，黄老板要逮捕的某人被杜月笙等绑送到法捕房。因此黄老板对杜月笙开始感兴趣，便要陈佛生把小杜带来见见面，以后好让他在中国地界做些侦探工作。后来佛生领着月笙来拜见师叔黄老板（因陈比黄大，先入清门，先进门为大，因称黄为师叔）。月笙见到黄老板，叫了一声师叔，趴在地下一跪三叩首，行了见面大礼。黄老板说：“以后我的巡捕有事找你，你听他们指挥。”从此杜月笙就有了靠山了。

十六铺和南市的小瘪三、小流氓知道杜月笙见过黄老板，大家都来跟杜月笙交朋友。于是杜成为南市一带的小流氓头子了。

杜月笙以为黄老板接见过他，胆了也大了，跟小流氓商量：偷偷摸摸，卖水果不够混生活。有个不花本的生意，我们可以做。中国地界有钱的鸦片烟鬼子每天到法租界来买烟土，我们小弟兄沿着租界边布防，见到买烟土者从租界出来，刚入华界，便把他烟土抢来往租界里跑。烟土在华界是违禁品，持烟土者被抢了烟土，

不敢向华界警察局报案。案子是出在华界，被抢者又不敢向租界巡捕房报案。我们把烟土抢来，在租界开了烟土店。买我们店的烟土，保险出租界没有人抢。我们不是也做了烟土店老板了吗？这就比卖烂水果要好多了。

一群小流氓举双手赞成。于是杜月笙便领着一群小流氓干起抢烟土和卖烟土的买卖来了。在法租界公馆马路（现在的金陵东路）开设了某字号商店，实际专卖烟土。杜月笙居然也做起老板来了。杜月笙有手段，对同伙的小弟兄们凡事公开，不吃私，宁可让别人多分些利益，自己少拿些利益。杜定了一个暗地宣言，不准其他流氓在法租界南边沿华界抢土，要抢可加入到杜的小集团，否则给他“吃生活”。于是南市一带小流氓请亲托友，跟杜老板说情入伙。杜的流氓集团成员越来越多。杜老板被人们称为“杜瘟神”。

杜老板抢卖烟土的生意日益兴旺，可是有一次抢土惹祸了，谁知又因祸得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杜的小集团侦悉由南通运来一船烟土，有好几百斤，要在十六铺上岸运入法租界。杜便组织小流氓集团，冒充中国便衣侦探，租用几辆出租汽车在码头等着（司机也是集团成员）。在南通运烟土船靠近十六铺码头时，这群“便衣侦探”便一拥而上，把船老大同水手们一起关进舱房，对他们说：“听说你船私运烟土，我们奉命前来侦查。”其余一些“便衣侦探”便在船上乱翻，找到四只红色衣箱，内中装着烟土。后来听说，不过100多斤烟土。这些“便衣侦探”便四箱烟土装入等在码头上的汽车内，送往公馆马路杜老板的商号。“便衣侦探”离船时，对船老大说：“不准上岸，听候报告局长处理。”船老大心里有数，明知这些是流氓冒充“侦探”。船上押运烟土的老板也不争吵，就让这些流氓把烟土抢走了。

哪知这批烟土是由黄金荣包运，向黄交付保险费的。杜的流氓集团有一项规定，每次抢来的烟土不管多寡，要保存三天以后，

才能出售分赃，以防租界上有权势者来“讲经头”（即办交涉）。船上押运烟土的老板去找保险者黄金荣，黄说没关系，会找回来的。黄自己明白，这次包运烟土，事前没有给南市一些流氓头头打招呼，怕他们抢到手分掉，黄老板内心还有些着急。黄即刻把陈佛生找来，要陈去找杜月笙调查冒充“侦探”抢这批烟土的人，送点钱把烟土赎回来。陈找到徒弟小杜，说明来意。杜说不知这批货色是黄阿叔保险的，二话没说便同几个小弟兄，叫了“祥生”（上海出租汽车商）几辆小汽车，把四箱烟土亲自送到黄公馆（钧培里）。杜见到黄老板，趴下来一跪三叩首，口称：小侄无知，不知此货是阿叔保险的，现在原封不动送来了。黄金荣即刻把杜拉起来说：这不能怪你们，是我事前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光棍不挡财路”（这是帮内语言），这四箱烟土，你拿一箱回去，给小弟兄们分分。杜答称：我们已“欺师灭祖”，对不起阿叔，哪能再分一箱烟土。杜坚决不受，便禀辞而去。黄金荣从此对杜月笙便另眼看待。黄对陈佛生说，你徒弟小杜够义气，要他常来我家走走。

不久黄金荣小生日，帮中小朋友贺客盈门，黄未见到杜来拜寿，便问自己的门徒：小赤佬（小鬼之意，是对杜亲热之称）今天怎么不来给我拜寿，派人去叫他中午来我家吃面。去者回来向黄说：小杜店里这几天生意不好（是说未抢到烟土），一些小弟兄伙食开不了，小杜把自己的一些好衣服，连新做的杭绸罩衫一齐送到当铺，当钱给兄弟们开伙食了，所以不能来拜寿。

黄听说后认为小杜真讲义气，克己待人，越发对他重视，即刻要自己徒弟拿了几十元送给杜，要他把衣服赎回，赶快到黄公馆拜寿吃面。杜立即赎衣服穿上，还买了四色寿礼，到黄家磕头拜寿。就在这次拜寿以后，黄对陈佛生和杜月笙说，月笙的小弟兄一天一天多起来了，南市的生意（指抢土）也兴旺了，我来跟捕房说，让月笙在法租界设个赌场，让小弟兄们混口饭吃。不久杜月笙又成了大赌场的老板了。杜也大量收徒，在租界形成流氓

集团的首领之一。这全是黄金荣一手提拔的，后来杜月笙成为上海“闻人”以后，其恶势力竟驾诸黄金荣之上。杜成了上海“闻人”以后，由他的“政客”徒弟陆京士等和一些门下清客提议成立“恒社”，社址也和“兴中学会”在一处大楼内——即浦东大厦（现在延安路上）。

最后陆桂山还说了一句：若不是金荣大哥提拔，月笙哪会有今天。

抗战阶段，孔祥熙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1940年前后，我担任行政院简任组长和中国农民银行董事会秘书。除星期日外，我几乎每天要拿着行政院或中农董事会的公文，到上清寺范庄“孔公馆”送给孔祥熙批阅。因此我多次亲眼见到、亲耳听到杜月笙在与孔谈运销大烟土的问题。后来我了解到，当时蒋介石命令部下假禁鸦片烟为名，在四川各地没收烟土。四川多年来号称川土出产地，这次禁烟运动搜括到的烟土据说有几十万斤，存在四川涪州等地方。孔祥熙便动脑筋想借土开发财源。孔商得蒋的同意，便找戴笠和杜月笙来商量。这时香港被日寇占领，杜月笙才到重庆不久，孔对戴、杜说：你们两位在敌陷区上海等处都有人，政府没收的一批烟土，放在四川毫无用处，托你们两位设法运沦陷区卖掉，变成钱，给财政部增加一些收入。杜月笙满口答应：“没有问题，我包销。但内外运输要请雨农兄（戴笠号名）派妥员护运。”戴与杜是老把弟兄，是做坏事的老搭档，戴也满口答应。此次把大批鸦片运往沦陷区出售，将要危害不少善良人民。听说杜月笙特地在重庆设一公司商号，向孔廉价购进烟土，运进沦陷区高价出售。杜老板固然盈余亿万，戴笠也分肥不少。

日寇占领沿海各省以后，杜月笙指使他在沦陷区的徒子徒孙帮助戴笠在沦陷区组织“忠义救国军”，表面口称敌后抗日，实际在沦陷区“剿共”。

“文社”是上海清帮成员韦以黻（字作民）和张竞立（字彬人）两同参兄弟于1935年在南京创立的。所有的会员，都是韦、张两君的门生徒弟，其中有女弟子。韦、张两君的门生和徒弟极大部分是交通部系统的中、下级官员和“复兴社”成员，都是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知识青壮年。抗日战争期间，“文社”成员大部分到了汉口、重庆。“文社”成员每月有一次聚餐会，韦作民兄因同我私交厚，聚餐常常邀我去参加。作民兄积极抗日，每次聚餐会，他都教导他的门生徒弟要义气团结，打倒日本鬼子，帮助政府收复失地。“文社”作风，比之上海的“荣社”、“兴中学会”、“恒社”要好一些。

九、为弟兄几遭戴笠毒手

1939年春天，我住在重庆市南温泉镇卢家花园，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认为我帮助清洪帮兄弟杨揆一逃出重庆，到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做汉奸，于是一面先派大批便衣特务包围卢家花园，监视我行动，一面报请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出拘票逮捕我。这个罪名不小，可能要丢脑袋的。

这场惊险事故，必须从头说起。

杨揆一，湖北省人，早年在日本士官陆军学校读书。蒋介石、李烈钧（字协和）、何成浚都是该士官军校的同学。揆一是上海张镜湖先生的清帮门徒，是上海清帮“仁社”的会员，也是汉口“太华山”洪门弟兄，与我和韦作民等是同参弟兄，向有往来。

八·一三中日战争爆发，上海、南京沦陷后，我于1938年春转移到汉口时，何成浚任湖北省主席，杨揆一任湖北省政府秘书长，韦作民在汉口任平汉铁路局长，我任第二集团军等部队的少将参议，常常去找何成浚、杨揆一帮我捐募抗日军用物资。因揆一是“仁社”弟兄，帮我捐募抗日军用物资特别热心，所以我与

杨的私交日益加深。

1938年秋，汉口将失守，我和杨揆一、韦作民等“仁社”弟兄都转移到重庆。1939春因日寇敌机不断轰炸重庆市，我同作民在市郊南温泉镇借了两处房子，作民住镇中，我住镇西虎啸口卢家花园。园主卢德敷是大地主洪门哥老会仁字号大爷，因我是洪门内八堂弟兄，卢兄特邀我住他家花园避炸。我在卢家第三天，重庆市被炸颇烈，城中居民纷纷往郊区、乡区逃避，杨揆一也逃到南温泉镇。杨到卢家找到我，说他原住重庆寄庐被炸，衣物家具全毁，只身逃到南温泉镇。杨还说住旅馆，吃饭店，总非久计。杨知我近半年来与四川袍哥的关系颇多，托我转托袍哥代他找一住所。我当时领杨到南温泉镇上找到本镇码头大舵把子谭备三。谭是这一带的洪门领袖，是大地主、大资本家，重庆川盐银行的常务董事。谭说，杨大哥既是兄弟伙，就在我家住下。杨怕打扰，要求代租一宅。谭说，正好我镇上有两间空房，请杨大哥住下，我会派人照料(四川袍哥确讲义气)。当时谭领我与杨揆一到那住宅，房屋很宽敞，谭叫兄弟伙般来床桌家具和日用物品，一个下午解决了揆一的新居问题。揆一不肯就食于谭家，他仍每天就食于饭店。次晨我去看杨，送给他100元法币，给他零用。我记得杨说了一声“真是雪中送炭”。说真的，我为搞清洪帮，在兄弟伙中花费不少，然而我一生事业之进展也获得清洪帮兄弟伙之帮助不少。可是我为了帮助杨揆一继续解决困难，乱子因此产生了。

因为我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字仿鲁）的少将参议，孙因在前方作战，把家眷爱妻（据说是溥仪的堂姐妹）寄托在云南省总司令卢汉（字永衡）家中。孙托我代表他去昆明面谢卢总司令，并探望其岳母。我因三天后就要飞昆明，特去走告杨揆一，问问的他的近况，告诉他我将去昆明几天。我到杨处，有一位50多岁壮者在座，杨随即给我介绍说：“这位是我在日本读书时的老同学李协和先生。”我说：“久仰了，李将军是北伐后的老主席。”

（北伐后，李曾任南京国府主席，是辛亥革命老同志。）杨对我说："最近何总监（指当时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派我去兰州担任军法执行分监工作，我不想去，正在同协和兄商量。"我说你们有事商量，我先走了。好在我飞机票还未弄到手，还有二三天才会走呢。

次日清晨杨揆一来找我说："我不想去西北了，协和兄家住昆明，有花园住宅，日机不炸昆明，协和约我去昆明到他家长住避难。协和今早已飞昆明了。我来同你商量，请您代我弄张飞机票，同您一道飞昆明。"我一口答应，杨辞去。我便赶往重庆找韦作民买两张飞机票，说明杨揆一去昆明看李烈钧（李协和之官名），与我同行。因航空属交通部业务，韦是交通部技监，我想托韦买飞机票，当无问题。可是韦作民对我说，买昆明飞机票不那么容易，因昆明靠近缅甸，是出国线路，必须通过军统机杨检查站，还要有商店担保才能拿到票。我丢下两张票款，托作民赶办。我知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是作民的得意门徒，买飞机票无问题。

下午我回到南温泉对杨揆一说："飞机票明天我去拿，你准备准备，在二三天内动身，把借用的一切东西交代一下。"次晨我一早就进城到交通部找韦作民问飞机票的事。作民说："一珊已同检查站打过招呼，票子随时可买，但还要办商保手续。"作民即刻陪我乘汽车到飞机场检查站，取了两张乘客登记表，驰往城内新中实业公司找经理胥惜吾盖了担保的公章（胥是韦的清帮徒弟）。韦又陪我去飞机场付款取到两张飞机票，我便与韦作别回南温泉。我对杨说："两张飞机票已拿到手，在我处，后天早晨您在家等我，7时出发，9时起飞。"杨问我："飞机票多少钱？"我说："我已付过了，您留些钱在身边零用吧。"

两天后的中午，我同杨揆一同机到达昆明。我们同到旅馆吃了午饭，杨说要雇车去郊区李协和家住，我们就分手了。

我在昆明住了五天，见了几次卢总司令和孙仿鲁夫人，公事

办完了，回到重庆向仿鲁总司令复命后，便回南温泉卢家花园休息。

大约我回家的第三天清晨，韦作民来卢家花园找我说："你出事了，你知道吗？"我说："我没做坏事呀。"韦说："戴雨农说你亲自保驾送杨揆一到昆明，杨经河内、香港到上海，在你上海家中住了几天，现在杨应汪精卫邀请在南京担任汉奸职务（据以后了解杨任汪伪军政部长和湖北省长等职）。戴雨农认定你通敌，报请军法执行总监拘拿你法办。因何总监说，崔叔仙是三个军部驻渝代表，必须把事情弄清楚才能发拘票，要戴先派便衣把你监视起来。从昨天起你花园前后，日夜都布置了便衣侦探，你这几天不要出花园门。我知道你去昆明是代孙总司令去办事的。杨揆一是巧逢同机。我通知你办事处给孙总司令报告你被监视情况，有复电，我会来告诉你。军法执行总监不得孙总司令回话，他们也不敢逮捕你的。"韦去后，我便约花园里同住的邻人天天打麻将，故作镇静。当时我身边有两个勤务兵，我要他们到花园墙外看看有什么人。他们回来说，前门后门，老是有几个人转来转去。我知道特务确在监视我。

作民与我分手后的第三天下午来看我说："孙总司令特由前方赶到重庆，看了戴笠与何总监，证明你确是他派去昆明看卢总司令和孙总司令家眷的；并说杨同崔是老朋友，杨托崔买飞机票同机飞昆明，这是偶然巧合，不能证明是崔要杨去南京做汉奸。孙总司令对他们表示：他担保崔参议是爱国者，八·一三以后。为抗日做了不少贡献。现在戴、何在商量，准备解除对你的监视。"韦说："这些消息是陶一珊告诉我的，一珊请崔老师不要担心。"

第三天韦还未来看我，仿鲁先生派了一位副官放了一部小汽车来卢家花园接我进城谈话。我到重庆胜利大厦，见到总司令，孙先生说："好险呀，我要不来一趟，你真要吃他们苦头。"孙先生又告诉了我对戴、何交涉和担保经过。他最后说："交朋友还是要

慎重，杨揆一、何成浚、李烈钧都是蒋先生在日本的同学，哪会想到杨揆一会去同汪精卫合作。”

十、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内幕

当韦作民在重庆开创洪门“丽华山”以后，山内内八堂的大哥们主张积极联系全国各洪门山主，成立全国性的洪门最高山堂的统一组织——总山堂，以谋增加抗日力量。事被特务头子戴笠侦悉。蒋介石入川以后，早已面示戴笠要防范洪门势力的发展和活动，并指示戴笠要用软的手段，不能硬干。蒋介石在日本读军校时，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又加入陈其美的洪门组织，回国后又加入黄金荣的清帮。他深知清、洪帮人数众多，隐蔽极深，捕捉不易。他本人现在做了委员长，口头是不愿谈清、洪帮了，然而他知清、洪帮是不好对付的。况当时川陕云贵等省洪门在野潜力还很普遍，蒋为了控制清、洪帮，怕被“其他党派”利用，所以他指示戴笠要用软的手段把清、洪帮控制起来，免得动摇后方。因此戴笠找杜月笙商量。如何把全国清、洪帮首领和头头与一些有力的清、洪帮成员组织起来。戴笠跟杜商量，组织“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作为清、洪帮联合组织，把全国清、洪帮头头都“邀请”来担任委员，把次要头头用“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的名义笼络起来，也就是控制起来，监督起来。其用心颇能体仰蒋介石的“用软手段”的办法。

大约在1940年前后，由戴、杜出面邀请重庆和流亡在重庆的外省的清、洪帮老头子和山主们宴会。据韦作民宴会后对我说，这第一次宴会在重庆交通银行大楼举行。因杜是交通银行常董，住在重庆南岸海棠溪交行宿舍，杜到市区都在交行会客。戴、杜借交行宴请清、洪帮的老头子和山主舵把子（四川称洪门领导者，普通称“某某老舵把子，某某老拜兄、老大哥”）。韦说，除他以外，

被邀者有四川的田得胜，上海的向海潜、杨啸天，武汉的杨庆山，浙江的张子廉，河北的张树声。戴、杜是主人，另外还有一位陪客徐亮。宾主共10人，酒席很丰盛，是鱼翅宴。在“动员委员会”成立后，韦才同我谈起徐亮（徐字味冰，江苏省常熟人，当时不到50岁）是戴笠徒时10个把弟兄之一，当时是军统局（特务机关）的大将。戴把徐拉来做陪客，是要徐来与这些清、洪帮的首领见见面，以后代表戴笠与这些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和骨干们联系工作。韦说，这是派徐亮来监视清、洪帮的活动。韦还说，戴、杜两人在宴会上对来客特别谦虚客气，为客人们斟酒敬菜。席间并未谈组织清、洪帮的问题，但大家心里有数。因为被邀者都是清、洪帮的首领，当然是为了帮会问题。据韦说，酒席完毕，大家进入客厅，饮茶会谈开始了。先由戴笠开口说：“清、洪帮有悠久的历史，一向有爱国心。现在日本鲸吞我们半个中国，蒋先生主张把全国清、洪帮联合起来（这是迎合侦悉我们要组织全国洪门总山头的动机）帮助政府来共同抗日。因月笙兄是中国帮会出色人物，最讲义气。蒋先生已同月笙兄谈过这一问题，（戴此言捧杜，抬高杜的身价，好让杜来做全国清、洪帮领袖。可惜杜的班辈太小，帮中人表面敷衍，内心反对。）现在请月笙兄同你们大家商量商量，如何组织全国清、洪帮大联合。”

据以后韦作民与张树声同我说：戴笠要组织动员委员会，固然是为了监视帮会活动。同时因四川省是哥老会的天下，杜在四川帮会中吃不开，戴来搞清、洪帮大联合，想帮助杜拉拢四川袍哥。

接着，杜月笙开口了：“各位老前辈，雨农兄已经传达了蒋委员长的指示，这是我们帮会的光荣任务，义不容辞。我已经同雨农兄商量过，用‘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名称作为我们全国清、洪大联合的对外名称，请大家商量商量，是否可用？”

首先由四川的仁字号老舵把子田得胜应声表示赞同，接着来

宾们极大多数表示为了加强抗日力量，赞成清、洪帮大联合，组织“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

韦作民对我说：“我明知戴、杜唱双簧把戏，是为了监视清、洪帮的活动，但我是政府的简任官，不能不表示赞成。可是我佩服张树声老大哥，真是硬骨头。张大哥在当时竟不发一言，装耳聋。”戴说：“让味冰赶快租房子开始筹备。”宾主就散会了。

在这里我要插一段话，张树声是西北军冯玉祥部队的老将军，曾参加辛亥革命，是洪门“长白山”的山主，是清帮的大字辈。抗日阶段他在重庆大收洪门哥弟，大收清帮徒众，以抗日复国为宗旨。有很多政客、军人，都是他的洪门弟兄或清帮徒弟，如宋哲元是他洪门兄弟，萧振瀛是他清帮门徒。此外也有很多下级军官，或商店老板，或汽车驾驶员，他是兼收并蓄。当时蒋介石侍从室副官和孔祥熙待从室副官，多数也是张老的门徒。张老在清帮是大字辈，比我和韦作民长一辈，照清帮算，张是我们的师叔辈。韦同我深知张老为人正派，民族思想很浓，有抗日决心。先是我与韦作民准备组织全国性洪门总山头，与张老商量，他十分赞成，而且主张积极进行。因此我与作民加入了张老的洪门“长白山”为内八堂大爷。这一来，我和韦作民与张成了兄弟班辈。为了推动组织全国洪门总山头，我们三人还结盟效桃园结义，拜成把弟兄，张居长，韦居为次，我老三。可惜张同我一样，抗日胜利后，以社会贤达身份竞选“国大”代表。他或许未能象我起义投诚。

关于组织全国性的洪门总山头，作民还出面在我住宅（山王庙5号）请了几位山主、舵把子聚会，讨论组织全国统一性洪门总山头的问题。

韦作民本是我家的常客，以后又多一个常客张树声老大哥。我们三人是常见面的。张年老，不大多说话。韦才50多岁，精力正旺，对戴雨农和杜月笙搞“人民动员委员会”一举，明知是特务来监视帮会活动，但当时韦是交通部技监，是简任官，不敢得罪

于特务头子，只好跟着他们周旋。因为韦有一个清帮组织“文社”，韦的徒弟多是中下级官员，不少人是“复兴社”成员。在抗日阶段，这些复兴社分子一部分参加了“中统”，一部分参加了“军统”，头子是徐恩曾和戴笠。当时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的稽查处处长陶一珊是军统大将，就是韦作民的开山大徒弟。他的一些复兴社分子的徒弟常常来同韦谈军统内部情况。韦的儿子韦倬就是复兴社分子，作民的一些复兴社分子徒弟大部分都是他儿子韦绰介绍入门的。因此军统要监视清、洪帮的措施，韦作民比别个帮会首领知道得早，知道得多。

韦作民和张树声等帮会首领应戴、杜之邀宴后没有几天，韦作民对我说：“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会址，已经指定在重庆海关巷7号，开过一次筹备会，已经推定筹备人选如下：戴雨农、杜月笙、杨啸天（即杨虎）、田得胜、韦作民、张树声、张钫、李福林、梅光培、司徒美堂、杨庆山、向海潜，此12人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委员。后来又由杜月笙介绍浙江人张子廉为委员，算是13位委员。由戴雨农为主任委员，由徐亮担任本会秘书，每月开会一次。

又隔几天以后，张树声、韦作民来我家对我说，动员委员会已开过成立会了，到9位委员，李福林、司徒美堂、梅光培、张钫4位委员未到会。第一次动员会议决议在“动员委员会”以下设立：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会，请动员委员会委员介绍自己的和其他的洪门兄弟和清帮门徒，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一位设计委员为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作民说：“这是戴、杜要进一步了解帮会中大多数次要人物，好作特务的控制和侦探的对象。”戴笠派前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重庆稽查处处长赵世瑞（陶一珊的前任）为设计委员会的总干事，并说赵世瑞和徐亮都是清、洪帮的老弟兄（这是明显的捏造）。

又隔些时，韦作民来对我开玩笑：“叔仙！恭喜！恭喜！特来

道喜。人民动员委员会多数委员推荐您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戴先生说，他知道您很能干，在帮会中认识的人很多，在军政界、金融界均有地位，请我转达，欢迎叔仙兄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我对作民说：“我们老弟兄三人（指树声、作民与我本人）都不赞成这个清不清、洪不洪的大联合组织，作民兄你为何不在会上代我推辞。”作民说：“我在会上不好不答允转达，因为上年你住在卢家花园，为杨揆一的事他派特务多人围困你近十天，戴对你情况十分了解。他又知道我同你的私交，当场我不好代你推辞，只好来告诉你。你如不愿担任这个主任委员，我们研究怎么回话。”我对作民说：“请对戴说，孔祥熙院长近来兼任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董事长，我在该行担任董事会秘书，每天要来往孔公馆送董事会的公文请孔院长批阅，我实在没有时间兼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请另选贤能。”我提“孔院长”三字是要使戴雨农不好再同我纠缠。韦代我婉言谢绝，但仍派我担任设计委员。我只去开过一次会敷衍而已。戴另派顾震（东海县人，前北洋军阀军长，老清帮弟兄）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选自《帮会奇观》）

贵州帮会五十年记略

蓝克安

辛亥革命前后，我不过20岁左右，参加了当时的哥老会。现将我当时亲历目睹的回忆，及走访曾参加帮会活动的几位老人得来的零星材料，整理成此文，将贵州辛亥前、辛亥时期及中央军入黔和解放后帮会活动，分述如次。

一、贵州帮会的创立

贵州帮会发展较迟，兴起较四川、湖南晚，就我个人推测，是创始于清咸丰、同治年间。在咸同期间，贵州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满地烽烟，后由湖南调席宝田、田兴恕、周达武统率大批湘军镇压起义。军事既平，湘军留在兴义一带屯田安居，军中帮会传于贵州民间。这是一条线索。赵尔丰平息西藏之乱之后，率兵屯川，他允许军队中帮会公开活动，这个组织也就流到民间。黔北如遵义、桐梓接近川省，因商旅来往，帮会也就在这一带发展起来，这是第二条线索。

贵州帮会繁盛区域，要属黔北遵义、兴义一带，黔东南是很少的，有些县分还不知道什么叫帮会。由此见得贵州帮会是由湖南、四川传播来的，以黔西北为据点。

贵州有了帮会100年左右，在省会以外如安顺、遵义、开阳等地较活跃起来，省会贵阳反而沉寂，是因为省会封建统治强大，

可以拿办帮会，所以只好收敛，不得显露。辛亥革命以前只有帮会的雏形，如湘军外四营中有不少帮会分子，经常吸收士兵参加帮会；威远营里的什长江怀清、陈杰光、沈月廷都是当时有名的大爷，也吸收小工商业者入会。又如湘军退伍哨官什长朱玉清、饶玉清等，有本领，有面子，吃得开，名望大，专门为湖南、广东大商人保帮，以免途中遭匪抢劫。他们也吸收兄弟，多为省内外工商业者。另外，贵阳府贵筑县衙门里的书办差头如曹兰轩、赵世祺、孙华堂等等，都是帮会的大爷，除收衙门里的六差为兄弟外，有时也吸收一些小商业者。其他如温瑞廷（四门稽查）、傅耀庭（九门总稽查）、周玉珊（外营哨官）、龚自安（新军营班长）等，都是鼎鼎有名的帮会分子，他们在省会收了很多兄弟。辛亥革命以后，贵阳有了83个公口，以斌汉公、黔汉公、光汉公为最大，经过开山立堂，迎过师印，才算正式建立了帮会组织。

二、贵州光复前后

辛亥革命前夕，贵州有两大政党——自治党和宪政党。自治党鼓吹民主革命，联系了新军营、陆军小学、务本学会、理论研究会、哥老会等组织。宪政党主张君主立宪，想走日本维新的道路。这两党政治主张不同，因此是对立的。自治党联系面宽，军队、帮会由其掌握，力量雄厚，故而在辛亥革命中能一举推翻清廷在贵州的统治。

在1911年重阳节前，自治党就暗中策划贵州光复大事，联络新军营和陆军小学、帮会分子、进步人士等，预先作好部署。新军营准备围攻巡抚衙门，由新军营中的帮会分子金渭宾、庄鹏程等运动卫队，将其枪柄下了，由教练官杨蓉诚，赵德全于九月十三日的拂晓率新军百余人围攻巡署，天明时卫队缴枪，未打一枪，未杀一人，贵州就光复了。

其后，自治党及宪政党即组织大汉军政府，以杨荩诚、赵德全为正副都督，其余各部门负责人均由两党及军队中的帮会分子担任，清吏以巡抚沈瑜庆为首，将印信交出，被保护出境。

贵州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与新军营和陆军小学及各方面的帮会分子分不开的。自治党在军政府中居于主导地位，不但掌握着军队，而且以哥老会在这次光复中的作用，大力倡导支持成立公口，军政首脑也大开山堂，各行业也纷纷组织，因此贵阳有83个公口出现。我于此时加入大汉公为么大。现兹将记忆所及各公口的情况简介于后。

斌汉公：正龙头陈稚书、副龙头陈松兵，吸收成员以军政最多，以新军营、陆军小学原有的帮会分子为班底。

光汉公：黄弗清当龙头，多数成员为巡防军和军政人士。

黔汉公：李香池、温瑞廷分任正副龙头，成员为工商界人士及老袍哥。

大汉公：正副龙头分别为王肇西、刘泮香。

忠汉公：正副龙头分别为任贵廷、喻体泉。

童汉公：龙头卢华轩、管事杨鑫泉。这是一个“儿童”公口，最大20岁，最小的12岁。

孝汉公：正副龙头分为罗云鹏，白植斋。

兴汉公：龙头卢方臣。

巧汉公：龙头何吉琴，成员为缝纫业工人。

以上公口，除斌汉公、光汉公、黔汉公开过山堂、迎过帅印，组织比较健全外，余者均未开山堂、迎帅印，不过组织也较健全，属于街道或行业中的帮会。由于年代久远，还有不少公口不能回忆了。迎帅印，就是集合本公口的哥弟来一次大游行，展示本公口的声势。迎帅印时，下几牌的兄弟们奇装异服，头戴凉蓬，面敷脂粉，扎英雄结，拖水发，穿绣花打衣，花彩裤，背弓挂剑，俨然是舞台上的武生林冲、李逵，而且以后的每天均如此打扮。帮

会公口成立后，使社会呈现一种不安定的状态，那些身着戏装的青年，打架耍刀，横行霸道，抓拿骗吃，捞筋扯皮，报私仇，泄旧恨，为非作歹这事层出不穷。其实这些公口并非独立自主的集团，而是自治、立宪两党暗中掌握，待机利用的组织。这也埋下了以自治党为主的大汉军政府垮台的根源。

三、军政府的垮台及哥老会的匿迹

光复以后成立的大汉军政府为时不久即垮台了。其起因在于巡防总统黄茀清的被杀，以及宪政党勾结云南唐继尧对自治党及帮会的镇压屠杀。

黄茀清为光汉公龙头，任军政府的巡防总统，下辖东南西北四路分统，人数不足1万，其军官全部为帮会分子。当时驻平越的哨官伍金剑纠合六七百人在该地独立，黄派分统谭德骥前往招安。谭的部下先锋二队长唐灿章驻扎仓上，欺压群众，无恶不作，被群众控告到黄茀清处。黄即召唐到总统府，严词痛责，唐恼羞成怒，含恨在心。宪政党得此机会，即以利禄收买唐灿章，策划刺杀黄茀清，事成奖黄金300两。

是年（1911年）腊月十五的早晨，唐灿章伪称一士兵要拐枪逃跑，率10人前往总统府，请黄茀清处理。当时黄正吃早点，命唐等人稍候。哪知唐灿章忍耐不住，冲着黄的办公室举枪便打。黄在室内闻得枪声，飞奔出外，走至房门口，正逢唐灿章举刀扑过来，左臂被砍伤，大叫扑倒在地。跟随唐前来的人一拥而上，将黄左臂砍下，割去两耳，砍下人头。总统府卫队只是虚张声势地放了几枪，原来他们已被唐事先暗中拉了过去。

接着，唐的手下罗清和提着黄的左臂，带着五六个人去枢密院院长张石麒（自治党首领）家报告，实际是要借机杀张。但张已得悉此阴谋，逃至对门谢石琴家躲避，至夜间，由南路巡防分

统陈南生将其伪装成士兵，夹杂在部队中走安顺、兴义出广西到上海。陈是张的表亲，二人到上海后再未返贵州。

都督杨柏舟原是新军营的教练官，光复前夕曾对起义士兵许愿，若是光复成功每人奖励50两银子，这是与自治党协商好的。后来杨柏舟向黄莽清要这笔钱，黄只是推诿，杨不能说服大众，恐生矛盾，又见自治党登台章法大乱，政治前途没有希望，即乘机率领新军赴湘援鄂去了。副都督赵纯臣见黄莽清被杀，张石麒逃走、杨柏舟赴湘，帮会寨乱，只得逃避乡间，后被刘显世杀害（刘为兴义团防首领，历来与宪政党有联系。）

自此，自治党独揽的政权崩溃，其军队巡防营也有动摇之势。宪政党乘机与耆老会郭子华密商，派戴戡赴云南，欢迎滇军来黔，清除帮会，推翻自治党。滇军唐继尧即率一混成团，长驱直入，直达贵阳。宪政党乃与之密谋，大开杀戒，于次年正月十四拂晓，在东郊螺丝山后阳明洞口枪杀帮会分子200余人，新军营长田世雄亦被枪杀。其余知名帮会分子纷纷潜伏离境，以逃噩运。当时我曾亲眼目睹巧汉公龙头何吉琴和丁玉廷的儿子丁少廷被害的情况，在西门城墙刑场，他们每人被刺数十刺刀，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唐继尧在螺丝山屠杀大批帮会分子，引起人民群众对滇军的痛恨以及对宪政党的不满，贵州的袍哥，有的潜伏乡间，有的投入部队，有的甚至避入教堂借以偷生。至此，热闹一时的帮会冰消瓦解，转入偃旗息鼓埋头蛰伏的状态。自治党也从此解散，黔省由宪政党执政，刘显世登台掌权。

四、中央军来黔策动帮会复活

1934年，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倡导西南大团结，正是中央红军长征要经过贵州的时期，时有广西廖磊一军已驻扎都匀。贵州

省主席王家烈既不能得罪蒋介石，又要联系桂军，因此开几团人驻扎马场坪意存观望。这时蒋介石任顾祝同为行营主任，薛岳为第六路军司令，挺进贵阳，贵州的实权即落入蒋系之手。

顾、薛为对红军作战，即暗中策动帮会的复活，以利用帮会侦察刺探红军情报。驻省会之第五别动大队长兼省会警察局长肖树经，其分队长兼三分局局长杨子知、行营的刘科长、军统训练科杨科长等，找到贵阳掌码头大爷邓占奎、兰克安（即笔者）协商，准备将已蛰伏24年的帮会复活起来，并将修文、贵筑、清镇、龙里、开阳、息峰、广顺、惠水8县的帮会分子，以每县200人，配合乡镇保甲，专负责侦察红军的情况。后因红军未经贵阳，这个政治阴谋才未实现。

9月时，肖树经首先在观风台进步（入流），刘参谋、杨科长都参加了。那天只摆了一个小香堂，从此肖便是邓占奎、兰克安的兄弟了。

那时我想，帮会之所以遭受打击，是因为没有保障，要想巩固组织，必须有个外壳来保护它，于是和肖树经等人商量，办个报馆，发行日报作为组织的掩护。肖树经同意，每月由省政府补助400元，创办了《黔风日报》、《黔阳晚报》、黔光通信社。《黔风日报》名义上是由“新民社”（帮会组织）主办，社长却是肖树经指派的别动队第五大队的指导员唐立圻，兰克安任经理，总编辑是蒋霭如、吴雪涛。《黔阳晚报》由谢凡生任总编辑，黔光通信社由徐礼周、董承烈、陈智鸾办理，兰克安任经理。我记得蒋介石50岁生日时，商会拟就一份各界庆祝游行秩序单交晚报发表，标题有空前盛举字样。未及发表，第二天警察局即通知停刊了。后来别动队离开贵阳，中央军调动，经费无来源，这3家刊物只好收场，前后不过两年的时间。

贵州帮会过去虽然消声匿迹20多年，表面上没有什么活动，其实暗地里一直没有停止发展，只不过变相地缩小香堂规模，成

员少有往来，避免引起注意罢了。这次得着政府的支持，有了复苏的机会，更有报馆的掩护，经费有了来源，于是联络旧日袍哥如陈佑六、邹玉珊、饶玉卿、刘桂初、孔序九、金锡瑞、蔡云先、孙华廷、肖勋臣、姚少山、周勋臣、唐秋林、赵自如、贾炳奎、郭辛益、罗守一、邓占奎、兰克安等18人开会，议决成立组织，对外用“扶风山”之名，对内用“新民社”之名，所有清帮、洪帮、汉流统归“扶风山”节制，并推举邓占奎、兰克安分为正副山主，刘桂初为香长，金锡瑞为盟证，组织内八堂和外八堂，在黔明古寺开山堂，正式成立扶风总山头，由仁字旗掌握。仁、义、礼各社负责人推定：仁字旗新民社总社长邓占奎，副总社长兰克安；义字旗永义社总主长周勋臣；礼字旗复兴社总社长唐秋林。

新民社分社组织以地区设置，分东、西、南、北、中5个分社，中社正副社长由邓占奎、兰克安兼（中社为总社直属的外八堂）；东社社长姚少山；西社社长蔡云先、孙华廷；北社社长肖勋臣。分社以下设支社、小组，共有20几个支社，10几个小组。从9月至12月吸收成员500多人，第二年（1935年）发展到三四千人。外县如遵义、安顺、毕节、清镇、平坝、黔西、织金等县都有分社，吸收成员约有二三万人。永义社（义字旗）、复兴主（礼字旗）均各有分社、支社、小组。

我在辛亥革命时是大汉公当公大，20多年未活动，这次因事位人，我先在麒麟洞提升为大部（出山），又复调为正印，这在帮会里是少见的。我的拜兄是邹玉珊、饶玉卿、邓占奎，引进管事是郑少清、江世杰。

五、抗战期间的帮会

1940年，贵州省主席是吴鼎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是陈惕庐。为争夺政治上的权利，陈惕庐跑到国民党中央，要求准许帮会加

入国民党，保证半年内吸收30万党员。得到同意后，陈即返贵州，派黄国桢为指导员，就国民党员中有帮会关系的选23人组织精忠党团，同时联络帮会分子组织精忠社。黄国桢来活动邓占奎和我，说明陈惕庐的意思，我们只好同意，停办新民社，加入精忠社。精忠社总社长由傅明轩担任，邓占奎、戴河清、朱导江为副社长。总社统率仁、义、礼3堂，成立9个分社，各分社社长都是新民社的原班人马。该社于1940年6月成立，次年3月解散，吸收成员不足千人。

吴鼎昌见陈惕庐大量吸收帮会分子参加国民党，又组织精忠社，便欲削弱陈的势力，密呈中央，称帮会就是土匪的变种，应禁止帮会活动。陈惕庐即被调离，到浙江任省府委员，继任者是黄宇人。陈离职后，吴鼎昌便布告禁止精忠社的活动，并大批逮捕帮会头目。

1942年6月13日，由省保安处四科派人手持吴鼎昌手令，以“防害抗战，被民族先锋队利用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清帮大字班陈保元，通字班的欧福同、王锦章，洪帮太华山的万少珊，汉流中的傅明轩、邓占奎、戴河清、唐秋林、蔡云先、孙华廷、赵自如，杨俊安、李连晖、阳世奎等23人逮捕。永义社在大田角关帝庙收兄弟，也被当场逮捕10余人。上述23人在保安处关了4个月后，其中傅明轩、邓占奎、戴河清、陈保元、欧福同、万少珊、王锦章等7人移至第一监狱关了9个月，后又移到海马冲军事监狱关了17个月，共坐了2年零2个月的监牢。

1944年黔南事变吃紧，日军由六寨向独山、都匀推进，吴鼎昌本想将傅明轩等7人先行枪杀再逃走，恰巧何应钦、张道藩来贵阳，受帮会中人之托向吴鼎昌疏通释放这7人。吴勉强答应，但要地方绅士10人及中央要员5人担保才可放人，并限3天离开贵阳，直至这些事体办清，这7人才始得于12月25日出狱。

六、解放战争时期的帮会

抗战胜利后，杨森入主黔政。当时省政府内部有3个派系，都在为即将举行的“国民代表”大会、立法委员、民选省长、市长、国大代表进行竞选活动。这3派分别以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傅启学、建设厅长何辑五、社会处长周达时为主，傅、何、周3人并赴南京开“十人团”分配名额的紧急会议。杨森知道此事后，立马解散各派系，主张“大团结”，以有利他成为“民选”的省长。为此，他大力发展帮会，派他的副军长兼贵州公路局局长夏炯（斗枢），联络清、洪、汉各帮领袖，自称贵州总龙头，由此在抗战中受到打击的帮会又重新兴盛起来。当时各帮的情况如下：

汉流：扶风社总社长邓占奎、副社长兰克安，在贵阳有45个分社（其中有两个女社），外县有10多个分社。其成员在各帮中人数最多，大部为工商业者。精忠社总社长朱导江、副社长张卫民，有9个分社，成员复杂，人数较少。永义社总社长戴河清，副社长肖俊卿，有12个分社，人数较多。复兴社总社长唐秋林，有3个分社。道义昌总社长何知重、副社长朱汝为，人数最少。汉流仁、义、礼共计5个总社。

洪帮：五圣山掌旗胡启民，太华山掌旗陈芳，九龙山掌旗邵直民，长白山掌旗李宝善。洪帮成立了4个山头。

清帮：江淮泗掌舵李宝善、兴五六掌舵刘锦森。清帮计两个码头。

此后，军统为掌握利用帮会，成立“新中国事业建设协会”贵州分会，吸收帮会分子参加，并在遵义、安顺、毕节、贵定等10多县成立区会，均由军统局派人指导组成。我被选为该会的监事。“新建协会”成立后（1947年9月成立），并未开过一次会，亦未发证章，不过半年，便自动解散了。

继“新建协会”后，军统又成立一个“新黔公司”，经营土产生意，如药材山货的运出，洋纱、布匹、汽油、轮胎的运入等。军统一方面借这个公司赚钱肥私，一方面借以掩护其特务活动。公司成立后，只有帮会分子才能入股，每股法币5万元，到1949年10月宣布退股时，每股退银元券2角7分，大家都未去退股，本利全部落入军统头子的腰包。

“新建协会”和“新黔公司”均含有政治阴谋，企图在必要时以帮会分子做政治上的牺牲品，同时又择肥而食，公开剥削诈骗金钱。当时帮会分子也认识到军统的无耻，但也只是敢怒不敢言，任其利用宰割。现举两件事以做说明。

1948年某日，我们突然接到“新建协会”的通知，内容是“今夜10点钟，扶风社骨干分子（总社执事、各分社长）在省府路中央信托局二楼开紧急会议，务必参加，不准请假”。晚上我去开会，扶风社有20人参加。10点钟未见动静，大家面面相觑，心中乱猜。11点钟时，突然隔壁套间开门叫我进去。我进去以后大吃一惊，房内点着一盏深蓝色的电灯，不明不暗阴森森的，壁上挂着蒋介石的戎装像，中间放一条桌，上铺白布，燃一对洋烛，桌上放了3件东西——手枪、配刀、毒药。屋内站着6个人，均系军统头目：马守援、李佐军、卢爱滋、陈星初、刘先炽、任廷模。我居中立定，马守援说：“你们是会里的核心，应该举行宣誓，以表示忠心。宣誓后还有话对你们说。”任廷模递了一张誓词给我，并交代念到“表心”时，桌上东西随我挑一件。我眼力差，看不见字，便由任廷模代念。我高举右手，心里忐忑不安，念到“表心”时，我想吃毒药死或许轻松些。宣誓毕，叫我站在墙边，灯光依然惨淡，阴风惨惨令人心惊肉跳。其后其余人挨个进来宣誓，20人全部进行完后，马守援等人给我们讲了话，不外是“对人对事要忠诚，对会要忠心”，一类滥调。最后陈星初说：“大家既是本会核心分子，所以今天才单独提前宣誓，别人还不可能，尚在

调查考虑中。很快总会还要派员训话发证章。今天的事回去不能对家人说，要说的话就讲是‘新黔公司’开预备会。”但是从此以后并无一丝动静。后来据我了解，这是军统利用帮会做外围的初步手续，若再有第二次个别谈话，就可记名为外围特务，经一段考察，就可作为预备特务使用。这可说明军统用心毒辣，企图用帮会骨干分子为他们效力。

是年8月，贵州的大学生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省主席杨森闻知极为惊慌，生怕学生们冲击省府，遂命“新建协会”在帮会中挑选300人，要在部队中充当过连营长的、身躯魁梧的。各帮的人还要有不同的暗记：汉流将左手的白袖头挽出，洪帮散开风领，清帮头上不戴帽子。一日中午，扶风社将选定的100人集合在商会大院里，陈星初对大家讲话，称：“杨主席要看看贵阳帮会队伍，以便将来委用。大家去六广门体育场，在指定地区内活动，要规矩些，听我指挥，不能自由行动。”我们到了体育场，杨森正和他的七姨太打网球，周围有几十个持枪卫士巡逻警戒。我们在那里呆了两个钟头后，宣布解散，杨森究竟看见了我们没有，真是天知道！这究竟是搞什么鬼？后来邓占奎告诉我说：“若贵大的学生们真的来省府请愿，除派军警弹压外，帮会的300人还要临时发枪，夹杂在学生中。若有暴动情形，便就地枪杀学生。”我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帮会又一次充当了反动统治的工具。

在解放战争期间，帮会与各特务组织是分不开的，多数职业特务为了联系面广便于活动，首先要参加帮会，不论是汉流、清帮、洪帮。帮会中有少数失业分子，也被特务所掌握，成为特务组织的外围。

解放前夕，不少帮会分子随着国民党军撤退或参加了土匪，由于我对共产党解放军不了解，也曾有想和邓占奎到外县组织土匪的念头，后经朋友劝阻未去，并见到了解放军二野的3位首长苏振华、谢鑫鹤、秦天真。他们给了我们宝贵的启发，并送我们毛

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书，使我初步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后来我在二野办事处做了一些检举和侦察工作，还通过帮会关系，去争取说服土匪投诚，整整有两年时间。其中有些经过也是相当艰险的，要冒生命危险。不过可以自慰的是，自己或多或少也帮助人民做了点事，以抵偿我在旧社会搞帮会为反动统治服务的若干罪恶。

（贵州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清洪帮在萍乡的活动

徐桂生

解放前，萍乡清、洪帮盛行。像我的老家湘东、渌市一带，一些保长、商会长、殷实商户、跑口岸的生意人、船民，甚至码头工人，大多数参加了清、洪帮。土地改革时，在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下，我曾参与过瓦解和取缔帮会的工作，找了许多帮徒谈话，了解到清、洪帮的一些内幕。近年来，我又查阅了市档案馆、市公安局、萍矿公安分局、市总工会、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大量档案资料，在萍乡城内先后走访了15位熟悉帮会情况的老人。现就所见所闻，撰写此文。

萍乡的洪帮，究竟由何时何地传入，无从查考。据《昭萍志略》记载，清咸丰四年四月初六日（1854年5月3日），至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太平天国军队曾先后多次攻占萍乡，并在伞铺里、芦溪、宣风、黄土岭、葡萄岭、三里头、草市等地多次和清军激战，后因兵力不敌败退。

清光绪十八年七月二十八（1892年9月18日），萍乡、醴陵、宜春、万载、安福、莲花等县的哥老会，以邓海山、罗凤冈、李保山、黄仁伢等人为首，聚众八九千人，在萍乡县属的大安里，举行以“反清灭洋，铲富济贫”为宗旨的农民起义，历时20多天，先后在芦溪、上埠、高坑、湘东、宣风、沂源等地与清军和地方团练交战10余次，后因武器低劣、军事素质差和叛徒出卖，起义惨遭失败。

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906 年 12 月 4 日）在湘赣边境的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爆发了由同盟会策动和领导的，以会党徒众为基础的，旨在推翻帝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大起义。同盟会会员蔡绍南和洪江会“大哥”龚春台等人参与和组织了这次起义。起义遍及于萍乡、浏阳、醴陵、宜春、万载、修水、衡山、湘潭、平江等 10 多个县，与清兵鏖战匝月，交战 20 多次，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民国 11 年（1922 年）安源大罢工前夕，安源工人中大多数参加了洪帮。洪帮头子就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李立三同志在安源，就曾利用洪帮的关系进行工人运动。罢工前，李立三同志买了礼物去见洪帮头子，洪帮头子很高兴。喝完鸡血酒后，李立三同志提出要罢工，要他讲义气，多帮忙，要求在罢工期间：①鸦片馆关门；②街上赌摊收起来；③不发生抢劫案。洪帮头目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包了，第三点我也包了”。并将一、二两点写在布告上，当时社会上震动很大，也给安源大罢工起了一定的支持和推动作用。有的洪帮小头目还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民国 22 年（1933 年），湖南人王炎又在萍乡发展帮徒。

萍乡的洪帮，大体有：彭麟的金龙山；张世家的金钱山；杨忠垣的终南山；郭敬秋的大汉山；朱德贵的卧龙山等等。他们结成一帮，分霸各方，纠合地方痞棍，进行一些危害革命、危害社会的活动。当时，萍乡城内由姚炳模、刘炳光负责，湘东由李善初负责，浏市由王永盛负责，高坑、芦溪由唐义宗负责，安源由何明远负责，上栗由胡友香负责，宣风由万全负责，赤山桥由王溪输负责。解放前夕，洪帮仍在发展。1949 年 4 月间，萍乡军警联合稽查处成立后，彭麟任副处长，张世家任工作队副队长，大多数队员是洪帮分子。彭麟、张世家、杨忠垣多次在衙前“振兴

花纱号”，萍城彭麟、杨忠垣、陈映斌家里，土城陈绍明家里，长潭陈明山家里开堂收徒，发展帮会成员。有的洪帮分子系“专任调工”、“兼任调工”或“义务调工”，以其社会职业为掩护，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和津贴，干着特工的罪恶勾当；有的帮会骨干分子分别参加了“军统潜萍组江西保安处情报十分队”、“军统江西保安处赣西边区情报站”、“中国国民党戡乱委员会国特室赣西区办事处”、“江西武功山绥靖公署直属突击队”等反、特组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

清帮，究竟何时传入萍乡，现在也无确切资料查考。民国17年（1928年）谭任昌、林孟竹、谢怀仁等曾在南台书院（现南台小学）脚下黄九兴家开堂收徒。民国24年（1935年），许克祥部队的排长、江淮泗帮悟字班熊志国来萍乡，暗中代师收陈明生等为徒弟。民国26年冬（1937年），国民党军官、嘉海卫帮悟字班邹桂荣回到萍乡，公开发展。一方面发展国民党第二行署专员危宿钟之叔危杰云等为帮徒，以壮声势，一方面筹款由邹桂荣赴北京进行联络。1938年春，邹桂荣从北京带回清帮“光明月刊社”的公函，向萍乡县政府备案，并在危杰云家成立“光明月刊社萍乡分社”。由危杰云任社长，陈云鹏、陈明山为副社长，还设有总务（肖瑞甫负责）、财务（姚树藩负责）等职，公开开堂收徒，入帮者每人交银元2元，发一本《本帮进家证明书》，盖上分社长、副分社长私章。有钱者还交银元，在《安亲系统录》上刊名。1938年6月出版的修正《安亲系统录》第四期下册中，萍乡就有党、政、军、警、商、工、教育界23人刊了名（其中有江淮泗帮陈明山、熊志国等7人，兴武四帮危秉宣等3人，嘉海卫帮危杰云、邹桂荣等13人）。以后，危杰云、熊志国、邹桂荣、林孟竹、谢怀仁、廖少云、魏子卓、陈明山、文毅、袁镇国、彭济、吴渭川等多次分别在各地开堂。据了解，北正街姚明公祠（现北星小学内）、萍城邹桂荣、彭麟、陈载芝家、长潭陈明山家多次开堂，发展帮徒。

当时，萍乡主要是悟、学两个字辈。头目有危杰云、林孟竹、谢怀仁、吴渭川、彭济、熊志国、李增、陈明山、舒斌、王雨立、蔡犹平、易赞群、吴烈、刘鹏等。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表面上也取缔清、洪帮会，但只是“聋子的耳朵”，不起作用。1943年9月2日，国民党萍乡县党部根据省党部的指令，曾向各区党部、区分部、直属区分部发出代电，对清、洪帮提出三点处置意见：①应遵照中央指示三原则妥善认真处理；②应使党员认识帮会组织为中国社会之病态，其与之原无关系者不得与之亲近，其已有关系者应当疏远并设法脱离；③以后征收党员对帮会分子绝对不予入党。1944年，蒋介石在报刊上公布：通令取缔帮会，凡党政军人员参加帮会的撤职，并劝帮会中人自动登记退出。江西省政府也发布了《江西省取缔帮会实施办法》，提出：运用保甲组织或密派人员普遍调查帮会名称、帮首帮徒姓名；发动知情人员密告；密派忠实机警之干部或特工人员佯入当地帮会，侦察其组织活动情形，从中诱导转变或使之动摇分化。侦察后按自白、号召、说服、感化、惩罚等方式进行取缔。还密令各县政府①清查本机关员工；②清查区乡镇保甲自卫队及其附属机关；③严格取缔地方帮会组织，限期肃清。1945年1月19日和1946年5月6日，萍乡县政府先后两次在《群报》上公开发布取缔帮会的训令，指出：清洪帮会，煽惑愚民，秘密结社，恐吓诈索，横行无忌，行同盗匪，扰乱治安，危害人民……致使社会秩序日益混乱，社会安宁渐呈恐怖”，通知各乡镇严加查禁，参加上述帮会人等应向该管乡镇公所办理自首手续。当时，也逮捕关押了少数帮会头子，登报声明后获释。但帮会分子仍然可以秘密或半公开的开堂收徒。

1947年春，由保密局郑介民、毛人凤建议，成立“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会”），作为团结各地帮会的中心机构。萍乡也不例外。1947年3月22日，假《群报》社为办公地点，

成立“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萍乡分会筹委会”，内定军统特务分子刘炳光为书记长。同年4月间，在萍乡大成图书馆召开成立大会，以清、洪帮分子为主，参加大会的有四五百人。县长曾敬持、县党部书记长肖造时、县参议长肖家修均登台讲了话，并有萍乡县商会等23个单位送了锦旗表示祝贺。会议最后决定：萍乡分会由刘炳光任书记长，王远松、文廷益为副，陈云鹏、刘家贵、张芳、游振益、危杰云、彭吉、杨桂林为干事，尊县长曾敬持为指导员，魏子卓任督导（魏是省里派来的，分管赣西几个县）。还推出理事27人，其中常务理事11人，监事21人，其中常务监事7人。理事会下设：组织（游振益负责）、社会（文廷益负责）、总务（陈云鹏负责）3个股。当时还计划，凡参加“新建会”人员，每人凑银元1元进行集餐，后因清、洪帮头目对“新建会”中领导职位安排问题互相争权夺利，争吵打架，结果集餐没有举行，会议不欢而散。“新建会”成立后不到半年，即被萍乡县政府下令封闭。后又另组“新建转运公司”，直至萍乡解放才解散。

国民党统治时期，萍乡地区参加清、洪帮的人数众多，帮会的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上至地方上的党政要人，下至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有的县长、区长、乡长、保长、商会长、县参议员、政府官吏、乡绅伪军、封建把头、戏剧科技人员、富户殷商子弟、刑警稽查、乡丁保丁、赌徒、烟毒贩子、妓院、戏院和饭店老板、星相医卜、船民脚佚、流氓打手，甚至正当商人、肩贩、教师、工人等，有的也参加了清、洪帮会组织，据调查座谈访问，他们参加清、洪帮的动机和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怕受欺侮，怕敲竹杆，寻找靠山，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②争权夺利，扩张势力，打帮会旗帜，谋个人利益；仗势称霸，仗势欺人，仗势干那些伤天害理的黑营生；③想沾便宜，多捞外快，认为出外谋生方便，跑码头吃得开；④借重帮会牌头，希望多交几个有钱有势的朋友，以便在工作上有人帮着说话，业

务上得到便利，生活上互相帮助；⑤不知内情，受骗加入。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所谓参加帮会的“好处”，什么“义气千秋”，“千里不要柴和米，万里不要点灯油”，“帮丧助婚，济困扶危”，“行要让路，坐要让位”等等。许多人为了保产、保家、保自身、是受蒙蔽、受欺骗参加帮会组织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帮徒是受帮会首领或师父的控制和利用，和帮会头目有着本质的区别。

调查反映，过去清、洪帮对于萍乡的社会影响是比较大的。国民党统治当局，利用帮会流氓势力，让其充当爪牙，干一些毒化人民、危害社会的罪恶勾当。

（一）破坏我党地下组织，杀害我革命同志。如张世家，既是洪帮头目、又是国民党特务、萍乡反共靖卫队大队副、萍乡县政府稽查、警察局刑警组长。他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利用门徒作帮凶，刺探情报，监视进步人士，诱杀、捕杀或暗杀我革命同志。据有关资料记载：经他手杀害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及革命群众就达26人之多。清帮骨干分子陈载之，化名孟相推，担任“中国国民党戡乱委员会匪特室赣西办事处”副主任，和匪首刘汝霖一道，以麻山、丹江为活动基地，积极扩充组织，分别委任反动骨干为萍乡、宜春、清江、上高、泰和、吉安等12个县的“地下县长”，并于1950年6月1日以匪特组织名义向我县人民政府发出恐吓信，印发反革命标语和反动传单，策划暗杀我革命干部，企图推翻我人民政权。洪帮骨干分子童仁杰，任“江西武功山区绥靖公署直属突击队”副队长，在浏市冬瓜磧石灰棚里开会，积极发展组织，策划刺探我军情报，企图抢劫民财，夺取枪支，与我解放军对抗。

（二）依仗反动势力，剥削压迫工人。有的帮会头目，又是封建把头、恶霸打手，与稽查刑警同恶相济，形成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如封建把头、帮会头目文松林、朱德贵、陈昌云、魏子卓、郭敬秋、王大沅等，任意打骂开除工人；奸淫工人妻女；结成所

谓“三十六友”白马会、“四十八兄弟会”、“十八罗汉”、“二十八宿星”等势力集团，进行派系活动，分化工人团结；克扣工人工资，工人20斤米一天的工资，只发给7斤；拖延发放工人工资，将其存入银行或钱庄放息生利。在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的旧社会，工人劳动一天，工资被七折八扣，所剩无几。萍乡西站萝脚行，是在萍乡火车站从事装卸、运输业务的工人组织。把头张世家、危杰云等，自己不劳而获，除了净得一份工资外，还可“卖扁担”，将空头名额卖给无职业的劳动者，除从中索取“扁担钱”外，还可以从“买扁担者”工资中抽取20%或30%的收入归自己。逢年过节，婚丧喜庆，工人还要送礼送物，否则，“扁担”就不知什么时候被人“顶替”。

（三）勾嫖串赌，藏垢纳污。旧社会经营旅馆、饭店、酒楼、剧场、澡堂、妓院、烟馆、赌摊的人，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脑子灵活，江湖门路清楚。他们大多数是清、洪帮头目或骨干分子，手眼通天。尽管国民党政府也明令禁赌、禁娼、禁烟，可他们仍然我行我素。有的暗设耳目，刺探过往客商，从中做些手脚；有的以色相引诱顾客，为操皮肉生涯的娼妓拉皮条，招揽生意；有的贩卖烟土，秘密销售鸦片毒品；有的开庄窝赌，集赌抽头，输打赢要。很多劳动人民因为吸毒、赌博而弄得生活困难，或酿成家庭纠纷，甚至自杀。

（四）敲许勒索，强赊滥骗。如1947年春节前夕，帮会头目文××和袁××，见刘质才开刘合发布匹百货店赚了钱，就串通流氓打手写匿名信，胁迫他拿出1000元按时送至指定地点，否则，就要杀人放血。刘质才害怕，转托帮会头目文××、袁××从中斡旋，文、袁等做好做歹，答应由刘借给1000元，几年不算息，才算了结。又如有一次，彭麟的儿子不买票强行去戏院看戏，验票人员阻拦了他，捅了马蜂窝，彭麟带枪闯进戏院，喝令戏院停锣停演。上商店赊欠货物，长期不还，更是这些人的家常便饭，店

家也不敢催讨。有的还发“秋风”贴子，三节（春节、端阳、中秋）两寿（师父师母生日），帮徒要送厚礼“孝敬”师父。外地有影响的帮会头子来萍，帮徒要集资送礼。如有一次，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的保镖来萍，帮内人员每人凑钱送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盘程费”。旧社会一些私娼（萍乡城内大多聚居在甘家巷、居仁巷、磨盘石、育婴街、两眼塘一带），为了能在市面上混得下，少受刁难，也要给帮会头目送礼送物，甚至无偿提供性生活方便。

（五）串通作弊，坐地分赃。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萍乡，大至县城，小至乡镇，凡市面稍为繁盛一点的，大多为帮会势力所及，他们分疆划界，各不相犯，每一码头必有一帮会头目为首。凡此势力区域内种种不法营业，莫不为他们所包揽。此为“占码头”，属帮会的固定“经营”。一些演戏法的、卖拳头的，以及巫医、相命、扒窃等一切江湖之辈，都要和“码头”联系，例称“拜码头”。对于扒手，洪帮称他为“黑家”、“少侄”，超级能手称“小山爷”。由外地流窜来的，来要向当地“码头”“报到”，去要“挂号”，扒窃的财物也要“孝敬”一些给“码头”的人，否则，就要被驱逐出境。有的“码头官”（帮会头目）和扒窃集团勾结一起，狼狈为奸，甚至暗中“衬底”（即暗中介绍本地情形，指引扒窃门路）；有的小偷，本身就是“码头”的徒弟，小偷得手，“码头”坐地分赃，秘密接受扒窃集团的津贴或“进水”，“黑心钱大家用”。失主报案，往往是石沉大海。有路子的人，也可以通过“码头官”领回被扒窃的财物。

（六）插手企业经营，进行走私活动。有的经营地下钱庄，翻云覆雨，扰乱金融；有的经营各类企业，或者搭股，或者委托他人做生意，进行各种走私活动。如萍乡转运公司，承揽从樟树至汉口一带的转运业务，在宜春、湘潭等地都设有分公司，总头目就是萍乡军警联合稽查处副处长、洪帮头目彭麟。他以帮会作桥梁，军警为后盾，在水旱两路承包转运货物。他们利用帮会人员

押车押船，沿途“码头”互相照应，沿途军警税卡徇情放行。一些客商为了旅途安全，避免旅途麻烦，往往和他们合股、搭股或者高价托运，过往码头打“神福”牙祭，以求得少受或不受损失。

萍乡的帮会头目，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段时间，确实气焰不可一世，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之深，可谓炙手可热，路人侧目。解放以后，我人民政府对帮会进行了取缔。鉴于帮会人员情况复杂，对革命的态度也各有不同，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策略和方法，对帮会成员和帮会头目，根据罪恶大小，悔改认罪表现，区别对待，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经过土地改革、民主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对罪大恶极的头目进行了严厉打击；对顽固的骨干分子给予警告和惩戒；对一般成员进行了教育改造，帮会的恶劣影响逐步得到肃清。

（江西省萍乡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我所了解的兰州清洪帮

范楚材

提起清洪帮，总要连上哥老会。兰州人对此并不感兴趣，把它视同疥疮（兰州人称这种病叫“哥老”）。可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兰州的清洪帮会却大交鸿运，由过去多年来的隐蔽型一下子变成半公开甚至公开的活动；由臭不可闻的东西，变得吃香起来了。这可能和当时抗战总动员“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关。现就我所了解的兰州清洪帮情况分述于下：

（一）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甘肃省代主席贺耀祖，为适应抗战建国方针的贯彻，整顿改良甘肃省政，办了一个甘肃省公务人员训练所，内分4个班，即区长班、警官班、教育班、合作班，学习3个月，共办2期。其过程是，先由甘肃省政府民政、教育、财政、建设4厅发布文告，对学员进行登记甄审，合格者张榜入所，接受军事、政治训练。毕业后分派各县任区长、巡官、中小学校长、农村合作贷款等项工作。由贺耀祖兼任甘肃省公务人员训练所主任，民政厅长罗贡华、教育厅长田炯锦、财政厅长梁敬惇、建设厅长张心一均任副主任，李少陵任教育长，李学谟任总队长，温树棻任区长班主任（后任康乐县设治局长，死于任内），萧照文（军统警察特务、西安市警察局长）任警察班主任，萧椒石（省教

育厅科长）任教育班主任，孙友农任合作班主任。该所设训练总队，4个班编为4个大队，每个大队又分中队、区队、分队、各大队长（营长）、中队长（连长）、区队长（排长）、分队长（班长）等，除分队长由学员担任外，各大、中、区队长均由驻兰部队九十七师师长孔令恂由该师调来团、营、连、排长兼任。该所训练所地址在兰州东教场东北营房，后西北训练团接着在此办了两期训练班。

当时，南京政府派来一批中央特派员当教官，作精神讲话和时势报告。内有一个叫马愚忱的特派员，辽宁人，是清帮头子。当时因得到贺耀祖的支持，首次在省政府后操场礼堂内开设香堂，大收徒弟。成员多系军政界人士，贺耀祖也亲临参加并讲话。

我当时是该所二期警官班学员，毕业后分派平凉白水镇区、皋兰定远镇区、榆中县政府当巡官。就在1938年经兰州宝生相馆和印依轩相馆经理蒋信庭和牛果亭介绍，参加了马愚忱的清帮。从这以后马愚忱的香堂都是在宝生相馆开设的。

经过马愚忱的清帮公开设香堂收徒弟，洪帮也接着活动起来，并摆香堂收弟兄了。最先活动的洪帮人员有尹世杰（甘谷人，原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委员）、张世雄（落伍军官）、吴兰亭（四川人，皋兰地方法院警长）。这些人在兰州四乡设香堂，大收弟兄，发展到兰州、皋兰、榆中及永登一带县区的保甲自卫队组织内。到解放前，兰州的清洪帮已发展到好多个帮和山头，计有清帮马愚忱的嘉海帮，张友贤的杭三帮，何世雄的兴武六帮。另外还有两个帮，一个是兴武四帮和一个嘉兴帮，这两个帮势力单薄没有势头。洪帮则有闵铸九（青海人，落伍军人团长）的中华山，蒋云台的铁血山，张世雄的兴隆山，尹世杰的长白山和新起的清帮魏烈铭和祁维藩。魏、祁两人原是杭三帮张友贤的徒弟悟字班，也开山设堂，收学字班二辈徒弟了。另外，安华雄也是清洪帮都占有的，他原是清帮何世雄的徒弟悟字班和洪帮张世雄、闵铸九等两山的

内八部占有座堂、礼堂的地位，在皋兰、榆中南山的羊寨、马坡一带大摆香堂，广收弟兄了。

当时，据说帮兴隆山主张世雄谈，他已得到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召见和支持，准许他组织一支游击队——抗日救国义勇军，以备抗日作战的力量。枪枝弹药由八战区负责供给，游击队员由洪帮弟兄伙招收，游击队服装采用梁山英雄武松式的帽服。八战区还让他赶快写一份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的详细组织、人事和活动计划。就在张世雄和安华雄计划筹备之际，贺耀祖被调走了，换了谷正伦任甘肃省主席。恰在此时，安华雄参加了甘南农民起义，率部在皋兰南山一带活动，危及兰州，谷正伦身兼保安司令，先后将张世雄和何世雄逮捕起来，最后以张、何二人串通安华雄谋反罪名先后杀害。安华雄、张世雄、何世雄都有清洪帮关系。何世雄当时家住兰州水磨沟花寨子，自建一处漂亮的别墅，本人吸食大烟，聚赌抽头，私生活非常腐化。他除在家常开香堂，大收各地散兵游勇外，而且家藏枪枝武器，在当地名声很大。而安华雄家住南山羊寨，每来兰州路经何家食住，有共同计谋起义之举。张世雄也曾在羊寨南山关帝庙和安华雄家中，摆香堂收弟兄。安华雄当时曾任皋兰县羊寨乡联保主任兼地方自卫队长，常来兰州绣河沿张世雄家中参加香堂活动。张世雄在筹备成立抗日救国义勇军活动中，也曾得到安华雄的支持相助，但遗憾的是，大事未成，张、何受祸，谷正伦抢在他们起事之前动了手。对于安华雄、何世雄、张世雄三雄的内在关系和当时活动情况，直至今天，都很少为人所知。

自谷正伦任甘肃省主席以后，首先在清洪帮中各砍一刀，先后杀害了清帮头子何世雄，和洪帮山头大哥张世雄，对当时清洪帮的组织和人员压力震动都很大，清帮头子马愚忱、杨尊一、张友贤；洪帮山主闵铸九、吴兰亭等都向兰州地方治安当局申请立案，并登报声明脱离清洪帮关系，停止活动，所有清洪帮都曾一

时偃旗息鼓，退避三舍。后来直到抗战胜利，谷正伦调出甘肃后，兰州的清洪帮才又慢悄悄地陆续露出头角，活动起来。

从抗战胜利到兰州解放这4年时间内，在兰州搞清帮活动的有祁维藩，祁于其家中（原兰州励志路，今通渭路）摆香堂收徒弟。魏烈铭也在兰州口袋巷家中摆香堂收徒弟。此时魏烈铭曾去上海，结识了上海清帮头子、上海市长杨虎。据魏烈铭谈，他在拜会杨虎时，得到杨的赐教，准许他回兰州另立清帮——新兴帮，他收的徒弟多是青年军人、学生等。其实祁维藩、魏烈铭都是张友贤的徒弟，他俩另立门户，张友贤也不喜欢。

（二）

为了说明兰州解放前的清洪帮概况，现将有关人员及其活动分述于下：

清帮：当时兰州有大、通、悟、学四字班辈。

杨尊一，甘肃庄浪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曾任兰州市参议员等职，当时住兰州双城门外公园路（现正宁路）邓隆院内。杨是当时兰州清帮唯一大字班的老头子，属清帮行武四帮。

马愚忱，辽宁沈阳人，国民党中央驻兰特派员，清帮嘉海卫帮通字班，1937至1945年在兰活动，收徒多为军、政、商上中层人士。1945年马愚忱回辽宁家乡后，兰州该帮由马的徒弟蒋信庭（兰州东大街宝生相馆经理）和东大街印侬轩相馆经理牛果亭（均为悟字班，河北省人）二人负责设堂收徒，并每年为马师筹款祝寿一次，筹献现金邮汇。

张友贤，河北人，清帮杭三帮通字班，1938年——1949年在兰活动，收徒多系军、政、商中层人士。张的门徒中名望颇高的有魏烈铭、祁维藩二人，而魏、祁二人收徒多系青年军、政、学

等下层社会人士。兰州解放前张去西安。

何世雄，安徽合肥人，系清帮兴武六帮通字班，系当时临洮专员何世英之弟，他是马锡武驻兰东路交通司令部和鲁大昌洮岷路保安司令部挂名少将，虚衔副官长，家住兰州水磨沟花寨子别墅。吸毒聚赌，生活腐化，1943年为谷正伦以"串连叛匪谋反"罪名被捕杀害。其门徒有安华雄等和兰州皋兰南、西乡一带保甲长、自卫队及农民、散兵游勇等中下层人士。何死后该帮活动告终。

祁维藩，陕西人，当时是兰州西栅子大商号元聚懋的小掌柜，系张友贤杭三帮悟字班之徒。1946年到1949年，祁在家中（今通渭路新华书店仓库北面大院私房）设堂收徒，内有兰州志果中学学生及当时十三太保等部分青年。

魏烈铭，兰州人，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校参谋，属张友贤杭三帮悟字班，1948年至1949年在兰州口袋巷家中设堂收徒，多为青年军人等。曾于1948年去上海拜识清帮头子、上海前市长杨虎后，在兰另立清帮新兴帮。

洪帮：分内八部、外八部，内八部中有山主、龙头、香长、襄堂、座堂、知堂、礼堂、行堂等位置，均称大哥，依次分工不同；外八部中另有等级分工。

闵铸九，青海人，曾任平凉地方部队陈贵璋师部团长，住兰州官园颜家巷。1937年至1949年系洪帮中华山主，在平凉、陇东及河西、兰州等地很有影响，收弟兄多系军、政、党、团、商等高、中等社会人士。当时驻武威骑五军长马呈祥（马步芳之外甥，曾任新疆北疆驻防军长，后逃台湾）和武威三青团书记、军统特务周致忽，均参加中华山，马呈祥在他的军内也设香堂收人，影响很大。有一次在闵铸九家设堂收人时，马呈祥、周致忽都参加，被谷正伦获得情报，电令兰州宪兵团出动包围，全部捕送省保安司令部，但因马呈祥的关系很快就全部释放。闵本人谨慎稳重，从不滥收下层社会人员，解放后畏罪自杀。

张世雄，甘谷人，曾任地方部队团长，住兰州缮河沿，系洪帮兴隆山主，与安华雄私人关系密切，曾为筹备抗日救国义勇军与安华雄密谋策划，最后受安华雄甘南农民起义的影响，被谷正伦杀害。该帮吸收成份较杂，多在兰州、皋兰、榆中一带农村活动，多吸收地方保、甲人员和地主自卫队人员，以及农民和少量军政人员。

吴兰亭，四川人，是一个在江湖上混迹很久的人，系兰州、皋兰地方法院老资格警长，在兰州、皋兰城乡一带影响很深，多吸收地方下层人士。住山字石北街，系洪帮乌龙山主。

尹世杰，甘谷人，国民党党棍，曾任省、县党部干事、委员、书记长等职，吸食大烟，行骗敲诈，品行不正，愚弄乡民，为兰州各帮所鄙视。即是他的山下弟兄也苦于勒索，避而远之。收人复杂混乱，系长白山主。

蒋云台的铁血山，都是在他自己部队内发展吸收的，在兰州社会上没有多大影响。

梁崑山的崆峒山，也多发展在皋兰、永登四乡一带农民中，兰州没有多大影响。

以上列举的兰州清洪帮各山头负责人，都是在兰州有点名气的，但也有不少不显名而鬼混在下层社会中的，尤其是洪帮小山头，那就数不清了。

因抗日救国而兴盛一时的帮会活动，在兰州很红了一个时期，当时兰州的一些军、政、商界人士，好象都有赶时髦的趋势，互相拉拢介绍参加入帮；一些中下层人士，唯恐无门可入，极力找门路投奔。我就是先由安华雄介绍加入洪帮兴隆山张世雄山头的，后又经安华雄介绍加入何世雄的清帮兴武六帮，接着又经皋兰县定远区区长牟仲举介绍加入闵铸九的中华山，此前就先经兰州宝生相馆经理蒋信庭介绍加入马愚忱的清帮嘉海卫帮悟字班，以后长白山和乌龙山两洪帮都送我该帮的内八部行堂礼堂的证件。其

实我也是逢场作戏，工作利用而已。

（三）

当时兰州八战区政治部话剧团在公演一出话剧《草莽英雄》，剧中竟把洪帮开香堂收弟兄的洪帮规矩，礼节仪式、帮话（称条子）全部搬上舞台，深得观众新奇，久演不衰。

说起清洪帮的帮规来，确实很不简单，那真是对内纪律森严、礼义周全；对外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帮会原宗旨，都是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据说在明朝灭亡，清兵入关，进行血腥屠杀时，不少明朝王宫的遗老遗少和有志之士，不堪遭受残酷压迫，对满清王朝展开了不息的斗争。为了保全和壮大斗争力量，就秘密组织帮会，帮内规定以帮话（即黑话）做活动联系暗号。所以，在后来的清洪帮黑话中，有不少是由明朝遗老、文人学士用似七言、五言诗词体式样，编造而成，历代接传下来的。

帮会称黑话为“对条子”，即认话不认人，口传不留笔迹，以示绝对保密。一个走南串北，走荡江湖的在帮者，为了畅行无阻，必须牢记很多“条子”。帮内称条子为“武术子”，满“武术子”，就是要熟记条子，对答如流，如遇码头山头，除了对节（洪帮对三把半香，清帮对三老四少），帮礼、帮话外，还要“盘光棍”，这可要凭武术子“满”了，否则过不了关不说，倘若再被盘查伪假，那可就“光棍犯法，自绑自杀”。只要对上条子，如进家门，温暖如亲，困难立解，万事亨通。洪帮多流行于川、云、贵及西北各省；清帮则流行沪、江、浙、京、津等地。可惜对条子我是帮盲，毫无所记，当然我也有逢场作戏，记些平时工作利用的句子，可惜年代久远，记忆力衰退，已经想不起多少了。经过搜索枯肠，仅将当时耳闻目睹的三言两语凑搬上来。不过挂一漏万，权作参考。

洪帮见拜大哥条子：“久闻大哥仁义宽，好比刘备坐西川；今

日一见大哥面，好似拨云见了天。”

路遇匪盗拦路抢劫的条子是：“远望岘子黑沉沉，走近原是自己人，东（枪）子虽快瓢（弹）有限，自家不伤自家人。”

洪帮十不准是：

一不准窝龙上架（即长辫子不准盘在头顶，辫子代表满清）；

二不准信口开花（对自己人不准说脏话谩骂）；

三不准登杆子上塔（不准搭二郎腿）；

四不准花池子跑马（不准放筷子与桌边头齐）；

五不准下九流（即不准剃头、修脚、吹鼓手、婊子、王八……）；

六不准带钳子（小刀）飞舞（即不准耍刀子）。

只能勉强凑出这一点条子，也太浅陋，不够秀丽。倘在当时帮会内部见到如此低水平的条子，那真叫笑掉大牙哩。

洪帮内部弟兄相会，须举“三把半香”，手势手礼对节相认，即把两手食指屈捏起来，和对方同样手礼对节，这是初认对手礼。然后经对帮话，后亮“海底”才算相认。“海底”是入洪帮拜香堂后发给你的公式（即证件）。外八部弟兄除“行一”为红布外，其他为白布（或白绸缎）黑字；内八部弟兄为红布（或红绸缎子）黑字，形状呈四方形，大小约小手绢那样大。是用木板刻字印刷，上刻印有某山、某水、某堂、某香，及恩、承、保、荐四大哥名；下刻有该帮给你的位置、姓名；中上刻桃园三结义牌位；周围刻盘龙飞舞图案。

开香堂时，供关羽（协天大帝）彩像，地点多在关帝庙，燃烛烧香，时多夜半，阴威严肃。帮人大哥则着长袍马褂，立于供桌两旁，山主大哥举香行礼，由五哥红旗“宣司”司仪，宣司武术不要满，香堂全要五哥来体现帮规的威风。新入帮的人，皆跪叩宣誓行礼。香堂所用条子皆标榜桃园三结义，和梁山英雄好汉。先清堂子，查察空子，“空子”（即帮外奸细）。

清帮内部相会，以“三老四少”手礼对节行礼相识的手式是：左手拇指和食指相接，剩三指谓“三老”。右手拇指收掌心谓“四少”，“三老四少”手礼要抱向胸前，彼此对手礼相认。清帮“海底”，是一印有三位祖师神像和贴有本帮师傅二寸像片的小本，并印有师傅辈、字、号、姓名和新入帮人帮、字、号、姓名。介绍人辈、字、号、姓名等。

清帮香堂供有天、地、君、亲、师牌位，焚香点烛，庄严肃穆，也多深夜举行香堂，也有条子对话，但较洪帮文明一点。不像洪帮腰带小刀（称钳子），玩弄粗野。清帮不行拳礼，而重躬腰和叩首礼，条子也没洪帮那么多。

洪帮在码头、香堂见大哥行礼用打歪子礼，即采用小红拳一小套拳术，两手臂交叉绕花，左右伸开，左后右前。外八部弟兄后出左腿，内八部大哥则前出右腿，均右手礼，下及右脚。捏“三把半香”手礼，似拉弓式行四次式礼，每式念一条子。行歪子礼式，似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在和加代于加贺店经营饭店时，遇帮棍取闹，阿信临时应急所行帮式帮礼大致相似，但不是全套。

如要把兰州清洪帮活动情况弄得全面清楚，在当前只能追踪觅迹找到几个人，但要赶快“抢救”。我本人对帮会各山头情况了解不多，所述难免有差错之处，尚请知情者补充订正是幸。

（甘肃省兰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张掖帮会素描

张友贤　王秉德

清代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清廷调任福建水师提督杨岳斌为陕甘总督（驻兰州）。杨曾为曾国藩湘军旧部，他到任不久，即荐其湘军旧部杨占熬为甘肃提督（驻甘州）。著名的湘军仁字营、义字营即驻扎在甘州。湘军中的哥老会组织从此传入张掖。到光绪年间，张掖哥老会得到很大的发展，首领王良庆，闻名西北。他与西安、宁夏、凉州、河州等地哥老会首领互通声气，成为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光绪后期，各地的哥老会进一步成为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依靠力量。

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初三日，武威会党起事，清廷命令陕甘总督长庚严加镇压，将武威哥老会首领齐振鹭下狱。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陕西新军得到哥老会的支持，起义响应，成立军政府，以张凤翔为都督。张凤翔以陕西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为副都督，甘肃各地哥老会积极响应。陕甘总督长庚急调宁夏总兵马安良率“精锐营”（俗称西军）二十营入陕进攻民军。据《张掖县志·杂记》记载，陕西都督张凤翔为防甘军入陕，急派副都督张云山出守乾州（今陕西乾县）。张云山临行前，张凤翔设宴说：“云山大哥是咱们全陕之北门锁钥也。”欲让他死守乾州，使甘军不得越雷池一步，云山到达乾州后，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西军精锐营，“百出其术以御之。”使马安良不能得手。安良愤甚，召军官会议，突然曰：“张半截子（指张云山）

拉吾马头，使吾不能先到咸阳，子女玉帛让捷足者先得，都是‘干淡头一件’（意为捞不到油水），如何对得起大帅。诸君有何奇策，快说。”营长马同田听尕娃说，有个武娘娘（指武则天）坟，其地高，正对乾州北门，用大炮攻之，以掩敌人之耳目，再挖地穴，以火药轰之，其克必矣。”马安良立马则天陵顶，顾左右曰：“就照营长马同田所言速办。”当是时，张云山正在乾州观戏，开筵痛饮。甘军攻乾州北门甚急，喊杀之声，闻于戏场。云山大惊，乃以城墙为战壕，令兵士头顶铁锅，身披毡袄，昼夜防守。又恐乾州万一不保，乃派专使缒城而下，星夜到甘州投书于王良庆，请王良庆搅乱其后方，袭取河州（今临夏市，为马安良老家），以摇惑马安良之军心。

甘州哥老会首领王良庆接到张云山来书后，立即召集会众，宣言曰：“昔顺治五年（1648年），甘州丁国栋、米剌印，起革命之师，谋恢复明之天下，事虽未成，名留史册。彼回族也，优知大义，我辈忝为汉族，云山大哥又有信来，袖手旁观，于心何安？”会众咸曰：“敢不唯命是从。”于是秘密布置一切，择期举事。唯因子弹缺乏，托人向甘肃提督直属提标营中以高价套购子弹，事为甘肃提督马进祥所闻，派人将王良庆扑杀于张掖南街。

甘州王良庆被杀后，震动了各地哥老会。宁夏府哥老会响应起义，占领府城，建立军政府。武威哥老会首领齐振鹭也在狱中活动起事，事泄，被凉州知府王步瀛所杀害。

张掖志士王之佐，对辛亥革命极表赞同，叹道：“以杀止杀，何如釜底抽薪。”于是联合志士上书马安良，指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可作民族之罪人。马安良于是按兵不动。不久，全国共和告成，乾州正式停战，甘州王良庆的义举也名扬西北。

以上是辛亥革命时期，陕甘两省包括张掖的哥老会积极响应起义的一些情况。

甘州哥老会自王良庆被杀后，组织一度涣散，部分会众流为匪盗。进入民国时期，哥老会这一名称逐步由“洪帮”所取代。张掖洪帮到20、30年代又开始活跃，并被反动势力所利用而日趋反动。

民国20年（1931年），青海马步芳派其所属韩起功旅进驻张掖及酒泉，（酒泉驻一个团）旅部设在张掖。为了利用洪帮作为其统治的工具与爪牙，于民国24年（1935年）在张掖开“祁连山堂”，由韩起功与蒋福海分任正副龙头，具体堂内事务则由其密探队长蒋福海负责，人称蒋大旗，从此大肆发展组织，仅张掖一地就发展1000余名。其成员主要是军官、兵痞、流氓、地主等反动势力。其内部组织也有内、外八堂之分，而内八堂中总、座、陪、盟、礼、管、执、刑八堂亦有兼领外八堂执事者，故张掖祁连山堂内部职务分工比较混杂。据张掖市档案馆所存档案资料记载，张掖洪帮职务分行一（大爷），正副龙头（正副山主），香长，盟证，坐堂，总印，正堂，陪堂，礼堂，护堂等。另有外八堂名目中有：行三（老三），有桓侯、当家（又名钱粮、粮台），行五（老五）有承行、执法、红旗、黑旗、帮办、中点子之名，行六（老六）有巡风、护律、兰旗之名，行九（老九）为挂牌，行十（老十）为辕门等职。张掖洪帮所传哥老会的来历，也不说来自湖南湘军，而是元朝末年徐寿辉、朱元璋起兵时所传。这在研究我国帮会源流中，可谓“自成一说”。

1936年我红西路军西进时，被马步芳、马步青军队阻拦于临泽、高台（均在张掖以西），韩起功以张掖洪帮为核心组成“民团”，搜捕、残害活埋我红军将士。帮主蒋福海率领密探队亲赴祁连山区搜捕我红军战士123名，并乘机抢劫、烧杀、强奸妇女，然后坐地分赃。

抗日战争时期，张掖洪帮又被国民党及“军统”与“中统”所把持。在洪帮内设国民党区分部，蒋福海亲任国民党第八区分部

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蒋福海于1946年先后以“打富济贫、义气借道交友、帮丧助婚和千金难进”等名目开山设堂，骗人入帮，又发展1000多名，扩充了其组织。1948年，特务头子姚鹏程又设中统张掖通讯小组，由洪帮头子、特务董文秀为小组长，发展成员，调查我地下组织情况。建国前夕，既是洪帮头子又是军统特务的周世祥与屈从义组织“西北反共敌后游击队”企图颠覆人民政权。另洪帮头子袁克礼，联络国民党驻张掖九十一军排长蒋令华等散兵10余人前往农村抢劫，在张掖三闸、大满等乡抢劫贾逢喜、吴学智等农民家庭，抢去白洋375元，衣料20多件，银元宝28个，牲畜53头，烧死贾逢喜家2人，吊烤重伤11人。我人民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于1958年11月5日对张掖洪帮加以取缔。

清帮传入张掖的时间较迟。直至民国23年，才由清帮分子冉一真、赵明兆、李树田、王道之等在张掖共立“张掖志明堂”，开始发展清帮组织，先后发展成员50多名。

抗日战争时期，清帮在张掖的活动并不明显，解放战争开始后，清帮在张掖开始活跃，并由国民党与中统特务所控制。1946年张掖清帮组织内设有国民党区分部与中统特务通讯小组。帮首李树田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李树田于1948年与国民党驻张掖的九十一军政工处长罗贤俊密会，拟定“消灭共产党、维护社会治安”计划，于同年7月，李树田参加“中统特务混合小组”充当通讯员，他化名邓西铭，搜集我地下组织情况。

清帮原由秘密宗教中的罗祖教演化而来，但清帮形成帮会后，即已无秘密宗教特征，对外不再以秘密宗教面目出现。唯独张掖的清帮在其后期不但伸入秘密宗教，而且以秘密宗教的招牌作掩护。它就是中华理教会。

中华理教会原名在理教，传入张掖的时间早于清帮。民国18年（1929年）道人牛映乔来张掖初办中华理教会堂号名“志明

堂”，对外挂牌为“张掖志明堂戒烟公所”，负责人称当家，也称“师爷”，下设“会长”、“承办”等职。每逢二月二、六月六、九月九、腊八为集会日，念经、上香；收取布施，先后发展会员200余人。自1929年起，由牛映乔任当家，1934年为石明山，1935年为冉元顺，1936年至1944年则由清帮头子赵明兆连任八年当家，1945年至1947年先后由伊至贤、谢金堂任当家，1948年到解放，又由赵明兆任当家，另一清帮头子王道之则先后任会长多年。该会内也设有国民党区分部，赵明兆为北京人，兼任区分部书记，也是“中统张掖中心小组”成员。说明张掖清帮于1934年成立后，1936年即伸入这一会道门，使这一会道门成为其外围组织。这一现象，可能也是张掖所特有的。

1958年11月5日理教会被取缔。

（甘肃省张掖市政协　供稿）

武冈清洪帮概述

杨运焰

清帮为父子帮。师徒关系形同父子，一岁为师，百岁为徒。不论年龄大小，先入者即为师父。入帮规矩相当讲究，一般先由愿入帮者寻找一名帮会成员作为引荐，代投“小贴”，引荐者即为其师。待师父同意，乃择期开“小香堂”，成为记名（即挂名）弟子。上小香堂时，堂内设有“天地国亲师位”和前、后三祖的神位，神位上方贴有“义气千秋”的横额，神位左右两边为对联，上联为“未入会提天伦名投寸步”，下联为“入会后讲师父走遍江湖”。经过小香堂后，再经师父同意，才入大香堂。大香堂仪式与小香堂相似，只是场面更为庄严，规模更为宏大，而且必须让当地清帮中各帮口成员到场才能开，此种仪式为帮中大典，故不常举行。经过了大香堂，入帮者才算正式弟子，才具有“开法领众，首次收徒”的资格，也就是可以做为师父，收纳徒弟了。

湖南武冈清帮始于1944年夏季，发起人为万国钦（女）。

1938年，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以下简称军二分校）从武汉迁来武冈，该校政治主任教官董洁如及其妻万国钦（万又名慧文，湖北大悟县人）皆系清帮中人，万与军二分校军官总队队长周磐的姨太太祖某（名字不详）系清帮同辈人。俩人经常在一起玩耍，感情甚笃，过从甚密。军二分校迁来武冈后，万执教于城内洞天小学，薪金不丰，生活不宽裕，董后来离开武冈北上，万更觉生活清苦，百遣无计。祖某为了扩大军二分校在武

冈的影响，且增加点经济收入，给万作为生活补贴，乃与万商议，劝其在武冈开小堂收徒，发展清帮组织。当时社会动荡，时局艰难，社会上一些人也想寻找靠山，作为立身保家的支柱。在万的说合下，这些人也愿意尊万为师父，加入清帮。第一次入帮仪式在城内石牌坊曾明卿家举行，时间为1944年夏。后开山堂数次，入帮者城内约200人，外乡（包括外县）七八百人。姚兆儒、罗意卿、许臣云、曾某（曾明卿之子，名字不详），刘楚、唐运隆、李述藩、李祖云（女）、林盛继、刘克安、唐运颐、黄文珂等十几人均先后加入。按照辈份序列，万国钦属通字辈，为师父，姚等新加入者为悟字辈，为弟子。

立帮后，帮口发展慎重，加入者有商界、军界人士，但多为教育界教员，这些人社会地位不很高，活动能力不强，有些成员自入帮后基本上不参与帮内活动。

1946年夏，万国钦中风病死，帮口由姚兆儒等人主持。姚为了多收徒得利，不按帮规，私自发展了个别剃头匠入帮。剃头匠社会地位低下，按照帮规，这种人是不允许加入清帮的。林盛继、唐运隆等同辈兄弟认为姚违犯了帮规，对姚几经劝导，姚不从，一意孤行，林、唐等人极为不满，在《武冈民报》上登载声明，与姚脱离帮会中兄弟关系，对姚今后在外滥收徒弟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1948年，清帮大部分成员先后陆续转入洪帮五圣小堂。清帮活动基本停止，组织亦不复存在。

洪帮为兄弟帮，帮会成员均以兄弟相称，为异姓兄弟，故父子不能参加同一山堂。

洪帮组织相当严密，每一个山堂，有一名龙头大哥，又称龙头大爷。龙头大爷为山堂首领，在他的统管下，山堂分为内八堂和外八堂。

内八堂：

一、正印龙头：习惯上称为背榜大爷，由龙头大爷担任。

二、副印大爷：习惯称为副背榜大爷，地位仅次于龙头大爷。

三、座堂：称左相大爷。

四、陪堂：称右相大爷。

五、刑堂：称东阁大爷。

六、执堂：称西阁大爷。

七、管堂：称中堂大爷。

另外还有香长、盟证等职，一般在开山堂的时候，临时由内八堂的人兼任，但也有列入内八堂而成为固定职位的。

内八堂为山堂首脑中心，在它的统制下，设有外八堂。

外八堂：

一、心腹大爷，又称心腹大哥，老大京内军师。为外八堂首领，又是龙头大哥的军师。另外还有职位相等职权仅次于心腹大爷的心印大爷和护剑大爷，还有一种颇象荣誉称号一样的心义大爷，亦称为新益大爷，心义大爷一般是为小堂提供钱财的人。这种人颇有家产，他们入帮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靠山，保护自己的财产。因此，他们一般不介入山堂事务。心义大爷有职无权，故人们背地里称其为空子大爷。大爷以“孝”字为代号。

二、圣贤二哥，或称老二爷，京外军师，是龙头大爷的军师，又是心腹大爷的得力助手，二哥以“悌”字为代号。

三、桓侯三哥，或称老三爷，京外总督，是外八堂的管堂，其中又分为金旗、银鉴两种职务，金旗掌管粮饷、银钱、出纳等，银鉴掌管收发、文告、印鉴等。除此，还有有职无权的插花三哥，披红三哥等。三哥以“忠”字为代号。

四、管事五哥。五哥有几种：红旗五哥，又称红旗总督，掌生杀大权，是五哥中职权最大者；执法五哥，为体罚的执行者；黑旗五哥，蓝旗五哥，为上下联络，传令报讯者。五哥统称为青刚五哥，以“信”字为代号。

五、巡风六哥，司理巡山、放哨、侦查等事。此外还有巡山六哥、镇山六哥、守山六哥等职，职责不同，地位相等。六哥以“礼”字为代号。

六、贤牌八哥，职责和六哥相似，负责侦查报讯，只是专由师公和尚之类的人充任。八哥以“义”字为代号。

七、江（音刚）口九哥，司理站岗放哨等外勤事务。除此，还有守口、斗口、检口等，名称不同，职责一样，九哥在山堂中地位最低，故一般由在社会上毫无地位的平民百姓担任。九哥以“廉”字为代号。

八、幺（音腰）满十哥，有大幺满哥，小幺满哥之分，大幺满哥是龙头大爷的勤务员，自然由其亲信充任。十年风尾转龙头，大幺满哥可直接升为心腹大爷，而其他等级的人是难以有这种殊荣的。要想晋升，必须从小到大逐级来，小幺满哥一般由社会上无正当职业的人充任。幺满以“耻”字为代号。

按照山堂内的称呼习惯，二哥以下“某哥”又称呼为“某排”。

另外还有金凤四姐和银花七妹，金凤四姐又称凤头大姐，一般由龙头大爷的老婆或有相当势力的人担任。金凤和银花均为女性，职责是发展女性入帮。金凤、银花与外八堂一起，合称十兄弟。

除此之外，如有因为效忠山堂，为维护山堂利益而受伤致残者，可封为幺满大爷，坐食终生。

洪帮规矩森严，刑法残酷。订有堂规三十六条，七十二款，十禁十刑，十条大令，另有奖惩办法六十九条。每事都由管事传令，五堂当家。五堂即坐堂、陪堂、刑堂、执堂和礼堂；五堂都有令旗，用黄绫制成。无论做什么事都由帮规管着，帮规十分繁琐，不但饮酒坐席有一定的规矩，就连相互见面都有文、武两种礼节。以文礼而言，先以两手大拇指和食指相联成圈，表示为圈子里的人，

然后按照等级行礼。大爷双圈平肩，二哥平胸，三哥平腰，五哥于腰下，六哥于大腿处，八哥平膝，玄满双圈放于脚跟处。武礼姿势虽与文礼不同，亦同样分有等级。走远路也有一定规矩，加入洪帮的土匪拦路抢劫时，一定要先将一根棍子横放路中，行人到此，假如能将棍子与路平行放起，往前走三步，再回头将棍子照原样放好，土匪见了，视其为帮内人，不来抢劫，任其通行。

洪帮的刑法分为极刑、重刑、次刑和轻刑4种。极刑即千刀万剐，凌迟处死。轻刑就是打40大板，或罚跪，罚款等。无论是谁，如果违犯了帮规，就会立即受到处罚。

加入洪帮有个别吸收或集体加入两种方式。入帮要举行仪式，叫做开堂放标。开堂放标时要摆设香案，供奉祖师。入帮者跪在香案前，龙头大爷站在案旁凳子上进行训词，宣布帮规，宣布后，再舞一趟剑，叫做打歪子。然后，入帮者用刀砍香，砍时，香是两头点燃的，谓之红香，香共三柱，必须拦腰一刀砍断，未能砍断者，谓之心不纯，而受到三刀六眼的次刑处罚。砍香后，五哥杀鸡，大家一起喝血酒，进行宣誓。誓词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天子打坐在云端，弟子下跪在尘埃，上有三十六码头，下有七十二渡口，上凭青天，下凭黄土，弟子×××生于×年×月×日×时，今与众兄弟结义以后，患难相顾，疾病相扶，上有认兄，下有认弟，如有欺兄灭弟及违反一切条款等事，红香一断，人头落地，此誓。"宣誓后，便是帮内正式成员了，这时，新入帮者要交纳帮费，谓之香费。香费标准城里每人光洋5角或1元，农村每人为两斗谷，多交不限。最后还要共盆洗脸，以示相互间团结无间。

入帮后，每人领得一份入帮证明，名叫单片，习惯上称之为红宝，是用红纸或红绸印制而成。还有一种小册子，名叫海底，红宝和海底印有洪帮的起源、帮规及帮内通常使用的隐语。红宝是每个帮会成员的身份证，重如生命，每遇上互不相识的洪帮成员，

“有宝现宝，无宝要考”。拿出红宝，即平安无事，拿不出红宝，就要受到帮内各种隐语的盘诘。有了红宝，再懂得一定的帮规隐语，就能在帮内通行无阻。洪帮隐语十分讳涩难解，现择其常用者，介绍于下：

本名（或本意）	隐语
帽子	顶风子
笔	管城子
月亮	蛾眉子
眼睛	照子
鼻孔	气孔子
小便	丢钱子
大便	丢堆子
吃饭	收粉子
说话	过挑子
走运	跑红光子
理发	扫青
一元钱	一分水
十元钱	一寸水
百元钱	一尺水

武冈洪帮山堂如下：

（一）双钟山——神仙堂，约成立于1940年，为武冈洪帮之始。当时，贺梓敖、曾富满受长沙双钟山堂龙头大爷肖宏亮的指令，来武冈开堂放标。何绍卿、罗道宏，袁恒臣、谢新元，谢光明等人相继加入，并成为山堂骨干，何绍卿，谢新元为正副龙头大爷，（谢后来转入五圣山堂），谢光明为心腹大爷。

（二）锦保山——老君堂，成立于1949年元月，覃逸为龙头大爷，覃后来离开武冈，由石镇流继任，曾明卿为心腹大爷。

（三）大林山——××堂，成立于1948年，杨文彬为龙头大

爷。

（四）五圣山——智松堂，成立于1948年12月，谢新元为龙头大爷，谢死后，由刘异继任。

另外，武冈当时所辖的石下江有长白山堂，卿则楚为龙头大爷；高沙也有个山堂，袁岐山为龙头大爷。

所有山堂人员各异，组织大致相同，一管窥豹，现将五圣山堂的组织和活动情况介绍于下：

1948年秋，董洁如从外地回到武冈，因妻子万国钦已死，无处落脚，只得住在徒弟姚兆儒家里，按照清帮帮规，徒弟视师父若父，有无条件供养师父的责任。姚兆儒，林盛继等人相互接济董的生活，日供三餐，烟酒不离，有空还陪董打牌消遣。当时，林在小学执教，薪金微薄，时间一长，对董难以负担，乃与姚商议后，让董迁住大皇城夏元凯家。董将罗荣华、袁咸学、许月屏等人收为徒弟，让他们每日陪着自己打牌消遣，继而聚赌，以抽水子（即抽分子）来维护生活。

董看到当时武冈帮会中，洪帮双钟山堂人数最多，势力最强，清帮人力单薄，处处受人挤压，认为自己作为清帮师父，这样很不光彩，有失体面，就接受袁咸学、夏元凯等人的建议，于1948年12月24日，在南门口外九江庙成立洪帮五圣山堂，取名智松堂，将双钟山堂副龙头大爷谢新元挖来，请作背榜龙头大爷，谢由副转正，身份有所提高，故欣然从命，却由此得罪了双钟山堂，两山堂间自此结下嫌隙。根据不成文的帮规："洪转青，剥皮抽筋；清转洪，一条龙"。参加洪帮的人是不能参加清帮的，而参加清帮的人却可以转而或同时参加洪帮。据此，作为清帮师父的董洁如，早就参加洪帮了。五圣山成立后，清帮大多数成员相继转入，余众有的停止活动，不再卷入帮派活动，有的虽有活动，但未能卷起波澜，清帮基本上不复存在。

1949年5月，五圣山堂内部进行调整，分设8个股，计为总

务股，调查股，机要股，训教股，交际股，外勤股和文书股等。8个股的职能和人员与内、外八堂相比，少有变异，基本相似。

五圣山堂成立后，原清帮成员的社会活动能力大大增强，为了争夺赌宝台子，经常与双钟山堂员发生争吵，有时几乎发生殴斗。随着大林、锦保山堂的活动能力日益增强，帮会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为了协调好各山堂的关系，双钟、五圣、大林，锦保4个在城里的山堂组成“联谊社”（又称联堂会），每月召开会议一次，旨在互相通气，展开活动。联堂会由双钟山堂的何绍卿、谢光明、罗道宏，五圣山堂的谢新元、刘楚，大林山堂的杨文彬，锦保山堂的石镇流等头面人物组成。会址设在九华园（现城关镇水陆派出所附近）。

联堂会成立后，各山堂之间的矛盾并未减少，尤以双钟、五圣之间为甚。一次联堂会上，二谢闹翻，谢光明当场拔出手枪，对着谢新元的胸部气势汹汹地说：“我认得你，这个东西不认得你。”谢新元期期艾艾，未能回嘴。袁恒臣上前，将谢的手枪压下，众人多方劝解，使事态得以缓和，会议自然不欢而散。自此，二谢之间嫌隙益深，直至后来，谢新元被人枪杀，五圣山堂均认为是谢光明所为。散会后，谢新元想到自己手无寸铁，怕今后吃亏，即召开堂务会议，商议对策。会上，谢耽心地说：“谢光明这样威胁我们，将来五圣山堂在武冈会站脚不住的。”经计议，决定请县自卫总队队长刘异，加入五圣山堂来，以为后台。同时决定买枪自卫，趁山堂成员杨心谷（城步人）到长沙去的机会，代为购买枪支，由山堂拿出50元光洋交给杨。谁知杨一去不返，携款潜逃，购枪计划随之落空。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攻克南京，国民党大势已去。白崇禧来湘西发展地下武装，据说曾秘密来武冈，任命谢光明为反共救国军少校司令官；任武冈县警察大队队长杨文明为县国民兵团副司令。就把帮会中当过兵的人收罗起来，发给枪支，

组成县自卫队，队部设龙侯宫（现县祁剧团）。五圣山堂成员刘楚、陈泽分别任正、副队长。

1949年5月18日，谢新元为了发展山堂成员，带了幺满邓云前往新宁，当日深夜在白马团被人枪杀。五圣山堂将尸体抬回，放在河道坪开吊祭奠，长达10余日。五圣山堂每人出光洋5角或1元，作为丧葬费。山堂制作了500个黑纱袖套，分发给各成员，缠于左臂，以示哀悼，袖套一无所余，全部发完。各山堂成员也络绎而来，参加吊唁。整个场面之大，人众之多，在武冈极为罕见，整个县城为之轰动。

谢新元死后，刘异继任为龙头大爷，但由于时局动荡，刘异又忙于公务，无暇过问山堂事务，其他成员因谢死亡而心灰意冷，不再积极开展活动，五圣山堂从此一蹶不振，元气大伤。

1949年7月至9月，洪帮活动频繁，达到高潮，各山堂人数激增，城乡许多群众以及城内部分商店老板不明真相，争相加入。

10月，人民解放军兵临武冈城下，向城内国民党守敌发起进攻，谢光明纠合双钟山堂部分骨干组成的反共自卫队，在东门、大炮台一带与解放军接火。杨文明组成的县自卫队中，五圣山堂的少数几个骨干，也随部在太平门、镇南阁一线与解放军对抗，终因抵挡不住，败退往绥宁方向。

解放军攻克武冈城后，谢光明伙同罗××，周××和顾××等多人，在二区城西乡半山庙多次开会，成立“西南反共游击队”，密谋破坏，公然与人民政权为敌，谢终于被人民政府抓获，公审后枪决。解放后，清洪帮均不复存在。

（湖南省邵阳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凤台清洪帮内幕

德　俊　张济锦

在旧社会，清、洪帮是两个很普遍的民间秘密（以后逐渐变成半公开）帮会组织。现就个人所知，将凤台县清、洪帮的有关情况介绍于下。

加入清帮有一套手续。安徽以凤台县来讲，申请入帮的人要先写好拜师贴，把姓名、出生时间、性别及父母、祖父母的姓名等，书写清楚，表示要求参加某某帮。然后由“引进师”引进，投贴拜师，向“本命师”行叩首礼。就是右腿在前，左腿在后，双腿半跪，两手按膝（左手掌捺在右手背上），低首弓腰，磕第一个头时，口中说“祖师爷灵光”；磕第二个头时说“家理义气”；磕第三个头时说“弟老的（徒弟）请起”。师父也同时还三个“打千礼”（动作与上同）。拜师时须烧香燃仪注，并传授《海底通草》，师父边讲，徒弟边记。有的还发给写有三帮九代姓名、籍贯的小楷本，本子正面写“正大光明”，背面写“义气千秋”8个字。入帮者一般交拜师费5——10元，还有自愿交数十元乃至数百元的，也有因家贫不交的。

为了加强帮会的联络，使帮徒开眼界，见世面，有时几个帮的师父互相约定，择期“摆香堂”，有的还邀请外地清帮派人参加，也有一些外地有关系的清帮不请自来的。摆香堂无固定的时间、地点和人数。一般在深山庵观寺院，也有的在秘密宅室内举行。堂中墙壁上悬挂祖师爷的画像。供桌上摆设24个花碗，用红头绳互

相交叉系连，碗内放满银元、铜钱（表示二十四代严密联系、紧紧团结）并在花碗中间点燃24柱香。参拜香堂的帮徒，进堂前要洗脸净手，屋内红烛高照，香烟袅袅。本命师登坛，叫全体起立，自己手举香烛念道："一柱香烟举在空，祖师神台笑溶溶，三老四少堂前站，徒子徒孙乐无穷"。帮徒跟着齐声朗诵，并即拜师父后，各自坐下。于是师父开始布道，主要是讲解帮内的规矩、仪注等。例如：外帮有人问你香头有多高？如果你是"念二"的，可回答："头顶大字，身披通字，手拉悟字"。意思就是我是二十二柱香，头顶二十一，手拉二十三。如果是"念三"的，就回答："头顶通字，身披悟字，手拉觉字。"余类推。还教导帮徒要记住三帮九代，即本命帮、引进帮、点传帮的师父、师爷、师太，共为三帮九代。报帮不但要报出帮的名称，还要报出本帮的船只、四季所挂的旗号标志、起运码头等等，才能使同帮人相信你是"码里人"（自家人）。入帮后要进香堂或到外地赶香堂，或者遇到帮徒盘问，要自动报出以上这些，就是帮语说的"安清帮许充不许赖，要报出三帮并九代"。师父布道，不外乎诸如此类的内容。

帮徒相见，都用隐语、暗号互相识别，即挽起左手袖口，背着手伸出三个指头（食指与拇指合成一个圆圈，另外三指伸出），对方问贵姓，答称："好说，姓潘"。意思是潘祖的门徒因"潘"字是"三"点水加个"番"字，故清帮俗称"三番子"。同辈帮徒之间，皆以"老大"互称。但不熟识的帮徒之间，也泛称"老大"，例如帮徒与一个陌生的人见面，对方开口就称"老大"，即知他也是帮徒。低香头的对高香头的（除自己的师父、师爷等以外），分别称二叔、二爷等等。帮中隐语，多以船上工具加以神化，例如，"什么有钉没有眼，什么有眼没有钉"、"七飞禽，八走兽"、"青头愣，愣头青，鸭蛋眼，枣核钉"、"什么叫三堂六部"、"狮子麒麟兽中王，大鹏飞到桅杆上"等等。凡此种种，如能对答者，就说明是"码里人"。清帮以"义气"为重，帮语说："安清、安清，不

谈不亲；谈起安清，连肉又连心，连皮又连筋”。只要是自己人，一切困难问题都能帮助解决。

凤台县的清帮，主要是“兴武六”、“嘉海卫”、“江淮泗”三个帮；帮徒以兴武六为最多，嘉海卫次之。抗战前后，清帮在凤台县较为盛行，当时“念二香头”的有蔡桂亭、张瑞卿、曹保国、李子峰、齐香候等人，皆立堂开山门收徒。“念三香头”的有张济昆、李剑虹、严子平、周如宣、张敬文及王少廷（后当了汉奸）等人，有的也开了山门。“念四”的就更多了。

1930年蔡桂亭在本县城隍庙摆香堂，一次就收徒300多人。帮徒大部分是县大队官兵，其余是码头、箩行的劳工和商店中的小开（小老板）等人，还有外地来凤台推车卖力的，他们主要是想借助帮会，谋一点生活门路。1936年5月间，蔡桂亭为扩大帮会力量，又到本县展沟、顾桥、阚町三处，广收门徒600多人，从此关山门不再收徒，但准许门徒开山门、摆香堂。因此，大徒弟张济旺、张警仕，胡传美等人，在城内和胡庙等处，各收门徒（念四）的200多人，分别把持码头、箩行。从此，城内和乡间的清帮互相串联，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帮统。

蔡桂亭的徒子徒孙非常众多，其中还有官府上部分高级人员，在江湖上名望较大，遂被推为当地清帮的“总老大”。凡来凤台打拳卖艺的；或者津、汉、隶、团分子以及东行西行（背大筐的乞丐）等五花八门的人，要想在凤台摆摊设点谋生，都要事先向蔡投贴拜访。否则就要遭帮徒干扰，逐出县境、甚至扭送官府。

1937年8月蔡桂亭死后，兴武六帮无统一帮主领导，即各自为主，随便开山门收徒，分别把持一方，做为据点。例如城内帮徒（嘉海卫）张仲达，户大丁多，门徒（念四）达800多人，占全县帮徒的1/3，绅商各界皆随声附和，唯命是从。

凤台县的洪帮徒帮较少，势力不大。

洪帮的成分比较复杂，浪迹江湖的，无正当职业的及旧军队

中的部分人，大多数都参加洪帮。有些人则醉翁之意不在酒，意欲利用洪帮，达到个人称霸一方，借以发财的目的。例如，在旧社会的上海、南京等地，流氓阿飞集团假借洪帮势力，敲诈勒索，绑票杀人，扰乱社会秩序，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凤台县的洪帮也是这样，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很不好，因此一直没有很大的发展。

清洪帮在开始时是自保性质的群众组织，并在一定的时期内带有一定的进步倾向。但是，在清洪帮的发展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怀着各种目的纷纷加入帮会，使得帮会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一步步走向反动，终于导致彻底覆灭。

凤台县的洪帮，早在40年代就已基本绝迹。1942年洪帮头子董人龙（字云骧、阜阳插花庙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利用洪帮关系，被汤恩伯委任为苏鲁豫皖边区党政分会视察专员，此后即常驻凤台、展沟、阚町，从事洪帮组织活动。当时在阚町、胡集等地开设了37个山堂，共收门徒350多人，其中有著名匪首马显廷、侯中和、贾同奎（外号铜锤）、张从善、张云峰等人。他们在凤、蒙、颍、阜四县边区作乱，不久被国民党骑八师消灭，并将小头目侯仲才（秃子）等19名，枭首示众，暴尸五天。从此，洪帮一蹶不振，余众不敢再继续活动，抗战期间在凤台城乡基本消声匿迹。

凤台县的清帮，直至解放初期才彻底覆灭。过去还曾参与过某些革命活动，做过一些有益的事。

1912年辛亥革命后，有兴武六帮头头朱锡芝（寿县人，念一的）来凤，约同帮徒蔡桂亭、张耀西等，辗转邀集帮徒及反满志士百余人，参加了柏文蔚将军领导的淮上军，编为一个营，由蔡桂亭、蔡梦周率领，随淮上军副司令张孟介攻打颍州。占领颍州未久，被清军倪嗣冲联合颍州地主武装，将淮上军重重包围。经

过昼夜巷战，浴血拼搏，淮上军伤亡惨重。当有帮徒蔡桂亭、陈伯华等自报奋勇，编成敢死队做为后卫，掩护张孟介等安全退出颍州。结果，帮徒陈士安、陈士坦、蔡继忠等180人壮烈牺牲。

淮上军退到寿县后，清军尾随紧追。倪嗣冲派一名叫李秃子的营长，占据了正阳，对淮上军家属进行残酷镇压，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并抓走蔡桂亭，由李秃子亲自动手，严刑拷打，封闭其家门，掘地三尺。后蔡趁隙逃走。淮上军虽遭受此挫折，然反清革命的热心，并不懈怠。此后张耀西又动员蔡桂亭，秘密组织帮徒，大开山门，广收徒众，以借助帮会扩大革命力量。

1932年，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黄家洼农民暴动失败后，国民党特务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留在凤台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处境十分危险。当时，中共地下党员丁文山不幸被捕入狱，蔡桂亭得知后，告诉担任国民党县大队队长的帮徒曾桂林对丁给予关照。在曾的安排下，狱卒齐景云对丁在狱中的生活等方面，照顾得颇为周到。有一次，中共地下党员蔡效堂等正在城内马家园秘密开会，被国民党兵突然包围，因队长曾桂林、排长夏近亭及班长叶廷胜、苏幼传都是帮徒，在搜查时有意马虎，视而不见，使开会的人得以安全脱险。

上海一·二八事变时，蔡桂亭、程华亭等，曾联名向政府请缨杀敌。但蒋政权认为蔡等是反蒋分子，不仅对蔡要求抗日一事不予批准，反而严加训斥。致使蔡忧愤成疾，于1937年病故。

蔡桂亭死后，凤台的清帮山门林立。有些人平时既不讲帮内清规戒律，遇事又不遵江湖情理，胡作非为，甚至认贼作父，把清帮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工具。如“兴武六”帮的张济昆、赵景伯（又名赵德贵）、胡传美等，是同参（同师）兄弟，他们结成一体，上通官府，下连徒众，一呼百应，恣意横行。胡传美（外号大牛黄）朝夕借酒疯沿街骂人；城内的张某仗势强买强卖，大称进，小称出，欺压进城商贩。尤其是曹瑞峰，在日军侵占县城前夕，借

帮会力量，以忠义救国军名义成立一个特务大队，约有枪120支，在潘集、芦沟集一带设卡收税，盘查行商，借端敲诈，浮收中饱。还有张某和赵某（念三的），担任了“正义”部队（即忠义救国军）的大队长，在城南山里过街楼，赫家圩拉马起枪，催粮派款，无恶不作。

1941年5月日军占领县城后，帮徒扬立言在本县田集、杨庙、苏家岗一带，搜集沦陷区民枪和部分潜散的匪枪约150支，由他的长子杨开昌任中队长，投靠汪伪的花团长，当了“鬼变子”。有一次他带兵到古沟、芦沟一带骚扰，所到之处，将群众衣物、财产，甚至鸡、狗等均悉数掠光。群众恨之入骨，背地称杨立言的部队为“吃拿队”、“大褂队”。1943年秋，杨立言又借帮会关系投靠了国民党第十五集团军前哨指挥所颍凤大队，在沫河口、鲁口子河下设卡收税。有时还护送茶、麻、竹、木、粮、油等走私物资，运销沦陷区。有一次因与大队长杨威分赃不均，发生内哄，杨威被杀，双方各死30多人。杨立言遂率帮徒百十人，逃往敌后刘集、田集一带，企图重整旗鼓，竟大肆抢劫，公开收税。他有时冒充国民党杂牌军，有时又自称汪伪军，闹得沦陷区百姓日夜难安。1945年5月，杨立言、杨开昌父子率枪兵30多人，在田集行酒作乐时，被国民党军廖仲平部捉住，当即就地枪决，露尸街头。曾被杨家残害者，将父子二人尸体的眼珠挖出，有的还用棍打尸体，可见群众受害之烈，痛恨之深。

还有一个穷凶极恶的帮徒侯巨岑，又名侯保元，自称侯三爷，是阚町侯、王两姓械斗流血惨案的罪魁之一。王姓的头头王希璇被国民党县长马馨亭枪决后，侯自以为得胜，气焰更张，肆无忌惮地大开山门，广收帮徒。其中有著名匪首马显廷、贾同奎、侯中和、张云峰、张从善、汤绍尧（克正）等，带400多人、200支驳壳枪、100多支步枪及很多子弹，集体加入清帮，拜侯保元为师。从此，侯更加嚣张，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绑票架人，抢劫客

商，坐地分赃，无恶不作。他家中有一小妾，人称苏妲已，朝夕擦指抹粉，浓妆艳服。还有一个干闺女名王淑云，娇小玲珑，双手使枪百发百中，一张利嘴巧言令色，江湖隐语，处处精通，帮内同伙皆能听其号令。但在1944年高粱晒红米时，有一次山军（山是指山东。即国民党驻阜阳的九十二军）十二路傅师长，配合骑八师将侯保元部包围，打死打伤帮徒200多人，并将匪首侯仲才、侯仲有等19人枭首示众，余众四散潜逃。侯保元元气大伤。

两个月后，侯又率众向山军请求收编。即经该军抗日挺进司令部委以独立支队支队长，原帮中人员也委以营、连、排长等职。但侯部野性难训，开到蒙城驻地受训，刚刚月余，官兵即行携枪逃跑。侯保元借故私自回到阚町家中，仍想图谋作乱，当即被骑八师营长马受天逮捕，在侯宅门外就地枪决。

解放后，人民政府取缔所有会道门，令帮徒自新，给以出路，并根据群众要求，将怙恶不悛的帮徒张寿禄和赵乾三、赵景伯等人，经过公审，执行枪决。从此，帮会组织彻底覆灭。

（安徽省淮南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我所知道的帮会情况

周声远

我同洪帮的接触

1937年底，我在河南省洛宁县看到了《清帮和哥老会》一书，这是一名中共党员潜入帮会内部，经过数年调查了解之后写成，在陕北出版的。读了之后，使我对帮会有了大概的了解。不久，因派壮丁不公，当地青年纷纷顺着通天沟前往伏牛山聚义拉杆子。中共党组织派小李同志前往，拟向两三千名所谓股匪做工作。小李对帮会一窍不通，被土匪捉住，拉出来要枪毙，经出示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才得幸免于死。不久组织上又派富有土匪工作经验的焦点同志前往，工作相当顺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把我所在的那支人民军队围困在鄂豫边区半年有余。1946年6月底我军开始突围战斗，7月初到达川陕鄂边区，以神农架原始森林区为中心，建立兴保房专区革命根据地。我同工作队员到通向四川的一条川里工作，发现这一道川里的群众基本上都在洪帮。我们把这一条川叫做洪帮的老家。

我们工作队是为宣传和税收进入这条川的。起初同志们发现，群众总以“仁兄”来称叫，经与群众用洪帮的暗语问答的结果，证明这里的群众确实都是洪帮的人员。经过深入了解，知道这川的

香堂里还按水泊梁山交椅的次第排列职位，垭口那位饭铺女老板就担任着香堂里黑旗管事职务。一次我同一位管事对谈过暗语之后，他问我："仁兄在玄吧？"我说："不在"。他说："仁兄一定在玄，不过你入了共产党，盼头更大了！好哇，仁兄们都会跟上哩。"从此以后，群众把我们当自己人看待，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我在河南舞阳县做基层政权建设工作。那时区里30多个村的村长之中，我们以为可靠的只有一个地下党员和一个长工，还都被敌人杀害了。其余的村长有土匪和通匪者、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和狗腿子，人员很复杂。那时候，上级政策规定，对地方上握有武器的土匪、小当权派等人，要尽量团结争取，使之稳定下来，以免随国民党军队南逃。有的匪首，我们也进行争取，给以名义，使之有改恶从善的机会。区干队里也有土匪和通匪窝匪者。如果对帮会一无所知，我们对这些人是不容易驾驭的。在和这些人相处的日子里，尤其形势危急的时候，我不时地脱口而出，说出洪帮的暗语，使他们认为我是洪帮老兄，不得不服从我的领导。有一次夜间出动，我说："车子，长条，上红堂！"区干队队员马上照命令办。同时又有人带几分埋怨口气说："你咋还要掂这一壶哇！"他心里可能在想：咱们已经是光明正大的区干队了，忘记当土匪的丑事吧。

从以上经历中，我对帮会情况略有一些了解。

洪帮内幕

洪帮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成员分为三等，称"三等光棍"。头等光棍叫清水光棍，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学识、声望、地位的人；二等光棍叫浑水光棍，是武装实力人员，以攻城、下寨、打家劫舍、拦路卡财物、夜间盗库房等手段筹集钱财；三等光棍叫捐班光棍，是只出财物粮食的地主老财。

洪帮组织在全国是统一的，其四级领导机关称为“四柱”，即山、水、香、堂四级，如同大行政区、省、县、乡一般。各级机关对外绝密，内部派人到各基层机关取联系叫做“闯香堂”。

洪帮吸收新帮员，须经过详细考查，履行严格手续。每人入帮都得有介绍人、接收人、保荐人、引进人，这四个人，帮内称为“四梁”，叫做恩兄、承兄、保兄、荐兄，缺一不可。入帮后可与帮内人员互称仁兄，在洪帮组织内称为“在玄（读元）”。帮内人员违犯了帮规，称为“犯教”。

洪帮的帮规十分森严，内部人不得泄露，局外人不得混充，否则生命就失去保障，所以能延续数百年而不衰。不过它的生命力主要还在于有封建思想意识作精神支柱。他们的意识集中表现在对“光棍”的棍子精神崇拜这一点上。如他们标榜天下光棍有三：第一根是如意棍，大闹天宫孙大圣；第二根是盘龙棍，打平天下赵匡胤；第三根是水火棍，大破天门穆桂英。

洪帮用暗语，起着统一意志团结成员的作用。如作为帮名的洪字，本取之明朝开国年号“洪武”，在帮内化作暗语隐称“三八廿一共一家”，人人牢记。洪帮称暗语为“条子”，发问叫“开口条子”，请求停止再问叫“闭口条子”。清末和民国年间，不少常出外活动的人加入洪帮，是为了赖以作保护，免去被抢劫、欺压之祸，他们说：“学一套暗语，用得着，万金难买；用不着，一文不值，有备无患。”如在路上突然遇到有人掏出手枪喝令站住的时候，说“车子本是一条龙，摇摇摆摆在空中，本是江湖会上人，英雄不打自己人”，然后再交谈出初相见时的一连串暗语，就能免去被劫截之祸。又如在外地受困时，把匕首插在路上或把手巾丢在路口处，帮内人过来，一脚踢开，说：“一条黄龙在×中，何人在此访英雄？……”和他以暗语通气接头，可受到当地洪帮组织的帮助。

一般情况下，洪帮人员初次见面时所问答的暗语有这么几句，

问："请问仁兄哪道来？"答："来处来。"问："哪道去？"答："去处去。"问："路上见的啥？"答："一台戏。"问："唱的啥？"答："桃园三结义。"问："回戏？"答："宋江杀楼。"问："请问四柱？"答："××山，××水，××香，××堂。"问："请问仁兄四梁？"答：恩兄×××，承兄×××，保兄×××，荐兄×××。"也可不问四柱四梁而只问："请问仁兄在玄不在玄？"还可以无限度地问很多。如果答不上或不愿多谈，可以说出闭口条子"在家住深山钻老林，多见树木少见人，还望仁兄多加海涵，搂拦搂拦！"对方就不再多问了。

清帮内幕

清帮初名安清帮，由翁、钱、潘三人发起组织。河南的安清帮多数姓潘。三人发展的帮员，出外都得以发展人的姓氏为姓。其帮内人员一律论资排辈，一代一代往下传递，不同于洪帮的一律称为仁兄，视为同辈。安清帮人员之间互称"老大"。

安清帮称机关为码头，穿插于机关之间做联系工作叫做"拜码头"。其内部成员有政府工作人员，交通部门的职员、工人和城市闲散人员等。他们之间的联络记号和隐话，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面前公然表露、问答，丝毫不作掩盖。

安清帮的手势和记号以及暗语，除了在指法上以左三右四代表"三老四少"外，因其组织以保护航运为重要任务之一，故多为与水路交通相关联的事物。例如，洗脸先在脸上擦一川字，然后再随便擦洗；帽、碗、盆等物不能口向下扣着，否则就视为帮外人，如果知道是帮内人，便认为是严重违犯帮规而要给以责罚；发现有帮员将帽子歪放或把手巾放在帽口上，这表明是有了困难，在请求救援。他们的隐语，除了互称"老大"，问贵姓时回答"在家姓×（本姓），出门姓潘（或翁、钱）之外，多问答航船上的各

部件名称。

安清帮人员经常在一起吃喝拉拢，花钱不论你我。更经常有上级人员下来到处联系，酒肉大席，肥吃大喝。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帮伙人员的非法夺取。

听老人们谈，在清代，一般所谓正人君子以加入安清帮为耻，避而不谈其事。

安清帮的名称后来去了一个“安”字，叫清帮。民国时代的清帮有都市的流氓、宪兵警察、偷盗团伙、国民党党政人员、部分高中以上学生和个别职教员等。

1935年，河南省立开封师范教导主任皮春如曾经向学生中的清帮人员公然传达命令，让学生把带回去的网篮里放进盆口向上的脸盆，我也用这个方法，使清帮人员在暗中给我照看了一路行李。

1938年，在漯河车站上，小偷偷去了我的包袱，路警站在一边看着，也没有管，因为他们都是清帮组织里的成员。

（河南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武汉帮会在汪伪时期的活动

张孟青

一、中国安清总会汉口市分会组成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以后，上海安清帮头子常玉清结束了原归日寇领导、以安清帮分子为中心的“黄道会”，重新组织归属汪伪政权的中国安清总会，并将会址从上海迁到南京。那时，在武汉的安清帮头子计国桢、葛树森、孔广青、李清泉、张树毅之流，热中名利，蠢蠢欲动，把投靠敌伪说成是“义气”，于1940年秋推派张树毅前往南京，与汪伪中国安清总会联系，征求常玉清同意后，决定在汉口设立分会。经过短时间筹备，同年底召开成立大会；选出计国桢为理事长，葛树森、孔广青、李清泉、张树　为常务理事，王文明、贾思普、范寿椿、傅精亭、刘声远、诸锡兴、仇墨康、谭觉存、程通慧等为理监事，任用孙斌为文书，孟鑫清、陈云等为干事，会址设汉口中山大道一元路口。汉口市分会成立后，聘请汪伪特务头目张孟青为顾问，接受特务津贴，经常提供情报，承销特务机关报《国民新闻》，扩大反共宣传，在市区和各地广收会员达300人左右。安清帮分子被汪伪武汉特务组织用作情报人员的有罗冠雄、孟鑫清、黄忠卿、孙斌、范寿椿、赵启超、赵元孚、赵庆麟、傅精亭、谭觉存、覃文义、王学忠等10多人。

二、安清帮设立华中总会

自命为安清帮“大”字班的杨缵绪，虽已年近古稀，但野心甚大，企图凭借安清帮在华中地带湘、鄂、赣各省沦陷区内扩展帮会势力，遂于1942年委派张树毅去南京，征得中国安清总会同意，在汉口市分会基础上设立华中总会，由杨缵绪任理事长，原汉口市分会的4个常务理事转任华中总会常务理事，原汉口市分会的一批理监事加上新增加的邵虎、刘协和、陈俊、王学忠等人充任华中总会理监事。先后在湖北黄陂和河南信阳各设一个分会，黄陂分会理事长是傅精亭，信阳分会负责人不明。此外，还计划在九江、岳阳、临湘、长沙、黄冈、应山、云梦、大冶、鄂城、江陵等市、县分期设立分会。由于帮徒分散，均未正式建成。据了解，杨缵绪曾多次对徒众表示，要在二三年内把安清帮势力插足到整个华中地区，但这一痴想直到日本投降尚未实现，终成泡影。在华中总会整个议事日程上，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替日本主子建立恶贯满盈的“安清漕运团”。

三、安清漕运团应时出笼

安清帮分子、华北人刘协和进入华中总会前，与日寇汉口陆军特务部有密切联系，杨缵绪企图利用这种关系发展安清帮武装势力。两人经过一番商讨，决定沿用满清王朝时期旧例，在日寇的卵翼下设立一个隶属于华中总会的“安清漕运团”，由刘协和充当团长，杨缵绪以华中总会理事长身份出任名誉团长，首要任务是强征民间木船，编成运输船团，由日寇拨付一批步枪和短枪，为日寇运输军用物资，配合进行特务活动，沿途收集情报，并在运输途中利用武装袭击革命力量。华中总会的4个常务理事任漕运

团顾问，团部除顾问室外，还有总务处（处长温绍昆）、运输处（处长姓名已忘）、情报处（处长邵虎）、护运大队（大队长赵庆麟，下设若干中队、分队），据不完全记忆，孟鑫清、高有鸿、李永久、傅昌明、张克平、邹清泉、彭俊等人曾在团部或护运队中充任不同职务。漕运团建成后，对外大肆宣传是一支拥有300条枪支的运输武装，实际枪支据悉只有100支左右。

1945年刘协和离汉后，杨缵绪将漕运团改为“安清漕运总团”，原团长改称司令，由杨自任。不久，日本投降。同年8月下旬，时我正任武汉治安联军总部调查处长，据报该团有大批现钞（伪中储券），藏在一个防空壕内。经我派人会同该团前往起出，装了5个麻袋，封存保管在汉口车站路大陆银行仓库楼上，10多天后由杨缵绪擎立收条提回。以后听杨缵绪说，该团全部枪支弹药交予军统鄂赣边区区长唐新接收。又据传闻，由赵庆麟经管的该团部分枪支，已被新四军收缴，确否有待证实。

下面简介一些安清帮头目的情况：

计国桢，上海市人，早年在上海参加安清帮，属“通”字班，抗战前到汉口开设针织袜厂，曾任汉口市针织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和市商会理事，武汉沦陷初期出任日伪武汉维持会会长，1939年4月充任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参议府参议，1940年冬组建中国安清总会汉口市分会，任理事长，1942年在上海丧命。

杨缵绪，湖北人，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新疆善后督办，自称“湖北将军团中将”，属“大”字班，武汉沦陷后充当日伪武昌维持会会长，1939年冬任伪湖北省政府专员，1942年当上安清华中总会理事长，1945年自任安清漕运总团司令，于日本投降后将漕运总团的枪支弹药和存款交予军统接收，后被军统武汉办事处关押审讯，武汉解放前死亡。

葛树森，别名葛清泉，河北人，抗战前在上海加入安清帮，属“通”字班，曾当过伪上海市警察局督察，1940年复任伪敌工总部

武汉区专员，兼充特务机关报《国民新闻》汉口经销处主任，利用安清帮大举收徒，介绍徒弟罗冠雄等10多人当伪特务组织情报员，到处搜集共产党、新四军和其他有关方面情报，1943年春患脑溢血病死于汉口中山大道天德里福源坊。

孔广春，山东人，属“通”字班，曾在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宣传科充当股长，并任大东旅馆经理，洗尘池浴室经理，是汉口市分会和华中总会的常务理事，日本投降后当东方旅馆经理，解放后自杀身死。

刘协和，河北人，属“通”字班，沦陷期间到武汉，与日寇汉口陆军特务部有频繁联系，有人说其在特务部负有秘密任务，或说是情报关系。1942年在日寇的支持下，与杨缵绪合组安清漕运团，充任团长，约在1945年离职去华北。

温绍昆，河南信阳人，曾任安清漕运团总务处长。

赵庆麟，河北人，武汉沦陷前后在大陆银行汉口分行当警卫员，1940年参加安清帮，属“悟”字班，同年冬经葛树森介绍在伪特工总部武汉区当情报员，后在安清漕运团任护运大队队长，日本投降后下落不明。

四、洪帮继起组织洪兴正义会

中国安清总会汉口市分会成立以后，武汉洪门巨头——大洪山山主丁子璜、郧都山山主穆岐山、中华山山主文纯卿、天定山山主桃春阶等人，认为洪门在湖北和武汉地区拥有20多个山头，洪门兄弟大大超过清帮的数量，于是分头活动，力争组织起来，与清帮比比高低。这些人都是甘为日寇卖命的蒋记与汪伪特务，如丁子璜在沦陷初期是中统外围武装——汉阳人民自卫总队队长（自称司令），1940年投敌，任伪特工总部武汉区专员、伪汉口特别市党部委员、伪海员特别党部汉口区党部常务委员等职；穆岐

山的公开职务是伪汉阳县警察局特高科长，又任蒋记宪兵潜伏组织——特警第三队联络员；文纯卿是伪特工部武汉区专员；桃春阶是军统潜伏组织——军令部第二厅武汉谍报组组员，早与老牌日本间谍宫城宇平有密切关系。

自1940年冬起，丁子璜等就接受日寇汉口陆军特务部情报班班长宫城宇平、宣传班班长日野秀人的策动，并得到武汉汪伪特务组织的支持，开始筹备以洪帮为中心，结合情报活动的双重社团组织。1941年春夏之交，召开“洪兴正义会”成立大会，选出丁子璜为理事长，穆岐山、文纯卿、桃春阶、范冰清、徐鸣皋、徐吉甫、樊树三、程翰卿、刘瑞卿、蔡云卿、秦养正、朱燮卿、郭仁泰、仇元、梁瑶亭、李源成、袁海棠等人为常务理监事或理事、监事，推樊树三兼总务科长，徐吉甫兼组织科长，文纯卿兼宣传科长，徐鸣皋兼调查科长，委派朱超信为秘书（后为张一民），蔡子俊为会计，会址设于汉口吉庆街云绣里。

洪兴正义会表面上以社团面貌出现，但实际上成为帮助日寇进行特务活动，蒐集情报的御用工具。宫城宇平在该会会址的对面楼上设立了一个密室，专事研究各方送去的情报，并不断与丁子璜、张一民、邓在望等会中人联系，互通情况。

洪兴正义会还仿照安清漕运团，设立了一个“合利运输贸易公司”，具体任务是为日寇运输军用物质，收集情报，凭借武装打击抗日革命力量，起到了日寇后勤机构所不能担当的特殊作用。特别是1944年春，日寇发动湖南攻势，合利公司征集数以千计的木船，运送了数十万吨的军用特资，助长了日寇的攻势，长沙、衡阳相继沦陷。为此，1944年夏，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中级副总参谋长来汉视察时，亲自召见合利公司的头头，慰勉有加。1945年春节，因美机大轰炸后市面萧条，银根奇紧，日寇特送7000万元中储券给该公司过年。可见日寇非常重视他们的“功劳”，也暴露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

抗战胜利后，虽然中国安清总会汉口市分会、华中总会、漕运团、洪兴正义会、合利公司等等五花八门的反动帮会组织归于消亡，但国民党军统、中统争相控制清洪两帮，组成外围。军统控制的“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和中统控制的“民治建国会”次弟出笼。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湖北分会由赵凯任书记长，成员由杨庆山及其喽啰一手包揽。丁子璜则帮助武汉中统头子杨虞州筹组民治建国会武汉分会。清、洪两帮成为国民党继续反共反人民的政治资本之一。

（湖北省武汉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清帮早期组织考略

李世瑜

清帮是清初以来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秘密结社之一。除了在其早期以及某些特殊情况下它也起过进步作用之外，一般地说，它总是具有很大危害性。尤其是民国时期，国内各派反动统治者以至帝国主义侵略者，无不与之有着彼此依存、狼狈为奸的暧昧关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它更形成蒋介石政权组织的重要社会支柱，所谓“党、政、军、帮，路路皆通”。[①] 当时有许多城市，如果说已经成了“清帮世界”，那是诚不为过的。因此在现代史的研究中，清帮问题就不能不被列为一项重要课题。而研究现代的清帮，又不能不溯及其早期组织的种种，为此试就闻见所及撰成本文，囿于水平，未识有当否。

一、清帮的早期组织

清帮的早期组织因何而起，起于何时何地，组织情况如何，名称来源如何，起于何人，史籍缺乏明确系统的记载。然而在清帮

① 唐人：《金陵春梦》第一集161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

内部流传的一些“通草”[①]里面，却颇不乏关于其源流的考证。虽然编纂人大多为帮内粗知文墨附庸风雅分子，考证的目的不外为妄托古人以显见其源远流长，但有些资料经过剔抉印证，还是足资征信或可以取材的。

清帮的早期组织原是清代漕运水手中的一种行会性的秘密结社。先从漕运说起[②]。漕运是封建时代转输田赋（粮食）的一种制度，这项田赋被称为“漕粮”或“皇粮”。清代时，统治者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南等省把粮食搜刮来之后，主要是经由运河运到北京，专供那些统治者和他们的军队以及统治集团的寄生虫们去消耗。因此清帮不论在称为“清帮”以前及以后，其发展一直是以转运漕粮的河道沿岸各大码头为基地的。

漕运的转输量很大，在清代每年运到北京的粮食共有400多万石，运粮的船只经常有12000多艘，水手有10万户，大约二三十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所谓“仰食者千百万”。为了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些船只和水手，统治者仿照明制，设立了一个“漕运总督”。其官职有行政权，也有带兵权。带的兵叫“漕标”，也叫“卫军”，是专门用于镇压水手和保卫漕运安全的。统治者把各地漕运组织分成许多卫、所[③]，卫、所下面有联，联下是帮。这套组织又统称为“粮帮”或“粮米帮”。每个卫、所都有名称，如苏松卫、杭州卫、严州所、金衢所等。下面的联，记载中不常见它们

---

① “通草”又称“通漕”、“通钞”、“统抄”，是帮内秘籍。版本甚多，以我所见即有印本、抄本30余种。内容不外记录清帮历代祖师、粮船制度、帮规、仪注、黑话等。大都是驳杂荒唐，牵合成书的，但也保存了一部分清帮内部的原始资料。

② 以下讲漕运及粮帮组织的一段文字，参阅《清朝通典》及《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及《续通考》、《大清会典》、《清史稿》等书中有关漕运部分，以及《光绪漕运全书》等，因一般不引用原文，故不再一一加注。

③ 据《明史·兵志二》载，卫、所都是明代的军事编制。后来卫、所名称有的即被作为地点名称，清代因之。漕运组织中的卫、所也是沿袭了这种称谓，这也可能与漕运中的“漕标”编制有关。

的名称。帮则与其所属的卫、所名称统一，如说江西卫四十帮、江安卫五十二帮等；但也有径称帮名的。如江淮泗总帮、兴武六帮、嘉白总帮等。各帮还因地区的丰歉或所负担任务的多寡而有分别，称为“高帮”、“低帮”。每个卫、所有守备，每个帮有千总，此外还有一些武举“随帮效力”，每个船有旗丁，或称帮弁、运弁、千总、旗丁等，都是些下层统治者或其爪牙，这些人是比较接近水手的。

这一套统治机构中的分子联合一气，通同作弊，对上隐瞒虚报，对下克扣加派，盗窃、走私无所不为，水手叫苦连天，人民不堪其扰。当时这类问题已经形成一种专案，叫做“漕弊”。关于“漕弊”的情况，清代官方是并不讳言的。如雍正四年（1726年）就有一道上谕说：“近数年以来，内外臣工条奏旗丁不法者不下数百纸。”可见其流弊之甚。下面节录几段这类“条奏”以示一斑。

如一只粮船从装载粮食到运至通州，即须经过不知多少道税卡或非分的勒索，只是这一项剥削就要几百两银子：

“以臣所闻，弁丁有水次之苦，有过淮之苦，有抵通之苦。何谓水次之苦？其一为买帮陋习。帮有高低，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穷必欠。当检运时，富弁行贿买帮，费至二三百金，……此一苦也。其一为小次陋规。卫丁当承运时，有卫官、帮官常例，……名目数十，难以枚举。……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又一苦也”。①

“运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剥削所致，如开兑之时，粮道发给钱粮，任意扣克，……而运丁之都司，监兑之通判，又多诛求；及至启行，沿途武弁借催趱为名百计需索。”②

剥削的严重，有时竟使劳作者装载的粮食运不到目的地，原

① 王命岳《论漕弊疏》，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下称《文编》）卷四十六。
② 《东华录》雍正朝；雍正四年闰四月谕户部。

领的运费就全部用光。回空时甚至绝粒，只好变卖自己的东西。

“即如赣州帮素称殷实，而其穷彻骨。临至河西务剥米（按即水浅处须换用小驳船分载，雇用驳船的费用须由原来的大船负担）之时，米已上船，而剥价不能开发，千总代为挪移，始免误公。回空则身工饭米全无，无所不卖。……各帮情形，大概皆然。”①

“臣奉旨催漕，留心体访，数年以来，回漕船回空冻阻，……破产不足，益以儿女，苦累难言，深可悯恻。”② 东西卖光，就要连自己的儿女都得出卖。

“盖以屯丁领运漕粮，冬出冬归，过湖过江过河，殚劳涉险，备极艰苦。……水手亦赤贫穷汉，一年每名止得身银六两，撑驾挽拽，泥水风雨，使尽筋力。”③ 经济的剥削之外，在劳动强度上也是备极艰苦的。

充当水手的大都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一类的“赤贫穷汉”，“况粮船水手甚多，皆系好勇斗狠之徒，声应气从，亦易齐心生事”④。面对上述那些严重的情况，水手们是不会缄默的。因此秘密结社，以保卫自己的利益并和官方进行斗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他们的这种结社就是利用了原来官方在各地的粮帮组织建立起来的，名称也照旧。凡是原来属于各粮帮的成员，都有资格加入这种秘密的结社。

这种结社据说最早是由安庆地方的粮帮开始的，后来才逐渐

---

① 杨锡绂《论漕弊与各省粮道书》，见《文编》卷四十六。

② 李绂《请截漕运 》，见《文编》卷四十七。

③ 林起龙《请宽粮船盘浩疏》，见《文编》卷四十六。

④ 觉罗永德《查获罗教人犯先行恭折奏闻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下称《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5号。

普遍于其他粮帮。⑤ 按安庆府是个重要产米地区，当时共辖 6 个县，有粮帮 16 个，由这个地方的粮帮首先组织起来自然是很可能的，出现这种结社的时间大约不会晚于雍正初年。因为现在能查到的档案资料中，有关查禁水手中的秘密结社的案卷最早的是雍正五年至七年（1727——1729 年）⑥

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大约到嘉庆年间，安庆府的粮帮水手们又在原来粮帮组织之外，独立地成立了一种秘密结社，名字叫做“安庆道友会”，简称“安庆道友”、“安庆帮”、“庆帮”。这是一个较前此利用地方粮帮组织所建立的秘密结社更为健全的结社。它的组织内部情况今天已经不易确知了，我们只能从某些史籍中的片断记录，参比清帮“通草”中的有关资料，略为窥见其大概。

如他们的首领不再叫守备、千总一类的官称，而叫做当家、师父、老头、前人。他们编造了一套“道统”，拉来一些不一定相干的人当做祖师，甚至把佛教的历代祖师也排列进去，而且煞有介事地说他们是佛教临济宗的支派，后来清帮有个别称叫做“临济会”就是这样来的，加入安庆道友会的还依进来的先后分成 24 个辈次，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理大通悟学”⑦。他们还在水手们聚居或歇宿的地方，如靠近河岸的庵堂里，也有的在船上，摆设成一种“佛堂”式的场所，设上香案，供上祖师牌位（详后），他们称做“香堂”，摆设香堂的这条船就称为

---

⑤ “通草”内多有所谓“家谱”及“一百二十八帮半领帮当家”一类记载，详列粮帮秘密结社初期所有当家姓名、别号、籍贯、帮头、辈次、师承关系以及粮船名称等，似尚有所依据，可知当时食帮大都有这种结社。

⑥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中有雍正五年李卫、张大有，六年张大有，陈明夏，七年费金吾、史贻直等人的奏折。

⑦ 青海还有所谓后 24 个字辈：“万象扳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续寨普门开放普照乾坤”，但这是晚近的清帮分子所定，未及按此排辈，清帮即行消灭。

“泰子船”、“老堂船”、“将军舟”、“太平舟”。订立了一些条规守则，如“帮规十戒”、“十禁”等经常奉行。编造了一套仪节，加入的人要在香堂里举行一些类似宗教洗礼的形式。还发明了许多隐语、手式、暗号做为帮内人秘密交通的标志，他们叫做“切口”、“令子”等等。这套东西越到后来自然是越复杂的。

安庆道友会的产生是清帮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安庆道友会还不等于整个清帮早期组织，而只能看做清帮早期组织的一个典型代表。安庆道友会成立之后的若干年中，原来地方性的粮帮秘密结社陆续联合到这个新的组织中去，它的声势也就日益壮大起来。大约到光绪年间，各地粮帮秘密结社（据说共有 128 帮半）才被它所统一。

适应统一的需要。名称也随之改变。“安庆道友会”改为“安清道友会”或“安清道义会”，它的简称“安庆帮”、“庆帮”也就相应地改为“安清帮”、“清帮”，还有称“清门”的，“庆”改变“清”显然是音变而来，但也含有“清朝”或“大清”的意义。至于象一些“通草”里说的，他们所以称为“清帮”或“清门”是由于帮内的 24 个行辈（“清净道德……）里“清”字居首之故（《安庆粗成》主此说）；或说是“清门”一词来自乾隆时王伦的“清水教”（《清门考源》主此说），这纯属附会。按“安清”一词和“扶清”、“助清”的意义相同，清帮的由“安庆”而“安清”也犹义和团的由“反清”而“扶清”、“助清”的转变过程。这是一般民间秘密结社和秘密宗教的通例，当他们的组织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想从非法而取得合法。最早使用“清帮”名称的记载始于清末，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查探徐怀礼报告》：“向来枭贩有清帮、圈帮两种，清即安清道友。”① 其时正是清帮的盛大发展时期。

---

①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 3 册。

“清帮”又何以称为“青帮”，首先还是由于同音代替之故，也可能是与在它以前出现而又长期并存着的“洪门”又称“红帮”的一种相对的称谓，即“青帮——红帮”，简称则是“青红帮”，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从粮帮的秘密结社时期就曾自称为“青皮”，这个词在许多档案资料里都见过，如道光十六年（1836年）色卜墨额在《严查回空粮船水手拿获自号青皮拦路截船滋事之缘由》中所说：“又淮署督臣林则徐咨开奉上谕御史刘梦兰奏，粮路积惯匪徒，号为青皮；……既有犷悍性成之水手，又有积惯为匪之青皮。”① 道光年间“自号青皮”，光、宣年间就自号“清帮”了。按“青皮”一词有闯将、英雄好汉的意思，与民间所谓的“青头楞”或“三青子”为同义词。这个词经过清帮的使用流行很广泛，不只在文献资料里使用，文学作品里也使用，连鲁迅先生也曾谈过青皮问题。“清帮”一词的出现不晚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朱家宝在《奏请以鄂蜀之例罚办皖省青红帮》中说：“昔青红各帮会匪，雄地蔑有，历为巨患，虽节经查拿惩办不敢稍宽，而蕴孽有本，根株迄今未能尽绝。”②

“安庆帮”、“安清帮”、“青帮”、“清门”等名称分别于各个历史时期出现之后，并非递次取代，而是同时并用，即使是最早的“安庆帮”一词，到出现“青帮”称谓之后，仍有某些地方的帮头在使用。路滨生在《中国黑幕大观》中说：“又有所谓‘潘氏兄弟’者，……在北有‘江湖东号’，在南有青帮、安庆帮等。”③ 这个事实从各帮头所编印的“通草”名称也可看出。如：《安庆粗成》、《安清仪规》、《清门考源》、《青帮通漕汇海》等等。

在“青帮”这面旗帜下的统一，自然不会是真正的统一，而

---

①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13号。

② 《录副奏折》卷二九六七。

③ 《中国黑幕大观》初集卷上《党会之黑幕》第3页，1918版。

是各地粮帮组织仍旧相对保持其独立性。这除了从上举的“通草”名称可以看出其混乱的情况外，各“通草”的内容出入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其派系、师承、切口、令子等，大半都是为了尊大自己，区别于其他而任意捏造的。这也就是清帮分子直到晚近仍是既有帮头又有辈次以代表其身分的原因。举例说，如上海清帮头子黄金荣的清帮身分就是“兴武六帮头通字辈”。其实清帮与粮米帮组织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这些帮头、辈次的意义，晚近的清帮分子根本是莫名其妙的。

至于清帮早期组织究竟创始自何人？最初，在出现安庆道友会名称之前的清帮早期组织，就是在官方粮帮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各帮水手的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名称，因此很难说是创自何人。但在所有的清帮“通草”中，在提到清帮源流时，都无例外地说它是创自清康熙或雍正或乾隆年间的翁、钱、潘三个人。而且不仅说他们创立了清帮，还说由他们“领帮匡漕”，似乎清初的漕运制度就是由翁、钱、潘三人所创兴。各种“通草”还一律说清帮的“家庙”在杭州武林门外（“家庙”是指翁、钱、潘传教时所建的庵堂）。翁、钱、潘各建过一个庵堂，有一种“通草”的名称就叫《三庵宝鉴》。各种“通草”还一律说翁、钱、潘三人的师父姓陆，陆的师父就是罗祖教的创教祖师罗祖，罗祖的师父姓金。清帮中的香堂里所供牌位各帮头并不统一，大致都是“天地君亲师”、“四海龙王”、“老官师父”、“金罗陆祖”、“翁钱潘祖”……。但必不可少的就是“翁钱潘祖之灵位”。翁、钱、潘三人以潘为主，清帮内向来有一种规矩，就是彼此称为“潘氏弟兄”。有一种帮头里还规定帮内人彼此问姓什么时，不能直接说出自己的本姓，而要答以：“在家（即帮内）姓潘，出外姓×（本姓）。”另一种帮头规定要答以：“头顶潘，本姓×”。看来翁、钱、潘三人创立清帮早期组织之说，还可能是有所依据的。

按翁、钱、潘三人实有其人，许多有关查禁水手中信奉罗教

的档案资料中都曾提到，比较详细的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闽浙总督崔应阶的《拿获罗教各庵人朱光辉等审拟事》：

“杭州府北新关外拱宸桥地方向为粮船停泊之所，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教。……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事，此水手皈教之由来也。……其各庵借寓之水手亦不尽归罗教之人，而每年平安回次，则各出银五分，置购香烛素供，在庵酬神。向来守庵之人是日念经数卷，其水手中归教念经者亦即随之如守庵之人，不会念经则惟与水手人等焚香礼拜，别无夜聚晓散及煽惑民人之事。此现在朱光辉等二十二庵信从罗教容留水手之情形也。”①

这通奏折所记，把清帮早期组织与罗教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白。水手与罗教的遇合是偶然的，而且最初只是在杭州一地，也没有什么翁、钱、潘“领帮匪漕”的事。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清帮是罗教的一个支派，从这通奏折也可予以澄清。

这里就是要根据这通奏折所记，参比清帮内部的一些传说，试图对于清帮的创始人问题，得到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第一，翁、钱、潘三人在杭州布道建庵是事实，他们传的是罗祖教，教徒内有水手。第二，罗祖教在联系和团结水手方面起过良好作用，翁、钱、潘也有可能曾把教徒组织起来，成为一种宗教性的团体。官方为了控制水手们的活动，曾借查禁罗祖教的名义对水手们施加过压力。第三，奏折里并没提到翁、钱、潘曾建立过清帮早期组织（自然是指出现安庆道友会之前的），但也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譬如从以罗祖教为联系纽带的宗教性团体转化为水手们的秘密结

①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7号

社。第四，如果翁、钱、潘确曾建立过清帮早期组织，则传说中的在康熙或雍正年间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不可能晚至乾隆年间。总之，从官方的记载来印证，清帮内部的关于翁、钱、潘创立清帮的传说，除个别地方不够确切尚需存疑外，基本上是可信的。

二、清帮早期组织的互助活动和反抗斗争

粮帮的水手们自己秘密地组织起来，其最初的目的就是保卫自己的利益，针对官方的盘剥、欺凌进行抗争。他们彼此很团结，小则是在生活上、工作上互相帮助，大则聚众闹事。不论是官私文献还是清帮的“通草”，所记都体现了他们的这种精神。

如在杭州为了解决水手们回空时的食宿问题就自己成立了一些庵堂，有的是利用原来的庙宇，有的是新建，庵外还有耕地，收获即归守庵人用度；还有义冢，水手死后就葬在那里；年老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还可以进庵养老。

“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亡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现在住庵之人，皆供系年老有病，不能为水手，遂住庵管守。”①

“伊等闲空歇业，因各堂不取房租，只收饭钱，皆贪图省便，到堂住宿。”②

“……该庵遂为水手已业。更因不敷居住，醵资分建至数十庵之多。庵外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③

水手们的团结互助还表现在他们运输漕粮时，是采用的“包运”制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水手们的职业得到保证（但包运

①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5号

② 《彰宝折》见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15期。

③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5号

制度是一种严酷的剥削制度，危害性也很大，详后）。如有时水手犯了错误被革或被通缉，他们就彼此收容或庇护。

“［水手］经千总请革、请缉，而守备听其革于此船仍入彼船，革于此帮仍入别帮。如此舵役包运之弊，奚由禁戢？”①

关于他们的这种患难与共的作风，直到出现了“安庆道友会”这个名字以后，文献上仍然能见到寓褒于贬性质的记载。如下面这段文字就是记录咸丰年间安庆道友会的情况的。

“以先入者为长辈，次入者为幼辈。已及五七辈。辈不知若干人，均以口号字第为凭，随地联络。所至不携分文，可行居处饮食。遇事群起应之，口号所通，趋救立至，不必素相识也。”②

由于官方对水手们的浮收过重，他们就联合起来要求增加运费：

“伊等知州县浮收有加五、六［成］之多，遂得借口多索。运弁、奸丁连成一气。州县惟恐误兑，不能不受其刁勒，是以帮费竟有递增至五六百两、七八百两者（按原只一二百两），而苏松为尤甚。”③

闹得更激烈些的话，就是进行请愿（官方称为“告漕”）或暴动（官方称为“哄仓”或“鼓噪”），因为规模很大，有时将那些统治者们弄得焦头烂额，叹嗟不置。

“丁船借此需索兑费，为数甚巨。……更有挟州县浮勒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众哄仓。”④

“……稍有不随意，甚至纠众凌官。如漕臣周卜世所题‘吴江鼓噪’一案，岂惟民膏吮尽，抑且国体大伤。漕事至此，尚可言

---

① 杨锡绂《论漕弊与各省粮道书》，见《文编》卷四十六。

② 陈锦《勤余文牍》卷一。

③ 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见《文编》卷四十六。

④ 胡林翼：《革除漕务积弊并减定漕章密疏》，见葛士濬《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下称《续编》）卷三十。

哉!"⑤

道光年间，清帮早期组织出现两种形式，一种在船上，一种在岸上。他们都常与地方上的游民无产者（官方称为"游帮匪徒"）以及地方下层小吏联合一起与官方作对。

"帮内之巢穴即老官师傅盘踞之船，名为老堂船，藏有经卷神像，传徒敛钱，挟制旗丁，与游帮匪徒表里为奸，实为帮中之害。……其沿途之巢穴，皆由沿河集镇捕役河快素与水手声气相通，其间亦有老安（庵）、潘安（庵）等教之人混迹充当，与水手游匪互相勾结，从中取利，而水手青皮亦恃为护符。地方官查拿匪徒，不能不责成河快捕役，是欲其查拿而反被纵扬，更为帮中之隐患，尤宜严禁。"⑥

清帮早期组织有时还联合"绿林英雄"（官方称为"无赖亡命徒党"）进行起义。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临清王伦起义时，就曾借重过漕运水手的力量：

"［王伦］往来山东，号召无赖亡命徒党日众，……［八月二十六日］连陷堂邑，陷阳谷，皆劫掠弃城遁，分趋临清、东昌，图阻运道，众数千。"⑦

"［九月］十一日探知回空粮船自九月初六日挽进闸河者，俱日夜遄行。……其于临清经过之船，并有迫胁短纤随行者，是以贼匪聚集日众。"⑧

"［九月十三日］回空粮船已过临清者六十八帮，计船三千四百余艘，其余多在临清以北。"⑨

"［九月十四日］回空粮船阻桥闸，［官兵］不得进，贼反胁

---

⑤ 王命岳《论漕弊疏》，见《文编》卷四十六。

⑥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16号。

⑦ 魏源《圣武记》卷八。

⑧ 《录副奏折》卷一八九一。

⑨ 《录副奏折》卷一八九四。

纤夫以攻城，又束粮船为浮桥。图北渡"。[10]

由于王伦和粮帮水手有这样一段过程，所以后来在清帮中就传说王伦也是他们的老辈"前人"之一。如在著名的清帮"通草"《清门考源》的作者初版《自序》中就提到"清水教（白莲教支派）王伦在山东与诸秘密会党共同树旗反清失败之后"，"各埠粮米帮统行归并，清门弟子由此日增"，而且还证明清帮（清门）的名称来源与清水教是有关系的。[11]

又如嘉庆初年安徽巢县以水手为业的白莲教首方荣升在长江下游各省传教，并酝酿起义，嘉庆二十年（1815年）事泄被捕牺牲。有关这件史实的记载[12]并未发现它与清原早期组织有关，但在《清门考源》中也把方荣升列在"家谱"之中，说他是"兴武四帮头来字辈"的"前人"。[13]

与此同时，著名太平军后期领袖之一、西捻首领张宗禹，由于他曾在河北、山东交界的运河地段与清军有过激烈战斗，最后牺牲在这里，因此也可能与漕运水手有过配合。尽管有关记载[14]语焉不详，但《清门考源》也把他列入"家谱"，说他是"镇前帮头性字辈"的"前人"。[15]

甚至还有一些从历史记载上看与漕运和水手不可能有关的农民起义领袖，如嘉庆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的四川农民军领袖冷天禄、冉文元，河南滑县清茶门（白莲教支派）起义领袖王

---

⑩ 《圣武记》卷八

⑪ 陈国屏《清门考源》，上海道德善堂1937年版，《自序》（初版）。

⑫ 嘉庆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上谕，见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四册434页。又吴之英《圆教始末及其经卷》，见《人文月刊》第八卷第五期，引杨绩《祉庵日记》及百龄《除邪纪略》。

⑬ 《清门考源》第202页。

⑭ 参阅《国朝事略·皖豫寇蜡》；《清史稿·李鸿章传》；《山东军光事略》卷九。

⑮ 《清门考源》第202页。

正纪等，也被说成是粮帮出身的英雄人物而列入清帮“家谱⑯”。但也有从历史记载上看与清帮早期组织极可能有关的起义，而其领袖人物却未被列入清帮“家谱”的。如咸丰十年（1860年）捻军进入山东后，以水手刘双印、孙化祥为首的“幅军”，分别在峄县云谷山、岐山建寨起义，配合了捻军的行动，并曾攻克邹县⑰。水手们参加起义原因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漕运被迫改由海道，原来的水手为了生计问题，不得不铤而走险。

“江苏徐、海、邳、宿、山东郯、兰、滕、峄之民，随漕逐末，及游手好闲挽舟佣食者累计数万。恒以匹布分幅帕头，私相雄长，阴有曲部。……［咸丰］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⑱

“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而为贼。捻逆滋扰，淮、颍、徐、宿之人居多。往年贼党繁滋，未始非漕运羁阻，激而为此也。”⑲

另一则材料更明确地指出参加太平军和捻军队伍的是“安清道友”，并指出这种组织的分子加入义军的只有一部分，还有的是零星地流于社会的。

“［道光年间］……而犷悍游食之徒萌糵其间，所谓青皮党安清道友者，引类呼群，恃众把持，成固结不可解之势。迨发，捻事起，此辈潜入其中。南北荡平，消磨殆尽。虽阛阓市镇尚有此等名目，然无大渊薮以容之，偶或什伍成群，良有司足以治之

---

⑯ 《清门考源》第201页。

⑰ 参阅佚名《山东军兴事略》卷十七；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第20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⑱ 《山东军兴事略》卷十七。

⑲ 丁显：《请复河运乌言》，见《续编》卷四十一。

矣。”[20]

上引这些有关漕运水手参加起义活动的记载，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有的注明是安庆道友会所为；有的泛指为“贼党”、“贼匪”、“奸丁”所为；有的可能与漕运水手有关，有的不可能有关；有的载入清帮“通草”中的“家谱”，有的没有。因此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记载中，除确知其与漕运水手根本无关的之外，不论其载入“家谱”与否，都可视做以安庆道友会为代表的清帮早期组织所为。理由是：这些记载既然都是漕运水手或与之有关的起义活动，这些起义就都不可能是没有组织的，因为他们动辄以千万人计。而当时漕运水手中的秘密结社之风甚炽，所谓“各立教门，多收门徒，结为死党”，“结党成群”，“贼党繁滋”，安庆道友会则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以安庆道友会这类组织的性质来看，如果说它们在这些起义活动中没有起过作用，那倒是不可思议的事。

三、清帮早期组织的破坏活动

清帮早期组织的活动，除了上述的团结、互助、斗争以至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的一方面之外，它还具有另一重性格，即破坏以至罪恶、反动的方面。

第一，不论清帮早期组织的目的是怎样地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利益终归是狭隘的利益，而他们的天职却还是为那些统治者去运输“皇粮”，这就在客观上起了“资敌”的作用，自然这与较它稍早出现的天地会一类的反清革命组织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正如1921年谭人凤以革命会党的立场向北京政府所上呈文中所说：“清帮起于漕运，船桅高张‘天庚正供’旗号，乃残吾民以资

[20] 沈葆桢《漕项无从划拨海运难以议分疏》，见《续编》卷四十。

寇粮者，呜呼视为同道！”① 因此，清帮一类的组织我们只能把它视为一种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而不能称他们为革命团体。在晚近时期中，清帮在各种反动派的支持和纵容下，转变成为非作歹的社会流氓集团，最后发展为特务、汉奸组织，实际就是滥觞于此的。

第二，清帮早期组织没有严格的纪律，组织很涣散；更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行动很盲目。有时固然可以做出好事来，但有时就尽做坏事。这些坏事即使有的也能算是一种自发的斗争，也应属于消极手段。如《大清会典》中在记述漕运水手的情况时就说他们：

“盗卖糟米，渗水和沙，或私带客货，冒渡关津，或扰害民船，强横生事，或行船越次，以避稽查，或中途并载，脱船私归。……”②

更其是关于群殴斗狠，行劫为非，扰害居民，以及他们在生活上的任意花销、吸毒、聚赌等的记载更多，称为安庆道友会时期，表现较前尤为突出：

“数年前浙江、湖广粮船因怀挟私忿，彼此争斗，持戈放箭，杀伤者多。逞其凶顽，肆行无忌。又闻前岁之冬，粮船守冻在山东地方，竟行抢夺，扰害居民。去岁回空，又闻强取百姓衣物，此等皆大干法纪。”③

“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窃或盗，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

① 见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大清会典》卷十三《漕运》。

③ 《畿辅通志》卷二《诏谕二》。

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④

“安庆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劫为非，声气甚广。”⑤

这样就把他们自己闹得很被动，官吏们“每言及运丁，无不切齿”！⑥ 对待水手中的案犯总是“严加究审”、“从重处治”、“尽法从严究办”、“以昭炯戒”。如道光十六年（1836年）直隶总督琦善奏报：“自五月底至八月下旬，共计获犯五百余名。”大约同一时间，漕运总督恩特亨额奏报：“本年在直隶、山东、江苏境内先后弋获不下四、五百人。”大约同一时间，两江总督陶澍也奏报：“饬获凶恶水手王七，当在清江浦恭请王命正法。……尚有阎大汉等数十名、……郭蕴得等三名，……张茂富等四十余人，现饬讯质严办，期无枉纵。”⑦ 一方面如此严厉地镇压，一方面一再加强雇用水手时的查选点验，甚至规定每船“水手十人，由运军雇募；令十船互保，有滋事不法者，连坐”⑧ 的办法。所有这些，都使得水手们的许多正确行动，也就因此受到很大局限。

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些消极行为，就使得本来是纯朴的劳动人民，做了官家的水手，入了帮之后，就渐染了许多恶劣习惯。这些恶劣习惯，他们一直带在身上，直到晚近时期清帮成了反动的社会流氓集团，他们依然使用这套伎俩去危害社会，危害革命。

第三，清帮前身组织中那些“当家”、“老头”一类人物，大都是坏得透顶的。他们利用在帮里的地位，往往形成一种“把头”，与官方一气地剥削压榨水手。如前引杨锡绂的奏折里就提到

---

④ 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1876年6月15日）《申报》，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944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⑤ 陈锦《与琴岩论善后余事书》。

⑥ 姚文田《论漕弊疏》，见《文编》卷四十六。

⑦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14、16、17号。

⑧ 《大清会典》卷十三《漕运》。

"舵役包运之弊"。他们向官家包下任务之后，再用低价去雇用水手，从中渔利。雍正七年《刑部咨文》[①] 里也记录着江淮卫七帮的把头孟有德雇用水手时只给工银3两，而他却从官方按6两具领，其他向水手的需索尚不在内。除了经济的盘剥之外，还有人身的凌虐，他们的"香堂"同时还是私立的公堂，里面有"家法"即私刑，那些老头们可以随意动用。在那篇《咨文》里还记录着嘉庆帮的刘把式指使他的徒侄赵玉，借口一件小事对孟有德船上的水手严会生动用私刑，把他的左耳割掉。《咨文》里评论道：各帮水手结党后，"一切任其'教主'（老头）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刘把式倡教惑众，赵玉藐法纵虐，孟有德附党作恶，均属恶徒，风不可长。"可见这种把头的凶恶嘴脸。这种风气同样一直保留下来。即在后来清帮的"通草"里也还是十分强调这种"家法"制度。请看下面的三首诗：

"家法森严鬼神惊，乾隆钦赐棍一根。汝既犯法当责打，下次再犯火烧身"。

"法师堂上把令行，手执家法不容情。谁人如把帮规犯，不论老少照样行"。

"祖传帮规十大条，越理反教法不饶。今天当堂遭警戒，若再犯法上铁锚。"[②]

真是好不厉害！这就无怪乎晚近的清帮老头一类人物仍是动辄非刑拷打其徒众了。例如抗战胜利后在天津充双议成脚行把头号称"四霸天"的清帮头子王家保兄弟四人，即曾因工人抗议其剥削工资达90%且常拖欠的事，而"将工人刘保玉、杨老、姚明寿、崔小冬、赵天斌、大群等六名，手足捆绑，倒悬马棚，鞭棍交加，神魂数绝。经工人亲属再三跪求，何二说项，立誓悔改，始

① 《史贻直折》《附录刑部咨文》，见《史料旬刊》第2期。

② 《清门考源》第179页。

释绑饶命。③显然这仍是雍正年间刘把式一类人物“捆缚烧炙，截耳割筋”的遗风所被。

但这里必须指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把头并不一定都是纯粹的劳动人民，他们有的本身就是那些漕运系统中或地方上的下层统治者或其爪牙，有的则是被官方收买过去的水手。在光绪初年安庆道友会超越漕运范围向一般社会发展时，这种情况更甚：

“[安庆道友]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痒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④

我们从“通草”里的“前人题名录”、“同道题名录”、“近代家里知闻录”等之中所列举的数千个老头一类人物的名单，也可看出这个事实，因为其中有10%左右为粮帮时代的守备、千总、武举、文牍等等。民国以后，也就是他们正式以清帮名义开始盛大发展的时候，则更由上层招揽。同样是从那些“录”中，我们还可看到著名的军阀官僚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江朝宗、袁克文、姜桂题、杨宇霆、陈调元、王占元、张之江等等，就都同时也是清帮的著名老头子。⑤即使是原为一般清帮分子的，做了老头之后，也莫不竞向上层趋附。一个清帮老头如果没有军阀、反动派、帝国主义者或者地方的军政首脑当做后台的事是不可能的。现代史上为大家所熟知的例子就是上海清帮头目杜月笙，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起，他们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与戴笠结拜为兄弟，最后在蒋介石的提掖和帝国主义的扶持下，竟

---

③ 天津市运输公司《脚行典型调查·双议成脚行》，见李世瑜辑《天津市脚行资料》第28页，1958年抄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④ 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申报》。

⑤ “通草”内“前人题名录”之类的名单，列得最多的当推《清门考源》，《青帮通漕汇海》（北京正礼堂1944年印），《三庵宝鉴》（天津1932年印），《学道须知》1932年印）。仅此四书即有约3700余人，吴佩孚等人名字均见于其中。

至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党国要人”。当然这些都应是清帮后期历史范围内的事了，这里提出来，不过是想更有力地说明：我们研究清帮问题时，那些老头们的行径，是要与一般帮内分子严格界别的。

小　结

综上所述，可知清帮早期组织乃是清代漕运水手的一种行会性的秘密结社。这种结社的产生不晚于雍正初年。初创于安庆府的粮帮。清帮中传说，其创始人是翁、钱、潘三人，基本上是可信的。当时并没有自己的名称，嘉、道之后一度称为安庆道友会，“青帮”这个名称大约是光绪年间定下来的。其组织形式初以官方的粮帮组织为基础，渐后乃渐趋复杂；赖有“通草”的留传，这套组织形式得以保存至于晚近的清帮之中。

清帮前身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卫水手们的利益。他们很讲团结、义气，除了在生活上、工作上彼此互助之外，有时还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官府进行斗争，以至举行起义。但他们并未因此得到什么便宜，招来的反而是更为残酷的压迫。更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本身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他们的组织很不健全，斗争目标很不明确，水手们的某些消极行动构成了他们的许多罪恶，再加上一些原为下层官吏或由劳动人民蜕变而成的把头人物的操纵把持，因此清帮在它的早期组织时代就是一种在主观上依附封建统治者、在客观上维护了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流氓无产者的结社。当他们的发展超越了漕运范围之后，更迅速地堕落为无恶不作的更为反动的社会集团，以至成了为各种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反革命反人民的重要工具。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清帮的源流及其演变

姜豪

解放前，我在上海从事社会活动多年，与清帮会中人素有交往，1936年，投拜“大”字辈汪禹丞门下，正式参加清帮组织。八·一三日军侵沪时，汪避居香港，不久逝世。另一“大”字辈张仁奎，抗战期间在沪病故，其在重庆的门徒为之做忌辰时，代收门徒10人，名为“灵前孝祖”，我也是其中之一，因我已拜过师，称之为“过房”。对于清帮的产生及其演变，现就搜集所得资料及亲历所知，草成此篇，供史家参考，并请指正。

一、清帮的“前三祖”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清帮组织，实际上是在清朝雍正初年为了承运漕粮而形成的，但帮中人却把其历史渊源，推前到明朝，以明永乐朝的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为其第一代祖师。

金幼孜号碧峰，祖籍应天府（南京）麒麟门外三十里金家堡，生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明洪武时中进士。先在北京燕王朱棣前任职，后随军南下，负责都督粮台。燕王在南京正位后，任工部左侍郎，永乐间迁都北京，改任文渊阁大学士。及成祖亲征辽东，金奉命都督粮运，不久辽东平定，随成祖凯旋回朝。当时他看到仕途险恶，厌弃红尘，衷心仰慕达摩，因此上表辞官，隐居栖霞山紫云洞修炼。后又转至五台山求戒，拜佛门禅宗临济派

三十六传鹅头禅师为师，取名清源，从此在紫霞洞隐修，数年后去世。这就是清帮以达摩为始祖，把金幼孜尊为第一代祖师的来历。

第二代祖师是罗清，号净清，甘肃兰州府渭清县东乡罗家庄人。17岁时考中明嘉靖恩科举人，后赐进士出身，擢任监察御史及户部侍郎。吐鲁番犯边时，嘉靖帝任为阃外都督，领兵直抵番边。传说血战后不幸被困于两狼山下，粮尽三天，杀马充饥，忽来一和尚相告，寺后石崖下有本朝清源禅师北征时所储藏的粮食，往取果如其言。全军饱餐后次日出击番营，斩了番将，一直追到番都，番主出降，表示以后永不叛明，罗接受降书，大获全胜而回。归途中经过五台山，访求清源禅师遗迹，由北寺方丈恨修禅师指引，从佛龛中取出金幼孜的经典遗物，并悉嘉靖曾封金为护国禅师。罗深受感动，即由恨修领至金的塔下，拜金为师，后人在师父生后拜师，称为“灵前孝祖”，就是起源于此。后来罗被严嵩父子暗害，入狱12年，万历年间由于边事需要，把他释放，但他立了功不愿受禄，乃至栖霞山紫云洞金幼孜修炼处修道，在那里终了一生。

第三代祖师陆逵，号道元，江苏镇江府丹徒人，自幼学武，精于技击，当过江右总兵。明亡后隐居茅山。后慕罗清征番定回之功及其能通满、蒙、回、藏语言文字之能，又为佛教禅宗嫡系，因此到五台山求道。清初云游到新疆、甘肃一带，看到回民与汉人由于宗教不同而争执械斗，就向清廷条陈用宗教感化之策，为康熙嘉纳，授以西北宣化法师名号，赴西北宣化，订立“回汉约法”，规定回汉人民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各守其制，两不相犯。回京复命后，康熙大喜，议授以官，他却乞归学道，就封他为靖国尊人，并加封其师罗清为一清佛祖。晚年陆在杭州武林门外宝华山刘氏庵内讲经说法，听者甚众，殁于雍正七年（1729年）。

以上金、罗、陆三人，帮中人奉为“前三祖”，都与佛教禅宗

有渊源，所以后来的清帮组织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二、清帮的“后三祖”及其与漕运的关系

清帮的真正祖师，起自陆逵的徒弟翁岩、钱坚、潘清三人，即所谓“后三祖”。

翁岩字福亭，号德慧，江苏常熟人，祖居山东东昌府聊城县，其后迁居河南南阳府。出身秀才，后弃文向河南嵩山少林寺僧习武，喜与绿林好汉交往，并入天地会，为会务奔走四方，到处为家，性情刚毅，不善词令。

钱坚字福斋，号德正，江苏武进人，迁居安徽徽州府。为人精明勇敢，幼从父经商，移居开封。16岁父母双亡，无心继承父业，改习拳术，入天地会，与翁岩同隶张岳部下，张是天地会中的首领。

潘清字清宇，号德林，浙江杭州人，先移住安庆，后又迁居河南开封。承父母余荫，富有财产，幼年读书，颇以诗词歌赋自豪，武艺亦佳。为人勇义，好交游，地方上以“小孟尝”称之。翁岩、钱坚二人奉张岳之命，到安徽访潘，三人都是天地会道友，一见如故，结拜为异姓兄弟。

三人结拜后，一起出门访求志同道合的人，乃至杭州陆逵处听讲，对陆非常敬服，要求投拜门下，陆见三人学道心诚，同意收为弟子。雍正三年，清政府悬榜招贤，加强漕运，他们意图以粮帮为基础，组织一个大团体，乃至河南抚署揭榜承运。其时抚台田文镜是杭州人，三人向其条陈了整顿漕运办法，田与漕督同上奏本，经雍正批准，指定归漕运总督张大有节制，并听命于勘视河工的钦差大臣何国宗指挥，准许开帮收徒，以之统一粮务。他们接受任务后，先在开封潘清家中招集各地天地会头目就商，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赞助，并联络旧有粮帮，统一了粮帮组织，推翁、

钱、潘三人为首领，组成了一个“道友会”，供奉达摩为始祖，金幼孜为第一代祖师，罗清为第二代祖师，陆逵为第三代祖师。

他们开办粮运，首先设厂造船，统一尺寸，绘成图样，亲自监工督造，传说共造9999只半（所谓“无半不成帮”，半只是脚划子）。第二步是协助清廷开办浚河工程，动员山东民夫16.5万人，用银110万两，开浚河道，打通了南北水运。布置完成，乃大开香堂，广收门徒，翁君按八仙之数收8名，钱坚按二十八宿之数收28名，潘清按三十六天罡之数收36名，三人按七十二地煞之数共收72人。此后徒弟又收徒弟，从而清帮组织扩大起来。

清帮建立承运漕粮后，翁等三人向陆逵请示，陆以祖传24字的字派相授，作为传统的帮内“家谱”。此24字就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无（又作悟）学（又作觉）”。其中，“清净道”三字是在粮帮未成立前使用的，从“德”字起立帮，所以实际上前三字是教派，从第四字起才是帮派。立帮后徒子徒孙越来越多，原来的24字怕不够用，乃由王德降（即王降祖，帮中称为小祖师）续订24个字，就是“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明乾坤”。解放以前，上海以“大通无学”四字辈居多，而以大字辈为最高。传说后24字也已开始用到，但究竟用到哪一个字无从查考。

清帮建立后，在杭州武林门外宝华山建立“家庙”及12座“家庵”（翁、钱、潘的高徒12人家庵），承运漕粮事务所就设在家庙内，并公议订立了十大帮规、香堂仪式、孝祖规则、十禁十戒、家法礼节等等规则。此后翁、钱二人至青海、蒙古去朝佛，再无音讯，帮务由潘清一人主持。至雍正十三年潘在黄河大风事故中身亡，帮务由王德降继任。

清乾隆年间，白莲教中人王伦，见粮帮势力雄厚，乃与帮中人交结，并自立“清门教”，于乾隆三十九年在山东起义反清，一度发展至数万人，但结果失败被斩，至此清廷严厉查拿一切秘密

会党，不过事实上秘密组织依然存在。嘉庆五年，八卦教刘子协、宋之清继起举义，游击清军于川、湘、鄂、豫、陕、甘各地，不久也以失败被杀。其后，山东金丹八卦教主林清和河南八封教主李文成联合反清，林清并贿太监高广福、刘金二人为内应，事败，预伏于城外黄村的林清被捕杀。李文成原在滑县城外的关帝庙邀集主教 36 人议事，被捕囚禁于滑县城内。附近教徒闻变，顿时集合近万人，其中也有清帮人员，攻占了县城，杀死知县，救出李文成，但最后义军失败，李文成纵火自焚而死。乾隆年间，粮帮本来是公开组织的，但自清门教、八卦教等相继起义反清，其中人员牵涉到粮帮，因之粮帮也在严禁之列，稍涉嫌疑，就难免杀身之祸，由是销声匿迹，转入秘密活动。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粮运复盛，北方粮船大多为清廷服务，南方粮船大多被太平军改为水师，杭州的家庙祠堂被乱军所毁，至此清帮势力消灭几尽。太平天国失败后，漕运废除，粮帮裁撤，不过清帮组织仍旧流传于社会。

三、粮帮的组织

粮帮的具体组织，以粮船为主体，有一定制度，凡是粮船所到之处，就有统一的组织。传说其组织及粮船数目如下：江苏省 21 帮，派船 1638 只；浙江省 21 帮，派船 1538 只；江西、两广 19 帮，派船 1492 只；湖南省 18 帮，派船 1386 只；安徽省 16 帮，派船 1258 只；江苏省松江府 9 帮，派船 686 只；河南省 9 帮，派船 702 只；直隶 1 帮，派船 187 只；桐船麻包 4 帮，派船 310 只；山东 10 帮半，派船 800 零半只。以上合共 128 帮半，粮船 9999 只半。此外传说还有乾隆御赐小祖师半帮，不在正帮之内。

关于运粮船只的分类，类似船队，各指定装粮地点、交粮地点、收粮户名以及船上所用旗号、标帜等等，都有详细规定。其

类别名称有江淮四（在江苏21帮内）、兴武四（在松江9帮内）、嘉兴卫（在浙江21帮内）、武昌卫（在湖南18帮内）、南昌卫（在江西两广19帮内）等34项。

四、拜师手续和帮规

清帮成员间是师徒关系。入帮手续，第一步是“记名”，由记名人请求介绍人（不问字派，都可作介绍）代投“小帖”，俟本师同意，乃择期开“记名小香堂”，投正式拜帖，上过小香，就是记名弟子。再上大香，才算正式弟子，从此有了“开法领众”（首次收徒）的资格。

拜师须投拜师帖，上开三代履历及本人年龄、籍贯、职业，亲向本师呈递，这就是拜师凭证，不得抵赖。

香堂分大小2种，具体的讲，可分5种：

（一）临时小香，这是最简便的，不论香堂大小、记名人数多寡，可以随时随地举行，只要用香烛一份，上供三家祖师牌位一座，行礼如仪就行。

（二）正式小香，组织略具规模，须有引进、传道两师在场，依照规定仪式举行。

（三）正式大香堂，组织规模宏大，布置庄严，执事人员也多，乃为帮中大典。

（四）特别大香堂，其组织与正式大香堂略同，所异者多设几炉香，多供几位祖师，多下几次参礼，多用几位执事，多唱几次歌词。

（五）特别满堂香，组织更扩大，极尽铺张之能事。

香堂执事计有12个名称：一、当家师（收徒者自任）；二、讲经师（传道师兼任）；三、陪堂师（引进师兼任）；四、执法师；五、护法师；六、巡堂师；七、执堂师；八、散香师；九、抱香师；十、

福德师；十一、知客师；十二、站堂师。

香堂上拜祖，名曰“参祖”。小香堂有四海龙王的灵位、天地君亲的灵位以及翁、钱、潘三位祖师爷的灵位。大香堂的牌位有达摩始祖、历代佛祖、慧可祖师、弘忍祖师、僧璨祖师、道信祖师、慧能祖师、金祖、罗祖、陈祖、林祖、陆祖、翁祖、钱祖、潘祖以及三家历代过方前人。香堂横幅用“义气千秋”四字，对联一副，上联为“安清不分远和近”，下联为“三祖传留到如今”。

清帮组织严密，规则完备，主要有：

（一）十大帮规：不准欺师灭祖；不准藐视前人；不准扒灰倒笼；不准奸盗邪淫；不准江湖乱道；不准引法代跳；不准扰乱帮规；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弱。

（二）十禁：不准拜二师；父子不准同一师；师死不准再拜师；关山门不准重开；徒不收不准师收；兄弟字派有高低；本帮与本帮引进；师过方代师收徒；在道不准诽谤道；香头低不准爬高。

（三）十戒：万恶淫乱；截路行凶；偷盗财物；邪言咒语；讼棍害人；毒药害生；假正欺人；聚众欺寡；倚大欺小；烟酒骂人。

（四）十要：孝顺父母；热心做事；尊敬长上；兄宽弟忍；夫妇和顺；和睦乡里；交友有信；正心修身；时行方便；济老怜贫。

（五）传道十条：遵法律；孝双亲；敬神明；习正道；保身体；善改过；立品行；慎言语；务正业；戒嗜好。

（六）家法十条：在翁、钱、潘三人领导时期，由于帮内组织严密，虽有家法刑杖，很少使用。其后潘清得意门徒石士贤肇事潜逃，乃订家法十条，并以香板为刑杖。清乾隆帝南巡时，在金山寺皈依佛门后，化装到杭州，看了清帮家庙及粮帮公所，认为王德降管理有方，传谕嘉奖，并钦赐龙棍一条，上写“违犯帮律，打死无罪”字样，以为帮中镇山法宝，以后凡遇重大事故，即以此棍责罚。家法十条如下：

（1）初次犯帮规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

定香在臂上烧“犯规”二字，并加斥革。如犯叛逆罪，捆在铁锚上烧死。

（2）初次忤逆双亲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胸前烧“不孝”二字，并加斥革。如犯逆伦罪，捆在铁锚上烧死。

（3）初次不遵师训，妄言妄行者，轻者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顽民”二字，斥革。

（4）初次不敬长上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不敬”二字，斥革。

（5）初次以长上资格侵占帮中老少所有财产物件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强夺”二字，斥革。

（6）初次殴打帮中老少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强暴”二字，斥革。

（7）初次违国法所禁不道德之事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重大罪时，用定香在臂上烧“莠民”二字，斥革。

（8）初次诽谤仙、佛、菩萨以及一切宗教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妄为”二字，斥革。

（9）初次不务正业，专事敲诈、逞凶斗殴，不受规劝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无义”二字，斥革。

（10）初次犯奸盗邪淫，而伪造虚构、诬栽，殃及帮中老少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无耻”二字，斥革。

五、上海清帮人物

清门字派，分为24个班辈，从金幼孜算起，是清字辈（号清

源），第二代罗清是净字辈（号净清），第三代陆逵是道字辈（号道元）以上三人实为教派祖师。从第四代起，成立粮帮承运漕粮，开创者翁岩（号德慧）、钱坚（号德正）、潘清（号德林）三人，是德字辈。此后一直流传下来，到抗战前后，上海方面还有几个大字辈，其下通字辈较多。现就笔者所知，列举如下：

大字辈：

高士奎，山东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做过直隶水警厅长，后来住在上海，收徒甚众，其中马祥生、杨仁铨等较有社会地位。

汪禹丞，安徽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时，任总统府卫队长，又在淞沪警察厅及申报馆任职多年，在洪门是五行山山主，抗战期间在香港病故。

袁克文，号寒云，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次子，在上海老牌小报《晶报》上写稿，因此他所收门徒以文艺戏剧界较多，如俞逸芬、金碧艳等。

樊瑾成，安徽人，历史情况不清楚，是张啸林的老头子，在上海由张供养。据说张得发后不愿樊再收徒弟，所以他所收之徒不多。

张树声，江苏人，绰号“天王老子”，又是理教头子，所收徒弟以京剧演员为多，20年代去世。抗战期间在重庆另有个大字辈张树声，是北方人，西北军中人物，收徒甚众，以交通运输界为多。

王德邻，安徽人，原是军人，后在上海经商，所收门徒甚众，如金廷荪、高鑫宝、顾嘉棠等。

步章五，别号林屋山人，河南项城人，据说当过袁世凯幕僚，到上海先在中国济生会干过扶乩活动，后来挂牌做中医，并办过小报《大报》，写些鸳鸯蝴蝶派的小品文，又喜写评剧稿，吹捧女演员，所以他除收无聊文人为徒外，又收女演员为义女。

张仁奎，号镜湖，山东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过通海镇

守使（驻南通），后居上海，收徒数百人，其组织名仁社，成员中颇多旧军政人员及工商企业负责人，抗战期间在上海病故。

仁社形式上是个俱乐部，地点在现延安路重庆路附近的一所二开间三层楼的西式建筑内，经常有人在内吃喝玩乐。其中人员有陈世昌、黄金荣、张竹平、孙以乡、姜怀素、汪英宾、徐逸民、杨虎、周思忠、吕苍岩、杨德钊、庄铸九、夏奇峰、时寿彰、陈铭枢、韩复榘、范绍增、孙连仲、黄绍竑、韦作民、董显光、蒋鼎文、孙桐萱、杨庆山、金月波、徐亮、葛福田、曹志功、姜豪等。

徐朗西，号峪云，陕西人，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参加同盟会，从事过辛亥革命活动，担任过军事方面的职务，北伐后因对蒋介石不满，没有担任国民党政府职务，在上海创办新华艺专，自任校长。所收门徒，以知识分子居多，解放后在沪病故。他在洪门是峪云山山主。

刘登阶，江苏人，具体情况不清楚，是顾竹轩的老头子，因顾而出名，生活由顾供养。

通字辈：

金九龄，江苏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探长，兼开人力车行，解放前去台湾，在台开浴室，大概在1980年前病死。

马祥生，江苏人，贩卖烟土的八股党之一，开设金门大戏院（现儿童艺术剧场），解放后被镇压。

陈世昌，江苏人，张仁奎徒弟，是杜月笙的老头子，杜得发后由杜供养。

金廷荪，浙江人，抗战前因杜月笙关系承办航空奖券。

高鑫宝，王德邻徒弟，解放前是丽都花园（现市政协所在地）的经理，八股党之一。

臧步祥，南京人，公共租界巡捕房探员（包打听），开设大中华饭店。上海沦陷期间其子与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有关系。

季云卿，曹幼珊门徒，在长江帮中有一定势力，抗战时期汪伪沪西七十六号特务组织成立时，由他支持，特务头子李士群、吴世宝都是他的徒弟，后被暗杀。

顾嘉棠，上海人，贩烟土起家，八股党之一，原来是花匠，黄金荣得力助手，四·一二反革命活动中搞共进会。

顾竹轩，江苏人，以出租人力车起家，刘登阶徒弟，与虞洽卿的关系较深，后为天蟾舞台经理，解放前是上海市参议员。

郑子良，广东人，在广东帮内收徒弟甚多，抗战期间因军统关系参加忠义救国军，解放后被镇压。

王彬彦，江苏人，闸北区商界重要人物，区保卫团负责人。

吕苍岩，江苏人，大业公司经理。

周思忠，江苏人，中国旅行社副总经理。

徐逸民，广东人，著名西医，广收门徒，其组织名逸社，在洪门是五行山山主。

汪英宾，安徽人，汪禹丞之子，留美学新闻，曾任申报馆经理、时事新报馆总经理。

姜怀素，江苏人，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执委兼书记长、上海义务警察副总队长，也收徒弟，解放后被镇压。

孙以乡，安徽人，阜丰面粉厂高级职员，在沪西收徒甚众，其组织名怡社。

张竹平，江苏人，抗战前大陆报、时事新报、申时电讯社、大晚报设有四社总管理处，他是负责人，抗战期间在香港开设大华饭店，后至重庆办百龄餐厅，抗战胜利后回香港办大华饭店，后在港病故。

曹立功，安徽人，曾任上海市商会秘书、上海市卫生局药政处长、西药业同业公会主任秘书，解放前病故。

徐学禹，浙江人，招商局总经理，解放前去台湾，近况不明。

唐季珊，广东人，大茶商，与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有过同居

关系，后阮自杀。解放前唐在上海，以后情况不明。

孙百群，安徽人，阜丰面粉厂经理。

庄叔遐，江苏人，曾任国民党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秘书长、国货银行总经理，解放后病故。

杨虎，又名啸天，安徽人，曾任淞沪警备司令及中华海员工会主任委员等职，解放后在北京病故，所收门徒甚多，其组织名兴中学会，所收徒弟以海员为多，但也收国民党方面的军政人员。

程俊观，江苏人，江海银行总经理，解放初在沪，以后情况不明。

黄金荣，江苏人，法租界巡捕房探长，贩烟土起家，所收门徒甚众，原来以巡捕房人员及流氓居多，后来发展到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及其他方面，其门徒组织名荣社。

解放前荣社主要负责人为黄振世、陈培德等。黄振世在十六铺称霸于渔业，是渔业银行的负责人，又是市参议员。陈培德原在浦东英美烟草公司搞工会，后在黄色总工会内有一定地位，抗战胜利后自办大德印刷所，也是市参议员。

董显光，浙江人，上海英文大陆报负责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郑希涛，浙江人，曾任时事新报馆经理。

肖宗俊，广东人，曾任新新公司总经理。

葛福田，江苏人，抗战前曾从事马路商界联合会活动，抗战期间在重庆办百龄餐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金谷饭店总经理、江海银行经理等职，解放前病故。

卢友兰，哈同妻罗迦陵的义子。

韦作民，浙江人，在交通技术界资历很深，抗战期间任交通部技监，抗战胜利后病故。他是张仁奎的门徒，与另一仁社中人张彬人（浙江人）合办文社，所收门徒以交通运输业人员为多。

文社设在上海，主要负责人为陶一珊、王徵君、王庆年等。陶

一珊是军统人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上海解放前数月改任民政局长，解放前夕去台湾。王微君原是三青团人员，抗战胜利后任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干事，陶一珊调任民政局长时当该局主任秘书，陶离沪时王负责局务，解放后负责办理移交工作，由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留用为专员，其后离沪赴香港。

张啸林，樊瑾丞徒弟，生于浙江慈溪县，20岁时移居杭州，先进机房学织绸，不久进武备学校，结识了张载扬，后拜杭州衙门探目李休堂为师，从事流氓活动。旋到上海拜樊瑾丞为师，从此大收门徒。北伐前张载扬当浙江省长，张啸林通过他的关系勾结浙江督军卢永祥，又因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原是卢永祥的部下，又搭上了何丰林的关系，依仗这些关系，贩运烟土，与黄金荣、杜月笙结拜为兄弟，成为上海流氓中“三大亨”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们共同搞“中华共进会”反共，此后踏上政治舞台，并担任工商界职务。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充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张在日本特务指使下，搞“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军收购军需物资。1939年与日特暗谋成立浙江省伪政府，张自任省长，国民党特务暗杀未成，但因此不敢出任省长伪职。1940年8月14日被其保镖林怀部所杀。

姜豪，上海市宝山县人，抗战前后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上海市参议员等职。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老闸区区长，现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无（悟）字辈：

杜月笙，上海市浦东高桥人，陈世昌的徒弟，年轻时在十六铺做水果小贩，后来结识了黄金荣，替黄跑腿贩运烟土，从此青云直上，成为上海“三大亨”之一，而且他的势力还超过黄金荣、张啸林二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为国民党反共有功，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进而插足工商企业，成为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各方面爱国人士合组上海市各

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以上海地方协会会长身份参加该会，并为该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与黄炎培、王晓籁、钱新之、潘公展、张寿镛、柯干臣等共同主持会务。上海沦陷后，他先至香港，后转重庆。在香港和重庆期间，直接参与指挥国民党方面在上海的秘密组织统一委员会等工作，并与军统头子戴笠合作，搞“对敌物资交换”，与沦陷区做生意。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通过门徒，控制了上海市商会和黄色工会等组织，并与CC合作，控制了上海市参议会，左右上海地方行政。

杜月笙善于使用软硬兼施和广事交结的多面手法。他和蒋介石表面上关系密切，但在历次反蒋运动中他同时拉拢反蒋派系。1930年四五月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我是改组派上海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也去过北平，陈公博布置我回上海配合杜月笙进行反蒋军事活动，说杜已准备好三师人响应石友三在浦口的反蒋兵变。临行时陈公博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杜月笙，叫我回上海面交，可是我回上海时石兵变失败，就没有去见杜月笙，由此可见杜的两面派手法。

杜月笙广收门徒，其组织名为恒社，成员遍及各行各业，其中有些原来就有相当社会地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上海负责工商团体工作的骆清华、王先青，负责工会工作的陆京士、水祥云都是恒社人员。在工商业方面，杜月笙充当了许多工商企业单位的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而且安排几个儿子和得力门徒充当各该企业的经理、副经理，掌握实权。在新闻界方面，杜月笙本人是申、新两报的董事，加之报人唐世昌、赵君豪、金雄白等也是恒社中人，因之可以左右上海舆论，当时恒社在上海各方面的影响是很广泛的。

无（悟）字辈清帮人员为数众多，社会影响很大。按理讲，通字辈人员所收的门徒都是无（悟）字辈，但严格地讲，不一定都是有辈份的。因为收徒分“徒弟”和“学生”二种，收“徒弟”是

清帮关系，拜师父只能拜一人。收“学生”、拜“先生”的性质不同，拜“先生”同时可以拜几个人。当时与帮会有关的各团体成员中，有的是“拜老头子”（即师父），有的拜“先生”，所以有的有清帮辈份，有的没有清帮辈份。

还有几个人的字辈不清楚，但在社会上有一定势力，如：

谢葆生，苏州人，驴夫出身，后到上海，开设卡德浴室、卡德旅馆和仙乐斯舞厅，他和汉奸陈群关系密切，曾任伪江苏省警察厅长。

陆连奎，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督察长，与汉奸常玉清关系密切，抗战初被暗杀。

卢文英，女，绰号卢老七，上海市宝山县人，专搞花会赌博，被称为花会大王，收徒甚众。

徐铁珊，浙江绍兴人，在上海同文书院读过书，以后在山西警务学校当过翻译教师，敌伪时大收日本浪人为徒。

六、清帮对上海社会的影响

清帮对社会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评价。由于创立粮帮的翁岩、钱坚、潘清三人原来都是天地会中人，天地会是洪门中的一个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翁岩等为清政府运粮，在政治上起了安定清朝统治的作用，违背了洪门宗旨，所以洪门中人认为清帮是洪门的叛徒。但清帮中人却说，他们开帮收徒积蓄力量，也是为了反清复明。不过在翁、钱、潘三人开帮运粮时期，并没有反对清政府的活动，直到后来才有清帮中人参加各地的反清起义。到了辛亥革命前后，清、洪二门中有不少人响应孙中山号召，加入革命行列，作出了贡献。

清帮对于上海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利用帮会、流氓势力，作为殖民统治的爪牙，例如帝国主义

运来大量鸦片，就是利用流氓主要是清帮中人推销的。此外，帮会与流氓合流，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为非作歹，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恶势力。

上海的帮会人物，原来只在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下层活动，而且拜师传徒大都秘密进行。但自蒋介石利用上海帮会、流氓势力，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少帮会中人、流氓头子登上政治舞台，纷纷公开组织团体，各立门户，扩充势力，在某些场合形成政帮合一，气焰不可一世，在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中，都有深刻的影响，直到解放后才肃清。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所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

薛畊莘

解放前，我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20多年，跟不少帮会人士以及大小流氓打过交道，现回忆一些情况，择要介绍。

一、几个有名的帮首

近代清帮的最高辈份是“大”字辈。上海地区仅有数人，大都社会地位不高，默默无闻，只有张仁奎，字镜湖，北洋军阀时，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3万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学各色人等。凡拜张做“老头子”的，均有“通”字辈资格。张晚年住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宛园。黄金荣、陈世昌（杜月笙的老头子）、夏奇峰（曾任外交部长）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张仁奎在南通时与清末状元张謇（张季直）关系密切。当年张状元请郁启生老伯委托笔者先父薛仲江向英国购买纱厂机器后，在南通设宴庆功，被邀参加者，有先父及郁启生和张仁奎。后来张仁奎得悉我是薛仲江之子，曾邀我及公共租界捕房高级警官刘绍奎、张元清及三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的经理等，至宛园聚餐饭后，他个别对我说：“你是我老友之子，看到你高升（当时我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我很高兴。但在抗战乱世时期，我有一句话劝告你，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切记切记。”我一直认为这句忠告，是值得深思，作为座右铭的。

近代上海地区洪帮声望较高的是陕西徐朗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同乡、知友），当时住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天文台路一座法式小洋房内。

洪帮势力范围本在长江中游，特别是宜昌、汉口、大别山一带。他们兄弟间见面第一句暗号是“同饮长江水”。后来西南各省军阀贩卖鸦片（特别是川土、云土），用轮船把烟土从重庆运到上海，即雇洪帮头目沿途保护，船到上海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再交上海清帮黄金荣、杜月笙集团接运。船上的服务员及码头上运货的小工头，绝大多数是洪帮成员，由于利害关系，相互依赖，无形中清洪两帮混成一体。

通过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特高处副处长姚笃伯（即饶恕，也是帮会大哥）介绍，我与徐朗西认识，并且经常往来。徐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过贡献，所以解放后受到宽待，可见中共是不忘老友的。

二、郑家木桥小瘪三的来历

当年上海开辟外侨居留民地时，法国人选择的范围是沿上海城脚，从小东门外滩向西的地区，认为地近上海县城，市面较热闹，向北则有护城河，与英租界分界。这个护城河，又名“洋泾浜”，后以垃圾填平为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当时老北门外的护城河上有一座桥，称为“郑家木桥”。桥南属法租界老北门大街，桥北属英租界福建路，又称石路。因为当时福建人开设的桂圆及檀香店多集中此地，故取名福建路。

浦东南汇、奉贤等县农民摇小木船，装载豆萁、稻柴等到桥边出售，一些小瘪三（无赖小流氓的俗称）云集在桥堍，遇有老实农民船户，即挑衅敲诈勒索。若被害人高声呼唤，英租界巡捕过来干涉，则逃至桥南，法租界巡捕过来干涉，则逃至桥北。因

为桥南北分属英法两租界，形同二国，在英租界犯了罪，到法租界就不管，反之亦然。这样就被坏分子钻了空子，由此，上海旧社会流行着一句话："当心郑家木桥小瘪三"，成为上海人民群众当心吃亏的口头禅。

有的小商贩，每天都要摇船经过此地，为了免遭麻烦，就主动向其中的强有力者行贿，请其出面保护，随后进一步发展拜小瘪三中强者为老头子，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地方恶势力，有的依靠两租界捕房便衣探员，变成了流氓集团的头子。

三、黄金荣与法捕房

黄金荣，苏州书画店裱画出身，高小文化程度，约在1900年前后来沪。初到沪时，流落在郑家木桥一带当小瘪三。最先结识了南汇县农民出身、摇柴船的丁顺华和程子卿。丁谙拳术；程绰号"黑皮子卿"，镇江人，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从小掮米，握力很强，后入法捕房当巡捕，最后升为政治部督察长，先后有37年之久。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清帮弟兄，黄老大、丁老二、程老三。

法租界当局为了收拾这批郑家木桥小瘪三，用以毒攻毒的办法，雇用黄金荣为刑事科便衣探员（俗称包打听）。黄就把大部小瘪三收为徒弟，加以掌握，作为向法捕房立功的资本。通过黄的关系，程、丁两人也先后进了法捕房当巡捕。黄利用这些条件，确实破获了一些盗窃案件，逐渐擢升为探长，在那时洋人统治的上海租界，这个探长的地位是了不起的。

黄在法租界依靠刑事科长夏才立（Chazel）的势力，开始在上海社会上有了声望。北洋军阀时期，他结交了浙江督军卢永祥和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卢的亲信），合作贩运鸦片。黄通过留法回沪的张一枢，与法捕房总巡费沃利上尉（CapitaineFiori）勾结，初是

半公开地在东新桥宝裕里销售鸦片，其货源由何丰林管辖下的高昌庙海军兵舰由汉口运来。后黄又通过其同产弟兄陈世昌，与马祥生、金廷荪、高鑫宝等挂钩，由汉口直接运到了上海太古码头，公开在法租界兴办烟赌事业。在东新桥宝裕里、霞飞路嵩山路宝康里设烟馆，在福煦路181号（今延安中路卢湾区妇科医院）、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褚家桥申吉里和东新桥宝裕里第一弄内开赌场。由于黄的飞黄腾达，上海清帮的势力随之而起，使他成为上海第一号“闻人”。据程子卿告知我，杨虎、梅兰芳均列其门墙，共收南北徒弟数万人。他60岁做寿时，徒弟们集巨资在漕河泾建造了一座黄家花园，以资纪念，解放后改为桂林公园。

黄金荣与魏廷荣为了争夺舞台美女吕美玉，发生矛盾，结果吕嫁与魏。当时魏是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其岳父朱葆三是买办巨商兼上海商会会长，为英法二租界当局所倚重。有此种种关系，魏当然不肯买黄的帐，不独夺得了美人，而且向法国外交部控告黄的种种劣迹，使黄被迫辞去法捕房探长职务。当时祸不单行，黄又与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为名演员露兰春事，发生冲突，受到打击，加上其他因素，从此黄在上海地位逐渐削弱，杜月笙后来居上。

魏、黄之争，后来牵涉到法租界上的绅董派与大流氓之间的明争暗斗。论实力，黄派在法租界势力超过魏廷荣，不过恶势力树敌太多，引起公愤，尤其是上海天主教上层人物，都支持魏。同时，留法人物徐文才及朱孔嘉（法公董局华董，南市水电公司重要董事）之弟朱孔祥通过法侨谭斯脱（Destes）出面，办了一张法文日报，取名《真理报》（LaVeriét），集中火力，抨击法租界内公开经营的烟赌业，矛头指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流氓闻人，特别指出黄是依靠法租界关系起家的。此报一出，轰动一时，引起法国外交部的重视。适在这时，魏又多次向法政府控告黄“广收徒弟，招摇撞骗，开设烟赌，危害居民”等，特别指出在平

济利路（今济南路）法藏寺外面空地上，为法捕房刑事科长夏才拉庆祝六十寿辰，大摆酒宴，向万余商民收寿礼，招摇生事。在此多方控诉下，巴黎当局召回上海总领事葛格霖（Koeclin），询问租界上流氓与烟赌等情况。

所控事实，经法政府查实，乃将捕房总监费沃利上尉撤职，调回法国，改由法伯尔中校（L. Fabrer）继任，并任职业外交官饶伯泽（Jobez）为副总监，严禁烟赌，大杀流氓气焰。从此，黄便收敛锋芒。听说，解放前夕，因梅兰芳的忠告，他掩护了一些革命民主人士，得以立功赎罪，故在镇反时，获得人民政府宽大处理，终身管制在家善终。

四、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关系

1939年，我被擢升为外籍待遇的特级督察长后，通过程子卿的关系，每周至少一次被邀到法租界东新桥民国路（今人民路）口的逍遥池浴室洗澡。黄叫茶房头阿五，特备亨牌雪茄烟、茄立克香烟及特制的中西名点招待。在逍遥池特别间内，黄曾多次对我谈他同杜月笙的关系。他说："我因受苏州同乡陈世昌的推荐，在法租界开办的烟赌事业中，起用了杜月笙，这是大家所晓得的。开始时，他叫我黄老伯。北伐军胜利到上海，四·一二清党前不久，蒋介石来上海，在龙华机场上，我亲自把杜月笙介绍给蒋介石（蒋在上海交易所时，由虞洽卿介绍与我认识），当时在场的，有警备司令杨虎、该司令部秘书长陈群、法捕房的程子卿。蒋介石对我和杜说：'将来有些重要工作，还希望借重你们！'清党后，我的徒弟陈培德，杜的徒弟陆京士、周学湘等，成为上海工会的头子。但陈的办事能力远不及陆等，杜又在推销国民政府公债方面发挥了作用，他的声望远胜于我。从此以后，杜在电话里，不叫我黄老伯，而改口为金荣哥了，我感到真不是味道！"

但黄平时常托程子卿带口信给我，要求我对杜的先生陈世昌（住法租界西爱咸斯路金神父路）特别关照，我认为他很重江湖义气。总之，由于黄的关系，杜才能从一个水果贩变成烟赌老板，后又与国民党挂上了钩，青云直上，对黄不如过去尊重，这也是事实。正如上海流氓中一句成语说的："弟兄之间，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

五、我和杜月笙的交往

1930年，上海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1000余名工人，要求适当增加工资，资方不同意。在徐阿梅领导下，工人发动罢工，长达一个多月，资方企图收买徐阿梅，遭拒绝。当时法捕房总巡找杜月笙说，如果不能帮助解决工潮，我将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俟工潮平息后，再考虑重新开禁问题。杜即找罢工领袖徐阿梅，表示愿收他为徒，并每月津贴他300元。徐不从，杜乃重金收买法捕房政治处法国探目马慕雅（Marmorat）、翻译陆殷栋（后改名为陆昭化）及华探目范广珍（军统潜伏人员）、赵子柏（于右任学生）等，共同策划，事先由范仿制印有煽动性内容的共产党传单数百张（由范向公馆马路即现金陵东路高生大纸号代印），在某天晚上由马慕雅率领程子卿、朱良弼、范广珍等30余人，到徐阿梅家搜查，硬把传单塞入徐的卧室内，即将徐押解法租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按国民政府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提起公诉。

法租界当局一向只承认南京政府的《中华民国刑法》，不承认特种刑事条例，而这次竟破例引用，该法院按煽动罢工事件，判徐徒刑10年。事后，张福宝、石全福等人拜杜为师，领导法商工会，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

以后，法捕房总监法伯尔，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事业，杜月笙

企图通过留法工程师张一枢拉法件尔下水，并派人送去一副“金台面”（宴会餐具全套，2000 两金子造的）。法伯尔除严拒外，还要杜在上海申、新二大报上刊登启事，说明送礼的错误，并保证不再做类似的事，否则要把杜逐出法租界。

这件霹雳大事，影响大流氓的前途，杜即利用他的徒弟赵志英（法商水电公司抄表间组长）及沈静彝，鼓动车务部 2000 人罢工，声势浩大，时间长达二个多月，所有上海法租界内电车均告停驶，严重影响了法租界的交通和治安。

捕房开警务会议时，我与曹炳生二人也参加。我当时提出：“法伯尔中校莅任后，取消了烟赌二大害，受到全上海中国居民的赞赏，有口皆碑，但上海自中英鸦片战争开辟商埠以来，华洋杂居，良莠不齐，尤其是租界情况十分复杂，流氓恶霸十分猖獗，如果对他们采取的手法太严，可能引起反感，甚至于派徒弟到处扔手榴弹，做坏事，妨害治安，巴黎方面看到这种情况，有损捕房的威信，为此，我建议先限杜月笙 24 小时内写书面向您道歉认错，不再做类似事情，如果杜照办，总监的威信更高，事情也可圆满解决。”法伯尔接受我的建议。我告知了杜，他欣然接受，即通知赵志英停止罢工斗争，并自那时起，每月给我银洋 300 元，后增加到 500 元。

事后，赵、沈二人被法国资方开除，由杜收养在家中。1940 年我到香港去访杜时，杜指派赵代为接待。

1934 年，宋子良同上海维也纳舞厅张姓舞女发生关系，怀了孕，女方向宋要求一笔 10 万元津贴，宋不允，双方纠缠不休。宋请杜处理，杜在法租界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厦召见该舞女，她一到即被四保镖劫持，用汽车送到吴淞口外，连同胎儿一并葬身大海，俗称“种荷花”。

1936 年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重新处理顾竹轩杀死大世界经理唐嘉鹏案时，风闻这件舞女被害事，曾亲自调查，得知一切经

过内情。他将调查情形告知我，要我严守秘密，切勿外泄，因事关国民党政府重要人物宋家的事，法当局应请示巴黎政府，才可决定怎样进行法办。适值那时中日战兴，且不久法国在欧惨败，饶伯泽等均赴非洲参加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军，此事便不了了之。

六、张啸林的下场

张啸林，杭州人，浙江清帮通字辈，来上海后，与黄金荣、杜月笙拉上关系，在法租界华格臬路216号同杜共建有住宅。因为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属浙江督军卢永祥管辖，张是浙江人，在这个黄、杜、张“三大亨”合作的集团里，专门负责联络卢永祥与何丰林，勾结他们贩运烟土，黄、杜则专与法租界当局来往。

抗战初期，国民党方面曾动员张离开上海，张托词拒绝，后被击毙在华格臬路住宅的窗口。他被杀的主要原因，据悉是由于接受日伪委任，准备出任浙江省长。死前三天，他在愚园路岐山村54号岑德广家中，接受委任状，旋即被杀。杀他的凶手是他的保镖，又是其长子法尧（留法学生）奶妈的儿子，名林怀部（绰号王和尚）。整个计划是军统周伟龙派其上海行动组长陈默领导执行的。凶手枪法很好；当日因保镖与车夫在院内吵架，张从楼上窗口向下探望，子弹从口中进入，穿枕骨而出。吵架是一种故意的安排，引张伸首窗外看望时枪杀。次要的原因，是张企图借日伪势力，趁杜月笙不在上海，取代杜在上海的地位，故杜与戴笠商议，利用张将投敌的理由，可以名正言顺地“除奸”。

事发后，赵志游向法当局联系，认为凶手平时怀恨张啸林气量小，脾气大，为泄愤报复而杀他的。通过这种关系，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对该凶杀案断定为普通刑事案件，不牵涉政治问题，因此日伪无法插手干涉。赵志游的法国太太也对我说过这件事的内

幕。后来凶手被释，送往内地。

七、与法租界有关的其他帮会头目

除上述黄、杜、张之外，还有两位“江北大亨”金九龄与顾竹轩。顾又名顾四，与金均拜黄金荣为师，在公共租界福州路开设天蟾舞台，与虞洽卿为莫逆交。他曾在上海搞过多起谋杀凶案，据其亲信徒弟王兴高说，顾至少谋杀过7位有名望的人物，其中2人是律师。由于他有恶势力，竟能逍遥法外，并收徒弟1万余人，包括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顾、金二人都是苏北旅沪同乡会的首要人物。

顾竹轩与唐嘉鹏都是黄金荣的徒弟，为了争夺黄开设的大世界游艺场的经理职位，顾唆使其徒王兴高杀死了唐。事后，王被捕，判刑10年。起初讲定由顾负责王的家属一切开支，谁知过了三年，顾不按时付给，大有毁约之意。王趁饶伯泽参观马思南路监狱时，向饶伯泽密告此案内情（饶精通华语），揭发顾是唆使的主犯。经调查属实，恐顾神通广大，饶伯泽特亲自与公共租界总巡商量，不使两租界捕房便衣探员知道（因他们极大多数是黄、顾的徒弟），直接将顾拘捕，移解上海市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法办。顾的家属虽然用了许多金条，但在法捕房监视下，不得不判刑10年，关押在马思南路监狱。直至抗战开始，经顾祝同出面保释，始恢复自由。

抗战期间，顾对通过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运送到苏北新四军地区的药品等物，做了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

八、各类犯罪组织和违法活动

在帮会头目的指使、包庇和控制下，旧上海社会上有许多犯

罪组织，从事违法活动。如（一）扒窃组织。这个组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秘密集团，非局内首脑不知其详。1934年春，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居民家搜出一张名单，与扒窃者有牵连而每日接受津贴的捕房刑事科人员，公共租界有65人，法租界有27人，此92人均被两捕房开革。

实际上，英、法两租界的陆连奎、刘绍奎、金九龄、吕竹林、翁老四等都与该组织有关，是租界上华籍探目、探长放的“笼”。该组织有500余成员，分粗窃、细窃二种。细窃为特等扒手，7岁起就开始受训，分男女两组，其中的超级能手称“小少爷”。凡能升到小少爷地位的，要经常“出差”，调往南京、北京、太原、苏州、杭州、广州、汉口、香港等地，领导秘密行业的工作。

扒手们在上海活动地点，主要是车站、戏院、交通车辆、大百货公司、珠宝店、绸布店等场所，而且成员各有专长，扒窃到的财物，须存放三天之后才能处理。每天接头地点是法租界八仙桥菜场西首朝北的黄全茂酒店，时间为晚上8时至10时。有路子的人，可以依靠捕房人员前往该酒店领回被窃的东西。

据说该扒窃行业供奉《水浒传》上的时迁为祖师。内部组织极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即遭杀害。各地各道有单线联络，组织内部等级森严。抗战前，还有全国性总头目。此组织不同于清、洪两帮，其历史渊源更为久长，与“拐带”、“扎飞”等均属未入流的特殊行业。

（二）人口贩子。贩卖人口的流氓，在旧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专贩男孩者，暗语叫“搬石头”，专贩女孩者，暗语叫“摘桑叶”。

专贩男孩的后台是前海宁路汇司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身在清洪两帮，有徒弟2000余人，与虹口吴淞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一部人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的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养的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事业的大权给予继承，故绝大多数男

孩均被贩卖到广东去。尚武在我做黄浦分局长时，当过半年刑事探长，解放后被处极刑，这就是丧尽天良者的下场。

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前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清洪两帮，有徒弟5000余人。他们将在上海拐到的女孩，极大部分卖到北方地区。由于包庇贩卖人口发了财，尤阿根贿通外国人升任总探长。此人在1939年帮助日本宪兵队捕捉了10名苗族抗战分子。这10位苗族志士，英勇不屈，被刑致残，以身殉国；日军部尊称他们为“支那十勇士”，在江湾立碑，并派一队士兵向他们墓前致敬。尤阿根因此被军统陈默杀死在汉口路扬子饭店门口。

法租界上贩卖人口的总头目是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杜月笙的徒弟。任的后台是范浪打（Volenti），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出身，绰号叫“药罐头”，其意是任何事情，有钱都可解决，他的妻子是中国广东人。由于租界上有这些人作保镖，妓院里的女孩卖出买进，是无人敢干涉的。

此外，还有一种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者，称“国际护照贩”。当时旧中国天灾人祸，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民不聊生。浙江省青田一带，有不少青年农民擅长石刻，女的缠足，他们被用“贩黄鱼”的方法，通过澳门葡籍流氓，诱骗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干石刻劳动，女的被带到马赛、尼斯等地去表演“扭跳小脚舞”。马赛、尼斯两地是法国南部著名的风景区，别墅林立，为欧美资本家避暑游览胜地。所谓“贩黄鱼”，因中国人是黄色皮肤，属黄种，在运葡途中，万一死在船上，即被扔入大海，如鱼一般，因此贩卖中国人即叫“贩黄鱼”。

当时有一名陈鹤鸣者，温州人，杜月笙的门徒，勾结青田县政府、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二国邮船公司买办，并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卖人口的流氓，和旧中国派驻这两国的公使馆中的败类，诱骗中国青年出国，从中渔利，严重影响国体。

他们的方式，凡被骗者，每人发旧西服一套，但要付给陈鹤鸣旅费法币 450—500 元（当时值黄金数两），由陈包办，实际上，他并不购买船票，而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货舱里，每次每船最多 20 多人。船抵马赛港，由法国流氓接待，设法乘火车到葡京里斯本，由中国使馆人员接待，休息一时期，再签署“赴法游历证明”，可以在法国定居 3 个月。抵法国后，男的由当地流氓宣传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印章或人像，每枚可赚 5—25 法郎不等，3 个月中，除一切简单生活开支外，每人平均可余 5000 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3 个月约可余 8000—10000 法郎。3 个月期满回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纳 1500 法郎，称“树上开花”。这样来去循环不已，轮番前往法国，五六年后，有的混上个法国老婆带回国来。当时中国政府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欠付使馆经费，也赖此交易来维持生活。

这些农民，为要交付旅费，常出卖家乡房地产，甚至把妻子出租；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训练，并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照片。再者，因上船后不买票，旅费为陈吞没，因而上船后就藏在煤堆中，如遇海关人员搜查货船时间过长，常发生窒息闷死情况，尸体即葬身鱼腹。当时日本新闻记者专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于日本杂志以侮辱中国。

《申报》史量才先生曾为此事，在社论中揭发批评，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奉令彻查，并有南市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亲自协助，在南市王家码头将陈鹤鸣逮捕，移解法租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讯办，判刑 5 年。陈在沪的有关组织均破获，意、法二国邮船公司买办受到严重警告，青田县政府及上海市警察局护照股有关人员被撤职查办，到 1936 年，此案才告一段落。当时法租界承办此案的席能（法国人）和我受到嘉奖。为此，法总领事并曾写公函致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感谢文局长亲自协助破案。

另据当时加拿大皇后轮船公司买办夏君透露，陈鹤鸣被捕后供认，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三合会曾于1930—1936年间，贩运5万多男女青年至南美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对汕头流氓每诱出一个劳动力，即付100美元。我代表法捕房将此材料咨照文鸿恩局长转南京国民政府，事后未闻下落。

（三）走私贩子。长江“潜水鬼”均属洪帮，组织庞大，十分复杂。当时近法租界外滩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和平女神像（第一次欧战纪念碑）斜对面，有一“关记汽车运输公司”，白天甚少活动，清晨4时前，有小木船10余艘，从外国轮船上把进口漏税货物卸在和平神码头，由该公司卡车运至洋行仓库存放，每日有五六卡车之多，既有租界靠山，又有外国洋行保护，真是“双重保险”。该公司经理吴志龙，浦东人，拜黄金荣为师，同时加入洪帮，与长江帮潜水鬼有密切关系，靠水鬼把外轮扔入水底的货物，运上小木船。抗日战争时，部分外国侨民被日本军部强迫集中，吴经常邮寄物品给与他走私有关的外国人。胜利后，吴被这些外商推荐，当了杨树浦英商蛋行买办。从此走私的事由他的儿子吴小龙继任。吴志龙在十年动乱中身故。其子吴小龙，在镇反时判刑20年。

此外，抗战前，通过浙江沿海进入的走私物品，除就地销售外，也有经由装运水果、山货及水产等的船只进入上海的，主要商品是西药、高级化妆品、奢侈的生活用品等。其实在旧中国，最大的走私集团是四大家族勾结军统控制的缉私机构垄断了这个生意。抗战时，这样走私的舶来品，在上海法租界也可以买到。虽然走私的销售对象是全国性的，但上海法租界仍为主要集散地之一。国民党有些军政要员，利用职权，或通过空运及军舰，或以军用物资名义，进行大量的走私活动。有的则用搭股方式，或委托他人做生意，即使海关检察人员，遇到这类走私货物，也都不

予过问。

（四）烟毒。旧上海流行的毒品，有鸦片、白粉、红丸三种，以前两种为主。鸦片分四等："度土"一名"大土"，即由印度运来者，质最佳，价最昂，非一般人所能问津。"云土"，产于云南，为国产鸦片的上等品，是云南军阀强迫农民种植罂粟，通过走私，流毒全国；"川土"，主要产于四川、西康一带，是四川军阀的经济来源。"蒙疆土"，产于内蒙一带。蒙土又分二种，一为热河土，质较佳，汤玉麟督热时以此为其主要经济来源，一为绥远土，质较劣，但宜于制造白粉。

白粉用于制造海洛因及红丸，大都由日本浪人经军舰运入上海，由朝鲜人中的败类为中间商转销。这些人有日本领事裁判权保护，可以安然无恙。日本军阀利用白粉、红丸，一面毒害中国人民，一面则充作头山满领导的亡华机构黑龙会经费。

杜月笙依靠黄金荣与张啸林在上海法租界做鸦片生意有两个得力助手，即金廷荪与徐采丞。金因此大发其财，在今新乐路襄阳南路口建造巨宅（现为运输公司办事处），并兼任黄金大戏院经理。抗战前，一度由南京方面委为上海航空奖券大运公司经理，设在法租界老北门大街中汇大楼内。徐采丞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徐被任命为重庆政府上海直属通讯员，利用他与日本大使馆兴亚院坂田的关系，大唱"双簧"，在其高恩路寓所设置秘密电台，与重庆军政机关通讯联络。

金的徒弟楼银川和高鑫宝的徒弟吴世宝，在1930年前，负责从十六铺码头接运江轮由汉口、宜昌带到上海新开河的鸦片，再用汽车运到东新桥宝裕里及霞飞路宝康里潮州大埔帮人开设的"土行"，然后分销各地。

抗战时，清官僚盛宣怀的后裔盛幼庵，住法租界金神父路西爱咸斯路口（今瑞金二路永嘉路口）的大花园洋房内，以"宏济善堂"名义运销蒙疆土。实际上，他是受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控制，

用日机将内蒙古的鸦片大批运到南京，再交“宏济善堂”运销江南各地。盛在法租界的住宅，由日方要求租界当局派警保护。他把江南地区推销鸦片的买卖，交给蓝芑荪办理。蓝是广东大埔人，一贯做烟土生意，是杜月笙徒弟任文桢（法捕房外勤科督察长）的徒弟，专销南京、苏州、杭州、嘉兴一带。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他在岳阳路217号的大住宅，胜利初期由姜公美宪兵队长占据。除上述地区外，蓝芑荪还在南市九亩地一带开设“燕子窠”和“土行”，经营零售和批销。1942年（时法国已在欧洲战败），他与日本沪南宪兵队长杉原中佐勾结，每日上午11时到下午3时把烟土运进法租界销售。此外，还有严春堂，上海人，黄金荣徒弟，严潮生（绰号白马潮生），浦东人，陈世昌徒弟，都曾参加这些活动。

敌伪时期，上海最大的白粉贩子，有王永康、李筱宝、徐阿毛等人。王永康，拜褚民谊为义父，又有丁默村为其后台，故得承包当时上海的粪便，兼营白粉贩卖。李筱宝是伪警察局长卢英的徒弟。徐阿毛绰号“咸菜阿毛”，拜杜月笙为师，其毒品出售机关伪装得十分巧妙，设在大公寓的浴室水龙头内，共有两根管子，日本制造，一根出水，供洗浴用，另一根则装有白粉，揿动暗钮即有白粉喷出，外人不容易识破。他与公共租界捕房刑事科督察长陆连奎、刘绍奎及法租界的金九龄、吕竹林等均甚密切。

（五）赌窟。上海租界当局借口“补助和发展华人教育事业”，在本世纪20年代前后，先后在公共租界上，每年春秋二季举行赛马，还设立“明园跑狗场”；在法租界，成立“逸园跑狗场”和“回力球场”，都是变相的赌博，很多中产阶层人家被害得家破人亡。逸园跑狗场今改作文化广场，回力球场则改为卢湾区体育馆，化害人魔窟为有用场所，说明今昔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别。

20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也用同样借口，勾结租界中外头目，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俱乐部”，实际上是变相的赌场。串线人是留法学生张一枢（李石曾的学生，任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

当时最著名的赌场是福煦路181号、西藏南路褚家桥申吉里及浙江路东新桥宝裕里。三地的总经理是高鑫宝，每月给法捕房及会审公堂的职员以特殊津贴40—500元不等，按级别为标准。当时有个潮州帮三合会的头子郑子良，属洪帮，会员都谙拳术，曾与黄、杜接洽，要求每月津贴5000元，遭拒绝，因此常派人到以上地点投掷自制的香烟罐头手榴弹，造成伤亡。有时被赌场保镖捉住，用“种荷花”方式扔入吴淞口外海中灭迹。这样惨死的，每年有10多人，谁也不敢过问。法捕房也视若无睹，上海大小报噤若寒蝉，似乎都被收买了。

此外，尚有杜月笙的出窝弟兄马祥生，住法租界陶尔斐斯路10号，勾结南市西门一带的流氓“红脚阿胖”等，在两租界各处设“花会听筒”，以十二生肖为砝码，中者1元可得36元。很多劳动人民因受骗而弄得生活更苦，或酿成家庭纠纷，甚至自杀，为害匪浅。

抗战时上海沦陷后，静安寺以西是越界筑路地段，原来路面归租界捕房派警维持交通，两旁居民归中国当局管辖。上海沦陷后，中国当局随军撤出，无人管辖，外国报纸称之为“歹地”或“歹土”（BadLand）。大批汉奸歹徒云集该地，先后开设“六国饭店”、“绿宝俱乐部”等大赌场，由沪西大流氓潘三省、朱顺林、李筱宝、王永康等负责保护。后来又迁到南市九亩地。这些赌台老板都是广东潮州帮，聚赌抽头达4年之久。

（六）码头恶霸。上海开辟租界以后，沿黄浦江建立了很多外轮、沿海及内河轮船装卸货物的码头。码头上雇用的劳动力主要作搬运工作，俗称“码头小工”。

这些码头大多由外商经营，他们为便于管理，指派一些人做包工头。包工头本身都是流氓，多以洪帮为主。这些码头包工头，就是所谓码头霸首（主）。每件货物从船上搬至码头，或进仓库，轻者200斤，重的超过600斤，每件运费从法币1—2.5角不等。

他们不劳而获地抽取60%，真正卖力气的搬运工只得40%。这些小工都是临时雇用的，劳动强度高，体力消耗大，不论风雨寒暑，从事劳动，极易得病，或造成工伤、坠江等事故，他们的生命健康，毫无保障。

一个码头，忙时雇一二百人，把头的收入相当可观。为了便于管理，他们又雇用小工头，层层剥削、压迫。这些把头大都参加帮会，又有洋人和他们手下的“二鬼子”撑腰，小工们则是一盘散沙，无法与之对抗。

码头工人名义上可以得到40%的劳动报酬，实际上还要支付种种不合理的开销，逢年过节，或把头、小包工及其亲属婚丧喜庆，都要工人摊份送礼。这些码头霸主同属帮会，互通声气。只要一个帮会霸主不用，则其他码头也难立足。

这些把头，除残酷剥削工人外，还在码头上横行不法，欺诈老实旅客。例如码头是用木板铺成，他们将其中一、二块暗中改成活动板。这种活动板分弹性和抽板两种，旅客下船后，把行李放在码头上，稍一不慎，转瞬间行李即不翼而飞。原来有小偷潜伏在码头地板下，趁机把行李窃走。这些小偷都是码头霸主的徒弟，他们事后坐地分赃。我当过黄浦分局局长，洞悉其内幕。记得新开河码头有两个霸主，一姓陈，一姓刘，曾被我通过黄金荣将其收押，起出了许多赃物，最后具结悔改。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经我证实他们确有悔改表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据笔者所知，解放前，码头霸首中最大的有三个，均收徒弟几千人。一是沈关生，绰号“大刀关圣”，系杜月笙的同门弟兄，又参加洪帮（20世纪20年代起，清洪两帮混杂，可以身在两帮），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丁家巷有大批房地产，与中统码头组长刘槐是结拜弟兄。二是李茂龄，拜顾竹轩为师，以码头恶霸起家，日伪盘踞时，是浦东日商三井洋行煤栈的汉奸把头，大发其财，在法租界今建国西路有“茂龄别墅”，岳阳路有“茂龄新邨”，天平路

有“茂龄村”等房地产。当李茂龄在岳阳路建造“茂龄新邨”30幢三层楼洋房时，因地处甲级住宅区，依照规定，建筑材料也应用甲级的，他通过我的帮助，借口抗战时期缺乏物资，准予改用三等材料，李为酬谢我，把岳阳路79弄该新邨21号的房子，以3万元伪币廉价卖给我居住27年。三是张春宝，绰号“码头春宝”，是苏州河内河码头的霸主，早已病故。

（七）粪大王。旧上海，多数居民用便桶，每天清晨4时至8时，有人拉粪车到各街道里弄中叫喊“倒马桶”。每只马桶每月收倒桶费2角。清粪工人用的粪车为粪把头所有，在粪码头，粪把头将每车粪加一车水，一变为二，卖给粪船农夫作肥料，每车收1元。

公共租界粪码头在曹家渡苏州河边，法租界粪码头在徐家汇路打浦桥（今瑞金二路口）。两租界均有承包的粪把头；公共租界是王永康，法租界是黄金荣的姘妇阿贵姐的儿子马鸿根。以法租界为例，每年承包费8000元，共有粪车400辆，这是把头的唯一资本。他每月付给清粪工人每人8元，另给法捕房及卫生处有关人员6000元，每月净赚1—1.2万元左右。除每日清晨派一人在码头登记出售给农民的粪车数外，不参加任何劳动而坐享其成。

马鸿根绰号“马老三”，是杨虎的门生，与我私交颇笃。他的帐房叫张泉生，独揽大权，在法租界平济利路置有大批房地产，并开设日新池浴室。

九、黄道会与清帮汉奸常玉清

30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者派川岛芳子来上海、南京进行特务活动，一面收集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一面唆使日本和尚在虬江路放火烧毁抵制日货有效的三友实业社，掀起了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这时闸北清帮通字辈苏北人常玉清，秉承川岛芳子的命

令，派人到苏北盐城等地招收10岁左右男小孩50名，经过上海虹口送往日本受黑龙会的培训。1937年初，这些孩子全部以日侨身份调回虹口，到江浙沿海调查中国军队驻防情况及海防布置。八·一三中日开火后，这些孩子伪装卖棒冰，到南市、浦东、闸北中国军队驻防的地点收集各种有关情况。南市地区的集中地设在原法租界东新桥大街爱多亚路口面朝东的一爿冷饮店内，店主姓吴，小名阿毛，前浦东陆家嘴日华纱厂工人。每天晚上10时，孩子们将收集的情况汇总后，由吴乘云飞出租汽车送往住在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17号的一个日本人。

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法租界东新桥民国路铁门口，搜查出入居民时，发现3个卖棒冰的13岁小孩身上有很多日本银元，麦兰分局把这3个孩子送至政治部调查，经我审讯，孩子们即说出以上情况。

事后，法租界当局把吴老板及小孩全部送到民国路铁门交界处，交给我预先约好的南市公安局政治科长刘槐及探长薛士林。后据刘告知我，国民党军队撤退前二周，把吴阿毛枪毙在西门陈英士纪念塔前，小孩全部遣回苏北。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日军占领闸北，常玉清担任闸北地区维持会会长，又在日军特务机关长楠本大佐领导下，组织黄道会，自任会长。该会的设立是企图假借发扬黄种人的道德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常玉清的黄道会直属于黑龙会上海分会会长楠本大佐，自1939年起，势力逐渐深入上海公共租界。被常收买的有公共租界捕房政治部对外联络高级警官、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督察长谭绍[illegible]，公共租界捕房刑事科督察长陆连奎和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illegible]鸿（曾任南市区维持会会长）。以上三人，后均被军统驻沪组长陈默打死。

我本人也多次受常派来的人纠缠，但未为所动。当时两租界

捕房部分便衣探员被常收买，但因他们无实际权力，收效不大，尤其是在极大多数爱国者监视下，他们也无能为力。抗战胜利后，常玉清被处决。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张仁奎与仁社

洪维清

张仁奎号镜湖，山东滕县人，是清帮大字辈。到民国年间，清帮辈份已传到大、通、悟、学四字。大字辈残存的很少，数不出几个人，帮会中人，把张看成凤毛麟角。他晚年在上海组织仁社，与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三，是上海帮会组织中最有势力的三个团体。仁社的社员，大都是旧社会所谓“上流人士”，与荣社、恒社的鱼龙混杂，有所有同。

张仁奎贩私盐出身，跟随盐枭徐宝山浪荡江湖多年，与瓜洲的水警区区长（相等于水上警察厅长）赵鸿禧，同为徐宝山手下的得力干将。

辛亥革命中，徐宝山挂上革命的招牌，在江北招兵买马，鹰瞵虎视，大有割据称雄之意，因而遭到袁世凯的嫉忌。袁侦知徐有爱古董嗜好，密使人以送礼为名，在装潢精致的木匣内，安装烈性炸弹，徐展匣启视，为炸弹炸毙。徐死后，由张接管徐的旧部，“头戴二十四颗当”（帮内术语，表示辈份的意思），为部下所拥戴。

癸丑二次革命，冯国璋统率北洋旧部攻打南京，逐走了南京留守黄兴，接任江苏督军兼长江巡阅使，收编了张仁奎。经过李纯、齐燮元的提拔，任苏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驻防南通。

张到南通后，拜张謇为老师，每日必到张謇的“濠南别业”请

安问好，曲尽弟子之礼，张謇也以上宾之礼待之。

我与张仁奎认识，在1924年。那时，我只有23岁，担任南通大生第八纺织公司（永丰公司）经理。在酬酢场中，与他相识，他喜打5角钱的扑克，同赌的有通泰五属盐场总场长韩奉持，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经理蒋嘏堂，上海银行南通分行经理赵汉生，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筱竹，还有张謇的私人秘书许泽初等。我们均以输赢太小，提不起兴趣，但因不好过拂张仁奎的豪兴，勉强与之周旋。有一次，张忽发牢骚说："张三先生（指张察，字退庵，是张謇的哥哥）同我过不去，我在江湖上混到现在，什么都看淡了。三先生是我老世伯，何必同我闹别扭，他要做什么，我还不依他吗？"言下，颇有唏嘘之感。

第一次江浙战争，齐燮元电调张仁奎部队开往前线增援。他封了很多帆船，把军队运到浏河登岸，布防嘉定、南翔一线。据他说，指挥那一线的宫邦铎，初战得利，当面之敌是卢永祥的何丰林部，有不支之势。后来杨化昭部队开到，反攻很力，锐不可当。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张率领的部队赶到，赵营长（指赵子超，赵丹的父亲）装了刺刀，冲上前去，展开了白刃战。他的部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拼命把杨化昭的攻势压下去，才稳住了阵线。

张仁奎在南通多年，积蓄了一些资财，在山东原籍，置了不少地产，为终老之计。

1927年北伐军到江浙，南通易帜，曹万顺部在南通哗变，鸣枪抢劫商店，张仁奎亲出弹压，张有一个远房侄子，希图混水摸鱼，杂在变兵中行劫，为张所知，立即正法示众，悬首南通西城门，此后张告老辞职，迁居上海。

1929年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绑受伤，不治身死，哄动了上海银行界。先是朱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到静安寺电车站终点自大发南货号至元元帽庄的一段地皮，准备建造市房出租，

已向地政局备案，办定了一切法定手续。同时，张啸林也要租这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和尚接洽，和尚不肯，情愿以便宜的租价租与朱成章，不愿租与张啸林。张向朱商量，愿以较高的租价，向朱转租，朱亦不允。一天早晨，朱成章从愚园路寓所坐汽车外出，同车有朱的女护士邓小姐和朱的女儿。汽车刚出弄口，忽然有绑票匪向朱开枪，勒令停车。邓左手掌中了一枪，朱小腹上中了一枪，当场把朱绑去。中国国货银行得知后，四处派人接洽，探听线索。当日傍晚，由该行庶务周子斌带领赎回，把朱送往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救治，终以伤重不治身死。事后，我问周子斌，周只知捕房叫他去，到杨树浦路底把朱赎回，朱躺卧在田塍内，已气息奄奄。与何人接洽，出掉多少钱，他都不知道。赎票的钞票是用麻袋装的，外加火漆印，数目多少，他没有点过。银行界因为朱成章出事，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由交通银行钱新之请出了张仁奎，把张供养在海格路范园，称为“张老太爷”。

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兼上海银行业公会会长陈光甫与女护士发生关系，欲娶为妾。陈妻是著名的雌老虎，闻而大怒，与陈拼命，陈无可奈何，只好与女护士决绝。不料女护士是上海大流氓高鑫宝的徒弟，哭诉于老头子，高答允与陈交涉，派人带信给陈光甫，提出条件：一、与原配离婚，与女护士正式结婚；二、给女护士慰藉费10万元。否则将以对付朱成章的方法对付陈光甫。陈大为恐慌，求救于溥益纱厂总经理徐静仁。徐在淮北办盐务时，曾充张謇的总务科长，甚得张的信任，因此与徐宝山熟悉，与张仁奎亦有关系，就介绍陈光甫拜张仁奎为老头子，请张与高鑫宝“讲斤头”。陈备了重礼，送张仁奎一副门生贴子。张说：我们年岁相当，而且同是张四先生（即张謇）的门下，兄弟相称即可，门生贴子万万不能收，当场璧还了门生贴子，另换了一份兰谱，张自称盟弟，马上为陈了结了这桩风流公案。事情一传开，银行界

知道张仁奎有苗头，辗转托人拜在张氏门下的更多了。同时进门的有上海银行兼办的大业公司的总经理李桐村，上海银行分行经理徐尔康，上海电话公司总工程师华某，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陈香涛等。

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在北洋军阀中资格很老，与冯玉祥部下宋哲元、韩复榘都有交情。葛卸职后，自置房产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285弄上方花园19号，与我望门对寓。葛也拜张仁奎为师，时常请张仁奎吃饭，有时邀我作陪。我与张有20多年不见了，相见时，他还认识我，与我谈了南通张家成败兴衰，孝若的惨遭横死（张孝若是张謇之子，在家被保镖刺杀），很有故旧之情。

韩复榘也由葛光庭介绍，拜张仁奎为师。我问葛，韩有权有势，为什么要拜一无权无势的张仁奎？葛说："你不懂，过去左宗棠出兵新疆，当行军到平凉的时候，忽然三军勒马不前，向左要求暂停一日，左问他们什么原因，答是要迎接大龙头。你看，以左帅之威，军令之严，官兵甘冒军法，宁愿得罪左帅，要去迎接大龙头，可见老头子的威力，祖师爷的规矩，入人之深了。左后来也拜了老头子，于军法之外，用帮规部勒部队，因此，加深了和将士的关系，取得了用兵的胜利。向方（韩字）是西北军，冯玉祥也玩这一套，张之江等都是帮里人，向方拜了张老太爷，他就可以自开香堂，自立门户了。"

拜老头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送贴子，称为门生；一种是开香堂，由引见人先介绍，经过老头子的同意，开具本人年庚八字，然后定期开香堂，经过三跪九叩首、吃血酒、发誓、请客等重大礼节，才录为徒弟。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葆竹是经过开香堂、拉台子（请客）的礼节，拜张仁奎为老头子的。朱葆竹常到我家约我闲谈，谈起"张老太爷"又收了两个有势力的徒弟，一是蒋鼎文、二是朱绍良。他劝我也拜张为老头子，可以得到"老头的游

扬和同门的帮助”。他说：“象我这样吃水上饭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没有张老太爷的牌头，就玩不成了。”

孔祥熙、宋子文的部下，拜张为老师的很多，如中央造币厂厂长韦敬周、江苏印花烟酒税局局长盛昇颐等等。

张的学生，组织了仁社，为聚会之所，借以互通声气，联络感情。杭州也有仁社分社的组织，会址在“双峰插云”的附近，左边是袁良的住宅，右边是周象贤的住宅，买了地，插了木牌，没有把会所建造起来。

帮内把第一个入门的叫作开山门徒弟，最后一个叫关山门徒弟。开山、关山多是老头子得意的徒弟，张的开山门徒弟，据说是第七十六混成旅副官长王凤楼，关山门徒弟是苏北海门警察局局长陈楚均。

陈楚均在海门，也开香堂收徒弟。张驻防海门的部下，多有拜陈楚均为老头子的。陈的徒弟，不少是警察局的警官和巡长，失业后，有的贩私盐，有的贩烟土，对陈都有孝敬。我在海门祖传有一爿茶叶店，烘茶叶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喜欢叫叫打打，也有人拜陈为老头子。他们时常去参加打群架，被打的时候，口里衔了一条毛巾，不吭一声哎呀。如果吭了一声，就是没有“种”，以后帮内就不认他为好汉了。我问陈楚均，为什么张仁奎、黄金荣、杜月笙所收的徒弟，都是文文雅雅；你收的徒弟，动不动要三刀六洞，大打出手？陈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所收的学生，分档很严，上等的有上等的一档，下等的有下等的一档，文的有文的一档，武的有武的一档。你所见到的，多是上等的文的一档，下等的武的，你见不到。如果只有文治，没有武功，还玩什么清帮，玩什么老头子？”

清帮有一条规矩，许充不许赖。洪帮是许赖不许充。如果你不是帮里人，而懂得清帮规矩的，叫空子，帮里一样招待你，代你付酒饭账和旅馆钱。洪帮就不同了。我在湖北担任印花烟酒税

局局长的时候，花捐、印花是由洪帮弟兄、湖北饭店经理王静哉包办的。王告诉我，有一次，一个乡下佬到汉口，在法租界燕子窠吸鸦片，他放烟枪的位置，插烟签的位置，放茶壶的地方，拿茶杯的手法，吸香烟的姿势，斟茶的派头，俨然是大哥身份。小么（小弟兄）看见了，报告了大哥，说是什么山头的大哥到这里来了。我们就去招待他，同他辩道（盘问底细），但此人所答非所问，问他为什么胆敢冒充我们大哥，他说没有，问他为什么胆敢扯我们大哥的旗号，他极口叫冤。一切一切，都是碰巧的偶合，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帮里的规矩、手法、姿势、位置等等。经过大家研究，认为他有意冒充，犯了帮规，乡下人叩头求饶，结果，死罪虽免，还是割了一只耳朵。

张仁奎在上海所收的学生，都经过他自己严格审查，没有下级流氓混迹，他也不以帮规来管束他的门生。门生孝敬他，以"自愿"为主，有财力的多送些，没有财力的少送些，他从不争长论短，不象黄金荣、杜月笙等那样以做寿等为名，发贴子，打秋风。

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也拜张为师。有一天，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请杜月笙吃饭，有我作陪。杜向我说："听说你和张老头子相识，张老头子何必要收学生，他每月要多少开销，我送他就是了。"散后，吴启鼎对我说："杜月笙不高兴张仁奎多收学生，一则怕抢他的生意，二则怕张多收学生，他的师叔会越来越多，因为杜是陈世昌的徒弟，陈是通字辈，别人拜了张老头子的门，也是通字辈，就是杜月笙的爷叔了。"

为仁社奔走最力的，是时事新报馆总经理张竹平，浴德池浴室经理葛福田。大凡基金的筹募，月费的征收，都由他两人负责。仁社的经费是独立的，与张仁奎私人经济不相混杂。

蒋介石背叛革命，利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恶势力，捣毁设在闸北商务印书馆内的上海总工会，并诱捕总工会理事长汪

寿华，造成了人天共愤的反革命惨案。蒋认为帮会对他有功，因此对帮会头子竭力拉拢收买。蒋对张仁奎也很尊重，曾经利用过张到山东疏通韩复榘。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劝张随同西迁，张没有去。敌伪对张，也作过工作，张托病未出。抗战末期，张病死在上海寓所，张介石还以重庆政府名义下令表扬。

据我看来，仁社的社员入社目的有五种。一如陈光甫、李桐村，喜欢玩弄女性，有了张仁奎的后盾，就不怕流氓敲竹杠；二如朱筱竹、陈香涛，吃的江湖饭，有了张仁奎的靠山，跑码头可以吃得开；三如蒋鼎文、朱绍良、韩复榘，继承了张仁奎的衣钵，可以借帮会为号召，加强他们的势力；四如钱新之、韦敬周，扯了张仁奎的旗号，可以得到安全保障；五如张竹平、葛福田，有了张仁奎的关系，可以多轧几个有钱有势的朋友，在业务上得到便利。

张仁奎生得魁梧高伟，两目炯炯有神，言笑不苟，颇有“北方之强”的气概。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习于下流，在南通病死。第二、第三个儿子都从事正当职业。第三个儿子经钱新之介绍，在中兴公司工作。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

程锡文口述　杨展成整理

一、我和黄金荣的关系

我和黄金荣的关系，要从城隍庙说起。民国初年，我父亲在上海城隍庙附近开设裱画店，我从小就在店里帮忙。当时城隍庙内有五个有势力的“白相人”，[①] 因名字里都有个“生”字，被叫作“五生党”。其中有个当过律师、后开象牙店的薛连生，有次拿来一张任伯年的学生画的松鹤图，要我偷梁换柱把任伯年学生的名章改为任伯年的图章，我起初不肯干，经不住薛连生再三要求，终于给他裱好。薛连生拿了这张画去送人，经常夸奖我的手艺好，并且介绍我认识了史锦绣，叫我拿些字画到史锦绣家中兜生意。

史锦绣是白相人范开泰的老婆。那时范开泰在上海开设乌木行，人称“乌木开泰”，其弟范回春也是白相人，兄弟俩在上海都很有名气，但史锦绣更比范开泰出名，在白相人中被称为“强盗锦绣”。她是常州人，善于交际，性格豪爽，手段泼辣，在上海女白相人中可算是头面人物，当时连黄金荣也惧怕她三分，因黄的

① “白相人”是上海解放前社会上对帮会、流氓分子的俗称。“五生党”除薛连生外，还有牙医陈润生，开玩具店的王廷生，开石灰店的沈菊生，以及后来管城隍庙香火钱的朱友生。

元配夫人林桂生同史是结拜姊妹，史锦绣是大阿姐。

范开泰是城隍庙的董事，我认识史锦绣后，他夫妇就叫我带管些城隍庙的事务。那时我年纪轻，做事巴结，每逢初一月半，城隍庙进香人多，史锦绣来烧香之前，总是先派人通知我，替她准备香烛，做些杂务，她很满意。起初我和她见面总称她老太太，她叫我小弟弟，后来接触较多，她要我叫她“寄娘”，认我为“干儿子”。她为了让我多赚些钱，叫我挑些好的书画由她陪我到黄金荣家中去，卖给黄金荣和黄的亲戚朋友。因此我就经常在黄家进进出出，对于黄家大小佣人也花些小钱交结，关系日趋密切。

约在1922年农历七月半那天，城隍庙烧香和看庙会的人特别多，黄金荣是城隍庙执香会的会长，很迷信城隍爷，也带领亲信弟子前来祭供叩拜，还恭送城隍出庙赴会，街上的群众挤在两旁争看，秩序紊乱，烧香的人把香火乱丢在庙门之外，以致引起火灾，把城隍庙的大殿烧毁。靠庙里香火糊口的康道士等请求会长黄金荣和董事范开泰重建城隍殿。黄金荣一口答应，叫范开泰、范回春兄弟两人负责筹建大殿。范开泰做乌木生意，有的是木材，范回春是嘉定银行经理，钱财进出方便，黄金荣那时早已操纵三鑫公司（全上海贩卖鸦片的大本营），于是范回春想出一个办法，把筹建城隍庙需要的大笔钱，在三鑫公司贩卖的鸦片烟中，每两增加些价钱，总共拿出两万多元，由黄金荣、杜月笙、范回春、陆金林（城隍庙救火会负责人）等组成筹建城隍庙董事会，推黄金荣为董事长，实际工作由范开泰负责，叫我经管材料进出。经过一年多时间，城隍大殿重建完成，焕然一新，由于我管理材料有功，得到范开泰和黄金荣的信任。

1931年我25岁时，父亲去世，裱画店由我接下。但在豫园翻修过程中，把我裱画店的地皮收走，生计无着，范开泰劝我投靠黄金荣。正巧黄金荣的领子黄源燊结婚，范开泰就叫我到黄金荣家中帮忙。这次办喜事的场面很大，我代为张罗，黄源燊深为满

意，要我投贴拜他父亲做老头子，彼此结为师兄弟关系。于是我向黄金荣三跪九叩首，拜他为老头子，同时与我投门生贴子的还有汪伪时期在苏北当伪师长的田铁夫。

我在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以前，经常出入他家，对他家里上上下下、老少男女早已熟悉，拜师以后，和他日益接近。他抽鸦片时，由我在烟榻旁替他装烟，他常到逍遥池洗澡，也由我伴同。在烟榻旁、浴室卧榻上，他和我几乎无所不谈。他所住二楼的事务，楼下厨房间的伙食，以及招待来宾等等工作，都叫我办理，逐渐成为他的总管家。特别是我替黄家掌握财政大权的“大少奶奶”李志清办了一件使她和黄金荣十分满意的事，因此更加得到他们的信任，巩固了我的管家地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黄金荣的元配妻子林桂生，原在南市一枝春街开设“烟花间”（比较低级的妓院），从苏州选了一个侍女叫李志清，长相秀丽，为人聪敏，林桂生不忍让她当妓女，就领在自己身边当贴身女儿看待。林桂生和黄金荣结婚后，把李志清作为童养媳，配给黄金荣的领子福宝为妻，福宝在17岁时死去，于是李志清就成为黄家的“大少奶奶”。这位大少奶奶得到黄金荣的特别宠爱，主持黄家一切内务，公媳之间有着特殊关系，黄家的人心中都有数。那时黄金荣有个徒弟叫张方庚，在大陆商场开设大成皮件行，抗战胜利后倒闭，亏空伪币34亿多元，各方催偿债务，无法应付，央求黄金荣帮助，黄命我全权料理，我与各债主谈判，由于这些人都怕黄金荣，事情比较顺利地解决。正在这时，黄家大少奶奶风闻做交易所经纪人是发财的买卖，叫我借房子，领执照，我就劝说张方庚把大陆商场里大成皮件行的店面房子让给大少奶奶使用，又去找杜月笙，请他帮忙领取证券交易所执照，李志清还亲自打电话给杜月笙，结果领到执照，取名“志诚”证券号，由李志清的领子黄起予当经理。这个证券号办得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我也因此得到黄家大少奶奶的青睐。

接着，黄家大少奶奶和我共同集资 3.6 亿多元，开办了 84 间门面的小世界福佑商场，黄金荣叫我当经理。这样，黄金荣的门生丁永昌负责大世界，我负责小世界，都成为他的得力心腹人。

二、黄金荣的家世与家庭成员

黄金荣生于 1868 年（清同治七年）。父亲黄炳泉，原籍苏州，出生在上海漕河泾，原是种园地的，有些地产，后被其姑母侵占，就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那时张家弄内住有当过武官及捕快差役的人，同黄炳泉是邻居关系，因此后来黄炳泉一度做过捕快差使。黄金荣的母亲邹氏，苏州人，生两男两女。长女阿宝，嫁给邹家，黄金荣排行第二，三女名招弟，嫁给徐步州，小儿子木金，不知下落。此外，黄炳泉还有个姘妇，在高桥旧校场开糕团店，名叫“麻子阿金”，也生过一个女儿，不明其下落。黄炳泉在黄金荣 10 余岁时死去，几年后邹氏相继而亡。

黄金荣 30 多岁时与林桂生结婚，那时他虽在法租界巡捕房当便衣包探，还未十分得意，招赘到林家，住在八仙桥钧培里。因林桂生没有生养子女，就领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子名福宝，又名钧培，女名宝宝，嫁给一个姓许的（下落不详）。福宝妻李志清，前面已经说过是童养媳，掌管黄家财政大权，后与黄闹翻，把黄家黄金美钞、珍宝饰物一扫而空，迁居香港，后到台湾死去。她在黄家没有生养子女，领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黄起予，现在美国经商；二儿黄起明，现在上海；女儿黄悦明，现在香港。

黄金荣 54 岁时，当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名利双收，已经得发，因为林桂生没有生儿女，他看中了在他开设的共舞台演《宏碧缘》的京剧名伶露兰春。露曾拜黄金荣为先生，她所唱的《骂毛延寿》，灌有唱片，在共舞台演出改良时装京剧，名噪一时，时常客满。黄金荣眼看露兰春色艺双绝，不管师生关系，搞得火

热，并向林桂生提出要娶露兰春为二房，林桂生不答应，两人闹翻，林桂生即与黄金荣离婚，并把黄金荣的财物，如钻石戒指、名贵貂皮大衣等席卷而去，直到1981年死在上海。

露兰春嫁给黄金荣时，只有24岁，比黄金荣小30岁，结婚后没生子女，她的母亲给她领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黄源焘，小名连弟，另一个小名根弟。据说黄源焘原是大舞台一个唱武生的演员的儿子，这个演员姓李、山东人，名不详。根弟原姓麦，名政学，又名元勋，是广东人，因其父母贩卖鸦片被捕，死在狱中，由法租界会审公堂公断给黄金荣作养子，在结婚时恢复原来姓名，离开黄家。露兰春与黄金荣婚居三年后，下堂求去，据说先嫁给唱老生的同行安舒元，后来嫁给德孚洋行买办、做颜料生意的薛某，住在丽都花园。

黄源焘18岁结婚，娶沈阿三的长女沈静华为妻，生两女一男，大女黄蓓莉，嫁给黄金荣的门生、上海雷允上药店老板雷宪芝的儿子，现都在上海；二女黄蓓兰，嫁给邮电局的一个职工（姓名不详），现也在上海。黄源焘的儿子现在东北航空大队工作。黄源焘在1975年获得政府特赦宽释，曾往北京参观学习。回沪后于1976年分配在浦东高桥五新木工厂工作，1982年11月因心肌梗塞死去。

三、黄金荣的童年

1873年黄金荣6岁时，随父母从苏州搬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黄金荣就在附近的庙宇孟将堂内的私塾读书。他从小顽皮，不认真读书，头脑却很灵活，善于随机应付。前面说过，张家弄内住有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黄金荣的父亲经邻居介绍，也当过捕快。黄金荣从小耳闻目睹这些捕快的言行，头脑中印下不少江湖诀窍，对他后来进入法租界捕房充当便衣包探，以及营

救法国人姚主教而起家发迹，都有一定的影响。

黄金荣小名“小和尚”，并非是他做过和尚，这里有段来由。1881年黄金荣14岁时，父亲黄炳泉因病去世，留下母亲邹氏和姊弟四人，只能依靠母亲代人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于是邹氏把黄金荣送到孟将堂内做些零碎生活，混口饭吃，过着小和尚一样的打杂生活，因此当地人就叫他“小和尚”。由于他脸上有麻皮，后来又有“麻皮金荣”的绰号。

黄金荣在孟将堂做小和尚杂活后，不能解决温饱，他母亲又托人把他送到城隍庙一家裱画店当学徒。这家裱画店开设在豫园路环龙桥下堍，名叫“萃华堂裱画店”，是只老店（有说是在城隍庙九曲桥得意楼旁边的一家叫“凌云阁”的裱画店，这是误传）。萃华堂裱画店的老板叫黄全浦，黄金荣拜他为师，做了三年学徒，每月只拿月规钱400文（40个铜板）。满师后站了两年柜台，收入也不多，生活仍然清苦，谈不上养母亲和弟妹，母亲仍靠洗衣服维持生活。黄金荣在萃华堂度过了五个年头，除学了些正规的裱画手艺以外，还懂得了一些以假充真、偷梁换柱的手法。

四、黄金荣是怎样进法捕房和发迹的

黄金荣进入法租界巡捕房，主要是靠邻居陶婆婆的介绍。陶家也住在张家弄孟将堂附近，同黄金荣家是隔壁邻居。黄金荣的母亲常替陶家洗衣服，日久天长，陶婆婆看到邹氏母子五人生活困苦，深表同情，邹氏就托陶婆婆替黄金荣在巡捕房中找个差使。1900年，法租界扩充管辖地区，捕房公开招考华人巡捕，黄金荣报名投考，恰巧陶婆婆的儿子刚从上海中法学堂毕业，进入法租界捕房充当翻译，陶婆婆就叫她儿子在捕房内打了招呼，因此黄金荣被录取为三等华捕。那时捕房招考录取20名华捕，后来改组成侦缉队（即便衣警探），陶翻译推荐黄金荣做领班，当时人称

"二十股党"。

那时法捕房的实权操纵在法国警探手里，黄金荣被派在十六铺码头一带管理治安。由于他在萃华堂学艺期间，常到城隍庙得意楼喝茶，结识了城隍庙一带的一些地痞流氓和清洪帮分子。当了法捕房"包打听"（便衣警探）后，为了管理十六铺码头的治安和破获盗窃案件，他进一步有意识地和这些人厮混，在社会黑暗面中的关系逐渐多了起来。他用小恩小惠收买了一批惯窃惯盗作为线索，制造内讧，利用一批盗窃分子去破获另一批盗窃分子，甚至玩弄"贼喊作贼"、"假戏真做"的手法，一面布置一批小喽罗，约好某月某日在什么地点作案抢劫，一面叫另一些喽罗到法租界巡捕房向他"报密"，他再向法国警探报密，这样使他能掌握带人破案的主动权。到了约定的日期和地点，原来约好的一批喽罗果然在进行抢劫时，便被黄金荣亲自带领、化装埋伏的侦缉队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些盗匪被关进捕房后，黄金荣又在捕房内打点，一一陆续释放出来。法捕房当局看到黄金荣连连破获盗窃案件，对他重视，使他逐渐有了威信。

黄金荣对上海的一些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进行敲榨勒索的办法也很巧妙隐蔽。他常常唆使一些清洪帮分子和地痞流氓，在商店门前或闹市地区寻衅取闹，甚至假装打架和骂街，影响商店营业，使顾客远而避之，不敢进去买东西，而黄金荣带着巡捕和便衣包探，上街巡逻，每到之处，这些闹事的小流氓无不逃之夭夭，有时黄金荣还故意抓起几个小流氓来惩办。于是一些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感到他确有办法，每逢过年过节甚至按月给他送钱送礼，把他当作护身神，有的还投贴子拜他做老头子，有的拜他为寄爹，有的拜他为先生。对于那些有名的富翁，黄还采用绑架勒索的办法，大肆敲诈。如唆使他的心腹徒弟丁永昌绑架荣德生，一下子就敲诈了几十万美钞。至于指使爪牙向富翁财主写恐吓信敲诈，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受害人被敲去大笔竹杠，还得请黄金荣·

出面解决，以免后祸。最使黄金荣得意的，还不是他破的假案，而是破了一件法国姚主教被绑架的真案，从而使他成为上海第一流大流氓，大把头。

姚主教原是法国天主教神甫，与法国驻沪领事、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在上海法租界有幕后操纵的实力。他为了开辟传教基地，亲自由上海乘火车，还带着几箱银洋，准备到天津去开办教堂。当火车行驶到山东临城时，遭到军阀张宗昌部队拦车抢劫，把他绑架到临城乡下看管起来，准备勒索一笔巨款，赎回“肉票”。

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捕房动员所有的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都没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采取高价悬赏的办法，凡知道姚主教下落通风报信的，赏银洋 3000 元，如能找到姚主教的，赏洋 1 万元。黄金荣对此事极感兴趣，认为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甚至亲自到城隍庙烧香求签，祷祝城隍保佑，使他能获得线索，破案立功，将来青云直上，一定整修城隍大殿，装塑城隍金身，但还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这是黄金荣躺在烟榻上对我讲的）。

说来凑巧，这起绑架巨案，却从一个到上海来的山东人被扒去 100 元钱而获得侦破线索。原来在山东临城地方有个人名叫韩荣浦，是吴佩孚部下的副官，从临城乘火车到上海来买东西，火车到了上海，他从拥挤的人丛中走到车站附近的旅馆登记住宿时，发现装在肚兜里一百块钱不翼而飞。韩荣浦沮丧万分，想起有个姓隋的同乡在法租界捕房当巡捕，于是抱着一线希望到法捕房去寻找姓隋的巡捕，姓隋的巡捕替他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他和黄金荣见面。黄金荣一听是从天津附近来的，便不放过机会，向韩荣浦打听上海火车开往天津前被拦车抢劫和法国神甫被绑架的事件。由于韩荣浦是吴佩孚手下的副官，熟悉行伍中的事，而且吴

佩孚的部队和张宗昌的部队都驻在天津附近，双方所干的坏事，互有所闻，所以韩荣浦就将听到的消息告诉黄金荣。黄金荣一听有了线索，大为高兴，立即付给韩荣浦 150 块钱，要他回到临城去详细打听肉票藏在什么地方，一有下落赶快到上海来报信，再给 500 元赏金，如果破案，更有重赏。由于黄金荣慷慨解囊，打动了韩荣浦的心，果然韩荣浦回到临城之后，几天时间就同绑架姚主教的张宗昌部队取得联系，打听到姚主教被关押的地方。他第二次来上海同黄金荣接头，商量赎票问题，黄金荣的点子多，叫韩荣浦不必去找部队头头开价赎票，而是叫韩荣浦设法买通看押姚主教的人员。同时黄金荣与陶翻译商量，先向捕房支领 2000 元，给韩荣浦 500 元，另交 1000 元叫韩荣浦立即去买通看守人员，并答应等黄金荣到达关押姚主教地点时，再付 2000 元，要这些看守人员逃往外地。还叫陶翻译用法文写了一张纸条告诉姚主教，请他放心，黄金荣会亲自到临城来救他出险。韩荣浦再度回到临城之后，黄金荣按照预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由上海乘火车到达临达，在晚上赶到乡下把姚主教营救出来，安然返回上海。

黄金荣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不去直接同张宗昌部队谈判，而只花了几千元买通少数看守人员，竟把姚主教营救出险，法捕房对黄金荣破格重用。原来法捕房中重要职务都由法国人担任，这时破天荒地提升黄金荣为督察长，还专派八个安南巡捕保护他的安全。黄金荣带着这八个安南巡捕进进出出，权势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响，他也从此更忠实地为法帝国主义服务。

黄金荣担任法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 20 多年，直到他 60 岁做寿以后，才辞去职务，名义上退休闲居，实际上幕后操纵。继黄金荣之后担任华探督察长的先后有沈德福、任水扬两人，因不奉承黄金荣的意旨，被黄金荣安置在捕房里的余党所排挤，最后还是由黄金荣的亲信担任这个职务。

五、黄金荣与帮会的关系

黄金荣虽然同帮会分子经常往来，却没有真正拜过老头子，既不是什么“大”字辈，也不是什么“通”字辈。按照帮会规定，凡是没有入过帮会的，称为“空子”，不能开堂收徒。黄金荣却不管这一套，他同清帮的“大”字辈张镜湖、曹幼珊等称兄道弟，对人自称是“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划。他收徒弟不举行开香堂仪式，只是要徒弟写张贴子，上写黄金荣老师，下写某某门生敬拜。黄金荣是见钱眼开讲实利的，只要送钱送礼拜他为老师，他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因此他所收的徒弟不下二三千人。在当了法捕房华探督察长后，一次就收了200多个徒弟，其中重要的和关系密切的有金九龄、程子卿、丁永昌、陆少章、鲁锦臣、曾九如、卢英、尚武、冯志明、韦钟秀、乔松生、汤坚、马德荣、张荣、董明德、周相成、管宝全等。这批徒弟大多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小头目或骨干分子。另有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法租界和粪大王马鸿奎、六国饭店赌台的朱顺林、沧州饭店老板姚松如、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和水果荣生，还有工商界人士如新光内衣厂老板傅良骏、正泰橡胶厂老板郑仁业、渔业公司经理黄振世、新华影片公司经理张善琨等，其他还有文艺界、戏剧界、新闻界、医药界人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麒麟童（周信芳先生），当时被天蟾舞台老板压迫和威胁，也曾投拜黄金荣为师。

除黄金荣所收的徒弟以外，他的领子黄源燊收过二三百门徒，外孙邹政之也收了五六百人，再加上顾竹轩、唐嘉鹏、卢英、黄振世、丁永昌等也都收有不少门徒，所以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不但遍于全上海，甚至江浙一带，也都有他的势力。

六、上海的大八股党、小八股党和三十六股党

黄金荣曾和杜月笙、张啸林、杨啸天、王柏龄、孙祥夫、陈群、陈希曾结拜为兄弟，收罗帮会分子、流氓地痞，称为上海的“大八股党”。按当时结拜的顺序，老大黄金荣，老二王柏龄，老三杨啸天，老四张啸林，老五杜月笙，老六孙祥夫，老七陈希曾，老八陈群。

王伯龄是扬州人，出身财主家庭，北伐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军长，在上海与黄金荣结识后，利用其军队贩卖军火，贩卖烟毒，以后死在扬州。杨啸天名杨虎，曾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北伐战争时期是何丰林的部下，当过海军司令，在上海办过兴中学会、海员俱乐部，参加洪门，收过不少弟兄。张啸林原是杭州的白相人，在杭州开设锡箔店，因逃税而到上海避风头，结识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积极参与。敌伪时期，投靠日寇，参加伪组织承包锡箔税，后汪伪拟任为浙江省长，被戴笠所知，即与杜月笙密谋，将张刺死。孙祥夫曾任北伐军军长，与王伯龄搭档，托黄金荣在法租界代买军火。黄金荣有一次在烟榻上谈起孙祥夫、王柏龄两人，说：“这两个都是色鬼，在租界内看到长相好的女人，就请我替他们动脑筋，搞不到手，甚至拦路抢劫，色胆包天。”陈希曾是陈立夫的侄子，曾任蒋介石的警卫队队长，当过南市警察局局长。抗战前夕，黄金荣等组织“反日会”，我当过干事，有一次，上海宝大祥绸布店的老板丁某，因卖日本花布，被陈希曾拘捕，经丁某托人向黄金荣求情后保释。我接待过陈希曾，是陈果夫、陈立夫会见黄金荣时带来，介绍给黄金荣的。二陈要获得法租界的情报，黄金荣就转告陈希曾，互通声气。陈群在“大八股党”中是最小的一个，但在八人中他的文化知识最高，足智多谋。北伐战

争时期，曾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当时他指使部下散布反共谣言，为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作舆论准备。抗战时期，投靠日寇，充当伪江苏省省长，抗战胜利前夕，畏罪自杀。

除了“大八股党”外，还有“小八股党”，都是黄金荣、杜月笙的得力心腹徒弟，计有高鑫宝、马祥生、金廷荪、叶焯山、顾嘉棠、杨仁千、范果百、范恒德等八人。这些人也收有不少徒弟，横行上海。

此外，在上海码头上还有一批流氓，号称“三十六股党”。头头叫陈福生，又名陈世昌，曾拜张镜湖为老头子，自后在清帮中渐有地位。杜月笙在十六铺码头卖水果时，拜过陈福生为老头子，得发以后，就把陈福生供养起来，还送给陈福生一座宽敞的住宅（在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淡井庙斜对过），报答恩师。陈福生绰号“套签子福生”，因他早先在码头上用套签子的赌博方式，骗取行人旅客钱财①。

七、三鑫公司的由来

旧上海贩卖鸦片的生意，原以广东帮为主，靠贩卖鸦片（当时称“黑货”）起家的大商号有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那时码头上的流氓众多，其中有一批叫“水老虫”，为首的叫范高头。这批流氓专靠在水中偷盗为生，每当英国轮船装运成千成万箱鸦片驶进上海港口时，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必须用小划子从轮船上将货物驳运，当轮船上一箱一箱的鸦片装进小划子向码头行驶时，常常会发生翻船事件，使一箱箱鸦片沉到黄浦

① 套签子的赌博方法，是用三根一头涂着红、黄、蓝三种彩色的签子，向行人旅客显示，然后用手握住有颜色的一头，让顾客选择一种颜色套住另一头，套中的一元赔一元、五元赔五元。因为一共只有三种颜色，看起来容易套中，不少人受骗输钱。

江里去，这就是“水老虫”在作怪。他们把小划子弄翻，然后又把沉在水中的鸦片箱捞起，安放到另外的小划子上，将鸦片偷走。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窃。盗窃勾当使郑洽记等黑货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在白天黑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告失踪，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面。

在陆上码头也有一批流氓干这种不花本钱的生意，著名的有十六铺的张椿宝、单阿云、李德荣、荣啸云（绰号跷脚阿云），虹口的浦宰元，江湾的粜饭和尚（绰号），天后宫桥的闹天宫徐福生，以及铁臂膀陈长福等。其中有个范高头的徒弟，绰号“橡皮老虎”，曾把外国巡捕摔到黄浦江里去，后来破案，被南市警察局局长徐国梁枪毙在九亩地。

既有偷盗鸦片的流氓组织，也就有窝赃、销赃的贼窝，头头是三十六股党的另一个头子，叫马德宽。他手下养着不少徒弟，专门干收赃、窝赃和销赃的勾当，聚集地点在浦东对岸东昌路码头附近的“金丝娘庙”内。范高头等水老虫从水上和从码头上偷来的鸦片，都在这里开箱收赃，每箱烟土价值数千元。

后来，法租界捕房的头头法国人沙利，指定黄金荣想办法破案，实际这些事都是“大八股党”的徒子徒孙所干，黄金荣只能开只眼闭只眼拖延敷衍。但终非久计，于是和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商量，范回春提议组织一个公司，象保险公司那样收保险费。鸦片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这些保险费每月收入几十万至百万元以上，由公司发给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的徒子徒孙和水陆码头的有关流氓，作为“月规钿”。这就是“三鑫公司”的由来。

当时黄金荣打着三鑫公司的旗号，安排捕房派几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

运鸦片进入库房。这几百名安南巡捕的费用，就由黄金荣从保险费中开支。开始时，法租界捕房在名义上派出500名安南巡捕去保护码头，每月开支数万元，实际上由于法捕房头头沙利等都吃空额，并不足500名人数。后来鸦片运进越多，法捕房的头头也水涨船高，吃空额由500到一二千，每月开支从数万元增加到一二十万元，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三鑫公司收取鸦片保险费是出在吸鸦片的商人郑洽记等身上。而鸦片商人付出的保险费就出在吸鸦片的人身上。在保险费收入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坐地分赃，每月各得数万元不等。其中最实惠的是杜月笙，因为黄金荣当时在法捕房当督察长，算是官方人员，不便公开露面，便让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经理，张啸林、范回春任副经理，实权掌握在杜月笙手里。杜月笙当了三鑫公司经理后，掌握了水陆码头大大小小的流氓组织，张啸林负责对付外地的流氓组织，范回春负责经济收支。此外，在三鑫公司安插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徒子徒孙几百名，挂名为检查员，每月可拿数十元至数百元。

三鑫公司之所以得到鸦片商人的信赖，固然是由于通过该公司，平息了鸦片经常失窃的事件，收到了“保险”的效果，但主要的却是鸦片买卖由秘密转向公开。当时，三鑫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这个公司除了收取鸦片保险费外，还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于是上海的鸦片烟馆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俗称“燕子窠”）。三鑫公司代捕房收取烟枪执照费，每支烟枪收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那时一个烟馆至少有十几支烟枪，大的烟馆有几十支，仅法租界内就有烟馆一二万家，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各处烟馆大都少报烟枪数，而三鑫公司所用的几百名检查员，专门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除了鸦片这种黑色毒品外，到了敌伪时期，又盛行红白两种毒品，红的叫“红子子”，白的叫“白粉”，又名海洛因，即吗啡。“红子子”由一个日本浪人叫滕曲三郎的，首先在上海制造，地点在虹口昆山花园（现武昌路附近），后来顾嘉棠、浦宰元、扬庆邦等在法华庙大量制造。这种毒品比鸦片价格便宜，而且吸法方便，放在香烟上就可吸，因此毒害更甚。旧上海的烟毒如此蔓延，与三鑫公司的经营、包庇是分不开的。

八、黄金荣和杜月笙合办高级俱乐部

黄金荣和杜月笙合办上海高级俱乐部的前夕，我在黄家的烟铺上和逍遥池浴室房间里，听黄谈起他和杜月笙合伙诈骗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钱财的事。那时袁克文初到上海，人地生疏，他的侍从人员中有个名叫韩荣浦的，正是在营救法国主教事件中给黄金荣通风报信的人，因此介绍袁公子去访问黄金荣。袁克文一见黄金荣，就送了10枚金币作为见面礼。这些金币是袁世凯当上总统后，由英国给他铸造的，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颇为珍贵。杜月笙看到连声称好，黄金荣就送给他3枚。于是黄、杜两人大摆宴席，隆重招待袁公子，吃的顿顿是丰盛酒菜、中西美点，穿的是高贵的中西服装，住的是精致华丽的高级公寓，出入有多名安南巡捕保护。袁克文受到上海这两个“大亨”的殷勤招待，非常满意。黄、杜两人先伴袁公子踏遍上海的名胜古迹，接着又引他到书寓（高级妓院）和会乐里长三堂子，并亲自选上几名红妓女送到袁克文所住的公寓，与袁朝夕相伴，说唱玩乐，使袁克文跌入黄、杜安排的迷魂阵，在上海流氓流行的吃、着、嫖、赌四个字中，一下子就沾了三门，接踵而来就是赌博。开始时，袁克文和黄金荣、杜月笙、金廷荪等四人一起叉麻将，总是袁赢钱，黄、杜等输钱，因此袁克文的赌瘾越来越大，一场赌注由成千元到上

万元。不到十天功夫，把他带来的几万银钞输得精光，只得拍拍屁股回北京。临行前，黄金荣、杜月笙还亲自相送，并且拿出5000元给袁作途中用费。

黄金荣、杜月笙对赌博门槛不精，但是他们的门徒中不乏赌棍，如王茂亭、朱如山等，对赌博都有精明的手法。这次黄、杜两人陪袁克文玩牌，对赌博发生兴趣，又听黄的门徒王茂亭介绍外国流氓开设赌台赚钱多和轮盘赌的黑幕。黄的门徒马雨亭还会做赌具，如在骰子内灌铅等等。于是黄、杜两人在三鑫公司内召集马祥生、顾嘉棠、王茂亭、马雨亭、金廷荪、范回春等人商议，一致认为开赌场是桩好买卖，顾嘉棠建议开个俱乐部，黄金荣、杜月笙表示赞成，选定地点适中、环境幽静的福煦路181号（现延安中路）为场址。

上海最早的大赌窟叫“人和栈”，地址在小东门陆家宅桥口，即现在的一枝春街口。那时该处开设不少鱼行，鱼市集中，开办“人和栈”的是称霸十六铺码头的陈世昌，还有沈嘉福、范恒德等。由于鱼行一早开市，那些卖鱼的贩子卖掉鲜鱼，手中有钱，陈世昌就利用这个机会开设赌场骗取鱼贩的钱财，但比起福煦路181号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福煦路181号是幢较大的花园洋房，开办之初，只是当作三鑫公司成员的俱乐部，后来扩展到与三鑫公司有关的员工家属及上海一些闻人财主，最后只要有钱或认识该俱乐部的任何有关人员都可进去赌博。里面中西赌具一应俱全，免费供应上等中西大菜、高级烟酒和上等鸦片烟，还可免费乘坐小轿车回家。但是，进了俱乐部，要想赢钱可不大容易。赌台里惯用灌铅的骰子，轮盘赌的赌具下面放着吸铁石等，做手脚欺骗赌客。即使赢了钱，走出大门，还会被人跟踪，用“抄靶子”、“剥猪猡”等办法，把钱抢走。有时还搞“突然袭击”捉赌。一天晚上，笔者亲眼目睹，正当俱乐部里赌客们兴高彩烈，呼么喝六之际，突然一批安南巡捕

和华人包探蜂拥而入，把赌客们一串串押上警车，关进了法租界巡捕房，最后是每人被罚款几百元交保释放，其实都是赌场老板和巡捕房勾结做好的圈套。

九、黄金荣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是由于黄的徒弟徐福生介绍认识黄金荣的。徐福生绰号“闹天宫福生”，原是天后宫桥的一个流氓，手下有不少徒弟，在天后宫桥及苏州河码头上仗势欺人，因霸占了天后宫的庙产，所以有“闹天宫”的绰号，此人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认识了一些广东人，由广东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一度跟随孙先生。20年代初，孙先生到上海，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进行革命工作，曾给徐福生写过一把扇面，那时正值五六月间，徐福生拿了这把纸扇去见黄金荣，说孙先生是个有名望的革命家，到上海也想看看黄先生。黄金荣十分高兴，约定日期要徐福生伴随孙先生到黄家。6月间的一天，孙先生由徐福生伴同到了黄金荣家。黄金荣亲自邀请孙先生到楼上会客室。孙先生说，知道黄先生在上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今后我的同志和朋友到上海，请黄先生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

后来，孙先生又写信给黄金荣，大意是讲当时的形势，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制造内战是造成民生凋敝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之民众；而革命需要有人才之参加及经济上之援助，请黄先生联系志同道合之朋友，在人才和经济方面多加援助。黄金荣平素在经济方面出手不大，收到来信之后，居然一次拿出1000元交给徐福生转送孙先生，还通知虞洽卿也援助了一笔钱。孙先生接到之后，又给黄金荣写了封回信致谢。由于徐福生奔走出力，孙先生又替徐福生写了两把扇面，其中一把扇面，徐福生特地裱好后装上镜框，悬挂在他

家中的客厅正中。

据黄金荣告诉我，孙中山先生前后写给他几封信，因时隔几十年，不知下落。另据黄金荣家当秘书的龚天健告诉我，这几封信在杭石君处见过（杭是大世界最后一任经理，已去世）。1937 年，日军侵占上海时，黄金荣曾要他秘书和帐房整理藏在铁箱内的一些文件和信件，陆震中告诉我，曾看到孙中山先生的来信，不过信封已霉旧，信笺上沾有水迹，字迹模糊，但“孙文”的签字还能看得清楚。此外，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时，黄金荣曾叫杭石君写了封祝贺信，由杭石君亲自送往南京面奉孙中山先生。北伐战争胜利后，黄金荣有时对徒弟们说：“我一生之中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只要有困难，我不会不帮忙。”这些话，在 1941 年黄金荣做寿时，我也听到他对前来拜寿的李济深说过。

十、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

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不多，很不得意。耳闻黄金荣的势力，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贴子。

1921 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虞洽卿出面代为了结。当时蒋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黄金荣认为自己替孙先生出过力，就与虞洽卿一同资助旅费，使蒋走上了“国民革命”道路。

1926 年至 1927 年期间，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即和虞洽卿商量，退还门生贴子。蒋介石到上海后，由虞洽卿伴同去黄金荣家探望，黄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

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贴我找出来交结虞老送还"。蒋介石当时谦虚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金荣接过表，连连称谢。黄金荣对这只金表，一向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出来炫耀一番，一直保存到死后，被黄源焘取去。

北伐军到上海后，黄金荣和虞洽卿等，曾召集工商界以及社会名流为蒋接风祝贺，并为蒋的军队筹集了10万元的"慰劳费"，蒋把10万元交给虞洽卿、黄金荣，虞洽卿把5万元捐献给慈善事业，黄金荣也捐给陆伯鸿等办教会事业。

蒋介石北伐到上海时，警卫部队约有100多人，驻扎在南市董家渡附近，蒋本人决定随带警卫队长便衣进入法租界。为了保护蒋介石的安全，警卫队抽调了60多人，开了两辆军用卡车，由董家渡出发，经外马路转一支春街，准备进入法租界的爱多亚路。车到一枝春街口，被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拦阻，不许这批军警进入租界，并将两辆警卫车拦进法租界巡捕房，警卫班长也被扣押。黄金荣得知后，亲自到法租界巡捕房，与程子卿一起向法捕房头头解释，说蒋总司令进入租界是看黄的，黄为安全起见，请蒋的警卫队开进租界到黄家保卫，希望和平解决。法捕房打电话请示法国领事馆，法领事感到事态严重，指示捕房让黄金荣出面调解，黄金荣主张先让被扣押的两辆警卫车开进法租界游行一圈，然后开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家。法捕房同意了黄的主张，通知一支春街的法捕房让警卫车开进法租界，经爱多亚路进入八仙桥钧培里路口。黄金荣办了这事，颇得蒋介石的赞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反共急先锋，蒋介石先后拨付10多万元费用，并在事后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聘任黄金荣为少将参议，杜

月笙、张啸林为少将顾问，后来又委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奖给勋章。黄家花园落成时，蒋介石题了“文行忠信”四字，黄金荣奉如至宝，刻在黄家花园四教厅（四教厅的命名就是根据蒋介石题的四个字）右边的六角亭上，在黄氏门人结社时，也以“忠信”为社名。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80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不下3000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在做六十寿辰时，他把漕河泾的黄家祠堂扩建为黄家花园，就是靠徒子徒孙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礼，自己没花一文，还捞进几万元。现在八十做寿，应该又是一个良机，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对我和鲁锦臣等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当时我和鲁锦臣、杭石君、[illegible]天健等商量后，请杨虎、杜月笙主持，黄振世为总务，鲁锦臣和我接待宾客。那天前来拜寿的蒋纬国、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各局局长，由杨虎、杜月笙接待，后来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将近11时，李济深来了，吃了一碗素斋面后，由我陪同去向黄金荣拜寿，李称黄为老大哥。黄金荣听不大懂李济深的话，后来杨虎把李济深的话详细讲给黄金荣听，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孙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帐。现在蒋介石对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以后李和杨虎同黄金荣密谈，我不在场，情况不明。据我了解，过去杨虎、李济深同黄金荣私下做军火生意，曾托黄金荣向法捕房总巡买过军火，是由黄金荣的门徒程子卿接洽的。李济深离开玉佛寺之前，黄金荣邀他一起拍照留念，黄、李两人拍了一张，黄金荣、王晓籁、李济深和我四个人也拍了一张。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

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鲁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动漕河泾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外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称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泾前前后后，沿路站岗。在占地近60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12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具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寿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十一、黄金荣与汪精卫的关系

汪精卫和黄金荣的往来，始于抗日战争之前。1935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汪精卫在照相时被人打了两枪，到上海治

疗，黄金荣替他请医生，从此两人有了交情。汪精卫投敌筹组伪政府前，曾到黄金荣家，请黄召集工商界及社会名流开会。起初黄金荣想以大世界为开会地址，汪精卫认为大世界厅堂小，不集中。后来黄金荣给他选择大光明电影院为开会地址，并要袁履登和其学生程子良布置会场，让袁履登、王晓籁等通知各界人士。汪精卫在会上发表了“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谬论，要求各界人士支持“和平救国”。随后，汪精卫在日本人开设的乐山花园大酒店宴请黄金荣，那天由我和龚天健伴随前往。酒宴上日本军官佐藤对龚天健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工作，黄先生在上海名气大，说句话就能算数的。”龚天健回答说：“黄老板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早已退休。”黄金荣接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老了，不中用了。”边说边身体摇摇晃晃，我马上扶着他离开了乐山花园大酒店，龚天健向佐藤和汪精卫打招呼后告别。

汪精卫又叫周佛海到黄金荣家，我和龚天健接到楼上会见黄金荣。周佛海请黄金荣当上海市市长，黄金荣躺在藤椅子上对周佛海说：“谢谢周先生，我身体实在不行，加上自己没有学问，现在我不用说站起来，就连坐上一个钟点也不行。”我帮腔说：“老太爷，我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抽上几筒烟提提精神。”龚天健接着说：“周先生，今天黄老板身体不好，非常抱歉，改天再说。”他就伴同周佛海送出门外。

此外，又有伪黄浦分局长日人小林和其他日本人曾到黄金荣家中拜访，请黄金荣当维持会会长，黄金荣同样地装病，婉言推辞。还有个徐铁珊，据说曾教过日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特务机关利用徐铁珊的洪门关系，组织黄道会。徐铁珊也到黄金荣家中请黄金荣帮忙，主持黄道会，黄金荣同样以病推辞。

日伪多次请黄出山没有达到目的，最后派来了一个名叫藤曲的特务，名义上是保护黄金荣的安全，实际上是暗地监视。这个

滕曲长驻黄家，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才离开。

据黄金荣对我和龚天健、杭石君、鲁锦臣等几个心腹徒弟闲谈，他装病推辞担任伪职，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怕死。傅筱庵被刺杀后，黄金荣对我和龚天健等说："给日本人做事名声臭，性命不安全。"二是蒋介石在重庆也说抗战，黄金荣的门徒胡宇之在申报馆工作，常到黄家告诉政局和重庆的情况，黄对蒋仍有留恋，曾说："事情不要做绝，光棍不打九九，留个余地为好。"三是黄金荣爱听评弹，在钧培里黄家，常有他的门徒请来评弹老演员为他说唱，听《岳传》感到岳飞精忠报国，受人尊敬，而秦桧夫妇奴颜卖国，遗臭万年，对他的思想上有触动。有一次黄金荣在听评书《岳传》后对我和龚天健、鲁锦臣等几个心腹徒弟说："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据了上海，但它不能把上海搬到日本去。我能得势窜上去，同蒋介石有关系，他好我也好。现在他在重庆，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遗臭万年，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四是黄金荣老于江湖，惯用"两面光"伎俩，凭他的经验，自己不出头露面，利用门徒和别人办事，可以坐享其成。于是介绍门徒卢英当了伪警察局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担任伪职，从而加以遥控，左右逢源。

汪精卫做寿时，黄金荣特请日本三菱洋行买办王一亭精绘《长眉罗汉寿佛图》一幅，派秘书龚天健到南京送给汪精卫，表示祝贺。

黄金荣曾托周佛海帮过一次忙，原因是他的门徒史雨春那时是上海糖业的领袖，伙同糖商从台湾运来食糖，多次逃税，被伪税务局查获，将四马路善生糖行的老板席德霖扣押，并抄走了200包蔗糖，价值六七亿元储备券，还要罚款5亿元，查处史雨春。史雨春非常着急，找黄金荣想法；史雨春的妻子同黄金荣的媳妇李志清是结拜十姊妹之一，也向李志清求救。黄金荣和李志清派我陪史雨春的妻子一起到周佛海的小老婆家中（在马斯南路），送给

周佛海小老婆3万元现钞、5根金条。第二天，周佛海打电话给黄金荣，黄金荣叫我晚上再到周家，我到周家，周佛海说："我派人同你一起到仓库去，你要多带些人手，在今夜把200包糖搬走，不要耽误时间，税务局方面我已通知，只要补税，就不罚款了。"我听后就按照周佛海讲的办理，这事便顺利解决。

黄金荣还派我采购过粮食。在日伪时期对粮食统制极严，当时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已落水参加统制金融、粮食、纱布的伪组织。黄金荣要我找袁履登联系，袁让我到苏州买了一批大米运回上海，在老西门关帝庙、武定路财神庙等处施粥。

1940年至1945年间，黄金荣秘密同重庆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顾祝同联系过，顾祝同曾派其妻舅许某到钧培里与黄见面，黄金荣派他的门徒秦兴炎到南京及浙江等地第三战区所设的办事处联系。我听秦兴炎讲起，他去找顾祝同是请顾发一张委令，做地下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前，顾祝同委派何尚时为驻沪联络专员办事处专员，秦兴炎为支队长，黄金荣的儿子黄源熹为大队长。何尚时与黄元涛、秦兴炎结拜为兄弟。听说何尚时现在台湾为国大代表，秦兴炎到台湾后任候补国大代表。

黄金荣同当时在太湖的游击队双枪王八妹也有联系。约在1941年间，美国一架战斗机协助重庆对日作战，被日方击落在太湖地区，该机驾驶员美国人白劳特（译音）乘降落伞降在太湖地区，被游击队王八妹的部下救护下来，王八妹派人向黄金荣报信，秦兴炎、何尚时、陶雪生等设法将白劳特护送到后方。

十二、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关系

在黄金荣和杜月笙两人中，黄的年龄较大，发迹较早，杜月笙是黄金荣一手提携起来的，两人又长期共同从事烟赌生意，关系本甚密切。后来杜月笙与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发生关系，门

徒陆京士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门徒王兆槐担任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门徒陆京士操纵上海工会，杜月笙的权势和活动能力超过黄金荣，两人之间产生矛盾。最使黄金荣恼怒的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当英美烟厂工会主席的陈培德想竞选上海总工会主席之职，竟被陆京士指控有共党嫌疑，被警备司令部扣押，使黄金荣十分难堪，气得黄金荣咬牙切齿地说："哼！没有我提拔，他哪能窜得上？今朝倒好，吃饭忘记种田人。他忘记我，我就没有他。"当时黄金荣直接向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要求保释陈培德。在蒋介石来上海到黄家花园时，黄金荣又将他的门徒被杜月笙打击的情况向蒋介石诉说，蒋指示杨虎从中调停，因杨与黄、杜关系都好。经过杨虎劝说，陆京士和陈培德各当了一段时间的总工会主席，似乎平分秋色，但是黄杜两人暗地里都在勾心斗角。

1948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溃败，各地物价飞涨。蒋介石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督导专员，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副专员，统率所谓"戡乱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打算大干一番，稳定颓局。

蒋经国一到上海，黄金荣、杜月笙都相继邀请，准备盛宴招待。但蒋对杜月笙的几次邀请都置之不理，使杜心感不妙。黄金荣派心腹黄振世备好请帖面邀蒋经国，因黄振世当时被聘为评价委员，可以和蒋接近。蒋经国开始推托不去，黄振世说："如果到黄家或黄金荣的荣社去不便，那就请到我的"振社"去，我是专员部下的评价委员，到振社去可说召开工作会议，名正言顺。"蒋经国口头答应第二天赴宴，黄振世得意非凡。第二天他把酒席摆好，不料来的却是蒋的代表吴绍澍和蒋恒祥，大失所望。其实黄振世邀请蒋经国到振社，我风闻后已向黄金荣报告，黄听了改变主意说："让大少奶奶去请他适当，大少奶奶交际手腕好，小蒋先生会听她的。"说罢，微微一笑。我听后告诉李志清，由她亲自打电话邀请蒋经国到黄家赴宴。第二天，蒋经国如约到了黄家，由

李志清接待，蒋在席间表示“打虎”决心，并向李志清询问上海交易所内投机倒把的情况。李志清的儿子黄起予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她本人是后台老板，对交易所的情况一清二楚，但她想借此代黄金荣打击杜月笙，就回答道：“交易所是杜家爷叔（指杜月笙）负责的，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管理，我的儿子想申请执照当经纪人，要花10根大条，向杜家爷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5根金条。”李志清这样告了杜月笙父子两人一状，黄金荣大为赞赏。后来蒋经国把杜维屏逮捕关押，震动上海，市民称快。这虽然和李志清告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李志清的挑逗，充分反映黄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此外，两家门徒的明争暗斗，事例很多，当时上海人大都了解，不再赘述。

十三、黄金荣不去香港及解放后的情况

上海解放以前，杜月笙首先离沪赴港，接着黄金荣的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财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当时有些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黄金荣没有同意。当时他曾对我和丁永昌、龚天健等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字条，交给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据龚天健说，这张字条他和黄起明（黄金荣的孙子）看到过。这可能也是黄金荣不去香港的原因。

1950年，黄金荣对我说：“现在我买了5万元公债，没有钱，你到香港去找杜月笙，请他给我讨还一笔10万元借款，这是刘裕章早几年向我借的。”我于1950年2月去香港找杜月笙，碰了个软钉子，他要我去找大少奶奶（即李志清）想办法，我只得回上海，把情况告诉黄金荣。黄金荣叫秘书写了一封信给杜月笙，大意是，现在派程锡文来港，关于追还刘裕章10万元欠款，务必请你协助解决。我问黄金荣，这笔10万元款子刘裕章是怎么欠下的？

黄金荣说，这是他和杨虎、程子卿等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法国人乔瑞士私下做的军火买卖，卖给了刘裕嘉，刘是军火商人，没有付过款。黄金荣私下多年和杨虎等做军火生意，但他守口如瓶，连我也不知道。我带了黄金荣的信，第二次去香港找杜月笙，黄金荣还几次打了加急电报给杜月笙，请杜设法将欠款追还。杜月笙最后叫其门徒万墨林汇给黄金荣5万元，我才返回上海，陪伴黄金荣，直到他1953年病故。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黄振世口述　何国涛整理

（一）家　庭

上海最大的清帮头子黄金荣（锦镛），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十一月初一，自幼生长在上海漕河泾。黄发迹之后，就将父母墓地周围的土地买下来，起造黄家花园，里面还有一个黄氏家祠，因此有人说他是上海人。其实他的原籍并不是上海。据汇中银行经理黄雨斋说，黄金荣是余姚人，老大房食品店主人陈汉勤却说他是崇明人，但黄本人每次对我谈起，总说他的祖籍是苏州。他只有两个胞妹①，长妹住漕河泾，除了婚丧大事，平时很少来往。次妹嫁给邹姓，丈夫早死，一直寄居在黄宅。

黄金荣自双亲去世后，就被叶姓招为上门女婿。元配叶桂生②，后来也是一个出名的女流氓，曾生一子，领有童养媳李志清。此子抚养到17岁就去世了，李志清一直守寡未嫁。叶桂生自与黄结婚后，因黄在外面与盛家七姨太有染，又与京剧名伶露兰春私通，夫妻间感情渐有裂痕。1930年，黄在父母坟墓周围起造黄家花园，依照叶桂生的意思，认为黄是叶姓的上门女婿，要定名为

① 此说不确，见程锡文文。——编者

② 一说为林桂生。

叶家花园，黄坚决不肯，两人从此闹翻分居。黄宅当家大权就付之其媳李志清。外间纷传黄与李志清有暧昧之事，黄宅佣人背后对我也作如此说。但黄在门生面前，对李志清强作大方，若无其事。

黄金荣开设共舞台，长期聘露兰春挂正牌。当时正是时装剧盛行之时，露擅长演时装戏，其舞台营业因而大盛。黄见露色艺双绝，即以暴力占露为妾。但两人相处不久，露也继叶桂生下堂求去，嫁给唱老生的安舒元。

此后，黄就与盛家七姨太同居于吕宋路10号，成为公开的秘密。抗战胜利后，黄授意邱子嘉，拟由门生发起，将盛家七姨太扶正。酝酿多时，扶正一事拖延未决，后来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黄有领子名源燕，小名叫做连弟，原是大舞台一个武行的儿子。源燕长大后，充当大世界里面高峰舞厅的经理，依仗黄金荣的势力，也收了一二百个门生。抗战胜利后，又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戚再玉等相勾结，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义务稽查大队长，收罗了一批投机商人和帮会分子充作爪牙，帮助稽查处当眼线。黄金荣的外孙邹政之就是在源燕负责的一个义务稽查大队里当稽查员的。

李志清自丈夫去世后，先后领养了两个儿子，大的叫成法，小的叫成德。解放后成法与养母住在香港，成德留在大陆，是新华影片公司老板张善琨的女婿。另外还领了一个养女，也带往香港。李志清因为多年主持家政，搜括了不少私蓄，去港时把所有现款首饰全部席卷而去。

（二）学徒、捕快到探目

1880年，黄12岁，由熟人介绍到上海邑庙九曲桥得意楼旁一家叫凌云阁的裱画店当学徒。据黄自己跟我说，这种小店里的学

徒，除照顾店务外，附带充作淘米、煮饭的伙夫，根本没有工资，老板每月只给他50文月规钱，剃头、洗澡而外，就所剩无几了，他认为干这一行没有出息，要想找门路改换职业。80多年以前的上海，游艺场还没有兴起，要算城隍庙一带最热闹，得意楼茶馆里每天有人吃讲茶，摆龙门阵，成为流氓出入聚会的处所。1883年，黄金荣学徒满师，有了9600文一年的工资，他就不时上得意楼吃茶，挤入流氓队伍里鬼混，渐渐结识了上海县衙门里一班六房书吏、捕快差役等人。大约在1886年，经过多次请客送礼，终于被他谋到一个上海县值堂的差役，不久又充作捕快。

那时，上海县属松江府管辖，他每天要送公文到松江府去，往来150多华里，经常穿了蒲鞋，背着雨伞，提着灯笼，从清晨三四点钟起程出发，要到深夜八九点钟才能回到衙门。日子久了，他感到这种差使虽能仗势欺人，找些外快，但毕竟要起早落夜，风来雨去，太辛苦了，于是又想另找出路。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法帝国主义者第二次扩充上海法租界，设总巡捕房于公馆马路大自鸣钟（今为金陵东路老北门）。由于辖区扩大，法捕房公开招考华捕，黄金荣也去报名应考，但没有考取。后经洽人向主考者送礼行贿，才录取为一名三等华捕。

（三）处世手腕和对帮会的影响

清洪帮流氓集团发展到清末民初，势力越来越大，成为旧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产生了象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所谓“大亨”，其中固然包含着许多根源，而租界的存在却是一个主因。

黄金荣知道当一个洋奴，要向上爬，必须博取法国主子对他的信任。为了表现自己的侦缉才能高人一等，他收买了一班惯窃惯盗充作眼线，利用他们去破获另一批窃盗集团所犯下的案件，有时还和眼线讲通，保证被捕后可以保释。由眼线纠集了一批人到

界内去进行抢劫，黄则密报法国主子，法国主子派出探捕，化装埋伏，果然将盗匪一网打尽。如此连续破了几次盗案，法国主子认为他干练有能，对之另眼相待。

为了造就自己的势力，他又唆使一班小流氓，向当地商店、居民和殷实富户去寻衅取闹，自己则紧跟在后面大做好人。法捕房向有便衣巡捕配合包探巡逻街头维持治安，黄金荣每次出巡，碰到流氓向商店拆梢这一类情事，他一定要对着拆梢的流氓“大摆华容道”，故示惩罚，而那个被打骂的流氓对黄金荣犹如老鼠见了猫，使得旁人看了，认为黄金荣真有一套，其实都是预先布置的假戏文。有时又运用另一种手腕，提高自己的“威信”。如在法捕房对街的兴记咸货店，黄暗地里叫人去捣蛋，一面又指使门生对店主说：“这事只要托黄老板出来一压，保证太平无事。”店主晚人请黄出场，果然不再有人到他店堂里去捣乱了。总之，黄金荣暗中制造了纷乱的不法情事，闹得租界内鸡犬不宁，而他自己又来亲自消灭这种纷乱的现象，这是他早期博得声誉的手法。

到了后来，他在法捕房的地位巩固了，就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培植封建帮会势力。举例来说：杭州阿法（一说阿发），就由黄金荣一手扶植，成为民初出名的大流氓。太古、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鸦片提货装运，均归阿法为首的八股党独享全权，黄为其撑腰，坐地分赃。如果别人去提货，法捕房就要派出探捕，严加缉捕，归案法办。杭州阿法又承包了法租界花捐，凡在法租界辖区内开设的三等妓院，都得依靠阿法牌头才能开业。这样，杭州阿法在十六铺一带，仗恃黄金荣的恶势力，为非作歹，欺压商民，横行到了极点。阿法的徒子徒孙，经常在聚宝楼等处吃讲茶、打架、率众以利斧伤人。

法捕房的流氓班头目徐阿东对待流氓一向采取高压手段，流氓畏之如虎。黄金荣要提高“白相人”的地位，压制徐阿东，颇费苦心。在第一次欧战结束以后，黄金荣因维持法租界治安有功，

法帝加聘他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领少将衔，法捕房里所有华籍探目、巡捕，均由黄金荣提名升级。徐阿东当然也想往上爬，于是便向黄金荣请求提名，黄叫他到新北门聚宝楼去找杜月笙，说这次提名升级的探捕，都归杜月笙拟定名册。徐阿东如约到聚宝楼去见杜月笙时，杜早已得黄金荣暗示，约好两租界以及闸北、南市地区的白相人，等候阿东到来。徐阿东对杜说明来意后，杜月笙立即拍胸担保，但说，今后在公事方面，要请徐先生对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另眼看待。徐只好一口应允。杜月笙当着众人的面，高声宣称："先生和我们是一家人了，今后不走大家的样（就是殴打和逮捕，使流氓难堪的行动）。"徐阿东经过这一次事实教训，不敢再以硬派作风对待流氓。这事以后，英、法两租界捕房里的包探，不但不敢再开罪白相人，反而向大流氓门下投帖，认作门生（如英捕房督察长刘绍奎等拜在蔡洪生门下），流氓势力更加飞扬跋扈。

在黄金荣和杜月笙之前，白相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如杜月笙的师父陈世昌，绰号套签子福生，在天后宫一带用三根红木签子供游人用竹圈投掷，骗取学龄儿童的糖果钱。此外又强包附近居民婚丧喜事的仪仗队，称为吃"红白饭"等等。而陈世昌在早期白相人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头面角色。黄金荣利用帮会分子打天下，慢慢爬到法捕房华探督察长时，流氓势力就大为抬头，黄是他们可靠的后台老板。由黄金荣幕后操纵，承包了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于是造就了象杜月笙、金廷荪、马祥生那样的大流氓。杜金两人又从开赌台和包销鸦片烟得来的钱，经营工商事业。黄金荣自己经营了大世界、共舞台等游艺场。这样，白相人的生财之道，就从妓院、浴室、旅馆、饭店等类扩大而为工厂、银行、公司的老板，挤入名流闻人之列。

（四）网罗羽翼和勾结军阀政客

黄金荣投靠了法帝国主义，并在白相人中有了地位以后，进一步拉拢各种恶势力为自己服务，勾结官僚政客作为靠山。这样就使黄金荣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政客的混血儿，在社会上起到极大的影响。

黄金荣是怎样勾结官僚政客和拉拢各种恶势力的？

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看中了共舞台坤角露兰春，接连几天到共舞台看戏捧露兰春的场。前已言之，露兰春早被黄金荣霸占为妾，黄看到卢小嘉所作所为，醋海生波，派他的门徒到共舞台将卢小嘉打了两下耳光。卢遭辱后，向乃父卢永祥哭诉。卢永祥闻言大怒，即命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原卢的部下）设法将黄拘捕，押解至龙华，要置他于死地。何丰林的母亲信佛教，听到黄金荣常和丛林的当家和尚打交道，况且黄金荣又是法捕房督察长，有帝国主义当靠山，何母认为此人开罪不得，要何丰林释放他。何迫于母命，只得释放。这一场风波却使怨家结成亲家。黄感何母缓颊之恩，拜认她为寄母，这样，黄金荣与何丰林结为义兄弟。从此黄金荣不但有外国帝国主义为靠山，也有中国军阀为靠山。黄何结交之后，进一步勾结当时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贩卖鸦片，从中牟利，造孽钱越来越多，恶势力越来越大，凡在上海租界地区干不正当行业的人，都得向他送礼行贿。后来，上海市面上一批闹事生非的白相人，均惟黄的“马首是瞻”。如瞎子黄清（施黄清）、红木阿胖（沈文元）、闹天宫福生（徐福生）、卖鱼小顺（杨小顺）、松江老大（傅丰来）、歪头李德荣、三上吊长生、瞎子锦芳（朱锦芳）、阿四徒（浦金荣）、季云卿、烂脚炳根（黄炳根）、蔡和尚（蔡洪生）以及出道较晚的谢葆生、水果长赓（沈长赓）、水果荣生、唐嘉鹏（阿裕）、阔嘴巴亦生（张亦生）、杜月

笙、金廷荪（阿三）、张啸林、马祥生、许宝福、顾竹轩等，莫不罗致于卵翼之下，集流氓势力之大成。

黄金荣勾结新旧军阀，另有一套随机应变的势利眼光。如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曾派金廷荪等组织一批流氓去保驾。徐国梁当淞沪警察厅长时，黄就与徐国梁勾结起来，该厅侦缉队长赫仕林成为黄门的常客。后期担任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的乔松生、卢英等，黄收罗他们充作门生。民初，袁世凯当政，袁党联络法捕房总巡在租界内逮捕国民党分子，有一次要到望志路去捉汪精卫与陈公博，黄金荣采用两面手法，他带领一批探捕出发之前，暗派门徒程子卿去通风报信，以留后步。在他一生中勾结官僚最得意的，是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初在陈英士部下，陈死后，蒋在政治上失去靠山，乃与戴季陶、陈果夫从事物品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因投机失败，处境十分狼狈。蒋乃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投靠孙中山先生。因迫于债务，又缺乏路费，由虞洽卿介绍他去投拜黄金荣为师。黄见此笔交易好做，不但不收蒋介石一笔压帖贽敬，而且送给蒋介石大洋 200 元作为路费，助其成行。1927 年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这自然使黄感到无上荣耀。黄为讨蒋欢心，把蒋介石投递门生帖子悄悄送还，不以“师父”自居，给面子与蒋介石，使蒋黄之间始终维持密切关系，彼此利用。

黄金荣为着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又挖空心思用种种手法拉拢各方面的恶势力，对下层阶级还施以小恩小惠来毒化麻痹。如他对江湖上落魄的三教九流，也肯接济一点。到了晚年退职闲居，每天上浙江南路逍遥池浴室洗澡，必带二三十元银币，分赠地头上游乞，每人 2 角至 1 元，无日间断。乞丐队中视为惯例，等他的汽车停在逍遥池门口，就派代表去领受赏赐。黄金荣对在内地犯案潜逃来沪的巨盗惯匪，也能网开一面，以留后步而拉关系。特别对于到上海来的外埠帮会分子，更加沆瀣一气，只要引见有人，

备了一份贿赂厚礼，就来者不拒，广事交结。这不仅因为他们臭味相投，更重要的是黄金荣想扩大他的影响面，将自己的恶势力发展到各地去。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黄金荣与外地帮会头子也渐渐交上朋友，如武汉的洪帮头子杨青山、向松坡，九江地界有名的鸦片贩子九江阿生，苏州的刘晋康，天津的潘子欣，扬州的曹幼珊，华北的高士奎以及宁波的俞康树等，凡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上海活动时，黄对若辈均予便利行事，多方照顾。因此之故，黄的门徒到外地去干些走私贩毒之类的不法情事，当地帮会头子莫不爱屋及乌，大力帮助。

（五）组织中华共进会，投入反革命政变

当北伐军抵达上海前夕，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租界当局借口保护租界安全，命令黄金荣、杜月笙等组织纠察队，协助维持界内治安。法捕房仅有的16辆坦克终日在公馆马路、霞飞路等热闹马路上往来巡逻，以防止法租界工人起来响应北伐军，实际上充当了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

黄金荣的早期门生，大都是两租界捕房的探目和军警人员，如法捕房的陈三林、金九龄、程子卿，英租界捕房的陆连奎、尚武、冯志铭等，以及南市公安局侦缉队的乔松生、卢英、张荣、董明德等。工商界的门生并不多。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当时是他手下得力的门生，唐徒王文奎、樊良伯各有一二千名徒弟。马祥生虽为陈世昌徒弟，但他早年在钧培里黄宅曾充厨司，是黄一手提拔起来的大流氓，他如杜月笙、金廷荪以烟赌起家，亦由黄所扶植。他以法捕房督察长身份组织起来的流氓武装队伍，人数达二三千以上。

蒋介石阴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一面勾结英法帝国主义，一面策动清洪帮集团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队进行反革

命大屠杀。他派杨虎、陈群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利用中华共进会名义，在申、新各大报上刊登反共启事，随即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袭击工人纠察队。据亲身参加这次反革命政变的董明德（董为镇海人，杭州阿法女婿，和我拜把兄弟）告诉我：他那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分队长，每天押解着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从法租界到龙华司令部。马祥生和金廷荪在这次反革命血腥大屠杀中，都卖足了力气。金廷荪后来和我谈起这件事，常常以此自夸，说他一生中有几件自命不凡的事：一是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命他去保护；一是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押送李立三，驱逐出法租界。

中华共进会设办事处于爱多亚路安乐宫旅社内。黄金荣、杜月笙坐镇指挥。事先与第二师刘峙部阴谋劫取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由黄等派出便衣流氓数百人，持械围攻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工人纠察队总部。正在捣毁袭击之时，刘峙部队突然又将共进会分子赶走，对被害的工人纠察队假意慰问。临去时，邀请工人纠察队全体到北站广场上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工人纠察队负责人不知是计，竟去赴约。他们将带去的枪械放下架好，准备观看第二师演出节目时，就被预伏的反革命部队包围缴械，接着就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一次替蒋介石充当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事后得到了北伐总司令部不少勋章和奖励，并给以顾问、参议一类的名义。黄金荣晚年退隐家居，每逢黄宅有什么结婚、做寿一类的喜事，他必定将这些勋章挂在胸前，以此自耀。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勋章中，还有法租界当局和北京军阀政府颁发的。

（六）黄杜矛盾与忠信社

自从四·一二政变以后，杜月笙跃居为流氓政客，他的实力

和地位超过了以“老太爷”自居的黄金荣。究其原因，有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三个流氓头子是依靠黄金荣势力承包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起家。黄金荣身为法捕房华探督察长，只能在幕后操纵掌握，不能公开出面去经营烟馆和赌场，实权就落入杜月笙和金廷荪手中，黄只是坐地分赃，分尝一脔。杜金两人从烟赌中获得厚利，在有钱就有势的旧社会中，连法捕房里法籍捕头都见了眼红，甘愿投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如当时法捕房嵩山捕房捕头“鹅牌”、小东门捕房的捕头“马松”这两个人都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每月可向杜月笙赌场拿500元俸禄。一班与杜地位相等的白相人，如顾嘉棠、芮庆荣、孙嘉福、荣炳根、袁珊宝等，甘为杜所利用，充实杜党势力。

第二，杜月笙与国民党反动派打成一片后，交结孔祥熙和宋子文，与特务头子戴笠结成生死之交。他又千方百计收罗国民党党政人员投拜门下，并以重金聘请“名士”幕僚，组成智囊团，助其定策设谋，扩大声势。这就促使杜月笙在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地位大为提高。黄金荣收录门生，只视作个人进益的一条途径，他的门生中只有唐嘉鹏、丁永昌辈替他奔走效劳，实力渐不如杜。

第三，杜月笙热衷于工商事业，开设银行、商店、工厂等等，影响越来越大，黄金荣故步自封，从来不肯出资与他人合营企业，所以除了早期在法捕房督察长任内经营的共舞台、大舞台、大世界等等以外，只有一些房地产。他在工商业的收益反不如金廷荪。

杜有政治野心，肯花钱，手面阔，手段辣，能笼络别人，利用别人。黄满足现状，只肯花些小钱，不愿冒一点风险。所以他办的所谓“事业”都是些不会亏本的买卖。黄以敲诈勒索所得，购置房产，坐收房租，认为较投资于工商业牢靠稳妥，比将现金存在银行里还要保险。有人劝他加入股份合资开店，他害怕亏本连累，一概谢绝不干。终其一生，没有和人合营过一项企业。

杜月笙早年跟杭州阿法在十六铺一带私运鸦片，帮会中辈份极低，后得黄金荣撑腰，渐露头角，所以才有后来这样炬赫的地位。黄金荣60岁做寿那年，曾与杜月笙、金廷荪结为换帖弟兄。杜金两人尊黄为大哥，双方勾结甚密。但到了杜月笙势力达到登峰造极之后，黄杜两人渐有裂痕，只保持表面上的合作了。

先是，黄的门生陈培德当英美烟厂工会主席，时在九·一八之前。杜的门生陆京士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为打击黄门，扩充自己势力计，指陈有共产党嫌疑，拘捕关押，不肯释放。后经黄金荣亲自出马，向司令杨虎直接说情，陆才将陈放出。陈培德获释后，对陆怀恨在心，在黄金荣前哭诉进谗，说陆心目中只知有杜月笙，不知有"老太爷"，矛盾误会，日益加深。我于1928年进入黄门后，因加入鱼市场筹建工作，被杜党排挤倾轧，心怀不满之后，也在黄前点火。那时正当杜月笙的恒社气焰极盛之时。1936年的夏天，黄默许门生秘密组织忠信社，专事对付杜党，企图制造杜门师生矛盾，搞垮恒社。

忠信社命名的由来，取之于漕河泾黄家花园走廊前面六角亭上蒋介石写的"文行忠信"石碑，黄即以其中"忠信"两字为名，组成社团。忠信社的社员在黄门子弟中也不是公开的，其中主要分子有邱子嘉、丁永昌、陈培德、张善琨、徐笠衫、姚松如、陈福康、鲁锦臣、潘瑞生、龚天健、胡憨珠、杭石君、吴玉荪和黄振世等，算是该社委员。社员则由委员口头通知聘定，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开过成立大会。黄金荣名为社长，但他只默许我等按其指示去搞，每次集会均不来参加。黄在组社之前，密召我们几个亲信门生说："你们可以搜集一些关于杜月笙的确实资料，由我亲自向委员长告发。"我等得此要领，即着手组织忠信社，起先在黄家花园聚会，每星期日以聚餐为名，秘密商量搞垮恒社的对策。后来感到杜党势大，乃联络杨虎的兴中社，结成联盟。大约在1936年夏秋之际，两社主要分子每逢星期日，相约到半淞园聚

餐，双方凑满一桌圆台面，视为常例。当时所以择定半淞园聚餐，因黄杨两人对杜尚保持虚假情面，不愿被外人侦知内情，半淞园地处南市郊区，可以避人耳目。当时初步定策：第一步，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门师生矛盾，预定拉拢的对象中有鱼市场常务理事唐赞之和《大美晚报》发行部李骏英诸人。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作为密告材料，好由黄金荣去向蒋介石告状。这样举行了六七次秘密会议，搞垮恒社的阴谋仍不能实现，而搜集杜月笙劣迹又查无实据。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忠信社的秘密组织就在连天炮火声中趋于瘫痪，遂即销声匿迹，无形解体了。

（七）退休以后的剥削生活

黄金荣在做过了60岁寿以后，就辞去法捕房华探督察长职，退休闲居。沈德福继其后任，继沈后任的是任水扬。这两个人皆因不趋奉黄金荣，为潜存在法捕房里黄金荣的势力所排挤而去职。继任后任的是金九龄，以及法捕房政治部主任程子卿，两人均出黄门。担任法捕房总巡多年的乔辨士、法驻沪领事杜来，在黄退休后常到黄宅，商量有关法租界治安的事情。黄在幕后操纵法捕房警权，以维持其帮会集团中的霸权。因此，黄的退休是以退为进，将衣钵传之徒弟，自己以太上皇自居的一种做法。

这时，他的门生约有1000多人，每年都要向他送礼以示孝敬，加之他在法捕房督察长任内，受贿贪污之所得，经营了共舞台、大舞台和大世界，这是一项包赚钞票的生意，收入足够他挥霍一世。所以他到了晚年，就不问外事，在家纳福，过其剥削生活。

荣记共舞台是他最早经营的戏馆。当时京剧是男女分开的，女演员搭班演出的，称为髦儿戏。他在共舞台首倡男女合演，营业大盛。

一·二八事变后，他将共舞台租给张善琨。其他如大舞台，最早租给沈长赓，后由范恒德长期租用经营。黄金大戏院则租给金廷荪。此外尚有大世界、荣金大戏院，则派其门生管理经营。

大世界初为黄楚九开设，黄金荣出资50万盘下，改为荣记大世界。黄也有个打算，按照当时情况，将50万元现钞存放银行，每年只得3000多元利息，大世界每天可出售门票五六千张，日得五六百元。除去各场开支，实际收入每天可得二三百元。星期例假及元旦、春节就有加倍的收益。一个月的收入约在七八千元以上。他认为这项买卖不会亏本，况又可安插大批徒子徒孙在那里混饭吃，乐于承盘经营。

钧培里黄宅内部的家务由寡媳李志清当家。全宅有男女佣工30余人。账房（俞永刚）、秘书（骆振忠）、当差、装烟、门房、保镖、司机等等，各司其职。此外，有厨司3人及房里打杂的女佣五六人。黄息影家居，犹如下野官僚，每天交往访会的客人川流不息，门前车水马龙，迎来送往，户限为穿。这些客人中，有外省军政人员、当地富商缙绅、清洪帮流氓头子、下野军阀、失意政客以及国民党达官贵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全有。如有女宾，例由李志清出面接待。招待这些客人的方式，不是抽烟，就是赌博。黄公馆里的麻将，每天至少有四五桌。抽头所得的钱，由李志清分给内外仆役，作为赏赐。

黄以势利眼光待人，敬客的香烟是分等级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门，中等客人奉敬白锡包，上等客人则为茄力克，再高级一些的就以上好大土供给。对于子弟也是如此，身价较低的门生，见面点一下头，就算敷衍过去，对于地位高势力大的门生，才显得亲近一些。

他本人烟瘾很大。客人如有请托谋求之事，就在鸦片铺上商量解决。他经常用四五支名贵烟枪，轮流调换。所吸烟土，均为多年储藏的大土，和以上等沉香珠粉之类。所以他虽为瘾君子，而

脸上毫无烟容。

国民党政客中与黄金荣有过交往的，有宋子文、孔祥熙、王柏龄、杨虎、吴铁城、戴季陶、吴稚晖、于右任、蒋伯诚以及大汉奸褚民谊、陈群等人；上海工商界则有虞洽卿、王晓籁、俞佐庭、方椒伯、黄延芳、袁履登、林康侯、秦润卿、闻兰亭、盛老三、盛老七、李思浩、李祖莱等。此外，如南市豪绅李平书、姚紫若，南市水电公司姚慕莲，救火会毛子坚，闸北王丙毅、顾馨一，与黄均互有勾搭，常到黄门作客，孝敬的帮会分子，三教九流，无不齐全。我所接触过的，有大字辈高士奎、曹幼珊、张锦湖，也有北京著名的飞贼燕子李三。

黄自退隐闲居，不时到漕河泾黄家祠堂游憩。他的门人对他阿谀奉承，便建议将祠堂扩建为家园，得黄默许。于是由唐嘉鹏、冯志铭两人经营其事，在黄门子弟及其他帮会分子中普遍捐募。各人视经济力量大小，分别出资，最少的三四十元，多的千余元。我那时捐助500元，唐嘉鹏出1000元，杜月笙与金廷荪大约捐出4000多元。这是一种变相的敲诈。捐募所得，除付出黄家花园的全部建筑费外，尚有几万元余款。两位经手人由于手续不清，双方互相攻讦，闹出一场狗咬狗的丑剧。黄偏信唐嘉鹏，对冯志铭大为不满，竟加以驱逐，冯因此有一年多不到黄宅走动。

新建的黄家花园占地约60亩，有一个很大的客厅，题名为“四教厅”。四壁悬挂黎元洪、徐世昌、曹锟等的匾额，是黄家祠堂的旧物。厅右一块“文行忠信”大石碑，是蒋介石送的。四教厅的建筑，仿造丛林的大雄宝殿。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中供福禄寿三星，两旁摆着12把红木大座，封建色彩十分浓厚。四教厅后面是一列钢骨水泥二层洋房，一共有十几间，充作黄歇夏的别墅。

花园内假山亭池，曲径通幽，颇多名贵花木，如玉兰、黑松、大牡丹等；桂花则尤为普遍。

黄家花园落成之后，每星期日，一般黄门子弟不邀而集，都到漕河泾花园内聚会，中午就在那里聚餐，游玩到下午三四点才尽兴而散。黄本人每年过了立夏节，就迁至花园内歇夏，一直到八月秋凉后，再回钧培里本宅。手下一班游手好闲的门生，成天陪着他抽鸦片烟或赌博，消磨岁月，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黄爱好挖花牌和碰铜旗两种赌博，龚天健、夜壶阿四、陈福康、鲁锦臣四个门生终日跟随为伴。偶然也到漕河泾附近小茶馆去摆测字摊（泡一壶茶闲聊），视作闲居一乐。

黄金荣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上海城隍庙每年一次的执香会，他是会长，他必率亲信子弟前往祭供叩拜，还叫些流氓装扮成判官、小鬼、阴皂隶，两个一对地搭成对子，面对面，在马路上表演。黄家花园内设有关帝庙，庙后土山上有观音堂，题名为"紫竹林"。每逢农历正月十三、五月十三和九月十三日举行关帝会，黄门子弟每人出资10元，到花园内关帝庙聚餐，菜肴由黄宅厨房供给，多余的钱就作为黄家花园的内部开支。这又是借名敛钱的一套手法。他又乐于交结僧道，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及上海龙华寺的当家和尚常到钧培里化缘募捐。黄出手不大，最多几百元。而各院主持均以得黄题名为荣，多少在所不计。他对江湖上落魄的三教九流，若有所求，惯以小恩小惠来扩大影响，拉拢关系。对于各项社会救济事业，不肯做发起人。在情面难却时，敷衍一下就算。他在法租界八仙桥办了一所金荣小学，由黄门子弟律师金立人任校长，算是他唯一赔钱的事业。

自从60岁生辰后，他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借祝寿为名，公开向门生和平素交往的人们敲一记竹杠。门生中稍有地位的人，至少送100元礼金，多的往往送500、1000元。杜月笙、金廷荪等辈，每年都送二三千元，视作常规。因他性好阿堵物，接近他的人摸透他的个性，故凡黄宅婚丧等事，大家都以现金相赠，不送礼物。寿诞酒席，例由黄徒仇万荣所开的桃花宫（后改大利春）包

办，有时归鸿运楼定席。这样每年一次的寿诞，除去办酒等各项开支，至少可赚一两万元。

此外，黄门子弟1000余人，每年三节要送节礼孝敬。这三节是端午、中秋和春节。如我这样，每节送门房20元、茶包100元、节礼100元。一年之间要向钧培里黄公馆孝敬600多元。黄金荣门生众多，加起来就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我为什么心甘情愿向黄金荣按时孝敬这许多钱呢？在旧社会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有势就有财”。我在没有拜黄金荣为师之前，只是个初露头角的生意白相人，剥削劳动人民的办法还不多。自从进入黄门之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抖起来了，担任了许多社会团体理事一类的职务，剥削的办法就更多。归根结蒂是依仗黄金荣的恶势力才能有这样的成就，所以也就乐意从我的剥削收入中抽出一些钱来供应自己的老头子。封建帮会的师生关系，就是这样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黄时常去吃小馆子，小东门德兴馆是他当年当法捕房探目时常去的。此馆后来盘给唐嘉鹏的徒弟吴全贵，吴开设泰新旅馆，制造红丸，是黄的徒孙。抗日战争时期，德兴馆因地处华界边缘，法租界当局在界边设置铁门，若遇紧急情况，就要宣布断绝交通，德兴馆的生意因而十分清淡，顾客寥寥可数。吴全贵特地邀请黄金荣去该馆会宴，把他当作活广告，以便招徕顾客。黄素来爱吃重油厚味，对当年德兴馆的红烧桂鱼和狮子头砂锅犹有回味，于是在一天中午，由钧培里开出汽车两辆，到德兴馆小宴，当即引起一班好奇的小市民聚而围观，要看一看这个流氓头子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为德兴馆大做一番宣传广告。抗战胜利后，苏州木渎石家饭店老板如法炮制，也邀了黄金荣到那里去小吃，把他当作活招牌，吸引顾客。石家饭店老板是黄门生，彼此利用，各得其所。

（八）黄门子弟内讧

黄金荣在晚年退居的最初10年中，不断收纳门生，视为一条进财的途径，有时往往闹出笑话。

安清帮师徒相承，最初以20字定辈份，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20个字。到了清朝末年，20字辈用完了，又添上“大通悟觉”4字。民初辈份最大的帮会分子是大字辈。黄金荣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在清帮中称为空子。按照帮会组织规定，没有进过香堂，就不能开堂收徒，所以他所收的都是门生，门生是没有字辈的。只因他位高势大，不需要再去投师拜祖，自有一批流氓头子尊他为“老太爷”。他虽不是真正帮会中人，但在帮会组织中的地位，反比几个大字辈的要吃得开。因此有人问他，他就开玩笑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划。”后来他的老朋友高士奎、曹幼珊、王德邻等大字辈都劝他认一个曾任通海镇守使的张镜湖为老头子，他也不推不就，实际上仍未举行过仪式。

虽然如此，但在黄的门生中，为了培养自己手下一批小喽罗，却有不少是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如我和卢英、董明德、何国梁等30个黄门子弟，在八·一三前，联合拜安清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并开堂收徒，继承封建帮会这份家业，收了许多徒弟徒孙。黄金荣晚年滥收门生，而这些门生中，有不少是我的徒弟徒孙，辗转浼人介绍，又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就和他的原来老头子成为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名为“爬香头”，是一件令人头痛犯忌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在外面混混的门生，曾经劝黄停收门徒，他当面也认为应当如此，但不多几时，却又开门纳徒。这是与他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的剥削本性分不开的。

黄在法捕房所收的门生，除金九龄、陈三霖、程子卿等少数

几个人外，后来比较接近的门生，大都是他成为大流氓头子后所收。军、警、工商、文艺、科技以及星相医卜等各色人员全有。其中比例最大的当然是游手好闲的白相人。因为人数太多了，有的门生连黄本人也叫不出名字。我能记得起来的，就只有下列这一些人。

一、属于英法租界捕房、公安局等任职人员：陈三林（法捕房探目）、金九龄（法捕房督察长）、程子卿（法捕房政治部主任）、丁永昌（法捕房探目）、鲁锦臣（法捕房探目）、曾九如（绰号花魁，法租界强盗班探目）、陆连奎（英捕房督察长）、尚武（英捕房探长）、冯志明（英捕房探长）、汤坚（英捕房探目）、韦钟秀（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马德荣（英捕房探目，抗战时充敌特高科探目）、乔松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卢英（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抗战时投敌充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张荣（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副队长）、董明德（侦缉队分队长）、周相成（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秘书）、宋云涛（侦缉队指纹科）、曹安昌（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顾葆羽（北京军阀政府上海税务局长）、许宝铭（浦东保卫团团总）、张志清（伪公安分局长）、易缵仁（南市邑庙分局、）陈亚夫（敌伪时期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常务委员）、胡寿琪（汪伪上海市社会局主任秘书）。

二、封建流氓、把头等职业白相人：顾竹轩（大流氓，天蟾舞台老板）、马鸿魁（法租界粪大王）、谢彬衡（大包作头）、朱顺林（六国饭店、好莱坞等赌场老板）、刘怡章（汉口大流氓，烟土贩子）、闵采臣（大世界总管）、许福宝和金立人（流氓律师）、龚兆熊（绰号哑喉咙阿六，天天饭店老板），顾玉书（徐家汇大流氓）、姚松如（沧州饭店老板）、颜伯颖（恩派亚大戏院及大陆饭店老板）、唐嘉鹏（大世界经理）、水果荣生（大世界经理）、舒长泰（日新池老板）、王五权（杭州大流氓）、孟禄久、娄炳章、谌则高（星相把头）、何国梁（招商局杨家渡码头包工头）。

三、属于工商界的所谓“生意白相人”：郑仁业（新北京轮买力，正泰橡胶厂老板）、张子廉（三星棉铁厂老板）、谢克明（仁丰染织厂老板）、陈菊生（华欧制糖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泰康饼干厂老板）、王云浦（中兴轮船公司总船主）、陈翊庭（舟山同乡会会长）、邬信泰（顺大鱼行老板）、李云生（招商局码头买办）、黄振世（渔业公司经理）、郑筱舟（国信银行行长）、吴小石（吴开照相馆老板）、朱文炜、郑慕周（以上二人为报关行老板）、周梦月（鱼行老板）、张善琨（新华影片公司经理）、邱子嘉（仁丰染织厂厂部经理）等。

四、属于报界及戏剧、医技等人员：吴玉荪（弹词）、王振川（西医内外科）、方慎庵（针灸医生）、方公博（推拿医生）、平襟亚（旧小说家，开设中央书店）、沈菊隐（新闻报编辑）、任矜苹、胡酣珠、杭石君（以上三人均为报馆编辑）及科天影（原名鲍琴轩，魔术师）、刘亮馥（牙科医生）等。

上列名单中，经常出入黄公馆与黄金荣关系甚密的人，是唐嘉鹏、顾竹轩、陆连奎、卢英、金九龄、张善琨、丁永昌、陈培德、张子廉、邱子嘉、董明德和我等二三十人。有些人虽拜黄金荣为师，除了逢年过节去走动，平时就很少来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正当商人要在当时社会上发展事业，对于象黄金荣这样具有恶势力的流氓头子，是不能不敷衍一下的。

周信芳最初在丹桂第一台演出，当时有个文武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开设的天蟾舞台演出全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卖座颇盛。顾竹轩对待被聘请的演员一向不肯出大包银。常春恒以天蟾生意好，要求增加包银，顾不允。常乃提出辍演要求。顾暗使其门徒将常打死，续聘周信芳在天蟾演出。后来周又因不愿受顾竹轩的剥削，期满不肯续演，顾对人扬言要置周于死地，人都为周的生命担忧。周知顾蛮不讲理，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浼人投拜黄金荣为师。黄接受周的请求，特地召顾到黄公馆，对他说：“信

芳现在是你自己兄弟，今后要照顾他。”自此以后，才得相安无事。周深恐顾乘机暗算，急忙离开上海，到北方去游码头。三年后，始重返申地，先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三天，使顾不敢侵犯。

顾竹轩在黄门子弟中以杀人著名。他是苏北盐城人，小名顾四，绰号瘪嘴，帮会集团中都称他为“四老板”。原为人力车夫，后来考进英租界捕房当巡捕，以敲诈勒索所得的赃款，开设车行，出租给贫苦的苏北同乡。他以巡捕身份，不怕车夫短欠租费。同时，又向各捕房站岗巡捕打招呼，凡他出租的车辆，偶有不遵守交通规则，宽容放过。这样一来，他的车行生意大好。他见有利可图，干脆辞去巡捕之职，扩大车行业务，又开设天蟾舞台。后因永安公司串通英租界工部局，勒令顾竹轩将天蟾舞台迁址，改建为永安公司南部。他心有不甘，聘请了穆安素和甘维露两个外国律师，向工部局大打官司，一直上诉到英伦法院。结果，由英伦法院判决，工部局应赔偿天蟾舞台损失 10 万元。自此以后，顾在帮会中成为红角，苏北同乡等称他为“顾四太爷”。

顾与唐嘉鹏两人是黄门中两大台柱，各人都有一部分恶势力。后因大世界包场争利，相互仇怨，形成同室操戈。先是陈荣生，绰号水果荣生，当了大世界经理不久，就被人杀死。由唐嘉鹏继任为大世界经理后，各场包场，取决于唐一人。会有季云卿的徒弟许福宝，因为包不到大世界的场子，怀恨在心，蓄意将唐嘉鹏杀死雪恨。许与顾竹轩在东方饭店开 301 号长房间。那天许对顾说：“唐嘉鹏这家伙不是东西，打死他怎样？”顾笑而不答。许乃乘机驱车至顾的徒弟苏北人王兴高家中，对王说：“顾四爷要你打死唐嘉鹏。”王信以为真，即备手枪至大世界门口等候。唐偕同说《描金凤》的吴玉荪从大世界出来，正欲上自备包车之时，被王兴高枪杀致死。此案发生后，黄金荣立即打电话给法捕房督察长金九龄，坚主严缉凶犯。法捕房缉获了凶犯王兴高后，招出顾竹轩为幕后主使人，顾因此被扣，判处 5 年徒刑，关了 2 年就交保释放。

黄照旧视顾为心腹，并没有因此而断绝师生关系。在此案发生后，曾使金九龄非常为难，因为顾、金两人是儿女亲家，难以下手。

我在黄门中原为唐嘉鹏一党。唐被殂后，陈福康、邱子嘉、丁永昌和我各树一帜。其中邱子嘉以元老派自居，和我互有勾结。丁永昌只保持表面上的协作。陈福康一向管理黄宅房地产及大世界帐目。龚天健、夜壶阿四、鲁锦臣等与陈结成一党，包围老头子黄金荣，过其帮凶分赃的寄生生活。唐嘉鹏的徒弟王文奎也加入一伙。每逢黄公馆过年过节或喜庆大事，他们都来吹拍奉承，是黄宅内部的一批群小，我与他们互不协作。有次为了黄的养子源熹之妻在南市某烟馆吸食白面，我在黄金荣面前提起此事，认为若不加以禁止，不但与黄面子有关，即在我们子弟面上也失去光彩。黄闻言勃然大怒，竟将源熹之妻赶出黄宅。因此之故，内宅群小对我虽话不投机，但怕我在“老太爷”面前直言不讳，大都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与我相处。不过在背后却与我为敌，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是常有的事。一·二八后，杜月笙任上海市冰鲜鱼行业同业公会主席，我为该会总干事，与杜常有接触。陈福康就在黄金荣面前说我背黄联杜，要投拜杜门等话。黄金荣将信将疑，经我解释分辩后，才不置信。又在1937年初秋，我获得了一尾重达6000余斤的大鲨鱼，想到大世界去展览，门票所入四六拆帐，并已向黄金荣谈妥。结果因未许陈党锡箔灰，即以有碍卫生，公董局卫生处不会许可为理由，阻止展出。我见此事不成，转向新世界尤阿根谈妥将大沙鱼放在新世界展览。当时新世界营业不盛，游客寥寥可数，门可罗雀，经在报上吹嘘招徕，突然观众剧增。尤阿根大为高兴，我也因此赚得了3000元暴利。

（九）抗战时期的苟安生涯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守军后撤，两租界处在日寇四面包围之

中，成为“孤岛”。敌寇利用汉奸，成立维持会，帮会中的亡命之徒便乘机大肆活动，一时群魔乱舞，比往时更为猖獗。这时，杜月笙、金廷荪已避走香港，日本特务机关一度看中黄金荣，要他出任维持会长。有一天，敌酋（名已忘）前来要挟，黄事前伪装瘫痪，由两个家人扶着他出来接谈，声称他有病在身，本人不识字，不知国家大事，不配当维持会长等语，被他逃过了这一关。

其后，帮会分子徐铁珊、金鼎勋投敌，日寇利用他们组织“黄道会”。徐、金劝黄出面主持，他又用同样方法婉言推辞。但他对来访的敌酋与落水的汉奸，从来都是以礼相待，不敢得罪他们。抗战八年中，日本特务机关时常有人到钧培里访谈，黄礼待有加，其中伪黄浦分局长日人小林来往黄宅尤勤，关系更加密切。

黄门子弟中，媚敌附逆的颇不乏人，其中恶名昭著的，要算卢英了。卢在抗战前夕，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1938 年冬，敌寇军部组织伪大道市政府，物色卢英出任伪警察局长，卢踌躇未决，与黄金荣商量。那时租界上日本人的势力还不能渗入，黄叫卢英不要落水。随着敌伪势力日益猖獗，租界当局处处向日寇让步。卢英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由南市警察局长而跃升为伪军委会参军长，成为“新贵”中的要角。卢再次到黄公馆探望他，黄把卢英当作炫耀黄门的得意门生看待，十分宠待他。黄金荣不亲自下水当汉奸，并不是他有什么爱国之心，这从他对待汉奸徒弟态度和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所谓沪上三老下水后友好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他曾对人说，做维持会长，怕别人暗杀，为的是要保全自己的生命。

这一时期，社团的活动是较为消沉的。杜月笙的恒社与杨虎的兴中社均迁往内地，忠信社因为失去了攻击的对象，无形趋于停顿。我于 1935 年就组织起来的振社票房乘机大肆活动，黄金荣时常到振社来闲坐，看到振社内部进进出出的社员甚多，当面对我赞许一番，认为是黄门中一件得意的事件。

他对各项社会活动，一概以年老体弱为名，谢绝不去。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浴室洗澡，视为常课。1941年夏天，帮会分子高兰生在丽都花园摆宴做50岁生日，黄金荣前往祝贺，同座者有公共租界捕房探长尚武、刘绍奎、汤坚等人。忽然从外面走进沪西76号魔窟绰号“杀人太保”的吴世宝（吴世宝为76号警卫大队长，吴妻余爱珍于1941年5月间乘车到公共租界烫发，西捕索阅派司，她的卫士不肯，被西捕开枪打死卫士及车夫），当着黄金荣面，手指尚武、刘绍奎等一批捕房探长，指桑骂槐地说：“这批瘪三，现在寿世已满，再与老子为难，穷爷一个个都要打死他们！”极尽威吓谩骂之能事。黄金荣在旁噤若寒蝉，不作一声，真是深得能屈能伸之道。

（十）荣社成立后的一些活动

1945年9月，杜月笙从上饶乘火车回到上海。因为是从后方来的，身价顿增10倍。他所主持的恒社重又活跃起来。此时杨虎担任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他的兴中社已改为“兴中学会”，吸收海员1万余人为社员。洪门郑子良组织侠义社，社员也有1万余人。黄金荣见而眼红，欲将停顿8年的忠信社恢复活动。后由我和邱子嘉建议，改名为荣社，采取公开形式办社，要与恒社互争千秋。黄同意我们的建议，即物色社址，拟定组织。会址设于嵩山路振声里隔壁前法租界公董局买办赵振声家中。1945年11月间，荣社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杜月笙、杨虎、王晓籁等均以来宾的身份前往观礼。当场选出荣社组织人员如下：

社长：黄金荣。

常务理事：邱子嘉、黄振世、陈培德、杭石君、丁永昌。

理事：姚松如、吴玉荪、龚天健、陈福康、鲁锦臣等15人。

监事：莫士爵、杨春华、张志清、陈菊生、张锦寿。

黄金荣拙于辞令，那天社长致词，他以家长身份说："今天荣社成立，大家聚集一堂，欢欢喜喜，我很高兴，今后大家更要团结……"不知所云地说了几句。

荣社成立后，除了举行多次不定期的聚餐外，一般说来，不如恒社活跃。我因为另有振社组织，对荣社活动不大热心。邱子嘉也不是一个有力的办社能手。兼之有些自称为社员而没有社员资格的人，如黄源燊徒弟陈雄、汤雄及邹政之等，对外以荣社社员自居，敲诈勒索，无所不为，遂使我们这班中坚分子也大为泄气，不愿以全副精力发展所谓社务了。

有一次，黄金荣向我提出，说是荣社房子很大，可以将我的振社和我的门生周一星的星社都搬到荣社，合并起来，人多势众，也就更热闹了。而我呢？振社是我称霸仗雄的一块基地，一旦合并过来，上有黄金荣，中有黄家班的群小插手，我自然不愿将自己辛苦培植起来的小团体轻易放弃，便推说振社分子复杂，反而不好，因此作罢。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黄金荣80岁。若在往年，他要大办寿席，热闹一番的。这次忽然主张节约不铺张，只在玉佛寺办几席素菜。荣社子弟事前为他组织祝寿筹备的人员，聘请杜月笙为总理，杨虎为总招待，我担任总务。那天上海市长吴国桢及各局局长均来拜寿，孔祥熙也来了，杜月笙、杨虎见孔驾到，即对我说："我们去陪陪孔院长，这里就请你代劳了！"他们撵孔祥熙，反把寿翁冷落了。

1948年8月，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督导副专员的身份在上海执行经管事务，口口声声要打几只大老虎，偶然还微服出行。我那时被聘为评价委员，风闻杜月笙暗中策动徒众抢购物资要搞垮蒋经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打击杜党的好机会，于是由我向黄金荣献计，请蒋经国到荣社赴宴，劝他以后行动要谨慎些，以防有人对他有所不利，顺便告诉他，杜月笙正在暗中煽动抢购物资的消

息，叫他预作准备。黄金荣认为此举十分必要，当即由他备好一份请帖，叫我面邀蒋经国。我去见蒋时，他谦逊地说："请老太爷不必费心！"经我再三邀请，才允赴约。谁知到了第二天，酒席已经摆好，蒋却派了吴绍澍、蒋恒祥两人为代表。这样一来，当然不便跟吴绍澍谈起关于杜月笙的话，我们的计划便全部破产。事后不久，杜月笙次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扣押，杜已风闻荣社宴请蒋经国的事件，认为是我暗中捣蛋。实际是有因无形，我们虽有倒杜的打算而没有成为事实。

（十一）向人民坦白交代

上海解放后，黄金荣的寡媳李志清席卷了黄宅所有金、钞、细软及钻石、珍宝，带领其养子成法及领女（忘其名）逃到香港，黄金荣一生搜括得来的人民脂膏，已十去其九。其时杜月笙、金廷荪等均已往香港。有人劝黄也去港安身，黄说："我的年纪已经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路上生了急病，总不要死在半途！"因此坚主不走。他本来思想顽固，晚年信赖潘七爷（子欣）和我，不时和我谈论大局，并和我说："有事多和潘七爷商量。"1949年12月，我受宁波旅沪同乡会指派，去港为宁波筹救济款。临行前去见黄，他叫我见到杜月笙时，商借美元5万元。那时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企业均归职工管理，他无法再向人民进行剥削，而手头的现金又被他媳妇盗取一空，渐渐对这么一个开支浩大的黄公馆感到应付为难，所以叫我向杜借钱，可能是出于无奈。我到港后，即向杜月笙提起此事，杜当面表示十分抱歉，说此事且与黄家妹妹（即李志清）商量后再说。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我去港前，得杨虎暗示，要我动员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等返回大陆，政府一概不咎既往，希望他们回头是岸，向人民戴罪立功。王晓籁听了我的劝告后，当即表示愿回上海，杜、金及

其他流亡的帮会分子不但坚决拒绝，反而劝我叫黄金荣速去香港，免得落入人民法网。我回沪后，对黄谈起杜、金诸人托我转达的话，黄沉思一会，问我道："振世，你看怎么办？"我说："还是不去的好。"黄默然无语。

1953年某月，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劝黄向军管会坦白交代。黄嘱龚天健草具自白书一份，由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陪同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当由首长粟裕、副市长盛丕华两位接见。据陈翊庭事后告诉我，黄于提呈自白书，交代历史罪恶后，与他一同步出首长办公室，两人方至楼下门口，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首长办公室，即叫黄在门口稍待，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事后知他恐生变故，急不及待地独自一人回到黄宅去了。此后不久，黄偶然发热病倒，不数日，就不治身死。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蒋介石拜师黄金荣内幕

黄振世

一般人都晓得蒋介石与上海封建帮会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知道他曾经投拜过上海第一号帮会头子黄金荣为师的经过事实，恐怕为数不多。我将自己有关这方面亲见亲闻的材料提供出来，供作研究历史人物的参考。

首先得介绍我自己的身份。我于1928年经当时黄金荣最为宠爱的门生、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小名阿裕，定海人）和法商电车公司高级华员冯志铭二人介绍，投拜于黄金荣门下，从此有了靠山，逐渐从一个初露头角的生意白相人，一跃而为上海闻人，担任了中法渔业公司董事长、中国渔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渔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重要职务，操纵上海之渔业20年之久，进而自立门户，设“振社”，广收门徒近千名，成了帮会中新兴的红角儿。这对老头子黄金荣来说，无异是“荣宗耀祖”十分高兴的事情。由于我发迹后仍忠于黄门，老头子更是对我另眼看待，为了表示对我的信任和显示他自己的威风，和我谈了不少“私房话”，其中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将介石拜师在他的门下。

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死于上海，蒋介石在政界上失去了靠山，在经济上也开始拮据。他需要另辟门路，寻找庇护者，乃开始与张人杰、戴季陶、陈果夫等关系密切，并跟随他们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活动，因投机失败，背了一身债，处境十分狼狈。

在被债权人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决定离开上海，避债到广州去投奔孙中山先生。因为债务所缠又缺乏盘费，就去找虞洽卿老板商量办法。虞洽卿当时在上海商界虽有地位，却是一个卖空买空的“空壳老板、负债大王”，不肯做这种赔本钱的事情，就代蒋介石出主意，介绍他去投帖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一可以利用黄金荣牌子，去对付债权人，二可以向黄商借盘费。两人商量定当，先由虞洽卿与黄金荣谈妥并约好日期，并陪同蒋介石前去举行拜帖仪式。

这里先得来一个说明：按照安清帮投师拜祖的常规，普通一般的压帖赞敬自几十元至几百元，最起码的亦需 5 元至 10 元。若照当时黄金荣、杜月笙的身价，压帖赞敬，至少是几百元，甚至有几千元的。赞敬越多，越受老头子的看重。1928 年我投拜黄金荣为师的时候，就花费赞敬 200 元，捐助造“四教所”款项 500 元，门房、茶房以及其他小账 300 多元，总数超过 1000 元。拜师之前，要填具门帖经黄金荣允准方可。这门帖是由黄金荣账房间印就的，约 6 寸长 4 寸半宽的淡黄色双层摺子，里层印着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介绍人等，左角上还要贴上 2 寸的照片。举行仪式的时候，所堂里点起香蜡烛，黄金荣坐在中堂，地上铺着红　条，我跪在红　条上叩三个头，算是行礼如仪。门帖由黄金荣秘书骆振忠管理，骆是上海人，经常办公的地方在帐房间里，门帖也保管在帐房间橱内，还备有一本名册，经常可以查考。这是一般规矩。但是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虞洽卿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公馆后，向黄金荣说明情由，要求录收蒋介石为门生，黄金荣因为虞洽卿在当时商界地位高，势力大，亦很想结交，所以对他提出的要求都无条件答应下来。又因为虞洽卿不熟悉投拜老头子的手续，第二天陪同蒋介石到黄金荣处时，只投递了一张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的大红帖子，既没有拜师应有的蜡烛、香，更没有致送压帖的赞敬。还因为黄金荣事先从

虞洽卿处知道蒋介石的困难环境和拜师目的，同时也为了讨好虞洽卿，所以非但不计较压帖贽敬，还有心"慷慨"地赠送蒋介石旅费大洋200元，并且鼓励他去广州。分别以后，互不通讯，日久以后也就事过境迁，淡然若忘了。

1927年，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蒋介石随军回到上海，成为名震中国的北伐军总司令。一天，唐嘉鹏陪了北军某路司令王柏龄去拜会黄金荣（王柏龄，扬州人，与唐嘉鹏拜把兄弟，与蒋介石很投契，我曾亲眼看到他与孙中山、蒋介石三人在肇和兵舰上合摄的照片），黄因此知道蒋介石就是当年蒋志清，即是自己的门徒，又曾有恩于他，飘飘然引为自得，可以光耀黄家门楣了。这时唐、王两人向黄金荣提醒，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中国第一号大人物，如果说开去曾经拜过老头子，于他面子有关，一定会触怒于他，倒不如顺水推舟。即以蒋介石过去用的是蒋志清名字，未曾举行过仪式，又未曾"拉过场"（帮会收新门生或徒弟时，设宴请同门师兄弟及有地位的帮会中人，互相介绍关系，称为"拉场"），外面无人知道，叫黄金荣隐没这段师徒关系，将门生帖子亲自送还，说明过去只凭虞洽卿一人自说自话，并未接受过拜师收徒之仪，只是以朋友看待，今后仍希望蒋介石只承认黄金荣是他朋友，这样定会使蒋感激，将来可以受用不尽。黄金荣听之有理，就依计而行。

当时托王柏龄代为向蒋介石请示，要求约定时间，前去晋见。一面关照帐房老骆（即笔者拜老头子时黄金荣秘书骆振忠的父亲，大家叫他老骆，名字已经忘记）将当初蒋志清的一张门生帖子检出来备用。王柏龄辞行后，当日下午即打电话给黄金荣说是已与蒋总司令约好，准定次日上午11点钟恭候大驾。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王柏龄即到黄金荣家里，宾主在鸦片烟铺上共吸上等烟土达2小时，将近11点钟方才由王柏龄陪同黄金荣去拜会蒋介石。黄把门生帖子送还给蒋介石，并说了昨天唐王二人教唆他的一番

话，希望蒋总司令原谅海涵。当时蒋介石对黄金荣的这种诚意表示十分感激，口口声声称他黄老先生，并留他便饭。黄金荣对蒋介石热情招待认为是毕生第一光荣，而蒋介石对黄金荣也别有用心，企图利用黄金荣帮会势力为他反革命效劳。至于这一次唐嘉鹏、王柏龄等叫黄金荣送还蒋介石门生帖子究竟是出于蒋介石暗示，抑或唐王两人的主张，当时黄金荣未曾明言，但从经过情况看，很可能是蒋介石本人的意图。

黄金荣自送还蒋介石门生帖子以后，对于这件事就矢口不谈，但与蒋介石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蒋介石一面勾结英、法殖民主义势力，一面策动封建帮会分子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队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他派杨虎、陈群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在上海各大报上刊登反共启事，随即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袭击工人纠察队。

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因为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事后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不少勋章和各种奖励，并给以顾问、参议等一类名义，成为上海"三大亨"，得到蒋介石的格外青睐。杜月笙爬上了政治舞台成为流氓政客，又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结为生死之交，黄金荣坐地分赃成为老太爷。从此，上海封建帮会与国民党的反动势力打成一片。每逢黄金荣、杜月笙家有婚丧祭祀，除各路军政官员都前来拜谒外，总有蒋介石的轴幛悬挂在中堂来装点他们的门楣。在黄家花园（今桂林公园）四教厅前面，还竖立着一块高六七尺的石碑，上刻"文行忠信"4个大字，上首记"中华民国十九年"，下面题"蒋中正赠"。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蒋介石与上海帮会关系之密切。约1937年黄金荣到奉化访蒋介石后回到上海，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蒋委员长对我特别客气，留我同桌吃饭，问我在上海的一些人是否对我和从前一样的尊敬。还说我年纪大了，外事可以少管管，保重自己身体最要

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黄金荣这个帮会头子仍旧保持着师徒般的情谊。

1964年

（浙江省宁波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关于杜月笙

范绍增口述　沈　醉整理

我和杜月笙是从1925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清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1928年前后，我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他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我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吗啡工厂，由我给以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烟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1929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和他见面，他除了对我盛情欢迎外，还和我换了庚帖，结为异姓兄弟，并陪我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抽时间去上海玩玩，每次去他都是尽我所好来招待我。

1933年，蒋介石调四川部队去湖北进行反共战争时，我率部与贺龙司令员领导的红军作战负了重伤，他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派他的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我去上海就医。船刚到码头，他又叫顾嘉棠代表他迎接我，送我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给我诊治，我负伤的右臂才未被截去。从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更加要好。

抗日战争期间，他到了重庆，我当时的部队虽调往前方，我自己却是经常回重庆玩，和他时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我住在上海，他的第二个女儿杜美霞拜给了我做干女儿，我们便成了干亲家，双方家眷也经常往来。

这份资料，大部分是我和他接触中亲自看到或听他讲；有些是长期和他一道的顾嘉棠、马世奇等人告诉我的；还有一些是我从种种关于他的传说中，选出较为可靠的部分。

一、初期活动

杜镛，别号月笙。光绪十四年（1888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家境贫穷，10多岁便到上海打流，跟小流氓马世奇等结识，专做无本生意，经常和马在小客栈里挤在一张床上过夜。他很爱睡懒觉，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才爬起来央求马等叫伙伴们去抓别人的帽子（上海人叫“抛顶宫”）卖点钱来填肚子。

他这样混了几年，感到不是办法，才在黄金荣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许多人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莱阳梨”。当初他对这样一个诨名是很得意的，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在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在向他要钱不遂意时，还是不客气当面向他大叫。我在上海和他一道去四马路会乐里妓院吃花酒时，便看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人快给钱。有时钱给少了，这些流氓便大叫：“莱阳梨，多给一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才能把这群瘪三打发走。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情况，大为不解，怎么这个大清帮头子会

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人？后来马世奇告诉我上述这一经过，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关系。

他以后一直还保留了削水果这门手艺，我常常看到顾嘉棠遇到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时，便拿起一只水果送到他面前，叫他削，他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毫无不愉快的表现。同时，他也爱开顾的玩笑，因顾是花匠出身，他便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

顾和他是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有客人在面前，顾总是装出恭恭敬敬十分听话的样子，他们俩人在一起时却无话不谈。我以后与他们相处久了，才看出他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

杜一向以善于出主意而出名，在帮会中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他贩水果时，许多小流氓便时常找他出主意去敲诈勒索。据说当时许多商店，在开张时怕流氓捣乱，便请巡捕房派人保护。他就指使小流氓在夜间去偷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还有些生意很热闹的商店，不肯花钱给流氓，他就指使这些人去这些商店门口相互殴打，抛粪便等，弄得顾客纷纷趋避，最后只有出点钱才能了事。

不久，他的名声渐渐传到黄金荣老婆耳朵里，她叫人找了他去谈话，发现他果然有不少名堂，便决定把他收到黄家去。从此，他和黄狼狈为奸，成了黄手下的一个重要帮手，在法租界不知干了多少坏事。

他在黄家的几年中，一边替黄出主意，一边也为自己将来独立门户而暗中作了不少准备。他利用黄的关系大肆交结，拉拢各方面关系。等到他认为羽毛丰满，便脱离了黄家，与张啸林、金廷荪及顾嘉棠等结为一伙，连黄的厨司马祥生也被他拉了出来。黄对他很不满，他就去拜另一个清帮头子陈世昌为师。

陈世昌的老师是仁社的头子，叫张镜湖，这人做过通海镇守使，山东人。他的学生中不少是军政头子，如杨虎、贺贵严、韩复榘等。蒋介石在上海打流时也拜过张的门下，以后蒋的地位高

了，才不承认这个老师。

我也拜过张，参加了仁社，本来和杜的老师陈世昌是同一辈，以后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份高低了。

杜刚离开黄家时，自知敌不过黄，不敢和黄争夺财源，便向工商界方面另求发展。他的手下都是听从他的指使去捣乱的，所以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这就慢慢形成了他替资本家充当保镖的基础。

黄金荣一直靠老一套强抢硬要的手法弄钱，当时一些官僚在外省搜刮了人民血汗跑到上海想当寓公，被黄的手下知道了，便会用种种手段进行勒索，直到把这些人带去的钱弄光，然后给他们留点路费离开上海。杜却不这么干，凡到上海来的外地军阀官僚等，他有机会便与之结识，当作朋友，充当保镖。所以他和新旧、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结识极多，便是这个原因。

他和黄金荣表面上一直很客气，但两人暗中争斗却从未停止过。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黄向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敲诈2亿元，钱怕在上海出事，便如数给了黄。杜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和钱又异常要好，知道了此事，大为不满，埋怨钱新之事前没有告诉他。没过好久，黄又出面写信向重庆商业银行要借4亿元，我是该行董事，我去找杜，杜为我出主意，叫我自己打一个电话给黄，当面问他，看他怎么好意思。我照杜的办法，黄果然不承认是他自己干的而推给他的手下，这笔钱才没有要去。

杜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搞来的钱很多，花得也痛快，总是左手进，右手出，不象黄金荣只进不出，这样替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能混出名来，还有他一套拉拢人的手法。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同，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认为这个人对他有利，必然千方百计

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故意吹捧这人一番，使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对方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对他发生好感。

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去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

别人有事要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他总是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等，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别人时，也往往能够顺手。

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就象杨虎、陈群、顾嘉棠等，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他还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他也很注意听取这些在政治舞台上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的意见。

他用的秘书当中，有曾为袁世凯搞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首的杨度，以及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嘉邢，还有不少旧文人、洋人、洋博士之类的人，经常为他出主意。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使用起来，不象一般反动头子用部下那样，而是处处表示出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执礼甚恭，使这些自鸣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他充当工具而不自觉。

他早年一向想学梁山泊上的宋江，在社会上当“及时雨”，经常爱施小恩小惠。而捧他的一些失意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了要借他抬高自己的身价，便把他捧为什么“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

他在施小恩小惠时，还有一着很高明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这也是他经常看到我乱花钱而不大讲究目的而规劝我的话。他对人帮助，往往自己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问题，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又往往把

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便更加感激，而且到处为他宣扬。

杜月笙捧人的手段的确很有一套，这对他的成名有极大帮助。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了一步，刚刚募过苏北等几处水灾，又要捐没有办法。向等便去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可以把募得的钱交与向等就可以了，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地听他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我与何北衡、向传义也都参加了。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助等之后，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我们几个知道内幕的人，看到他耍的这一套手法，使得孔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举起大拇指说："月笙不愧大好佬。"

他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因此孔也愿替他捧场。如1947年他的儿子维屏、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了孔去当证婚人，我便听到孔当着介绍人钱新之、章士钊和去参加婚礼的贺客颜惠庆、徐寄庼、李石曾等1000多人的面，说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由于杜对孔这么讨好，孔在很多地方也特别照顾他，给过他不少找钱的机会。如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孔知道蒋介石决定要把日本交出的大量棉纱抛出，他便暗地通知杜赶快把手上握有的棉纱抛出去，免得吃亏。杜因此而赚了一大笔钱。在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中，孔是最受他那一套吹捧手段的，两人的关系也最好。

他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注意，还是从1924年开始的。那年秋天，由于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个军阀在上海附近打起仗来，四乡居民纷纷逃往租界避难，成千上万的人流落街头。那时租界内的流氓正趁机诈骗难民仅有的一点财物并贩卖难民妇女，杜却别出心裁，居然跟着一些靠吃慈善饭的所谓“善士”们，办起难民救济工作。他以救济名义，叫爪牙们拿着捐簿向商民强征硬募，这种明目张胆的搞钱办法，不但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受到一些人的称赞，难民对此也很为感激，杜月笙就这样一下变成了“大善士”。

从那次得到甜头后，不论什么地方发生天灾兵祸，他总是非常热心襄助这些“善举”，在上海大肆捐募。因为这种无本生财之道，可以名成利就，所以他乐此不疲。

我还记得，抗战前某年不知什么地方遭受天灾，他又在主持“救济”工作；当时他在上海已红极一时了，为了举办赈灾义演，他和张啸林、王晓籁等人也登台客串，以资号召。他扮黄天霸，张扮窦尔墩，票价最高10元。

那天我邀了大批人去替他捧场，他刚一出场，就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平日虽爱听京戏，小老婆姚玉兰又是名演员，长年还和一些京剧泰斗有往来，可是他自己却唱得非常蹩脚。张啸林刚一开口，假牙一下滑出来，他慌忙拾起，台下一阵狂笑，张连唱词都忘记了。金少山在马门边一看不妙，便急中生智，忙捧着一把茶壶给张送水，把唱词念给他听，这时台下有人在发牢骚说俏皮话了，还有人大声在叫：“梅兰芳的票才卖5元，‘莱阳梨’卖10元还这么开玩笑。”他的爪牙们一听，抓起说这些话的人就痛殴起来。台上倒没有打开，台下却真的动起武来，打成一片。

杜能够成名，为很多人所称道，主要是他善于耍两面三刀的手段。这里就我所见到过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来说明一下。

第一件是调解1930年上海法租界水电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内幕。在这一事件中，被法帝国主义打死打伤的工人有20多人，造成了上海的七·二一惨案。他在这一惨案中抬高了自己的地位。

事件的起因是法国资本家凭借在上海的特权残酷压榨工人，当时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200多两银子，华工月薪却平均只有12元。每次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从不兑现。1930年6月中旬，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资的诺言。法方竟于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法商水电工会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每人每月增加工资8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帝方面完全不接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态度异常蛮横；并宣布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和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

杜月笙先是伪装同情工人，送了一笔钱支援他们，并答应他们的请求进行调解。这时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也去找他，请他设法制止工人坚持罢工，他也满口答应。

这次罢工最初只限于机务部门，自从法帝指使越南巡捕在华成路开枪打死了一名去参加开会的工人后，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弄得法租界内电灯不亮，电车停开，自来水供不上，预定在7月14日举行的法国国庆狂欢也不得不宣布改期。7月21日，法国巡捕枪杀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20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工会一致起来支持。

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和巡捕房警务总监费沃礼，请杜出面，设法不让工潮继续下去，可是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却不肯接受。杜为了讨好法帝，便指使他的门徒陆京士等组织“罢工后援会”，明为支援，实则进行分化瓦解。

这时上海市长张群和警备司令熊式辉也贴出布告，严禁工人擅自罢工；不准其他工厂支援罢工。警察局还派出大批警察，保

护法帝派出的白俄到华界去修理通向法租界的自来水管，这更引起工人们的不满。因法帝拒绝国民党市党部调解的理由是，他们公司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注册，所以国民党无权过问。可是国民党政府却自动派警察前往保护，还大肆逮捕阻止白俄修理水管的中国工人。

蒋介石生怕工人坚持下去会影响中法邦交，赶忙派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到上海进行调解。李一向和法帝有勾结，到上海后，首先就找杜，杜满口答应，愿为蒋介石分劳分忧，加紧施展分化工人的狡计。

法帝方面态度仍极野蛮，他们宣布法租界实行戒严，加派铁甲车巡逻，并继续逮捕领导罢工的工人，这些人跑到华界，警察局也同样逮捕他们。

工潮一直坚持到8月中旬，由于法租界水电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电车交通断绝，法国当局才允许每人每月增加工资2.4元，但坚持要开除领导罢工的40名工人。

杜月笙和李石曾一听到法方答应加了一点工资，以为是了不起的胜利，便一定要工人复工。对法方开除的40名工人，他答应负责安置到工会工作，工资归他支付。罢工工人只好勉强同意复工。

在签字的时候，工人们要求在复工前释放先后被捕的几十名工人，法方坚持要复工后看情况再定，几乎又成僵局。后来由杜签字保释，才结束了这一工潮。法方要开除的40人，杜垫了两个月工资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达到法方开除的目的。少数不愿复工的还被他的爪牙打了一顿。

这件事给李石曾添了面子，为蒋介石解除了忧虑，法方更看重他，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也对他表示感激。杜是一举而四得了。

第二件是1947年国民党选举副总统的事。我那时和杜同在南京，我住在中央饭店，曾扩情成天陪着我，怕我出去活动，因我

能控制不少四川国大代表的选票。曾要我支持孙科，我因李宗仁过去对我不错，准备支持李。有天早上，陈立夫来找我，说蒋介石召见我，我不想去，下午他又送来蒋的手令，叫我一定要准时去。见了蒋，才知道也是为了要我支持孙科，我没有料到蒋会自己出马替孙科拉票，便老老实实告诉他，我答应了投李的票。蒋便指示我，我的一张可以投李，其余能控制到的选票都要投孙。我对此事有点犹豫不决，便去找杜月笙，他很坦率地告诉我说，无论谁叫他支持，他都答应下来，不象我这样。在这种场合，应当机灵一点，不但不能为这种事得罪人，还要借此机会来笼络人才是办法。他把他的这种秘诀传授给了我以后，我留心观察，果然每个参加竞选的人都对他抱着希望。本来他能控制的选票就不多，分散开来根本起不了作用，但他自己却得了许多好处。

他早年手面很宽，非常注意利用送礼来出风头和拉拢人。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他立刻表示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了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他又买一架飞机送给了他。在当时，送人飞机，还是很稀罕的事，所以报纸上为他这种举动大吹特吹，这正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在送这两架飞机时，都是用他的名字来给飞机命名的，如送飞行社的叫“月文号”，送孙桐岗的叫“月辉号”，其用意是不言可知。

其他象送人以汽车、小老婆等，更是平常事，好些反动头子在上海公馆里用的汽车都是他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他也送给汽车等物。许多中西探长、探目，每逢年节，他都要送一笔厚礼，动辄一两千元。

早年给他的法帝拉关系的张翼枢，最称赞他这一手。张是留法学生，在法租界公董局当过华董，据说他和法国内阁方面有勾结，法租界当局不答应他的事，他能直接写信给法国内阁有关人员。杜在法租界早年时吃得开，张翼枢对他有过不少帮助。他的

门徒在法租界内犯案被捕，或别人托他向法捕房讲人情保释人等，只要他一个电话，或一张名片，便可解决问题。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或不便由他出面时，张翼枢便代他去奔走行贿，也是很生效的。

他结交朋友很广，无论南北军阀与官僚政客及外国名人到上海，他都得通过有关方面去联络应酬一番。他最得意的是日本元老西园寺到上海时，对他表示非常好感。当他告诉我，他以后一直与西园寺保持联系时，我还将信将疑，后来我的儿子范之青去日本读书，他写了封信交我儿子带给西园寺，果然很得到照顾，我才相信他不是吹牛。象李顿调查团到上海，他也曾盛情招待，主持中国海关与邮政的外国佬也同他经常保持往来。至于各省军阀官僚和国民党军政官员到了上海，他也照例招待一番。

在不到10年中，他便超过比他资格老得多的黄金荣等大帮派头子了。当他在社会上渐渐有了点名声后，为了想与所谓上流人物打交道，过去那种歪戴帽子，卷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不得不改变一下，而装成文质彬彬的样子。据他告诉我，在这方面他是下过一番功夫去模仿的，最初很不习惯，以后他在任何公共场所露面，甚至大热天在家里见客，都是穿起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罩上马褂。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这么打扮，他常常对我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

他的文化程度和我差不多，正楷字还能认识一些，略带行草便认不出来了。但他对写自己的名字，却下过一番功夫，看他的签名，倒也象读过几年书的样子。他说话一向不急躁，以后更装得斯斯文文，在公开场合和交情不够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随便多讲话的，以免露出马脚。故初次和他见面又不了解他的出身的人，是一下识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的。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他不愿别人象对黄金荣一样称呼"老板"，而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

他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那一路的人干的，只要他出面便可平安无事，但他却从不肯答应做这种事。一方面是不愿得罪那些亡命之徒，怕别人以后对他不利；另一方面也害怕别人说他与匪徒有勾结，影响自己名誉。

他帮助别人发横财却非常之够朋友，我自己就有过几次这样的事。

1946年，我听人说，国民党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即能发横财。我便和杜商量。他叫我请敌伪物资管理局长刘攻芸吃饭，由他出面说人情，我便和顾嘉棠、张君生三人合伙做这笔生意。我和刘攻芸本来熟识，但交情不深，我照杜的意见。在我家设宴招待刘，由杜作陪。酒醉饭饱之后，我便向刘提出要求顶仓库事，刘还没有回答，杜马上插嘴说："这些东西都是抓在他手上，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刘只好答应顶一座仓库给我。当时还不必付给现款，只是由我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

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我们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有清点过，问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腐败的程度，实在使人吃惊。那一次我就赚了黄金3000多两。

杜兼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我和顾嘉棠想做投机生意时，便向杜请教，他指点我们一下，一转眼就可以得到几十、几百两黄金。后来我和顾向他要该所经纪人的号码，他说怕别人说闲话，因为要这东西的人太多，黑市已卖到几亿元一个。但结果他还是给了我和顾两人合共一个。以后我们懒得跑交易所，便把这个号码卖了几百两金子。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有那么多的钱乱花，大都是靠了杜的帮忙。

他从离开黄金荣家，在上海独立门户以后，便极力注意避免

树敌。但看不起他的人还是很多，有些是怕他爬起来对自己不利，处处打击他。据他告诉我，他刚出头时，遭到不少人的欺压，最使他怀恨的是魏廷荣兄弟。魏是浙江帮，在上海的势力比杜形成得早，在法租界中也是风头一时的人物。当江浙军阀混战时，不少散兵游勇窜到租界，到处乱来，帝国主义也感到穷于应付。魏廷荣在法租界发起创办“中华义勇团”，自任团长，帮同维持法租界治安，很得法帝的赏识。以后当过商会会长和法租界公董局华董。杜初露头角，魏怕将来与自己竞争，便处处压制他，让在羽毛未丰时，只有尽量忍受，而内心则恨之入骨。以后杜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都有了勾结，势力一天天壮大，便向魏进行报复，曾派他的爪牙去绑架魏，没有成功，又准备去暗杀他。魏因自己力量日小，不再受法帝的重视，只好离开上海暂避。以后杜在上海的地位已巩固，才不采用那套凶狠报复手段。魏后来回到上海时，杜表面对他还是很客气。

杜身体一向不好，却好女色，还吸上鸦片烟，瘾很大，每天得抽二三两。不过他抽烟有定时，每日早午晚三次之后不另抽，所以不大耽误应酬和工作，他答应了去什么地方，一般都不会失约，以后甚至气喘病大发，也勉强带病去参加约会。他经常对我说，无论怎样，要言而有信，否则不如不答应。我记得有次是川盐银行上海分行开张，他和我及顾嘉棠三人一同去道贺，在汽车上喘病大发，几乎连气都回不过来，他稍许好转一点后，仍坚持前往。到了以后，我急忙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刘航琛，刘没有让他下车便请他回去了。

他不爱穿西装，却爱吃西餐，喜爱吃点心零食。他有5个老婆。大老婆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只听说他的大儿子杜维藩不是他亲生，是大老婆抱了人家的孩子。他很迷信，自这个儿子抱进门后，事事顺利，因此把这个儿子看成了“兴家宝”，非常喜爱，胜过亲生。

他以后又从妓院中讨了老三、老五两个小老婆，还不满足，又由杨虎一手替他包办，硬把一个京戏名演员姚玉兰收为小老婆。抗战胜利后，又与京戏名演员孟小冬同居，上海解放后逃往香港，虽已60开外，还与孟举行正式结婚。他虽有这些老婆，还爱经常到会乐里长三堂子去胡调，以抗战前银元来计算，我和他在长三妓院请一次“花酒”，总是500—1000元。以后他得了气喘病，连上一层楼都费力，却还是要去这些地方玩，上不得楼，便叫人用藤椅把他抬上抬下。

他自己尽管成天花天酒地，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对他的女人却管得很严。我听人说，他的大老婆本来和他还好，以后有人告诉他，说她与他的一个同门兄弟有暧昧关系，他一气之下，便指使他的爪牙把这个兄弟的脚砍去，以后弄清楚完全是误听谗言，他又怕别人议论，只好把这个终生残废的兄弟收养在家，不久这人就死去了。他的大老婆也因不堪虐待死了。

他不但对自己老婆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听到杨虎丢在上海的一个名叫“小老虎”的小老婆，与杨的徒弟汪盼有关系，他和戴笠一定要杨虎设法把汪盼杀掉，说这是严重违犯了帮会规矩，非置于死地不可。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虎并没有杀汪，他对此事还表示很不满意。他的孩子除维藩是抱来的外，以后老三、老五、姚玉兰等又生了维垣、维屏、维翰、维宁、维新、维善、维嵩等7个儿子，及美如、美霞2个女儿。

他几个老婆都存有不少私房钱，我有时钱不够花，还找他的老婆去借。有一次向姚玉兰借2万美元，她说只有19000元，我拿到后，很奇怪怎么会恰好少1000？顾嘉棠便点醒我说：“你归还时不就替她凑成了总数！”我才知道这是干亲家母先把利钱扣去了。

二、靠反共形成的特殊势力

杜月笙在旧中国能享所谓"盛名"达30余年，长期得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等的信任，以及大资本家的支持，关键是靠反共。

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上海之前，上海几十万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并拥有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在孙传芳的直鲁联军溃逃时，工人们奋起收缴了溃兵的大量武器弹药，俘虏了大批反革命军队，维持了上海的治安，扑灭了溃兵逃走前放的大火，因此很受上海老百姓的热爱。

工人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两个口号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急电本国请求增调军队到上海，同时与当时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和以后赶到上海的蒋介石进行勾结。

4月初，美、日、英、法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调集了50多艘兵舰开到上海，英国把一艘载有几十架飞机的航空母舰也开到吴淞口外，法帝从巴黎和海防抽调几个营的法、越军开入法租界。两租界从3月间开始实行戒严，通向华界的铁门关闭，马路上架起大炮机枪，装甲车四处巡逻。

当时谣言很多，帝国主义更经常捏造事实，说某处工人持枪企图冲入租界，因而向白崇禧提出抗议。据杜后来回忆说，当时租界的帝国主义气焰很凶，国民革命军军官士兵在租界铁门旁边贴宣传标语，都常被租界的巡捕捉了去。那时魏道明正在上海当律师，巡捕房每次把捕到的官兵送到租界的法院去审讯判刑时，都是由魏道明代为辩护，每次审判往往是被捕官兵被迫承认误入租界，具结悔过后才能保释。蒋介石便下手令严禁官兵进入租界，查出要以违令惩办。

杜当时在上海的势力虽不如黄金荣，但他却异常活跃。当时

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淞沪警察厅厅长吴忠信等和他都有密切往来，陈群领他去见白崇禧和蒋介石后，蒋、白对他都非常称赞，还设宴招待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

帝国主义的头子中，先是法军司令巴而雪很赏识他，以后陈群又介绍英军司令邓坎、美军司令白多楼等与他往来，他们从杜口中可以了解到总工会和蒋介石、白崇禧等方面的情况，因而他一下子便显得重要起来。

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曾召集白崇禧、宋子文、李济深、吴忠信等开过好几次秘密会议，杜从陈群那里了解到蒋有反共清党的准备。当时外面早也传言纷纷，有的人说共产党要组织政府，打倒国民党，并武装接收租界。据杜说，这种谣言是由陈群的政治部散布出来的。另一种是说国民党要驱逐共产党，解散总工会和纠察队，这是蒋介石等反共的阴谋被泄漏出去了。

杜说最好笑的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听了这些话之后，还去找汪精卫查究，汪当然矢口否认，两人便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来为两种说法辟谣。蒋介石还赠送纠察队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上海市政委员会也褒扬纠察队是“民众的武装”。没想到几天之后，就发生了一场反共的大屠杀。

杜得到陈、杨两人的通知，要他动员上海流氓参加反共后，他先劝说张啸林，张同意后，又去说服黄金荣。黄开始拿不定主意，因他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拥护的人很多，怕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要杜看看谁胜谁负再说。杜认为机不可失，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据说黄最后被杜说服，是杜提出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黄才决定参加。

杜的爪牙早有一部分混到了总工会和纠察队中，他们预先仿

制了不少总工会用的标帜，事前由杜与租界方面商量好，同意流氓和特务在租界内集中，配合反革命军队去解除纠察队的武装。蒋介石把一切布置好以后，便于4月7日离开上海去南京。

4月12日早晨4点钟以前，杜和黄金荣、张啸林分别集合了他们的党徒，杜的爪牙高鑫宝、芮庆荣等由顾嘉棠率领；黄的门徒由唐嘉鹏、顾竹轩率领，杨虎特务处的特务由彭伯威率领。一律工人装束，佩带工字臂章，携带武器，分股从租界铁门冲向南市和闸北纠察队驻地及电车工会、三山会馆、湖州会馆、申新纱厂等处。

这批冒充工人的特务、流氓，乘纠察队员尚在梦中时，缴了守卫的枪枝。有的地方被他们欺骗搜缴了一些武器，有的地方当时发生冲突，工人们仓促应战。事前约定好了的二十六军周凤岐部由参谋长祝绍周指挥该军第一师伍文渊部和第二师斯烈部4个团，分别将纠察队包围，向纠察队进攻。同时假称调解双方冲突，命令双方放下武器，趁机将纠察队武器全部骗走。在冲突时，纠察队当场被打死100多人，打伤几百人，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杀害。流氓把纠察队的东西抢劫一空，循原路退入租界。杜月笙等当时没有离开租界，而是在铁门内守候，看到他们的人都安全回来，才离开铁门。

第二天（13日），总工会把这一经过真相用特别紧急启事在《申报》刊出，戒严司令部立即派人将此项启事删去，并代之以该部特别紧急启事，否认租界方面有武装流氓冲出，并说这次事件纯系地方流氓莠民与纠察队发生纠纷，为了维持治安，才将双方枪械临时缴存。杜月笙等对戒严司令部说他们是流氓莠民，极不痛快。陈群又赶忙出来更正，声明这次事件是总工会内两派互相殴斗。

消息传出以后，上海工人们愤怒异常，所有工厂均罢工，工人分别在南市、闸北等处集合开会，要求严厉惩办杀人凶手和主

谋犯，立即发还缴去枪械，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顾嘉棠等第二天也大批出动，协助搜捕总工会和纠察队负责人。顾亲自在闸北宝山路口仁善女校、第二师司令部门口观看，游行的工人被该师全副武装的士兵打死100多，陈尸遍地。反动派又对工人们进行新的诬蔑，说总工会内部隐藏有直鲁联军，已搜出了大量直鲁联军符号证件，“通敌有据”。以此为借口，大肆搜捕和屠杀工人。

这一阴谋又是杜月笙的得意之作。因为流氓们抢劫了纠察队所有东西之后，回去一检查，值钱的东西并不多，文件等便送给了杨虎。在清点这些东西时，杜发现工人们在收缴直鲁联军溃兵枪械时，也缴了他们的符号证件等物，没有毁去，杜便建议拿这些东西作借口来捕杀工人，这便是所谓“通敌证据”的由来。

在两天的混乱局势中，反动派一会这么说，一会又那么说，许多人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群得到白崇禧和蒋介石的指示，由他拟好一个通电，叫杜和黄、张三人署名发出去，并印了几千张在上海散发。14日上海和南京等有些地方的报上就刊出了这一通电。在这一通电中，对中国共产党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同时大肆攻击总工会和纠察队的负责人。但电文不打自招，说什么“同人等急起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凶蛮，以免遗害子孙，尤望全国父老，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共起而铲除之。同人等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出而奋斗。”恰恰证实了蒋介石勾结流氓进行反共的阴谋。当晚，白崇禧便去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行前又找杜等去勉励嘉奖了一番，因此杜的劲头更大了。

上海工人们并没有被这场大屠杀吓倒，除了继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外，他们印发了不少文件，揭发蒋介石为首的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的大阴谋。杜又指使他的爪牙到处侦察共产党人，随时向杨虎递送黑名单，不断搜捕中共人员。

杜的通电还没有发出，他就找了与他有关的一些团体，陈群

也指使一些与国民党有关的团体，共凑集了六七十个，于15日在各报刊出了致蒋介石、白崇禧的通电，把这几个流氓打手捧为“救国义士”，说他们12日晨，亲自率领“敢死同志”收缴总工会枪枝，解散纠察队，使全市中外人士为之欢跃庆贺，希望全国各省市各团体一致仿效上海办法，向他们看齐，以此作一次舆论试探。

16日，陈群奉蒋介石的指示，要杜等公开出面招待新闻界，发表反共谈话。通过这一系列试探之后，蒋介石和白崇禧才不再掩饰，公开提出了反共的言论。

杜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既讨帝国主义的欢心，又为蒋介石等所器重，还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一举而三得。

多年以后，在他做60生日时，《中央日报》曾用这样的话来称颂他：“十六年国军方奠定东南，上海伏莽遍地，一时人心未定，秩序纷然，先生以安定地方为重，与黄金荣、张啸林仗义执言，昭告国人，复默运机宜，不旬日而反侧以宁，此则有造于党国之始也。”对他这次充当反共急先锋的功劳，一直没有忘记。

蒋介石背叛革命成功以后，对上海清帮头子特别表示好感，不久他到上海，曾盛宴招待杜、黄等人，当面称赞他们“深明大义”，是“识时务的俊杰”。

蒋第一次下台，住在上海杨虎的俱乐部里，杜盛情招待过他，据说还给他送过钱。不过杜自己对送钱给蒋的事，我没有听他谈过，别人问到他时，也不正面答复，因他怕蒋知道不高兴。

多年来，蒋和他一直是保持着一种很特别的关系。在大庭广众中，对杜从不表现过分的亲热，当只有他两人或少数亲信在一起时，却对他非常要好。我在抗战前有一年去上海，正遇上他被蒋邀去南京，蒋约了他和钱新之与另外两个金融界的人一同吃饭，座上对他极为亲热。他们曾一同论起年龄，以杜最小，蒋特别鼓励他，说他前途无限，回来他非常高兴。据他自己说，蒋介石曾

向他表示过，有困难可以随时去找他。杜对此万分感激，常以此炫耀自己和蒋的关系。但他非遇到特别重大问题，关系到他切身利害，从不肯轻易去使用这张王牌。他和蒋手下不少人有深交，一般问题不必通过蒋就能解决。我过去听到他谈过两件事，这是当时许多人认为没有办法可想，他才直接找蒋而得到解决的。

一件是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大吗啡案，这个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他叫顾嘉棠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等分赃不匀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这一连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反动派内部也吵闹不休。杜知道追查下去，必须会查到他的头上，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一面自己见蒋，请求不要彻查下去，这件哄动一时的大案子，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还有一件是他最有钱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抗战那年在上海和官僚资本勾结，做棉纱交易，引起了市场上一次轩然大波。蒋介石命令戴笠在上海逮捕徐，这时杜的徒弟王兆槐在戴笠控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任侦察大队长，王奉令后，便去密告杜。徐懋棠向杜求情，他看在钱的份上，立刻飞到庐山去见蒋，请求不要逮捕徐等，蒋接受了他的意见，叫戴笠和他商量办理。以后由于牵涉到孔祥熙的老婆，要办也办不下去，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从 1927 年到 1937 年这 10 年中，是杜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倚仗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甘心充当帮凶，又与反动头子有勾结，而两方面又都需要利用他充当工具，他的地位被抬高了。杨虎第二次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后，对他更是言听计从。

杜为了直接控制警备司令部的主要部门，把他最得意的徒弟陆京士推荐去当该部的军法处处长。这个从来没有穿过军服的工贼，一下成了陆军上校。他的另一徒弟王兆槐是该部侦察大队长，在警备司令部里，许多人对杜比对司令还恭敬。

在租界方面，他的势力原来只限于法租界，这时也扩充到了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督察长金九林是完全听他安排的，公共租界的流氓头子季云卿和他徒弟英租界捕房督察长陆连奎，对他也很尊敬。再加上商会会长王晓籁是他支持出来的，自己又兼了不少的董事长、理事长、总经理一类职务，故在工商、金融界也很有势力。

在他全盛时期，他是挥金如土。如果靠他所经营的企业、银行和兼职等正当的收入，他绝不可能一掷万金无吝色。他那么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不得不谈一谈他的生财之道了。他自己虽不直接做鸦片生意，但他大宗的收入是靠包庇贩运鸦片等毒品而得。当时在上海行销的各种毒品，都要由他保护，这笔“保险费”为数相当惊人。每年由各地运到上海行销和加工的毒品有几千担之多，他从中可以收到上百万的“保险费”。他不仅可以担保货物不出问题，连搞这项生意的人也由他保护。顾嘉棠便向我谈过，戴戟在上海当警备司令时，有次他手下的特务把吗啡大王陈坤元扣捕在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不通过英租界巡捕房把陈秘密押回司令部。此事被一个认识陈的妓女看到了，立刻打电话向杜报告，杜马上叫顾嘉棠带了 8 个携枪的打手，闯进房间，硬从特务手中把陈抢走。他们平日护运毒品，也都佩带手枪，随时敢与检查人员对抗，死人流血在所不惧。

他另一大宗收入是包赌，上海许多大的赌场，都是由他负责包下来。我只去过其中一家最大的，是在同孚路 181 号，那里由顾嘉棠派顾苗根等十几个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这是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铁门经常关闭着，只有认识的汽车才能直开进去，对不认识的人他们还要抄一下身，怕带手榴弹等物进去出事。他们对前去捣乱的小流氓，轻则殴打，重则杀害。

进赌场以后，便向账房换筹码，从 1 元到 100 元不等，主要是轮盘赌，还有单双、大小、回门摊、麻将、扑克等等，中西赌

具一应俱全。我在那里赌过轮盘和大小，总是输的时候多。那种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万元。赌场除了靠赢钱外，还明见十抽一的办法来抽头，1000 块钱只要输出赢进 10 次就等于没有了。

一些从外地来的大赌客，把钱输光以后，赌场还照例代购车船票送回去，好让回去再拿钱来赌，同时也免得在赌场寻短见或耍赖皮。赢得多的人，赌场也派人护送回去，但这种情况极少有。

赌场设备很齐全，可以免费供应上等鸦片烟、中西餐、冷热饮料等，休息时可以大吃大喝，以此来吸收赌客。杜月笙从这个赌场每月可以拿到三四万元，顾嘉棠每月也可得 5000 元。

杜自己不到这种场合来赌博，平日总是在家里赌。客人赢了钱，得给他家里的人小费，为数也很可观，有些人想巴结他，给的比抽头还多。他一般小赌是“挖花”，陪他玩的有刘航琛、康心之、顾嘉棠和我等人，虽说是小赌，每次输赢也是上千块银元。大赌是推牌九，每场是几万到几十万银元。抗战胜利后由于法币贬值，便用美金计算。下场时再按当日美金黑市价格折算法币结帐。这种大赌，他是十次有九次要赢，而且赢得很多，他自己不要花样，靠别人和他合作来做假。象以前一个大盐商的儿子朱如山、律师徐士浩等都有一套很高明的手艺。我曾和他合伙搞过大赌，他因身体不好，只赌到晚上 10 点左右便去休息，由我守通夜，往往到天明才散场。他在桌上时总是赢，做假的朱如山等人也和别人一样输钱，所以不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当时输得最多的是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在杜家里先后输掉 9 万多美金（当时外面传说吴输了 90 多万，我记得是 9 万多）。还有四川帮的刘航琛、康心之、康心如，以及杜的小同乡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等，也输过不少。赢得的钱，我和杜三七分，我有时一夜可以分到几千或上万美元。

杜玩假牌的手艺并不高明，有次戴笠和我们一起在我家里表

演过，还是戴笠那一套比我们俩人都高明，他不论拿什么样的骰子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掷出自己所要的点子来。我和杜都称赞他这一手“绝技”。

杜在上海，不仅中国人开的赌场由他包庇，连当时外国人搞的“大翻戏”，他也分成。解放前上海的跑马、跑狗、回力球，不知骗去中国人多少钱，我认识的许多女人中有不少爱去赌回力球，好多都弄得倾家荡产，甚而自杀。

当时这些公开赌场，是得到租界当局保护的，虽不象中国人开的赌场一样向他送包银，但也得和他拉上关系才能太平无事。我过去爱买马票，每年举行春秋两季香槟赛开彩时，也请杜去主持。那时头彩最高有过25万元，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得到过，得主都是不在上海的外国人。我最初还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后来杜告诉我，这些得头彩的外国人都是假的，要是真的付出那么大一笔奖金，那些外国人还吃什么？所以他从不去赌这些玩意儿，而只是从这几个外国大赌场中拿回一笔数目不小的车马费。

他兼差之多，真是惊人。他自己主办的商号倒不多，如象中汇银行，名义上是他办的，实际上是他的徒弟徐懋棠等占的股金比他多，还有通商银行是从别人手中抢过来的。这通商银行据说开办在光绪年间，是家老银行，发行过钞票。他抢的办法很毒辣，先叫人去该行存款，等到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以后，便派人在同一天内去提取现款和兑换钞票，官僚资本的银行又不帮其调头寸。这样一来，弄得该银行措手不及，支付困难，风声一传出去，存户纷纷提款挤兑，眼看该行要垮台了，该行负责人只好去请他帮忙维持，他先还故意推三推四，等他答应出任该行董事长后，他关照一声，提款和挤兑风潮马上就和缓下去。以后又由钱新之等在该行增加了官股，这样通商银行便被他抢过来了。当时的经过很复杂，我只记得这一简单情况。

另外他兼任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常务董事，浦东、国信、亚

东等银行的董事长，还有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在交通界，他是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兼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董事。

他懂得要成名还必须靠报纸为他吹捧，所以他也想方设法钻入了新闻界。他是上海《申报》的董事长、《新闻报》的董事、《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他的徒弟办的许多小报，如陆京士办的上海《正报》都和他有关系。

他兼的重要职务还有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总会长、上海商会常务监事、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中纺公司董事长、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世界书局董事长、大东书局主席董事等。杜兼的这类职务约100个之多，有时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所兼的这些职务，一个月单是车马费就很可观，再加上干股分红，那就为数更大了。他的这许多兼差，大都是靠使用流氓手段和倚仗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勾结所取得，有些人则是利用他的“牌头”来应付意外的麻烦，有时他也利用这些兼职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如抗战开始时，蒋介石想要拿些轮船沉到长江当封锁线，许多私营轮船公司都不愿意把船拿出去，兼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杜月笙，便首先响应号召，拿出了几条船沉到江阴，别的公司也只好忍痛牺牲，长江封锁线便这样完成，杜因此而落得个“爱国”的名声。

1932年，他创办了恒社。这是以社会团体为名，实际上是个帮会集团，该社成员都是他的门徒。它标榜的宗旨除一般帮会的所谓道德信义之外，特别提出它是“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以此骗人和讨好反动统治者。他常常夸耀，他有“八千子弟，患难相从”。这完全是吹牛，实际上是2000不到。就连他的徒弟陆京士的清社、张克昌的畅社等徒子徒孙加在一起也不到8000。这些人和他的关系，他自己也很清楚，无非是借重他的势力来作挡箭牌，除了早年跟他打流的一伙人要靠他生活，常跟他在一起外，大部

分工商界的人都是彼此利用而已。他的门徒中军官极少，因为他很懂得蒋介石的脾气，这个流氓出身的独裁者最忌讳他的学生和部下去拜别人当老头子。恒社中的将级军官如王兆槐，是奉戴笠指示才去拜他的门的。他平日和许多反动军官虽有往来，但大都是交朋友，并不拉来当自己的门徒。

他当时每月得支付一笔为数很大的钱，去养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每到月底，各方面的进账还没有转入他的户头，就有部分送出去了。我曾经看到过接受他的钱的名单，其中不少都曾经有过一些名声的人，如章士钊等。

三、祠堂落成和六十大寿

我认识杜以来，先后参加过他一生中两次最热闹的场面。一次是1931年6月，参加他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一次是1947年8月30日他60岁做生日。前一次是他大走红运的时候，后一次虽也热闹非常，却是在走下坡路了。

我于1931年5月间，便接到他的邀请，6月初才到上海，没有赶上参加他那大规模的筹备会的工作，只是去看了一场热闹。当时替他主持筹备工作的都是所谓上海“闻人”和“商界四杰”之流。如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

他在家乡修建祠堂，把在家里的祖宗牌位送进祠堂去供奉，是想借自己当时的声势来光宗耀祖，所以典礼中最隆重的节目便是送这些牌位的盛大游行。为了筹备一支精采的仪仗队，他把所有的关系都几乎用上了，一两个月前就向各地的朋友、同门兄弟、门徒等发出邀请函电，半个月前，各方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词和礼品等已堆积如山。他挑出其中一些地位高的人送的匾额随仪仗队送去，其余都先挂进祠堂，大部分祠堂里挂不下。

6月10日，是经过几个风水家选定的送主日期。那天一早，我赶到法租界华格臬路他家的时候，附近的几条马路已被几万名仪仗队和客人挤得水泄不通。仪仗队分为6个大队，这里我只把第一大队组成的情况谈谈。它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4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的金匾的匾亭，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匾亭等。还有一个100人的乐队。

其余5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8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据他告诉我，当时最不易选到的是一个扶轿杠的人，不知他根据什么人的建议，扶轿杠的要用清朝有过功名的地方官才行。他说要找一个当过什么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找一个这样的人反而费事。后来总算找到了当过上海县知事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6个仪仗大队，从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3个多小时，所经马路交通全部断绝，一路上鞭炮不停，看热闹的有几十万人。

当仪仗队和来宾从码头分乘十几艘火轮渡江时，秩序很乱，法

租界的巡捕探警全部出动维持，还是有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10里路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这些彩旗和彩牌坊都是由各商店所赠。临时还从上海调来不少汽车和大量的人力车接送客人。

杜祠前面，搭着5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100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祠堂本身并不很大，只是一座三进五开间的房子，门前却立着一对很高大的石狮，气派很不小。

那天上海邮政局也在那里设立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许多商店都去赠送扇子、汽水等作广告宣传。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的杜月笙照片，则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凡去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很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可以去看戏和吃饭。

举行粟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21响。首先由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登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当时连我都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一个帮会头子的家祠落成，堂堂的国民政府会派代表去道贺？

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1万多人。

去赶热闹的贺客，不少是为了去看几场南北京戏名角会演的拿手戏，这在当时是有钱也不易看得到的。我还记得那次梅兰芳

是从广东赶回来，荀慧生是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程砚秋是从哈尔滨来，尚小云是从天津赶来，还有10多年没有到南方的龚云甫，那次也破例去了，王又宸有病，刚好一点也在头天赶到。其他如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也都是很早就来了。

从10日到12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都为之哄动。1万枚纪念徽章早已发完，临时还加添了几千个入场证。附近几县赶去看热闹的根本不能入场，便由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演唱招待。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几乎整天都是在开饭。从各方送礼之多，堂会戏目之精彩，排场之阔绰，据说在上海都是空前的。

事后杜告诉我，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有这么大的场面。他最感激的是法租界当局准许他那样大搞，因自有租界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列队开入过，这次能把陆海军、公安部队等开入租界还是第一遭。蒋介石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的公馆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从来也不准调军队去给他守卫。

这次费用据说花了几百万银元，有许多项目是完全由别人凑钱代办的，还不计算在内，不过他收的礼金也不少。

杜为了想抬高自己身价，曾查过许多代祖先，也找不出一个可以给他撑点面子的先人。这次祠堂落成，吴佩孚送了他一面特大金匾，题了“武库世家”之后，其他的人也跟着送了些“武库家声”、“武库经纶”等金匾，他非常高兴。经吴佩孚这么品题一下，使他一下子成了晋朝名将杜预（杜预善用兵，当时人称为杜武库）的后裔了。许多为他捧场的文人，在为他起草特大的鸣谢启事中，便有这么几句：“宾朋联袂，车骑如云。草绿郊坰，见元戎之小队；花开闾巷，多长者之高车。地当江海之滨，幸有烟花十万；人愧春申之侠，居然舄履三千”，又俨然以杜甫自况了。

就在他祠堂落成不久，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绋，在中国四大家族中占了三个是他的子婿，也没有杜

祠落成的排场。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不久死去，这个最有钱的大地主，也没有办法组成一个那样的仪仗队。多年以后，杜在津津有味地谈起那一件事的时候，还是得意非常，他看作是他的力量的一次大检阅。

1947 年 8 月 30 日，是他 60 岁生日。我从 7 月间便参加由陆京士、徐采丞、顾嘉棠等人所组织的“祝寿委员会筹备处”的工作。开始是发动各方面送贺礼和通知在外地的熟人及门徒前来参加祝贺，同时接洽邀请南北京剧界名演员前来演出，并利用所有的关系去进行宣传联络等活动。

在生日的前几天，我经常和他在一起，那几天各方面送来的贺礼、祝寿文等一天比一天多。杜的耳朵里每时都听到当时的所谓要人姓名和礼品名目，许多院长、部长、省主席、总司令等，他都没有多大兴趣，他最关心的是蒋介石送他一点什么，好炫耀一下。因那时他已开始走下坡路了，生怕蒋会忘记了他。等了几天，一直没有看见蒋的东西，他有点着急了，便挂起长途电话去问蒋的亲信陈布雷，希望陈代蒋写几个字给他装装面子。陈当时也答应了，可是过了两天，蒋的东西还是没送到，他心里很不安。眼看只差一天了，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蒋已派了一架专机送来了礼物。他马上接待这个专使，并立刻打开礼物，原来是蒋亲笔写的“嘉乐宜年”4 个 1 尺多大的字。以后陈布雷告诉他，说蒋听到陈提出这件事的时候，没有叫人代写，陈也不便再催，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动笔。

在大批寿礼和寿文中，他只看了一些有名人物的东西。送礼最早的是钱大钧，第二是邵力子夫妇送的“仁者寿”3 个大字，还有宋子文送的用乾隆年间竹根雕成的寿桃和佛手。他看到这一礼物时曾笑着说，想不到这位洋化朋友会送中国古董给他。

当时最忙碌的是从各地赶来祝寿的京剧界演员，整天在安排演出精彩的节目。我起先不大了解，为什么这些名演员这么热情

卖力，后来我经过这样两件事才明白。一是张君秋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时，老板沈兰庭两个月都不给他钱，还要他继续演下去。张把这一情况告诉我，我向杜说了一声，杜拿起电话问了沈几句，沈马上就付给张5根金条。还有一次是抗战胜利后，程砚秋去上海演出，我经常接到南京许多反动头子的电话托我买戏票，老是买不到好票，因票被朱文膺包下了，我很不满意，便去找杜商量，准备程在上海演出时捣一次乱，使他演不成。杜初不答应，并说把程每场送他的4张好票转送我招待朋友，我没有要。过了几天，情况还是这样。我再去找杜，他回答说程是有些不对。他一松口，我便找杨虎弄到一枚手榴弹，到我在上海的帮会组织益社找一个我养的打手，在程演出的戏院里丢了那枚手榴弹，后来程知道再在上海演下去要出大问题，便赶忙束装回北平了。所以在当时情况下，不去走他的门路，是没有办法在上海吃那碗饭的，祸人福人，只是在他一摇头又一点头之间。

他60岁生日时，原来还准备举行堂会演出的，后来他的一些谋士向他建议，才决定改为赈济两广、四川、苏北等处水灾的义演，将全部收入作为救灾之用。另外把寿礼收入办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几个替他捧场的人，准备在编印通志时，把他过去在上海的一切活动都写进去，他一向是希望“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所以对这件事极感兴趣。

他口头上虽大谈什么国内到处有灾荒，不忍心过事铺张，实际上那次生日，浪费还是相当惊人的。

头天晚上，顾嘉棠等发起为他暖寿，在北京西路佳庐顾的家中，办了40桌最丰盛的酒席，到的有许世英、钱大钧、王正廷、郑介民、钱新之、王晓籁、章士钊、唐生明、潘公展等300多人。那晚章士钊读了他写的一篇祝寿文，这篇寿文是由于右任、孙科、居正、戴传贤、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吴敬恒、吴铁城、何应钦等100人联名签字送给他的。在宣读时，不少人当时都感到

捧得实在太过份了。为了让这篇奇文不致全部失传，特抄下其中几句："芦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敌席卷千里，浸不可制，如是者相持至于八载。顷之，强敌一蹶不振，肉袒请降，此掺之至坚，导之使然之二三君者，其谁乎？吾思之，吾再思之，此其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试执涂之人而问焉，吾敢曰，战时初期，身居上海而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者，舍吾友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之也。"

其余的贺客中，也有不少极尽阿谀之能事者，有的把他捧成郭子仪，更有人说他的富贵寿考都超过了郭子仪。杜只简单地致了答谢。席间还由各地来道贺的曲艺名演员说了几段相声和滑稽戏助兴。

第二天寿期，是在泰兴路丽都花园举行祝寿典礼的。寿堂正中悬挂一个比人高的寿字，由上海市参议会全体参议员签名于上。寿幛上面是蒋介石的题字。8个儿子都穿长袍马褂，几个老婆和儿媳女儿等都挂着精巧的寿字胸花。当天他自己不去寿堂，请陆京士、杨虎、徐寄顾、徐采丞、顾嘉棠和我6个人代他招待客人。凡去贺寿的人，都可以得到精印的吴稚晖和叶恭绰亲笔书写的寿文和华福烟公司赠的寿烟一盒。汽车前面均贴上"庆祝杜公六秩寿辰"的小条。当天上海的宪兵、警察、特务大批出动去保护，警察局长俞叔平亲自在门前指挥进出的汽车。

第一个去祝寿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府文官长吴鼎昌，接着才是宣铁吾、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俞鸿钧、汤恩伯、郑介民、吴国桢等院长、部长、总司令、特务头子及金融、工商等界的所谓巨头和社会名流，穿长袍、西服与全副戎装的都有。当天去的汽车有1000多辆，宾客有八九千人。中央电影制片厂还把这一热闹场面摄成了新闻片，在上海等地放映。

这次表面上说是为了提倡节约，实际上是分等级招待，一般

贺客只能吃到一碗素面，而有地位的都被请到里面去享受上等筵席。

蒋介石对他还是特别表示好感，除亲笔题字与派吴鼎昌代表祝寿外，又叫自己儿子蒋纬国领着儿媳到他家里去拜寿，向他行子侄礼，杜对此非常兴奋。

祝寿赈灾的京剧义演，原定从9月3日到7日为期5天，因很多有钱人认为这种南北名角的联合演出太不容易，又要求延长了5天。票价分5等，最高50万元，起码20万元。当时米价是30多万一石。10天义演得到了20多亿元。寿仪却有30多亿元。这些钱都是随收随存于中汇银行，名义上他是一钱不要，但等到把这笔钱捐出去时，米价已涨到50多万元一石。这些因法币贬值所得到的巨额利润，全上了他的腰包，只是苦了那些演员白帮他一场，而他却名利兼收了。

四、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

七·七事变刚一开始，杜月笙就在上海大声疾呼，要那些还正在过着花天酒地的人不要再那样醉生梦死，上海也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并着手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大肆征募医药用品。不久，八·一三战事果然发生，过去说他是危言耸听的人，也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门徒和替他捧场的人，更利用这件事把他吹得比未出茅庐便预知天下大势的诸葛亮还要高明。后来我从孔祥熙口中听到，原来是孔先知道中共已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蒋介石被迫不得不接受，孔为了勾结杜利用战争来发财，所以把这一消息及早告诉了他。他自然是大卖气力，早在一·二八时，他已尝过甜头，在那次战争中他是名利双收的。

上海开战以后，他又组织抗战后援会，向工商界摊派和征募了巨额物资和现金，为数在千万元左右，全部由他支配。中国军

队西撤后，这笔巨款成了糊涂账，谁也没有向他清理过，大部分上了他的腰包，他成为抗战开始第一个大发国难财的人。

这段期间，他和戴笠勾结得更紧，戴借抗日为名，趁机组织起特务武装部队，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杜被邀去当了委员，并由他的徒弟陆京士等，把他们所控制的邮务工会员工组成了一个邮工支队，还拼凑了许多流氓帮会分子参加。以后这些部队在上海与日本军队一接触就垮了，剩下的逃到安徽改组成了“忠义救国军”。

上海沦陷后，他很不愿离开他的发祥地，还想利用租界作保护留在上海不走。当时主张他离开的人，大都是与蒋介石集团有关系的，主张他留下的人也不少，这些大都是他在工商界的门徒。后来由于钱新之和戴笠的劝说，他才动摇。戴临走之前，曾和他几次研究，如何利用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搞特务活动，他在这一点上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能留下一批人继续保持他在上海的地盘，而且是名正言顺地留下来，将来无论哪方面取得胜利，对他都有好处。于是决定把他的秘书徐采丞和管家万墨林等留下。同他住在一个大门内的兄弟张啸林不想走，也作为有任务而留下，戴同意了。后来张投敌，发表为浙江省长，戴派特务把他打死了。这一内幕我知道一点，张不愿走的原因是对蒋介石早就不满，因张的儿子从法国留学回来，张想过去在四·一二时他与杜月笙、黄金荣三人充当过反共的急先锋，希望蒋能够念及他的这一功劳，培植他儿子一下，便要儿子去南京见蒋，希望给他儿子一个银行经理或高级职员当当。蒋在接见时，一听到他在法国读书一年要花十几万元，便不敢用他。张对此异常怀恨，认为蒋太不讲交情。杜也了解这一情况，所以沦陷后除了家务方面和个人财务等请他帮忙照顾外，有关秘密工作都不愿意要他参加。后来张与陈公博、汪精卫及日本人有了关系，对杜的话根本不理，并且多方面想了解杜和戴在上海的活动。这样一来，杜、戴两人为了自己的利害关

系，在杜的布置下，由戴的特务收买了张的汽车司机，很容易地把这个与杜合作多年的老伙计打死了。

杜和钱新之一道带着姚玉兰和儿子逃到香港后很不得意，因为在上海横行多年，这一亲手打出的码头丢掉后，便有寄人篱下之感。当时他绝没有想到这个仗会打八年，总认为一两年便可见分晓。要是日本人打胜了，因他没有去重庆，回上海照样可以保持原来的地位，他与日本人还有不少关系；要是中国打胜了，更不会有问题，所以他呆在香港，静观变化。

他在香港期间，也是采用两面手法，既和敌伪有联系，又替戴笠做过不少工作。他和敌伪的关系，没有具体和我谈过。但从他无意中说出的汪伪组织的情况中，可以听出他在香港与这些人是有密切关系。而他谈得最起劲的，是和戴笠搞的那一套。如唐绍仪和日本人有了勾结后，蒋介石很希望了解日本人向唐提出了什么条件，便叫戴笠设法弄清楚。戴去找杜，想把唐秘密请到香港商谈。杜怕唐不答应，除托人去向唐联系外，还找了一个与唐关系很深的朋友去邀唐，并说明如果唐自己不愿来港，可派一代表来。唐对这些完全不理，并加紧与日本人勾结，结果被特务打死了。

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据杜月笙说，还是他最先得到这一条约的全文，由他告诉戴笠转报蒋介石，重庆方面才公布出来的。不过这一密约他是从什么人那里得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一直秘而不宣。抗战胜利后他虽说出，当时代表汪精卫与日本接洽的高宗武，曾两次到过香港和他谈过许多情况，可是也没有说这密约是谁交给他的。

他在香港码头是吃不开的，收入便大成问题。这个离开名和利便感到痛苦的人，再也耐不住了，1938 年夏天，他去武汉，见过孔祥熙。同年冬天，他又带着一批从上海逃到香港的金融界与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从香港到河内转往昆明、重庆，表面上是去

西南旅行，准备投资开发西南工商业，实际上是去接洽做鸦片烟生意。

过去他在上海走红时，是包庇别人做鸦片烟生意，从中分红，自己不愿直接去做。到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不得不在这方面打主意了。他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他如果肯出面做这生意，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洋，向他购买。他去西南便是找戴笠商量，并弄清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顾嘉棠负责。当时西南许多地方负责人，还以为他真是想投资开发西南，对他大事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便争着向他订货，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3000多万元的定款。这些人都很相信他，认为他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定金拿到后，他又活跃了起来，对他在香港的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九区的赈济工作，早已置之脑后，成天与戴笠研究如何把大批烟土运去交货的问题。

他承揽的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他不得不去重庆找戴笠，催促他履行合同，否则他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很凑巧，在他离开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事发生，香港陷敌，他没有当俘虏，这笔生意救了他。

为了以后还要在社会上混日子，他不能因香港沦陷而不讲信用，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的关系一向不好，所

以戴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

杜到重庆后，有天他找我去，把这一经过告诉我之后，便拿出一张500万元的支票给我，叫我去送给孔祥熙。他先叫我对孔说，他要我给孔买点东西，我实在想不出买什么好，所以把钱送去，请孔自己去买。当时孔是住在范庄我的房子里，我每天都可去见他。我受了杜的委托，照着杜让我说的话向孔谈过以后，便把支票交给了孔。孔接过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关照过我，只要孔收下便不必再说什么，回去告诉他一声就行。

我把这一经过回复杜以后，他立刻抓起电话通知戴笠。我当时在旁，只听他简单地说了句"货物马上准备起运"，接着就去与孔联系，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便拿到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了广西镇南关去交货。我经手一下，也分到了100万元。我还记得，当时王晓籁在重庆周转不灵，顾嘉棠也送了他5万元，还送叶焯山5万元（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大宗是杜和戴两人平分。钱新之、顾嘉棠两人也分到一些，我们便把这笔钱在宜昌合伙办了一个电力厂，买了一批新的机器。

他到重庆后，就更加感到不能为所欲为，内心很苦闷，经常向我说："一日无权，人人都嫌。"只有孔祥熙、戴笠、钱新之等少数人和他还拉得不错，比起过去在上海自然差得太多。钱新之在很多方面都比较照顾他，除在打铜街交通银行楼上给他准备了住处外，还利用交通银行的钱在南岸汪山给他建了一座小洋房。

他原来还打算利用和戴笠的关系把他的恒社在重庆发展起来。因上海方面的徒弟们也有一部分到了重庆。他在临江路骞家巷转角处弄到了一幢楼房，作为恒社社址。而戴笠有他自己的打算，蒋介石曾指示他组织帮会流氓搞特务活动，于是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委员会"，拉了不少从外地来的清洪帮头子

和四川江湖大爷等做该会委员，杜也被邀请参加。所以戴不愿意他把恒社恢复到象在上海时一样，只望他协助自己搞这方面的工作。戴还去拉杜的人，杜看出了如果再发展自己的组织，便要和戴笠及四川地头蛇发生磨擦，所以决定只维持现状不求大的发展。后来有人提议把恒社改成政党组织，他感到问题很多，没作这一打算。由此，他对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工作自然不感兴趣，戴笠召集开会时，他常借口身体不好，重庆气候对他的气喘病很不适应等理由不参加会议。戴笠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常请他去军统局和中美合作所参加庆祝或节日等活动，他也不常去，去了也很少讲话。

最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冷淡。有一天孔祥熙邀我和他，以及杨虎三个人去孔家吃饭时告诉我们，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清洪帮的头子压一压。孔向蒋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为什么要杀他们？蒋才没有再讲下去。孔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都懂得他是想借此来拉拢我们，同时也是劝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被蒋找到借口。所以我们对孔也更加尊敬。

杜听到这番话很受刺激，虽然他估计到蒋要杀也不会杀到他的头上，但对蒋介石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是很不以为然的。出来后，他便和我与杨虎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

孔谈出这件事不久，蒋介石把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枪毙了。原因是被蒋介石看到了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其实兵役署已把兵交给了交通部的运输大队，责任不在程而在俞飞鹏，但因俞是蒋的亲信，蒋不追查，却把程杀掉。当时曾引起几十万四川袍哥的极大反感，他们准备大闹一场。大家认为蒋介石不仅已开始杀袍哥，而且要杀四川人，不能不团结起来拿点颜色给蒋介石看看，免得他再这样乱杀。杨虎当时在重庆也没有被蒋重用，

早已万分不满，便到处挑拨，鼓动四川袍哥一定要借这事，名正言顺地大闹一场。

戴笠早已得到情报，正调集大批武装特务准备应付，一场大的流血案眼看就要发生了。杜得到这一消息，也了解到戴正在大肆布置，便出面极力劝阻。他说，大家如果闹了起来，蒋介石更会借口多杀人，枪杆子抓在他手里，何必吃这眼前亏。同时也对不起孔祥熙，因他很关照我们，绝对不能这样瞎来。许多袍哥头子一向相信他，也考虑到闹起来不会有好结果，这件事才慢慢平下去。

杜由于平日很小心，不易看出他对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原以为他对蒋介石非常忠实，和戴笠也象是无话不谈，实际上他曾暗中和人进行过反蒋的活动，如果不是我亲自参与其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1941 年前后，我从前方回到重庆。有一天，杨杰请了杜和我，还有黄琪翔、章伯钧、杨虎 5 个人到他南岸的家里去吃饭。饭后，杨杰提出请我们参加一个什么党，念了一些东西，我看杜同意，我也同意了。出来时，杜便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能向任何人讲出这件事来，并说连顾嘉棠都不能让他知道。我相信杜也绝对没有告诉戴笠，要不杨杰早就被杀掉了。

我当时糊里糊涂，完全没有弄清楚是参加了什么组织。我只看杜同意了，便认为不会有错。他比我一向仔细，肯考虑问题，跟他一道吃不了亏。解放后，我问起黄琪翔，究竟那次杨杰搞的是什么？黄说他也不明白，只知道杨那时就在搞反蒋活动。

我当时认为杜忠于蒋，是因为他在重庆时向我谈过他替蒋介石做过许多事。如蒋为了加强和统一沦陷区工作，成立了一个“上海市统一委员会”，戴笠和吴开先推荐杜为主任委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他作过的一些工作中，认为最得意的，是他利用过去在上海工商界的关系，为蒋介石推销了几千万元的战时爱国公

债。蒋为此而设宴招待他，并当面嘉奖了一番。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上海投敌附逆的许多工商界分子，为了预留退路，才肯拿出极少钱认购了一些公债，作为将来的护身符。抗战胜利后，不少落过水的人，便拿出这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爱国”和忠于重庆蒋家王朝的证据。

他和戴笠除了搞过出口大量鸦片烟的生意外，1943年前后，又搞了一个通济公司，由他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老板。当时蒋介石集团的要员们都是利用种种特权大做其生意，发国难横财，连美国方面也觉得太不成话，向其提出过警告，蒋曾下令禁止官员经营商业。故戴笠自己不出面，却去向蒋备过案，由杜出面经营，让他分点红利。

通济公司倚仗戴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如当时不准出口的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够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这种丧心病狂的作法，还经常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1942年，杜曾应胡宗南的邀请去过西北，要他去是希望他号召一些人投资开发西北。他本来早就答应过胡，戴笠也催过他，迟迟没去的原因是他对开发西北毫无兴趣，投资多而获利少且慢，不如在重庆搞投机倒把可以赚大钱。这次恰好他的小老婆老三（杜维垣的母亲）和张嘉璈的妹妹一同由上海来，他顺便去西安迎接。

在西安，胡宗南待他如上宾，陕西的地方豪绅为了讨好胡，也为他而举行了一次盛大欢迎会。据说还因为1928年陕西大旱，朱子桥在上海作救灾募捐时，杜帮过忙。他好久没有遇到这种场面了，非常高兴。那次他除了主持筹办西北毛纺织厂外，还为通商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进行过一些活动。

1945年夏天，蒋介石正忙于准备接收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果

实时，杜也异常活跃起来，他多次向戴笠谈到日本投降在即，应如何设法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等问题。尽管这方面工作重庆早在积极准备，但他的意见还是很受蒋介石的重视，蒋一听到他愿尽一臂之力，马上召见了他。当时他气喘病时时发作，蒋劝他先派几个得力的人去布置，等秋凉他再去。他生怕错过机会，宁冒生命危险，也决心冒盛暑长途跋涉。蒋介石当面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叫他和戴笠一同前去。

6月25日，他带着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10多人，乘汽车由重庆出发。行前他身体还不舒服，可是一想到不久便可回到上海，他立刻变得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多了。27日到贵阳，戴笠和中美合作所美特头子梅乐斯也赶到与他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经芷江到达长汀。他稍事休息便到铅山去见顾祝同，顾当时满以为一定由杜负责主持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对他极表欢迎，杜曾和顾谈了两天关于如何接收上海的工作，要顾多从中协助。没想到胜利后，蒋介石并没有把这一发横财的任务交给他，这连杜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否则他就不会去白跑那一趟。

他在浙江淳安住了一个多月，随时和戴笠研究如何接收上海的问题，并两次打电报给蒋介石。第一次主要是关于重庆政权到达前伪币的继续流通问题，具体内容我记不起。第二次是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赶到淳安，向他谈了上海方面许多落水投敌的工商界汉奸，希望杜在胜利后设法保护他们。杜便向蒋建议，对这类人将来给以宽大处理，不宜牵涉过多的人，以免有伤元气。他准备只要蒋对这一问题有回电，便马上通知上海，让这些人早点安心。但蒋对他这一电报没有给予答复。

他到淳安的消息很快在上海传开了，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去见过他。还有不少汉奸也纷纷派人和他联系，这时他又显得异常忙碌起来。

当时戴笠在淳安，专搞联络敌伪军，布置胜利后阻止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部队进入上海、南京及京沪沿线大城市等阴谋活动，杜尽力予以协助，并向戴提供了许多当时京沪等地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这一对狼兄狼弟配合得很好，他自己也叫人放出消息，说他是由蒋介石派到东南去协助主持接收工作的。他留在上海的门徒更大造谣言，说他将出任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他在淳安时，便有一些人从上海赶去和他接洽这样的事：上海许多与敌伪有关的汉奸产业有的给他补上股东；有的认他做后台老板，分一部分股权给他，避免日后被查封没收。当然他都一一答应了。因此，在敌人还未正式投降，重庆所派的接收人员还没到达，杜已经在进行这种变相的“接收”，成为发“接收财”的第一个人了。

五、走下坡路

1945年8月28日，他迫不及待地从淳安经杭州回上海。到达上海的那天，正是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9月3日。随同他回上海的，除重庆带去的一批人外，又添了由上海去迎接他的另一批人，一路浩浩荡荡，不减当年的威风。事前上海方面早已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都赶到车站去迎接他，这使得他又踌躇满志了。

他很久就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用，因为怕别人会联系到蒋自己的流氓出身。而杜的野心又不小，非特任官他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上海市长这样一个职务对他最适宜，希望蒋介石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拥蒋的功劳，能把这一职务给他，加上孔祥熙对他的极力支持，他以为很有把握。结果，蒋介石却发表了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这使他非常失望。以后上海市参议会成立，他又想退而求其次，能当当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也行，不料CC又把潘公展推出来，抢了这个位置。弄去弄来，只弄

到一个上海市参议员的职位。两次失败之后，他只好改变口气，大谈什么“推进社会力量，扶导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是个人生平夙愿”来为自己解嘲。

刚回上海，他还有点旧日余威，主要是和戴笠勾结得很紧密。军统和中美合作所上海联合办事处刚一决定成立，他就把他在杜美路70号一幢新洋房借与戴笠使用。其实当时戴要在上海找象他那样一幢房子，实在太容易了，但戴为了表示不首先占用敌伪房屋，也乐得利用一下。

戴笠胜利后负责主持逮捕汉奸的工作，大权独揽，气焰很高。凡被军统逮捕的人，很少人能去说人情，杜却可以去保释人或请求戴暂缓逮捕。他用的办法也留有余地，从不当别人面向戴笠说人情，也很少用电话直接和戴谈这些事，当他接受了汉奸家属送去的金条之后，总是找戴笠手下的处长王新衡去说，王一向是代军统和他联系工作，是他家座上的常客，通过王向戴去转达，戴十有九次肯买他的交情。这一时期中，汉奸家属奔走他门下的络绎不绝，唯恐他不肯收下金条、美钞，他也很懂得戴笠的脾气，往往是选择些案情不太重和伪职不太显要，但搜刮却是很多的，才去保释几个，一般他也是不肯答应的。

1946年3月的一天，我正和唐生明等在丽都打牌，得到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我立刻去找杜，他一听大惊失色。他一向认为结了戴这样一个兄弟，对他来说，真是如虎添翼，满以为胜利后可以相互勾结起来，在上海大干一场，没想戴这么快就暴死了。他内心的沉痛，从他在上海主持戴笠的追悼会时落泪的情景，便不难看出。隔了好久，他一和我谈起戴来，还是无限怀念。戴笠死后，情况就随之而起变化，许多特务自己直接找汉奸家属谈条件，不愿他从中插手了。

胜利后的上海，虽然租界没有了，却成为国民党各派各系大抢劫的重点地区。CC、军统、中统、宪兵、蒋介石的侍从系、汤

恩伯的实力派，加上孔祥熙、宋子文四大家族和他们的爪牙一起拥来，彼此抢来夺去，把上海抢得一团糟。杜在这种局面下，不要说恢复过去的特权，连他自己抢到的东西也有人在打主意了。没有租界，他的恶势力再也敌不过这许多掌握特权、军权、政权的大小饿狼。他虽施展出全身本领进行联络拉拢，但这不是交情问题，而是关系到与反动派切身利益的冲突，哪里还能容许他再来插手！CC 在上海的一些头目，表面上对他很客气，而暗中攻击他最凶。

首先使他感到最难堪的，是他的门生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向他开火。吴公开向他要退门生帖，再也不承认他这个老师；并在自己主办的《诚报》上大肆攻击他，一些影射他的文章，使他很伤心。顾嘉棠告诉我说，这是 30 年来上海报纸第一次这样骂他，他怎么会不难过？过去上海发行的报纸，哪一个不是捧他的场？这次着实刺痛了他，他无刻不在等机会报复。当吴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便连篇累牍地揭发和攻击吴，趁机大打落水狗。这样他仍感不足以泄恨，还指使他的门徒王兆槐派人去暗杀吴。这件事被毛人凤知道了，曾派保密局处长沈醉赶到上海，坚决不允许王为杜去充当打手，使他一直没有泄出这口怨气。

接着使他丢脸的事又发生了。一向倚仗他的势力在上海横行惯了的万墨林被扣捕了。万是他家的总管，沦陷时留在上海为他照顾财产和敌伪勾结做米的生意，赚过不少钱。抗战胜利后，由于杜证明万留下是替军统做地下工作，使万不但逍遥法外，还继续当他的豆米业公会理事长和万昌米行的大老板。这次为了粮食贷款舞弊案被牵涉进去，法院传讯后予以扣押。他也看出这是他的反对派有意识在倒他的台，用杀鸡吓猴办法拿万来开刀。他知道敌不过，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出面袒护。但背地里却大发牢骚，说什么“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因为那次粮贷舞弊案万墨林不是主角，只是利用粮食贷款来进行粮食投机倒把

的活动，幕后贪污得更多的人却没有事，所以使他很感不平。我那时常和他在一起，一谈起当时上海一团糟的情况，他总是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10倍还不止。"这时他处处小心，什么事都不敢过问，常常自称是"一品老百姓"。

他虽然希望平安无事地过下去，维持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局面，不要再让他过分地难堪便算了。可是反对他的人并不肯就此放过他，使他更加丢人的事终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1948年秋天，他的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逮捕了，这一下几乎把他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起不得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气愤到极点地对我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激动。他喘了好久，又叹了几声气说："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关于他儿子被捕的消息，当时不仅轰动了上海，连许多大城市的投机商人也为之大吃一惊。这件事的经过，我当时在上海，比较清楚，它的内幕谈起来是相当复杂的。

1948年夏天，由于法币贬值得更利害，物价的狂涨的确惊人。当时省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跟着涨落。蒋介石总希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先后曾几次给杜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他当时很清楚，他不可能想出办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记得他第一次接到这个电报时，曾对我和几个常接近他的人谈过，只有采取标本兼治才能有效。他复电蒋便提出了"进行劝导与纳游资于正轨"两项办法。据说蒋对他这样空空洞洞的意见很不满意，又要他提出更具体的办法。他找了不少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可望稳定。他当时

认为很得意，曾向孔祥熙谈过，孔也认为是一项好办法，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蒋介石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相同，最后才决定了收回游资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有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金赶到上海，这些陌生的主顾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大量出笼，上海的游资还是异常雄厚。这不但是蒋介石始料所不及，连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他告诉我，他最初的确认为抛物资是一项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料到南京方面会有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能把抛出的东西一口吞下去。

由于这一着棋失败，蒋介石的愤怒也发到了杜的头上。当时传说蒋认为杜不是诚心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把库存物资抢走囤积起来。杜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曾大叫冤枉。

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把杜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谈。回来后，杜便对我说，这是蒋介石在打招呼，希望大家帮他忙进一步搜刮。杜对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帮忙也帮不上。

金圆券发行的头一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便不客气开始上涨。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名义上俞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早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刘攻芸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却自恃有“上方宝剑”，决心借几颗人头来挽回这一局势。

我当时便听说蒋经国原来决定左右开弓，一面打击一下官僚资本，一面压制地方势力。他选中的对象便是他的表兄弟孔令侃。

这个一向倚仗父亲孔祥熙势力横行不法搞惯了的扬子公司年轻董事长，搞不法的黑生意名震一时，谁也不敢惹他。当时如果能把他拿来开刀，是可以暂时使许多官僚资本家敛迹一些。蒋经国去南京向他父亲请示，蒋介石为了要维持他的统治，也同意牺牲这个外甥。我当时是扬子公司的董事，常和孔令侃一起玩。这个消息传来，孔有点恐慌，便决定请蒋经国吃饭，当面拉拉言语，结果蒋经国不接受他的邀请。他一看苗头不对，连夜赶往南京向宋美龄去哭诉，经宋向蒋介石提出坚决反对办她的外甥后，蒋立刻通知蒋经国另行选择对象。孔令侃得意洋洋地回到上海，见到熟人便说："看他（指蒋经国）能把我怎么办？"

蒋经国办不了孔令侃，便决定要在杜的身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蒋介石也同意拿这个老伙伴来替代孔令侃。嗅觉灵敏的杜月笙，早就提高了警惕，因蒋经国到上海后没有去拜访他，他已处处留心，使别人不易在他身上找出大毛病。蒋经国的特务找去找来才从他儿子身上找到了问题。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凭仗着父亲的关系，一向很吃得开，经常搞点投机倒把，在他看来完全不算一回事。那次是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 2800 多股，在他看来，真是小事一件。没有料到蒋经国便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这样一罪名，把他和另外两个同样情况的人逮捕。

杜月笙得到这个消息，虽气个半死，却表面上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口口声声说："这孩子破坏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

杜维屏这个所外交易的罪名，无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得多的人多得很，便只好送他到法院勉强判了 8 个月徒刑。一送法院，都知道不会成问题了，杜维屏也声明不服，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延到 11 月间，法院只好改判 6 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蒋经国原以为这么来一下，可以把操纵市场的投机商人吓倒，结果却失败得更快。杜虽然害怕再坍台，不敢直接去和他作对，可是暗地里，却极力支持自己的手下去兴风作浪，从旁看热闹。金圆券的贬值比法币更快，没有好久，上海市场物价便由硬性的"限价"改为"议价"，议了几天，又恢复到以前的随意涨价了。蒋经国在上海搞了不到3个月，毫无起色，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南京。这时，杜才抱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再度在公开场合露面。

抗战胜利后，他做60岁生日时，虽远不如杜家祠堂落成时那样的气派，但蒋介石等还是给了他不少面子，因此他还想再次检阅一下他在上海的力量。在竞选伪国大代表时，他想和CC较量一下，便决定参加上海市的"国大"竞选。他明明是以CC为对手，却偏偏要CC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吴开先领头提名，当时了解他的人都称赞他这一着很高明。表面看他还是在靠拢CC，但等到他发动全部力量暗中活动，想在开票时抢个第一时，便被长于搞这一套的CC分子看出他想借此来抬高身价。于是集中力量进行压制，坚决不让他抢出第一。开票那天，他还很有信心，认为可以得到压倒一切的多数票，结果又出他的意外，市参议长潘公展得到了第一；在上海向无基础的市党部主委方治得了第二；他被压到第三名当选。当时他非常后悔，不该去参加这次竞选，屈居于潘、方两人之下，在他看来，是件很不体面的大事。

国大第一次在南京开会，他又想选入主席团去露露脸。最初他以为南京方面的老朋友会支持他，等到要选主席团的头两天，他一摸情况，才知道可靠的票少得出他意外，他的确感到非常着急。要他坐在下面而登不上主席台，他又认为是件丢人到极点的事，他连夜找我商量，神情沮丧。我立刻答应尽力帮忙，他才转忧为喜。他告诉我还差4票，我为了怕别人临时拉他的后腿，便给了他6票。开票时，果然答应他的又少了2票，加上我多给他的2票刚好选上。他对此感激万分，回上海后，便要我把这两个投他票的

黄色工会负责人请去吃饭，亲自殷勤招待了一番。

在这一段时期内，他知道自己越来越走下坡路了，过去那种挥金如土的作风也变了，左手进钱放入腰包，右手进钱也放入腰包，很不容易向外掏出了。

解放前夕，我和他都决定出卖在杜美路的房子，那时只有美国人肯花钱买那些东西。我11号的房子卖了170根金条，他70号房子卖了45万美元。他带着这笔款逃到香港去当寓公。1951年秋天他去世时，听说只剩下25万美元的遗产，由孟小冬和几个老婆瓜分了。

他死后，顾嘉棠和他老婆把他的尸体运往台湾，停在寄柩所内，显赫一时的杜月笙终于弄得死无葬身之地。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

杜门话旧

黄国栋口述　罗醒泉整理

(一)

我在24岁那年到杜月笙家任总帐房，距今已有几十年。我所以能够进杜宅去，是由于我父亲的关系。

我父亲黄文祥，字文庠，是水果行出身，那是我祖父在上海南市里马路（从前叫大码头的北首，现名杨家渡码头）开设一家源裕水果行，托人将我父亲介绍到张恒大水果行学生意。当时张恒大的"当首"（即经理）是杜月笙的伯父，我父亲就拜此人为师。

当年从大码头起的水果行有张恒大、唐恒泰、张锦记、潘源盛、源裕等，近十六铺的里马路有宝大、梁东升、益大等。十六铺旧法租界地段有同茂、祥茂、合成、同祥茂、吴顺发等。我父亲在张恒大水果行由学生意升为小帐房，这时杜月笙也进张恒大学生意，但做了不多时间，因杜月笙不安心学艺，时常上街去游荡，在饭店吃饭，付不出钱就记帐，饭店上门讨帐，行里还得给他付钱。行门口马路上有女人乘坐的黄包车经过时，杜常用烂水果抛上去，侮辱调戏，有些女人就到张恒大来大吵大闹。这些事情使他的伯父非常不满，就介绍他到宝大水果行去学生意，拜宝大的经理为师。过了不久，杜老毛病不改，宝大经理就停了他的生意。

杜月笙失业以后流浪在十六铺。这时十六铺是上海重要的商业区和水码头，市面繁荣，流氓众多，杜先拜套签子卖酒酿的陈世昌做老头子，后认识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探的黄金荣，黄叫杜出面向停泊在十六铺码头上的民船要码头钱，向十六铺附近的“花烟间”（下等妓院）、“燕子窠”（吸鸦片的场所）、赌台等收月规钱，收来的钱全部交黄金荣，由黄分出一部分给杜，就这样，杜成为黄金荣的得力助手。

这时黄在法租界开设赌台，贩卖鸦片，都叫杜合伙，或由杜出面，杜自己也经营赌台、鸦片，逐渐发了财，而后又开设中汇银行。

杜月笙有了钱之后，第一件事是在浦东高桥造了杜氏家祠。1931年家祠落成，上海各界头面人物都去祝贺，我父亲也去了。杜月笙看到了我父亲，叫心腹茶房悄悄通知，要我父亲在一星期后去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他的公馆，有事商量。我父亲依约前去，杜就叫原来管帐的杨渔笙把钥匙全部交给我父亲，要我父亲立即任他的总帐房，我父亲就担任了下来。后我父亲中风逝世，杜要我继任父亲的工作，一直到上海解放。

（二）

当年杜月笙在上海有两个公馆，一在华格臬路，一在杜美路（今东湖路）。杜美路的房子是金廷荪用承包发行航空奖券的利润所得，造了送给杜的，杜自己没有去住过，抗日胜利后将这所房子以60万美金卖给了美国领事馆。华格臬路房子是黄金荣送的，黄金荣靠贩卖鸦片等发了财，在华格臬路造了两座房子，都是三间两进，前一进是中式二层石库门楼房，后一进是西式三间三层楼洋房，东南一座212号送给张啸林，西面一座216号送给杜月笙。

杜月笙原住在民国路民国里，搬入华格臬路后，将前面中式住房楼下三间打通成为大厅，楼上三间住原配妻沈氏，又将后面西式楼房的楼下分为三间，西面厢房前部为秘书室，后部是古董间，是杜与人谈重要事情之处，中间是客堂，东厢房是大菜间，内设杜氏本人的写字台、烟铺和沙发等，在这里接见普通客人，总帐房办事、吃饭和电话间也在这里。二楼全部给第二个妻子陈楣英（老五）居住，三楼全部给第三个妻子孙佩豪（老七）居住。杜的原配沈氏，苏州人，是黄金荣给他娶的，生子维藩（小名林宝）。陈楣英，也是苏州人，共生3个儿子，即维垣（小名根发），维翰（小名二囡）、维宁（小名三囡）。孙佩豪，是唱苏滩的筱桂荪的外甥女，也是苏州人，生了2个儿子，即维屏、维亲。第四个妻子姚玉兰，北京人，她母亲是唱京戏老生的小兰英，父亲是唱京戏丑角的“七盏灯”。姚玉兰原来也是唱京戏的，嫁杜后，生2子2女，即维善、维嵩和美如、美馥。

抗日战争胜利后，姚玉兰又介绍孟小冬到上海和杜月笙同居，因为姚玉兰看到杜氏的妻室中都是苏州人，唯她是一个北方人，势力孤单，所以接孟小冬来做帮手。可是孟来上海后，得到杜的宠爱，反而把姚玉兰疏远了，使姚后悔莫及。

我看到有本写杜月笙传记的书中说，杜氏的四姨太与家乡来的表兄几度幽会，有人向杜告密，杜就派他的四大金刚之一，把表兄两脚砍掉，将姚氏关押起来等语，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姚玉兰作风正派，也无表兄在上海，也从未被禁闭过。评弹《筱丹桂之死》中有一段书说，杜月笙的三姨太在外搞腐化，杜月笙将关系人物斩去手脚，变了“活冬瓜”，并说张春帆拜戚再玉做老头子，戚再玉拜杜月笙做老头子，所以知道此事，也不正确。三姨太孙佩豪一直是规规矩矩的，高年长寿，现在美国，两个儿子都在美国经商，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戚再玉也不是杜的门生，因为不论在抗日胜利前后，戚再玉还没有拜杜做先生的资格。

杜公馆除了这些主人之外，尚有许多雇佣人员，帐房除我外，有杨筠心、邱曾受、赵琴波共4人。我负责银行取款，支付各项开支，管理来信和发信事务，接待重要来客等。杨筠心负责处理发来的各种婚丧喜庆帖子，逢时逢节各处送礼发信，写回单簿，管理电话、水、电的修理装置和各种报纸，分发零星开支、年赏、节赏，管理大厅清洁，招待来客的汽车司机和侍卫人员等。邱曾受管理伙食帐目，厨房炊事员的人事调动，并负责每月发放杜月笙救济贫苦孤老的“善折”金额（孤老经人介绍，取得“善折”后，每月可凭折领取救济金10元至50元不等。这些孤老大部分为英、法两租界死亡的包探和巡捕家属），发信时写回单簿等。赵琴波负责带领“小开”们到外面玩耍，管理电话、水电费和所有大小挂钟等。此外，还有一个万墨林，负责管理茶房（服务员）、汽车驾驶员、厨司、门警、卫队等，外面打给杜的电话，都由万先接听，后交杜接，杜向外打电话，也都由万打通后再交杜接听。万墨林不识字，但记忆力特强，能记住杜的亲友、门生、机关、企业等一百几十个电话号码，只要杜氏令他打某处电话，他能随手拨出号码，用不到翻电话簿。

万墨林原名木林，进杜宅工作是顶替他哥哥万兆棠（度新）的。万兆棠是我父亲水果行里的门生，后来进杜宅工作，几年后积了些钱，吸上鸦片，日夜在杜宅工作，既怕麻烦又吃不消，所以要求杜介绍到烟土公司工作，杜宅里的事情，要他兄弟万木林代替。大家都认为“木林”这名字难听，后由杨度将“木”字改成“墨”字。

杜宅秘书室共有秘书4人，翁佐卿（左青），是张啸林的门生，由张介绍给杜；邱访陌，由陈群介绍；王幼棠（曾任淞沪警察厅秘书）由刘春圃介绍；胡叙五，由黄炎培介绍（原在上海地方协会任秘书）。

杜氏外出时的近身侍卫亦有4人。陆桂才，是张啸林的门生，

做过旧军队的军官，在社会上，人家知道他是扬州白相人，叫陆大麻子，他广收徒弟，有一二千人之多，家住南阳桥，开设维扬大舞台和荣贵祥香烟批发行等。陈秦鹤，是台州白相人，也收有不少徒弟，兼开西藏路恒茂里内的恒雅书场和恒雅剧场、八仙桥第一旅馆、东自来火街的恒雅茶馆、八仙桥第二旅馆、顺昌路同乐剧场、同乐旅社等。陈继藩，较有文化，能说法语，由法租界领事公馆华董张翼枢介绍来的，杜月笙认为此人比较老实，抗日战争发生，杜去香港后将他叫去。高怀礼，北方人，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打听，在淞沪警察厅担任巡官等职。

杜家的汽车多，驾驶员更多。杜本人的汽车司机叫王宝钰（小名阿菊），无锡人，杜宅的所有司机都由他管理，有助手2人。4个太太的汽车司机有8人，子女的司机有4人，杂务用汽车司机2人，共有司机10余人。

厨房间炊事员有几种，苏州帮2人，扬州帮2人，本帮3人，北京帮2人，下手3人，一共也有10余人。

另外，有夜班卫队4人，门警6人，后弄巡路卫队2人。大菜间杜氏接待客人的茶房（称大茶房）4人，专装鸦片烟者1人。装鸦片的名郁咏馥（永福），原在十六铺摆水果摊出身，也是有名的白相人。他满身刺花，广收徒弟，曾任新城隍庙总稽查、上海纱布交易所总稽查等。此人在杜家时间最久，杜月笙认为能用这样的人给他装鸦片，是很体面的。此人平日作风随便，不拘礼节，即使黄金荣、张啸林来，他也嬉皮笑脸，毫无规矩，见到杜宅女佣人，常开玩笑，杜不加约束。他有2个助手，帮他烧鸦片膏。另有杂务工、烧水汀2人，管冷气2人，打扫天井、大厅、送信等茶房8人，花园司务3人，女佣20人以上，由杜氏的寡居表姐管理。每个太太处还有2个拖地板、揩门窗的男佣人。杜宅中的勤杂人员，确实是一个庞大的队伍。

经常到杜宅来的客人，有黄炎培、张翼枢、章士钊、陈群

（此人在杨虎任淞沪警备司令时，曾任政治部部长，后在杜月笙办的正始中学任校长，杜是董事长，每月贴学校2200元。陈在抗战时间，任汪伪江苏省省长，抗日胜利后自杀）等。另如刘春圃、杨度、洪帮大哥高士奎（按日乘汽车到杜宅，其生活开支全部由杜负担）、律师秦联奎、江一平、王荫泰、陆殿东、朱文德、王思默等，工商政界的闻兰亭、钱新之、王晓籁、虞洽卿、刘鸿生、潘公展、徐寄廎、吴开先、杨管北、金廷荪、杨志雄等，加上杜的门生朱学范、陆京士、唐世昌、章荣初、徐懋棠、骆清华、王先青、邵子英等，每天不下一二百人。再加来客的侍卫、司机，真是热闹非常。

杜宅有如此庞大的雇用人员和来宾接待，所以开支非常惊人。如秘书翁佐卿、王幼棠、邱访陌，每人每月工资300元；名誉秘书杨度、章士钊、黄炎培、陈群、刘春圃等，按月送500元；汽车司机上手每月50元，下手30元。保镖陆桂才每月150元，陈秦鹤每月100元，其他陈继藩等每月80元；门警、普通茶房、水暖工人每月60元，大菜间茶房每月100元，厨司领班80元，其他一律50元；女佣每月一律20元；夜班卫队每月80元。我每月亦给200元，杨筠心100元。邱曾受、赵琴波各80元。月宝轮船每月工资500余元。另有高桥杜祠、莫干山月宝别墅、杭州杜庄、苏州别墅等处的管理服务人员，亦需大量开支。当抗日战争日趋紧张，杜氏准备离开上海时，要我结算银行帐目，总共负债570余万元（其中向中国、交通银行借债240万元，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之媳简陈季臣借30万元，积欠中汇、通商、民孚等银行两百数十万元），他的股票、证券、房地产等估计不到200万元。这些债务，直至抗日胜利杜氏返沪时，由于币制变动，才全部还清。杜氏在重庆时，因与上海的徐采丞联络，将纱布等物资由沦陷区辗转运往后方，发了大财，至此杜才真正成了有钱的大老板。

（三）

杜氏的起家与帮会有关。据我所知，洪帮在上海的势力不大，参加者大多是北方人，因为这一帮原来流行在北方，在上海，多数属于理发、菜馆、浴室、茶馆的老板和从业人员。清帮在上海的势力较大，上自达官巨商，下至贩夫走卒，都有清帮人物。其中有名的“三大亨”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次要的有金廷荪（洽茂冷气公司、黄金大戏院、消遥池浴室的老板）、马祥生（金门大戏院老板）、高鑫宝（丽都舞厅老板）、谢葆生（仙乐斯舞厅、大舞台、卡德浴室等老板）、芮庆荣（新光大戏院老板，他专收文艺界方面人士为门徒，如施春轩等）、杨顺铨（绰号卖鱼小顺，在十六铺开鱼行，为当时的鱼霸，还在老西门开西门浴室）、范开泰（绰号乌木开泰，开木行）、范回春（胜洋影片公司老板、远东运动场经理。以上二人为南市人，清帮中称为老前辈，城隍庙出身。黄金荣在城隍庙裱画店当学徒时，就与他们认识）、顾嘉棠（又名花园阿根，本是哈同花园的种花工人，后来靠杜月笙发了财，在赫德路造了很大的花园洋房，名叫“佳庐”，拥有弄堂房子百多幢，又在大西路造起顾家花园）、范恒德（又名阿虎郎，开酒行，并同谢葆生合开大舞台）、徐德胜（扬州人，人称扬州杜月笙，在扬州广收门徒）、袁宝珊（曾开东南大戏院，现为南市影剧院）、叶焯山（是有钱的小开白相人，喜欢骑马，在跑马厅养了3匹马）、戴步祥（大中华饭店经理）、黄振世（开鱼行，是冰鲜鱼行中的大亨，在金陵东路开鸿运楼菜馆）等。

黄金荣手下出名的徒弟有丁永昌（小名野鸡阿大，大世界经理）、顾竹轩（天蟾舞台老板）、唐嘉鹏、陈荣生（二人在大世界门旁合开大利春菜馆，后因互争权利，陈荣生派人打死了唐嘉鹏）、樊良伯（专靠收门生过生活）、夏连良（新光大戏院经理）等。

杜月笙手下出名的门生有江肇铭（绰号宣统皇帝，主持福煦路181号赌台，专收各种白相人作门生，人数很多）、浦贤元（又名小阿本，专收文艺界人员作门生，特别是唱独脚戏的最多）、唐世昌（申报和新闻报的经理，专收各报记者为门生，控制上海新闻事业）。其他如金融业、海关、京剧名演员、交通部门等都有他的学生。

杜月笙能挤入清帮三大亨之一，甚至后来居上，超过黄金荣，有一段转折的过程。他原本是黄金荣的助手，在帮中地位比黄金荣差得很远。20年代，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至共舞台看露兰春唱戏，不满意时，喝了一声倒彩，被黄金荣打了一记耳光。两天以后，淞沪护军使公署派军队从民国路进入法租界，包围共舞台，将黄金荣捉去，关押进护军使公署。这一行动出于法租界当局的意外，大家认为中国军队敢于违反规定，进入租界捉人，说明有很大的决心，要将黄金荣置之死地，于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黄金荣解围。这时杜月笙挺身而出，筹集巨款，亲自与护军使何丰林联系，费了许多周折，终于把黄金荣保释。这件事使杜在帮内的威信大增，黄金荣出于感激，也极力把杜捧上去。同时杜与何丰林攀上了交情，通过何结交了一部分军阀，抬高了自己的身价，还打开了一条贩卖鸦片的新渠道，大大增加了收入。其时一年中仅与北方一个军阀成交的鸦片交易，金额即达几百万之巨。

杜有了钱以后，开始结交政界人士，力求进入社会上层，开始经营银行、工厂等企业。一·二八战事以后，法租界的新领事到任，法商买办朱葆三及其婿魏廷荣由于对杜不满，在新领事面前说了杜的坏话，并挑拨领事下令封闭法租界内所有赌台和烟土行。杜氏受此打击，非常不快，就吩咐门生邵子英（法商水电公司总翻译）组织法商公共汽车、电灯、自来水等厂的工人全部罢工。这时法租界内公共车辆停驶，自来水不流，电灯不亮，造成一片混乱。法国领事对此局面束手无策，就请华董李应生、张翼

枢陪同到杜宅拜访杜月笙，当面要求杜帮忙解决。杜一口应允，第二天，法商水电、公交车辆全部复工；但杜对所封闭的赌台、烟土行等不准备再恢复，故主要收入来源中断，仅靠各处办公费、车马费等收入，不足维持开支，可是为保持面子，排场还须照旧，不够的钱，只好向银行借贷。这时杜的社会地位和在帮会中的势力都已巩固庞大，不怕有人逼债。

（四）

八·一三以后，江南各地先后为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尚保留一部分抗日力量，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要予以消灭，运用威胁、利诱、绑票、暗杀等手段，企图迫使留在租界内所谓社会名流俯首就范。这时，杜月笙离开上海，移居香港。

杜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通知万墨林、朱文德、杨渔笙和我4人说，明天华格臬路吃夜饭，有话要同我们讲。当晚，杜告诉我们说，抗日战争已更紧张，估计日本人将对他有所举动，所以不得不离开，要我们胆大心细，仍按他的指示办事，并规定朱文德代万墨林写信和发电报，我除协助万墨林外，代张冀枢将在上海的报告、电报到电报局设法发出，杨渔笙专门发账务委员会每月的救济费。所谓救济费，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发给社会名流的补助费，以免他们因经济上有困难，受日本人的利诱而去当汉奸。

杜对我们吩咐后，即去香港。同去的有钱永铭（新之），带去秘书翁佐青和王幼棠2人，茶房马镇兴（小阿五），汽车司机汤二宝等。到香港后，杜又来电报给我们4人，嘱咐所有事情应照他昨晚所谈的办理，如有人到上海来找我们，只要有他的介绍信，都要好好接待，他们托办的事，都要一一照办。

在上海同我们联系的，有国民党的人，如蒋伯诚、吴开先、吴

绍澍、王先青、汪曼云（此人后来做汉奸），有民主党派的人，如王艮仲（当时他用假名李大诚，是黄炎培派他在上海做通讯工作的）以及朱学范毅社的两个门生。另外也有一批人拿着杜的介绍信到我处来，要租房子、买汽车、捐车照，以及托带信件去香港，有的要求代买香港的船票，有的有了船票，还要我另租上邮船的小火轮，因为从公和祥码头上船，码头上有日本兵的岗哨，要检查搜身。

这样过了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4人中第一个是杨渔笙忽然不见面了。他先避居别人不知地址的女婿家中，后逃往宁波。杜月笙在香港没有得到杨的信息，写信来问，我们如实告诉了他。杨渔笙原是无名小卒，自做了杜宅帐房后，逐渐有了钱，手里有30多万现款，在宁波有200多亩田地，5间二进房屋和一个花园。杜月笙平时很信任他，任为中汇银行襄理，他在杜面前说了经理傅品圭的坏话，在中汇银行新大楼落成迁入时，杜改任傅为总稽核，另派杨渔笙介绍的徐庆云之子徐懋棠为经理。由于这一原因，傅品圭对杨存有意见。上海沦陷后，傅品圭的父亲傅筱庵任伪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这时傅品圭在中汇银行一见杨渔笙，就恐吓他："日本人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了，你要当心，被日本宪兵捉去了是没有办法活着回来的。"杨渔笙本来胆小，有了钱当然更怕死，开始躲在家里，不敢到中汇银行办公。且因他平日人缘极坏，中汇银行的职工和杜宅的人，包括杜月笙的儿子，都与他关系不好。他虽躲在家里，也常有人打电话恐吓他，所以连家里也不敢住。杜月笙知他逃往宁波，就电报通知他回上海照旧工作。杨渔笙接到电报后不仅没有回上海，反而去了香港，杜氏见到杨渔笙，大发脾气，要杨立即滚出香港，从此断绝来往。杨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杜不予理睬。后经钱新之、黄炎培向杜劝说，才准杨留在香港，但从此与他断绝关系。

杨渔笙脱离以后，杜月笙来信要把账务委员会的工作交我负

责，每月由徐采丞至交通银行领出款子，交我分发。杨渔笙原来只发19个人，我接手后逐步扩大到200人，直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这一活动才告停止。

又过了三四个月，万墨林被吴开先手下的人出卖，由汪伪特工76号捕去。此人约万墨林到南京西路华安饭店（现在的华侨饭店）会面，万依约前往，一下汽车，就被埋伏在饭店门口的10多个人包围，绑架而去。万的司机邵翰度见此情况立即回来告诉我，我四处打探，知道是76号吴世宝干的事，并知万被捕后，受刑十分利害，同时吴又派人向万妻敲诈钱财，先后共达20余万元。

万墨林被捕两个多月后，我也被76号捉去，我是在菜市街的路上，被停在路旁的汽车上跳下来的六七个拿着手枪的汪伪特务绑上汽车的。出事后，顾文达（顾七）同张椿宝、潘三省、唐生明（唐生智之弟）都到吴世宝处为我说情，于是吴当晚就用汽车送我回家。

在这事情发生一个多月之后，有顾七和张椿宝二人来我家，对我说吴世宝在极司匪尔路新建住宅，在某日办进宅酒请客，要我也去参加。我对他们说，我要向人请示一下再说。我请示以后，都说要送一份厚礼才行。后由这些人给我钱，买了一些字画，先叫人送去，在别无办法之中，大着胆子去参加吴世宝新屋落成的酒筵。那晚到的人很多，大都是日本人、中国人中有闻兰亭、袁履登、林康候（当时称上海三大闻人）、唐生明、张椿宝、纪增寿、耿嘉基、潘三省、顾文达、卢文英等，我心里害怕，吃完饭赶紧向吴世宝道谢而别。

过了几个月，吴世宝叫顾文达来通知我，日本人在注意我，要我离开上海，避避风头。我立即买了“日本皇后”邮船船票，动身去香港。船到香港，杜宅的茶房阿陶和杜的门生邵子英两人乘小轮上大船来接我，我问他们怎么知道我来香港的，他们说杜老板到重庆去了，是杜打电报来通知我们来接你的，还通知杜维藩

准备筵席为你洗尘。当天晚上，章士钊的姨太太殷德珍和杜的四太太姚玉兰也参加了宴会，饭后我住在邵子英的房间里。

过了3天，杜月笙从重庆回来，一见面就对我表示十分热情，我致谢他专电通知人来码头接我。杜说，你在上海辛苦了，这是应该的。随即问我有人拿了他的介绍信到上海找我托办的事情办得怎样？我说都照你信上的指示办了，来人很满意。杜听了很高兴。第二天，杜又找我谈话，给我港币零用钱5000元，接着，向我谈到杨渔笙，他说，杨渔笙没有良心，发了财就怕死，他在上海当面答允我托办的事情，我一离开就避而不办，使各方面受到不利，他还有脸到香港来看我，我一见他就生气，我用了这样一个人，真是后悔极了。说到这里，他又把话题转到我身上，说："你这次来港，住上1个星期到10天就回去，现在上海万墨林已被捉去，出面办事的人没有了，上海各方面的人都不方便，对抗日工作是不利的，你听我的话，还是回去！"这时有客来了，我还没有表态，谈话就停止。当晚，他通知一些要好的朋友和门生，要他们分别请我吃饭，于是几乎每天晚上总有人陪我上馆子，给了我很大的面子。

我住了20多天，见杜的脸色不大高兴，就决定再住几天回上海。过了5星期，杜又召我谈话，我一见到他就先说，不管上海怎样危险，我决定回去，他就很高兴地说："那好呀，你早点回去，我就放心了！"过了几天，我向杜告辞，杜已叫阿陶买好了特等房间的船票。临行前一夜，杜备一桌酒席为我饯行，作陪的有张翼枢、章士钊、郭兰孙、陆京士、朱学范、杜维藩、顾嘉棠、邵子英等人，杜亲自给我倒了杯酒说："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万事吉祥。"并嘱咐我要胆大心细，一切小心。就这样，我又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与往日一样办理一切事务，许多朋友都来看望我。有一天晚上，王先青、朱文德来看我，悄悄告诉我说万墨林改押在四马路巡捕房，他二人已通过刘绍奎、陆大公、刘俊卿等人，计

划在今夜越狱出来，要我不要住在家里，以免受到牵累。可是第二天一早，王先青一个人来寻我，告诉我越狱的计划没有实现。因万墨林不能从大门出来，要从四层楼上吊出来，如果下面有人看到开了枪，危险性就很大，所以停止进行。王走时，也叫我处处小心。我到四马路总局，通过刘绍奎看了万墨林。过了几天，万墨林又被押到日本宪兵队，这是徐采丞与金鼎勋以及日寇坂田大将谈判的结果，不久，万墨林就从日本宪兵总队释放出来。我看了这情况心里很高兴，紧张的情绪比较放松。可是不到3个月，我突然被日本宪兵总队捉去，说我是抗日分子。拷问了十几天，经徐采丞设法营救获释，住进南洋医院疗养，蒋伯诚在当夜就派代表来慰问，后来有几次半夜里有几个青年拿着鲜花来慰问，我既不认识，也不知他们是什么人，但他们知道我的姓名。过了几天，杜月笙从香港派他的门人老俞送来慰问信，对我说："老夫子非常感动，特地派我代表慰问，希望早日康复。老夫子还希望您对上海的事情仍要小心坚持下去。"我默默点头，大约过了3个月，我又被贝当路（今衡山路）宪兵队捉去。这次是高桥开鱼行的丁如松领着日本人来捉我的。事情的原因是万墨林主持一个秘密电台，由朱文德出面装置在高桥丁如松家中，被日军破获，要丁领捉朱文德，但朱早已隐蔽，无法捉到，丁如松受刑不住，只好领着日本宪兵来捉我。我被送进了贝当路宪兵队，第一次审问时我就告诉日本人，第一，我不知道朱文德现在住在哪里；第二，我为人如何，你们可以到北四川路宪兵总队去查问，他们都知道我。这一下还有用，此后不审不问，也没有受刑，关押了40多天，由我兄弟请了台湾人蔡庆其保释出来。

我向各有关方面说起这次被捕和保释的情况，有人指出，要好好请蔡吃顿饭，送点礼。我正准备进行，不料姓蔡的接二连三的请我在国际饭店、新雅饭店吃饭，宴席上的客人，全部是汉奸名人和日本驻在上海四区的宪兵队长等。我将此情况告诉各方面

的人与徐采丞，询问今后是否再和他们碰头，参加他们的酒宴，大家的意见认为我既要出头露面做工作，不能不敷衍这些人，只要政治上不出偏差，不泄露机密，可以小心谨慎地同他们打交道。

蔡庆其请我请吃了六七次饭，最后向我开口，说他准备做五十寿诞，在金城大戏院义演一天京剧，要我出面邀请在上海的名角、名票参加，并邀请几个上海的闻人做庆寿活动的发起人。我只好按照他的意图，邀请名角马连良、汪吟秋，名票张中原、孙兰亭、裘剑飞、张哲生、孙钧卿等，在南国酒家吃饭，请他们帮忙演出，并介绍蔡给这些人见面。幸而个个都答应参加。我又给他找了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张慰如（敌伪期间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总经理）、马祥生、谢葆生、顾竹轩等作为发起人，并帮他推销戏票，发“秋风帖子”。

事后，蔡庆其要担任皇后大戏院顾问，因为戏院经理张锦寿是蔡的干儿子。不久皇后戏院改组，蔡要我参加股份，我鉴于这个戏院的几个股份老板都是汉奸，必须慎重考虑，即和蒋伯诚、吴开先、徐采丞等商量。后来徐采丞通知我，允许我参加股份，钱由徐采丞交我，就这样我参加了皇后大戏院，出任总经理，直至解放为止。

（五）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杜月笙从重庆经浙西返回上海，我和万墨林等到车站去接他。他一看到我，就叫去问从前亏欠的债务怎样了？我告诉他，由于股票升值，币制改革等原因，500多万债务已全部还清，他当即露出笑容，表示高兴，拖住我一起坐他的小汽车回杜宅。

杜月笙自重庆回来后，有很大的改变，过去随意挥霍，银钱一手来一手去，毫不吝惜，现在告诉我要紧缩开支，家里雇佣的

人员也减少了一些。如秘书邱访陌，因跟陈群做过汪伪上海市所得税局局长，杜就不再聘用；秘书王幼棠年老病死；秘书翁佐青自己找了通商银行秘书的职务，辞去杜宅工作；另如万墨林、朱文德都有自己的事业，不常到杜宅来；烧烟的郁永馥到证券交易所当了总稽查，只留下我帮助料理家务。

这时杜的子女都已长大，陈帼英提出要举办3个儿子杜维垣、杜维翰、杜维宁的婚礼，杜一口答允，要陈帼英同我商量办理。后来孙佩豪又提出要给她的2个儿子杜维屏、杜维新举行婚礼，也由我办理。再后是姚玉兰第二个女儿出嫁。6件婚事之后，又有杜氏本人的六十寿庆。

6次婚事都在丽都花园举行，为了节约，只有茶点招待，但每次来宾都是5000余人，花费还很大，其中有几个送的礼品价值昂贵，如中汇银行经理徐懋棠每次送金盾一只，重约20余两；门生黄振东每次送金盾一只，重10余两；华商电气公司经理孙志飞、荣丰纱厂经理章荣初，每次送黄金10两。杜的女儿出嫁时，他们4人合送“台面”一副，计有筷子、酒杯、杯垫、汤匙、酱碟等，全部用黄金铸成。后来杜本人六十寿辰时，这4人又合送黄金制成的福、禄、寿三星，重约10余斤。这些都是当时比较突出的情况。

庆祝杜氏六十寿辰，是农历七月十五日在丽都花园举行的，来宾6000余人。由于杜要求节约，每席仅用6个素冷盘和一大锅光面招待来宾，饮料可口可乐，由生产的工厂奉送，啤酒是中国啤酒厂和上海啤酒厂奉送。那天除了汽车多、客人多之外，来要饭的乞丐也有几千人。

几天以后，又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举行义演三天，全部收入捐赠慈善机关，开支由杜负责。所邀请的南北京剧名角全部尽义务，由杜赠送金笔和金表各一，作为纪念。

这时孟小冬已从北京来沪，住在杜家，也参加演出。演出前

几天，孟小冬要我联系请人送花篮，我答允了。当时杜月笙在旁说，花篮折价，每只50元，将来捐赠慈善机关。我提议每收到一只花篮的折价，就在中国大戏院门外墙上贴一张红纸喜报，写明是谁送的，送给谁的，杜和孟都同意。到演出那天，送花篮的，大都送10只（500元），只有证券交易所和杜的门生黄振东各送花篮200只（1万元）。墙上的红纸都写着孟令辉小姐登台谢喜，×××敬贺，贴满了中国大戏院门外的墙头，共计花篮2500余只，折款12.5万余元。

1948年，杜月笙遇到了一件痛心的事，就是他的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拘捕。当《中央日报》刊登着杜维屏戴着手铐的照片放到他面前时，他感到这个面子失得太严重，万分难受。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代客买卖证券，同时是上海大东书局的副总经理，蒋经国用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罪名把他扣押，这种罪名的处理可大可小，可以被枪毙，也可以押几天就释放。当时杜月笙立即打电话给钱新之、章士钊、徐寄庼、陆京士等，邀请他们来杜宅，杜与他们商谈很久。第二天杜又邀请黄炎培、盛丕华、刘鸿生、徐采丞前来商量，谈了整个上午。我在外面听到他们谈论蒋经国本来还要拘捕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因为孔令侃与杜月笙合办扬子公司，也算是投机倒把的罪行，后来是孔的母亲宋蔼龄与姨妈宋美龄一齐向蒋经国打招呼，才没有下手。但市面上已有谣言，说杜月笙也被扣押。

这几天杜月笙与这许多客人商量出什么办法来营救杜维屏，我不清楚。仅知几天以后，全市就发生了抢购风潮，凡属官价出售的东西，不论穿的用的吃的，从黄金到粮食都抢购一空，黑市物价一日三变，仍然不受限价的约束，于是金圆券的价值直线下降，蒋家政权的威信扫地。不久，蒋经国悄悄离开上海，杜维屏就被释放。当时市面上传言，这抢购风潮就是杜月笙和与他有关的各方面合谋搞起来的，真相如何，我不清楚。

我虽在杜家几十年，有许多事情确实至今仍不明白。如杜回上海后，就卖去杜美路的住宅，此时杜在上海的500万债务都已了清，银行里还有存款，并不急于要钱用，为什么要卖掉房子？而且卖了以后又租借"十八层楼"（茂名公寓）七楼的几个房间，作为自己和孟小冬、姚玉兰的住处，租费昂贵，这是使人很难理解的。

又如胜利后的杜家的来客中，有一个我们不知其姓名的人，他常晚上来探望杜月笙，来时不报姓名，自称是龙寿寺的当家，但这位当家有时穿中装，花呢长袍，有时西装革履，看不出有一点出家人的样子。他每次来，杜都接见他，谈话时间也较长。后来我了解到这龙寿寺在南京电影院（现在的上海音乐厅）对面，是抗日战争后建立的，附近居民说这个庙的和尚不规矩，晚上常穿着西服外出，有时晚上还有妇女进出。解放后，这座庙宇立即被封闭，这庙与和尚是干什么的，与杜有什么关系？我一直未弄清楚。

又如杜在重庆新收一个姓周的门生（当时用的名字记不清了），到上海后由杜介绍给周祥生，在祥生汽车公司工作。平日周祥生来，杜常不接见。但这位姓周的来，立即接见，并通知我和茶房徐涛生，只要周来，就让他进去，不要阻挡。这件事，我们都觉得奇怪，直到解放后才弄清楚。解放初，我在南京路中百一店门口，看到这位姓周的正坐着汽车转弯由西藏路向北，他也看到了我，于是在西藏路边停住，下车来同我握手叙谈，感谢我过去对他的照顾，并说他的原名叫周恩墅①，是周总理的堂弟。

自从限价事件以后，杜住在十八层楼，深居简出，接见客人减少。在上海解放前两个多月，蒋介石来电话，要他去复兴岛谈话，回来后，他就做了离开上海的布置，要我留在上海，秘书胡

① 周恩墅，曾用名翁园，解放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83年去世。

叙五跟他去香港。我不肯照办，向杜申说，我主持了他家6件婚事和他的六十寿辰，认识我的人很多，再加上我在国民党机构担任过一些挂名差使，留下来有很大顾虑。而胡叙五恰相反，他因有大小老婆，家庭牵累很重，不愿去香港。杜见我们对他的安排有抵触，很不高兴，立即叫茶房徐涛生打电话把徐采丞叫来，要徐劝导我们。徐对我们说："你们的去留问题，杜先生早就有所决定，你们不要再纠缠，纠缠也没有用。"并当场拿出一笔安家费给胡叙五。这时我们二人不好再有异议。徐采丞向杜回报以后，杜就叫了我们去，笑容满面地说："你们能听我的话，这就很好，我很满意。"他拿出一根大条（黄金10两）交给胡叙五，并说："你拿去，把家里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你走吧！"胡即告辞而去。杜又对我说："你听我的话，我心就定了。我现在对你直说，因为蒋介石叫我去谈了话，我不得不走，到香港去住一段时间，就要回上海来的。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向我谈到，解放后要我参加新政协，所以你在上海不会有什么问题。徐先生也不去香港，仍在上海，你遇到困难的事情，可以和他商量。"

谈了一会，徐采丞也走了，只留下我和他二人，他又对我说："解放军进上海，队伍是正规的，不会出乱子，解放后你还可以见到不少熟人。"说着他给了我3封信，并说"出什么事情，可以找这3个人。"我看信封上写的是廖承志、盛丕华和潘汉年。解放后，我看到报纸上上海正副市长名单中有潘汉年，就去市政府求见潘副市长，潘接见了我，我把信都交给了他。

在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的时候，一天晚上，杜在十八层楼召我谈话，吩咐说，明天晚上要宴请客人，为了清静一些，明天下午除了邀请的客人之外，其余来客一律不见，下午3时以后，家里的门卫、侍卫、茶房一律都回家去。要我在第二天早上亲自去十六铺德兴馆买几只冷盘，下午在新雅酒店买炒菜，家里的厨师在上午烧好一只鸡、鸭、火腿、蹄子的大沙锅，下午就叫他回去。

客来后，由姚太太热好菜，要我送进去。

第二天，我都照杜的吩咐办理。下午5时前，徐采丞来了，杜要他在底层大门迎接客人，叫我在705室门内等候。5时半，陆续来了钱新之、章士钊、黄炎培，还有一长须白头老人，由徐采丞扶持着进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客人（解放后在报上看到照片，才知是中央人民政府张澜副主席），后又来了盛丕华、沙千里和史良。客到齐后，一共9人进餐室关门吃饭，热好的菜由我送到门前，徐采丞开门接进去。里面谈些什么，我一点也听不到。到9时才散席，杜亲自扶着长须老人至底层上汽车。这是杜宅最奇怪的一次宴会，隔了不久，杜就离开上海，又不久上海就解放了。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所知道的杜月笙

郁咏馥

我原在上海城厢长生桥水果行当伙计，平时卖水果，秋天卖糖炒栗子。1922 年前后，曾赴香港做水果生意，1925 年赶上省港大罢工，在香港的生活很苦，就又回到上海。

我 38 岁那一年（1927 年），杜月笙的帐房先生来找我，说杜听说我烧鸦片、装鸦片很有功夫，想找我去杜家给杜装烟，我答应了。从此，我天天清晨去杜家，直到深夜才回家。因为杜睡得很迟，我一定要侍候到他吸了最后一口烟后，才能离开。

我进杜家时，杜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住宅造好还不到两年，听说这块地皮原是黄金荣的，黄送给杜和张啸林，杜、张就每人造了一宅住所。前面看来，两家各有大门，可是里面是打通的。

杜家这座住宅的二楼、三楼，住着杜的大小老婆和子女，底层有一大间“大菜间”，是他会客办公的地方，陈设很考究，冬天有水汀，夏天放冷气。在大菜间后面，有一间不大的房，名为帐房，实际是杜抽鸦片的地方，只有极熟的朋友和徒弟们才能进去，平常，只有杜月笙、万墨林和我 3 个在里面，杜和我是对榻横陈，万则守坐在榻旁的一张小桌子前，专门为杜打电话、听电话。万干了这个工作多年，凡与杜有关的电话号码他多记熟了，只要杜一声吩咐，他就拿起电话来拨，所以大家叫他“活电话簿”。每天早晨，杜从楼上下来到这间房里抽烟，就有人预先把当天有几处

开会，几处有应酬开了一张单子放在鸦片烟盘里，杜看了，一面吸烟，一面就吩咐万墨林，哪几处送什么礼去，哪几处打电话去招呼，万就立即遵办。

我这样在杜公馆当了10年多差。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不久，杜避居香港，我没有跟去，留在上海，一直与万墨林、黄国栋（杜的帐房）联系，从他们那里领取生活费。抗战胜利后，杜回到上海，先住在北京西路顾嘉棠的家里，后来又住在十八层楼705号（杜的家属仍住在华格臬路，他自己和姚玉兰、孟小冬住十八层楼公寓），又把我找去烧烟装烟，直到1949年初，杜从上海去香港为止。他的走是匆促决定的，曾通知我跟他去，我接到通知，赶到码头，船的扶梯已抽去，没法上船，从此结束了和杜的关系。

（一）杜月笙的出身

关于杜月笙年轻时代的经历，我是在杜公馆听他的朋友和徒子徒孙们谈起的。

杜是浦东高桥人，1888年生，从小就死去父母，由他姐姐抚养长大。他小时候就爱赌博，往往偷姐夫的钱去赌，姐夫发觉后，和他姐姐吵闹。后来，他姐姐看到他们郎舅俩实在不能相容，就托人给杜荐生意。他到上海进水果行当学徒时，他姐姐曾给他做了一些新的衣服，哪知他在中途就和人赌博，到上海时，衣服已输给别人了。

有人说杜从小由他娘舅抚养，那是不确的，他的确有一个娘舅，姓朱，是做泥水匠的。杜曾向娘舅借钱，结果被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所以杜得意后，娘舅上门来总不加理睬，直到1925年修建华格臬住宅时，听说还是他的大老婆“老四”对他说：“这回，你照顾照顾娘舅吧”，这才叫他的娘舅来做土木监工。后来，他还

提携了他的表弟，在杜门中很有一点势力的朱文德，就是他娘舅的儿子。

杜到上海，在南市大码头张恒大水果地货行学生意；3年满师后，升做“当秤”，因为他经常赌钱，又和流氓混在一起，无所不为，被老板歇了生意。他回到家乡，无以为生，曾在高桥镇贩卖油条大饼，结果也糊不了口，又回到上海。张恒大水果行的帐房黄文祥看他可怜，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当烂水果批给他。同时，他又和里咸瓜街钱庄会馆一带（当时叫协兴街）的流氓白相人杭州阿发等结伙，时常在十六铺一带徘徊，看到有水果船开来，就潜登上去，半偷半抢拿了一些水果，一起在大街和茶楼、烟馆、赌场叫卖。因此在流氓群，以“水果月生”出名（他早年叫月生，月笙是后来改的）。

因为他和黄文祥有这段关系，后来住进华格臬路住宅后，黄文祥变成他的座上客，一直到抗战时黄才死去。黄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黄国栋，杜把他派在华格臬公馆里当帐房（原来的帐房是焦文彬，焦死后是一个宁波人姓杨的，杨是杜的老伙计，在杜开设中汇银行后，调充该行襄理，帐房由黄继任）。抗战时杜去香港、重庆，黄一直留在上海和万墨林一起经营杜的财产帐目，解放前杜去香港，黄也留下来没有走。黄文祥的第二个儿子叫黄国梁，由杜派在中汇银行工作。

在“水果月生”时代，杜不仅伙同杭州阿发等偷抢水果，还叫他们一起摆赌摊、开花会，还时常到招商局金利源码头的煤炭栈房聚赌。据当时和杜一起的流氓后来告诉我，有一次，是杜的30岁生日，他们同伙弟兄每人出了一块钱，准备晚上聚餐庆祝，不料一个下午，杜就把人家送的份子全部输光。杜的好赌，当时在同伙中是出名的。

在那段时间里，杜拜了清帮头子陈世昌为老头子。那时小东门一带，到处是烟馆、赌台和各种哄骗敲诈老百姓的地摊，陈世

昌就是在那里发迹的。他初以套签子为生，手拿3根竹签，骗人把制钱套他的签子，套着了下面有红线的一根，就可以得一只水果或一包香烟之类的东西，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后来陈成为小东门一带清帮的头子，他是通字辈，杜是悟字辈。杜在法租界当了大流氓后，陈就靠这个徒弟过活。他住在原八仙桥附近的福昌里，不时到杜公馆来串门，大家叫他老太爷。每逢过春节，他总在恒社开赌3天，招集杜门中的徒子徒孙赌钱，3天中可以抽几万元的头钱，大部分归陈世昌拿去。

在杜30岁的那年，他从南市转到了旧法租界郑家木桥一带，替赌场“抱台脚”（保镖），充打手，不久结识了黄金荣，那时黄金荣依靠法租界巡捕房的力量，已成为法租界有名的流氓头子。杜先给黄做跟班，拎皮包，为人乖巧，深得黄的老婆阿桂姐的欢心。据说，那时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等私下集资开了一个公司，主要是包运和贩卖鸦片。杜月笙打听到这消息，告诉阿桂姐，由黄出面，一定要参加一股，结果，不上两年，黄就分得了200多万元。阿桂姐叫黄酬给杜5万元，这就成了杜起家的本钱，以这笔钱和人合开赌场和烟馆。后来，原在法租界包销鸦片的范回春改行不干了，黄推举杜去接手，从此以后，杜的场面越来越大。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到达上海，他更和国民党勾结，爬上了政治、经济的舞台，成为上海的“闻人”，声势超过了黄金荣。

（二）杜的生活和家庭

杜月笙在南市时，有个老婆，早死。后来跟黄金荣时，阿桂姐给他介绍了一个，一般称为“老四”的，算是他的大老婆。后来，杜听说老四与其表弟有暧昧行为，便让金廷荪找人打断了表弟的双腿，把老四的司机两眼搞瞎，把老四幽禁在一间小屋里，与外界隔离。直至几年后，老四的领子维藩娶亲，才把老四放出。以

后，杜又娶了妓女出身的陈某为妾，一般称为“老五”，她们都住在华格臬路。另外，杜又娶了姚玉兰做第四房老婆。姚玉兰原是唱毛儿戏的。她的假母小兰英，是有名的坤伶须生，玉兰以外，她还有一个假女叫玉英，她们在共舞台登台被杜看中，杜原想娶玉英，玉英病死了，才娶了玉兰。小兰英在玉兰跟杜以后，就出家当了尼姑。姚玉兰不住在华格臬路，由杜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租了两幢房子作为小公馆，以后杜两度去香港，姚都跟他在一起。

杜月笙共有 8 子 2 女，解放后留在上海的是维藩、维仁。一个女儿嫁给了金阿三（即金廷荪）的第四个儿子。杜对妻妾“当夕”日子，先期做好安排，多年以来相安无事。他的儿女平时对老子带着三分畏惧，不常在一起。究竟老子在干些什么，他们不明白，记得有一次，他们曾问过我关于杜月笙的某件事。我说：“这件事你们去问你们的妈就是了，怎么你们爸爸的事倒问起我来呢？”

孟小冬在大世界唱过戏，后来成了有名的须生。她在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投靠姚玉兰，呼姚为“阿姊”，同住在长乐路十八层楼，和杜发生了关系，直至解放前夕，杜去香港，才宣布和孟结婚。

杜自当了“上海闻人”以后，在家总穿着长衫或长袍，一副斯文样子。他的徒子徒孙中，一向穿惯短装、翘惯大拇指的，进了杜公馆，也要披上件长衫，否则被杜见了要挨骂的。

杜在开中汇银行以前，每天起身很迟，烟瘾也很大。他的烟榻旁，挂了 10 杆各式各样的烟枪，我总是很早赶到那里，打好烟泡，把 10 杆枪都装好了，杜一下楼，进了这间房就吞云吐雾起来。中汇银行开设后，他在社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天总在上午 9 时前起身，鸦片也不多抽了。起身后，吃一杯鸡汤，两片面包，吸上两三筒烟，就出门去。有一个时间，他说要戒烟，常在他那里

的医生庞京周对他大事宣传蛋黄素可以戒烟，他听了庞的话，从此少吸烟而服用代用品。抗战胜利后重回上海，他的烟瘾又逐渐大起来，因为他的气喘病越来越厉害，越发离不开鸦片烟。

他酒喝得不多，赌是喜欢的，但他自以为有了身份，不再和徒子徒孙们一起赌，也不到公开的赌场里赌。在福煦路181号大赌场开设的时候，他在里面另辟一个秘密房间，供他自己和几个有身价的大亨们在里面赌。181号停闭后，他又在外面另辟秘密赌博的地方，具体地点我不清楚。至于在华格臬路公馆，他只偶尔在过年过节时找些朋友又麻将。平时他是不在家赌的，也不许别人在他家里赌钱。

杜很少在家里请客，平时吃饭，他的老婆儿女在楼上吃，他和万墨林、我3个人在帐房里一桌吃。有时，他极熟的门客如张翼枢（骥先）等以及伙伴、门徒如顾嘉棠、叶焯山等恰在吃饭时刻到帐房里来和他谈什么事，也就临时添点酒菜在一起吃。

杜平时不喝酒，我是每顿要吃一大杯老酒的，总是他们先吃饭，我慢慢自酌自饮。张翼枢等在座饮酒时，杜也陪饮一两杯葡萄酒。除我们这一桌外，楼下还要开6桌饭，是司机、保镖、当差、女仆们吃的。他自己有2辆汽车，每一个老婆各有一辆，另外，还有一辆是公馆里有事一般乘坐的，所以，司机就有六七个人。他用了8个保镖，2个守大门，2个在屋里守卫，其余4个，分两班跟着他的汽车保护。我初到华格臬路时，杜尚没有保镖，只有一个长条子面孔的壮汉随侍左右。开了银行后，大家劝他弄几个保镖。杜起初认为不需要，经不起人家一再怂恿，并有一个当公事的营长，率先倡导，荐了一个保镖来，只得接受。从此他进进出出，有人簇拥，声势顿壮。

杜月笙在上海，除华格臬路的那幢住宅以外，在原杜美路（今东湖路）亨利路（今新乐路）口，还有一幢高大开阔的洋房，那是金廷荪给他造的。杜和国民党政府勾结，包销江浙等6省的

"航空奖券"，设立了大运公司，派金廷荪任总经理，刮了很大一笔钱，金就在大运公司所赚的钱里，提出45万美金在杜美路造了这幢房子送给杜。可是，这房子造好不久，抗战爆发，杜旋即去了香港，这房子他一天也没有住过。抗战胜利后，他把这房子卖给了外国人，得到60万美金（一说80万美金）。

除此之外，杜在杭州和莫干山都有房子，抗战期间，这两处房子的家具等等都散失了。胜利后，他又从上海运去大批贵重家具，我亲眼看到运往杭州去的有好几张席梦思床，所有夏天用的沙发套子，都是用台湾席做的。这两处别墅，他主要是用来接待国民党要人和各省军阀政客的，经常要有中西厨司和侍役等多人看守伺候。

（三）杜月笙的穷奢极侈

杜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可以举两件事来说明：

一是他在高桥所造的"杜氏宗祠"举行"落成典礼"。这件事，1931年曾轰动全国，上海各报在那几天都有详细记载。单就我亲自接触到的情况来讲，就够惊人的。"落成典礼"的前几天，杜就关照我多预备些鸦片烟，我就预先熬了5000两土，并从各赌场里调来了28人专门帮我熬烟打泡。到了杜祠以后，我调10个人专门侍候来参加堂会的名角们抽烟，另外十几个人，则侍候一般的所谓贵宾。至于杜的徒子徒孙中的"老枪"们，则给他们膏子、泡子自己去烧，不用我们侍候。就这样，我们十几人还是忙得不可开交。这3天中，我忙得来不及吃一顿饭，也没有去看一出戏。结果，5000两鸦片膏第二天就抽光了，又赶熬3000两，这才勉强应付过去。

那3天中，每天要开七八百桌酒席，调去的厨子有几十人，杜还调了对此道有经验的徒子徒孙40多人专司筵席安排等事。帐房

用了14个人，都是从中汇、通商等和杜有关的银行里临时调用的。

杜为了引诱高桥一带的农民来参加这个“典礼”，特地预备了大批的面盆、毛巾等等。凡来送礼的，不论送多少，一律发给一个纪念章，凭此在3天内可以随便吃酒席、看戏，要吸鸦片的也可以供应，另外，每人还发一个面盆，一条毛巾，几瓶痧药和一个灯笼，上面都印有“杜祠落成典礼”字样。这样，招引了不少农民去送礼参加。

杜自己有2艘船艇，一名“月宝”，一名“波涛”，在那几天，除这2艘外，还自招商局和其他轮船公司调来了好多艘轮船，专门载运贺客来回于上海、高桥之间。南市有一个流氓绅士叫毛子坚，特地向城隍庙借来5顶专供城隍乘坐的金顶大轿，把杜的祖宗牌位抬送高桥。

另一件事是杜在春节发压岁钱。据我所知，每年到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银行的帐房田洪元就给他预备“红包”2000个，每个2块钱，这是给一般司机、侍役和巡捕等等的，另外，还预备好200个金“四开”（金币），是给朋友、徒弟们带同前来拜年的小孩们的；还打了50个金洋钿，这是专给干儿子、干孙子们的。除夕之夜，杜洗好澡，一切准备齐全了，第二天早晨起，就门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恭作揖的。大概坐汽车来的，每一汽车连保镖要打发三四个“红包”。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禧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每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还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成群来拜年，也是每人给一个“红包”，大概不到年初三，2000个“红包”就发完了，总还要叫用洪元补送800个来，才能应付得了。

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处总是先到钧培里黄金荣处，第二处是到他的老头子陈世昌处，其他地方只投一个拜年名片。

粗粗一算，他过年的压岁钱每年就要花几万元。一年总共要花多少，可能他的帐房黄国栋清楚一些。我和万墨林也约略计算过，大概除掉他大笔酬应，向各省军阀等送礼不算，单单他公馆的开支，每年就不会少于200万元。

（四）他的钱从哪里来

杜月笙这样乱花钱，他的钱从哪里来的？据我所知，第一是做鸦片生意。他在追随黄金荣的时代，就做了包销包运鸦片的生意，开了土行。后来，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合开了“三鑫公司”（上海垄断性的大土行），包销包运从国外和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来的鸦片和其他毒品。他省军阀运来上海销售的毒品，获利很大，三鑫公司分到很多的钱，他们有的是三七拆，有的是四六拆。比如热河的汤玉麟，每年就有价值好几百万元的烟土运来上海，都是由杜月笙代为销售。总的说来，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总有几千万元。这些钱，是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朋分的。大三股就是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中六股是顾嘉棠、金廷荪、叶焯山、芮庆荣等，小八股是杜、黄的几个大徒弟。除此之外，当然要分一大部分给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国人，分一部分给上海的官员们。余下的，还要打发他们的“蟹脚”徒子徒孙以及在帮的新闻记者等等。

其次是从开赌场来的钱。上海法租界有一个时期到处是赌场，先是在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中吉里，以后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这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赌场，由杜门的大将顾嘉棠“抱台脚”，江肇铭等充当管事。这个赌场，我去过好几次，到里面去，吃的是西餐、中菜、点心，应有尽有，都不用花钱，还免费供应香烟、鸦片、水果、中西名酒。坐汽车去的，还给司机5元钱，每辆汽车免费加5加仑汽油。这些都是“钓饵”，让你舒舒服

服去送钱。这里面赌的花样主要是轮盘、摊番和牌九，输赢很大，里面有现成的当铺，现钱输光了，可以当场把金饰、手表等典押，接着是从里面的衣服起一层层脱下来拿去押。我在那里，看到不少人是输得精光走掉的。赢了钱要走，可不那么容易，不赌钱去白吃当然也不行。里面都是些红眉毛绿眼睛的人在盯着你。我是例外，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杜公馆的人，是去揩揩油的。

再其次是包揽诉讼、绑票勒索，这方面，我所知甚少，但肯定杜从这方面捞到的钱是很多的。

后来，他又成为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又自己开了中汇银行，这家银行的资本，主要就是从烟土上捞进的钱。还逐步向轮船航运业、面粉业、纱厂等方面伸展他的势力，成为工商界、金融界的"巨头"之一，收入就更多了。据我所知，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企业、工厂、单位的董事长、理事长名义的，就有56个，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等，更不计其数。一个董事长，平均至少要得1000元薪津或车马费之类，还有其他股的红利等等收入，算算这笔帐，他每月就要收进一二十万元。

他有时也做做"好事"。比如，夏天免费施送些"施德之痧药水"，还通过慈善团体施舍棺木。另外，他还在家门口给一些向他求告的人一点施舍，凡来求告的，都要经万墨林和我调查盘问属实，然后发给一个卡，凭卡可以到他指定的钱庄去拿几块钱，或者到菜市街协仁祥衣店去领一件棉袄裤或一条棉被。

杜月笙的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每次他要出去应酬。田洪元先把一叠庄票塞在他袋里。譬如他到沙房子华懋饭店吃饭，临走时就掏出几张庄票来分给侍役、电梯司机、看门巡丁等，一班卸任的官员临走时，总要到杜处辞行。杜一听到"某某局长看你"，就从抽屉里捡出庄票，袖着去会客，多则万元，少则三五千元，看来人的声望、地位与和他的情谊的厚薄而定，杜对来人婉转其辞，作为程仪致送。

杜月笙有几个据点，连同亲友徒弟，一个月的出帐的确不少。每年出帐，除了家用靠50几个董事长的薪津、车马费收入抵销外，加上其他各方面用途，达40多万元。杜在风头上时，徒弟月支50元到100元的不计其数。各路绅私营与公事上人，都要沾他的光。他个人除了烟、赌两大支出外，别方面的冤枉钱是不花的。他虽以银行家身份与大工商家搞在一起，但从来不买古董文物。除了别人孝敬他的古董，由帐房清客代为估价外，古董商人做不着他的生意。其实别人晓得他是外行，没有好货送他。

（五）他的朋友和门徒、门客

杜月笙和蒋介石的关系很密切，不必说了，他和国民党的其他所谓“党国要人”，也都有来往，其中孔祥熙和他的关系很深，我记得孔还亲自到华格臬路来过。他和宋子文也有来往，孙科等人因为在上海开银行、做买卖、玩女人，也非和杜来往得到杜的保护不可。国民党中和杜的关系最深的是戴笠，其次是杨虎、陈群，他们都是结拜弟兄。上海的党官中、吴开先和他关系最深，听说先是他的徒弟，后来退还门生帖改成为朋友，其余为潘公展等等，都和杜关系密切。各省军阀，也都和杜有勾结，大都是为了合伙做鸦片生意。

上海地方协会时期，史量才差不多每天到杜家，两人很谈得来。史遭暗杀，杜闻讯悲恸，伤心了好几天。黄炎培此时也常去杜处。

杜对张学良、于凤至夫妇来上海，待以上宾之礼。张那时沉湎毒品，面容滞黯，精神不振，杜慨然为之策划治疗，去其沉疴。所以张抵沪不久，就迁居福煦路181号，由专门医生为他净毒祛瘾。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慢慢地脱离苦海。事后杜对人说：“汉卿有决心。”

杜月笙在他的公馆中聘有7个秘书，洪宪六君子的魁首杨度就是其中之一。[①]他的鸦片瘾很大，来了总要躺在杜的烟铺上由我给他烧烟，每月由杜送给1000元。他不是每天来，杜有要事和他商量才请他来。其他历年充任过他秘书的人中，有一个是做过被暗杀的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的第三科长的无锡人，姓名我忘了。还有一个做过正始中学校长的姓陈的。郭兰馨也是他的秘书，是抗战前后进杜门的。

杜原来是个文盲，后来也在家学学写字，但写得很不象样。他和法租界公董局、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国人来往很密，主要靠张翼枢从中拉拢，此人一直做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凡是杜和法租界当局的往来，都由他经手，所以，他在杜公馆很吃得开。至于杜和法国人见面，则由在法大马路（今陵东路）开珠宝店的李应生（广东人）当翻译。

他的门客中，除以上这些人，还有一个"洪宪功臣"顾鳌，公馆中人都叫他顾师爷，他也不常到公馆来，每来总是大吸一顿鸦片，杜每月送他几百元。另外，章士钊也是为杜所尊敬的朋友，经常有来往。

陈世昌是杜的老头子，极少到华格臬路，就是去，也一到就走。胜利后，到过十八层楼几次。他的一个儿子曾在中汇银行当过襄理，后盘下一爿小钱庄，全部蚀光。陈世昌带了儿子，夜里赶到杜处，陈诉说经过情况，指着他儿子道："这个小鬼，在中汇做做本来很好，忽然心血来潮，做起那断命钱庄来，蚀得一搭精光。"接着向杜告贷2.5万元，杜毫不介意地说："明天一定如数送上。"哪里知道，陈的儿子荒唐不堪，5天后又把这笔钱如数搞光。于是再到杜处借2万元。从此断了这条路，陈不再上门，活活地被他儿子气死。这是胜利之后的事。

---

① 据庞京周讲，杨度、顾鳌都非杜的秘书，但被杜延为上宾。

杜的手下，大概可以分为两帮。一帮是老的，为顾嘉棠、叶焯山、金廷荪等，都不是他的徒弟，但可以称为他的下手，凡是烟赌、绑票、打架、暗杀等等，都是他们干的。除这些人外，还有芮庆荣、高鑫宝等，也是他的打手。高的儿子过继给杜作干儿子，和杜比较亲密。上海沦陷期间，杜有不少徒子徒孙当了汉奸，到胜利后，大部分他都通过戴笠的关系，为他们开脱汉奸罪名，只有少数人如谢葆生等，大概在沦陷期间没有和万墨林等联系好，胜利后就没有帮他们开脱。有一天，我和杜都在那间吸鸦片烟的帐房间内，杜正低着头在桌边学写字，谢葆生悄悄地走了进来，叫了声："杜先生"，下面的话还没有接上口，杜抬头看他一眼，冷冷地说"你现在发财了，来看我啥事体！"谢见苗头不对，就溜走了。敌伪期间，谢做过伪苏州警察局局长，很刮了些钱，在上海新闸路有房子，还开了新闸旅馆和卡德浴室、仙乐斯舞厅。杜的另一帮是门生，是他搞政治经济活动的爪牙，如陆京士等。抗战开始后，陆变成杜最得宠的徒弟，又是国民党的骨干和黄色工会头子。还有骆清华、唐纴之等，则是杜把力量伸向工商界的触角。

在上海的名流和闻人中，和杜来往最密的有钱新之和黄任之，史量才被暗杀前，也是杜的好友。虞洽卿有时也到华格臬路来，主要是向杜掉换庄票，就是把他的远期支票或空头支票向杜掉近期票以应急。王晓籁则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每月给他1600元。另外，王担任鱼市场总经理和江苏长途汽车公司经理，都是杜为了照顾这位老朋友老搭档而安排的。汉奸中的所谓"三老"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也都是杜的密友。

（六）杜的为人与嗜好

杜月笙自从开设银行后，出言吐语，温文尔雅，对人不亢不卑，竭力做出"高等华人"的样子。有人给他开玩笑，说他是从

“冷气间”里出来的。他已臻于炉火纯青，由此可见。

在我们讲起来，杜会做人不自发了财开始。在他浪荡于金利源码头阶段，逢到大家吃饭没钱，只要他身边有两角小洋，就会全数掏出来给你，说道：“你拿了去吃饭罢，有了钱来‘救’我！”他自己有时就这样挨一夜饿。黄金荣与杜月笙作风不同，黄眼光短，手面不大。任何一个徒弟，若能送他百把块钱用用，他心里就觉得舒服，对他另眼看待。

杜月笙平日不发病时脾气还好，对待左右，不打不骂，他与墨林和我三人，在没有外客时，大家海阔天空，乱拉乱扯。杜市面做得大，交友广阔，一天到晚，应酬极忙。有人说他烟铺上挂有一块水牌，开列着一天中该去应酬的人家。其实水牌是不挂的，每天由帐房间把接到的请柬帖子排一排队，按着主人的地位与情面大小，分别轻重先后，列成一表，给杜过目后，通知司机、保镖等人，照单行事。

我亲见杜会客时，先是侧耳倾听对方的话，等到人家讲完，才沉思一下，启口缓缓说上几句。妙在要言不繁，语中肯綮，叫听者动容。人有说他福至心灵，其实这是他做人的一种方法。杜本来胸无点墨，自从当了56家行厂董事长后，对自己的姓名“杜镛”两字，早夕勤练，居然写得笔笔着实。过了一时，签名签得多了，格外熟练，倒也有飞舞动人之势。

一般来说，杜的身体是结实的，平时很少打针吃药。每逢有病。请一位姓陈的医生按脉。抗战期间，杜在四川，有病总是请中医看。有一次他突患腹痛，大约是盲肠炎，请了一个50多岁的老中医诊治，这医生不用开刀，对症下药，一服而愈。从此他格外相信中医。杜住十八层楼时，孔祥熙有时来，见杜身子不爽，表示非常关心，说：“要什么药我处都有。”

杜月笙对跳舞兴趣不大，比不得虞洽卿、王晓籁、张啸林等人，乐此不疲。记得张啸林第一次进舞厅跳舞，池子里地板非常

滑，他身穿长袍，一不留心，摔了一跤，杜等见状大笑。杜常去的丽都花园，在那里请人家吃饭，应酬为多，若说跳舞，不是常有的事。

杜是票友，欢喜唱戏，尤喜唱演《黄鹤楼》中的赵云，《落马湖》里的黄天霸等角色。郑家木桥律和票房彩排时，他总要搭一脚，露露脸。逢到救济义演，有人去请他登台，他高兴时，也不推却。有一次，闸北的王彬彦为慈善义演请杜去帮忙，每票售至50元。一位老先生对我说："花50元钱看杜月笙唱戏，其实不贵。他唱的戏在内行看来，固然不大象样，但他行头漂亮，在台上那一副做工与唱腔，看了管叫你笑痛肚皮，真不止50元钱哩！"

杜死在香港，当时情况我不甚清楚。杜将死时，孟小冬为争取与杜的夫妇名位，要杜的儿女叫她"麦达姆"（英语"妈妈"）。杜一断气，谁都不肯把钱掏出来，终于去电美国，汇来30万美元。这样，每个未亡人分到5万美金。杜患的是中风，发病那天下午1时还与家人们谈话，至2点钟，突觉手脚麻木，张口不能言语，急召医生抢救，说是不中用了，聊尽人事，下了些药，到1951年8月16日去世。

我出入杜家20多年，长期和杜朝夕相对，我所了解的杜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些，有不少记得不周全，也可能有记错的，希望过去深知杜的先生们多加指正。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张啸林的一生

朱剑良　许维之

张啸林是上海帮会首领之一，与黄金荣、杜月笙同称“上海三大亨”。张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更名“寅”，以啸林为号。生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浙江省慈谿县人。父是木匠，早故，全家依靠母亲劳动度日，生活艰难。

1897年，张20岁，由于在乡下难以度日，举家移居杭州府拱宸桥。到杭州后，与兄张大林一起进杭州机房学织纺绸。但他游手好闲，不认真劳动，专同流氓地痞为伍。不久，弃工考入杭州武备学校，在校与同学张载阳等人结为密友，这就是他后来同军阀方面有勾搭的由来。以后，他又拜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探目）李休堂为“先生”，从此除充当李的跑腿外，就在拱宸桥一带以寻事打架、敲诈赌博为生。当时拱宸桥一带另有一个赌棍，诨名叫“西湖珍宝”，以张小林经常勾引他的赌徒为由，同张结下了仇恨。一次，“西湖珍宝”纠集手下的赌徒寻张小林打架，张因寡不敌众，在拱宸桥呆不下去，不得不与同伙躲到别处，靠制造、出卖点花牌九、灌铅骰子等赌具为生。

张小林不但在杭州城里赌博骗钱，还于每年春茧上市和秋季稻谷收获的时候，到杭嘉湖一带引诱农民赌博，骗取钱财。乡间的农民受张的骗，有的输得当空卖绝，有的输得投河上吊，因而民愤极大。清末宣统年间，杭嘉湖一带人民曾写状上告，但张小林凭他在衙门里的熟人为他通风报信，得以逍遥法外。

1912年，上海英租界的著名流氓季云卿去杭州邀请名角到上海演出时，与张小林相识，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张即随季到上海，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满庭芳一带吃赌台和妓院俸禄，又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大兴街一带设茶会，专干勾嫖、串赌、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等勾当。

张小林为了在上海站稳脚跟，发展流氓势力，拜了清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清帮"通"字辈成员。随后，他广收门徒，发展势力。由于身材魁梧，臂粗力大，凶狠毒辣，曾自比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他的门徒也捧他为"张大帅"。

当时，上海滩上的流氓各霸一方，相互争雄。一次，张小林为了夺取码头上贩运水果的权利，和广东帮流氓大打出手，混战一整天后，终于被张夺得贩运特权。后来，张又和南市流氓范开泰（诨名叫"乌木开泰"）、范回春（诨名叫"象牙回春"）、苏嘉寿等，为抢夺鸦片贩运权同法租界流氓金廷荪等发生殴斗。金廷荪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的得意门徒，而张小林和浙江省长张载阳、督军卢永祥有私交。当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原是卢永祥的部下，于是张小林和何丰林搭上关系。黄金荣、杜月笙为了利用张同军阀的关系，不想同张翻脸；张为了在法租界发展势力也不想同黄、杜弄僵，于是请出在上海的清帮"大"字辈出面调停，提出了所谓"黑心钱公平用"，各租界各帮共同合作，合伙贩运鸦片的约定。有一次，黄金荣因触犯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而遭监禁，张运用和军阀的关系伙同杜月笙出力营救，使黄获释，黄对此十分感激。从此黄、杜、张三人就结为把兄弟。

1920年，黄、张、杜三人正式合伙搞鸦片联运。张依靠何丰林的人马把鸦片从吴淞口运到十六铺，再由杜月笙派"小八股党"包运到法租界，在法租界内由黄金荣发"通行证"。这样，黄、杜、张3个流氓头子就成了上海赫赫有名的贩毒集团的首脑，大发贩毒财。三鑫公司就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给帮会头子，军

阀和租界当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1924年，黄金荣把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两亩地基，分赠给张、杜两家，造了两幢洋房，张住东宅，杜住西宅，两家共由一个大门进出，亲如一家。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准备公开叛变革命，指使上海的帮会头子盗用辛亥革命时的"共进会"的名义，组织"中华共进会"，把上海的清洪帮组织起来，充当反革命急先锋。张小林是这个组织的三大头目之一。4月12日，黄、张、杜指使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进攻，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事后，蒋介石为了酬谢他们，委任黄、张、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从此，张小林又和新军阀搭上了关系。黄、张、杜还和国民党的王柏龄、陈群、杨虎等拜为把兄弟，以为结纳。

1930年，张小林"荣归故乡"，一时轰动杭州城。当地土豪劣绅、反动政客、乡镇长和地痞流氓为他摆酒接风，无耻文人每吾生为张献名"寅"，号啸林（因张生肖属虎故名寅，啸林意即虎啸于深林之中，以显示威势）。此后，杭嘉湖一带的盗匪、歹徒、地痞、流氓纷纷投在张的门下。张在杭州西湖畔建造别墅，在湖滨路上开设天然饭店，并购买大量良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

1931年，张与杜月笙等在福熙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合开一家赌台，借以搜刮钱财。他们还将用非法手段得来的巨款投资于银行及工商企业，由流氓一变而为"实业家"。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孔祥熙、宋子文等也和他们有来往。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厂主、店东中有些人找他们作靠山，请他们挂名。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张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监事。张啸林的"五十大寿"、黄金荣的"黄家花园"和杜月笙的"杜氏家祠"落成，竟成了轰动当时上海滩头的盛典。

30年代后，杜月笙在上海的权势以及和政界的关系均超过了

黄、张，使张十分忌妒。1935年，蒋介石实行法币政策时，孔祥熙、宋子文事先对杜月笙透露消息，杜没有将消息告诉张，自己在交易所中兴风作浪，发了大财，张对此深为不满。又由于张为人齐衡，而杜善于慷他人之慨，因而张的门徒纷纷改换门庭，投拜到杜的门下，再加上1927年底张的儿子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张托杜引见蒋介石，但一直没有得到蒋的重用，张怪杜不肯帮忙。由于上述种种，张杜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常是面和心不和，张和蒋的关系也渐有疏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前夕，蒋介石指使杜月笙要黄金荣、张啸林和杜同去香港。当时黄以年老多病不问外事，决定不去香港。张认为杜月笙去香港，黄金荣不问外事，正是他依仗日本势力，独霸上海的好机会，所以决定留在上海。八·一三沪战开始，张正在莫干山避暑，日本特务机关立刻派人潜往莫干山跟他密谈。上海沦陷后，张即返沪，指使其门徒充当汉奸。

1939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张啸林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门徒为四乡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在军需物品的补给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张的生意越做越大，乘机大发其财。

1939年底，张啸林和日本特务机关暗中策划，准备建立浙江省伪政府，由张充当伪省长。国民党特务探听这一消息后，决定杀张。

1940年1月15日，张啸林的亲信、在"新亚和平促进会"中主持棉花资敌工作的俞叶封约张去更新舞台看戏，张因临时有事未去，结果俞在看戏时被人暗杀。张虽侥幸未遭暗算，但已吓得心惊肉跳。同年，有一次张乘车外出，汽车刚开到福煦路附近，突然红灯挡住了去路，只见一阵枪弹向张的座车射来。玻璃窗上连穿三洞，张的司机猛踩油门，闯过红灯，张啸林才免于死。

经过这两次事件，张从此闭门不出，并雇了20多名身有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住宅周围还有日本宪兵日夜守卫。后来国民党特务用重金收买了张的随身保镖林怀部。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乘张啸林和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三楼商量事情之际，故意在楼下与张的司机大声争吵，张从楼上窗口伸出头来责问，林拔出手枪击中他，结束了这个地痞流氓加汉奸的罪恶一生。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所知道的张啸林

俞云九

张寅字啸林，浙江杭州人，出生在杭州钱塘门外偏僻农村的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父母早亡，因是独生子，父母生前宠爱，事事依顺，故而自幼骄横跋扈。长大后，终日在外闲荡，所交者俱是浪荡子弟、游手好闲之徒，经常聚赌滋事，侮辱妇女，因警局有人为他们撑腰，所以任意横行。他们以三粒骰子做赌具，巧立青龙、白虎等名目，俗称“颠颠巧”，其实是诈骗钱财。杭州人替这班凶神恶煞起了个绰名叫“撩鬼儿”，这是杭州土语，意为没出息。

张啸林在杭州声名狼藉，便跟吴鸿到上海。吴鸿原是浙江省警务厅厅长夏超的旧部，当过杭州蒙古桥第二警署署长，在上海清帮中熟人很多。两人到上海后，由吴鸿奔走，遍访清帮中的关系，联络了一些中等流氓，并托人先后把张介绍到市区宝裕里“燕子窠”（低级烟馆）及沪西大赌台“荣生公司”等处，充当稽查（俗称“抱台脚”）。不久，张积了一点不义之财，就租赁重庆路马乐里一栋旧式石库门房屋，每天呼朋唤友，聚赌抽头，并将妻子娄氏接来同住。

民国初年，张啸林在上海邂逅其父生前友人唐观经。此人是黄金荣的徒弟，曾任杭州大世界游乐场经理。不久，经唐介绍，张啸林结识了投机药商黄楚九，由黄介绍，拜清帮大字辈樊瑾成为老头子。从此，他利用帮会势力，与人合伙贩卖烟土，同时广收

门徒，扩张势力。当时杜月笙已渐露头角，两人结为莫逆之交。后来在华格臬路（现宁海西路）各建住宅，楼上楼下辟暗室相通，专供张、杜两个密会时启用。张啸林发家后，野心勃勃，拉拢日本浪人土肥原，又由土肥原介绍，认识了日本军人永野修身，经常在华格臬路秘密出入。当时华格臬路张、杜住宅前，车马盈门，有捕房警探保护。

军阀混战时期，张啸林以“实业救国”为名，联络范回春、周邦俊、黄楚九等，共同组织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是个大赌场，地点在江湾，办事处设在法租界葛山路，聘请包兰文、洪纠督等负责日常业务。又在法租界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共舞台对面创设杭州饭庄菜馆。中苏恢复邦交后，张和杜月笙合作组织森记木行，与苏联驻华商务代办机构订立在远东独家经销俄国木材的合约。此时他早与东北日军勾结，并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苏联运来的全部枕木调到东北辽沈码头卸货，由森记木行业务主任赵南生派一心腹在东北坐庄，办理卸货与交接事务。森记木行设在爱多亚路97号，由张啸林任董事长，杜月笙为总经理，俞肇桐为常务监理，负责主持日常业务。后又在木行内组织了长城唱片公司，委派郑子褒全权负责，目的想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捧场。郑别号“梅花馆主”，擅长书法及散文。

张啸林有一妻三妾，同居华格臬路。发妻娄氏。妾张秀英，本青楼名妓，接交过许多军政要员，张利用她的关系，扩充势力。几个妻妾都未生育，四子二女都是自幼领养的。长子法尧与两个女儿都住在华格臬路，次子忠尧另住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其他两子行踪不明。张啸林企图在上海自立山头，除广收门徒外，还想利用法租界公董局和法捕房势力，因而将其长子法尧送往法国留学。数年后取得博士文凭，不料回国后默默无闻，挂牌开业也无人问津。杜月笙为照顾张的面子，将张法尧安插在中汇银行任

襄理，本系挂名，不数月辞职。

张啸林为让其子出头，拉拢顾维钧、褚民谊等，携带法尧赴南京，晋见蒋介石，希望进入政界。事前经顾等通关节，蒋已默许，在上海安排法尧一个局级地位，不料法尧在晋见时与蒋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故而做官的希望落空。

后来张啸林与杜月笙反目。杜月笙组织了一个“恒社”，张不肯示弱，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及“忍庐”等集团与杜对抗。

抗战前，西藏班禅活佛到上海参观访问，张啸林心血来潮，以上海佛教会名义，请班禅一行到他的寓所随喜。招待的场面奢华至极，从大门口开始直到百忍堂正厅，全部铺设黄色地毯，从华格臬路口起，排满他的爪牙及捕房中西探捕，列队欢迎。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张啸林经黄楚九、周邦俊介绍，勾结汉奸陈公博、周佛海、江亢虎等，经常在自己寓所设宴招待。后与土肥原密议，准备公开下水，不久即为林怀部刺杀。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上海三大亨的勾结和斗争

石　君

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号称旧上海帮会流氓中的“三大亨”。他们由于气味相投，相互勾结，又由于利害冲突，常有斗争。现就笔者所知，略述梗概。

一、开始合流

黄金荣幼年就在南市十六铺一带游荡，一批码头、烟花间的泼皮，以其勇于斗殴，多依附之。这些泼皮中，有杭州阿发、饭桶阿三、闹天宫徐福生、小工连生，以及虹镇的瞿龙龙，英租界的季云卿和马斯乾、杨顺铨等。黄曾经进城里一家裱画店学手艺，由于游荡惯了，不久就重回十六铺一带流浪。

十六铺和法租界毗连。法巡捕房感到这些泼皮经常在边界骚扰，影响租界秩序，便把黄金荣找去当巡捕。他进了捕房，穿起号衣，第一天回到十六铺，给一些泼皮瞥见，说他当了捕房的走狗，来管自家弟兄。他感到有些懊丧，次日，把号衣交还法捕房。捕头当场灵机一动，认为让他不穿号衣，同样也可以管束这班泼皮，于是就允许他不穿号衣，改充便衣探员（俗称“包打听”）。这样，黄金荣就开始在法租界巡捕房站稳脚跟，当上华籍探目。

黄金荣当了包打听，感到要有一个基地，作为泼皮弟兄聚会之所，于是在法租界大自鸣钟（今金陵东路黄浦区公安分局西

首）开设了一爿聚宝楼茶楼，后来又在隔壁弄内开起日新池浴室，并且在每天夜里把茶楼改为唱滩簧的书场。这时杜月笙经饭桶阿三介绍，当了黄的“蟹脚”（又称“三光”，即爪牙、跑腿之意）。这些都是清末的事。

张啸林在辛亥革命以后，才跟黄金荣“三光”。民国初年，上海的帮会曾经发生过一次内讧，季云卿离开上海，避风杭州。那时张啸林在杭嘉湖一带赶集聚赌，季云卿到了杭州，和他混在一起。风头一过，季回到上海，与黄金荣谈起了张啸林，说他在杭嘉湖有点名气，黄就答应把张找来做“三光”。这就开始了黄、杜、张三人合流。

二、黄金荣做了两租界的闻人

黄、杜、张合流之后，在法捕房总头目费沃利和大头目萨维尼默许之下，策动一些泼皮，在法租界摆赌场，贩烟土，坐地分赃。这时英租界出了一件越狱杀人案，一个名叫广东桂林的，因犯案被关在西牢，和一个叫福生的一同越狱。广东桂林一逃出来，就到虹镇去看摆赌台的翟龙龙。翟送给他100块钱。他拿了钱，去五龙池洗澡，先到德胜昌买衣服，裕兴隆买鞋子，宏茂昌买布袜，这几家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字号。这样一来，英租界暗探（又称“暗差”）看在眼里，发觉这人有些不伦不类，加以注意。这时英租界开始使用暗探，其中有些人原在西牢里坐过，或当过禁卒。他们看到广东桂林的面孔有些相熟，要把他抓进捕房。广东桂林开口要他们“照应”，暗探不许，广东桂林就拔出刀子，把一个暗探杀伤。英租界捕房觉得刚办暗探就出了这个岔了，会影响以后雇用爪牙，因此要求法捕房协助破案。

这个差使落在黄金荣身上，黄当即出动了些“三光”找寻线索。终于访得了同广东桂林一同越狱的福生，就想法把他找来，每

天给他 3 块钱，作为寻找广东桂林的代价。3 元钱一天，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重赏。不久，福生找到了广东桂林，这就为黄金荣立下了大功。此案凶手落网，使黄金荣不仅成为法捕房的宠儿，而且从此也受到英租界捕房重视，变成上海两租界的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法租界工作的一些法国人应征回国，鹰犬不足，法国领事把捕房人事作了调整，给了黄金荣一个督察长的头衔，黄的好友程子卿、金九龄等也分任了政治、刑警两处的督察，有关与中国官绅的往来，有时也派黄出面接触。如南市绅董毛子坚、上海交涉员许沅、警察厅司法科长刘春圃等，都成了黄家的特客。欧战结束，法帝国主义者还给了黄一枚勋章。

三、拳头开路，贩毒摆赌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把贩卖烟土作为主要手段之一，黄金荣当然要尝尝这块肥肉。当时在租界包贩烟土的是郭海珊、沈杏山等人，于是他和杜月笙、张啸林坐上汽车，到英租界大东旅馆郭海珊、沈杏山、谢葆生所开的公司房间，和郭等“讲斤头”（谈判交涉之意）。刚出电梯，正碰上沈杏山，沈一见黄就打招呼，黄却不由分说，猛的一拳，当场把沈打翻在地。郭海珊闻声出来，看到黄等摆足阵势，就说：“好！金荣老大，你回去！明天下午 2 点钟到日新池来看你！”黄金荣回说：“好，闲话一句！”第二天下午，郭海珊单枪匹马到了日新池，双方相见之下，拱手就坐。郭开口就说：“从今以后，我们二八开。”接着补充一句话：“英法两界都是二八开。”临走，郭又说：“此来无物可赠，就把汽车奉送，司机也跟过来侍候。”黄金荣随即道谢一声，就此作别。

从此，黄金荣有土有财，有财有势，便在龙门口购置住宅，并扩建了日新池（今大众戏院旧址），经营剧场共舞台。以后，郭海珊回苏北灌云原籍，烟土买卖归黄一人掌握。

接着，外国军舰运送烟土，越来越多。黄金荣得费沃利等庇护，正式组织公司，公开出售，并开设赌场。所得盈利，提出一部分给费沃利和法捕房其他头目，连驻沪法领事、法军舰官员，也成朋分对象。有时法国舰队司令来华，如招待麦兰将军等等费用，也从贩土进项中出账。当时法租界的东新桥、郑家木桥、八仙桥一带，顿成烟、赌、娼集中的闹市，和邻近英租界的烟赌场联成一片，数十年中，成为帝国主义在上海藏垢纳污的中心。这些烟赌场不断开设和扩大，其中最著名的赌场是西藏路升吉里及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

四、争权夺利，内外交讧

这个贩卖烟土的“三鑫公司”负责人，名义上是杜月笙、张啸林两人，实际上是由杜作主，后台老板是黄金荣，但最大的实际老板还是费沃利。杜月笙由此飞黄腾达，门下得力助手有顾嘉棠、金廷荪、马祥生、叶焯三以及季云卿的徒弟小阿荣等。这时候，杜月笙已经常和费沃利及费的译员李应生接触，成为法租界“大亨”之一，有时黄金荣还得仰其鼻息，特别是在动用公司银钱方面。

在这方面，黄对杜十分不满，可是尾大不掉之局已形成，黄亦无可奈何。同时，由于杜在公司里掌握全权，张啸林同样不满，但他却怪黄不给他和杜一样的权力，对黄也不称心。另一方面，杜月笙对黄的不断取款颇感棘手，因而彼此之间，造成了三角矛盾。加以法捕房大小中外头目，因为分赃不均，对黄和公司心中不平，关系更加复杂，于是众流汇合，形成反黄浪潮。杜、张还诋毁黄金荣只是“扒灰老大”（指黄金荣与其媳暧昧关系），闹得满城风雨。后台老板费沃利应付为难，考虑劝黄金荣退职，以缓和矛盾。黄那时感到四面楚歌，只得打电报给正在哈尔滨一带“打围”（帮

会中对在外码头活动的暗语）的季云卿，促其回到上海，准备收拾残局。

正当这个时候，山东临城发生了孙美瑶劫车案，被绑架上山的旅客之中，有法国姚神父及意籍律师穆安素等，经黄通过山东响马出身的清帮大字辈高士奎（杨顺铨的老头子）的关系，抢救获释。这一下，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又认为黄立了功劳。同时季云卿已经赶回上海，向杜、张等劝说，要以义气为重，并谓房帏中事，暧昧难明，不宜信口泄愤。这才稳住了黄在捕房的地位，他们三人之间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

五、继续斗法，广收门徒

上述风波一时平息，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虽然还是三位一体，其实暗斗激烈。杜在黄的左右走卒之间，不时离间分化，企图使黄孤立。黄则网罗一班在英租界六马路赌台收歇后眼馋法租界烟赌的流氓朱锦芳、蔡洪生，并联络原与法租界烟赌无关而在流氓群中稍有名气同时也眼红法租界烟赌的故旧门生唐嘉鹏、谌则高、许福宝等，在周围壮大声势。同时，黄、杜双方，都在工商界及新闻界吸收了一些门徒走卒。

我那时在《新闻报》当记者，就加入了黄门。在黄的授意下，唐嘉鹏、谌则高、邱子嘉、朱锦芳、袁三宝和我在苏州结盟。继而《新闻报》的方菊影、蒋剑侯、蒋宗义、徐耻痕，《申报》的许承绪，《民国日报》的江红蕉，《时事新报》的胡憨珠及小型报《金刚钻》的施济群，《晶报》的余大雄，《福尔摩斯》的吴微雨，《小日报》的黄光益和冯梦云，也加入黄门。加入杜门的有《申报》的康通一、唐世昌、赵君豪及《新闻报》的陈达哉。加入张门的有《新闻报》的余哲文（后来加入杜门）及小型报人黄转陶。对比之下，黄门声势较大，特别是小型报，完全站在黄的一边。于

是黄发动报界对杜攻击。杜月笙颇有心计，知道报纸的影响，当报上刚刚开始对他攻击，他便表示认输。当时我曾为黄在报上有计划地攻击杜月笙所经营的烟赌买卖，使黄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胜利，我也从中得到好处，黄从杜那里拿到钱，由我在有关人员中分摊。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方才置身事外。

当时我们形成了一个集团，取名“黄九公”，作为我和黄光益、施济群、江红蕉、吴微雨、冯梦云、蒋剑侯、徐耻良在新惠中旅社合开“公司房间”的代称。初开这房间是为了日常有个憩息之地，所以一般报人及非报人如吴天翁、谌则高、严荫武等都是这个房间的常客。历时久了，外界在刊登新闻方面不断有所请托，事后亦有所馈赠。

与此同时，杜月笙在新城隍庙附近开设大发公司，在法租界发行彩票，由朱锦芳、袁三宝、唐嘉鹏三人管领，经办职员是早年黄楚九、汪汉溪的利济彩票行的旧部，定期开奖，骗钱万千。这彩票的所以能够发行，都是杜月笙向法租界上下打点奔走的结果，黄金荣则坐享其成。这是黄获得的另一胜利。当时杜不这样做，黄门朱锦芳、唐嘉鹏等将在黄浦江中拦劫烟土。

当时杜月笙主持的公司经手的烟土，有高头货、北口货、外洋货之分。高头货从长江上游的宜昌运来，在隆茂码头提取，从汉口运来的在大阪码头提取；北口货在怡和及金利源码头提取；外洋货在高桥东海滩提取。承运这些烟土的轮船，在煤舱间装有特制的暗室，凭证提货，武装保护。1931 年的一个春天，和杜月笙同属陈世昌门下的邵文滨，竟干出一桩当初黄门大将唐嘉鹏等欲干而未干的事。他督领盐务缉私的炮艇在金利源码头江中拦劫杜公司的烟土。这批货是顾福康（即八股党小福江）托警务司令部武装保护的，与另一武装保护烟土的吴淞要塞司令部集团在江中火并一阵之后，警察局水巡出面干预，在十六铺关桥先行将烟土卸舱，连夜通过警察局长陈希曾调解，决定以后烟土提取，七日

一周，由盐务、警备司令部、吴淞要塞司令部三方面轮流协提，每挑（100斤）提开销费48元。这场风波，表面看是邵、杜之争，事实上也是黄、杜暗斗的事例之一。邵在事前，曾到钧培里黄宅，说是“阿生（即杜）瞧不起人”，意在请黄调处，哪知黄的左右亲信及黄本人大骂杜月笙忘恩负久，机深阴险，不几天，上述之事便发生了。

以上是我所知的黄、杜、张勾结与暗斗的一斑。张于抗日时期以汉奸被杀，杜于1951年死于香港，黄于1953年死于上海，才先后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纠葛。

（上海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从三光码子到清帮头目的金廷荪

洪宸笙口述　觉　人整理

依靠封建帮会，在上海“十里洋场”发迹的金廷荪是仅次于杜月笙的一个人物。但他的历史，不一定广为人知，故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提供如下：

一、金廷荪的幼少年时代

金廷荪，小名阿三，生于1884年。祖住浙江宁波城里镇明岭哑子弄。家里很穷，兄弟5人（廷荪居三，所以乳名阿三），都没有经济能力入学读书，靠父亲金殿林在湖桥头地方摆咸货摊过活。金廷荪10来岁的时候，还没有找到正当职业，只帮他父亲管管咸货摊，做些零星的家务。那时湖桥头有一家稍有名声的肉店金德兴，店主人是其同族宗亲。金廷荪的父亲就靠他的支持在湖桥头附近开了一家小浴室，以后老四金廷范就在浴室里工作。

金廷荪到14岁（1897年）的时候，因家境并不转好，感到住在宁波没有出息，想向外发展，就由他父亲托人介绍他到上海八仙桥一家钉鞋作场里当学徒，到了第二年阴历年底，依照上海习惯，家家要祝福祭神，做年夜羹饭，饭后金照例洗碗抹桌，偶一不慎，将一叠碗盏打得粉碎。师傅闻声过来一看，大光其火，认为岁尾年头敲碎碗盏，是不吉之兆，就大骂大打，金受不起痛苦，就从后门逃跑。可是他在上海没有什么亲戚可以投靠，又不愿回到宁波来，就在马路上过流荡生活，成为“马路浪荡”，金以后向

朋友们常常提起这段历史。上海的“马路浪荡”生活，使金廷荪渐染上城市小流氓习气，从砸碗盏，抛铜钱，卧街路，到借贷，做临时工，以至学着别人偷偷摸摸、做小贩、跑街，这些事情，他都经历过。因其为人伶俐，善于应付，慢慢弄到一些钱，认识了许多下层的流氓朋友，生活渐渐地好起来，就开始住小客栈。日子住久了，小客栈主人的女儿和他发生了关系，后来店主就将女儿嫁给他，这就是他的妻子张宝林。

二、金廷荪的发迹

金廷荪既然与小客栈发生了特别的关系，生活有了定处，朋友多起来，路道宽起来，经济情况也随着好起来。他所结交的大多是法租界里的白相人，白相人要拜老头子的，他拜了安清帮会中一个名叫王德林的首脑为先生，奠定了他以后成为“上海大亨”之一的基础。

不久他认识了一个朋友，这是他一生当中重要的一件事，这个人就是裱画店倌出身、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后来成为上海“大亨”头目的浦东人杜月笙。他因得到杜月笙的引荐进入当时法租界的帮会头子黄金荣门下。尽人皆知，当时法租界的统治机构是法国巡捕房，它们和帮会流氓组织是呵成一气的。黄金荣看到金廷荪是个“三光码子”，办事又精明干练，就提拔他做一名探目，即包打听(侦探)。包打听的职务是在租界里调查偷窃盗劫等案情，这个工作没有帮会的撑腰是办不成的，法、英租界都是一样。所以包打听和帮会都一鼻孔出气，劫抢拐骗、奸淫掳掠等事件自然一查就明白。充当这样的角色，不但居民群众对他畏之如鬼神，就是在下层帮会群中也有了一定威势。金廷荪在做了探目以后，就自然为法捕房所重视，和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也格外接近起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家为什么都叫他“金麻子阿三”，原来在法租界里有一个比金廷荪早些出道而且出了名的“白

相人”叫“金方子阿三”，乳名叫阿三、脸孔有少许雀斑的金廷荪既然也踏进了租界，人家就把他俩视为一对，叫他“金麻子阿三”，因此名气也愈来愈大了。

三、勾结军阀，大贩烟毒

金廷荪在法租界帮会集团中渐渐阔绰起来，成为头子之一，居民中也慢慢知道了他是一个不能轻视的“大亨”。

1919年皖系军阀卢永祥由淞沪护军使，调升浙江省督军，他的部属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后，这一伙“大亨”就进一步和军阀勾结起来。张啸林原是杭州人，曾在宁波任浙军旅长和台州镇守使的顾乃斌（子才）也是杭州人，顾与何丰林有交情，张啸林就通过顾乃斌的关系与何丰林勾结起来。因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以至金廷荪等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是靠在法租界里设立鸦片公司，贩卖鸦片与吗啡，但这是违禁品，在中国地界，表面上有着中国官吏的管理，只能偷偷摸摸地贩卖，及至与何丰林勾结，他们公开分肥后，于是运载大量毒品的船只就在淞沪护军使署附近开驳上站，不必受任何人检查，用汽车运往租界。他们为避免路人眼目计，当鸦片烟车辆经过街道的时候，所控制的电灯为之一暗。可知何丰林公开掩护和他们胆大妄为的情况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当时除了法租界这批“大亨”以外，英租界另有一批“大亨”，其帮会组织力量，还不及法租界，但在英租界内也设有鸦片公司。黄、杜、张、金等凭借自己帮会力量的强大，且有护军使何丰林作为靠山，发动手下流氓几次抢劫英租界的鸦片公司，使英租界内的“大亨”们招架不住，只得将自己的公司草草收场，这样全上海的鸦片就统归黄、杜、张、金等这个法租界帮会集团“独家经理”了。这时候，金廷荪在“十里洋场”中也就更加阔绰起来了。

四、国民党“清党”时期的金廷荪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已在上海策划阴谋活动。当时上海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已组成总工会；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组织也很健全。他们奋不顾身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开火，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蒋介石自然恨之切骨，于是利用封建帮会集团首脑黄金荣（原是蒋所拜的老头子）、杜月笙、张啸林上海三大亨，用“中华共进会”名义在各大报发表宣言，一再打击革命的总工会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会组织，号召各帮会组织下层流氓，投靠蒋介石。在这一场对工人阶级实行反革命大屠杀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流氓头目大显了身手，而金廷荪也是非常卖力的一个，其地位仅次于“三大亨”，成为三号红人。

在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派杨虎、陈群前来宁波“清党”时，杜月笙被任为副官长，金廷荪被任为副官，设办公处于宁波广济街旧提署内。杨虎、陈群这伙人的公馆就设在镇明路金廷荪的住宅内。这一次在宁波“清党”，被杀害的有王鲲、杨眉山、胡焦琴等烈士，现在已故的宁波民革主委当时宁波民国日报社社长庄禹梅、益丰米店店员邱庭芳等都曾被捕。这时的金廷荪，已不仅是一个帮会头子，而是蒋介石反革命集团中的一个得力的爪牙了。

五、大东601号俱乐部

杜月笙、金廷荪一伙既然投靠了蒋介石，为进一步扩展力量，又在上海永安公司楼上大东旅馆601号房间内，组织601号俱乐部。由杜任后台老板，金为俱乐部主任，负实际责任。

601号俱乐部是帮会的一个政治性活动场所，英租界的“闻人”虞洽卿、张继光、蔡琴荪；蒋介石周围的要人俞飞鹏、蒋鼎文、王世和、朱守梅、钱大钧；宁波的王文翰、竺梅先等人都是

这个俱乐部的座上客，彼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次蒋鼎文的母亲开吊，就由601俱乐部为之筹办。通过这个组织，不仅使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大亨”携起手来，而且使封建帮会与地方官员、士绅也进一步结合起来。金廷荪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后来杜月笙、金廷荪这一伙人中得能成为杭州的华丰造纸厂、嘉兴的民丰造纸厂的大老板，也渊源于利用这个俱乐部广泛的结纳和多方活动的结果；通过俱乐部的联系，竺梅先与金廷荪托王文翰介绍投资华丰10万元，并拉拢杜月笙，从杭州发展到嘉兴。民丰、华丰在中国造纸业上占了重要地位。以后竺梅先得能做宁绍输船公司总经理，不但与601号俱乐部有关，而且金廷荪从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六、大运公司与航空奖券

抗日战争以前，蒋介石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发行航空奖券，由大运公司独家经售。这个大运公司的经理就是金廷荪，董事长是杜月笙。通过601号俱乐部的结合，金廷荪不但成为上海的重要“大亨”，也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航空奖券搜括的民脂民膏是尽人皆知的，单以大运公司经售航空奖券的利润而言，金廷荪拿其中盈余一部分约几十万金去“孝敬”杜月笙，为杜在法租界杜美路造私人住宅一处，共计三幢再加余屋，规模很大，可以与四大家族蒋、宋、孔、陈等公馆相媲美，只是杜月笙尚未进屋，抗日战争事起，抗战结束后，杜月笙又将这批房子卖给中美特务机构中美技术合作所。后来杜拿这笔款子跑到香港去了。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杜月笙在老关系上虽然比较重视张啸林，但在经济、生活上对金廷荪更加接近。

七、金廷荪在上海的“事业”

这里再补述一些金廷荪在上海所做的“事业”，借以进一步了

解金廷荪这个从赤手空拳起家的流氓头子是怎样发迹的。在抗日战争以前，上海英、法租界之间，有一家108号赫赫有名的大赌场，是做轮盘赌的，赌客大多是广州帮和潮州帮和商贾豪门，进出以10万百万计。这个赌场地点在英、法租界交界之处，万一有事，前面是法租界，后门是英租界，可以溜之大吉，保险不出问题，所以最合大赌客的心意。这所大赌场的原址，就是解放后延安路的中德医院，老板是法租界的流氓集团，金廷荪就是其中重要分子。另外他们还开设生吉里大赌场（法租界八仙桥下现在的西藏南路），和一个名叫荣生公司的大赌场。这些大赌场，既是冒险家们角逐场所，也是流氓头子杜月笙、金廷荪等敛财发迹的乐园。

此外他在上海十六铺与杜月笙合股开设规模巨大的源茂笙记鱼行，在法租界大马路与杜月笙合开宝成银楼，在上海小东门与杜等合开洽茂冷藏厂股份有限公司，又在上海支胜桥独资建造逍遥池浴室，再加有上海的华丰面粉厂，黄金大戏院，在杭州有华丰造纸厂的股子，在嘉兴有民丰造纸厂的股子，这个当年的“三光码子”就一变而为百万富翁了。在这个基础上，金又与杜月笙等在上海河南路合开了中汇银行，又在上海造了二处私人住宅：一处在上海南禅家桥计三间二厢房，加里弄房二进，规模远较宁波镇明路住宅为大。后来在劳而东路亨利路（即现在的新乐路）新建一处住宅，较南禅家桥的更为阔绰。

八、金廷荪在宁波故乡做了些什么事

在旧社会里，一般人拥有财势后，就想在乡里争些面子名声，金廷荪也想用些血污钱在宁波故乡做些“善举”来扬扬名。约在1923年前后，宁波时疫流行，他就在江北岸新马路开办了一所临时性的时疫医院，这医院办了三四年，基础逐渐巩固，规模逐年扩大，后来就买地建筑了一所“仁济医院”。金廷荪对这医院的确

花了一些钱，光是买进原有房子就花银元 44400 元，再加建筑新房一大幢，约银元 10 万元。医院设备相当充实，只拿当时该医院所备的爱克斯光设备来说是全国第一流的。据说当时中国有这样设备的医院只有二处，一是北京协和医院，一就是仁济医院。

仁济医院的支出很大，费用都由金廷荪和杜月笙分担筹划。仁济医院从开办日起，表面上没有公开向外募捐，以示他的“弹硬”，但变相的募捐也会在一定场合出现，如医院开幕时就揭示着某某送礼几万，几乎没有不是上万的份子。为着准备搞到更多的钱，还假座宁波开明街民光戏院演京戏，邀请当时著名艺人王虎辰登台唱戏，“大亨”们参加了客串，虞洽卿原是一个惯吃白食的人，这一次居然也送了 1000 元现洋。

这所医院随着宁波被日军占领而关门了。抗战胜利后，金廷荪一度想把它改为仁济中学，据说备案的手续没有办好（底细不详），后来他把医院的房子、土地、设备全部名义上送给耶稣教会设立的浙东中学，实际上是变相的出卖，要浙东中学出资 1.2 亿元付给他。解放以后，改为宁波市第四中学。

金在宁波故乡除创办仁济医学外，还有宁波灵桥。宁波人因老江桥（灵桥）往来人多而桥面狭，早想把浮桥改建为上海外白渡桥式的钢骨洋桥，曾由士绅张申之、严康懋、陈蓉珽等发起组织，可是无法完成。约在 1934 年就以金廷荪为主，拉拢张继光（宁波张村人，上海建筑业的头儿）向上海募捐，只备一本捐簿，就捐到了好几十万元，实现了建造灵桥经费的捐募。

抗日战争胜利后，金廷荪在宁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重修郡庙（旧府城隍庙）。据估计所化费用约值黄金 50 大条，极大多数是由金向上海“闻人”募捐来的。金在宁波做了几件所谓“善举”，用的却是向人民搜括来的金钱。

接着他在镇明路造住宅。他所以要建造这所房子还有他的隐衷，原这所住宅地址是蔡姓的平房。金廷荪幼时家里贫穷，曾在

蔡家房子门外踱过，受到别人讥笑讽刺，如今他已有钱有势，特地买这块地来建造房屋，想洗雪过去的耻辱，以荣宗耀祖。

1931年，金廷荪游阿育王寺时，认识宁波大慎木行经理洪宸笙。大慎木行股东中有福州庄客，亏资万元，洪就趁这个机会，邀金支持，金答应出资5万元，后改为大慎荪记木行，仍由洪任经理，从此金又成为木行老板。这时大慎木行在宁波规模最大，执木业界之牛耳。

1933年，宁波立丰面粉厂正在摇摇欲坠之际，又去拉金廷荪帮忙。这家面粉厂过去是和丰纱厂股东顾元琛、俞佐宸等所经营，由凌养吾任经理，因经营不善，欠款达七八十万元之巨，以致周转不灵，势将倒闭。这时俞佐宸拉洪宸笙去任经理，另一方面由俞佐廷拉金廷荪出来支持。即由金廷荪任董事长，合资本30万元，俞佐宸等老股折算为10万元，金廷荪与洪宸笙出资20万元，当将立丰面粉厂改组为太丰面粉厂。其后该厂所出牧童牌面粉，曾盛销南洋群岛一带。太丰厂在宁波成为享有盛名的一家企业。

九、抗战期中的金廷荪

金廷荪在上海沦陷后不久来到宁波，宁波沦陷后又迁住定海沈家门。日寇曾一度想利用他。但不久他又到宁海、天台、温州一带，又去过香港。这里只叙述他在宁波和宁海的情况，以反映他这一时期的一般活动。

抗战初期，金从上海回到宁波的时候，号称“宁波杜月笙”的周大烈是当时宁波“红得发紫”的人物。周一听到他回来，就邀集地方豪绅、官员到轮船码头去迎接，大开筵度为他洗尘，俨然把金看成是一个“党国要人”，使金在故乡大显威风。周因经济地位、社会影响远不及金，于是随时仰仗于金，而金的生活安排、家事料理则又往托周办理。及至1941年宁波沦陷后，周、金先后到宁海。后因金信赖了一个原跟俞济民多年、曾任鄞县县政府及浙

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主任秘书的章鸿宾（字讽秋，诸暨人，抗战胜利后曾任慈豁县长），金周之间就比较疏远起来。

再说金廷荪与宁波“土皇帝”俞济民的关系。俞看金是有力量的“大亨”，对他很迁就、尊敬；金看俞是地方官，背后又有俞飞鹏、俞济时为依靠，也表示尊敬，彼此利用，你捧我吹，十分相得。这一时期，金廷荪恶势力，也渐渐深入到宁波地区来了。

另一方面，金廷荪的徒子徒孙们在敌伪沦陷时期所作所为更是无法无天。原在金所开设生吉里大赌场里管门的上海人吴四宝（吴云甫），在上海沦陷期间是敌伪上海76号特务机关的首脑，成为汉奸中的凶魔恶煞。上海法租界流氓帮会集团中金廷荪手下的许多人，与敌伪勾结，象高鑫宝、叶琢三等做了敌伪的大队长，范恒法、谢宝生（敌伪时期的苏州警察厅长）也很活跃。在黄金荣处做饭司务出身，后来跑马出名的马祥生，抗日战争期间做了海匪头脑，上海众所周知的著匪张阿六、陆安石，挂着忠义救国军名义，自己备有船只，长驻在海门一带，专门抢劫海运帆船，谋财害命，毁尸灭迹，不知欠下多少血债，抗战胜利后他们还继续干这种勾当。有一次被劫来的帆船中有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匪徒们强迫她住在上海做“压寨夫人”，后来这个少女逃出牢笼，就去报告当地警察局，才被破案。张阿六、陆安石的领导人就是马祥生，与金廷荪都是一路的货色。

十、金廷荪的三条门路

金廷荪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头目一样，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对内投靠国民党当局，除此以外，自己还有三条门路：一条是结兄拜弟，一条是攀亲结眷，一条是拜师收徒。

先说第一条门路。金廷荪有结义兄弟7人，这就是俞佐廷、杜月笙、吴经熊、张继光、蔡琴荪、某某和金廷荪自己。这几个人是多方面的人物：俞佐廷、张继光等是商界的头面人物，长袖善

舞，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杜月笙是上海“大亨”的头目，又是蒋介石的重要爪牙。吴经熊是留美的法学博士，当过大学教授、律师。国民党上海法院院长、立法委员，还在罗马梵蒂冈充当国民党教廷公使，这样就使金的社会地位，四通八达，伸展到各统治阶层里去。

第二条门路是结亲攀眷。金廷荪有4个儿子，长子金元馨，娶无锡祝伊才的女儿为妻。祝在各处开设电灯厂，不但是无锡帮有名的人物，而且在银行金融界也有一定的地位。次子金元霖，娶乐汝成的女儿为妻。乐是泰康食品公司和洽茂冷藏公司的老板，在上海金融界有一定的地位。三子金元顺，娶严仲林的女儿为妻。严是黑人牌牙膏厂老板，又是福泰钱庄大股东，也是所谓实力派之一。四子金元华则娶杜月笙的女儿为妻。这样金、杜既是结拜兄弟，又是儿女亲家。金的4个儿子，解放后除长子在台湾外，其余3人皆在香港。

第三条门路是拜师收徒，这是帮中的惯技。象杜月笙就拜宁波梅墟人陈世昌为师，及至杜成为上海的“大亨”后，陈就成为老太爷。至于金廷荪收徒，有二种手法：一种是拜金做先生，一种是拜金为干爸爸。反正做干儿子做学生都是一样，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利用而已。他的干儿子和学生中，比较有名的是：李耀庭，从开轮船公司到做中汇银行信托部经理，在上海轮船业金融界中有一定的地位。镇海人虞如品，在上海爱多亚路南货业中有把持作用。华达宣，在上海运输业和烟业中有一定地位。刘安卿也是烟业中有名人物。又上海黄金大戏院经理孙兰亭和著名艺人赵培鑫也都是金廷荪的过房儿子。在宁波，律师孙信赠，冷藏公司经理陆世昌，对人都说自己是金廷荪的干儿子或学生。是受到当地老百姓刮目相看的。

十一、结 束 语

金廷荪从一个摊贩的儿子，成为上海的“大亨”，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产物。他一生虽没有做过重要官吏，可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比一般官僚更加“吃得开”，社会影响也同样恶劣，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抗战胜利后，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俞济民率领喽罗们从宁海来到宁波，他的部下在街上横冲直撞，不可一世。有一天俞济民部下严纪民大队正在宁波市上耀武扬威，路上行人避之唯恐不及，却有一个人坐着藤轿在前面走，并不避让，使这个队伍光起火来，喝令停下，过来一看，原来是金廷荪，吓得严纪民部下苦苦救饶，请求金千万不要到俞济民那里去说起这件事情，救救他们的狗命。当时金廷荪狠狠地训斥了该部一顿。从这一件事也可看到金廷荪的“威势”，纵使是无法无天宁波土皇帝俞济民的部下，碰到他也就不敢，因为俞济民本身的力量，还是略逊他一筹的。

解放前夕，金廷荪和他的结拜兄弟杜月笙一样，带了从中国广大人民那里搜刮来的大批钱财，逃到了香港，以后还到台湾去，听说不久就病死在台湾海岛上。

1962 年

（宁波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潮州大亨”郑子良

凌　雷

郑姓是广东潮州的一个大族，分布在各镇各乡。梅花乡也是一家郑姓败落大户，其中一房只遗留下一个孤儿（有人传说他是一个被收养的螟蛉子），名叫郑子良，长得虎头虎脑的，浓眉大眼，高大身围，腿粗膀圆，可是从小就爱浪荡。及长成，同族的长辈替他娶了一房媳妇，原想能够对他加以管束，可这却使他的家境更加困难，不得已他只能随其堂叔奔向上海谋生。在上海四马路棋盘街一家烟土行里干些杂工，还充当打手。他本性难改，常给店号增添麻烦，三日两头的闯祸惹事，他堂叔一气之下就把他驱逐出店门。

郑子良单身一个流浪到了南阳桥杀牛公司一带（旧法租界敏体尼荫路、喇格纳路、平济利路、皮少耐路、格洛克路等处），开始了他的瘪三生涯。只因他长得五大三粗而又鲁莽好斗，最初那一带的流氓瘪三都认为他是个山东人，都叫他为“山东大个子”，后来才知道他是潮州人。

他厮混在地痞流氓中，施展了他的一套江湖诀，讲义气爱打不平，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打架抢在前，吃亏自己担当。所以几年后，流氓瘪三群都服了他，就有一大批人愿意跟随他打天下抢地盘，他开始走了顺风路。

他有了一帮子人拥他为头，也就想收徒弟了，他的开山门徒弟叫“麻皮阿毛”，姓潘，最中他意的徒弟姓高。郑子良也懂得帮会帮规，深知凡本人未曾进过香堂拜过老头子是无接收门徒的。虽有了

一伙人马，还想再扩大非得有帮会头面人作靠山，于是托人情找门路，乃得投帖拜上了清帮大字辈陈世昌为老头子（陈曾投拜黄金荣为门生）。

郑子良拜了老头了，有恃无恐地扩大自己的势力，争夺自己的财路，把魔爪伸进到十六铺码头。公和祥码头、大达码头的搬运工人全被他统治在手，从此潮州大亨郑子良就有了名望。

从流氓恶霸生涯中起了家，有了身份地位，权势和钱财，就想要成家立业，由一个唱苏滩名旦朱某介绍她的表姊张氏和他结婚，做了上海太太。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茄勒路口光裕里（今卢湾区复兴中路吉安路口）租赁到 4 号一幢两上两下石库门楼房，安心居住。后来为了发展他的势力范围，嫌房屋太小，又租下隔壁 2 号，也是一幢两上两下的楼房，拆墙翻修，两幢并为一幢。

郑子良既然改变了过去瘪三身份，当然是穿上了长袍马褂，不同的身份就有不同的生财之道，他在各患难弟兄的怂恿下组织成了“侠义社”，广收社员数逾千人，其中有不少各行各业的大小老板。他们为了本身利益，极需有个靠山抱台脚，参加“侠义社”只化少数的会费，何乐而不为。郑在商界也就灵活兜得转了，继又被推选为鸡鸭业同业公会董事长，南北货同业公会理事长，鱼市场的理事等，有了这些头衔，顿时他的身份又抬高百倍。

旧上海滩的清、洪两帮势力最大，他们争夺权势也很激烈。郑子良想到他单靠清帮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势力是不够的，他必须再向洪帮拉拢结合，先向虹口地区的潮州洪帮“至光社”笼络感情，另一面又对南市地区的广东洪帮“新胜和体育会”等大施拉拢手段，几经奔波获得成功，以合并成立“三侠会”，推选他为会主。

在潮州人世俗观念中娶小老婆是件普遍的常事，不足为怪，郑子良当然绝不愿例外，经人作伐，结识一个姓沈的护士纳为小妾，藏娇于望志路南永吉里 52 号（今兴业路 205 弄）。除了外室不算外，正式的妻妾有三房。潮州的大老婆也曾几度来上海小住，三位

太太相叙倒也能和平相处。

日寇侵华，一·二八淞沪战争后，郑子良由于爱国热情的冲动，心血来潮，痛恨日寇的蛮横，又想到他在"大亨"群中有了位置，上海商界又有一大串董、理事头衔，也应该尝尝军政界的味道，于是托人情向军统头子戴笠请求投靠效劳，总算得到戴笠的青睐。

抗战全面爆发，国军节节后撤，郑子良接到戴笠的通知，紧急招募军兵，隐藏太湖地区对敌作迂回游击之战。又得戴笠暗示，可以撇开忠义救国军总部马丁部队的管辖，单独成立"忠义救国军杭嘉湖指挥部"，郑任总指挥。郑乃率领他的弟兄数百人活跃在太湖之滨，迅速发展士兵和劝降汪伪军兵，也达数千人。郑统领指挥，实施"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确也曾与日寇几次作战，搞得日寇昏头转向，暂作回避不予正面冲突，听之任之，郑乃得安然无恙地担任他的总指挥。

日寇投降，戴笠坠机身亡，靠山已失，他也知道忠义救国军司令丁云山等决不会轻易放过他郑子良，识时务者为俊杰，赶快交出部队退居上海是为上策，结束了他的一场军政梦。

郑子良由太湖返回上海，本想再次一心经营"侠义社"，可当时的接收大员降临上海后，也都纷纷建立这个社那个会。"侠义社"的社员虽已近3000人，可在各社各会的倾轧下就不能有什么新招和苗头，活动极难进展。

解放大军南下，势如破竹已近长江，郑子良也明白蒋家王朝已临末日，感到自己的前途黯淡，乃离家避居大木桥路一幢平房里。

1950年4月上海大逮捕恶霸反革命，郑子良在光裕里家中被捕，以码头恶霸、反革命案处死刑，镇压伏法，"潮州大亨"郑子良结束了他的一生。

（上海市卢湾区政协文史委　供稿）

清帮在天津的流传

李世瑜

一、清帮与天津混混儿

清帮传到天津很晚，大约在光绪晚期。这是因为经过河道的漕运全面停废，漕运水手连同他们的组织——清帮，弃舟登岸，涌入沿河各大都市。天津是漕运时代的主要转输点，又是清代后期开埠以来的特大码头，故而清帮分子大批来到天津。它大盛于民国以后的北洋军阀时代，直到抗战期间。

在清帮传入天津以前，天津下层社会存在着另一种类似帮会的组织，叫做“混混儿”，或称“混星子”，或称“锅伙儿”，官方则称为“锅匪”。它最初发生于渔业中。天津号称九河下梢，各河流、湖泊及沿海所产鱼、虾、蟹等水产品都要由船运到天津，到津之后首先都必须交到“鱼锅伙儿”，然后由他们开秤定价，再发售给大小行贩。这种锅伙中的成员都是地方上的封建把头一类的人物，势力很大，官方莫敢谁何。后来“锅伙儿”又从渔业发展到粮食业、蔬菜业、运输业、摆渡、赌场、小押、人市（雇佣劳工的市场）等处，他们甚至敢私立铸钱炉，拦河取税，无所不为。他们和府县衙门差役都有勾结，平日供奉，三节送礼，应酬周到；而公门差役多半是混混儿出身，当然对于他们的同类要多方袒护。混混儿上述这类行径与后来的清帮无异，然其组织则比清帮松散。

故老传闻，混混儿也是清初成立的哥老会的一支，也有反清的性质，这恐是一种影附。按哥老会属于天地会或洪门系统，天津一向很少他们的踪迹，但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光绪初年李鸿章调他的部下周盛传驻军小站，周的部队淮军是从安徽等地带过来的，人数很多，在小站一带驻扎了很久，其间还开凿了一条马厂减河，因此周盛传甚著政声。然而淮军士兵则因离乡年久，军中待遇苛刻．时有哗变、叛逃以及到各处滋扰抢劫之事。这些事件的领导者、组织者是士兵中“国鲁匪”、又称“国鲁子”、“啯噜子”、“国匪”。在《李文忠公全集》、《周悫慎公全集》里就有好多篇奏折、公牍都提到镇压、缉拿小站驻军中滋事的“国匪”的事。什么是“国匪”？就是哥老会。乾隆年间哥老会发生于四川一带，四川话“哥老”与“国鲁”音近，遂有混同现象。而“国”又与“锅”同音，“混混儿”又称“锅匪”，于是“锅匪”、“国匪”又混为一谈。自然，小站驻军中的“国匪”逃离营盘并未回乡而潜入天津市内的也会是有的。这可能就是指称“锅匪”为哥老会的一支的致误原因。

总之，混混儿或锅伙儿、锅匪与哥老会没有多大关系。混混儿也不是清帮，而是清帮之前与它同样性质的一种下层社会结构，乃至清帮涌入天津，他们乃合而为一。

二、清帮与混混儿、脚行三位一体

象清帮这样以为非作恶为主要活动内容的下层社会流氓集团，在历史上可说是无时无之，无地无之。它们的差别不过是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尽相同，组织严密或是松散，流传的地区或大或小，人数或多或少，势力或强或弱而已。大体说来，工商业、国际贸易和交通运输特别发达，封建官僚、军阀、帝国主义势力特别强大的水旱码头和通都大埠，社会下层流氓集团就发展得比较

快。天津清帮的发展也是如此，但也有异于别地之处，就是天津的“混混儿”摇身一变而为清帮，它一直是以脚行中的把头及其徒众为主要成分。也就是说，天津清帮的特点是混混儿、清帮、脚行三位一体的组织，它们自始至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脚行即搬运工人。从漕运尚未停废时期，天津的脚行业即十分发达，因为在开埠之前它就是一个重要的北方水旱码头。河运、海运、漕运、盐运都以天津为转输点和口岸。据记载，清初开始，旧天津城就有官方组织起来的脚行名叫“四口脚行”（四口即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后来才在运河两岸、盐坨地区以及商业中心出现了私人把持的脚行。天津开埠之后，辟出九国租界，迅速成为工商业大都市和北方对外贸易中心，这就更促使运输业兴盛起来。大约是庚子年（1900 年）义和团运动之后，经由河道、海道的漕运全面停废，大批水手涌进天津，充当脚行是他们最为接近的行业，这是天津脚行兴盛的又一原因。

充当脚行的人都是赤贫穷汉，全凭一膀子力气赚钱吃饭。所以自来就有着一种“不畏死的性格，而脚行把头更必须是混混儿一类的人物，否则是无法驾驭的。

清帮来到天津之后，一下子就扎根在脚行这块沃土上，清帮组织自此空前地发展起来。自然，在传入天津的初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作为，而且与混混儿没有什么两样，社会上也就习以为常地不甚注意他们内部的这种变化。不仅如此，向来某些混混儿和脚行，他们在地方上还给人以好印象。如有的急公好义，象办水会粥厂之类；有的打抱不平，或为人排解纠纷，象是一方的英雄人物，如著名的“津门大侠”大脚行把头霍元甲即是。因此清帮传入初期，人们对它并没有什么恶感。

三、清帮在天津的发展

天津是个五方杂处的都市，历来各行各业中的头面人物许多都是从外地跑码头来的。后来站下了，压倒了地头蛇而成了强龙，或是压不倒地头蛇，反而助长地头蛇成了强龙，清帮在天津的发展过程也体现了这一点。

20年代初，从济南来了个叫厉大森的清帮“大”字辈老头，他到津之后清帮的发展起了质的变化。厉大森字宪臣，济宁人，年青时当过兵，民国初年就加入了清帮，属“嘉海卫”帮头“大”字辈二十一，很快就开山门收徒弟，而且到过很多码头传播清帮，帮头术语叫做“跑海”。后来跑到了济南，当了济南警察厅骑警队队长，同时发展了不少徒弟。骑警队的职务本来是缉拿土匪、小偷的，而他却与这些人都有联系，甚至由他豢养在骑警队，以备必要时出来“顶案”。1923年由于胶济铁路张店站站长被人绑架，军政当局责令厉大森立即破案，否则唯他是问。他找了一个土匪顶了案，临时搪塞过去。但不久案情大白，他受到处分。此后厉即离济来津。当时天津由奉系军阀褚玉璞主政，厉大森来津后居然先把褚玉璞收为门徒，然后由褚封厉为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此后厉更大开山门，广收门徒，其中之一即军警联合督察处一个分处处长白云生，另一个是《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张逊之。白、张入帮后也开山门收徒弟。白的门徒之一即褚玉璞的特高科副科长袁文会，另一个是督察处手枪排排长巴延庆，所以白、张是“通”字辈二十二，袁、巴是“悟”字辈二十三。自厉大森收了白云生、张逊之，白又收了袁文会、巴延庆，清帮在天津的罪恶历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这些流氓、土棍、混混儿、脚行把头汇合成的清帮势力控制了全市的下层社会达二三十年之久。

四、厉大森与白云生

厉大森、白云生两人在天津初露头角时方在盛年，大有“一跺脚天津卫乱颤”之势，后来因为年老了，非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是不轻易露面的，平日则只靠徒弟们的“孝敬”过活。如20年代末袁文会在日租界新旅社开赌局，由于法租界新津里还有一处由苏莲舫开的赌局抢了袁的生意，因而来新旅社的赌客寥寥无几。袁遂派人到新津里寻衅，结果双方约定日期决斗。这是个严重的场面，决斗的当日双方出动100多人，袁的一方即由白云生亲自出来督阵。结果袁胜苏败，从此新旅社赌局的营业独占鳌头。又如1931年袁文会受日本及汉奸张璧、李际春指使招募流氓、“白面儿客”（吸毒者）、清帮分子、脚行分子千余人组成“便衣队”发动“天津事变”，厉大森当时也住在日租界内，他是袁文会的师爷，袁文会组织“便衣队”事，厉自然也直接间接地插过手。天津市公安局在反击“便衣队”自日租界向市区进攻时将厉大森捕获，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亲自审问他。他见王后吓得浑身颤抖，一头跪在地上，声称他不是便衣队，请求饶命。王知道他在清帮中的声望，并未处分他，而是使了个釜底抽薪之计，让他取保释放，但勒令他号召其徒众迅速投案自首。厉果然照办，许多清帮分子纷纷自首，有的还缴了枪受了赏，这对瓦解“便衣队”起了很大作用。由此可知厉大森当年动辄“壘下”（躺下）“卖味儿”（任对方殴打）“不带哼哈”（不能出声）的劲头是完全没有了。

五、天津清帮始终以脚行为主

袁文会、巴延庆在进帮时都是褚玉璞的督察处、特高科的小喽罗，时间都不长，又都回到他们的世袭行业——脚行之中。袁

文会从15岁就接替他父亲当脚行头，巴延庆也很小就接替他父亲当脚行头。除袁、巴之外，其他脚行头子大半也是清帮分子，自然还都是混混儿，如刘德山、马文元、翟春和、佟少田、王士江、王士海等等，这些人不是袁、巴的徒弟就是他们的干儿子。他们大半目不识丁，粗野不堪。据统计，解放前天津全市共有大脚行把头901人，其中的576人是清帮，其他则是国民党、三青团、洪帮、一贯道、新佛教会、叉子会、火神会、清天道、在理教等组织的分子，有的则有双重或多重身份。如巴延庆、刘德山、马文元、佟少田等既是清帮又是洪帮，术语叫“双龙头”。

这些脚行头子、清帮也是混混儿们，有的后来发迹了，发迹之后也可能改营其他生意，甚至当了这个官儿那个官儿，但他们并不完全脱离脚行，而仍是兼跨着脚行头子的名义，或是虽无名义而实际仍操纵和支持这个脚行，分取他们的剥削所得。他们平日的作风也仍旧保持其脚行本色，即始终是下层社会流氓无产者的本色。

这种情况在其他帮盛传的都市中是少有的。比如上海的清帮，最初也是由河海运输船工、搬运工带进来的，但很快就脱离这种行业。著名的上海清帮人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没有一个是脚行出身的。黄金荣是个学徒，后来当上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借着清帮力量青云直上。杜月笙是个小贩，后来投靠了黄金荣才发迹了。张啸林原也是个学徒，还进过杭州武备学堂，到了上海才混迹于清帮之中，并与黄、杜结为一体。这些人物后来都成为腰缠万贯、拥有很多企业、银行、房地产的大亨、阔老，直至成为举足轻重的“党国要人”。

又如南京的清帮人物，最初自然也是漕运水手、码头工人中的把头之类，漕运停废之后到了一般社会上才分散到各行各业。因此清帮分子始终没有出现象天津的袁文会、巴延庆、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物，充其量不过象把持商会的江政卿，把持

工会的钱挹秀，把持农会的许生保等等。还有一些重要的清帮分子则是投靠了党政特务部门，充当了他们的爪牙而已。

镇江也是个清帮十分发达的城市，清末民初就有所谓上中下“八洞神仙”、新老“十二属”的名称，他们都是些地头蛇。20年代“大”字辈朱炳元、杨善之、魏子荣等比较活跃，他们开始虽也在江边码头、火车站吸收水手、工人为徒，而在他们经营一些事业，结交中上层人物，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后，多半就要“关山门”，有的专靠帮会吃饭的则依旧收徒。沦陷期间镇江与各地一样，有几个大清帮头目倚仗敌伪势力横行一时，胜利后销声匿迹，解放后被镇压，如邱凤仪、胡春潮等。镇江也有一些来跑海的清帮分子，如清江的冯守义、扬州的王柏龄、阮慕白、朱钧甫，瓜洲的樊葸臣等，他们也因跑镇江而成了帮中知名人物。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脚行出身或一直以脚行为业的。

再如济南的清帮，它也是庚子后传入的，自然也是首先由搬运业开始，直到民国初年，把持济南清帮的东把头张星垣、西把头柏锦章还都是脚行头子。后来发展成“安清二十八宿”时分子已经很复杂了。30年代后韩复榘掌鲁时期，由于他十分倚重清帮分子，所以一度十分兴旺，连韩的一些高级将领师长之类如孙桐萱、李汉章、展书堂、曹福林等都入了清帮，但一直没有形成如津、沪的情况。

天津、上海、南京、镇江、济南这是清帮组织和分子特多的城市，也是出现清帮显赫人物持多的城市。其他有清帮的地方，也不外是沿长江、沿运河的一些大码头，如南昌、九江、安庆、芜湖、无锡、扬州、杭州、宁波以及北京等地（帮内传说共有“七十二个半码头”）。据知这些地方都没有出过什么显赫人物，也没有起过多大社会影响，也没有象天津这样始终以脚行把头为主要成分的情况。

六、来天津“跑海”的清帮人物

天津地方对于清帮之类的分子来说，是一块“肥肉”，“跑海”的何止厉大森一个，又都何尝不想象厉大森一样在这里站下。而厉、白、袁、巴已经捷足先登，后来的只好另辟蹊径。他们大多以清帮的正统姿态出现，对于厉、白、袁、巴之流则斥为异端，都以维护正统、扶持正气为己任，或是捧抬出一些有清帮身份的社会名流、文化人以相号召。

如著名的清帮“兴武六”帮头“大”字辈老头袁克文（字寒云）即是。他是袁世凯的二儿子，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地都以文人墨客自居。他喜欢琴棋书画，能唱昆曲、京剧，玩古玩、玩古钱，交游的都是上层人士，但也很尊重帮内的下层分子。他认为下层分子是一种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结交他们一定会有好处，否则不利于立足社会。他也开山门，但不滥收徒弟，大约只收过100多个。因此他虽是清帮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津、京、沪的清帮都拿他当招牌），但毕竟只在一定的范围之中，远远不及厉、白、袁、巴的覆盖面之大。

又如张逊之，他是抗战期间在天津颇有声望的报人，原为《大公报》记者，后为敌伪报纸《庸报》副社长。他的清帮身份是“嘉海卫”“通”字辈，厉大森的弟子。他所收的徒弟最初很杂，哪种行业的都有，后来重点向文教界、政界及工商界发展，意思当然是想让清帮变得斯文些。抗战期间天津有许多中小学教师、机关职员、资本家都入了他的清帮即缘于此。他从抗战前到胜利后一直是个“不倒翁”，甚至抗战期间还奉日寇之命到重庆和国民党特务机构“讲斤头”（密通信息，磋商条件）。他的清帮势力与以脚行为主要成分的清帮势力形成一个对立面，但又始终不能形成优势力量。

再如王大同，字约瑟，他是从济南跑海来的。山东沂州人，本是个被耶稣教会收养的孤儿，后被送往国外读书，回来后仍在济南传耶稣教，还创办个报纸《世界真理报》。后来背叛了教会跑到上海，冒充清帮“嘉白”帮头、“大”字辈老头，大摆香堂，大收门徒。抗战期间又回到济南，还以清帮面目出现，创办了个大同中学。又跑到天津，同样招摇撞骗，并想在天津长期站下，置了房产安了下处，但以脚行为主要成分的地方清帮势力过重，他虽然竭力巴结袁文会，两人成为好朋友，也始终吃不开，解放前不久还是回到济南。

另一个人物姜般若，是个洪帮头子，又是个佛教徒，据说他还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南开中学教过书。30年代再来到天津，首先是结交上层，希图在天津传播洪帮，并开办了一所育德学院以制造影响。他在天津立了山头名“太行山兴和堂”，收过一些兄弟，起初是专收知识分子，后来为了拉拢清帮的地方势力，把脚行头子们也拉进许多来，上述身兼清洪两帮的“双龙头”们大半都为姜所收，但也止此而已，他的洪帮在天津也未成势。

总之这些以清帮正统为号召，希图抵制以脚行为主的一派势力的清帮人物都没能十分得意，虽然他们有的在社会上和在帮内的声望都很高，势力很雄厚，与军政当局的关系也很密切，以至投了大量资本，但仍是没能站得住。以上只介绍了少数几个，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有的也是很著名的帮内人物，如济宁来的“大”字辈老头、曾收过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为徒的魏大可，国民饭店董事长潘子欣，直鲁联军时期警察厅庶务主任、后来盘踞英法租界的陈友发，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曾控制过内河航运公会的张英华等皆是。

七、日本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清帮的控制

漕运水手、搬运脚夫及其清帮来到天津之后，除了向脚行业发展之外，也还向其他行业发展，只是不如在脚行业中的发展壮大。其中一个仅次于脚行业的去处就是到军阀队伍里当兵，清帮也自然一起带了进去。为了有效地控制这等士兵，许多军阀本人及其官佐也都入了清帮。如国民军总司令张之江，直鲁联军占据天津时期当过直隶军务督办的李景林、褚玉璞，定居天津当过山东督办的张宗昌和第四师师长陈乐山等等，就都是清帮分子。他们加入清帮的目的当然是想控制这个组织，但没有一个开山门收徒弟的，所以也就形不成一股势力。

天津沦陷期间，日本特务机关大力支持袁文会，1942年让他组织一个公开的机构“安清道义会”，请出清帮“江淮泗”帮头、“大”字辈老头、曾任前清河南总镇的吴鹏举应名为会长，实际会长为盐商、“大”字辈的王慕沂，袁文会、张逊之为副会长，王大同为顾问。该会成立后，天津清帮各派势力暂时协调，但却完全掌握在日本特务机关手中。

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被关押。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把清洪帮控制在手以供驱遣，并指派原由北京来上海的清帮“嘉兴卫”“通”字辈老头金玉波来津协助。由于天津清帮派系之间无法协调，只好分别成立两个组织，一是“忠义社”，后改名“忠义普济社”，由陈仙洲亲任理事长，巴延庆任副理事长（一说由张俭斋、朱佑衡任副理事长）、姜般若任顾问；一是“共济社”，由张逊之任理事长。忠义普济社有九个分社，绝大部分都是脚行组织，共济社自然比较斯文些。他们又都成了军统外围。前者基本上是个脚行组织，只是由于袁文会在押，改换了其他脚行头子巴延庆、刘德山、马文元之流是了。

后者的成分不象前者的单一，而且收罗了脚行之外的各行各业。故虽有些知识分子在内，基本上仍是个杂糅各种社会垃圾的集团。

这些社会垃圾，在解放前夕只有个别的逃离大陆，如清帮头子、国民党参议员刘广海，但绝大多数都没有漏网，罪大恶极的如袁文会、巴延庆、张逊之、刘德山、翟春和、王士江、王士海、马文元等均被枪毙，从而结束了清帮在天津的罪恶历史。

八、袁文会与巴延庆

各地清帮组织和分子有一条通例，即他们所把持的行业都少不了是脚行、赌场、烟馆、妓馆、旅馆、澡堂、戏园、饭店、茶馆、渡口、车场、杠房等等。这些行业都是公共场所性质的营业，必须广泛接触社会，包括社会的黑暗角落。这些行业来钱比较容易，也最容易出事。因此必须由清帮之类的分子们来经营，至少也要有个清帮之类的分子当做“顶门杠”（或“后戳儿”），否则是开不成的。他们当然也会依靠官方和军警来支撑，但绝不能单靠这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法的勾当，也必须与清帮勾结，如贩毒、贩卖人口、走私团伙、盗窃团伙、土匪、票匪之类。再有就是有政治背景的行径，如特务、打手、保镖、刺客等等，也常常离不开清帮之类的分子。

在天津，所有这些行业应有尽有，它们也是无例外地全部由清帮分子经营、包揽或支撑。因此如果要举出天津的清帮人物加以介绍，就必须包括各行各业，那将是举不胜举的。上文说过，天津清帮的一个特点就是以脚行把头及其徒众为主要成分的清帮组织占了绝对优势，各行各业尽管都有清帮人物在把持，但都要买他们的帐，稍拂其意，必然会自找没趣。外地跑海来的，别管是多高的帮头辈次，也别管是有多高的声望势力，来到天津虽是竭力巴结交好他们，最后也难免被排挤的下场。不但如此，就连帝

国主义分子，对于他们也要优礼有加，有时甚至要矮上一头。所以我们举出脚行中的清帮典型人物袁文会、巴延庆，就可以窥豹一斑了。

袁文会，天津人，生于1901年。他父亲就是一个脚行把头，他在15岁时就接替了这个职务。他的叔父袁国瑞（人称袁八）是日租界芦庄子中局脚行的把头，又在芦庄子鸿义栈开设一个赌局，袁文会从很小就混迹在这里，到20岁之后也与袁八一起经营起来。在这期间他又两次跑到军阀的特务部门去充当特务，曾充褚玉璞的特高科副科长、袁振青部的高级密探处密探，但时间都不长，又回到他的脚行、赌局中来。在他当特高科副科长时拜了白云生为师入了清帮。当时他26岁。入帮之后又拜日租界警察署（俗称“白帽衙门”）侦探长刘寿岩为干爹。在他28岁时又自己在日租界新旅社开了一个赌局，不久又在旭街开设一个德义楼烟馆（一说为会德号烟行）。至此他已是操纵着两个脚行、两个赌场、一个烟馆，又有清帮、军阀、特务和日本势力庇护的年青霸主了。在此之后，他又经过不少大的考验，赢得清帮分子的“拥戴”，最后成为全市的清帮魁首。

袁文会经受的第一次考验就是上述的与苏莲舫争夺赌局的斗争，他胜利了。第二次是他开了烟馆之后，烟土全靠陆运海运两路走私贩来，但陆运的全由东站把头吴六把持“下货”，海运的则由大沽把头王八把持“下货”。为了争夺这两处的权利，袁文会派出打手，经过搏斗，吴六、王八甘拜下风，从此袁文会全部垄断了天津的鸦片走私生意。第三次考验是1935年袁文会与刘广海的一场斗争，结果仍是袁胜刘败。当时日租界蓬莱街太平里有个大赌窟，赌法叫做“三十六门花会”，类似押宝，但赌者不一定到花会来，通过“跑花会的”就可押上哪一门，因此它是个全市性的赌博。这个花会虽不是袁文会所开，但他却是花会的“顶门杠”。平日拿“挂钱”，有事由他顶着。一次西头大清帮头子、大土棍刘

广海带着他的打手宋国柱到花会来，袁、刘素有嫌隙，以为刘此来必是寻衅，遂命手下动武，刘逃走，宋被捅死。刘向法院告发，袁在其干爹刘寿岩庇护下逃往大连暂避。袁在大连结识日本特务小日向，不久返津，经小日向介绍当了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

通过这几次较量，袁文会制服了他的所有对手，特别是当上日本宪兵队特务队长，更是如虎添翼，天津下层社会帮内帮外各式各样的人物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地来的，谁都要买他的帐。他自己的直接弟子有600多人，分布遍及全市。当时袁文会的威信确实是高，凡是能与他接上些关系的，哪怕是用他一个名字，就可以“无往不利”，不用说袁的直接弟子们了。

大约1935年前后，由河东的几个清帮、脚行头子、恶棍之类的人组成一个盗窃团伙，最初只有6个人，到40年代初发展到六七十人。这个团伙没有名字，人称“十大股”。他们专门盗窃轮船、仓库、铁路、工厂的物资，如粮食、钢铁、建筑材料，进出口商品如皮张、百货等等无所不偷，偷来后即在市场倒卖，这是无本生意，自然所得甚丰。他们分赃时将得款做为10股，然后按大小头分配。这个团伙的头子本是春和脚行把头翟春和，与袁文会并无直接关系。因翟与袁同是日本宪兵队特务，翟又是袁的徒弟（一说是“悟”字班王凤林的徒弟）和义子，为了“孝敬”袁文会，翟春和等竟然允许将10股中的3股奉送给袁，翟得2股，其余五股再按大小头儿俵分，于此可见一斑。

袁文会的成长自然还与投靠日本特务是分不开的。他与日本特务机关的勾搭并非始自在大连结识小日向，而是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九·一八事变后仅两个月，日本又利用“便衣队”制造“天津事变”，袁文会就是这个“便衣队”的招募和组织者。1933年后，他又多次派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诱骗壮丁，押送至海光寺日本兵营修筑工事。日本怕泄露军事秘密，事后将壮丁杀死灭口，弃尸海河。1935年袁文会自大连返津后又在日本

特务指使下，与清帮头子张逊之等在日租界组织“普安协会”，厉大森为会长，张任宣传部长，袁为行动部长。该会成立后大肆制造“华北自治”舆论，为日本侵吞华北预留张本。1937年七·七事变后，袁文会成立一个“会记公司”（一说名“会德号”），通过其清帮弟子和爪牙大抓“华工”，送往日本及东北。据不完全统计，通过会记公司及其他途径从天津口岸劫走的华工不下四五十万，而很少生还者。1938年袁文会在日本特务机关指使下，纠集土匪头子马成昆、王海明等成立“袁部队”，自称司令，以日本人济川为顾问，在霸县、廊坊一带骚扰地方，进攻解放区。他还派其手下的“四大金刚”郭小坡、国文瑞、祁国富、李子扬等四出侦捕抗日地工人员，收集解放区及八路军情报，供给日本特务及军警机关。袁文会为了取悦于日军，更丧心病狂地指使在他控制下的乐户业清帮头目李万有等成批地驱使妓女至日本兵营，其中多有被蹂躏至死者。

袁文会的罪行尚不止此，诸如拐卖人口、霸占妇女、暗杀、绑架以及巧取豪夺之类擢发难数。但抗战胜利后由刘广海的手下人高玉璞将他扭送法院，经肃奸委员会起诉，才判了他7年徒刑，他在狱中3年，被待如上宾，解放之后才予正法。

巴延庆，天津人，回族，生于1897年。他是河北大街脚行的世袭脚行头子。其父名巴有顺，巴延庆十几岁时就接替其父的职务。河北大街是天津开埠之前最为繁华的商业街之一，运输业务自然很发达，尝历二三百年不衰，因此独占这一带的河北大街脚行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巴延庆在接替脚行头子之后，也曾到军阀部队和特务部门当过护兵、排长、稽查，为时也不长就又回到本业。在这期间他曾拜白云生为师入了清帮，即与袁文会为同参弟兄。1925年起他又在老爷庙开设一个赌局，盘剥欺诈赌客，每日收入可达数十银元。1935年巴延庆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在这以前，他又

加入了姜般若开的“太行山兴和堂”，取得了“双龙头”身份。1937年后巴延庆又勾结日寇充当了新民会运输分会会长、运输职业公会理事长。日本投降后，又继续担任国民党天津区党部委员、三青团运输分团主任、运输公会理事长、全国总工会常务理事。他与军统特务陈仙洲共同组织清帮社团“忠义普济社”后，在脚行业中大量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和忠义普济社社员（也即军统外围分子）。由于他如此“效忠党国”，1947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天津市参议员、市党部督导委员以及戡乱委员会党务委员。

巴延庆行大，人称巴大爷。他的脚行即在河北大街，每日进市必由之径是北大关桥。这是南运河上的一座浮桥，每天定时开启，谓之开关，即将浮桥中间的一排浮船撑开，让河内船只通过。有时正在开关，“巴大爷”的包月车要通过，司关人员即须令河内船只停运，将浮船合拢，待巴通过后重新开关。

巴延庆在抗战胜利后成为继袁文会之后不可一世的人物。主要就是他接收了袁文会的全部班底，凡袁的徒子徒孙、势力范围、勾挂的各方关系，都转移到巴的手中，并且还有所发展，即他投靠了国民党，从而成了全市脚行、清洪帮的盟主。这个局面形成之后，不管是脚行业中的什么“四霸天”、“八大金刚”、“十大股”、“十四友”等等都要由他号令，甚至包括了脚行、清洪帮以外的地方恶棍之类。实际上，由于他首先将这类人等都已拉入了国民党、三青团、忠义普济社等组织之内，所以也就等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掌握了全市的黑帮人物。

1947年6月2日天津市人民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直接指示巴延庆进行破坏，巴指使同议脚行头子、清帮头子、运输工会常委、忠义普济社八分社社长、三青团十一分团区队长、人称“黑手刘三”的刘德山等10余个头目率领打手，伪装学生混入游行队伍，在东马

路、罗斯福路（今和平路）一带以木棍、皮鞭、铁钩殴打学生、工人多人，造成震动一时的大血案。

1947年东站东货厂“六号门”搬运工人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斗争，要求脚行头子马文元改变劈成比例，提高工人待遇。马文元通过巴延庆由警备司令部派出大批军警特务镇压工人，逼令工人复工。马文元对工人们狂喊：“小子们要反哪！马二爷的钱是大风刮来的，豁着一天的钱不要，买你们的命！”但最后还是工人胜利了，马允许将东货厂的“自理货”按对成劈帐。

1948年天津市社会局抽调了一批反动的脚行头子至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接受“反共”、“防共”任务。回津后即由巴延庆派遣其中骨干人员参加警备司令部的镇压革命活动，他们广布耳目，搜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并且大量搜集情报资敌。

1948年底解放大军逼近天津，陈长捷疯狂搜捕壮丁、平毁村庄、修筑工事及机场，凡此种种，都是巴延庆召集全市脚行头子计议之后驱迫工人干的。

天津解放后不久，巴延庆、刘德山、马文元等20多人在旺道庄、西老公所等地秘密集会10余次，策划对付共产党的办法，甚至派人去北京向华北人民政府告状，要求保存脚行制度。巴延庆如此嚣张，当然是垂死挣扎了。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天津清帮见闻杂记

周恩玉　刘炎臣

清帮是随着当年由南而北的漕运出现的，而其发展和日益嚣张的活动，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才开始的。当时北伐革命大军正节节胜利地向北方推进，垂死的北方军阀残余直鲁联军头头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等盘踞山东、直隶（今河北省），正做着最后的挣扎。1926年褚玉璞进占天津当了直隶督办之后，他手下的天津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原是山东清帮大字辈头子），为扩展个人势力，便在天津组织清帮活动。由于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全是清帮头子，在他们支持和纵容下，厉大森利用他是清帮二十一代“大”字辈的老资格，开始在天津收徒弟。厉大森的徒子徒孙和其他落脚天津的不同帮派的清帮，以及许多脚行把头们，也均在开山门，摆香堂，各自纠集门徒，使清帮的组织谱系在天津日益膨胀，他们为非做歹，甚至与日本人相勾结。与此同时，由于处于战乱年代，失业者多，谋生不易，不少人幻想能得到清帮“义气”的帮助，免受恶势力的欺压，纷纷想办法参加清帮组织，以求自保，其中包括很多公教人员和买卖人。因而清帮人员遍布天津各个角落，究竟共有多少清帮人员没有确切数字，当时凡参加清帮的，每人都有一个折子，上面写着本人的姓名、住址，“香头多高”（即辈数多高），数哪个帮派，师父是谁和帮内的一切帮规条款等等，这叫做“海底”，也称“通草”。但因时过境迁，人事凋谢，难得其全，故知之不详了。在这里我们仅就为人们所熟

知的一些在天津的清帮人员，按照他们参加的清帮帮派、辈数，列出谱系，并简述其分据的不同角落，以及他们残害人民，彼此倾轧的情况，从这里可以窥见他们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系。遗漏和错误势必难免，敬希指正。

天津清帮的部分谱系

本世纪20年代到天津解放前这20多年里天津存在的部分清帮，除前十四代中第二十代“礼”字辈的李金鳌外，主要是最后四代的大、通、悟、学四辈。

李金鳌，天津西头永丰屯人，清末曾同贾凤雄去上海，闯荡江湖，30年代初病逝津门故里。

二十一代“大”字辈：

王宝元，山东费县人，嘉海卫帮，白云生的老师，曾在李景林部下任连长。

袁克文，字寒云，河南项城人，为袁世凯次子，在上海进家，是由师兄代收，兴武六帮。在上海、天津等地收有很多徒弟，独自成为一种势力，1931年死于津门。

吴鹏举，江苏沛县人，江淮泗帮。曾任天津内河航运公会会长，天津“安清道义会”会长，称霸天津河北大街、大红桥一带。

魏大可，字汉卿，山东巨野人，嘉白帮，是张垂恩的徒弟，与王大同为同参兄弟，曾收日本人土把原贤二为徒。晚年自号“奇叟”。

王大同，又名约瑟，山东沂县兰陵镇人，自称是南洋船主郑老板的徒弟，嘉白帮，曾是基督教徒，去过南洋，曾在北京、上海、太原、天津等地，广收军政界和大商贾为徒，如何应钦、张宗昌、杨宇霆、刘多荃、王靖国、陈觉生、冯司直等，均为其清帮弟子。此人穿着和行动均极古怪，行动诡秘，被认为是江湖骗

子。

王慕沂，住天津法租界宜友坊。曾任天津德兴盐务公司董事长，恒源纺纱厂副董事长，天津“安清道义会”会长。

张英华，原是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日伪时任天津内河航运公会副会长。

厉大森，山东人，原是山东清帮头子，曾任天津军警督察处处长，为褚玉璞的清帮老师。

贾长清，为杜记脚行把头杜洲和称霸丁字沽的王十海的清帮老师。

二十二代“通”字辈：

白云生，山东历城人，为王宝元的徒弟，曾在厉大森手下任职，在天津开码头，收牛占元、袁文会等为徒，党羽极多，20年代到40年代，名闻津门。

张凤岭，山东人，兴武泗帮，为赵德成徒弟，精通清帮“海底”，住天津敦厚里。

魏子文，安徽芜湖人，为王大同徒弟，在天津经营货货业，字号叫“大事全”，承包红白事，人称“魏小辫”，曾在天津内河航运公会任科长。

杨锡庆，天津人，为吴鹏举徒弟，绰号“小刀子杨七”，曾在天津东马路开办国民戏院，1940年随其师吴鹏举任天津内河航运公会科长。

张逊之，河北深县人，曾任天津《大公报》采访主任，利用清帮，到处伸黑手，既亲日寇，又参加国民党军统组织。

陈友发，天津人，为天津英法租界清帮头子，与英租界警务处长李汉元关系较近，曾任天津警察厅庶务主任。其所收门徒，多是英法租界内商号经理，海关外班职员，报关行人员，在出进口贸易界吃得开。

管兴权，北京人，嘉白帮，曾任天津北洋戏院经理。

管华亭，天津人，侯家后一带清帮头头，曾任天津侦缉队队长，东来轩茶社经理。

王文德，天津人，嘉海卫帮，为刘广海之师，在西南城角一带称霸。

王十海，天津丁字沽人，为贾长清之徒。日伪时任河防队队长，收徒千余人，在丁字沽一带称霸。

张士骏，号子腾，执行律师业务，为厉大森之徒。

毕馨斋，为袁克文之徒，天津安利洋行买办。

王汉臣，袁克文之徒，英商天津驳船公司华帐房买办。

李明德，为袁克文之徒，外号“山东李”，为天津赛马会霸主，专欺压工人。

刘玉汉，为魏大可之徒，曾任北京世界白字乐会总会会长。

陈翰卿，为陈友发同参兄弟。

杨彩亭，为吴鹏举之徒，侯家后“八大亭”之一，曾任天津内河航运公会会计科长。

孙绍亭，为王大同之徒，在天津日商大仓洋行工作。

韩翠玉，天津人，妓女，厉大森义女，为天津著名女霸。

王金标，原是上海警察局督察长，后来参加汉奸殷汝耕组织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任高参。与日本人小谷晴亮勾结，在天津卫南洼强占民田，改种水稻，大发其财。

二十三代“悟”字辈：

牛占元，天津人，白云生开山门的大徒弟。英租界著名混混儿。

殷凤鸣，天津人，白云生之徒。

袁文会，天津人，白云生最出名的徒弟。

王恩贵，天津人，白云生之徒，南市庆云戏院股东经理。

刘金铭，天津人，白云生之徒。

郝祥金，天津人，白云生之徒，南市群英戏院经理。

王凤池，天津人，白云生之徒。南市开明电影院股东，东兴市场霸主。

刘宝珍，天津人，白云生之徒，南市鸿义栈宝局主人。

方明，天津人，白云生之徒。

王恩富，天津人，白云生之徒，外号“小王老”，掼跤能手。

郭茂林，天津人，白云生之徒，身材高大，举重能手，外号“郭大个”。

房树恩，天津人，白云生之徒，外号“房大个”。

王平，天津人，白云生之徒，外号“秃王平”。

郭筱波，天津人，白云生之徒，天津日租界北洋饭店经理。

国文瑞，天津人，白云生之徒。

李子珍，天津人，白云生之徒，人称“李二弟”。

王恩荣，天津人，白云生之徒，南市大舞台经理。

诸葛玉发，天津人，白云生之徒，大舞台经理。

李锡武，白云生之徒，南市丹桂电影院经理，外号“面茶李”。

祁国富，白云生之徒。

赵大鹏，白云生之徒，教武术，外号“镇南洼”。

刘静山，白云生之徒，英租界祥泰义商店经理，天津市干鲜果业同业公会会长，敌伪时天津市商会会长。

刘恩第，白云生之徒，日本宪兵队长池上的翻译。

段恩荣，白云生之徒，举墩子出名，在天津南市是举重能手，人称“段六”。

张乐勋，白云生之徒，文安县土匪。

李景文，白云生之徒，沧县惯匪。

刘广海，天津人，王文德之徒，天津西方帮主，青年党党员，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察处成员。

宋国柱，刘广海师弟，在万国公寓械斗中被杀，外号“宋秃

子”。

杨俊，天津人，原为刘广海派，后投袁文会，当过伪警察，南市庆云戏院后台负责人。

王如兴，天津人，原为刘广海派，后投袁文会，乐乐剧场经理，干过凤来阁妓院，收佟海山为徒。

苏莲舫，秦老头子的徒弟，兴武六帮。在日租界新津里开赌局。

周孟楼，袁文会的师弟。

高登第，组织京剧班，并教摔跤。

陈宝善，北马路华北戏院股东、经理。

柳小五，白云生之徒，武清县人，初以贩卖鸡子为生，日伪时投靠日寇，组织“柳部队”，为敌对手所杀。

张德广，白云生之徒大城县土匪。

王鸿绪，汉奸张璧之徒，劝业场华清池澡塘经理，天津市澡塘业同业公会会长。

刘金标，为王文德之徒，外号“细胳膊大王”，称霸天津西头。

姚好成，天津人，西南城角德利香糕点店经理。曾资助过刘广海，以保火险而私自放火得赔款发财。

三十四代“学”字辈：

佟海山，天津人，王如兴的徒弟。天津河东地道外“黑旗队”头头，组织评戏班，在南市升平戏院演出，因霸占小白玉霜，与曹锐之孙曹郁文发生争执，被天津稽察处处长白世维枪决。

佟大姑，佟海山的姐姐，在河东地道外有名。为给乃弟报仇，曾向北京行辕控告白世维，但无结果。

李子扬，袁文会的徒弟。

王金才，山东乐陵人，王凤池的开山门大徒弟，外号“少王爷”，无恶不作。收徒杜金衡、穆来子。

邝克俭，袁文会的徒弟，是万国公寓械斗血案中捅死宋秃子

的凶手。

从以上所开列的清帮的天津的四代部分谱系看，有二十一代“大”字辈9人，二十二代“通”字辈20人，二十三代“悟”字辈39人，二十四代“学”字辈5人，共计73人。这都是在30年代前后为津人所知的。

大字辈的9人和通字辈20人，人数虽少，师承较杂，各有其企图。人数最多的是悟字辈的39人，而在这39人中，白云生的徒弟有29人，王文德的徒弟和与他有关系的有6人。白云生与王文德，全是同厉大森有密切关系的。据此而言，当时清帮在天津的势力，可以说以厉大森为最强大。

厉大森在直鲁联军的褚玉璞任直隶督办时，任天津军警督察处处长，声势震动一时，白云生是依附于其门下名字叫得最响亮的。而白云生的徒弟又以袁文会最有名，其他如在日租界和南市一带开赌局、烟馆、妓院的国文瑞、刘宝珍、傅家馨、杨俊、李子珍、王恩贵、王如兴、郝祥金、陈宝善以及后来在日伪统治时期任伪天津市商会会长的刘静山等，全拜在他的名下。白云生对这些人的做恶活动，都曾给以支持，成为黑社会的幕后策划者。早年在天津帮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白老头”就是他。

袁文会，在天津清帮中，只是悟字辈，但他在解放前20多年里，做尽了坏事。他为争夺赌局生意，派他的徒弟王平，到日租界新津里搅散了苏蓬舫的赌局，使他的赌局独占上风。他又为了争夺东车站运烟土码头，派郭筱波和国文瑞，找河东清帮头子吴六挑衅，迫使吴六让出了东车站运烟土码头。袁文会还与刘广海较量，1935年在南市万国公寓发生了一场械斗凶杀案，刘广海的门徒宋秃子被捅致死。从此刘与袁仇上加仇，形同水火。后刘广海避居香港，抗战胜利重返津门，袁文会已被捕入狱，直至解放后镇反时，才在人民唾骂中伏法，而刘广海则逃往香港。

与白云生同是厉大森徒弟的张逊之，1926年来到天津，混入

新闻界，收徒弟达1000多人。他与白云生、袁文会等勾结，处于出谋划策的军师地位，更增强了厉大森系统下的白云生与袁文会等的黑势力。其他如王士海、刘广海、佟海山、陈友发，分别称霸于丁字沽、西头、河东地道外、英法租界等各个角落，还有各据一方的脚行把头和清帮与日本势力的相勾结、相利用。

天津清帮中脚行把头

旧天津的搬运业，向为“耍胳膊根儿”的脚行把头所把持，这些把头多参加了清帮。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天津市约有脚行头子3032人，其中大把头901人，在这些大把头中，有422人[①]是参加清帮的，几占1/2。他们不仅欺压商民，而且互相倾轧，弱肉强食。

天津最早的脚行，始于清朝初年官方组办的“四口脚行”。所谓“四口”，就是按照天津四个城门划分地段：东门一带为“东口”，西门一带为“西口”，南门一带为“南口”，北门一带为“北口”。这四个口，各按划定的地界，应承“迎官接差”的任务和为商民搬运货物，称为“官脚行”。后来因为搬运业日多，为适应这项需要，天津县衙门，采用投标办法，把“四口脚行”包给出钱最多的私人经营，从此产生“私人脚行”。1860年根据与英法签订的《北京条约》，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首先出现了英、法、美三国租界，不久又修建了老龙头车站（今天津东站），货物的输出输入，逐渐频繁。于是又相应地有了码头装卸脚行、车站装卸脚行、驻厂装卸脚行等等组织，遍布天津城厢内外。各口的脚行，分由大小把头们把持，形成子孙世袭的封建集团，并且很快与帝国主义势力结合起来，成为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统治机构的

① 《清帮在天津的流传》一文中为576人。

组成部分。他们分立门户，把持街头，藉端肇衅，扰害商民，讹诈钱财，为争行市，各不相下。许多脚行大把头们，既是清帮，又是洪帮，有的还参加其他反动会道门。如袁文会、巴延庆、刘德山、翟春和、王士江、马文元、华凤林、李竹坡等，均是清帮大头目。

1937年日军侵占天津后，为了全面控制天津市各处脚行，特意支持袁文会和巴延庆。袁文会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大肆扩张他叔父袁国瑞开设的"中局脚行"，独霸天津日租界北部和南市一带。其门徒吕春和、董文正等，把小刘庄、南营门外等地老脚行头子赶走，把持了那一带地方，扩充了地盘。

河北大街脚行世袭头子巴延庆，曾拜洪帮头子姜般若山主为盟兄，成为洪帮头子，属"太行山兴和堂"，后又参加了清帮。他当过赌棍、毒贩、军阀的护兵、褚玉璞的手枪排排长。抗战胜利后，参加"复兴社"，当了天津市"参议员"、"国大代表"、国民党天津市的区党部委员。1936年他推倒了延续200多年的"官脚行"——"四口脚行"，成立"天津运输业同业公会"，自任理事长，统治全市各脚行。天津市沦陷后，他仍然是"天津运输业职业公会"理事长。巴延庆每次过生日，天津市各脚行均送礼，这些礼金都是摊在每个搬运工人身上。常是借词"飞帖打网"，供其挥霍。

同义脚行头子刘德山，既是清帮，又是洪帮，是天津脚行大把头巴延庆的主要打手，有徒弟300多人。他担任"天津运输工会常务理事"、"忠义普济社分社社长"、"天津三青团11分团"区队长。他对人对事，手狠心毒，绰号"黑手刘三"，又称"北霸天"，在估衣街、东北角一带的商店，家家都曾受过刘德山的讹诈。一次他以自行扎伤腿部的流氓手段，向正兴德茶庄勒索300元。天津解放后，他恶习不改，曾带领打手，去到东马路邮局，强行装卸包裹，否则须给他"搭肩钱"，混不讲理，大耍无赖。尤其令人

气愤的是，他钻进天津运输公司第五办事处二十一工作组第三分队后，操纵亲信爪牙，煽动落后群众，竟提出“打倒服务社、拥护旧脚行”的反动口号，图谋不轨。

春和脚行头子翟春和，天津人，祖居东浮桥附近，乳名“老庙”，以摆摊卖菜为生，人称“翟瞎子”。

天津海河西岸东浮桥菜市，成立于清朝光绪年间，在天津警察厅前身北司衙门南侧。北自东浮桥，南至电信局，是早年自然结合的天津唯一最大菜市场。当时津郊乡镇菜农运菜进城，陆运较少，多从河运而来。地头蛇恶霸们，为争夺这菜市场屡出人命。

翟春和为争夺天津东浮桥菜市一带地方，曾先后发动三次械斗。1935 年 11 月间，他与另一个把头为争夺东浮桥菜市，纠集了 300 多人，参加械斗。还有一次以钢刀刃自己的头，胁迫脚行工人参加械斗，并亲手杀死他的表弟，以诬陷对方。

翟春和靠东浮桥菜市发家，但离不开河运，他要找个硬靠山，遂拜日伪时期的河防队队长王士海为师，加入清帮。在日伪统治天津时期，天津内河航运的总霸主，为清帮大字辈吴鹏举。吴的派系绝大部分是以河运为生的，尤其是天津的脚行把头，几乎全是他的徒子徒孙，因此翟春和即为吴系的二十三代悟字辈徒孙，与巴延庆、袁文会结成密切关系，从而更加有恃无恐，胡做非为。

翟春和对待他所属的脚行工人，敲骨吸髓，残酷剥削。如装卸一批货，所得到的费用，他自己首先要独得 60%，再经小头头们分别剥削，真正卖力气干活的苦工人，实际所得只不过是 10% 而已。他犹以为不足，还强迫所属脚行工人每三天给他“义务”一天，就是给他白干一天不拿钱，干完活各自回家吃饭。在哪一天装卸活忙，赚钱多，他就规定哪一天让工人“义务”一天。

翟春和除有 4 个大小老婆外，另有以干闺女为名的小老婆，多达 27 人，还霸占其他脚行工人之妻和奸污南市女演员多人，罪恶滔天，被称为天津“十大恶”之一。

1949年天津解放，翟春和见大势已去，又恐人民政府和东浮桥菜市受他欺压的群众找他算帐，便带着现金，自毁了面容，只身逃往香港。不久因所带金银在香港挥霍一空，又返回青岛，终被我公安人员抓获回津，1950年镇反时被枪决。

全记脚行头子王士江，为王士海之弟，称霸丁字沽一带。他吩咐他的喽罗们，对于在他管界内往来的客商车船，按照装运的货物多少，要给他送“车底”、“船头节礼”、“开贺”等钱，不然就不准许通过。凡有买卖房地产的，全要按照旧俗买卖双方“成三破二”的规定，给他提成。巧立名目，豪横敲诈，也是天津“十大恶”之一。

东货厂脚行头子李恩第、佟少田，勒索讹诈的手段，也是非常残酷的，每天的剥削所得，可以折合面粉30袋左右。解放后搬运工人们跟他们展开了反剥削的斗争。有的工人向佟少田清算积欠的工资，他拿出来的钱，都是从地下刨出来的带有绿锈的银元。李恩第和佟少田，都过着糜乱生活，每人家中除养妾二三人外，各有外家10余处。佟少田曾是洪帮的“巡风”，后又拜清帮大头目张逊之为“老头”，得以为所欲为。

东货厂另一个脚行头子马文元，剥削工人极为苛刻。1947年搬运工人们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罢工，向马文元提出改变分成的办法，以提高工人的待遇。马文元勾结天津警备司令部，派出了大批军警、特务，镇压工人们的斗争，并到处搜捕工人，逼令复工。马文元如此嚣张，经过这场斗争，他还是被迫作了让步，允许把东货厂自理的——由单帮客商运来的货物工力费，改由工人和脚行各分一半。

把持西货厂的七树脚行，号称“十四友”。他们为了对付所属工人和有关部门，主要头头儿们郭万春、李竹坡、李金奇等，分头负责与法院、讼棍黑律师、铁路局联系，并豢养着“黑旗队”头头佟海山，做为他们的护身符。此外他们的脚行办事地点，与天

津警备司令部装有专线电话，在李竹坡家里安装了直通天津警察局的警铃。一旦发生什么事故，立刻进行联系勾结，采取应付办法。

小于庄的德顺成脚行头子于存，在天津解放后仍不老实，以拉拢腐蚀干部的恶毒手段，威胁工人，强迫选他当队长。于存嚣张地嚷："小于庄不准外人当队长！"并派出他的本族几个打手，四处搜集情报，谁向上边反映他的劣迹，就跟谁打架做对。

在天津脚行队伍中称王称霸的，还有五村脚行的华凤林、小刘庄摆渡口脚行的张凤楼、大连码头脚行的杨聚祥、招商局码头脚行的"八大金刚"、石桥口袋班脚行的"八大怪"、紫竹林脚行的"三霸天"、把持东门和鼓楼一带同议成脚行的"四霸天"、杜记脚行被称为"杜扒皮"的杜洲、受美国德士古煤油行和比租界支持把持大直沽一带的通和成脚行等等。

日本侵略者与天津清帮的勾结

在30年代左右这20多年里，日本军国主义者与天津的清帮组织，形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日本人通过与清帮的拉拢，刺探我国各方面的情报和攫取经济权益，在天津的清帮头头们，则利用日本人的势力，以加强其各自的组织力量。因此，有不少日本特务，得以很方便地混入了天津的清帮组织，进行对我国的侵略。

日本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早在20年代初，就与另一个日本人富永启堂，投拜清帮大字辈魏大可为师。从此，土肥原加强了其所肩负的间谍活动，富永以中国姓名王永良的姿态出现，控制着世界白莲字会，担任该会的常务理事。

日本黑龙会分子小日向，为了收买袁文会，特投拜清帮头子大字辈王大同为师，得以挤进新成立的"普安协会"并担任了常务理事。该会会长为厉大森，张逊之与袁文会分任"宣传部长"和

“行政部长”。小日向时常接触袁文会，实现了他对袁进行拉拢收买的阴谋。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成立了“天津内河航运公会”，由清帮大字辈头子吴鹏举、张英华分任正、副会长。日本人为便于直接控制该会，特安排特务机关的渡赖和小野正男，先后投拜吴鹏举名下，渡赖担任了该会的常务理事，小野还开了山门，吸收徒弟，为他们直接控制该会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控制1938年成立的“河防队”，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天津铁路局水上警务段长山田本一和警务段司法主任执任省三，先后拜清帮大字辈头子张英华为师。

还有曾任土匪汉奸刘桂堂“自卫军”顾问的木村伊助，在天津日租界贩毒的高桥和为日军部队承办物资的日商野崎等三人，为便于进行经济侵略，也拜通字辈白云生为师。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张逊之其人

胡君素　李树荣

(一)

张逊之原名梦湘，河北省深泽县人。其父务农，家境小康。其母早逝，遗有子女二人。其姐张润如适当时北京《晨报》编辑张琴南。张逊之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娶本县齐姓女为妻，生有子女各一。因张逊之常与继母口角，被其父撵出家门，张到北京后，在北京《晨报》刊登启事，与其父脱离关系，从此改名逊之。

那时在天津跑本地新闻的记者，只要有一台油印机，就可以办了一个通讯社。张逊之始而在李万钟办的中央通讯社当记者，继而在河北同春里自己办一个和平通讯社，以新闻记者身份出入各机关并藉机敲诈。例如有一次他到津海关监督公署采访，因传达室的人告诉他上午没人，请他下午再来，他便发稿说津海关公署是半日衙门，结果由津海关公署给他 50 元才算了事。

当北伐军逼近武汉，大革命达到高潮时，《大公报》经理胡政之授意地方新闻版编辑何心冷在津市各通讯社中罗致一些记者，张逊之被《大公报》录用，并渐升为采访部主任。于是他把和平通讯社让渡给了戴昕潮。

张逊之在《大公报》工作期间结识了日租界竹华书寓妓女花生春的鸨母张妈，从此他就以这家妓院为落脚之处。花生春的客人中，有一个日租界新旅社 14 号的鸦片商人谷景三。谷替流氓军

阎孙殿英销售烟土，与孙殿英驻津办事处的张子宾、萧子仪过从甚密，终日在花生春处留连。张逊之由张妈的关系而结交了谷、张、萧三人，也开始参与贩毒，并到处吹嘘他与孙殿英的关系。有时，张逊之也从孙殿英那里弄点特别新闻在《大公报》上刊登，同时替孙殿英鼓吹。当孙殿英因东陵盗宝事引起全国哗然，各报纷纷刊载这项新闻，孙殿英的驻津办事长相国庆为了缓和舆论，通过张子宾、萧子仪请张逊之设法控制。张逊之让相国庆先在国民饭店举行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给记者们抹抹嘴头，然后他再以《大公报》采访部主任的身份，暗中加以疏通，结果津市各报对此项新闻的报导有所缓和。东陵盗宝案平息后，孙殿英来津，住在国民饭店。这时张逊之已拜房大森为师，进了清帮，与孙殿英更加气味相投。孙殿英为答谢张逊之，赠给他一颗从慈禧太后墓中盗出的大宝珠，据说是含在慈禧口中的殉葬珍品。

1928年河北省平津地盘为阎锡山控制，崔廷献接南桂馨出任天津市长，他极力拢络天津地方士绅，讨好地方人士，并拉拢新闻界。当时市政府所属局机构，新闻记者可以随便出入。这时的张逊之，不仅是《大公报》的采访部主任，而且兼任上海《新闻报》、北平《晨报》、沈阳《辽宁新报》的特约记者，自然更受到崔廷献的重视，除每月给张以固定的津贴外，还对张的一切要求都予以满足。

1930年政府秘书长冯司直改任社会局长，特邀张逊之任该局秘书主任。张得意地对《大公报》外勤记者李树棻说："我既是《大公报》采访主任，又是社会局秘书主任，今后要配合起来干。"并说："天津的面粉公司操纵市场行情，弁取暴利，我们要一方面用报纸抨击，一方面由我用社会局为压力抑制他们，敲他们一笔大竹杠。"后因阎、冯、蒋中原大战，天津的面粉厂停工，张逊之的这笔竹杠未敲成。不久，张学良进关，张逊之的秘书主任也被更换。

（二）

国民党军统特务王天木曾在天津《华北新闻报》任过编辑，又短期在《大公报》任过记者，他利用这个关系网罗了一些新闻记者，如《治新日报》的记者马登明，《大中华商报》的记者范石青，某小报的记者毛夙吉等，建起一个情报小组。他们打着北平军分会的招牌，为非作歹。后因他们在意租界培植小学（现光复道小学）绑架姜桂题孙女案发，马登明及其他4个主犯被立即枪决，王天木被军统局关押。军统在天津的情报工作改由范石青负责，成员有毛夙吉和吕继望、戚南谱等。他们支持天津有名的大流氓、清帮分子刘广海，与天津另一个著名恶霸、青帮分子袁文会争夺鸦片烟土运输权等，终于引起了双方械斗。张逊之站在袁文会一边出面调解，请双方有关人员在南市登瀛楼饭庄吃饭，并借机与军统特务大讲交情。通过贿赂，张逊之与军统特务初步建立了关系，从此与他们配合做情报工作。

（三）

张逊之进清帮以前，袁文会在日本警察署白帽（日人警官）和侦探长刘寿岩的卵翼下，在芦庄子亨得利钟表行后胡同的家里开设赌局，其中以花会的三十六门最为害人。这种赌博方法是由南方人任渭渔引进天津又托庇于袁文会的保护之下搞起来的。有一种小册子详细记载这种赌法的内幕，张逊之不知从何处获得，就在《大公报》上连载披露，攻击袁文会的赌局。袁文会、任渭渔非常害怕，托人向张逊之说情，并请张在登瀛楼饭庄吃饭，张才停止登载。事后，袁文会每月初由竹华书寓张妈转致逊之500元，从此袁、张二人彼此形成默契。张逊之入清帮后为了进一步控制袁文会，除了显示他与国民党军统局的关系外，还经常在袁文会面前，凭藉新闻记者、采访部主任的身份，与河北省最高当政者

通电话，使袁对张敬而畏之。此外按清帮辈分，袁文会是“悟”字辈，张逊之是“通”字辈，比袁高一辈，袁几以父事张，不断通过张妈给张孝敬厚礼。

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自成一系，张逊之还自己开山门，在法租界丰泽园饭庄摆香堂，收徒弟，不到半年，就收了1000多门徒，这些人大多散布在各码头和各个行业中。由于张逊之有一定的文化，比起目不识丁的袁文会在各个方面都高出一筹，袁对张不能不甘拜下风，一切听从张逊之的领导，自己退居次要地位。

（四）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二十九军在长城阻击日军，冯玉祥由泰安到张家口与吉鸿昌、方振武合作，组织抗日同盟军，张逊之奉《大公报》派遣到张家口。这时孙殿英盘踞平绥路沙城附近，为邀买人心也派其亲信马济才到张家口和冯玉祥商量抗日事宜。后来张逊之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便以其与孙殿英有渊源，向戴笠自报奋勇，说他可以说服孙殿英不抗日，拉冯玉祥的后腿。于是戴笠从南京来津，会同张逊之，还有刘健群前往沙城，与孙殿英晤面。孙当即将驻守在康庄车站准备开赴张家口一团人调离了铁路线，并表示接受中央命令。此后，张逊之又通过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邵华，与C. C. 陈立夫建立了直接关系，进一步为蒋介石效忠。

（五）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以后，日军对华北步步紧逼，在政治上组织亲日政权，经济上大量走私。这时原张宗昌的日本顾问小日向，因与厉大森有旧，特来天津组建清帮普安协会。会址在日租界桃山街（今归绥道），后迁至东马路宣讲所（现市少年宫对面）。会长厉大森。由于厉大森已年近八旬，且鸦片烟嗜好甚深，

因此会中一切事务完全由张逊之操纵。张逊之到处奔波，积极发展会员为日本侵略者效劳。

这时军统局在天津负责情报工作的范石青已死，毛夙吉也转入日本红帽衙门（日本宪兵队）做情报工作。因毛吸食毒品白面，需要钱，便时常向张逊之借贷，张逊之难以应付，毛便衔恨于心，将张逊之与戴笠的关系报告给了日本宪兵队长蒔苗。正在这时，天津《振报》主办人白逾桓突然被刺，毛夙吉告诉蒔苗说张逊之是此案的主谋，因此张逊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张被捕后，厉大森请小日向设法援救。厉大森和张逊之在天津都有不小的势力，日本人还需要利用、控制他们，因此最后由厉大森出面，全体清帮人员做保，以张逊之永不背叛日本，为“中日经济提携”做出贡献为条件而获释。

张逊之被关押期间，天津《大公报》刊登启事，声明张逊之所为与报社无关，并将其开除。张被保释后，天津已经沦陷，他与军政等方面的关系中断，便想离开天津到外埠去创立码头，等待时机，为日本侵略者效力。他先到济南访问了全国各报的特约通讯记者何冰如，了解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然后由青岛转赴上海，经信记银号经理戴云标介绍，与上海清帮头目胡宝祥（河北青县人）商议开辟码头事宜。胡介绍他与上海警察局长卢英面谈。但上海沦陷后局势混乱，清帮首领杜月笙虽然离沪，但其势力仍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已分化，纷纷变节，投靠了日伪组织。张逊之在上海搞不出名堂，便又回到天津。

张逊之回津后，受聘于《庸报》，任副社长。这时天津《庸报》已被日本特务机关所收买，以台湾籍人李治堂为社长，编辑部主持人是三谷亨，营业部主持人是生一。张逊之在《庸报》并不负实际责任，而是以《庸报》为掩护，遍设情报网为日本人搜集各种情报。日本特务机关给他3000元做活动经费，另有1000元《庸报》副社长的薪金。张逊之只收活动费，以表示他专心为日本

特务机关做情报工作。

天津沦陷后《大公报》迁上海发行，其在天津的全部机器、设备交由副经理王佩芝保管。张逊之打着日本军部的招牌从王佩芝手中强行接收，而对日方却谎称以10万元购得，对外则宣称代《大公报》保全财产。他利用这些机器设备在《大公报》社原址开设了东方印刷所，自任董事长。印刷所除为日寇印刷反对中国政府的刊物或新民会的反动宣传品外，就是替日本人伪造冀东边区人民币。

（六）

自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几年之后陷入泥潭，广大敌后为八路军、新四军占据。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既然不能把重庆政府消灭，就急欲诱迫蒋介石向日投降言和。为此，日本特务机关派张逊之赴香港，由天津特务机关介绍他与驻香港特务机关的负责人和知鹰二（原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接洽，并在和知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活动。恰巧原天津《庸报》的创办人、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的董显光正在香港，由于同行关系，与张逊之早就相熟，因此由董显光陪同张逊之赴渝，并引见了宋美龄。张逊之向宋美龄介绍了华北沦陷后的情况和日本人让张转达的意见，宋对张奖励了一番，并发表张逊之为国民政府参事。张逊之返津后，由于圆满地完成了日本特务机关的任务，受到日方的嘉奖，仍由日本特务机关供给其活动经费，继续为日方作情报工作。

（七）

当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时，张逊之认为汪蒋合流大有可能，曾以天津清帮组织名义发出通电，呼应汪的和平运动主张，要中国人民停止抗战。同时，他又大开山门，收徒逾2000人，

并在日本特务机关长雨宫的支持下，组织“安清道义会”。会址在河北三官庙大街13号（现红桥区金钟小学）。新修建了安清家庙，开办了安清子弟学校。会长是王慕沂，张逊之和袁文会任副会长。会中一切章程都由张逊之一手拟定。王慕沂当时是个“牌位”，袁文会是下手，会中大小事务均由张逊之操纵，而实权操纵在日本特务机关手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逊之积极响应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大量搜集铜铁献给日本军部，支援其“圣战”。

（八）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大公报》在天津复刊，张逊之以保护《大公报》的财产为要挟，获取了一笔巨额报酬，购得哈尔滨道249号楼房一所，并把多年密不示人的国民政府参事委任状悬挂其间，以示自己为抗日有功人员。

这时潜伏在华北沦陷区的军统特务麇集到北平前进指挥所，当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拉拢伪军，组织反共情报网，张逊之此时以伪军宣抚使名义做拉拢伪军工作，并直接与军统特务少将白连城联系。抗战时期，白连城是天津新民洋行驻太原经理，常来往于北平、天津、太原之间，张逊之就是那时与白结识的，抗战胜利后，张逊之摇身一变，成为军统局抗日地工人员，继续担任军统外围反共情报工作，受军统特务金玉波领导。

陈仙洲任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时，为了扩大天津反共情报网组织，想依靠天津洪帮，便与张逊之商量成立两个组织，一个是“忠义普济社”，一个是“青年共济社”。前者由陈仙洲自任理事长，以洪帮分子为骨干，以有行商职业的清帮人物为对象，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建立10个分社，经费由各区分社自筹。后者以张逊之为理事长，以清帮分子为骨干，以各行业或公营机关的工会为对象，夹杂以国民党市党部的工运活动，连同塘沽区建立11个

分社，经费由总社发给（即由军统局直接拨给）。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逊之曾纠合他的青年门徒，组织起一个“青年读书会”，会址设在他家。成员有于彩新、刘拱辰、刘锡胤、徐新之等20人，后来人数增多，会址迁移到河南路清和里2号厉大森纪念堂。以后改组为“青年共济社”，参加设计（类似顾问）的有陈仙洲、张士骏（字子腾，律师）、齐联科（社会局科长）、赵遂初（商会常委）。“青年共济社”总社设秘书室、干事室和若干组。秘书室设秘书长1人，秘书若干人。秘书长是徐新之（金城银行的会计主任，森记稻香村的经理）。干事室设总干事1人，干事若干人。总干事初为刘爽（千里），后为张威侯。内部事务由4个组分掌，计总务组，组长刘拱辰；调查组、组长王鑫培；通讯组，组长李玉堂；社会组，组长单某（实际此组未形成）。外部事务由20个组分掌，计码头组，组长萧魁升；海河组，组长李文元；商联组，组长王鸿绪（华清池澡塘经理）；电信组，组长刘文清、吴锡三；电车组，组长回云浦；铁路组，组长王惠卿、刘仙洲；此外还有电力组、纺织组、制车组、化工组、新闻组、印刷组、乡村组、武术组等。所有这些人选都由张逊之亲自选定并直接受张逊之指挥。这样张逊之把全市各个角落、各行各业都组织利用起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得到军统局的赏识。

当全国掀起反内战、反饥饿运动高潮时，各大城市纷纷响应，举行罢工。其中电信部门的总罢工在全国影响很大，而天津的电信部门由于张逊之通过青年共济社电信组组长刘文清、吴锡三的严密控制，就没能起来响应，为此，张逊之等得到稽查处的一笔奖金。

1947年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少将参议戚南谱来津组织“新中国建设协会”，戚任会长，张逊之、魏子文任副会长，在中国大戏院召开了成立大会，此协会的主旨也是搞情报工作。不久，戚离津，该协会为张逊之的青年共济社吞并。

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后，继续向天津挺进，张逊之妄图阻止解放军进关，特赴北平与张荫梧商量组织“华北民众自治救国会”，他任常务委员。另组织“华北自救军”。张还与美军接洽，希冀得到帮助。然而解放大军很快相继包围了平津，张逊之的梦想破灭了，他不得不又回到了天津。

天津解放后，张逊之在其同乡、市商会常务委员王步洲（天生贸易商行经理）的帮助下，在一区宏祥栈内搞了一个东记进出口公司为掩护，但终未逃脱人民的法网，最后受到了人民政府的镇压，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

（天津市政协文史办　供稿）

绥远清帮和伪蒙疆民生会

卢健飞　王明远　刘吉悌

一、关於清帮源流的传说

社会上都知道清帮是一个会道门，但对于它的根源，不仅外界人，即使象我们在帮多年的人，也很难说彻底，因为师父们所传的主要是帮名、三代和一些规矩仪式及行话，至于它的来源和真正宗旨，则不但说得少，而且说得乱，现在仅就我们能了解到的综述如下。

首先在名称上，外界多以清洪帮并称，其实只有清帮称帮，洪帮并不称帮。清帮所以称帮，因为它是从运河船运上的米粮帮发展起来的。虽然称帮，但在总的名称上，帮内人则说是“安清道”。

这个道是怎样产生的呢？据师父传说：当清朝康熙年间，运河漕运开通，南粮北运，船行所至，常被沿河的官兵拉夫封船，勒索财物，因而清江的船夫，首先创立米粮帮，团结自卫，接着沿河各口岸的船夫，也都效法结帮。清廷虽不同意船夫结帮，却又怕取缔后影响漕运，因而只好听之，米粮帮遂得半公开于社会。但在帮与帮之间，因各立帮头（最多到过100多帮），互不统属，时常有彼此矛盾的事发生。到雍正年间，有清门教徒翁岩、钱坚、潘清师兄弟三人，向清廷活动，要求把漕运上所有米粮帮都组合起

来，以清门教规治理。经清廷批准，在河南开封府成立了安清道友会。由此米粮帮的人都去参加，会外的人便把这个会叫做是清帮。

安清道既来源于清门教，清门教又来源于何处？据帮内师父们传说：清门教的始祖是金清源，在五台山拜佛门禅宗临济宗派第六传鹅头禅师为师，后来创立清门教，成为临济宗派的一个支派；他留下清门教24代的排字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悟学。”这些字都是佛法上的话，也就是它立教的宗旨，可见清门教是来源于佛教。同时，在摆香堂的牌位上，首先供在上面的是西天佛祖，达摩祖师，接着是禅宗的各位祖师，然后才是清门教的始祖金祖（清字辈）、二祖罗祖（净字辈）、三祖陆祖（道字辈），然后才是翁、钱、潘三位祖师（德字辈，他们是安清道友会的创始者，也是清门教的第四代祖），这也说明了他们最初的根源是佛教。

为什么在清帮又叫做“在家理”或“进家里”？这前者有佛法上的传说：认为临济宗派是属于佛法的禅宗，禅是佛性，只重修性，不重修形，不但出家可修，并且在家可修。清门教所讲的是在家修行之理，要普渡在家之人，不易服，不受戒，在家里带发修行。这种修法，有别于僧尼出家之理，所以对参加清门教的叫做“在家理”。后者有帮内沿习的传说：认为在过去各帮摆香堂收徒，都必须黑夜里在船上去摆，不许在旱地上去摆。后来漕运停止没有船只，便打破这个成规，都是由师父在家里摆香堂收徒，因此便以为进清帮必须先进入师父家里，才能得道，这便对进了帮的人叫“进家里”。也有的传说，在家里收徒，并不是漕运停止后就开始，在此以前就有一位师父，因为病在家里不能上船收徒，改在家里收。虽当时为同道所訾议，认为有犯帮规，但终因他有病，承认了他这一次所收的徒弟是帮里人。由此便开了例，各帮师父也都纷纷在旱地上自己的家里收徒了。此外还有人说：天下清帮

是一家，有人进了清帮，就是进了清帮这个大家里来了，所以叫“进家里”。

清帮是否具有民族革命的思想和活动？从清帮的传说看：曾说到翁、钱、潘三祖原来都是天地会的会员，这个会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族革命组织，后来失败了，他们便藉清门教进入米粮帮，继续作民族革命的活动，虽然在表面上说是要以清门教治帮，有利清朝的漕运，但实际上是藉此作掩护，仍要暗中进行反清复明。最显著的有潘祖留传的遗像可作说明，他的遗像是一只手提着一个雀笼子，一只手把个人发辫托在胸前，并怒目而视。这暗示着什么呢？师父们谈论说：“那雀笼子是指的汉族人民，像小雀一样，被关在牢笼之中；那发辫是代表清朝（因为发辫是清朝逼汉人留的），托起来是叫人们认清敌人；怒目而视，是表示民族仇恨，要反抗，打破牢笼”。同时这个意旨也见诸行动，如嘉庆年间李文忠的八卦教，王伦的清水教，联合起义反清。清帮第十二代慧字辈王祖正纪，就在河南滑县响应了这个起义，率领着帮内人兴汉排满，结果被镇压下去，王祖及其参与者均牺牲。从此清廷即裁撤米粮帮停止漕运，对清帮严加查禁，如稍有嫌疑者，即有杀身的可能。清帮在这时期大受摧残，原有 128 帮半，只剩下兴武二、兴武四、兴武六、杭三、江淮泗、嘉海卫、嘉白、双凤、湖州头等不到 10 帮，因之十二代以下的“本来自性”四辈前人的姓名，也在清帮中记载最少。但清帮并没有屈服，仍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所有后来的一切秘密行话，多是这时产生的，并积聚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积极地参加了孙中山的反清斗争，曾牺牲过不少的人。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民族反抗的暗示，如帽子要翻放着（暗示要变天），领子要掩起（暗示要恢复明朝汉族的圆领），其他还有，都可资说明。

为什么有人说清帮是投降清廷的叛徒，不象洪帮那样坚贞不二？说这样话的也不无原因。首先是因看到翁、钱、潘三人离开

了原来的民族革命组织的天地会，却投向清廷以清门教治理米粮帮，为当时统治者的漕运服务，这就是投降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定名为安清道友会，更把投降的旗子鲜明地打出来，因为要安清就是要保清，不再反清；其次是看到清帮在杭州的家庙，在乾隆下江南时，曾御赐头门匾额为“安清门”，三门匾额为“异姓堂”，四门联为“君恩臣当报，父业子当传”。另外还御赐蟠龙杖一根，作为他们的家法刑具，对违犯帮规的打死勿论。可见清帮在投降后忠心保清，得到当时统治者异乎寻常的欣赏，更证明是叛徒。洪帮人就这样看，并且还和清帮从根本上矛盾。但清帮人却不这样看，认为翁、钱、潘三祖虽离开了天地会投向清廷，成立了安清道友会，是为了要藉米粮帮扩展民族革命的力量；把会的名字称为安清，是为了迷惑统治者；拿乾隆的御赐匾联和蟠龙杖，是为了利用它作掩护，以有助于组织的秘密活动。如果清帮是真投降，潘祖不会有那样的遗像传给后代；王祖正纪也不会在滑县起义遭到镇压；清帮的活动，也不必要有这样的秘密。这两家谁说的对，时远事迁，很难稽考，但到了辛亥革命前，清帮积极地参加反清活动，这个对立的看法，便随着消失。

既然清帮出自佛门，是不是它按佛法行事？按佛法禅宗道理，为了要达到它所说的明心见性，不论在家出家，都要研究消极无为的经典，修习自我麻醉的禅定。但清帮的师父们，从来没有人做过和说过这一套，甚至于在香堂上传道时，满堂上香烟缭绕接连地请送神佛，充满了一派神秘气氛，也没见师父传授过什么禅宗上的东西。相反地，香堂上五字抱头香的五个字“敬学吃怕求”，倒是儒家的东西占了上风。如“敬”是敬的天地君亲师；“学”是学的仁义礼智信，这是传儒家的封建的纲常伦理；“吃”是吃的金木水火土；“求”是求的四季平安福，这也是属于儒家人生哲学的范畴。只有“怕”是怕的生老病死苦，这一个“怕”字是佛家的东西，但也不过是作个点缀而已。特别是有些师父们，不

但对清帮的根源说不清，并且因不理解佛法，以讹传讹，把清帮24代的排字都传错了，如“能仁智慧”，竟错传为“仁伦智慧”，因为他们不了解“能仁”是“释迦”译义；“本来自性”错传为“本来自信”，因为他不了解“自性”是佛法主观唯心论的核心；“大通无学”，竟错传为“大通悟觉”，因为他不了解“无学”是阿罗汉的果位。这些都说明它不但不按佛法行事，并且对佛法无所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历史上进行革命活动的组织，为了有利于动员号召，不少是打着神佛迷信的幌子，如黄巾、白莲教都是如此。清帮对于佛法，也不过是为了打幌子，如果它真按消极的佛法行事，那就要和民族革命的旨趣对立起来，不可能去进行斗争。

为什么清帮吸收的人多是社会下层？这首先是清帮旧有组织的传统问题。由于清帮是运河米粮帮的船夫发展起来的，他们多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者，本身就是负重苦的社会下层，他们为反抗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要求互助，才组织米粮帮。清帮虽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但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他们和中上层的阶级关系悬隔，和下层的阶级感情接近，这就很自然地要把下层很多群众吸收进来。其次是清帮进行民族反抗的组织路线问题，因为当时在异族统治下，所有社会上层，特别是士大夫之流，有的被清廷镇压吓倒了，有的是养尊处优，放弃了斗争，这就只有向受压迫较重具有反抗性的社会下层去发展。尤其是在滑县起义失败后，米粮帮裁撤了，有些人牺牲了，有些人转入地下，更只能是在社会下层中秘密活动，使统治者不注意他们。因此清帮吸收的也就多属于社会下层，甚至于地痞、流氓、劫盗、绺贼等什么样的人都有。

究竟清帮的传统精神是什么？用帮里的话说是“家理义气”4个字。这个义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民族斗争上，要天下清帮，树立起民族气节，团结互助，反清复明；一方面是在社会生活上，要天下清帮，互相扶穷济困，帮丧助婚，团结犹如

一家。这就是清帮的传统精神。虽然这种精神具有一定的革命团结情感，如清帮自己所说，“入帮后，地不分东西南北，姓不分张王李赵，使无亲无友无靠者，能有亲有友有靠。”但由于他们当时为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所局限，这种情感，只能采取封建的家长制的组织形式，如摆香堂、拜师父、认同参，要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等等，因而清帮的传统精神，也就兼具着封建的、宗派主义的落后情感。同时，清帮之所以打着佛家迷信的幌子，而所装的却是儒家的内容，也就是因为儒家的那一套封建的纲常伦理，适合于他们这一套拜师认徒的封建组织形式。但这些落后的组织形式和内容不可能使这一些社会下层求得出路，而相反的还促使一些帮的首领成为大把头子，更加深了他们的压迫和剥削。

以上所说，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清帮。辛亥革命以后，清朝被推翻了，民族斗争的对象消失了，清帮再没有提出新的政治内容，这就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躯壳，结果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为反动的国内外敌人所利用，变为反动的力量；不但充当过国民党特务的外围，并且当了日寇的汉奸工具，即使有某些好的表现，也只是个别人的问题，而不是清帮本身有什么好的政治指导作用。绥远的清帮是全国较小的一部分，但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现在将我们的亲历和见闻介绍出来，惟此事所涉较广，又以日久记忆不清，难免乖漏，请知者补充和指正。

二、刘长荣未到归绥前的绥远清帮

绥远偏处塞外，虽有黄河的水运，但因龙门的险阻，与内地河运不相关连，因此清帮伸入这个地方很晚，一直到京包路修通，才有了他们的码头（公共会所）。据说清帮先到的地方是包头，因当地洪帮势力大，参加洪帮的多，未能得到发展，反倒是后到归

绥的清帮占了先。首先在归绥收徒的是兴五四帮通字辈张恩泽（人们叫他张八爷，曾在北洋军队张绍曾部干过事），后来其他帮也陆续地来到归绥收徒，到了民国20年左右，已经有了六大帮，人数约一二百人，除大部分集中在归绥者外，其余都散布在外县，如集宁、凉城、武川、兴和等地都有。现在，仅把在归绥的各帮情况介绍一下。

1、兴武四帮，以贾生福为首。贾是归绥市人，在本市旧城西街开裱糊店，无字辈，拜张恩泽为师，他收了不少的洋铁匠等小手艺人和小买卖人及乡民作徒弟，人数较其他帮多一些。贾本人和军政各界的关系，也拉拢的较多。

2、兴武六帮，以宁钧衡为首。宁是河北人，在归绥车站旁开妓院，拜北京兴武六大字辈蒋万春为师（蒋系华北清帮五老之一，字筱亭）。他一方面收了一些妓院捞毛的和车站搬运夫以及旅馆跑街的作徒弟，一方面还代蒋万春收徒，把平康里开妓院的刘小三、边小三、叶慎斋、苟振声等拉为同参。同时也还拉一些其他界的人，如王明远（车站天亨粮站经理）、陈建勋（旧城金声旅馆经理）、刘玉山（旧城大观园坤伶白牡丹的丈夫），都是他拉去拜蒋为师的。陈建勋自己也收了一些旅馆茶房和流氓等作徒弟，但人数不如宁的多。

3、杭三帮，以李侗为首。李是河北人，学字辈，以塑神像、包油漆裱糊工为生，在归绥市收了一些小手工艺人和小商小贩作徒弟。

4、嘉白帮，以安定邦为首。安是河北人，通字辈，是北京嘉帮大字辈宋殿邦的徒弟（宋也是华北清帮首领五老之一）。他原以誊写石印和抄录官商文件为生，后来看清帮有利可图，便到北京拜宋为师，在本市收有一些毛店工人、学徒和小手艺人、小买卖人为徒。

5、嘉海卫，以王志诚为首。王是山西人，通字辈，是吕祖庙

理门公所的老道，收有一些小商贩和旅馆茶房作徒弟，人数不多。

6、江淮洞，以李国华为首。李是河北人，在当时任归绥警察局保安队长，通字辈，除收了一些保安队的队兵和警察外，并收了一些买卖中的学徒和服务行业中的茶房、剃头的、修脚的。

由上可见，各帮所收的徒弟基本上是社会下层，其所以如此，不外乎前章所述的是由于旧有的组织传统、路线使然，是由于“家里义气”对这些社会下层人们的吸引。但到此时期，是否清帮人们还理解这个组织传统、路线的革命意义呢？可以说，随着清朝的推翻，民族革命对象的消失。已经忘掉，甚至于传法的师父们不但不再提它，而且有另一种无耻的打算和说法。如兴武六大字辈的蒋万春，就有徒弟问他：“师父，你为什么专爱收那些开妓院的和地痞流氓等下九流的徒弟呢？这对于咱们的道，有点不太光彩吧？”蒋万春却很轻松地回答说：“徒弟，你不了解这些人地位低下，为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我们收他，他就能感到我们是抬举他，要比其他的人把道看得重，把师父看得重，就能够听师父的话，多办对师父有利的事，这为什么不多收他们呢？”事实上，蒋万春就是这样大得其利。如他来绥远收了不少下九流的徒弟，因绥远盛产烟土，就叫这些徒弟们给他凑烟土，运到北京去卖。这些徒弟，也的确奉命唯谨，照着他的意旨行事，结果他发了不少的财。至于其他帮收徒，一些师父们和蒋万春一样的想法，为的是便于“吃”徒弟。如安定帮、王志诚，对那些学徒、跑街等没钱的穷徒弟，也要在三节两寿上揩他们的油，并且还有时因此和徒弟闹对立，嫌徒弟不孝敬他们。到这时，所有组织传统的革命意义，已经连影子也没有了。收徒主要是为了有利于师父个人。

是不是这时清帮传统的“家里义气”还存在呢？这应从两方面去看，如果从民族革命团结的情感去看，由于清朝推翻了，斗争对象消失了，清帮再没有提出新的政治斗争内容，也就不可能再有新的革命团结情感，所谓“家里义气”，已经是随着时代消失，

不复存在。但要从封建的宗派主义的情感去看，则这种“家里义气”仍有所存在，但已经有了变化。如各帮的帮丧助婚，仍常常有人去办（大北旅社老板于化门和张子含都多张罗过），对失业者和无住处者，也有时替想办法（如陈建勋的振大旅社就常有帮内人住闲），但这必须帮内有头脸的人去提倡，才能办到，一般地想这样做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外来的帮内人，更必须找到这样有头脸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帮助。如果只是向一般的帮内人露出暗示，也无济于事（虽有的穷朋友互相同情，但多有心无力），甚至有的故意不认。而这些有头脸的人作帮助，也不是真正为了帮的利益，主要是为了树立个人在帮内的把头势力，拿众人的钱，给自己贴金。特别是有一些地痞流氓，依仗着这种“家里义气”的势力，欺压良善。如李国华的徒弟石朝珠等，就是些混混，向地方商民白吃白拿东西，经常招摇撞骗，外地唱戏的来了，如不买好他们，就聚众起哄，叫戏唱不下去。集宁的清帮张义星，也结伙在地方横行打人，只是还未发展到象南方上海的清帮那样肆无忌惮绑架杀人罢了。

是不是到这时清帮人还能守住往日的帮规？事实上早已守不住了，而且已经是大大地破坏了。不要说象那些进入清帮的地痞流氓，依势欺软凌弱，破坏了十大帮规，就是一般的帮内人，也破坏的不少。如帮规不准奸盗邪淫，嘉白帮首领王志诚，以一老道竟公开地把妓女叫到他庙里同宿，被人捉住；如帮规低香头不准爬高，本市旧城西街帽子铺经理李双义，竟由悟字辈爬上通字辈；帮规不准江湖乱道，要对外保密，而清帮人在社会上竟随意谈论，几成公开的秘密，又帮规收徒要经过小香堂、大香堂、开山门各个程序，不准“连香起”（即大小香堂开山门一次办），而这时收徒则连香起的人很多，甚至于视为当然。其他还有，不及细述，即使有的人能遵守帮规，也由于丧失了政治斗争目标，只能作形式上的遵守。

三、王若瑟的来绥远

在上述时期中，也并不是没有中层以上的人参加，如天亨粮栈经理王明远，中西药房经理高松声，就都是这时参加的。这并不是各帮首领们不愿吸收他们，蒋万春所讲的要收下层，只讲了一半心里的话，那一半想收中上层心理的话没有讲。其所以收不进去，主要是中层以上的人，认为清帮是下流团体，有些不屑参加。

到了1933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那时蒋介石要实行法西斯统治，也就是要实行其特务统治，认为清帮是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团体，便企图把它利用起来，作为特务组织的外围团体。因而在华北把清帮最有名的大字辈首领王若瑟、吴鹏举、蒋万春、顾炎年、宋殿邦，邀请到北京，尊为“华北五老”，由特务们在幕后策动，在北京大摆香堂，广泛收徒，特别是多拉拢当时的军政首脑和地主、资本家等进帮，一时风声传播，清帮的声价，在各地的中上层人物中，顿然提高。有不少的人，都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愿意参加。绥远也不例外，最显著的是王若瑟来绥远收徒。

据张子含亲身看到和听到的经过是：王若瑟是在1933年夏初，由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头子潘秀仁、赵允义等亲身把他从北京接来，为的是要他摆香堂收绥远党政要人作徒弟，并听说陈立夫还从南京给王若瑟一封劝驾的信。当车到丰镇时，当地的清帮首领郑文轩（通字辈）上车随侍。到了归绥后，国民党的头子们和当地各帮的首领们都上站欢迎，下车后住绥远饭店。晚间绥远省党部设盛大宴会招待，作陪者都是当时的军政要人。清帮人往谒者，必须经郑文轩传达方得相见。接着就摆香堂，新收的徒弟有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常务委员潘秀仁、赵允义、陈国英，有兼省会警察局长袁庆曾，督察长张公量，有归绥交通银行经理蔡书禾，丰

业银行经理王赞庭，电话局经理沈伟臣，还有其他军政人员均到香堂拜王为师父，特别是驻绥远的晋军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骑兵司令赵承绶，也从防地赶来，拜王为师父。另外王明远还听到郑文轩说，傅作义也向王若瑟递小帖子，认王为师父。王因其身份大，免在香堂行礼，并叫徒弟们不要对外公开传说。（北京帮里人则传说王因傅身份大，不敢当傅的师父，是代师收徒，拉傅作同参兄弟。但王的师父已早死了，这样做是不合帮规的。）

隔了两天，在省党部的头子们，在正风中学的大礼堂开了一个欢迎王若瑟的大会，当时参与者，除了新进家的党政头子外，还有一些当地的清帮首脑人物，再就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属下的一些骨干分子。王进会场时，头戴黑绒道帽，上嵌一块亮晶晶的玉石，身穿黄缎袍，上秀团龙，右手拿金漆龙头拐，左手拿玛瑙念珠串，白须飘飘，由郑文轩手拿拂尘随侍在后，真是装模作样，派头十足。各党政头子们见了后，都殷勤致礼，鞠躬如也。讲台上专备有太师椅，由潘秀仁恭请上坐，并致欢迎词说："安清道过去对革命有贡献，王若瑟老先生的道德和义气，都值得钦佩，应当欢迎。"接着就请王讲话。王道致谢意，除了讲一些安清道的源流外，就着重吹嘘着说："我们的道，最重义气，只要是帮内的人，没有不帮助的。我们的人到处都有，南京、上海、广州、武汉，我都可以给你们介绍，吃饭路费不成问题，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发展我们的道，并尽忠党国。"会后，张子含对王明远说："咱们的王老头子，真够神气的啦，想不到清帮能这样！"

接着王若瑟又收了几个徒弟，但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人，都推辞不收，不几天就回了北京。听说王走时，各党政头子进帮的都对他有新懔赠，连同押帖礼弄了好几千元，真是饱载而归。而清帮在绥远的声价，也由此有了显著的提高，不少衙门的官儿，地方的绅士们，买卖中的老板们，都转变了眼光想参加。但这些人都是眼睛向上的，愿意当爷爷，不愿意当孙子。都是想找个班辈

大的师父(当时以大字辈的最大),但华北大字辈的五老离得太远,并且不容易搅进,而缓远则仅有杭三帮的刘长荣是大字辈,这就把刘看作求师的对象,愿拜在他门下的日多一日,而刘也由此成为缓远清帮最有力的首领人物。

四、刘长荣的大收徒

刘长荣是山东肥城县候家庄人,历代以木匠业为主,在10岁时,跟父亲学木匠手艺,18岁投入老毅军当兵,到了河北。因同棚子的士兵都是在清帮的,他拜到了礼字辈的郑忠恩为师(郑是六合县人,当过武术教官),后来到济南结婚,又转到山东混成旅前路巡防队当兵,并升任排长。民国16年,该旅被张宗昌改编为直鲁联军混成旅,他递升营长,这时才重视收徒,新收的多是小买卖和小手艺人。1928年,直鲁军失败,他退到天津,被傅作义改编,仍任营长,曾驻过天津近郊韩柳墅、小站和沧州、青县、马厂一带,每处都有他收的徒弟。他的护兵崔朝海也是他的徒弟,专办摆香堂的事。但刘怕上级官长猜疑,不敢收军队内部的人,所收的多是当地人,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是地主老财居多。如他在韩柳墅收过一个姓马的,就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他拉拢这些人,为用钱方便,这些人为的他有营长势力,能仰仗庇护。

到1930年中原大战,刘长荣随着傅作义在津浦线上和蒋军作战,进到山东汶上县,结果傅军大败北撤。在退到汶河一带时,当地红枪会蜂起截击,有不少的部队被解决。但他所带的一营,因他有清帮的关系,一露出帮内的秘密暗示,红枪会中的同帮即认为自家人,不仅不加阻害,并且筹助给养,沿途护送,因是得以安然北撤。刘营内有个孟排长,此人平日很反对刘搞清帮,到这时也改变了态度,很惊奇地说:"想不到这个玩意有这么大的好处。"刘撤退到山西后,不久即调驻绥远,次年改编,仍任营长,

曾驻防包头、旗下营、平地泉等地，收了些徒弟，但仍怕上级猜疑，不敢在部队中多发展。

刘本人貌似忠厚长者，不善言谈，但接触之下，使人感到老实可亲，并且面不阻人，只要是对他有所请求，办到办不到，总是张罗去办，因此他虽然办不到，人也不反感，这也是他善于伪装之处。他家里经常有无职业的帮里人住闲，由营内顶个兵名字吃闲饭，甚至于有些作奸犯科的亡命徒，以清帮关系来找他，他也庇护。最显著的一件事，在傅作义剿王英匪部时，王匪四处逃窜，刘在武川县担任堵击，当时有王匪的参谋长南汉人，因走投无路，以清帮关系化装到他营里求掩护，他和南素不相识，竟把南隐藏起来。南有大烟瘾，刘还给他大烟抽，叫护兵崔朝海伺候他，一连住了几个月，事定后才走。

刘到绥远后，虽然一方面怕上级猜疑，不敢多收徒弟，而另方面还由于当时清帮声价不高，中层不屑参加，下层虽愿参加，却又因为自己的班辈大，怕收了后为帮内人所反对，说是给他们收进爷爷来了，这只能让徒弟们去收。因此就使他在收徒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自王若瑟来了以后，清帮的声价大为提高，有不少的中上层愿拜刘为师（当地的统治者也对他看法变了），于是他就放手大收其徒，而帮内那些忘了旧的组织传统的人，因见他所收的多是中上层有头脸有势力的人，虽然是给一些人当爷爷，有些不愿，但为了攀高结贵，趋炎附势，却又是心甘情愿了。这些徒弟有包头面粉公司经理刘豫、包头景兴池澡堂老板郭毅臣、包头庆春园老板王浩然、三道营车站站长巩佑愚、归绥机务段段长李开顺、陶卜齐、监工魏子明、归绥车站杂工大把头赵庆波、平地泉土店老板杨玉升、平地泉皮毛店老板宁连三、平地泉马店老板马林、集宁县绅士张振声、陶林县大地主张忠义、归绥利中照相馆老板孔夏亭、豫芳照相馆老板张占鳌、大北旅社老板于化门、亨得利钟表眼镜公司经理张子含、济胜元马店老板艾香亭，还有

绥远宪兵司令部的参谋高恒、归绥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韩伯琴、第三分局局长郑冠三、五原垦务局局长慕松鹤、民国日报社编辑杨丕滋、三十五军营长黄济五、国民党大队长范政通，三十五军副官史继高、刘鉴训，其他资本家、地主和军政界的人还有，不尽列举。这些徒弟又多是各自收徒，因之他这一杭三帮的派系，人数最多，在绥远哪一界哪一行业都有，甚至蒙古的王公贵族，也请求参加，达拉特旗的康王进帮，就是突出的一例。

刘也很爱钱，并善于“吃”徒弟，在他收了这些地主、资本家的徒弟后，就择肥而噬，常常出题目向他们借钱，翟朝海就多给他跑过。因此他来到绥远不久，就在平地泉桥东买了一二十间铺面房子，在归绥开了个“新新饭庄”，这就是由有钱的徒弟凑起来的。

在王若瑟来后和抗战前，可以说是刘的极盛时期。他那时已不干三十五军的营长了，先是军部少校附员，后任绥远省政府调查员。家住在归绥市北门外牛桥下的济盛元马店。屋里陈设整齐，成为绥远清帮的总码头，什么样的大小人物都去，大烟灯、麻雀牌经常摆列，犹如一个大俱乐部，真是座上客满，笑语达旦。由于各行业都有徒弟，用什么，吹口气就来，并且拣最好的去敬献师父。出门看戏吃饭，戏园子、饭馆子的老板们，都预先把最好的座位留下。在当时生活上，即使是一般的军政头子们，也没有他那样的方便如意。在他 50 岁时作过一次寿，当时各地清帮首领和徒众以及当地军政各界人物，多来祝贺，收下的寿幛、寿桃、寿面、寿屏，几间屋子都摆不下，同时还包下几个饭馆子大摆酒席，包下大观园戏园唱吉祥寿戏。象这样大的排场，当然是花钱不少，但用不着花他的，因每个徒弟的寿礼，最多的有几十元，最少的也是 2 元，不但够开支，而且有盈余。

这时，他手眼大了，有了势力了，对帮内的徒子徒孙们，也就显示着比别人有“家里义气”了，如他的徒孙于少恒，想开饭

馆没本钱，他就叫徒弟们凑钱帮助于开起来，名为“小小饭馆”。徒弟张占鳌开豫芳照相馆，本钱少，他给张凑借。徒孙李麻子的母亲死在人市街，无力埋葬，他给凑棺材钱。徒孙李双顺想买一辆人力车没有钱，他帮助买。隔帮徒孙韩令文，因所开的云华池澡堂失火，无力重修，他也给筹借。至于对其他帮内帮丧助婚赠旅费的事，还不少，只要是找到面前，总要多少想点法，这也是他在帮内有威信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他这样做也主要是为了猎取他个人的威信，要当帮内最大的把头。

但刘虽如此，他的妻子却不是这样，待人极其刻薄。据崔朝海说：“她很势利，对有钱有势的徒弟们视若宾客，不叫大哥不说话，对无钱无势的徒弟，则冷眼相待，甚至不答理。尤其对三节两寿看得重。10元以上的留吃饭，钱少的连茶水都不愿招待，但人们都以刘长荣的态度好，对她不作计较。他有两个儿子，当时都长大成人，大的叫吉孝，二的叫吉悌，因所处的那种生活环境，都是花天酒地，无所用心，成了浪荡公子。这也使他很伤脑筋，认为继承不了他的事业。”

虽然刘在清帮里有这么大的威信，但却曾遭到他本帮内小首领李侗的反对。李在刘未来前，是归绥杭三帮的首领，刘来后不但在本帮称尊，并且在其他帮称尊，这就使李黯然无色。但李却不承认刘的大字辈是真的，据李说：“杭三帮祖传有两句话，‘杭三不离马，离马即是假’，这是说杭三帮大字辈以上的师父、师爷、师太，总有一人是姓马的，没姓马的就是假的。”而刘的师父是郑忠思，师爷、师太也都没有姓马的，并且他还没有同参兄弟，所以就认为刘是假的。李侗的话，在帮内也有人认为有道理，但多数人都认为刘从20几岁就在济南、天津等地摆香堂，如果是假的，早就被帮内人以违犯帮规驱逐出去，不会闯荡江湖有这么多年之久。而且“杭三不离马，离马即是假”，这个说法也无法证实，有可能是捏造的。同时也还有人说：“刘有这么大的声势，给清帮添

了光彩，即使是假的，把他承认下来，也不辱没清帮的门户。因此李侗虽然反对，并提诉到华北五老面前，但因没充分证据；无人理会，也只得罢手。而刘也由此更顺利地大收其徒。

五、清帮收徒的程序和仪式

清帮的收徒，一般地要经过必要程序和仪式，进家人要先经过引进人的介绍，向所要投拜的师父递上拜师的帖子，在得到本师允可以后即开小香堂收为记名徒弟。小香堂的仪式很简单，堂上仅供翁、钱、潘三家祖师的牌位，供桌上仅点一香二蜡，在场仅有本命师及引进师，由请进人头顶正式拜师帖子，向祖师和本命师磕记名头，即算是记名弟子，但非正式弟子，帮内人称之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到了一定时期，本命师认为可以收为正式弟子，即开大香堂。大香堂在帮内是一个极为隆重的典礼，按所供牌位，应有西天历代佛祖，有禅宗始祖达摩、二祖印可、三祖僧灿、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有清教始祖金祖，二祖罗祖、陈祖、林祖，三祖陆祖，有安道清始祖翁、钱、潘三祖，有王降、肖隆二小祖，朱、黄、刘、石、四小祖，有十二庵堂师，有安道道历代祖师。按到场的人应有各帮的师父及同参，并且只要是在当地帮内人，都应通知参加，本人的传道师、引进师，更必须参加。按香堂职事分工有12人：①当家师，总理香堂一切事务；②讲经师，指导传道受戒，由传道师兼；③陪堂师，协理内外事务，由引进师兼；④执法师，管理帮规纪律；⑤护法师，担任安全；⑥巡堂师，负纠察任务；⑦执堂师，管香堂司仪；⑧散香师，照管香烛，指导上下香；⑨抱香师，协助散香师接香插香；⑩福德师，管庶务和办斋；⑪知客师，管招待来宾；⑫站堂师，管护卫站班。在十二师中有主香者一人为香堂领导，例由当家师即收徒者自任，但如有收徒者的长辈到场，则由长辈主香。按各祖

师牌位前的陈设，应有一大供桌，桌里边设四乾四鲜果供，桌当中设5个香炉和6个蜡烛杆。5个香炉的摆列，有两种形式：一种将香炉一字排列，名为“长江炉”；一种在桌中心摆一炉，前后左右各摆一炉，名为“梅花炉”（在当时一般都用梅花炉）。5个香炉的重量共5斤4两。含有五湖四海来聚会的意义；6个蜡烛杆，分摆在五炉两旁，作雁翅形。然后在五炉前又摆一个香炉，叫“接驾炉”，在供桌下也摆一个香炉，叫“扎根炉”。另外还用一丈多长的红绳，将五炉六蜡都一个一个地绕起来，缠在一起，据说红绳是代表拉船的绳，缠在一起是代表亲密团结的意思。再就是在供桌靠墙的左边，摆一窄长的木板，名为“家法”；在堂口设有火盆，专供焚烧佛袋、钱粮、黄表；在供桌前设蒲团一个，两旁设红毡或拜垫若干个，都是供参拜之用。同时在香堂门外，还专设一桌，摆香烛一份，说是供三家未上过大香的小祖。

在参加香堂时，必须遵守以下的规定：①对外须严守秘密；②服从主香者指导，发生任何变故，都要听指挥；③谨守香堂规则，千拜万拜，不得违怨；④必须穿长衣；⑤要隶立低头垂手；⑥不得自由进出；⑦不得闯香；⑧不得藉词惊扰。此外，在举行仪式前，还须净手漱口。

香堂的仪程是：①请祖，即供上各位祖师牌位；②献供果；③献香，在五炉里献的是“五子抱头香”，即每炉燃香一束，四外各炉的香头，均攒集当中一炉的香头，表示帮内人在祖师前的抱头亲热，犹如五子在父母前的抱头亲热，故名此；④请蜡；⑤请线绳，即将红绳缠绕五炉六蜡；⑥请家法；⑦朝祖，由司仪人唱礼，向各位祖师牌位一个一个地叩参，叩头的姿势是以左手压右手，先放在左膝，然后再右膝着地，两手抚地叩头；⑧转朝门外小爷；⑨朝引进师、师爷、师太；⑩朝传道师、师爷、师太；⑪朝本命师、师爷、师太；⑫回朝在堂各帮调卫的师父、师爷、师太；⑬回朝在堂执事的师父、师爷、师太；⑭本命师慈悲三代，帮头、船号、

班辈，所谓慈悲即传受之意；⑮传道师慈悲十大帮规、十大禁止；⑯送祖，香堂也就于此结束。在请祖、朝祖、送祖、献香、献蜡等节目中，司仪者还念些香歌、赞歌。

以上是一般大香堂应有的节目，这就使进家的叩的头多了，如请祖，每个祖牌，都要一个一个的叩，对本命、传道、引进的师父、师爷、师太，都要一个一个的叩，对在堂呼帮的师父、师爷、师太，都要一个一个的叩，对在堂执事者和同参师兄弟，也要一个一个的叩。在送祖时，还要向祖牌一个一个的叩。每叩一次，都要叩 4 个头，这就把头叩的多了。因此帮内曾流行过这几句话，“要进家，须叩头，够不够，九百六”。为什么要这样呢？据师父们说：“一是为了要显示帮规的隆重，二是为了要使入帮的人认识到自己叩了这么多的头，就是盟了这么多的誓，不忍去背帮叛帮”（实际这是树立师父的尊严，在组织上加强封建家长式的约束制度）。但到后来，在帮内人数较少的地方，开香堂凑不够那么多的帮和人，就把仪式的规模缩小了，并且把应叩的头简化了。如对禅宗的二、三、四、五、六祖和十二庵堂师以及本命、引进、传道各师以外各帮的前人们，有的就不叩了，或者是合并叩一次就算了，这就减少的多了，但主要的祖师牌位和近支的前人们，仍一个少叩不得。

在进家人给师父师兄叩头时，师父只是拱手答礼，并说：“祖师爷的灵光，前人的慈悲，家里义气，弟老的请起。”师兄则必须回叩答礼，叩完后，互相拱手说：“义气千秋。”这不但在香堂如此，在过节庆时，见了面也是如此。但平常见长辈则只说不磕，如晚辈说：“要给师父见礼。”长辈则说：“咱们香堂口见。”这就不磕了。

在摆完香堂后的第三天，进帮人应进行认家和领法。由进帮人预备两分礼物到引进师家，一份送引进师，一份由引进师陪同送往本命师家，除向本命师叩拜外，并向师娘叩拜，向师兄弟、师

姐妹互相见礼，然后由本命师传给道法，在领取道法后，就成为一个正式的安清道徒。但这还不够收徒的资格，必须经本命师作过一定时期的考察，认为可以收徒，并举行开山门的仪式，才可以收徒。开山门时，香堂的布置与上大香堂基本相同，只是不要叩那么多头（对远支的祖师，可合并叩参）。在叩参后，先由司仪念两段香歌、赞歌；次由传道师传给清帮的前后 24 代，作为收徒的辈次（后 24 代的排字，不知是那位祖师续的，字的次序为“万象依皈，戒律传宝，化度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发修行”，仍是佛法上的话）。再就是由本命师给开山门，方式是改变叩参时的手式。如在未开山门叩头时，是左手压右手连在一起抚地的，到此叩头，本命师用手将他的两手分开抚地，就算是山门开了。并且以后叩头，都是两手分开抚地，作为已开山门的标志。

师父收徒后，徒弟要在三节两寿孝敬师父（两寿是师父师母生日），师父要对徒弟的婚丧大事帮助。所谓孝敬，实际上是叫徒弟送礼，作为长期剥削徒弟的手段。

六、康达多尔济的进家和领法

康达多尔济，是伊盟达拉特旗的札萨克（王爷），由于王若瑟的来绥远，地方的军政头子多参加清帮，因而打动了他，由五原垦务局长靳松鹤介绍，投拜刘长荣为师。听说他递小帖子的押帖礼就是 300 元现洋。在开大香堂的那一天，刘长荣把全归绥市的大小清帮首领都邀了去，地点是他家住的济盛元马店，时间可能是 1935 年春夏之交，我（以下的“我”是卢健飞自述）是兴武四帮的通字辈，也在被邀之列。到后，刘长荣指我为站堂师兄（这时没大字辈的师父，执事者都以师兄代），香堂的陈设，大体如以上所说，据说这是在归绥开香堂最大的一次。旋即按香堂的仪程进行，由康王站在供桌前的蒲团前，传道师（由传道师兄张占鳌

代）站在供桌的左上首，本命师站在供桌的右上首，其余执事者各执其事，无事者按帮头分班站列。我记得六大帮的首领都有，以杭三帮的人最多。张子含是执堂师兄，由他司仪（司仪人称为朝奉，亦称办行道的）。在事前刘长荣因康王烟瘾很大，身体很弱，又王爷身份不小，曾叫张子含照顾他，少磕头。张子含在进行时，虽然尽量裁并磕头，并少念香歌缩短时间，但主要节目仍磕的不少。我在站堂时，曾亲眼看见康王因头磕的多，累的受不了，头上的汗珠子滚滚流下来，当场吃了点烟药才好了一些。特别令我感触的是这位王爷，平素在旗内作威作福，架子十足，想不到他今天能这样。我曾在包头会见过他一次，他旗下有个仕官来见他。这个仕官头戴着亮蓝顶子，官儿也不算小，在见他时先行跪叩礼，随着就垂手立站，康王躺在大烟灯旁连看也不看，不要说让坐了。接着问话，康王说一句，他“喳喳”的“是”一句，最后仍行跪叩礼退出门外。而这次康王在香堂上，不仅要给祖师爷叩头，要给本命师、引进师、传道师的三代叩头，还要给各帮的前人们叩头，给同参们普遍见礼叩头，虽然所叩的头数达不到“够不够，九百六”，但可以说他一生从来没有叩过如此多的头，特别是给这样一些人叩头，这真是在他们那个阶级的历史中罕见的事。

现在再谈一谈康王的领法，也就是介绍清帮的传法。按清帮的传法有两部分：一部分在香堂上传领，主要是传所入的帮头，船号、三代和帮规等；一部分在师父家里传领，主要是传帮内教义和秘密行话等。这两部分在康王领法时我都参与，和我所领的没什么大的不同，只是他是杭三帮，我是兴武四帮、在船号、三代各有所属而已。

在香堂上，首先传给他帮头、船号说：“帮是杭三帮，满运船42只，7只停修，35只运京，归三房祖师所拉，长房拉2只，8个窝子，次房拉9只，36个窝子，本房拉24只，227个窝子，共拉老窝271个。所是分三所：长房琥珀所；次房阴阳所；本房是紫

金所。旗号是白旗红银边阴阳月亮，上红下黑，火燎雀杆，外打小偏毛，前半所当家的姓郭，后半所当家的姓毛，运粮是在浙江嘉兴府嘉兴县，石门平旺玉石码头，兑嘉兴三县的粮，归浙江二十一帮。”（窝子即小划子，在小浅时可分开装）

其次传给他的班辈，先告给他清帮24代的排字，后说他是通字辈，是二十二炉香进家。

随着就传给他三代：先告给他本命师的三代，说：“师父他老人家姓刘，上长下荣，字华亭，大字辈；师爷，他老人家姓郑，上忠下思，字筱亭，理字辈；师太，他老人家姓孟，上广下源，字茂贤，行字辈。”并且还要把他们的籍贯住址都传给。接着就传给引进师、传道师的三代，也是这样传法。

在传给三代后，进帮人必须要牢实记住，因为作为一个安清道徒，最大的标志是能记清自己的三帮九代，特别是要能记清本帮的三代。如果记不清，就会被帮内人认为冒充，因为帮内人有这样两句话：私充安清到处有，提起三代发焦愁。在帮人千万不能忘了本帮的三代，江湖上主要是盘问这一点。

再就是传给他十大帮规和十大禁止。十大帮规是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各帮师父皆是师父，分帮不分家），三不准扒灰倒垃，四不准奸盗邪淫，五不准江湖乱道，六不准吃里爬外，七不准扰乱帮规，八不准开闸放水；九不准以卑为尊，十不准欺软凌弱。十大禁止是：①一徒不准拜二师；②父子不准同拜一师；③师死不准再拜师；④关山门不准重开；⑤徒不收不准师收；⑥不准兄弟字派有高低；⑦不准本帮与本帮引道；⑧师过方（即死）后，不准代师收徒；⑨在道不准诽谤道；⑩香头低不准爬高。从这些戒条看来，很明显地是要维护帮内的团结和利益，更着重是要维持师徒的封建秩序。

但香堂上传授的这些道法。在当时是记不完全的，因此各帮都有抄本，将这些记录起来（还有其他许多细目）名为通抄，又

名“通清”，在事后由进家人照抄，也有翻印的作为密本。其中还载有过去船运上的行话，这时已不重视。

在师父家里所传的是帮内的教义和秘密行话，那是康王在上大香的第三天，由引进师兄陈建勋引到刘长荣家中认家，由刘传给的。刘还邀我和张子含到他家中陪坐。这时，刘所传的道法，在教义上说的道理较小，主要是说：“你入帮后，应知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对帮里人应患难相助，要做到帮丧助婚，扶老携幼，以义气为重，要抱打不平，不要凌弱欺寡。总之，要严守十大帮规的十大禁止。”接着传秘密道法说：“清帮是秘密组织，不许在社会上公开表示自己是帮里人，只能在言语行动上作暗示。如放帽子，应帽口向上，但帽内应放手绢或其他物，这表示帽子是船，帽内放有东西，是船内满载；如果不放东西，同帮人看见，认为你是空船，便会有人向你帽子里倒水，说船已卸载空了，应当刷船。又端茶拿烟，都是左手用三个指头（屈母指和食指）左手用四个指头（屈母指），这表示是三老四少。所谓三老，远的是说翁、钱、潘三祖，近的是说师父、师爷、师太；所谓四少，远是的说朱、黄、刘、石四小祖，近的是说现在帮内的弟老的（徒弟），小弟老的（徒孙），少法师（徒重孙），少法孙（徒曾孙）。出外远行捆行李，要绳子横三竖四，向人家敲门，要先三下、后四下。这都是表示三老四少。如遇见同帮的见礼，应叉手整领（叉手是两臂交叉，将手搁在肩下；整领是双后并起，提提前领）。在谈话时，应开口称老大，如他问你“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姓什么？”你应说：“从杭州来，到通州去，姓潘”。如问你的班辈是哪一炉香孝祖，你应说：“头顶大字，怀抱通字，手拉无字，后跟学字，是第二十二炉香孝祖。”如果对方的班辈小，他说要给师父见礼。你应说“不要了，咱们香堂口见吧！”你如果出门在外没有钱，想向同帮的求帮，可在茶馆酒肆里，要一壶茶和两个茶碗，除把帽子翻放在桌子上外，在坐时应左膝压右膝，并使

左手压右手放在右膝上，这样暗示出自己是帮里人。如有帮里人看见，就会问你，你向他请求帮助，他有钱就会把钱搁在你帽子里，如果你不说道内行话去拿，他便认为你是冒充，你必须用手向他腕子上一掠说："清老大开闸放水吧！"他才会给你。特别是你在路上遇到危急的情况时，过去头上有发辫，要把发辫从脑后转搭在胸前；又穿有大襟的衣裳，要把大襟的上领掩起，象出家人的圆领一样，就会有同帮人把你搭救。现在虽然没有发辫或有时穿的上衣不带大襟，但只要把衣领掩起，成为圆领，仍然有效。在住旅店时，为了多得帮里人关照，更要多暗示自己是帮里人，并且放鞋也有暗记，如在要住的时候，是鞋头向内，要走的时候，是鞋头朝外。

在开山门方面，刘长荣因那时连香起已打破了旧例，康王又是高贵的徒弟，更当示以优待，便随着上大香就当堂给他开了。

康王进家后，为了联欢，曾在归绥市绥远饭店摆了好几桌酒席，宴会清帮的大小首领，当然刘长荣是首座。当康王向他敬酒的时候，我看到他面呈得意之色，很有点飘飘然。以后康王每来归绥，都和他有接触。

关于康王进家的消息，没多久就传到社会上，有不少的人都很惊异地说："想不到康王以王爷的尊贵，也要走上这个道儿。可能是他好奇心的驱使。"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为了好奇，乃是有他的政治用意。在那时，他本旗（达拉特旗）人民，因不堪他的剥削压迫，曾闹过"独贵龙"反对他。他为了维护王爷的宝座，便多方面想办法增加自己的力量，因而也就想在清帮上打点主意，一方面，他是想借此拉拢些汉人给他帮腔帮势，如他的绥远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的处长蔡幼声、咨议吴瀛洲，就以帮的关系拉拢得很亲密，遇事多得帮助。刘长荣也多方面给他吹嘘，说他聪明。另方面，他是想借此在本旗组织些人作为自己的亲信，如张子含就以帮的关系当了他的副官主任。他还有一些随待的护弁收作徒弟，

以求能更忠实于他。可见他当时放下架子磕头认师，并不是什么好奇心的驱使。

七、傅作义和清帮

傅作义对清帮一向是不重视的，并且怕传染了他的军队，影响了他的统治，因此把刘长荣调离军职，在归绥市住闲。但不久他的看法和做法就变了，先是有人传说他对上海的清帮很欣赏（1933年长城战役后，杜月笙首先以慕名赠给他像片，随后他到上海与杜见面），接着他又向王若瑟递过拜师的贴子，并且由不公开到公开的地利用清帮。这首先表现在我身上。我那时担任绥远省政府秘书，有一天，傅作义叫我成立密查组，由我当组长，要我学包文正铁面无情地去检查军政人员的贪污不法行为。我那时认为他对我看得起，并想藉此向上爬，便欣然接受。干了几个月，甚感人手少，耳目不灵，密查不出什么名堂来，这就想起在安徽宿县老家时，远房伯父卢正金和我说过的关于清帮的话。他是个老清帮，通字辈，收的徒弟很多，经常有外边的人到他家里去。他常和我谈到清帮的事，说加入后走遍天下皆朋友，困难时有人帮助，危急时有人搭救，再好没有了。我回禀我父亲卢正卿（是地主，秀才），父亲说："你伯父不务正业，和下流人为伍，才弄那些玩艺，你不要听他那些话，跟他学。"虽然我再没跟他，但帮内的"通漕"，我曾在他家中偷看过，什么三帮九代，什么船只旗号，什么三闸、五坝，什么七飞禽、八走兽、十二道金牌（系指船上部位和用物），这些表皮上的船运行话，我都知道一些，但对于上述师父传法所说的那些暗示，则无从知晓，一直到后来出门在外，也再没有人和我谈此事，因而我伯父的话，也早就忘怀了。这时搞密查组，遇到人手少、耳目不灵的困难，又适王若瑟来绥远，煽起参加清帮一股风，这就使我想起我伯父"走遍天下皆朋友"的

话儿来，动念参加清帮，从而利用它，以期能到处有人想助，耳目灵通。但这时王若瑟已经走了，无人介绍，想拜我伯父为师，又嫌他的辈小。

有一天，我在绥远省政府西院办公，绥远省政府的谘议张宣泽（中央介绍来的军统分子）到我屋内闲谈，在谈到王若瑟时，我说："我也想拜他为师，情无人介绍。"他说："不必一定要拜他，华北五老都是大字辈，在北平收徒，我就是在北平拜兴武四大字辈吴鹏举为师的，吴是华北五老年岁最大的一个，你要想参加，我可以给你介绍，押帖礼要10元钱，连请客送礼，约需20多元。象这样大的班辈，虽花这些钱，也够便宜的，因为他们现在大开山门收徒，才有这样的机会。"我那时正是求之不得，即请他介绍，由他写信给吴，得了回信。我便拿上他的介绍信到北平卧佛寺找见吴，拜吴为师并且是连香起开了山门。吴那时已年近90，老态龙钟，徒弟们在寺内来来往往的很多，在开香堂时，和我同时参加的，还有四五个，香堂陈设的非常讲究，一切礼仪都由徒弟们代办，他不过是进来看看而已。他家住在北城（地名忘记），领我认家的是引进师兄许人亭，过去不认识，是在香堂上临时指定的。从此我就成为帮里人。

回绥远后，我想我已经是开了山门了，为了广布耳目，可以利用它大收徒弟。但一转想，自己新进帮，年岁又轻，在帮内一切生疏，不压众，怕收徒自己弄不好。不如一方面和当地的同帮多联络，请帮忙，一方面叫密查员们分头参加，给他们作徒弟，和他们厮混在一起，把他们都利用上。结果就按后一个想法办了。那时是1934年初，刘长宁已经在归绥颇有名声。我首先和他拉拢，其次是和各帮的首领们拉拢，他们认为我是省政府的秘书又兼密查组长，是傅作义的亲信，也愿意拉拢我。那时拉拢的手段就是吃喝嫖赌抽，无所不干。花街柳巷，饭馆酒楼，都常有我们的踪迹，因而大家也就臭味相投，无话不谈。同时，我组内的副组长

杨雨帆，密查员孟广才、麻带雨、杨松茂、杨玉清、赵大义、费德明、牛成焕、沙省三、花宏源、李明甫、张文海、庞子政、岳进升、王宇先等20来人，也都参加了清帮，他们的班辈，有的是无字的，有的是学字的，还有的早拜刘长荣为师是通字的，也都因此而取得工作上的便利。（此外还以帮的关系，吸收一些有职业的青年做密查工作，如马映光、吴希圣、毛郁文等人。）从此我组的“耳目”就比较过去大大地灵通了，报告的材料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至于报告的内容，比较重要的能记起来的，有武川县县长席尚文的贪污，集宁县县长赵承绅的贪污，绥远电信局局长王继畬的贪污，绥远公安局裴会的贪污，包头县绅士李聚五、牛申之的不法，固阳县科长张国玺的不法，兴和县绅士王宾绶的不法。这些问题的查出，都与帮内人的帮助有关。其中经过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绥远电信局局长王继畬的贪污，由于他的管料员是清帮，被我组密查员以帮的关系，向这个管料员进行拉拢而查出的，他买料是买少报多，用时是用少报多。

但我这个利用清帮的办法，是否得到傅作义的同意呢？可说是得到的。我曾将这个做法，当作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报告给他，他开始不作表示，我就猜想他的心理，并不是不愿意这样做。如果不愿意，他在当时就会提出来阻止了。他不作表示，是怕允诺后，被我传出去，帮内人会借着他的名义在社会上招摇，与他的声名有碍。因此，我为了解除他这点疑虑，便说：“这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做，与主席不发生关系。”他便点头允诺了。我照计划做去，报告一天比一天增多，他很感满意。有一天，他愉快地告诉我：“你可以和刘长荣那些人多联系，做好这个工作，并要在调查贪污不法以外，附带调查地方情况。”接着不几天又发表刘长荣为绥远省政府调查员，叫刘尽可能利用清帮的关系，做百灵庙和绥东敌伪的情报工作，可见他已经是公开地要利用清帮了。

在利用刘长荣方面，傅作义得到的甜头更多。刘接到这项情

报任务后，即运用帮内人从归绥市到敌伪区各旗县，组织了一个情报网，并且还派些人化装打进李守信、王英的部队里，因而对百灵庙德穆楚克栋鲁普如何搞自治运动，日本人如何进行侵略活动，伪蒙军的人数和装备，得到了不少情报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那一次百灵庙战役的胜利。刘长荣还利用清帮关系，把动摇不定的绥东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争取过来。当德穆楚克栋鲁普以达密凌苏龙是他的老朋友，屡次以复兴蒙古民族相劝，要求达归向于他，达甚为动摇。傅作义侦悉后，以正黄旗在绥东和敌伪接壤，如达有变，不仅威胁前线，并且影响后方人心，甚为着急，便叫刘和慕幼声同去正黄旗，要求达共同防御敌伪。刘以达的亲信秘书赵××是清帮无字辈，便利用此关系，请赵向达做工作。经赵多方劝说，达才坚定下来。刘向傅转报后，傅即委达为“司令”（绥东蒙旗兵司令），拨给了些械弹，达甚为高兴，即和刘结为金兰好友，并送刘好马一匹。经过这一事件，傅作义更看重了清帮，不久即委刘成立绥远国民兵骑兵团（因臂伤未到差，骑兵团始终未成立），直到抗战时期，仍继续利用刘搞清帮，这是后话。

在那时，我和刘长荣的关系搞得非常密切，一方面是我要利用他在清帮中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他要利用我和傅作义接近多。因此两人经常会面，比其他帮内人都亲切。他有了地方军政人员的情报就告诉我，我得到敌伪活动的情报也告诉他。他曾把小儿子刘吉悌介绍给我当密查员，我也把没有参加清帮的密查员，介绍参加他这一帮。就这样搞了有二年。百灵庙战役后，我离开密查组，彼此没什么可互相利用了，才渐渐地淡远了。

除傅作义这样利用清帮外，其他警宪机关的大小首脑也利用清帮。省会警察局长袁庆曾亲自参加清帮。所属分局长郑冠三、韩伯琴，侦缉队长薄仁山等人也都参加；宪兵司令副参谋长张公亮、参谋高恒也都参加。他们的目的和我是一样，都是为了打进清帮，用作侦察的工具，不过侦察的任务有所不同而已。同时，我还了

解到我组的个别密查员，以清帮关系给他们找情报，两头“吃”。

此外，我领导密查组两年多，虽然利用清帮查报了不少的贪污不法材料，但傅作义认真究办的极少，即使有所究办，也只是捕打几个苍蝇（如有的连长吃一两个空名子、军需冒领点款、税务员开了大头小尾的税票，不幸被我们碰上查报了，因而受到处罚，其实这是普遍的现象），或者是靠山不硬的（如武川县县长席尚文的靠山不硬，就是由我组查报他有贪污500元的线索，经傅令省府复查丢了官的）。至于靠山硬的，如集宁县县长赵承绅是赵承绶的弟弟，电信局局长王继畬，是建设厅长冯曦的亲信，塞北关监督张秀升是阎锡山放下来的人，虽然查报他们有重大的贪污，傅作义也不想触动他们，只是把材料看一看就完了。同时我还了解到傅作义本身也并不是干净的，他把各地人民对绥远抗战的捐款，大部分挪用开了“共济社”做买卖，名义上说是为全军谋福利，实际上都作了他自己的买卖资本，由他的亲信王子才，在各大城市广为活动获利无数；至于他叫军需处向上虚报冒领，就更是常事了。特别令我们难过的是，在我组查报有某人的材料时，傅为了表示信任某人，竟将原报告交给某人看（这些人都是亲近他的大官），结果某人对原报告人永远怀恨，借机报复。如傅的参谋处长张濯清，就被我组密查员麻带雨查报过，说他吃某些军官的贿赂和吸大烟成瘾，傅即将这个报告转给张看，张对麻带雨始终衔恨，后来麻到部队，遇有保升机会，都被张压下去。至于我被这样的人视为仇敌的就更多了，甚至于他们有的遇到傅作义对他们要态度时，都疑心是我在暗中说的坏话。因此就使我感到象傅作义这样做法，如何能制止贪污。他是拿着我们做幌子，虚张声势，叫我们替他挨骂，把我弄成众矢之的；而且我对他如此卖力，他也并没有给我加官加钱。还有好心的朋友劝告我说：“你快不要干这个了，你能保险你的密查员说的话都对吧？如果查报错了就‘缺德’了，就是傅作义不办，也给人家抹了黑。”我想了想，不

但不敢保险密查员，连自己也不敢保险，因此就向傅作义表示不干。傅起先还劝告，后来看我一再表示消极厌倦，便把我调为绥远省政府设计室主任，从此就离开了密查组，这时已经是抗战的前一年夏天。

我到设计室后，因是领着一些新毕业的大学生搞设计，无利用清帮的必要，也就不再继续做利用清帮的活动，所有旧日交好的帮内人，就都逐渐地淡远了。

八、中央特务和绥远清帮

我和张宣泽虽同在绥远省政府供职，但开始我只听说他是中央介绍来的，并不了解他的底细。至于他介绍我参加清帮，我当时也只认为是一般朋友性质的帮助，不认为还有其它目的，接着在我参加不久，他就以帮的关系和我亲近了，并且时常有意无意地问我傅作义的政治态度和当地军政人员的情况，但我还不大理会。到1935年春，有中央的“蒙古旅行团”到了归绥，住在新城东街旗填巷姓倪的院子，恰恰和我是院邻，团长是李才桂。在他们来了后，社会上就有些传说：“他们打的是旅行团的幌子，实际是要做蒙绥的军事和情报工作，这些人都是蓝衣社的分子，蓝衣社是蒋介石的秘密组织。”这时候，我心里就想，蓝衣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团体？我倒要了解了解。在和李才桂认识了以后不久，张宣泽也来了，把我和李拉在一起说，大家都是帮里人，李也是兴武四帮通字辈。接着李就约我和张同往刘长荣家去拜访，叙一番清帮交情，并请同到麦香村吃饭。我和刘也回请了他们。从此李也同张宣泽一样，常常找我闲谈，有意无意地问我绥远的军政情况。同时，我也听刘长荣对我说，这两个人常常到他那里问长问短。由此我才觉察到这两个人都要利用清帮关系作情报工作，把我们俩看成他们利用的主要对象。我因为那时傅作义对我还看得

起，颇感知遇之恩，便对刘说："他们问是问，咱们可不能出卖主席。"刘说："那是当然的。"但同时我还有一些想法，我认为当时傅作义在绥远的处境并不是舒服的，除了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百灵庙搞高度自治和他对立外，特别是阎锡山这个婆婆，对绥远军政大权，都不放手。阎在绥西派有嫡系部队王靖国，在绥东派有嫡系部队赵承绶，把傅作义的部队夹在中间；行政方面，以他的亲信冯曦（建设厅长）对傅作义无形的监视，这都使傅很受制，无可奈何。因此我认为傅作义如果这样跟着阎下去，日久天长，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并且从全国来看，晋绥不过是一隅之地，泥潭里翻不起大浪，鸟儿应该向高处飞。因此也就认为傅作义要想有发展，不如投向蒋介石，这是替傅想的一方面。同时，在个人方面，因看见中央派来的李才桂这些人，举止豪奢，花钱如流水，由不得眼红心热，从而想到跟着傅作义蜷居绥远，究竟是出息不大，如果傅作义能走蒋介石的路子，他有了发展，我个人也能随着升大官、发大财。从此这两个人一问到傅作义时，我就把傅作义受阎锡山挟制的这些话说给他们听，并说傅虽想脱离阎锡山，但没有力量，不能不相机应付。中央要分化阎的力量，就应当多方面培植傅作义，对付蒙古的变乱，也只有傅作义能对付的好。这些话，刘长荣也同意，他也是这样谈。他们在表面上都认为我们说的有理，但是否真以为然，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俩这种反阎投蒋的思想，和阎的排外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俩都是外省人，万一傅被阎弄下去了，我们在阎势力下不可能吃得开，所以愿傅离开阎。）

我和张宣泽、李才桂的拉拢及对傅作义处境的看法，并不瞒着傅作义，并向他说，应利用他们替咱们向中央说好话，这比较有效力。傅作义听了后，面带微笑，不作可否。但不几天，他就专请蒙古旅行团的全体团员在绥远省政府内宴会，并对这些人表示得非常亲切。特别是他历来宴会客人，都没有请我作陪过，而

这次竟只请我和张宣泽作陪，并告李才桂有事可和我们俩联系，究竟他心里有什么意思，这就不言而喻了。

由于这样，我便和李才桂一天比一天接近，经常聊天。在那时，我因傅作义叫我在密查地方情况（在这个任务上，傅只说碰着什么查报什么，并没有指出重点），虽说是附带，但也查报了不少材料，如绥远乡村建设工作的不同反映、地方党派互相斗争的内幕、阎锡山和中央派来人员的活动（最显著的是我组密查员张文海在邮电检查中查出《边疆通讯社》社长赵尺子不少秘密通信，赵也是中央派来绥远的特务，他的密信是用药水写的，但一经火烤就显出来了）以及当地军政人员生活的形形色色，我都查报过（多不深入）。因此在他问我时，我就以此和他谈，但只就有利于傅作义的，不利的就不谈了，即使谈也是把坏根子归到阎锡山名下。如绥远种大烟就说是阎锡山的指使，“禁烟稽查处”是阎直接指挥的机关，在绥远收土又敛钱，傅作义并不愿这样干。在共产党问题上，他虽问我，我却没有什么具体的可说，因为傅作义没有特别指示我查报，只当一般的地方情报看待，没有作为重点。傅还把一个有共产党嫌疑的军官杨雨帆，放到我组里当副组长，也没有叫我特别注意杨的行动，同时我也没有发现杨有什么秘密活动（杨抗战后到山西解放区），只是密查员报告过宋志刚的女儿宋守莲有共产党嫌疑，我向傅转报过，也未作深究，此外再没看到什么材料。但这并不是我有意忽视，而是傅没有特别指示和我没有多碰上的关系。

过了些时，我弄清楚他们来绥远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各蒙旗打进军事人员，去掌握蒙旗的武装力量，从而瓦解蒙古的自治。他们搜集绥远军政情况固然重要，而搜集各蒙旗情况更为重要，但在这方面我不专作蒙旗情报，不如刘长荣了解的多（刘这时已经给傅作义组织清帮情报网，调查蒙旗敌伪活动），因此就叫李多找刘谈。刘也因彼此都是帮里人，尽量地告给他。

与此同时，我也常常问李："中国是否能把日本人打出去？中央为什么不动员打？共产党是否能剿除？"我还一再问他中央对傅作义的看法，他只是抽象地说："对傅的看法很好，认为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军人，蒙边的事，一定要依重他，但对阎锡山也不能不应付一番。"此后因交往较久更熟惯了，我便问他蓝衣社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始而他不承认，后来我以社会纷纷传说作证，把他逼急了，他说："即使有，也没有蓝衣社。"（直到前年，我看了文史资料选辑康泽写的关于复兴社的史料，才知道当时只有复兴社，没有蓝衣社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是刘健群个人向蒋介石建议提出的）。我又问如果有了，我们能参加不能？他说："不好说，那须要经过多方面的考察。"后来我又进一步向他表示要参加（这其中虽也有点想看看他们的内幕，而最大的目的是想借此抱蒋介石的粗腿）。他说："这里办不到，将来我回南京见了他们再说，这是由于咱们帮里和朋友的关系好，我才这样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数月后，他回了南京，随着就来信说"此事办不到"；又说他不再来绥远了，所有蒙古旅行团的事已交给团员常荫森代理，希望我多和常荫森及阎家屿（阎当时搞中央军校通讯活动，也是特务）联系，并帮助他们。我这时很感到失望，并认为李是中央参谋本部的课长，是黄埔三期学生，和当时要人多有交往，在南京尚办不到，说明他们俩人官小职微，作用不大，我和他们联系能联系出个什么名堂？这明明是敷衍我。因此我就对他们不感兴趣，虽然常荫森还有时找我谈，我也只是淡淡地应酬，不和他说什么有关系的话。我想他们不让我参加的原因，可能是认为我做的是傅作义的密查工作，怕傅作义叫我打进他们的组织，捣他们的鬼，因此只能是以清帮的关系，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外围而已。

在刘长荣方面，除李才桂、张宣泽利用他外，还有人说另一个国民党的特务艾香亭也利用他。这个人来归绥后，在牛桥下开

济盛元马店作掩护。为了利用刘长荣，专拜刘为师，并请到他店里住家，不要房钱，照顾毕至。其中详情如何，没听刘谈过。

由上可见，傅作义要利用清帮为他的统治服务，蒋介石特务要利用清帮作为特务活动的外围，甚至于封建的王公康达多尔济，也要在清帮上打点主意。在这时，绥远的清帮，广布在社会上中下各个阶层，好象人多势重，显着兴盛，但实际上已经为剥削阶级所把持。同时，在家里义气上，也好象有些人交往亲密犹如家人，但实际上是互相利用，各有用意，一旦无利用后，就视如路人，我在抗战期间就亲身经过类此之事。因为那时我在傅作义面前失宠了，很不得意，想另找出路，听说张宣泽在兰州（他是抗战前离开绥远的）当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大女婿（还听说朱的大女儿给朱管家很有权力），借裙带关系大走官运，我便想起和他在绥远有清帮的交情，托他在后方给我找个一官半职。不料去信后，他连理也没理，使我很伤脑筋。但后来一转想，我们这些人的清帮交情，本来就是互相利用，根本谈不到什么家里义气，现在自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当然人家也就不理了。不仅人家是这样，就是自己也是这样，如自己不干密查组，就和清帮的朋友淡远了，不就是个例子吗？因此对清帮就不再存什么幻想，仍然跟傅作义干下去。

九、刘长荣留绥和民生会的成立

抗战开始后，傅作义率部由大同撤往山西内地。不久日军即侵犯归绥，傅作义令绥远军政人员向山西撤走，一部分国民兵自行撤到后套。刘长荣那时没有能随着撤走，据他家中人说，是因骑马摔伤，在家中将养不能出门之故。但后来人们谈论起来说这不是他留绥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他留恋自己的房产家财和怕走出去受艰苦。也有的说，当时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撤往山西，日本军

迅速打到归绥，他在家中仓皇失措，待想走时，部队已撤出，便跟不上了。但不论如何他是留在归绥了，最后演出了一出悲剧。

在日军侵占绥远后，开始对清帮尚无暇顾及。到1939年，就着手利用它，指使清帮的首领们在张家口筹办“民生总会”，目的是要把伪蒙疆的清帮成员统一组织起来，在张家口特务机关直接领导之下，作其特务工作。

日本人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由华北的特务机关从北京把清帮大字辈的首领蒋万春、顾炎年、宋殿邦（吴鹏举已死去，王若瑟不详）请到张家口，刘长荣也同时被电邀去，这几个人被推崇为“民生会”的元老，号召一切；随着就叫张家口通字辈的清帮首领祖呈焜负责筹备成立“民生会”的实际责任。祖呈焜是华北著名汉奸殷汝耕的亲信人员，在殷汝耕成立伪冀东自治政府、分裂祖国国土、献媚敌人时，祖担任殷的秘书，发了不少财，后来不干了，回到张家口，拿他的赃钱大作旅馆、饭店等买卖，并拥有清帮徒众，成为张家口的坐地虎。这时日本人把他起用搞“民生会”，他就和张家口的清帮头子金小忠（通字辈）、魏健（无字辈）着手筹备，于1939年4月间召集到各地清帮首领，开了成立大会。

在开会时，张家口的伪宪兵大队负责人和伪蒙疆政府内务部部长王振华都到场讲话，大意说：清帮的人都是大大有用的人，虽是个团体，但没有能统一起来，这次成立民生会，就是为了把这些有用的人组织在一起，协助皇军作有利民生的事。现在首先要作好登记工作，把所有的帮里人都登记进来，然后再发展组织，帮助皇军和政府作好调查工作。接着就在张家口设民生总会，以清帮大字辈的师父们为元老，在元老下设理事会，由祖呈焜任理事长，魏健任秘书；清帮成员较多的地区设分会，分会设干事长一人，干事若干人。计有宣化分会，干事长为金小忠；平地泉分会，干事长为朱尚真；厚和（即归绥）分会，干事长为元老刘长荣兼；

包头分会，干事长为刘寿山；萨县分会，干事长为崔江。分会由当地特务机关就近直接指导，下设6个股：①登记股；②调查股；③会计股；④朝奉股；⑤传道股；⑥总务股。发表后，因各地区的干事长都是当时与会之人，日本人即叫原地着手组织，有问题可向当地特务机关请示办理。

刘长荣回到归绥后，即暗告王明远说："我看这事情要坏，日本人组织民生会是要把我们都登记起来，等到登记齐了，好把我们一网打尽。我听说日本人进了东北后，就有过这种做法，但我们现在又不敢不登记，只好照着办，听天由命罢了。"王明远说："那也只有这样，别无他法可想。"接着厚和市的特务机关就叫刘长荣着手组织，经刘和帮内的人商议，厚和分会设干事13人，他本人兼任干事长，干事为张子含、张占鳌、王明远、于化门、韩令文、李同、王志诚、孔夏亭、胡清源等人。下设6个股：登记股长为佟树屏，调查股长为贾生福，会计股长为崔凤仪，朝奉股长由李同兼，传道股长为王志诚，总务股长由张子含兼。随着即召集帮内成员开成立大会，宣布一切，厚和市伪军警宪都派员参加，特务机关的宫琦亲临讲话，内容和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所讲的大体相同。会后即向刘长荣和干事们要求履行以下的任务：首先是要调查中国抗战军队的方向、距离、人数、兵种、装备及活动的情形，特别是要调查共产党的八路军，其次要调查日伪军警及汉奸特务们的不法活动，再就是要调查地方的年成丰歉及人民的生活情形，这不过是附带的作调查，以应付民生会的这个幌子而已。在经费方面，日本人不发给，由帮内自己筹划。地址设在旧城剪子巷凉城会馆内，刘长荣则仍住牛桥济盛元马店内自己家里。

在进行登记手续上，规定凡上过大香的安清道徒，均须到会登记，并发给登记证和徽章。登记证是由张家口总会统一印制，其形式为一硬纸折，折面印"义气千秋"四个大字，折内印帮头、辈次、姓名籍贯、出生年月日各栏，并勾画有"防共"两个虚线，可

见日本人在当时对清帮的用心所在。徽章为铜质，黑边紫地，内画太极图，又叫阴阳鱼，表示道贯阴阳。背面还有“帮丧助婚”、“义气千秋”等字。在登记时，有本帮师父证明，本人申请，经登记股报由干事长批准，即办理手续和发给证章。同时对新吸收进帮的人，规定各帮均须在民生会里摆香堂，不得在会外私摆。

在经费的筹划上，主要是收会员的登记费，每人收两元，除登记证和徽章开支小部分外，均归为会用。再就是摆香堂，每次用不完的香堂费，亦归为会用。另外是每年包卖历书、月份牌，把赚来的钱作为补贴。这一笔买卖，也可说是日本人特许“照顾”的。因之民生会虽日本人不给钱，仍能够自给。

十、刘长荣和各方关系及刘长荣之死

首先谈谈刘长荣和傅作义的关系。傅作义在退到山西后，仍不忘情于绥远，不忘情绥远的清帮和刘长荣。刘长荣在当时虽顺从了日本人，没有离开绥远，但亦不忘情于傅作义。因此傅作义在1938年进攻绥远前，就派谍报薄仁山和刘长荣联络，要刘帮助做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刘对薄尽力帮助，供给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傅作义那次进攻虽未得手，亦对刘甚为重视。1939年，傅到了后套之后，对刘更想充分利用，不但要他做情报，并要他做策反工作。据刘吉悌亲见：傅作义在1939年三四月间，曾派三十五军书记张庆武（刘的远房表亲）、中尉排长赵成勋（刘当营长时的老班长）到刘家中，送给刘一个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招抚司令的委任状。状是在一块白绸子上写的，盖有关防及傅作义的名章。刘见后即交其长子刘吉孝带到集宁，埋在自己的院内，随着就组织招抚司令部，以杨丕滋为副司令（原绥远兴和县士绅，民国报编辑，刘的徒弟），邢寿臣为参谋长（由伪蒙古军总部的嘱托，后来调伪包头市察务科长），费德明为副官长（原绥远省政府的密

查员），张子含、张占鳌、范秀锋等部分任司令部各处首脑。从此就大开山门，积极地拉拢伪蒙疆的军政上层参加清帮，作策反活动。在伪蒙军中吸收有4个师长为徒弟，计有第一师长刘继广（山东人，和刘认本家）、第二师师长陈升（热河人）、第三师师长李明远（热河人）、第五师师长刘建华（华北人，后调厚和警察局局长，以包贵廷代），此外还有伪蒙军一个宪兵大队队长李铁生，伪蒙军防共第一师师长李维业，这些人都经刘说好，愿投傅作义反正，并电请傅批准加委，给了番号，令待机反正（电台先由伪蒙军秘密通讯，后自设）。在政界中所拉拢比较知名的有伪蒙疆高级法院院长关怀青、检查厅厅长王庆三、厚和市地方法院院长李建安，都拜刘为师，主要是为了帮内人犯了案有关照。

在另一方面，刘更积极地调查敌伪军的军事情报。特别是在打包头、打五原的两个战役中，傅作义急于要情报，他们越发地忙起来了，每天都派人侦察铁路兵车来往及汽车出动的兵种、兵力情况；每天都向这几个愿反正的伪蒙师长要敌人的军事消息；每天晚间都要到他们秘密聚会所——新新饭庄去碰头研究。刘长荣还亲自到过包头两次，布置这个工作。

刘长荣和绥远的抗日救国会，也有密切联系。有不少的抗日救国会会员，为了找“掩护”，进入了清帮，魏大贤就是其中的一个。刘给过他300元蒙疆钱，介绍他和新民药厂的刘慎行（通字辈）合伙作买卖，由此得到掩护。有人向刘说魏是共产党，刘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人，抗日救国就好。他还给魏买过子弹，并代发过抗日救国会的传单。同时他对大青山的自卫军也很关照。有一次自卫军司令于存灏派到归绥的谋报躲藏到他家里，警察要逮捕，他坚决拒绝，终没有被抓。

在和国民党特务的关系上，前边已说过，济盛元马店经理艾香亭，是个老特务，在抗战前对刘极为殷勤，人们就认为刘被艾利用，到这时，艾和刘住在一起，更为亲密，吃用不分。人们从

他俩的关系上看，认为刘可能已被艾拉到特务的圈子里去。还有人说，伪蒙古军有一个少尉阚××、无线电报员陈杰，都是国民党军统系统的人，他们做情报，刘给他们掩护过秘密电台，也关系密切，有可能把刘拉到军统圈子里去。但据张子含等谈，刘和他们都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他面不阻人，这些人利用他帮忙是可能的，但他当时却是一个心眼向着傅作义。。

在对日本人的关系上，那时驻绥的特务机关长是少将小仓达次，辅佐官是末松，情报主任是宫琦，民生会就是由宫琦直接指挥。宫琦手下有两个特务腿子，名为"嘱托"，一叫王葆琛，一叫胡云泉（字骥猷）。这俩人都是马占山的部下，在黑河作战被俘，经日本特务机关留用，又把他俩派来绥远工作的。王葆琛被派到厚和市商会工作，胡云泉被派到民生会工作，从此胡就在刘长荣和宫琦双方之间联系一切。这时宫琦主要是叫民生会的调查股多供给有关抗日军队的情报，刘长荣为了应付宫琦，一方面用好吃好喝买哄胡云泉，一方面叫调查股的徒弟们到厚和市警察局抄写该局获得的情报，经过整理转报宫琦。此外还叫他的徒弟李维业把抗日军队的布置情况，制成图表报去，当时绥远特务机关对他们还不作过高的要求，胡云泉又从旁多添好话（帮内人有的说胡是八路军派去做地下工作的，尚待证实）。这就在表面上把宫琦应付过去了，而刘长荣则主要精力放在给傅作义做工作上。

但这时张占鳌却看出危险来了，他告王明远说："咱们老头子要两面吃，我看象他那样的脑筋简单，不会弄成，只有招祸，我怕将来要受他的牵连，不如走开。"于是他就把豫芳照相馆交给别人，带着家去了北京，但刘长荣和其他人还认为没什么。

不久，他们勾通傅作义的风声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辅导官末松率宪兵、特务到凉城会馆民生会的办公处去检查，把房上的瓦都揭翻，砖下的地都挖掘，但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接着末松又来个测验，请刘长荣、李春秀（伪厚和市长）、张兰田、贺和厚

（前任市长）、王明远等人吃饭，在饭后就叫他们写信劝傅作义投降，他们哪敢不写，由张兰田执笔，他们盖章。信中大意是：这里从日本皇军到来后，各方面都好，皇军很敬爱你的为人，盼望你以地方人民的和平幸福为重，不要再继续抵抗，如果能速来归顺皇军，绥远的军政大权，可仍归你执掌。写完后末松看了同意，即令刘长荣派一民生会的人，骑着驴子将这封信转到西山嘴的中国军队，并得到收条。但后来也没有见到傅作义有什么表示。而刘长荣在旧城振大旅馆里闲坐，却接到了个匿名条说："你们劝降投敌，是汉奸行为，早晚要大祸临头。"刘大为吃惊，告王明远说："了不得，有人要杀我们哩，这真是不写也要杀，写也要杀，没法子。"王明远说："可设法去电报，向中国方面多多解释解释。"以后再没见出什么事。

从此，末松不再作纠缠，但不久日本人因傅作义部队攻包头，在包头城内有内应，使日本人吃了亏，便对中国谍探和爱国人士的查缉，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了。到了1941年农历正月初八，在厚和查获了绥远抗日救国会，逮捕了共产党员贾恭、爱国人士段敬斋、郑廷相，中小学教员阎继璠、聂士俊等100余人。王明远、张子含都被株连在内，扣押在日本宪兵队内。到了四月间，刘长荣的次子吉悌被捕，又隔了七八天，刘本人亦被捕，都扣送日本宪兵队。

刘被捕的原因，说法很不一致，据刘吉悌说，这是由于送招抚司令委任状的赵成勋、张庆武二人要向刘长荣借大量的钱做买卖，不愿意再回后套（因傅作义在他俩来时，曾说要在包头给刘2万元的活动费，但刘仅收到数千元，这两人想把大部分都借去），刘长荣拒绝了他俩的要求，因此就挟恨向日本人告发。赵成勋还在日本宪兵队当堂对质过。据王明远听到的原因是，由于蒙古军军部电台的破获。首先逮捕的是和刘来往亲密的阚少尉和电务员陈杰，并搜出了一张名单，都是化名，刘的化名叫刘清华，因此

就把刘逮捕了。在电台破获后，日本人还叫陈杰照常和对方通讯，但通了两次就不通了。又据张子含说："刘的被捕，与抗日救国会的暴露有关，因为刘和我都以民生会的会员名义和符号多掩护过抗日救国会的人，在抗日救国会暴露后，就有人把我和刘供出，但抗日救国会究竟因什么暴露，谁也没弄清楚。"

刘长荣被捕送到日本宪兵队时，张子含、王明远都还押在那里。他们亲眼看见把刘用汽车押来后，摔在看守所的木栅子外，刘看见他们在棚子内，还说："你们的问题和我不同，你们是得罪了人。"他们因为他不知道宪兵队里的厉害，怕看守兵发现，还向他摇手示意，不让他说，其实他说了是想开脱他们。接着日本人都在隔院子里提讯他们，很清楚地听见板子声、扛子声、铁链声和刘长荣的哀号声，真是闻之心酸。讯完后刘已不能行动，由人拖着送到看守所，因看守所人满，便把他仍在栅子以外。

当时日本宪兵队可以说是人间的活地狱，烧烙铁、灌煤油、狗咬、过电、悬吊、刺竹签、穿笔杆、踩图钉、栽坑、坐冰卧雪、雨水浇、钻水缸，等等非刑，无所不用。至于鞭打棍敲，饥渴困逼，那就更不用说了。但如能熬过两三堂，找不出证据就有可能保释出去。如果是熬不住招了，那就放不出去了。张子含、王明远、刘吉悌，虽经过灌凉水、悬吊等刑，因没有招讯，隔了些时就保释出去。刘长荣因受不住酷刑，便招认他是傅作义的招抚司令，日本人就把他定了案，送到张家口。据张子含说："当送走的时候，是五月端阳节的前几天，日本人用一辆大卡车装载他，他在车上向我们被押在牢房的人大喊着说：'我是为国家牺牲的，我谁也没有出卖，我死后大家看着办吧！'说完后就被日本人押走了。"但另据费德明说："刘是把我们招了出来的，辛寿臣在包头就因此被杀害，杨丕滋、李毓芳因闻风较早逃走了，我也被扣捕过，但在被押解时，我在路上乘敌人不注意也逃走了。"也还有人这样说："刘可能是没有拉扯别人。如果扯到蒙古军一、二、三、四师的师

长，日本人非把蒙古军加一番大清洗不可，但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可见刘并没有什么拉扯。”

刘到了张家口的日本军法处后，被判处死刑，听说执行时是用汽车拉到大境门外的河边上，把他吹了头，连尸首都扔到河里。和他在一起砍头的，还有绥远抗日救国会的董五三（包头商会会长）、王绪卿（清帮、包头市政府科长）等10余人。他死后张家口的帮里曾多方打捞他的尸首，但始终没有捞到，他的一生也就从此结束。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回到归绥，刘长荣的儿子吉孝、吉悌去见傅，傅说：“你父亲是为国家牺牲的，我当负责，以后当对他有所表示。”并给他们点钱，但后来傅作义因忙于反共反人民的军事，就再不提他了。

十一、绥远民生会的改组和王明远

在刘长荣被捕后，厚和民生会的干事长由李同代理了七八个月。这时，刘长荣已被押送张家口，王明远和张子含都从日本宪兵队被释放出来，经该会正式选举王明远为干事长。

在王未被选前，胡云泉曾向张家口总会的祖呈焜保荐王担任此职，祖不同意，想叫他的亲信胡宪章（通字辈，和祖同帮）担任，但魏健却同意王明远，经议定由厚和民生会选举，并派魏健监选，结果王明远得了全票。

王明远是河北省沧县齐家务村人，祖辈务农为业，在幼年时，除务农外还读过几年冬学，略识得几个字。17岁到天津四站汇通公司充杂役，被老板看重，逐步提拔粮厂管理员，整年跑外，一直升到绥远天亨粮栈经理。就在这个时候，拜了北京清帮大字辈蒋万春为师，并广收徒弟，逐渐地在清帮里树起自己的势力。后来因娶平康里妓院老鸨石二奶奶的养女林富仙（唱化衫的兼营妓

业）为妻，为公司所不满，因而被辞退出栈。不久由绥远电灯公司经理武葸卿介绍，当了该公司的交际主任，借交际的机会，更进一步搞清帮活动和各种迷信活动，而且随带着对各种迷信会道门，如纯一善社、理门公所、万国道德会等。无不参加，势力逐日扩张，成为清帮中知名的活动人物。至此正式接任了刘长荣的干事长的职位，当了清帮的大首领。

王明远继任不久，伪蒙疆自治政府正式成立了，察绥的民生会也随着扩大改组。原有的张家口民生总会，改组为伪蒙疆自治部民生会中央本部，原有厚和分会改组为巴盟民生会地方本部，包头分会改组为伊盟民生会地方本部，宣化分会改组为宣化省民生会地方本部，并发表中央本部部长为祖呈焜，宣化地方本部部长为金小忠，伊盟本部部长为刘寿山，巴盟地方本部部长为王明远。

在厚和民生分会改组为巴盟地方本部时，首先将原有 6 个股改组为 2 个科，一为弘报科，仍与过去的调查股任务相同，由胡宪章任科长，贾生福副之；一为总务科，掌管登记、朝奉、会计、传道等事项，由张子含任科长。其次在各地分设 4 个分会：①厚和分会，干事长由王明远兼；②平地泉分会，干事长仍为朱尚真；③丰镇分会，干事长为孟凤三（通字辈）；④托克托分会，干事长为白涤清（杭三帮无字辈）；⑤凉城分会，干事长为高树德（无字辈）。

十二、王明远和各方关系

王明远当了巴盟地方本部民生会的干事长后（以下王自称为“我”），民生会的势力一天比一天扩大，较刘长荣在世时超过了好些倍。主要是我向各方面拉拢的好，特别是我和日本人拉拢的好。我常向手下人讲：“一个人在世上，要腰里多有几张牌，看谁需要哪一张，就给他哪一张，可不能只用一张牌。”这些话，很可以代

表我在当时的想法和做法。

在日本人方面，我认为日本人的最高权力是操在日本的大特务和高级军官手里，只要能把这些人买哄好了，就什么事都好办。因此就尽力的巴结他们，投其所好，究竟他们好些什么呢？虽各有不同，却都是想来中国找甜头的。如那时的特务机关长是少将小仓达次，他最爱好字画和古玩，我便买当代的名人字画和好古玩送给他。又如掌握厚和市政府实权的顾问小岛育男，他最爱穿阔绰的服装，我便买一件上等的狐皮大氅送给他。又如在蒙古军最有权势的总教官纳须，他看中了一把战刀没钱买，我便很慷慨地拿出200元钱借给了他。其他如日本驻绥军部队长石黑，特务机关的辅导官末松，情报主任宫琦、山本、关口，宪兵队队长梅川，特务主任河野，我都送过厚礼，使这些日本人眉开眼笑。同时我还买通这些日本头子们的亲随人员，使他们常常在主子面前替我吹嘘。甚至于这些日本头子们常去的地方，我也注意到应怎样利用去作巴结。如在东顺城街宪兵队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小料理馆（即饭馆），小仓达次和石黑部队长常好到那里小吃。这个小饭馆的主人，是一个年老的日本妇女，我便尽量买好这个妇女，在吃饭后多给小费，并也请小仓达次等到这里吃饭，这个妇女便对我很喜欢，在小仓达次等面前，给我说了不少好话。

其次是我知道日本人组织民生会，是为了防共、防抗日部队，想叫中国人顺从他们。我便在日本人面前尽量赞扬“日本皇军的德政”，并顺着日本人骂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等于洪水猛兽”；骂国民党是只知道要税要捐，刮地皮，不知爱惜穷人，这就使得那些日本头子们听着声声入耳。日本人为了试探人的心理，常常用酒把人灌醉之后问话作测验。有一次我和日本头子们在一起饮酒，我被灌得似醉非醉之时，便假装着醉了，一个日本头子问我：“中国军、八路军的好？日本皇军的好？”我便醉声醉气的答道：“日本皇军大大的好，中国军、八路军大大的王八旦。”这个日本头子

听了后就哈哈地笑了。此外我为了颂扬小仓达次在绥远作特务的功绩，还送过金漆牌匾，上头写了些令人极其肉麻的话，使小仓达次更喜欢我。

再就是我看出来日本人重视迷信，因此我也就在这一点迎合他们。本来我就搞纯一善社、万国道德会、理门公所、道教会等迷信会道门，于是我就更努力去搞，使日本头子们看到无论哪一个会道门我都是一个热心支持的领头人，特别是纯一善社，我利用扶乩、假供神佛作号召，捐集了不少钱，连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都亲到社里请乩问事，并捐助款项。因此纯一善社就能够起房盖屋，施棺送药。每年冬季大开粥厂，有时领粥者达数百人之多，这就使日本头子们对我有异乎寻常的看法。有一次，小仓达次见了我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真是个好人，你是个慈善大家。"以后凡我对会道门的事有所要求他都尽可能地给以支持。

在对一般小特务汉奸上，我知道他们都是势利眼，欺软怕硬。在我已经取得日本大头子们的宠信和掌握了民生会的报告权力后，他们是怕我的。因此我也就利用这一点显示我的本领，做刘长荣所不敢做的事。一方面遇见他们胡闹就去干涉，以买好中国人的受害者。如驻在厚和市郊区孔家营子等处的小特务和朝鲜浪人，到市内向商号勒索钱财，逼迫妓女在饭馆里脱裤子等等，我就多干涉过，但我也怕他们怀恨报复，便给他们点好处，以示笼络。如在旧城人市街有个米面铺，这个铺子的老板朱耀离存有好些桶油，被日本宪兵特务讹诈，硬要没收。我出头干涉，不叫他们没收，他们就缩回去了。我又叫朱耀离送他们一些油，这样物主少受损失，特务们也得到一点油水，就两头都能讨好。此外，还有时为了扩张自己的力量，拉拢他们，收他们作徒弟。如伪蒙军宪兵队的曹教官到处吃酒打人骂人，勒索钱财，甚为凶恶。我就向特务机关报告，结果通知了他的总教官，把他严厉责罚。但因这个人对我有用处，又向他拉拢，把他收作徒弟。象以上这类的

事，我做过很多。

在和清帮内部人们的关系上，由于我得到了日本人的宠信，能干涉一些小特务和汉奸狗腿子，为了树立我在清帮中的声势，便尽量利用这一点给清帮的人们撑腰。最突出的是当时伪萨县县长张某在旧城云华池澡堂丢钱的一件事。这个澡堂是帮内人无字辈韩全文开的，张从萨县来到那里洗澡，说丢了200元钱，是茶房偷去的。韩向他解释，张竟把茶壶茶碗砸了，并把茶房打得死去活来，送到警察署押起。韩向我诉说，我就向伪市政府顾问小岛育男鸣冤，结果小岛育男听信了我的话，便把茶房放出，把张大加申斥，后来张还因此几乎免了职。又如旧城海窟的居民王老毛，在城南茂林太买猪到城里卖，恰遇当地老财李麻子丢了猪，硬说王买的猪是偷的他的，并依仗特务势力，将王老毛送到警察署，苦打成招。经王的亲戚王庆年（清帮无字辈）托我向伪警察署苏署长解说，便把王放出来，不再要猪。其他类此之事还多。因此清帮人都认为我能办事，能给他们撑腰。只要我在帮内有什么建议，没有不支持的。如向日本头子们送贵重礼物，大家就设法给我凑，用不着掏自己的腰包。这不但使我在清帮内树立了声势，并且影响到社会，使一些人认为清帮在日本人手里吃得开，有力量，从而愿意参加民生会。

在对待抗日部队和爱国人士上，我虽然为了个人利害，丧失民族气节向敌人屈膝献媚，但也想到日本人会不会长久？如果中国胜了自己又怎么办？这就使我对抗日部队和爱国人士尽可能地想法应付的过得去。如在给日本人做情报调查方面，我没有认真对抗日部队作调查，仍然是由贾生福、冯世祥等利用帮里人，向伪警察署和蒙古军内部，偷抄各地敌探的报告，只是比刘长荣在世时，抄的勤一些，多一些。抄回来，由弘报科改头换面，加以整理，不但和人家基本上雷同，而且报到特务机关时，也落在人家之后了。此外虽也利用各地的民生会员，要他们调查报告抗日

部队的情况，也只是表面敷衍，并没有真正派人深入调查过。这都是怕国军回来和我算帐。因此日久天长，日本人就向我说："你们的报告都过了时了，没什么价值。"我说："民生会没有经费，本领小，只能做到这样，慢慢地来。"日本人也没作研究，为什么不研究呢？主要是我对特务机关那些管情报的日本人，如宫琦、山本、关口等，经常地送礼，请他们到饭馆子里大吃大喝，使他们对我有好感，就放过去了。

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我也掩护过一些抗日救国人士和解放区的人民。如共产党员于明打进厚和日本特务机关，作地下工作，就以清帮关系和我联系，我曾给他出主意并掩护他工作，还给以经济协助，把宫琦对付过去。于后来回解放区任团长政委等职，现任呼盟建设局局长，还和我通信。又如在河北省解放区曲阳县六百户村有恶霸王某被村民斗争死掉，其子王彭振在厚和经商，和伪警察署有联系，他一面想报父仇，一面想邀功，便去信诱惑该村的人说："我过去就反对我父亲的行为，你们做的对，这里花生棉花价钱很好，能赚钱，盼你们来卖，勿失机会。"结果竟被他诱来王汉忠、王老刁、王庆和、石小四、王志中等5人，王彭振即报告厚和市警察署将这5人扣捕。经严刑吊打，有的手指都被吊断，这5人承认是八路军的探子。日本特务主任关口要杀他们，他们的乡亲王庆臣（清帮无字辈）托我去说情，我就向关口说："不如把他们给我作情报员去刺探八路军，比杀了的好。"关口很同意，就交给我，我叫他们都进了帮。并陆续地打发他们回家，只有王志中一人被关口要了去给他搞特务。这些回了家的人，都对我极为感谢，曾送给我好些汉白玉刻的纪念品。直到前年，还因我年老寄来40元钱。后来日本人还有时把打得半死不活的中国俘虏交给我看管处理。如纳须就因借钱的关系相信我，两次交给30几个（内有八路军10多个），伪厚和市警察局长山田也交给40多个，我都送到纯一善社收养。养好后，趁着日本人不管，由他

们各自走去。还有的安置在善社的粥厂、学校里当服务员。

再就是大青山的八路军，有时找清帮人要求供应鞋袜、毛毡、文具等，我都叫我徒弟去办。在那时沿山坝口子、史家营子、红山口等村的村长们，都是清帮，在城上办好后，就交这些村长掩护运送过去。但在办的时候，我也怕是日本人用的诡计，冒充试探，便一切都推在徒弟身上，我不露面。因此一遇到这种事，便向徒弟们说："你们照着办就完了，不必提到我。"这样，自己从不出头。

在和会道门及其他关系方面，前边已说过。我把搞迷信会道门、办慈善，作为博取日本人的信任的资本。如对纯一善社粥厂的募集捐款，对在理公所的捧斋，对万国道德会、道教会的筹划基金，我藉着清帮首领的力量，徒众多、门路宽、势力大，都给了有力的支持。会道门有句话："无财不养道。"我这样做，就在财字上给会道门里的人解决了大问题，使那些吃道的道首们，皆大欢喜，因而也就对我特别奉敬。我只要到他们那里，都对我是鞠躬如也，殷勤备至，并且在社会上给我吹嘘，说我是怎样的好心，怎样的有办法，是绥远第一个"大善人"。影响所至，不但日本人信任我，就连绥远地方的名流郭象伋，对我办粥厂也表示过异乎寻常的钦佩。有一次他亲自向我说："你一个外方人到这里来，居然能办这样大的事情，真是了不起。"他还送了我一把扇子，在上面写了一首赞扬的诗作为纪念。

我这位大"善人"，在这方面是表现的如此慈眉善目，而在另一方面却假借日本人的力量去攫取钱财。由于我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头子山本的支持，当了厚和市俱乐部的监视人。这个角色是日本人的代理人，等于是俱乐部的太上皇。因此，我一到俱乐部，那里的人就把我看成如日本人来了一样，不仅是美酒肥肉，大吃大喝，而且是每期结帐都要给我送上两三千元的车马费。同时我还荐举了几个亲近的徒弟如贾生福、李成瑞等到俱乐部当差，每

月拿着百八十元的外快。这都是当时有些在台的高级汉奸们也想谋到而谋不到手的差事，我却谋到了。这个俱乐部设在厚和市南柴火市一个旧买卖家的空房子里。什么样的赌具都有，每天车马盈门，人声鼎沸，喝幺呼六，纸醉金迷。最大输赢，有一场到万元以上的。因而倾家荡产、寻死上吊、出妻卖子的，不知有多少，可以说是一个最罪恶的陷人坑。我在受到了党的教育以后才想到：我那时拿的那些钱不知上边沾有多少人家的眼泪。这和我搞会道门的假慈善相对照，正如人们常说，是“老虎脖子下带念珠”。

总的说来，我是以屈膝献媚的手腕得宠于日本人，以慈善家的面貌取信于日本人，从而假借日本人的势力，树立个人和清帮的势力。复利用此势力，压服少数的小特务和汉奸浪人，以买取当时社会的虚誉；复利用此虚誉，扩大声势，以提高在日本人面前的地位。因而我也就在当时的汉奸群中成为重要的一员。如我父亲死后，在绥远旧城发丧，前往致祭的有日本人部队和特务机关的头子，有伪蒙疆巴盟政府和厚和市政府的文武官吏和宪警特务，有各行各业的老板和伙计们，有伶界、花界及其他各色人等，同时各庵观寺院的僧道尼姑都来诵经超度。特别是在起灵前开追悼会，特务机关长小仓达次亲临讲话，把我和我父亲都称颂一番。接着送灵，参加者连同仪仗队，从旧城北门外一直摆到小十字以南，足有一里之长。沿途各商号均在门前摆桌路祭，张家口民生总会，还专为召集当地会员开追悼会遥祭。其排场之大，就连后来傅作义的军长袁庆荣在归绥殡母也有所不及。这也正说明我腰中牌多的效果。至于什么祖国兴亡，民族气节，那就不管它了。

十三、清帮分子在日本人统治时期的各种表现

由于王明远在日本人方面取得宠信，做了些刘长荣所不敢做

的事，使民生会的声势颇为扩大。当时特务、警察、宪兵以及汉奸等，一看见带黑白鱼的民生会徽章的，都要给个面子，不敢去惹。因此参加民生会的人也日益增多。有一次在凉城会馆开大会，馆内外挤的连站处都没有，使日本人看了为之惊异。同时清帮分子的思想行动，也随着人数增多而异常复杂，其在当时的表现，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

1、搞迷信的。这里有两种。一种是年岁老一点的清帮人，他们除参加清帮外，还参加迷信会道门，而且搞迷信比搞清帮还热心。如利中照相馆经理孔夏亭、大北旅社经理于化门、九龙湾成衣铺掌柜石辅卿等，都沉溺在万国道德会或纯一善社中。这些人虽不甘心背叛祖国。但却顾及身家性命，不愿招惹是非，所希望的是“安居乐业”，因此就借宗教迷信和鸦片自我陶醉，从而变为日本人的顺民。另一种本身就是职业迷信者。他们看见清帮有力量便参加清帮，目的是依靠它能多骗人的钱财。如旧城聚善堂在理公所当家于元瑞、吕祖庙老道王致城、姑子板在理公所当家田太和，为了弄钱，常常是请清帮首领和运用他的清帮徒弟，到处发动人捧斋或推销烟药。

2、藉清帮作护身符的。在当时日本人的淫威之下，特务横行，汉奸作恶，一般平民都感到身家难以自保，而民生会有时敢于报告和干涉，这就使有些人把参加民生会当作进入避难所。虽然一般地是但求自保，不多生事，但也有的给民生会通风报信，甚至自以为有了仗恃，欺压别人。

3、吃帮和榨财的。首先是在民生会作实际工作的那些人。如胡宪章、贾生福、冯世祥等人，就依靠民生会为职业，向各方面应付拉拢，从中找取好处。他们在俱乐部吃“兼差”，就是一例。更严重的是利用清帮的关系，作无理榨取。如张子含在纯一善社办粥厂，平素表现的非常积极，好象是同情穷人。但另一方面，他却依靠清帮力量搞“人力车夫组合”，剥削可怜的车夫血汗。特别

苛刻的是，他垄断了修理车辆的零件，连一个螺丝钉都不许车夫家里存藏。因此他发了不少财。又如凉城县民生分会会长高树德，利用民生会的关系，大跑烟土买卖，获利巨万，除起房盖屋外，还在本县田家镇买花园一所。此外还有李国华的徒弟，假借清帮势力，把民生会推销的历书和月份牌，拿到乡里强追乡民出高价购买。

4、当汉奸特务残害人民的，在民生会也有。如在归绥旧城西菜园有个刘瑞兰（无字辈），就和日本特务勾结，假借着民生会调查员的名义，在当地打人骂人，勒索了不少钱财。有时还冒充蒙古军军官，招摇撞骗。胜利后，被国民党又吸收为特务，更是无恶不作，解放后被镇压。还有沙成山（兴武六帮学字辈），何涛（外号红挠子，学字辈），都在日本宪兵队当特务，替日本人搜查抗日爱国人士，抓人打人，象日本人一样坏。王明远还亲眼看见民生会会员王志中（悟字辈），在归绥车站上捆了一个人，王问他捆的是什么人，他说是八路军的嫌疑犯。王说民生会没有捆人的权利，应当放开，他说这是特务机关的关口叫他捆的，不能放。王才知道他已经是直接地当了特务机关的小特务，不便再说什么。再就是在乡村里，有些民生会的会员，认为农民老实容易欺负，假借给日本人调查事件，在乡里诈财、要大烟、搜劫行人，什么坏事都干。如归绥东南乡有个绰号大二红鞋的，干的比一般都凶恶。连帮里的人有时都不认，因此人们又叫他是阎王。在外县里，也有些民生会员干类似的坏事。能记起来的，有后山乌兰花的于贵堂（无字辈），勾结日本特务，欺压和吃喝当地人民。

5、带土匪队伍，祸害人民的。如李维业、苟子臣，都当过傅作义部的连长，都是刘长荣的徒弟。日军侵入绥远，都没有离开，在青山以清帮关系扩充游击队。苟子臣并叫官兵上下都参加清帮。这两个人，李维业投降了日本，在白塔一带驻防，苟子臣在归绥城北哈拉沁一带山里游串，都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特别是李

维业，抢不来女人晚上就不睡觉。苟子臣不许老百姓打狗骂狗，谁要打骂便枪毙，就是犯了他姓苟的“讳”。

6、耍流氓，吃腥赌，坑人骗人的。如旭绥市张全（学字辈）、王树之（无字辈）都是老百花，每年春季庙会，专以假骰子、假宝，在农村坑骗农民。其他耍流氓，欺辱妇女，骗人财物的也有。

坏事还有，不能一一尽举。但也有在当时掩护过抗战人员和爱国人士的。如大青山姚喆司令属下的干部王成、王虎臣、刘鸿宾和现任呼市民政局长李云玉，以及潜在万国道德会当秘书的郑功浦（人们叫他是郑大胡子），在做地下工作时，贾生福、张子含等曾对他掩护和关照过。

谈到帮规简直破坏的不成样子，不要说拔香头、扒灰倒垅（互相倾轧）破坏了旧规矩，就是民生会新立的规矩也视若空文。如干事胡清源为了吃徒弟的香堂费，就在民生会外私摆香堂，只要是有人给钱，他就敢收。特别是在邪淫方面，胡清源还纵恿他的女儿做暗妓生涯，在家里和一般日本翻译、特务、伪蒙军军官乱搞一气。甚至于有的人欺师灭祖，欺到王明远头上。如王续取的女人林富仙，是一个河北梆子班唱花衫的，他的徒弟张宝龄（归绥面粉公司技士）勾引她，搞起不正当男女关系，后来他的侄儿王学曾（也是帮里人）在他家中养病，也和这个女人乱搞。按十大帮规中的“不准欺师灭祖”，“不准奸盗邪淫”两条，照老规矩应当开刑事香堂，把这两个人绑在铁锚上烧死；轻处分也要用家法责打。但王明远却管不了，只能骂他的女人“连个老母狗也不如”罢了。

总之，清帮分子在这时期的表现是极为复杂的。已经把清帮变成为一个汉奸、特务、恶霸、迷信、流氓等大杂会的反动团体。特别是在日本人的指使下，组织了民生会，赤裸裸地当了敌人镇抚的工具，背叛了祖国和民族，连自己清帮的祖先牌都卖了。

十四、抗战胜利后的绥远清帮

1945年，傅作义争先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进了归绥。民生会随着日本的投降而解散，王明远（以下自称“我”）也被捕送到归绥法院监狱。不久归绥被解放军包围，情况甚为紧张。有一天，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把我从监狱提出说：“现在把你保出去，你要好好工作，争取免罪，要不然就罪上加罪。”说完后就把我交给国民党党政总队的乔宝琳，乔领着我去见张庆恩（大特务头子）。张说：“你来了好，你有人就有力量，好好地帮助咱们去对付共产党。”随着就叫我当该队的第二中队第五小队队长。不几天发给我一个白绸子委任状，委我为平绥线的特派员，下边盖队长张庆恩副队长柴玉峰的名戳。另外还给我一个上校阶级的黄符号，任务是叫我召集和联络平绥线的民生会会员，准备组织起来。他们还把贾生福、沙成山、刘瑞兰都叫了去，说要按他们的能力分别委派职务。我住了两个星期。看出这个队的一切行动与日本特务机关差不多，是侦察和拘捕共产党的。我就想他们是要利用我们帮里人干这个活计，如果不捉共产党，做不出成绩，就更要问我的罪。但捉又不是容易的，而且要去捉，等共产党打进来更不得了。因此为了要“活”，就决心逃出这个是非窝。一天晚上，托故外出，找着一个帮里人杨子恒（学字辈）带路，一直逃到后山武川东南的羊圈村，却不料被大青山自卫军鄂友三的部队捉住了，连夜解回归绥。于存灏见了我说：“把你保出你还跑，能原谅谁，也不能原谅你。”结果把我判了刑。判词大意是“王明远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经密保出所，又乘隙逃走，本应判处极刑，姑念他过去创办平民小学校和慈善事业，减刑为无期徒刑。”于是又把我送到监狱。这时社会上都知道清帮过去组织民生会为日本所利用，是汉奸特务的组织，又看到我进了监狱，便都对清帮加以鄙视．帮里人也不愿

多谈此事，甚至于有很多人登报声明退帮。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视这个组织，在傅作义侵占张家口后，张庆恩仍想按过去民生会在张家口设总会、在各地设分会的组织系统去利用它。当卢健飞回家里殡父路过张家口见傅作义时，张庆恩还找他问谁在当时是清帮最有力之人。卢以刘建勋（当时是察哈尔公路处处长并兼绥远公路处长）在帮内很孚众望，便说是刘。在卢回绥远后，不久就接到刘的信，说他要在张家口把清帮人组织为西北协会，於张家口设总会，归绥、包头、集宁等地设分会，请卢任归绥分会的负责人。这时卢已专心致力宗教迷信，终日搬经弄典，向佛寺道院会所宣讲，对清帮已不发生兴趣，不再去搞它。同时，过去的清帮首领们也都因搞民生会伤了脑筋，不愿意再搞，因此再没有人把它组织起来，而它的影响也就一天天消失下去。

但其中也有的人又当了国民党特务。如刘瑞兰、沙成山，就是先参加党政总队，后到了调统室的看守所。这两个在当时打人抓人，都极为蛮横。这些人在解放后都没逃脱了人民的审判，刘沙二人都被镇压了。帮内一般的首领和徒弟们，如没有特殊罪恶的，则不咎既往，能悔过退帮就算完了。

就象我王明远有这样严重罪恶的人，都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解放前，国民党法院把我判了无期徒刑，但到了解放后，党根据我的实际行动，分别功过，却减为7年有期徒刑，并扣去在监中已坐过的年月，只坐了3年零4个月就出来了。出监后，还安置我在乌盟建筑工程公司工作，为人民服务。这真是我梦想不到的事，怎能不感到党恩重如山？

写成这个材料，除我们三人所知者外，还访问当时帮里人于化门、张子含、崔朝海、费德明、贾生福、韩伯琴、王春芳、赵长海、石辅卿等诸位先生，承他们的热情帮助，在此致谢。

（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办　供稿）

江苏安清帮记略

张华光

安清帮即一般人所说的清帮，又名“安清道德会”、“安清道教”。因其始祖之一姓潘，“潘”字拆开是“三”和“番”，所以又俗称“三番子”。其成员用手势作暗语时把手翻三翻，即示同类矣。还称“家礼”，参加了安清帮的人即为“在家礼”，以区别于“门外人”（一般人）。安清帮曾是我国近代史上重要社会现象之一，是会党中仅次于“洪帮”的第二大势力。

安清帮源于罗教，由活动于江浙水手中的一支罗教组织逐步演化为民间结社的组织形式——清帮，其宗教职能逐步消失。到了咸丰年间，随着海运大兴，造成十数万漕运手手的失业。数以万计的水手失业或投奔太平军，或加入清军阵营，但更多的则以安清道友为名，聚集在两淮盐场以贩盐、抢劫为业。同治元年卞宝弟片中说得很明白：“江北聚匪甚多，有安清道友名目，多系安东、清河游民，私结党朋号称师徒。”安东、清河是苏北淮河流域的两个地方，说明当时苏北是清帮活动的主要地区。清帮之所以在苏北得到发展，原因有二：①当时苏南、浙江地区是太平军与清军作战的重要战场，清帮在此无从插足；②淮北盐场是贩私者集聚之地，立足于此，有许多油水。同时，盐枭集团“青皮”是帮会的天然盟友。

清帮在苏北站急脚跟后，数十年间迅速向苏南、浙江一带发展，成为苏浙皖地区的主要帮会势力，从事贩盐、贩私、贩毒、劫

掠、包赌、包娼，甚至贩卖人口的社会恶势力。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它的活动重点也由农村转向镇江、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

清代，清帮主要活动在下层社会。到了本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主要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了联系和改造清帮，有时则直接加入清帮，并充任他们的领导。这是会党发展史上的一个新变化和新特点。民国成立后，清帮的一大批头目都接受了政府和军队中的重要职位，做了新官。如辛亥革命后曾任扬州都督，旋改任南通镇守使、膺陆军上将衔的张仁奎（字镜湖）就是最早步入上层社会的帮人之一。清帮发展到中上层社会的鼎盛时期则为1927年到1937年的十年间。许多军政要人都是清帮中人，如杨虎（啸天）、蒋鼎文、韩复榘、陈锦棨、黄琪翔、孙桐萱等，上述诸人都是张仁奎的门生。

抗战前夕，清帮的辈份主要是“大、通、悟、觉”四辈。当时全国的大字辈只有37人左右，而江苏一省就占了10多位，加上上海的5个，几占全国之半。江苏省有名姓可考者有：朱炳元、杨善之、魏子荣、胡小望、步长生（以上5人在镇江），阮慕析（扬州），朱钧甫（常住扬州）、樊葸臣（瓜洲）、王柏龄（扬州，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当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王敬亭（扬州商会会长）、鲁紫铭（河南永城人，其徒众多在徐西各县），再加上文提到的张仁奎（鲁南滕县人，在江苏发迹，其徒众多在江苏，此时常住上海），共12人。

张仁奎所收的门徒极大部分是社会上层人物且多知识分子，多半是谋互助为发展个人事业而加入张门清帮组织的。并用社团法人形式于1935年组织了“仁社俱乐部”，“仁”是张仁奎的名字。也有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加入“仁社”的，如江苏省的崔锡麟先生。仁社联系军、政、经济、学各界，颇有影响，据说1936年山东军阀韩复榘曾欲发动一次倒蒋战争。因韩是张仁奎的门徒，蒋

介石邀约张仁奎到南京磋商，张受蒋之托，赴山东利用师徒关系消弥了抗战即将爆发前的一场内战。

继“仁社”之后，在当时京（宁）沪先后成立的清帮社团组织还有“荣社”（上海，黄金荣）、“兴中学会”（上海，杨虎）、“恒社”（上海，杜月笙）、文社（南京，韦作民、张竞立）。其政治倾向各不相同。但成员多系军政界人物和经济界大亨，也有不少留学归国学生。

江苏省另一个大字辈人物朱炳元，早年所收徒弟多是江边码头、车站的工头和工人，以后多有商业老板、小开之类，逐渐和中上层人士交往，最后竟担任国民党苏浙皖卷烟查验局镇江分所负责人，成为半官方人物，虽未跻身士绅之林，但至少已不被看成一个帮会头子而受鄙视了。这类人物颇与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相似，是由下层社会的“青皮”、流氓，借助帮会爬上来的，与张仁奎等颇不一致。稍晚于朱炳元的向春亭是江都县人，早年在镇江的轮船公司当学徒。他拜清江（淮阴）大字辈的冯守义为师父，属通字辈。由于善“混世”，即入清帮又入洪门，后竟爬到公司的总经理。到抗战时期更成为涉足各个领域的“闯人”。名声虽不及杜月笙，但远在南京的清帮重要人物余得水、黄春庭之上（余、黄是觉字辈）。朱、向这等人物都是典型的帮会人物。还有以帮会混世、吃饭，在帮里打一辈子滚的人物。如镇江的顾华堂，几乎一生以传道师为业，帮内人远近皆知。

另几个镇江一带的大字辈人物，有的是在乡村土豪、乡保长者流中谋发展；有的在土匪、兵痞中出没，尚不能涉足上流社会。

扬州的“二王”——王柏龄、王敬亭，也都是大字辈人物。不过他们侧身于军政界或工商界，不以“混世”身份出现，与清帮只是有这么一个关系而已，也与张仁奎等在清帮中广泛交游不同。扬州的徐宝山是与张仁奎同代，其辈份已不可考。他在扬州一带的安清帮内拥有众多势力，又是洪帮“春宝堂”的龙头大爷，以

贩私盐为业。曾受清政府招安，任巡防营统领。1911 年 12 月 1 日，徐绍桢、林述庆等的光复军克复南京，他亦投机革命，借机光复扬州，后投靠袁世凯，终被革命党人暗杀。这是帮会人物中比较特殊的一例。

对于淮阴冯守义的情况不详。

徐州一带著名的清帮人物有鲁紫铭、唐步云、张广茂、高化羽、顾震等人。鲁紫铭早年在北洋旧军界担任过参议、幕僚职务，深有学识、谋略。到了国民党当政时期，属于在野人物，对于国民党的统治亦深表不满。其子鲁雨亭很早就追随彭雪枫从事革命。这些恐怕就是他接受我党统战政策的思想基础。30 年代黄金荣在上海为自己建造“四教堂”（取《论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之意），邀请全国大字辈人物为“四教堂”落成祝贺，鲁紫铭是到会 17 人中的一个。抗战前夕，唐步云是徐西（丰、沛、肖、砀、铜。当时肖、砀亦属江苏）各县民团的参议，曾决心死守砀山城。抗战期间为顽固派所杀害。张广茂在大革命时期（1924—1927 年）是徐西各县最早的国民党员之一，但国民党时代的地方当权者多系年轻后进，他受到排挤，而与当局多所龃龉，以后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高化羽是著名绅士。唐、高、张三人都是鲁紫铭的徒弟，属“通”字辈。顾震也是通字辈，东海县人，抗战时期在重庆曾任“中国人民行动委员会”的主任设计委员。

宁沪地区的清帮人物，如杜月笙、黄金荣等，在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多数追随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成为反革命“别动队”。而在徐州地区以鲁紫铭、张广茂为代表的一些清帮人物却没有同国民党合作，更在抗战时期接受了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清帮在江苏省的发展大致分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是第一阶段，清帮势力仅在下层社会。从辛亥革命至抗战爆发前为第二阶段。这是清帮发展鼎盛时期。这时的清帮头面人物渗入到军、政、

绅、商、学各界，出现了许多风云人物。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则是清帮发展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它的分化瓦解时期。

当时清帮在全国的会众约计百万。抗战大后方的四川，更是遍地袍哥（指哥老会成员，即洪帮）。蒋介石为了稳定后方，并力图在敌后与共产党争夺，于1939年指示戴笠联合杜月笙等，成立了清洪帮的联合组织“中国人民行动委员会”。在此之前，杜月笙就把他在敌后的清帮头目（恒社成员）交由戴笠的军统管理。在江苏省出现的“忠义救国军”，其大小干部不是清帮头目就是军统特务。清帮与军统的结合是这时江苏省帮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1939年特务头子汤铁飞接任江苏九区督察专员（徐属八县）。当时的省府在兴化，他由兴化辗转到徐西北，一路多得清帮的帮助靠其支持才站稳脚跟，并组成了嫡系武装即是一例。

汪伪政权建立后，极力拉拢在苏沪的秘密社会组织。1943年12月成立了“中华会党联合会”。多有清帮中的无耻之徒加入。但在清帮大字辈人物中，除上海的张啸林意欲下水，被狙击毙命外，尚未发现与敌伪合流者。那些大字辈人多数去了大后方，也有流亡香港、海外者，也有匿居乡间的（如鲁紫铭以后接受了我党统战政策）。在江苏省为敌伪效力较出名的，南有镇江的邱凤仪、胡春潮，北有徐州一带的王献臣、侯本昇等人。邱是大字辈帮人杨善之的门徒。胡是大字辈人物胡小塑的儿子。王献臣是北洋时代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的第三师师长。至于徐州伪淮海省的汉奸头子郝鹏举虽自称帮人，但意在拉拢，帮人都认为他是冒充的“空子”。

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中共中央专门发布了关于争取会党的指示，广泛开展帮会工作。抗战初，中共徐东南区委书记邵幼和为联络“三番子”抗日，曾印刷过清帮的《通草汇海》。苏鲁豫根据地的创建人王文斌、赵万庆、陈筹等党的领导曾通过张广茂、鲁紫铭等人，建立了与新四军彭雪枫部的固定交通线。1938

年底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组成苏鲁豫支队，张广茂利用帮会关系为“苏支”组建了陇海大队，又称独立团，群众称新八路。后编入新四军第三师。

1944年张广茂被国民党暗杀后，其兄张广苞担任了我冀鲁豫边区参议员。

解放后，会党已变成历史名词。在港、台、海外华人社会则仍为黑社会势力。

（转自《江苏地方志》1991年第2期）

清帮在杭州

章寒微

清帮在杭州地区的发展，较洪门为早，势力也比洪门大。抗战前，杭州还没有洪门组织，杭州的水陆码头，全被清帮势力所霸占。清帮势力原来分布在运河沿线，杭州是运河的终点。杭州拱宸桥有日本租界，是公娼区，是流氓妓女滋生的地方。拱宸桥桥东有一座二师殿，据说是翁、钱、潘的坟墓所在，也是清帮收徒集聚的地方。拱宸桥有个龚瞎子，是清帮“大”字辈头目，杭州清帮辈份最高的大流氓，在杭州收的门徒最多。

1934年军统特务赵龙文任浙江省会警察局局长时，省警局侦缉队，豢养了一大批清帮头目，如历任侦缉队队长楼秉璋（清帮通字辈的大头目）、朱校东、柴显荣，副队长张永济、吴容昭，都是觉字辈头目；分队长朱炳荣、赵子卿和多数探长、探警，也是清帮小头目分子。1934年，我在省警局实习，派在侦缉队当队员，队长是徐行（即管容德），他参加清帮后，是由赵龙文派他当侦缉队长的，侦缉队几乎清一色是清帮分子。当时在杭州作科犯法的和社会上的流氓小偷如桃园、橛子、元宝、扇子（系属小偷分行的切口），也都与清帮头目通气的。不利用清帮势力，就很难破案；特务系统更是利用清帮，作为侦探耳目。而清帮头目则依靠特务势力为靠山，广收门徒，包娼包赌，敲诈勒索，仗势欺人。

1935年，宣铁吾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时，保安处设在谍报股，以后改为调查股，由军统特务翁光辉（又名翁亮，浙江丽水碧湖

人）任股长，在杭州梅东高桥举办了“保甲侦探训练班”，招收了一批清帮分子受训，派充保甲侦探，作为特务耳目。省保安处设有“密探组”，组长杨锡山及密探应相助、吴瑞、俞樟荣等人，也是清帮的大小头目。浙保调查股股员吴成章、何培荣，曾多次率领“密探组”密探吴瑞、俞樟荣等人，到永康、东阳、嵊县、安吉、孝丰各县，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逮捕杀害当地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和共产党员。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杭州后，日军杭州特务机关长芝原平三郎，组织了一个“芝社”，吸收清帮分子拜芝原平三郎为老头子，加入“芝社”，担任坐探；黑泽部队也组织了一个“宣抚班”，勾结汪伪特工总部苏浙赣皖四省行营指挥部，罗致了一批清帮分子，替日寇引诱国民党部队投敌。敌伪统治时期，杭州清帮头子王鸿生在杭州组织“安清同盟会”，广收门徒，为日寇充当鹰犬。杭州有名的大汉奸所谓四大金刚陈春辉、李宝和、包瑞正、金德春，也都是清帮头目，收罗清帮流氓很多，更是作恶多端。

抗战胜利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成立调查室，由军统分子吴锡文（浙江新昌人）任该室主任，下设密查组，以应相助为组长，蒋子荫为副组长，吴坚、楼昌福等人为密查员。浙江保安司令部刑事警官队，由军统分子应绳武为队长，组长楼武佐、杨松山，队员吴瑞、俞樟荣等人，都是清帮分子，为非作歹，人民恨之切骨。

杭州市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沈溥，刑事警察队第一任队长胡嘉权，继任队长军统分子林奇伟，副队长张永济，分队长吴容照、朱炳荣，组长陈凤鸣、鄢全、肖炳虎、蔡云章等人，也都是清帮头目。杭市警察局是“保密局浙江站”的公开第四组，当时我担任“浙江站”站长，沈溥兼公开第四组组长，林奇伟是公开第四组的组员。这时杭市刑警队的清帮分子，是特务、流氓、反动警官的三位一体。刑警队的一个探长，即是杭州日清池浴室的老板，又是杭州旗下暗娼的庇护者。军统特务利用清帮分子作为

发展组织的社会基础和外围耳目；利用刑警队执行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青年学生，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1947 年 3 月，“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成立“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设总会于上海，由军统特务徐亮任书记长。4 月，派军统特务陈庆尚为“浙江分会”书记长，由我拨给杭州竹斋街新民里弄堂房子一幢，作为“新建会浙江分会”的会址；并指派副站长张开运（洪门分子），直属试用通讯员兼经纬通讯社社长孙绍轩（清帮分子），协助陈庆尚发展“新建会”。6 月间，在杭州中国酒家召开成立大会，参加的会员共 500 余人，绝大部分是清、洪帮分子。

“新建会浙江分会”成立后，以清帮头目楼武佐为组织股长，清帮头目梁步飞为总务股长，清帮头子张永济为上城区会筹备主任，清帮头目朱承德为下城区会筹备主任，妄图大规模的收罗社会渣滓。

军统组织“新建会”提出“清、洪合流，三山五堂合流，海内海外合流”的口号，企图把清、洪帮各方面的势力，统统控制起来，以“社会贤达”名义组党，与国民党内各派系争夺政治势力，引起国民党 CC 系的嫉忌。CC 系为了分化军统控制的帮会势力，提出了“清、洪不合流，三山不合流，海内海外不合流”，进行分化；并利用 CC 系控制的国民党社会部和省社会处，不准“新建会”立案。“新建会浙江分会”由于浙江社会处处长方青儒不批准立案，挂不出牌子。筹备成立只有半年，被迫解散，停止活动。

“新建会浙江分会”的活动虽只短暂的几个月，却助长了帮会势力的发展，给特务组织增添了外围力量，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社会上增添了一大批流氓恶霸。他们聚众殴打，敲诈勒索，调戏妇女，包庇暗娼，特别是杭州各个歌场舞厅，几乎天天大打出手，败坏社会风气，流毒极为深广。

在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前，上海清帮大头子杜月笙，以变相

组党形式，成立“恒社”（恒社设在上海法助界杜美路70号），收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经理金润泉的大儿子金观贤为门徒。金观贤在杭州组织“贤社”，广收门徒；另外还有“协社”等帮会组织。“恒社”发展到杭州，由杜月笙的门徒朱承德担任“恒社浙江分社”的负责人，杭州西冷桥头杜月笙的别墅作为“恒社”活动的地点，在杭州发展清帮势力。

杭州清帮势力活动猖獗的地区是南星桥，有所谓五虎八将三十六大汉。南星桥江干码头是杭州水陆交通枢纽，钱塘江水运码头、轮渡码头、浙赣铁路南星桥车站都在这里，是商货集中转运的枢纽，有许多靠出卖劳力的搬运工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黄色搬运工会把持在封建把头之手，而这些封建把头，都是清帮流氓头子，和天津的六号门一样，剥削搬运工人收入的10%，采取各种敲诈勒索的手段，来供养他们这些清帮头子；勾结特务势力，横霸一方，仗势欺人，聚众殴打。搬运工人如不听他们摆布，随时都有失业、甚至被驱逐、流离失所的危险。多数搬运工人、码头工人，都住在沿江码头蓬户内，终年劳累，不得温饱，是当时杭州最黑暗的贫民窟。

所谓“五虎”，就是杨松山、杨继曾、泮大维、陈夏牛等人。杨松山浙江诸暨人，上海清帮头子楼秉章的门徒，悟字辈。曾任“忠义救国军”上校参议，抗战时期，在诸暨、肖山和富春江沿岸各县，发展清帮势力。抗战胜利后，他任浙江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议兼浙保刑事警官队组长。1947年，我在杭担任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时，委派他担任浙江站上校联络员。杨松山以“浙保”和军统为靠山，成为南星桥横行霸道一方的“南霸天”。杭州解放前夕，杨松山跟国民党六十八军军长杨彬（诸暨人）逃到广州，受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密令，潜回杭州，勾结杨继曾组织匪特武装部队，继续与人民为敌，经人民政府逮捕公审镇压。

杨继曾、泮大维也是诸暨人，清帮悟字辈，都当过“忠救

军”大队长。

陈夏牛也是清帮头子，系中统浙江调统室（主任为俞嘉庸）杭州组（组长项逸民）手下的南星桥小组长。1947年10月29日，中统特务、浙江调统室主任俞嘉庸，秘密杀害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激起了浙大学生和社会上的义愤，浙大学生举行为于子三烈士出殡的抗暴游行示威。俞嘉庸指使陈夏牛在南星桥以每名伪币5万元收买清帮流氓打手，伙同特务暴徒，暗藏铁尺作凶器，冲进浙大校门，见学生就打。许多浙大学生被打伤，造成严重流血事件。

所谓“八将”，是指金曹有、钟乃有、周康正（南星桥南星戏院经理）、王铁雄等人。既是封建把头，也是南星桥的清帮头目。

杭州清帮势力对人民的危害造成的灾难，擢发难数。上述资料所揭发的，虽尚万不及一，亦足说明清帮在杭州的累累罪行。

（浙江省杭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郑州清帮内幕点滴

大梁郑二

1934年我来到郑州，在专员公署任科员，为专员阮藩侪担任管理往来信札工作，职位虽小却接近专员，在社会上相当活跃。我常在茶社、饭馆、浴池等处，看见有些人进门后，将礼帽口朝上放着，有时对茶房（茶社服务员）、堂倌（饭馆服务员）等说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话。我当时年轻好奇，经多方了解才知道这些人是“在礼儿”（在帮）的。当时郑州清帮的活动是最兴盛的时期，经过进一步和郑州清帮头面人物接近，逐渐了解到他们活动的一些内幕，后来我曾在戴吉甫、蔡铭武这些清帮头头家里看见过上海清帮内部出的一些有关帮会内容的书籍，所以我对清帮的了解比那些文盲“老大”们知道的还多，下面我介绍的郑州清帮的情况，有些是亲见，有些是听在帮人亲口对我说的，因事情过去四五十年了，有遗漏或错误之处，请知情者指正。

清帮在旧社会是一种既公开又秘密的群众组织。所谓公开，是人们都知道社会上有清帮组织；所谓秘密，就是各帮内都有暗语、帮规，这是外人所不知道的。他们重义气、讲团结，一人有难大家相帮。

清帮是一个纵的组织，按班辈分前辈后辈，如同家庭中的祖、父、子、孙等长幼辈份一样。参加清帮拜师如父，收徒如子，俗称父子帮。同拜一个师父的徒众称为同参兄弟，称清帮前辈为师“父”，不是称师“傅”。最初，清帮是在南方运河里若干运粮船队，

被前明反清遗臣遗民在抗清失败后，转入地下活动时所利用，在江浙一带以运河船帮为地下基地的力量，每队船只多则五六十只，少则二三十只，各船队都有自己的帮名旗号，但供奉的都是翁、钱、潘三位祖师爷。因翁、钱都没有开山门（收徒），只有潘祖师爷开了山门，所以清帮后代都姓潘，互以“老大”相称（这是船上工人的称呼）。在四川一带以沿长江码头为基地进行活动称之谓洪帮，亦称洪门。洪帮与清帮不同的是，师徒不以父子相称，而以哥弟相称，故俗称洪帮为兄弟帮。

郑州是个旱码头，清帮在郑州共有4个船帮名：第一是嘉白帮。帮主叫尚滋干，是清帮第二十二代“通”字辈的，俗称念二。尚是郑州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住在苑陵街，以他收徒最多，他的门徒多数是火车站的起卸夫（搬运工、装卸工）、纱厂、打包厂的工头等。他有个门徒叫陈耀龙，密县高庙人，是尚一手提拔起来的，抗战胜利后，陈利用他公安局侦缉队的权利，结交来郑的接收大员，曾走红一时，在地面上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最后连他师父尚滋干也给他让道。例如有次尚的生日，一班亲友前去拜寿，进门后他家竟无一人，事后问尚是何缘故，尚说：我和陈耀龙同一天过生日，我若在家，势必减少他家的热闹气氛，因此就躲出去了。

第二是兴武六帮。帮主叫陈荣卿，是郑州老鸦陈乡人，在一马路南头路的河南饭店当经理。30年代初，郑州火车站一带大半都是开的大小旅店，比较大而且新式的旅馆有4家：最好的是华阳春，楼高4层，并装有电梯（郑州唯一有电梯的地方），其次是鑫开饭店，附设有西餐馆；再次是郑州饭店，设有浴池；最后就是陈荣卿的河南饭店。陈的为人在当时来说比较正派，他的师父邱现荣是清帮二十一代“大”字辈的，俗称念一，这是1934年时清帮内最高的辈数（念三的是“悟”字辈，念四的是“学”字辈，“学”字原为“觉”字为所改）。邱现荣是上海闸北理门公所当家

的，因他本人不在郑州，就委托陈荣卿代师在郑广收门徒。按规矩入门拜师，须献礼金，这项收入也是师父的生活来源之一。这个时期，郑州清帮的发展是个高潮，不但人数增加，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由低层逐渐走向中上层。由于陈荣卿师父是“大”字辈的，又是代师收徒，所以郑州军政界等中上层人物都拜在邱现荣的门下，由陈代师收为门徒。至1945年，除郑州专员外，郑州专署保安副司令张启堂、参谋长王时杰、副官长梁少峰、专署科长刘雅亭，县党部书记长鲁彦，陇海铁路段长李贻之，平汉路段长青德馨，陇海路车长游执中；郑州商界有鑫开饭店经理韩俊甫、郑州饭店经理马德元、华阳春饭店经理毛虞岑等都加入了郑州的兴武六帮，因此引起了陈荣卿的自豪和孝心，于是1935年他就派人去上海，把这个在全国仅存极少数的二十一代大字辈的清帮祖师爷邱现荣接到郑州。当列车进站时（因我当时有事没去看热闹，事后听参加迎接的人说的），早有服装整齐的徒子徒孙们列队欢迎，出站后被扶上刚装好尚未经人坐过的人力车上，徒子徒孙们前呼后拥，沿途鞭炮声中，送至陈荣卿的河南饭店，据说当地的热闹场面，不亚于藏人迎活佛，天主教徒迎红衣主教。

第三是杭三帮。帮主戴吉甫，开封人，郑州公安局侦缉队队长，也是二十二“通”字辈念二的，家住郑州市裕元里，在郑州也收了一些门徒，并代师收徒，接受开封县县长李雅仙为他的师弟。

第四是兴武四帮。帮主梁子斌，河北省沧县人，1934年随专员阮藩侪来郑的，任专署侦缉队队长，因来的时间不长，收徒不多，只有徒子没有徒孙。阮调走后梁便改行做生意了。

陈荣卿把其师父邱现荣接来郑州之后，次日宣布他与各帮头头事先协议好的序目单，依次由各帮主率领觐见。第一天是尚滋干带领嘉白帮，第二天由戴吉甫率杭三帮，第三天是由梁子斌率兴武四帮的徒子徒孙向邱行觐见大礼。觐礼时，必须按帮规所定，

凡是晚辈向长辈行跪拜大礼，长辈者必须在晚辈磕第一个头时说："祖师父灵光"，磕第二个头时说："家礼义气"，磕第三个头时说："贵前人慈悲，弟老请起。"这样就算见礼完毕。邱现荣已年逾70，年老体弱，光在受礼时致答词就受不了，只好由他的大门徒陈荣卿代替；就是陈也在一天下来累的舌干口渴。第四天是兴武六本帮后代觐见，第一批是二十二代通字辈的，第二批是二十三代悟字辈的，第三批是二十四代学字辈的，这一天四代同堂热闹已极。陈荣卿要求徒子徒孙向邱祖师爷献金，5元起码，多则不拘，10天后这个郑州兴武六帮的祖师爷腰缠一批意外收获，被送回上海去了。

为什么30年代清帮在郑州这么盛行？因为当时政局不安，交通不便，以郑州来说，除了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外，其他交通工具不多，到外地谋生，做生意的人，离开铁路线都得步行，地方上不平静，被劫、被抢的事时常发生，社会各方面的人都想找个靠山护身，同时入帮后可以互相关照。例如车长游执中入帮后，他的师兄弟乘车不要票，还坐头等车厢。因此，1934年郑州刮起了一阵加入清帮风，吸收了不少中上层分子入帮，因而又引起了开封省会保安部门的注意。

1935年10月，省保安处参议吴赓恕奉令来郑了解清帮情况，专署侦缉队副队长蔡铭武陪同吴见了郑州嘉白、抗三、兴武六、兴武四的头头尚滋干、戴吉甫、陈荣卿、梁子斌等之后，他们曾在南下街商会大礼堂利用白天上午9点（按规定摆香堂都是夜间）的时间，摆了一次大型的香堂。摆香堂对帮内来说，是很庄严郑重的事，除了收徒、处罚徒弟外，一般不随便摆香堂。这次摆香堂有通字辈的100多人参加，另有悟字辈扮道（即司仪人）的10余人。开始之前，司仪人用黄表纸写翁、钱、潘三个祖师爷的牌位贴在墙上，桌子上放有香炉蜡台，司仪人点烛焚香后高喊："朝祖开始，行三跪九叩礼！"磕头时左手压在右手上，手背贴额头向下

磕，按帮规意思是说，世上的人凡作坏事，都是右手干的，帮里人称右手为恶手，左手为善手，以左压右表示善压恶。在叩头时可以从姿势上看出谁开过山门，谁没开过山门。凡是开过山门收过徒的人，都是两手敞开着地磕头，敞手还必须由他的师父将两手掰开。朝祖大礼之后，由吴赓恕讲话，他说：此次是奉上级命令来郑，与各位老大（兄弟）和弟老（徒弟）见面的。由于政府看到最近清帮人数日见增加，形成社会上一股潜在力量，蒋委员长有鉴于此，就亲自组织领导一个名叫“忠义救国会”的组织，所谓忠，是忠于国家，所谓义是团结友爱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邀请一部分在社会上，在帮内有活动能力的老大们，明天和我到开封去看看，相国寺后街河南大旅社设有招待站。吴讲完后，让大家又同到小西门旧城墙空地上去照像，由独家具有甩头照像机的大同路华光照像馆给照的像，加洗一张收费 5 元。第二天随吴去开封的约 30 余人，有尚滋干、梁少峰与其弟梁子斌、蔡铭武，三多里盐店经理刘仲强等。听他们回来说：在河南大旅社一直候到晚上 11 点左右，才被领到在亭午朝门外一个大院的房子里，每人先填了申请书，随后被带入一个大厅去宣誓。一进大厅门，就看见墙是蓝色的，电灯也是蓝色的，在这种气氛下令人不寒而栗。讲台墙上挂有一块四方黄布，当中绘有一个大拳头。吴赓恕站在讲台前，领着大家宣誓后，吴又说：为了向领袖表示忠义，大家可量力献金，10 元起码，多则不拘。次日回郑时，献金 10 元的每人发给蒋介石的像片一张；献金 30 元以上者，给的像片下款有蒋的签名；献 50 元以上者，像片上除下款有蒋的签名外，上款还写有献金者的姓名“某某同志惠存”的字样。这 30 余人算是在开封加入了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忠义救国会（要想加入蓝衣社必先加入忠义救国会），蓝衣社是国民党军统的前身。此后，再未见到吴赓恕，后来听开封来人说吴是个内部骗子，已被撤职押赴南京受审，真实情况如何无人知道。

清帮进山门开始很严格，一个人不能单独收徒，必须有一个引进师父介绍，拜在谁的门下称本命师，入帮时还得有传道师教给规矩礼节。清帮炉香证书我没有见过，30年代郑州清帮进门时，发一个折子，上面写上引进师、本命师和传道师的姓名、住址，加入、船只旗号等，帮规由传道师当面口授。他们的帮规、暗语我也知道一点，例如：送茶接茶，两手平举茶杯，左手屈大指食指，右手屈大指，即左屈二余三，右屈一余四，解释为“三老四少”，意思是老少爷们请茶。这种动作若在大众场合，如在茶馆里，就是表示自己在礼，假如在生疏地方，要找在礼的人，自己先作如上表示后，对方就问：贵姓？答：姓潘。问：出门潘？在家潘？答：出门潘。这是初步接触，说明自己在礼，对方进一步审查时叫做“盘道”。问：请问老大你在哪里进的家？答：我是某乡（地名）进的家。问：贵前人（师父）是哪一位？答：他老人家姓某、上某下某（例如叫刘仙洲，就是姓刘、上仙下洲）。问：你是哪炉香进的家？答：我是某炉香（指入帮的辈份）。问：贵帮你是哪一帮？答：敝帮是嘉白帮（或兴武六、杭三帮、兴武四等）。问：贵引进师是哪一位？答：敝引进师姓某上某（姓名）。问：贵传道师是哪一位？答：敝传道师姓某上某下某。接着说：给师父见礼（磕头）。问者答：家礼不常见，香堂口见。这就是不实际见礼了。经过这样盘道，知道是自家人，即互以“老大”相称。

1936年5月间，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正和华阳春饭店经理毛虞岑闲谈，忽见一个茶房（即今日之招待员）气喘吁吁地走进屋里对毛说：“街上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情，各街口都戒严了不准行人。”我听后便走到街上看看，因我身上戴有专署和保安司令部证章，无人阻拦，就进到公安总局，经问才知道专署侦缉队副队长蔡铭武，在他的家中被人暗杀了，于是全市戒严，侦骑四布，直到晚上9点左右，才在平汉路小李庄站把凶手捉回，缴获的手枪，号码早被用刀刮掉，似公用之物。蔡被暗杀一案，是何原因，凶

手被抓住是谁，怎样处理的当时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敢问，因此至今是个谜。蔡铭武对朋友诚实热忱，帮内和社会上不少对他有好感，死于非命又留下双亲幼子，于是不少人激于情义乃为之募捐相助，共得银元5000余元，并以此款在饮马池街买了一处货栈的房子，每月收租作为他全家生活之用。

由于吴赓恕被撤职查办，蔡铭武之被暗杀身死，使得郑州的清帮大为降温，特别是去开封参加过救国会的人更是讳莫而不言。

1938年日本侵华占领平津以后，河北、山东各地能走动的人，纷纷流入郑州、汉口、西安一带。原驻郑州的军统特务队、CC特务队藉捉汉奸为名，大肆活动，错抓了许多好人，其中也有不少“在家礼”的，如鑫开饭店经理韩俊甫、郑州商会总务主任赵捷臣被抓后再没消息。

1944年日本第二次侵占郑州后，社会上凡是有钱有势和一些在清帮内外有声望的人，都逃往西安去了。余下一些地痞流氓，则依附日寇认贼作父，其中有一叫陈资衡者，藉在清帮为名，大收门徒为日寇效劳，深受其主子信任，其权势之大胜似伪官。

1945年日本投降后，尽管逃往西安的清帮头头陆续回来，但清帮名声早被陈资衡等搞得臭不可闻，加之胜利后，全国沦陷区刮了一阵“接收”要金条风，因之社会风气不变，就是认钱不认人了。有次我在福寿街亲眼看见保甲长拿着手铐向铺户收捐，户主说：“请老大们关照些！”保甲长说：“什么？老大吃不开了，拿钱来！”虽然老大们不吃香了，但有些老的清帮分子还不肯收敛，仍旧作威作福，例如延陵街惠尔康饭店经理陈紫纯，对来郑州演戏的女演员，必须认他为干爹。

1948年郑州解放了，经过镇压反革命，尚滋干、陈耀龙这些既是清帮头子，又是反革命分子，在郑州作恶多端的害人虫已被人民镇压。

另，清帮都互称“老大”，为何电影《51号兵站》中称“小老

大”？“小老大”是本命师在关山门时收的最后一个徒弟，此徒弟必须在年龄上比他小的多，且要年轻有为，能做他的接班人，故称“小老大”。

附带说一说郑州的洪帮。

郑州洪帮人数很少，其山主叫明德，湖北黄陂人，是豫丰纱厂上海总公司董事长穆藕初派他来郑州豫丰纱厂当顾问的，因为30年代全国工厂时常闹罢工，明德与郑州专员阮藩侪是近同乡，遇事好打关照。明德来郑后，由于他个人的地位关系，对人们寻找保护伞的引诱力不大，所以很少有人找他入帮，尤其按洪帮规矩，只允许清帮加入洪帮，不许洪帮加入清帮，因此，他只在豫丰纱厂收了几个弟兄。洪帮暗语，我只知道见面问你是哪个山头，例如我在湖北时遇到一个洪帮互相问答的情况，问：你是什么山？什么水？什么堂？什么香？答：我是武当山，湘河水，忠义堂，万寿香。其他更多的情况我就说不上来了。

（河南省郑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清帮头子张树声

孙玉田

张树声，字骏杰，生于1881年秋天，原籍河北沧县人，同冯玉祥在第六镇第十一协第二十一标（即团）同时当哨官（即连长），辛亥革命时，又同时当营长。冯因参加滦州起义，有人密报王怀庆，派人到滦州抓冯御香（当时冯玉祥用这个名字），冯闻讯逃跑，找到陆建章掩护。陆升京畿执法总长，委冯玉祥为京卫军第二营长，后升团长。1914年9月升第十六混成旅长。张树声在滦州起义失败后逃到上海参加了清帮和洪帮，黄金荣还是他的徒弟。这时冯玉祥旅由四川回到河北廊坊，张树声由上海来到廊坊，冯委张为高参。1918年到了湖南省常德，冯委张为该旅第三团长。1921年十六混成旅改为第十一师，冯兼陕西省主席（应为督军——编者注），委张为交际处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兼河南省主席（应为督军——编者注），张仍任交际处长。1924年夏天，张树声向张作霖的亲信马炳南（前曾在第六镇十一协第二十一标任团部书记，与张早已相识）透露，冯处境极为苦闷，冯因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行赏不公，心怀怨忿，颇有与奉军联系之意。

马炳南返回沈阳，将张树声所谈情况，密报张作霖。张即派马炳南入北京，与冯玉祥暗取联系，正好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马乃代表张作霖往贺，由张树声带见冯。马谈到张作霖愿与冯合作，冯曾向马笑着说，你要好好负责。当时通过马的往还，曾由奉军

秘密接济一些军事上的补给。

1924年秋天，曹、吴密谋出兵东北，马炳南找张树声问冯，张树声告以吴佩孚派冯率队去古北口经承德袭击奉军后路，并以黑龙江主席许冯（当年黑龙江省级官职设督办，省长。——编者注），冯决心与奉军合作。张树声密告马，冯部一师三旅移防高丽营、怀柔、密云、石匣、古北口，冯意请奉方千万勿入关。马立即回沈报告。冯按兵不动。马将张作霖信交给冯，只要达到和平目的，奉军可以不入关。冯阅后很为满意，当即用一张旧东昌毛头纸写了一个很大的“成”字，下署“玉祥”二字。马拿冯字回沈撮告张作霖。张派马炳南和冯玉祥的老朋友贾德耀，送冯200万元。

这时冯接到吴佩孚的参谋长张万严电告，前线情况危急。冯见电后，坚定了回师北京的决心。准备将军队到北京后开到天津杨村北仓打垮吴佩孚。1925年春天，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张树声任西北边防帮办（《国民军史稿》记载：任骑兵第一师师长——编者注），专收土匪事宜，计有王英匪部、刘黑七匪部、荣三点匪部、夜猫子张匪部，联络孙殿英部和万选才部。1930年10月冯阎第二次讨伐蒋介石，西北军全部崩溃。

张树声到了上海，黄金荣与张准备一处住宅，专门在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南京、蚌埠、徐州、开封、汉口等地，收清洪帮徒弟。每到一处就拜香堂一次，徒弟照顾吃、住，临走徒弟买好头等车票，到某站，有徒弟迎接等等。例如1938年1月，蒋介石召集一、五战区旅长以上将官在开封开会（是押韩复榘的时候），张树声由上海到了开封城里，住在鼓楼南马道街某百货公司拜香堂。张树声邀西北军各级将领吃饭，饭后拜香堂所到的师旅长全拜张树声为师：有一三二师师长王长海，三十七师师长张凌云，第一集团特务旅长孙玉田（写材料时属一〇七军二六一师师长），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三十七师旅长吴振声、王为贤，一三

二师旅长柴建瑞、刘景山等十几个人，每人拿拜香堂用费100多元。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徐州、开封、汉口，张树声仍在上海未动。

（选自《都会奇观》）

记张树声二三事

王冶秋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街头许多店铺的匾额、招牌，下面都落着张树声的名字，有人看到很奇怪，觉得这位姓张的字写得并不好，为什么这些人找他写招牌？原来这位姓张的，不是什么“写家”，而是一位清帮“老头子”。

张树声曾经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过骑兵师长，也曾经作过冯的代表和张作霖的代表联络过。后来他不干军队了，就在北京等地搞帮会①。由于他的辈分高，是所谓“大”字班的，所以在帮会中地位很高。

“大”字班，即清帮中排辈字的“大、通、悟、学”之“大”。按辈数来说，即为第“廿”辈。又称“念”字辈，以下则称“念一”“念二”……按他辈数来源，比蒋介石、黄金荣、杜月笙等都高。

抗日战争期间，他到了重庆。当时帮中辈数最高者，据说有两人，一为张之江，一为张树声，都是“大”字辈的。张之江据说曾拜过“祖师爷的衣冠”，又比张树声多一层资历，但他早已“关了山门”，不收徒弟。剩下只有这位张树声，按理他也应该早关山门，但他却没有“关”，继续收徒，而且大收特收。有人说，某一年（约在1940年前后），他的徒子、徒孙等等光是在重庆的

① 此说和《清帮头子张树声》一文中的说法不同。

就有9万人。上至蒋介石周围，下至中统、军统、各机关，水旱码头都有他的徒弟。有一年蒋介石下了手令，禁止公务员入帮会，就是为了抵制他的，但未生效。杜月笙到重庆也曾劝过他："你老人家不要再给我们收些小祖宗了。"他也没有理这回事，还是照样"开香堂"。

他在重庆时，老是住在两家饭馆子楼上，这半年住在上清寺一家河北饭馆，那半年就住在校场口附近一家天津饭馆。只要他一住下，这家饭馆就生意兴隆，"高朋"满座。因为他隔几天就"开"一回"香堂"，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开过香堂，大摆酒宴，生意哪能不好？

这人那时约有60岁以上年纪，胖身材，有两撇小胡，讲话慢慢的，穿的很朴素，常常穿一身灰衣服，裤子后面补了两块大补钉。

他每次"开香堂"，都照例讲一套帮会的历史，说的却是"反清复明"的一套。对于"安清帮"有一些新的解释。例如他说：帮会是顾炎武等创始的。帮会中用的"手式"，屈着食指是"九"字，大手指代表"十"，剩下三个手指，代表"三"，合起来就是三月十九日崇祯上吊的日子；供的"祖师爷"姓"潘"，是代表明朝最后的三个藩王。他说后来乾隆下江南，在运河船上加入帮会，改为"安清帮"，可是帮会中人大部分没有受利用，还是反清，并没有"安清"。他大约受到冯玉祥一些影响，常常讲到这里，就讲一些爱国爱民道理，反对日本侵略。

他的左右有许多徒子徒孙当特务，可是他有时在一两个人的场合下，也大骂特务。

他虽然主要的是搞清帮，但也搞"洪帮"，同四川的"袍哥"也有一定的关系。据说还有一种"黑帮"他也搞，因此同各地土匪也有关系。

他也常同冯玉祥来往。冯玉祥后期搞"利他社"，实际上是学

张树声的一套，甚至入“社”形式，也是跪拜，好象“开香堂”的样子，不过每次人数少些罢了。

张树声在重庆“开香堂”，实际上也不仅是在重庆的一些上下人等拜门，而是常常有些由各地专程到重庆来拜在他门下的人，混个“通”字班，回去好方便行事。例如有些杂牌子队伍中的军长、师长、团长之流，那时队伍很不好带，蒋介石一面叫他们搞摩擦，一面又派了许多特务在部队中搞鬼，而部队中土匪流氓也应有尽有，那么这些人拜了门，回去以后，就多了一层“一个门里”的关系，所以就纷纷来“拜门”。例如刘汝明部的刘尊三军长，本有军统关系，但又拜了张树声，回部队以后，一面借此巩固内部，一面利用帮会关系，与一股土匪拉上这个关系，把土匪头弄来称兄道弟，天天吃喝玩乐，最后把这股土匪吃掉，据说坑杀了千多人。

张树声在重庆被称为“无冕帝王”，从他一次得病的经过，就可见他的势力之大。他那次得了“搭背”，在上清寺一所教会办的宽仁医院中开刀。这所外国人办的医院是当时在重庆最阔气的医院之一，他居然包了二楼整个一层的房间，从他病床前面起，直到大门，都有便衣“副官”站岗，有穿西装的，有穿中山服的，都佩带着新的美式左轮。每天来问病的人川流不息，有坐汽车的，有坐滑竿的，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送的礼品，就摆满了两间房间。

有一次冯玉祥的副官周茂藩被捕，案情十分严重。而周茂藩究竟被特务搞在什么地方，口供究竟怎么样，无法知道。后来找到张树声，他叫来“副官”一问，马上就知道关在南岸一处秘密特务机关中。他马上给那里的看守长写信。派人去后，所长一看是张的信，把所长房子让出来，把周茂藩带出与去的人见面。

有一次特务准备把一个人在从歇台子到重庆的途中绑架走，张树声亲自去找他送信，他不在城里，又托人带信到乡下，让他无论如何去他那里见面。见面以后，张树声就说：“特务要路上绑

你的票，绑去以后，就把你拿硝镪水化掉啦！”后来那人说：“我有两个月没进城了，城里出了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张树声信了他的话，马上叫来一位“副官”，说：“告诉他们那边，这个人我们这边担保啦！”以后就没有出事。

张树声在解放前夕已经死掉。我知道关于他的事，就是这些。

（选自《都会奇观》）

安庆的清帮

李帆群

一

安庆是长江中游的一个重要码头，又是安徽的省会，商旅来往频繁，因此就成了清、洪帮活跃的舞台。其中，以清帮的势力较大。洪帮人数很少，也没有形成组织的发展。

清帮进入安庆，大约在清代末年。就目前能了解的材料，最早是大字辈的叶松山，人称叶二爷。他的祖上在吕八街开了一家浴室，后来由他弟弟经营，他自己也有一股。他是在外地入帮，而后进入安庆，开始开山收徒，此后通字辈的帮徒才逐渐多了起来。

入帮要遵行十大帮规，诸如：不许背师卖友，不许扒灰（奸污下一辈的妻子）盗宠（奸污上一辈的妻子）等。犯了帮规，要按“家法”给以严厉的制裁。重的“吹灰”（杀掉），次则“六根去一根”（手、脚、耳、鼻、眼），轻的“三刀六眼”（对穿大腿）。犯了帮规，师父审问时，要直言不讳，否则加重处罚。执法时，师父和重要徒弟都亲临现场，犯规的人必须自己动手，否则由别人执法，蔑称“孬种”，不仅颜面扫地，而且要被赶出山门。如果自己动手，纵然犯了帮规也可以称为“好汉”。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帮徒在安庆犯了帮规，安庆帮师父和一班徒弟在深夜把他带到西门外一个小破庙里。师父坐在

上首，徒弟持刀立于两旁，当中放一个木凳，上竖尖刀一把。师父叫犯规人站在下首，一句一句审问："这些事可是你干的？"他一一承认。师父问："该怎么办？"回答："该杀"。师父说："漂亮的就自己来吧！"于是犯规人脱尽上衣，对着木凳，跑步上前，他上身猛扑刀尖，刺穿心脏。然后两旁徒弟以其上衣将他裹住，抬到江边，丢进长江。如果他不自裁，两旁帮徒就会一涌而上，乱刀将他戳死。（这段材料系访自余世左。徐世左不是清帮，但与帮徒有来往，当时他很年轻，被邀往旁观，亲眼所见）。

师父所收最后一个徒弟，称作"小爷"，其人选是师父早已物色好的。收了"小爷"，就关"山门"。"小爷"到"同山"（同一个师父）的师兄家作客，先由师兄做一身新衣，并招待食宿，给予路费。"小爷"到别的"山门"（别的师父）师兄家，也要予以款待。

徒弟升任县长或团长，就由师父大宴宾客"退贴"，一面表示徒弟中出了"人才"，是师父的光荣；一面表示徒弟地位高了，可以不受师父的约束。

帮内发生了矛盾纠纷，就要"摆台子"（说理），一般都在茶馆酒楼进行。南门在"富贵楼"，东门在"嘉宾楼"。茶馆招待叫"水台子"，酒席招待叫"油台子"。双方师父和得力的徒弟都要出场。辈份最大的面朝大门坐，辈份最小的背朝大门坐。大辈师父用茶碗盖在碗里刮三下（当时通喝盖碗茶）；中辈用手指沾茶弹三下；小辈把茶往地上倒三滴，以表示各人的身份。说理结果，谁的理亏，由谁付钱。

帮内小偷，只许偷外人的东西，如果误偷，必须交还，叫作"归号"，但规定"见物不见人"。如果失主并非帮徒，但与帮徒有交情，可以在案发后报告师父。只要是他的徒弟偷的，一般都可以归还。因为帮徒中的小偷，都划分区域行窃，而且行窃后要向师父汇报，因此容易找到。小偷上轮船行窃，叫"跑一趟水"，但

先要和船上的帮徒联系，偷来的东西，也要讲清品种和数量。

帮徒去到别的“码头”，捆行李时把脸盆朝上，或在行李上插一只布鞋，鞋底朝外，表示是“自家人”。但见面后要盘问根底：“头顶什么香（师父）？手捧什么香（兄弟）？脚踩什么香（徒弟）？”“光棍许充不许赖，要能说出三帮和九代。”不但要能说出代代师祖的姓名，还要能说出帮内的黑话（象座山雕盘问杨子荣那样）。假的不能冒充真的，冒充的叫“空子”。答复不出时也有一段黑话：“兄弟脚短，跑在山后，都是老大哥们丢的东西，我捡了一点子。”等承认是“空子”以后，教训一顿，也就算了。如果虽是“空子”，而却是别的师父介绍来的，则要尽力协助。

清帮不仅有套秘密组织，也有一套秘密语言（黑话），以隐蔽其秘密活动。凡生活起居，什用杂物，无所不包，足可以编一部黑话词典。如：姓什么叫“什么万子”；姓赵叫“亮伙里”；姓王叫“红伙里”；姓李叫“子伙里”；姓徐叫“砍伙里”。男人叫“阳码子”；女人叫“阴码子”；打架叫“比扒”；茶壶叫“洞庭子”；手巾叫“瓢子”；钞票叫“花虎”；公文叫“威虎贡”，军警界叫“掌威虎”。多少钱叫“多深的水”，几十元叫“几寸水”，几百元叫“几尺水”，几千元叫“几丈水”。这些黑话是在清帮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创造而积累起来的，它通行于长江中下游整个清帮内部。

二

清帮在下层社会中发展，在“讲义气”的帮规的约束下，“一家有事，百家相助”，把持了一些社会基层，形成了一股顽固的封建帮派势力。他们活动的地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茶馆、酒楼、浴室、戏院、车行、轿行……。这些部门所接触到的社会阶层，包括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他们容易受到反动军警以及各种地方封建恶势力的盘剥欺

凌。加入清帮以后，就可以凭藉帮会的势力，保住自己的地盘。

2、烟馆、赌场、高行、盗窃、流氓。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业和非法行为，容易受到反动军警的干涉。他们参加清帮以后，就受到清帮恶势力的保护，可以为非作歹，横行无阻。至于妓院，虽然清帮规定“王八”不能入帮，但他们也有清帮有联系，按时送钱，求得清帮的保护。

3、安庆是沿江码头，搬运工人云集，每一个航运码头，都被封建把头把持，而大小封建把头，无一不是清帮。他们制订有各种严酷的剥削规章，任意盘剥工人，还吸收一些身强力壮的工人入帮，充当打手，称作“叫鸡儿”。如东门外的把头陈庆贤（梧字辈，外号陈小狗子），南门外的把头马五臭，都是清帮中有实力的分子，在沿江码头，形成特殊的帮霸势力。凡是在码头做搬运工，或者是在江岸挑水的（当时无自来水，南门一带都吃江水，每家都有固定的挑水人送水），都要花钱向帮霸“买码头”，否则就不能在他的辖区生存。一个挑水的买一个固定“码头”，就要30块银元。

轮船上的勤杂人员，大部分也都是清帮，他们走南闯北，与各个码头的帮徒结为一体，贩毒走私，从中渔利。

4、反动军警侦缉部门，也多半由清帮分子把持，他们敲诈勒索，包庇烟赌，怂恿抢劫，坐地分脏。

安庆清帮中的重要分子计有：

叶华，出身屠户，身壮力大，每逢元宵节玩龙灯，他总舞龙头，而且在龙头里绑个石锁。后来担任侦缉队长，作恶多端，解放后被镇压。

谢介孚，外号谢大莆，以惯于打架闻名，曾口衔一桶水走上邓家坡而滴水不泄，而不改色。解放前是军警稽查处和警察局的督察长，解放前病死。

卢秉忠，也是警察局的侦缉队长，为非作歹，解放后被镇压。

韩景琦，外号韩麻子，是上海清帮头子黄金荣的徒弟，担任军阀时期安徽省政府的参议、安徽禁烟局顾问和警察局咨议，又是特业工会会长（制鸦片的行业）。他在安庆开粮行、鸦片行，景琦钱庄、庆云银楼和绸缎庄。他虽然不收徒弟，但却仗恃清帮的势力，操纵商业经济，交结官府，成为具有特殊势力的清帮分子。

张大光，安庆对江大渡口的恶霸地主，在农村广收帮徒，霸占民田，渔肉乡民，办有大光中学。后被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枪毙。

方少泉，外号方大狗，靠贩鸦片红丸起家，在钱牌楼开澡堂，又开皮鞋店，解放后被镇压。

屠老三，有名的赌棍，以斗殴闻名，曾与广济圩外号“八十岁”的帮霸打架，致使丧命。

朱雁秋，是名噪安庆的清帮头子，他原是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部下的旅长，退伍后在安庆办“厘金”（税收）。他在安庆小东门盖了一座小洋房，院中奇花珍禽，星期天则开放任人参观。他广收帮徒，遍布全市，敲诈勒索，偷资抢劫。他的徒弟，身穿对襟短衫，上缀十三粒布扣，号称“十三太保”。他的老婆，人称“朱师母”，也招收女“学生”。又办了《大同报》，扩大自己的势力。当时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准备在全省办理“米捐局”，搜刮民脂民膏，朱雁秋提出要当大胜关米捐局长，被刘拒绝。朱又利用《大同报》攻击刘镇华渔肉安徽人民，反对成立米捐局。刘盛怒之下，面陈蒋介石，控告朱雁秋破坏税收，蒋介石遂批示将朱雁秋就地正法。

以上这些人，都是通字辈。

三

由于清帮内部施行严格的家长制组织形式，容易为少数人所

操纵利用，沦为反动政权的御用工具。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就在安庆指令其特务处长杨虎，勾结国民党右派陈紫枫、管鹏、凌铁庵、张秋白，清帮头子朱规清、张培亭等，收买一批清帮分子，组成反动的安徽省总工会，捣毁了左派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酿成三·二三事件。此后，反动军警部门也利用清帮作为镇压人民的爪牙。到了日伪时期，有些清帮分子则充当汉奸敌特，为虎作伥，更加暴露了它的反动性。

安庆清帮，主要活动在辛亥革命至解放前这一段时期，也就是以通字辈为主而佐以大批悟字辈的发展阶段，还没来得及向学字辈大量发展，安庆就宣告解放。解放以后，我人民政府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将清帮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予以镇压，并严禁其他帮徒再继续进行帮会活动。至此，猖獗一时的清帮，也就被革命的洪流，冲洗得烟消云散。

（安徽省安庆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芜湖、桐城清帮见闻

杨邦太　金　里　金钟平　胡景翼

芜　湖

清帮在芜湖历史比较悠久。这里仅谈谈从1920年以后到解放前夕，清帮在芜湖的一些情况。

1920年以后，芜湖的“大”字辈清帮人物已寥寥无几。仅剩肖达三、江顺玉、袁仲轶（先杰）、宫自安、俞昌龄等人，其中以肖达三、江顺玉、袁仲轶为最有名。家门（俗称清帮人为站家门）内外，都称呼肖达三为肖老太爷；江顺玉为江爷；袁仲轶为袁二大人。早期清帮收的学生，一般都是码头小头目、工头，浴室、茶馆、酒店、戏院等服务行业的工商户，以及吃赌博饭、开鸦片馆的小市民。抗战前后，芜湖曾一度出现虚假地繁荣，一些暴发户和工商户老板，怕受伪官吏敲诈勒索，纷纷加入清帮。当时的粮食采运业、杂货业、糟酱业、百货业、五洋业、中西药业，以及皮毛业等行业中的人，特别是这些行业的所谓“巨头”，大都在帮，以此作为保护伞。而清帮头头也乐意收这些生意人为学生，以得到经济上的“孝敬”。

当时芜湖的清帮，“大、通、悟、觉”四代人都有。清帮行话称“大”字辈为念一，“通”、“悟”、“觉”为念二念三念四。下面就谈谈几个“大”字辈清帮头头的情况：袁仲轶是后来的“大字

辈”帮头头，出身官宦之家，大哥是袁斗枢。他想站家门收学生，但在芜湖最高的也只是“大”字辈，他要拜则只能是“通”字辈。据传，他认为这样似乎不够体面，也过不了当清帮头头的瘾。于是他就到扬州去找“理”字辈，结果只找到一个刚死不久的“理”字辈。清帮允许在灵前投帖拜先生，袁仲轶就是这样搞了个“大”字辈，并在芜湖开山门大收学生。当时他既有做官的哥哥，又有高铁君（专员）这样的同乡作靠山，加上香头又高，所以收的学生都是在黑社会里叫得响的。据说他还在肥西和巢湖一带收了学生，其中有惯匪。他在九莲塘海心地建造了一个公馆，四面环水，仅有一条经过蒲草塘通往街上的路。经常在公馆聚赌抽头，赌到深夜，把吊桥拉起，不想赌的想走也走不了，结果往往只有输光了事。当时袁的声势之大，在芜湖是无人能与匹敌的。1934年左右，国民党政府以匪魁之罪将袁逮捕押解湖北武昌枪决。逮捕他那天，气氛是比较紧张的。上午10时，一连步兵包围他的公馆进行搜捕，查抄了一些违禁品。然后执行任务者与袁并肩步出他的公馆，直奔大轮码头，乘轮船押解赴汉。另一比较有名的“大字辈”清帮头头是肖达三。肖曾在大马路（今中山路）开“第一春达记番菜馆”，后面设交通旅社。沦陷期间他收的学生多是工商户，因之肖亦侧身于当时工商界，开有达记纱号，并为纱业公会理事长。他的学生较多，且各方面都有，因而在社会上联系面也较广。曾与汪善诚、吴玉堂、徐干臣等一度接办过育婴堂、养老院等慈善团体，所谓官商政学、三教九流都有给他捧场的。学生中出点什么乱子，提到肖老太爷门下，无有不能解决的，堪称当时芜湖清帮中的“太上皇”。江顺玉也是有名气的“大”字辈，但他不太露面。抗战前曾为南京和记洋行收活鸭，江南江北养鸭群（又称棚鸭）赶往南京销售的，沿途提到是江爷的学生，或者说与江爷有关系，一般都可以保证一路平安通过。他在市内学生也较多。世居北门桑枣园，并开设洁园浴室。

“通”、“悟”、“觉”字辈，除“通”、“悟”字辈有少数全市闻名之外，“觉”字辈已无较大出名人物了。这里仅就“通”、“悟”字辈各举一例：“通”字辈的吴正启较为有名。他是赵云生剪刀店的东床快婿，住长街宁渊观口。此人在芜颇有影响，学生较多，交往亦广，社会各方面关系都拉得上，闻名一时。“悟”字辈的董海亭（绰号董三虎），是伪公安局侦缉队头目；本人在中山路开设东南饭店（是芜湖当时一家较大的旅馆）。由于既官又商，辈份虽小，但有势有钱，并且和袁仲轶以及其他“大”字辈、“通”字辈的头面人物都能抓得住，所以名气较大。“通”、“悟”字辈还有一些成为地方上小地头蛇的出名人物。他们所以能混出一点名气，不过是因为能说会道（清帮行话叫“弦子快”），或打架有两手（清帮行话叫“锤把子硬”、“苦水足”），或交际（小官小吏小衙门联络得比较亲密）而已。

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清帮在社会上的影响是较大的。芜湖的国民党“接收大员”，大都加入了清帮，借助帮会势力，大搞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的勾当。

新中国成立以后，封建残余势力的帮会组织，受到应有的打击，芜湖的清帮当然也不例外，从此销声匿迹了。

桐　城

江邦寅这个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年轻时曾在芜湖“小有天”当厨师，会做一手好菜。那时常来“小有天”上馆子的，是芜湖船业公会的把头们。这个公会的理事长金旭光是双店人。江邦寅除结识了金旭光外，还结识了专在芜湖做讼棍的双店人吴文堂、在商会做秘书的孙潜园等。那时船业公会常在“小有天”聚餐，一来就是十桌八桌。有一次，金旭光吩咐船民们给江邦寅凑个股子。于是，江邦寅在芜湖的新横街开起“悦来”茶社。开张

后，那里的主顾，除了船民就是清帮伙里，生意相当兴盛。

抗日战争爆发后，芜湖许多做生意的人，都怕日本兵来了以后，生意做不下去，因而纷纷回故乡。江邦寅也回到家乡双店，将开“悦来”茶社赚来的钱广置产业，除了四柱落地的两幢新屋外，还在屋的四周扎起了篱笆，样式非常讲究。此外，还购置了100多石租田。他还广泛结交，大收徒弟，在双店一带，竖起旗杆。当时双店是个“三不管”的地方，来往于敌伪沦陷区和国统区的商船，便利用这里进行走私，获利颇大；一斤盐运到内地可以换一斗米，而内地的粮食运到芜湖，要赚10倍以上。因此，只要与敌伪和国民党两方有勾结，便可以立即致富。一般商人，因为获取暴利而走私，都请江邦寅给他们保险，否则，一经察觉，货要充公，人也要扣押。江邦寅由于在长江中游一带，到处都有“老师”和“学生”，所以不但替人说生意，自己还搭股本。因此，投靠他的人很多。同时，他也利用徒子徒孙，扩充自己的潜势力，在双店一带，他俨然是个土皇帝。凡是路过双店的客商，都要去拜望他，送礼给他。地方上的大小事情，也都少不了找他。他和他的徒子徒孙，干了许多坏事。

1941年末，新四军北上抗日，沿江支队的一部经过双店转至湖东和巢县，以双店逗留了一些时日，进行了抗日救国的革命宣传，同时杀了为群众恨之入骨的惯匪江海霞；又在吴氏宗祠的石壁上写下了“不灭倭寇誓不休！”等标语，并公布了12条公约，其中有：“不通敌资敌，不给敌人带路”等条款。江邦寅在表面上表示赞同，暗里却向当时国民党一七六师报告，说新四军在双店活动“猖獗”，要求派军队驻防双店。新四军沿江支队在获悉这一情况并认真分析研究后，遂决定北撤。不久，国民党一七六师五二八团进驻金神墩，以一个加强连驻双店。

国民党军队一到双店，就会同保、甲长挨家挨户清查户口，此外，四处张贴“自首”通告，在双店火王庙对面的金家爆竹店还

设置了“自首登记处”。但是，并无一个新四军前来“自首”。国民党为了欺骗群众，便勾结江邦寅，指使清帮的徒众假“自首”。开始时，帮徒还有点怕，认为冒充新四军“自首”。以后不知国民党会怎样对待。后来才明白：“自首”了，帮徒就有了一定的反动身份，就可以借此和国民党反动组织正式勾结，牌子反而比清帮更“亮”了。国民党驻军唐连长眼看搞来这么多人“自首”，高兴自不必说了，离开双店前他特的摆酒请客。酒宴上他对江邦寅恭维备至，说什么“江老先生在地方上的威望素著，这次流窜到双店一带的新四军能够全部悔过自新，与其说是本连的功劳，倒不如说幸得江老先生大力配合的结果。所有自首的弟兄们，走向光明之路，都是江老先生所赐。”

新四军北上抗日以后，小队长叶六三（本地人）留在当地进行地下抗日活动。江邦寅很想把他也拉进清帮组织里来，曾派人去诱降。叶六三不但严词拒绝，并且还率领小队狠狠地打击了沿湖一带与江邦寅有往来的走私资敌船只。叶的小队后来转移到内湖船只通往长江必经的石灰山上进行活动。一天傍晚，小队在双店的瓦竹嘴头活动，为清帮分子金玉相、余三瘌痢所发现，他们跟踪潜至石灰山脚，又星夜赶回双店，带领一个排的匪兵前去袭击叶六三和他的小队。叶小队长得悉情况后，一方面指挥小分队队员向雨坛那边转移，一方面自己留下掩护小队和坚持发动群众把家畜、家禽及粮食收藏起来。国民党军队来了，并不向山岭挺进，只蜷缩在村庄里乱打枪，继之又虚张声势地向西南边山脚蠕动。叶小队长担心他们与小队队员正面接触，就向山下打枪，把匪兵引过来。后来，叶小队长终因子弹打完，趁匪兵围上来，扑到匪兵身上，把匪兵身上的手榴弹拉响，与敌人同归于尽了。解放后，给国民党军报信和做向导的清帮分子金玉相、余三瘌痢被人民政府镇压，欠下的血债终于偿还了。

抗日期间，双店的清帮分子，在江邦寅的指挥下，勾结距双

店20里罗岭那里的清帮，到双店抢劫；双店清帮则到罗岭、萧店、曹岗等地抢劫。闯入被抢的人家后，通常是把家主按倒，用油纸捻灼炙脸部，直到他把钱、首饰所藏的地方说出来为止，然后把东西一掠而光。每次抢的东西，都听凭江邦寅分配。他们还抢劫商店，临走时常留下纸条，其内容是：军需在急，暂行借用。落款是：新四军。

每一处受劫，江邦寅于第二天总是装作大士绅样儿前去探望，并表示同情，声言要组织流动夜哨。经江邦寅一说，一些小康人家都表示赞同。后来，一支由清帮分子和地主分子组织起来的流动夜哨，便逐夜"巡逻"，由地主们供给夜餐。但是很多人挨抢的命运仍不能摆脱。江邦寅根据新情况采取了相应的变化：流动夜哨到甲地，清帮组织抢劫乙地。时间久了，人们虽从无数的事实里识破了江邦寅等清帮分子的花招，但却哑巴吃黄连，有苦没处说。

更为残酷的是，除了抢劫外，江邦寅指使下的的清帮分子还绑票，并杀死被绑者。罗岭有一个姓严的，被双店的清帮捉来了，白天关在黑屋里，晚上带他到处乱转，好让他弄不清方向，同时叫罗岭的清帮通知他家里拿2000元法币前来赎人，结果姓严的家里送来1000多元，无济于事，人还是被杀掉了。

至于清帮分子拦路抢劫，更是常事。有一次，笔者之一和另个两清帮分子晚上赌钱后，两囊空空如洗，就想到湖边去发点"外财"。那时船只白天航行的很少，因为一碰上国民党军队，船被扣押，所运物资也全部没收。尽管这样，一旦运出去了，一船货物会抵上十船货物，所以偷运的仍然不断。这些船只大多在夜晚航行，连帆也不扯，出了枞阳口就算稳妥了。事情非常凑巧，三人到了湖边，正好有只船从菜子湖心扬帆而来。三人看到这只船扯起了帆，有些疑心。因按一般习惯，偷运的船只不仅不敢扯帆，就连划桨也划得很轻。由于想发"外财"心切，也就不细想这些，

大声命令那只船靠岸。这船倒蛮听话的，立即转朝这边开来。离岸只2丈远了，三人正盘算着怎样下手，忽然听到船里发出“站住”的声音，随即是10多条步枪同时拉动枪栓的声音，这一下把三人吓得不轻，都乖乖地站在岸上。船靠岸了，为首的一个拿着“八音子”手枪，问三人深夜到河边干什么。三人只好硬着头皮瞎诌：“我们是‘十三游’的，夜晚例行执勤到这里来的。”

“‘十三游’？说老实话，要真是‘十三游’，老子就崩掉你！”

三人原想讲‘十三游’可以把这一关蒙混过去，岂料他们是这样恨“十三游”。于是改口道：“我们是江邦寅老先生的学生。”

“好哇，我一看就有点象。为什么要扯谎？上船吧，和我们一道到姆山那边去捉‘八哥’去。”

这一下可把三个弄得莫名其妙。对方叫上船，又不好不上，只好心惊胆颤地上了船。看这三人的样子，那个拿“八音子”手枪的说：“不要怕，兄弟原来也是江老先生的学生。记住啊，以后遇上什么穿军装的，可千万不要说是‘十三游’的。就把江老先生的名字亮出来，还吃得开得多。”到了姆山的阴儿沟，先抢了一个鱼棚，又抢了靠鱼棚的一家商店，回来时又把江家嘴的鱼棚也一抢而空。在这以后，这三人觉得只要说出江邦寅的名字，在外面就有帮手，便愈益骄横起来。

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清帮实质上是和旧社会各种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反对革命，祸害人民群众的反动组织。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蚌埠清帮记略

石留成

早在民国16年前，蚌埠就设有警察厅，厅内有一个侦缉队。当时的队长郭华亭，是蚌埠清帮巨头（通字辈），收有400多徒弟。他的徒弟五花八门，一小部分是工商界小开，其余都是地痞、流氓、土匪、惯窃等。郭表面上是地方警察官，负责地方治安，实际上他每天干的都是危害人民的勾当。那时候，蚌埠四郊地主们用的打手，以及乡镇上的团丁，一般都是地痞、二流子，并且加入了清帮。他们没有固定的薪金，经常以“合法”身份带着短枪来蚌埠找“买卖”（就是抢人或绑票）做。这路人就叫“官码子”。没有合法身份的土匪则被称为“私码子”。这些官私“码子”到达蚌埠以后，先要向郭华亭挂号，请示，然后由郭指派，叫抢哪家就抢哪家。在马祥斌担任警察厅长前，厅长曾几度易人，郭都平安无事，丝毫未被触动。后来马祥斌担任厅长，郭给马的公馆送去全套家具，又送去一匹枣红马和一柄虎头刀。想不到马祥斌为人很怪，他对郭这样做不但不高兴，反而心里愈加怀疑，并格外注意从各方面了解郭的罪恶活动。当时看守所里关押的一部分盗窃案犯，经过审查半数以上都与郭华亭有瓜葛。马祥斌遂把郭华亭开除。郭被开除后，一心要与马祥斌为难。除指使其徒弟扰乱治安外，又暗中指使土匪到外抢劫，以至蚌埠一日发生过三次抢劫案，闹得人心惶惶。一天，天还没黑，二马路闹市中心老凤祥银楼对面一家皮货店被抢，抢去现金和几千张皮筒子。当时警察

厅逮住两个土匪，审讯后得知此二人是郭华亭的徒弟，而抢劫的主谋正是郭华亭。第二天早晨6点钟，警察将郭的住所包围，搜出许多赃物和400多张投师贴子，当即将郭逮捕。马祥斌亲自审讯，郭供认不讳。随即将郭华亭师徒三人绑赴皮货店门口斩首示众，全市人心大快。郭的一班徒弟亦作鸟兽散，从此瓦解。

以后侦缉队又由清帮头子于化鹏、于化洲兄弟俩掌握。于氏兄弟与郭华亭大同小异，也是到处想点子在社会上敲诈勒索，当时有许多商店和旅馆、戏院、浴室，都请于氏兄弟担任名誉股东，白送许多红利给他们。这样做，一般地痞流氓就不敢上门敲诈了。抗日时期，日机轰炸蚌埠，于化鹏被挤死在防空壕里，于化洲则在伪警察局搞侦缉。抗日胜利后，于化洲又当上蚌埠市公安局侦缉队长到处横行。

日伪时期，清帮在蚌埠成立了安清同盟会，日本浪人也有加入清帮的。总会设在南京，总会长是常玉清，他在南京开了一家大饭店。蚌埠分会会长韩凌阁（阜阳人，与安徽省当时的伪省长倪道烺是同乡），会员还有一些重要人物，象秦松亭、张云山、曹捷臣、贺子明、王修芝、赵汇川、朱少庭等。入会手续，须有内部人介绍，报出三帮九代，填写入会申请书，缴入会费一元。然后发给入会证，以后按月缴会费。每月举行例会一次，每年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一次，主要内容是夸耀会内又收进了某某高级军官、政客和发展的人数。当时蚌埠清帮中最有名的，一个是沈席儒，一个是路家云（绰名小疯狗）。沈席儒是蚌埠南乡（距城20里）仁和集的地保，拜赵汇川为师加入清帮的。这时，沈席儒已当了土匪头子，有七八十支长短枪，在蚌埠西南河梢一带抢劫来往商旅。日本特务机关得到消息，就叫赵汇川去劝沈投降。这时，沈在乡村已无路可走，乃同意并立刻同其师父赵汇川一起面见日本特务机关长樱庭和富田大佐。日本人任命沈为蚌埠地区伪军司令。从此，沈就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收罗了一大批流氓、土匪、小偷、

扒手，当起了乌七八糟“大杂烩”的司令。不到一年，沈发展到2000余人枪。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伪中央政府时，沈的杂牌队伍已有7000多人。汪委任沈为绥靖军第六师师长（编者注：一说是任伪军王占林的第四师副师长兼团长），驻防淮南铁路沿线和津浦路南段。沈利用日本人给他的一点权利，想尽一切办法来抓钱。他在蚌埠设有赌台23家，每个赌台由沈派二人管理，聚赌抽头，弄得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沈还派人逐日向300来个小本经营的盐盆子（小盐贩）收税，每日总在千元以上。另设岗卡检查班，勒索往来行商、小贩。他还是一个贩运毒品的老手，有了“军权”以后，又勾结日本三菱和三井洋行，将大批海洛英和烟土运到南京等地。抗日胜利后的第二天，沈席儒竟被蒋政权委任为接收师长，仍然骑在蚌埠人民头上。解放后，沈席儒终被镇压。

路家云，也是靠清帮起家的。抗战前因匪案被怀远县政府判无期徒刑。1938年农历正月初三怀远县沦陷时，路由大牢里逃出来，脚上带着大镣，连夜跑到石国柱家（石国柱认路母为干娘，当时任保卫团的一个队长，有三四十支枪，以打游击为名，到处进行抢劫）。路家云到石国柱家不久，地方上几家地主怕他会找他们的麻烦，乃商议把他请来，给他枪支，请他担任地方上的保卫团大队长，保护他们的财产和利益。不到半年，路家云就有了200支枪。他住在曹老集一带，经常到周围二三十里外进行抢劫。他的势力逐渐扩大，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本人了解到路与怀远县保安队长张天柱是清帮的同参兄弟，便利用张劝降。张天柱于是到怀远县苏家集，找师父苏家斌商议。经过苏、张二人的说合，路家云投降了日军。日军委任路为淮北地区伪军司令，司令部设在曹老集。路在地方上任意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敲诈勒索，人民恨之入骨。后来，路家云又抽靠了蒋介石政权，继续为非作歹，直到解放后，才被镇压。

抗战胜利后，蚌埠清帮比日伪时期更为活跃。当时号称“三

老”的刘华轩、项允诚、高香山都是清帮中有名望者。刘、项是当时商会的负责人，徒弟收得不多。高香山是个封建把头、地头蛇，收有七八百徒弟和学生。原先蚌埠河下驳运划子老板是刘子珍，刘死后，其子刘文元继承父业。刘文元吸毒，不务正业，加上清帮的人天天捣乱，因此就拜了高香山为师父，靠高来支持他。从此驳运班每出事故，高香山就出来调停。久而久之，高竟取代刘当上了驳运班的大老板。民国20年前后，驳运班发展有600多条船，内部派别很多，天天闹事，弄得高香山也无法应付，只好把盐、粮分开。规定装盐不装粮，装粮不装盐。盐驳120条船，派刘文元担任老板；粮驳500多条船，由高香山自任老板。七·七事变后，高香山逃往四川。蚌埠粮驳由齐学厚担任大老板，盐驳由蒋新民负责，蒋不干后，由席兆江任大老板。而蚌埠码头，则先由贺子明、张云山等人负责；后由曹捷臣一把抓，成为蚌埠码头上说一不二的红人。这些封建把头都是由清帮起家的。

1945年秋，高香山回到蚌埠。这时他又在国民党，又在清帮，又有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写给蚌埠市长李品和的一封介绍信，所以，高一到蚌埠市，立刻就坐上了封建把头的第一把金交椅。此时，他的味口也大了，对这个驳运老板的地位，一方面感到太小，另一方面又舍不得丢掉。于是叫他的学生陈金波、张其书等人替他经营，自己坐分十二份老板帐，专心去运动市工会会长职务。当时可与他竞争的对手是曹捷臣。曹虽然是日伪时期的封建把头，但在蚌埠码头上势力还是很大的。36班票班老板，约有20班以上是拥护曹的。但是，高既有重庆归来的牌子，又有李品仙的支持，曹捷臣终于失败，并被关押起来，高香山于是爬上了市总工会会长的宝座。

当时，高香山的许多门徒把持了国民党蚌埠的党政部门。蚌埠市党部的洪吉岚、穆道铎等党魁，经常在高香山家里吸大烟、打牌，我也常去赌麻将。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夏威、蚌埠市长李品

和也常到高家拜望。警察局长刘景武更是听他的话。高家每天开着长流水的席，四菜一汤随便吃，如果是有钱有势的人到他家，另有小厨房招待。他家的客厅有四个，分别招待包括工人在内的各种人。各个客厅设备也不一样。有一个特别的会客厅，设备富丽堂皇，是专门接待象夏威、李品和这样的高级人物的。还备有四盏大烟灯，供人随便吸食。另外，还摆有几台赌。每天下午老板们就扛着钞票送上门。后因物价一日数涨，钞票不值钱，高即通知各封建把头拒收现钞，只要宝兴面粉厂的面粉条子，防止受到物价波动的损失。由此可以看出，抗战胜利后蚌埠的清帮与国民党的政权结合得更紧，国民党离开清帮就失去爪牙，清帮离开国民党就失去靠山。

我14岁小学毕业后，就在本市小斗班当缝包工人。18岁那年，经邻居周香甫（通字辈）引进，拜薛少庭（通字辈）为师。那天上大香时，香堂上有些事务是我办的，师父很满意，就命我担任18人当中的小老大。从此，我就进了清帮的门。薛少庭在北洋军阀时期干过团长，后来又干不挂牌的律师，包揽诉讼，贩卖毒品。日伪时期我任蚌埠伪军司令时，上至参谋长高小三，下至勤务兵，全都加入了清帮。我所联系的一些伪军头目，和我到南京走上层路线所依靠的，也都是清帮的人。如通字辈的崔玉山是“和救军”的中将司令；通字辈的黄其兴是任援道“绥靖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我也参加了蚌埠安清同盟会，后来迁到南京住，又参加了南京常玉清领导的安清同盟总会。我在南京时，曾帮过当时“八大财阀”之一的王炎生（通字辈）摆过一次大香堂，又名双香堂。那天既是王炎生开门收徒弟，也是王的儿子王九香拜日伪宪兵司令申振纲为师，同在一个香堂进行，所以叫双香堂。王炎生是汪伪时期南京中华路兴业银行的总经理，香堂是在南京仓巷他的家里摆的。当时，王炎生收有徒弟40多个，大多数都是资本家和小开。日伪宪兵第一团团长李洪志、伪第一集团军八旅旅

长孔端玉等也向王炎生孝祖认师。这天早晨8点钟开始，在帮的徒子徒孙都陆续赶到王府，计有大、通、悟、觉、万五代200多人。到场的还有日伪高级汉奸多人，其中象“绥靖军”总参谋长黄其兴（通字辈）、警察厅长邓祖禹（通字辈）、宪兵司令申振纲（通字辈），全市几个警察分局局长，以及大字辈的“穆老太”等等。日伪宪兵第一团团长李洪志派来一个班的宪兵在周围担任保卫。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在利用清帮来为其反动统治服务这一点上，汪伪政权的大小汉奸们是不遗余力的。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嚣张一时的南陵清帮

季　方

一

南陵清帮，在旧社会是一个互相标榜，朋比为奸的流氓组织，其内部分："佛门"、"灰窝"、"水湾"（又称三番子）三种。其中"灰窝"又有三帮：一是"泰山庙"（住庙叫花子）；二是"寒山门"（流动叫花子）；三是"靠盆底"（背高脚蓝子）。各帮都有排行、暗语。清帮家规是：传递师只将暗语、行话传给开山门大徒弟，一般人只知一些常用的行话，如见面时（不相识的朋友），将左手臂靠在右手臂，左手伸出三指，表示"三老"；左手伸出四指，表示"四少"；最后将右手一指，按在自己鼻孔上，表示我是"灰窝"；再将左手从头上向下抹一下，表示我只有一条腿，辈份不高；两手再合拢，表示要大家照顾。这时，开口便说："在下头不顶锅，身不背灶，千里不带柴，万里不带米，望各位多指教。"这样，在江湖上走南闯北，不愁吃喝，缺少盘费，也可得到帮助。

清帮收门徒的规矩相当严格。投师者一定得先写帖拜见，经帮内师兄引见才可。如徒弟想开香坛收门徒，事先一定要禀告老头子，等老头子关了山门，徒弟才能开香坛。开香坛时，徒弟一定要把与老头子同辈的人请到。每开香坛时，用费很大，这笔钱均由新收的门人供给。另外，主持香坛的，还要送一笔厚礼给老

头子。从此，老头子也就关山门，不能再收徒弟了。老头子在关山门时，收的最后一个徒弟，就是“小爷”。俗语说：“大爷嘴，小爷腿。”小爷就是老头子耳目，帮内师兄弟谁好谁坏，就凭小爷一句话，如果有人违犯了帮规，重则吹灰（杀掉），次则五根除一根（手、足、眼、鼻、耳），轻则要给三刀六眼，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最后驱出山门。遇到要案不好解决，老头子指定谁去顶替，谁要呲一声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处分。

清帮开香坛仪式非常隆重。香坛有大、中、小三种：大香坛要点十三路半香，上挂通天教主像（代表南北十三省）；中香坛点七路半，上挂达摩祖师像（代表南北七省）；小香坛点三路半香，供设翁（雍）、钱（坚）、潘（清）三位祖师爷的牌位。其半路香是点给各个祖师爷的师弟的。一般开香坛，是开三路半的小香坛，其香坛摆设是：一张桌子上放一把椅子，上供翁、钱、潘三位祖师爷的牌位，各个牌位前点一盏油灯，牌位下摆设三牲、水果、糕点等供品；还有一壶清茶、一壶白酒、三对红烛，中间一个铜香炉。其半路香牌位放在大门口旁边，供品照样。徒弟们站在下面，由引进师将新加入的人迎到祖师爷牌位前站好，引进时向牌位叩拜后退下，于是仪式开始，由点烛师点着红烛，唱诗一首：

“一对红烛亮堂堂，照得祖师放红光。
江湖带充不带赖，好汉做事好汉当。”

点烛师唱罢退下，燃香师将香燃着，上香三次，插入香炉，又唱诗一首：

“香烟缭绕上天堂，江湖侠士道义长。
青山埋骨不足惜，维护清帮理应当。”

燃香师退下。这时，传递师高呼新收门生就位下跪，向祖师爷献酒、献供品，然后门生叩首四拜退下，站在原处。传递师将祖师爷（老头子）扶上主坐，如有师叔，再将师叔扶上客座；传递师即高呼门生向师爷行四叩八拜之礼，再向师叔行三叩礼。此

时，传递师便宣布大家都是自家人了。

二

南陵县首次加入清帮的主要人物有刘绍先、程履标、张荣、黄昌运等。他们辈分虽不高，但势力却不小，各有徒子徒孙三五百人，遍及泾、南、繁三县各个角落，可谓嚣张一时。

刘绍先少时念了几年书，说起话来文绉绉的，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终日无事，游手好闲，鸦片烟滚单吃，麻将桌上昼夜忙，人们说他是文"把式"（流氓），他嗜利忘义，一生浪荡逍遥，娶了三个老婆。他在南陵县东门外开设东美旅馆。当时旅馆南来北往的人很多，流氓兵痞进进出出，这些人不易待候，稍不如意，即无事生非。为了易于掌握营业，他便投靠了清帮。托他的本家刘蹦（在芜湖开交通旅馆）介绍，投贴拜在芜湖"大"字辈袁仲轶门下，排行"通"字辈。从此，刘绍先在泾、南一带，大开香坛，广收门徒，扩充势力。他所收的人，大部分是商人、小老板、纸糟工人，号称"佛门"。

程履标、张荣二人，系南陵县政府的"马快"（法警）。因为土匪、小偷大部分都是清帮，他俩为了当好差役，也加入了清帮，从中了解匪盗情况。他俩到旌德投贴拜在陶行宏门下（排行"通"字辈）。并敦请陶行宏来南陵主持开香坛，网罗门徒，扩充势力。当时香坛设在湖南会馆后面一间民房内，仪式隆重非常，在县城轰动一时。他们收的人，多半是偷鸡摸狗之徒，甚至有做土匪的。这一派号称"灰窝"，这些人粗暴残酷，"苦水足"（心狠手毒），都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流氓。他们入了清帮，以为有靠山，便狐假虎威，在地方上横眉怒目，肆无忌惮；有的在深山僻径，拦路抢劫；有的夜入单家独户，强奸民女；会场上，戏台下，开场聚赌，输打硬要，使人望而生畏。有些打鱼的，放鸭的，做

窑的，以及偷窃扒拿之徒，都纷纷要求加入清帮；还有一些怕事的人，也投靠程、张门下，以求安稳。他们常说："我们天大的事，有老头子顶住。"因为程、张二人在县衙当差，朝夕跟随官员，与那些贪官污吏，朋比为奸，敲诈勒索，无所不为。

黄昌运，也是"马快"出身，幼年读几年私塾，衣冠楚楚，颇有文人雅士之风。他是西河镇"大"字辈杨大年的门徒。他收的门徒一般是出卖劳动力的人（船帮、箩帮、轿夫等）。这一派叫"水湾子"（三番子）。这些人，以出卖劳力为生，心地善良，淳朴浑厚。而黄昌运有点文化，"钳子快"（会说话），他掌握这一派，独霸南陵城沿河码头，势力倒也不小。可是黄昌运贪食鸦片，夜晚，独耳朝天，精神抖擞；日上三竿，鼾声如雷，所以无心问事。后被其门徒王建中所取代。

南陵"灰窝"最大的却是老歪。老歪住在本县城隍庙。他是一个歪嘴、跛腿、瘸手、白呆眼的叫花子，终日拖着口涎，说话不清。他生的虽然丑陋，干儿子却数不胜数。一般人家，子孙金贵，都将小孩过继在他的名下，托他的"福"贱带贱养，好养大成人。因此，逢年过节，许多家长都要向老歪送一份礼物。老歪虽是叫花子，住在庙里，却生活优裕。

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兵匪不分。一般小商贩、流动贩（翻公路做生意的），常感到自危，纷纷找清帮老头子，作为庇护，花点小钱，图个安稳。因而南陵清帮竟发展到"仁"字辈。短短的20年间，清帮由"通、悟、觉、万"到"仁"字辈，其门徒遍及南陵。

三

清帮设香坛收徒弟时，有一条清规戒律：遇到要案不能解决，大家要讲义气，就是所谓"朋友能替生和死"。老头子指定谁去顶

替，谁要吡一吡牙，就要受到严厉处分。例如：张荣徒孙阮益丰（觉字辈），在五岳山（繁昌五华山）做土匪，误抢了驻泾县的六县专员公署一批物资，专员邓昊明限令专署刑警队队长倪建虹捉拿匪徒归案。阮益丰被捉后，倪建虹得悉阮是南陵张荣的徒孙，是自家人，遂派心腹通知张荣。张荣就指派赵光玉去顶替。赵当时年仅30岁左右，无家眷，只有老母。赵光玉在这恶势力的压迫下，叫不应黄天，深悔误入邪途，无法，只得含泪去顶替。赵光玉被送到泾县后，由队长倪建虹带进监狱，换走阮益丰。待审问时，赵光玉泪水片肚里流，不敢说明事实真象，只得一一承认，终被枪决了。1945年，罗立光任南陵县长时，阮益丰回到南陵又当了侦缉队队长，手下拥有四五十条枪，威风凛凛，气焰嚣张。1947年，廖天寿任县长时，阮益丰又升为看守所所长。可是，替死的赵光玉的老母却在沿街乞讨，终于饿死在街头。

四

南陵自刘绍先、程履标、张荣、黄昌运等人加入清帮后，气焰嚣张，四乡八镇的懒汉、流氓也纷纷趁机而起。30年代，黄墓镇就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刘大嘴，奎湖也有一个声震南繁的张大屁股（通字辈）。他们在地方上奸淫敲诈，勾结土匪。那时，土匪抢劫方法很多，“绑票”即是一种。“票主”没办法，只有找清帮头子带钱去赎，因为这些土匪都与清帮有联系，赎回人以后，还要以厚礼感谢带赎人。张大屁股、刘大嘴，就经常做这些事。此外，奎湖圩区，旧例每10年有一次大会，非常热闹，高搭花台，唱十天十夜大戏。戏台下，除了许多茶棚酒店外，赌博桌子一张连一张。政府虽有禁赌令，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清帮头子坐地分赃。再拿打“秋风”（利用诞辰敲竹杠）来说吧，老头子或其他徒弟，如有经济困难，即利用诞辰大办酒宴，以示庆贺。除了给家门里所

有叔、伯、兄、弟下请帖外，凡是邻友和一般商人、地主、资本家，都统统送去请帖。白天吃酒，晚上聚赌。赌博有文场（麻将、纸牌），有武场（牌九、单双、四子宝）。他们公开喊赌，抽头归打“秋风”的人（抽赌钱），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哪个看不惯他们的作风，得罪了他们就要遭祸。例如：奎湖地区青年士绅谢文鼎，就因此而被杀。死后，家里人才知道是清帮赌棍害的。

抗战时，南陵国民党游击队头子周家严，派他的弟兄周传德在奎湖做通讯工作。周传德加入清帮，开香坛，广收门徒。国民党反动派又给他几支手枪，进行“游击”活动。周传德门徒越收越多，竟发展到50多条枪支。他的徒弟，大部分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亡命之徒，他们白天在路上抢做生意的，晚上到人家里抢劫，闹得奎湖一带农村鸡犬不宁。

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南陵县衙内一些官员都与清帮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大搞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群众恨之入骨，但又敢怒不敢言。

1949年，南陵解放了。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对这些反动的帮会组织，严厉取缔，其罪恶大的，给予法律制裁。从此，南陵人民不再受帮会之害了。

（安徽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参加清帮的片断回忆

李连生口述　徐桂生整理

解放前，我是一个杀猪的屠夫，在萍乡南门摆砧卖肉。有一次，稽查杨盛福来买肉，我斫了1.2斤给他，当时是铜元360文钱一斤，我收了他400文钱。他把肉拿回去后，剔掉骨头又回来找我，说我少了秤。我申辩了两句，他就骂我，还砸烂了我的屠刀，折断了我的秤杆，并动手动脚想打人。由此我感到愤愤不平。后来，我为了躲避捉壮丁（因为我有六兄弟），就在保长张世杭家做长工。他请别人是10吊钱一个月，我就只有8吊钱一个月，为什么？因为我要躲壮丁，要请他庇护，钱少一点也得干。有时，我也出外做点挑脚生意。但出外又很不平静，有打闷棍拦路抢劫的，也有设关卡敲诈勒索的。搞不好，不但钱未赚到，还要送掉老命一条。在旧社会，赚一碗饭吃确实难上难啊！

人总要生存下去，怎么办？有人劝我说：现在“圈子里面”（指帮会）势力很大，出外吃得开，参加到“圈子里面”去，不会吃亏，有时还可得到帮助。我一想，也对，反正我家里贫穷，又没有什么背景、靠山，能交上“圈子里”几个朋友，或许不会吃亏。

我参加清帮是谭任昌介绍的，他是当家师，林孟菊是引进师，他们都是悟字辈。我是1928年参加的，地点在南台书院脚下黄九兴家里，开堂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开堂很森严，有内巡逻、外巡逻，外人是绝对禁止参加的。开堂时我花

了3元银元，其中2元给师父、1元钱办酒席吃了一餐（办酒席的钱是由新加入的徒弟们互相凑集起来的）。

入帮手续，第一步是记名，通过正式拜帖，上小香，就是记名弟子；再上大香，才算正式弟子，从此才有开堂收徒的资格。

开堂的程序，虽然时间久远，但还依稀记得一些。开香堂叫摆香案。香堂分为3种：一种是喜事香堂，其中又分小香堂、大香堂。小香堂比较简便，大香堂比较繁琐。开堂收徒，属于喜事香堂。二种是评事香堂，请“三老四少”出席讨论帮中一切公共事务。三种是刑事香堂，请“三老四少”到香堂说明受责人之事实，公议处分，对违反帮规的人实行“家法”。

香堂执事计有12个名称：1、当家师（收徒者自任）；2、讲经师（传道者兼任）；3、陪堂师（引进师兼任）；4、执法师；5、护法师；6、巡堂师；7、执堂师；8、散香师；9、抱香师；10、福德师；11、知客师；12、站堂师。

小香堂程序一般为：1、止静；2、开坛；3、请天地君亲师；4、请三祖；5、请小爷；6、上烛；7、上小爷烛；8、上香；9、上小爷香；10、请朝祖；11、引进师之慈悲；12、本命师之慈悲；13、请戒香；14、新进家之受戒发愿；15、焚表；16、起戒香；17、送旨。朝见祖师要行三跪九叩礼，下礼时，左手出三指为三老，右手伸四指为四少。抱左膝先跪后右膝同进。进行每次仪式，执事人都要念诵规定的诗句。如进门后洗面，就念“洗脸九江水，嗽口杭州泉”。洗完面后要把洗面巾扯起来，叫做“扯风蓬”。止静，执事人就念“三老四少，有事早报，祖师临坛，不准喧哗吵闹，如有吵闹，家法不饶”。记名，执事人就念：“弟子上粮船，海水向东流，若要进家礼，先磕记名头”，此外，执事人还要讲解帮规训戒。我参加香堂拜师，首先磕了八磕记名头，履行各项仪式，都磕了头。我跟着“和尚”拜塔，共磕了108个头。

清帮帮规：有三祖训戒、十大帮规、十禁、十要、传道十条、

十戒、家法十条等。条文繁多，一时也记不上来。我原来有一本清帮的书，解放后烧掉了。我记得十要是：要孝敬父母，要尊敬长上，要夫妇和顺，要和睦乡邻，要正心修身，要济老怜贫，要行使方便。另外，帮中还有“三露”（遇急露、遇灾难露、遇盗劫露），“三不露”（外人不露、熟人不露、仇人不露），“三谈”（同道能谈、香堂能谈、告帮能谈），“三不谈”（茶馆不谈、娱乐场所不谈、酒醉不谈）等规矩。帮中兄弟遇有“三灾”（天灾、兵灾、无妄之灾），“八难”（出行路费短、遇事少人援、中途逢卡线、生活无路难、老来无积蓄、病中少药煎、死后无人葬、贫苦无人怜），要互相帮助和救济。

帮内还有许多隐语、手势、暗号，作为帮内人员秘密交往的标志。比如手式，要左手“三老”，右手“四少”。帮内人彼此问姓，不能直接说出自己的本姓。如我姓李，就答“在家姓潘，出外姓李”。送烟、接烟，要用“三老四少”手式。扎袖子，解扣子，也有一定的规定。进人家门要左脚先进，右脚后进，表示恭敬。使用筷子、调羹时，不能拖调顿筷。帽子代表粮船，进门帽子放在桌上，帽口朝天平放，表示行船平安，侧放则表示行船搁浅，有困难，请求帮助。

拜码头就念：“喜洋洋，笑洋洋，一步来在三义堂，日出东来不得正，杭州船上运粮旗，久闻老大多仁义，兄弟请安又道喜”。“金码头，银码头，兄弟来到老大龙虎大码头，承你老大打个好字旗。兄弟年轻，望你老大高抬龙膀，海涵海涵！”如盘问：“老大，今天运粮船有多少板？”就答：“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人有三百六十五骨节，船有三百六十五块板。外加三块，即头顶房板，身背纤板，脚踏跳板。”如果盘问对答不上时，就说：“拜师晚，离师早，师父少慈悲，前人少交代，沾祖灵光，借前人路走，求老大多多慈悲。”

参加清帮，一年“三节”、“两寿”要给师父送礼。我师父喜

欢吃酒，平时，我也拿点钱给师父买酒吃。

过去，帮会讲江湖义气，有时候还真能困难相帮。记得我父亲死时，家里只有2吊钱，无法安埋，结果帮会内弟兄凑了200吊文，协助我安埋了父亲，以后我才陆续还给他们。有一次捉壮丁，镇公所把我捉了去，我家属就去求帮会头目谢怀仁帮忙，结果关了一夜，就被释放出来了。我有一个朋友刘凤歧，也是清帮中人，被捉壮丁，当时我师父谢怀仁去交涉一下，就放回来了。以后帮内兄弟凑了16块银元给镇公所，替他买了一个壮丁。还有一次我去安福山里买米，路过王坑时，遇到抢劫，我实在无法，就试探着讲几句江湖话："此风本是自来风，好比刘备遇关公。"对方即问我："你那里来？"我旋答："杭州家庙前来。"对方又问："那里去？"我又答："朝祖去。"对方反复盘问，我按照帮内隐语一一作答。结果，竟侥幸地过了关。

到后来，帮会内有些流氓打手，发展到公开敲诈勒索，抢劫绑票，甚至充当国民党的走狗，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成为旧社会的一股恶势力。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严加取缔帮会，对作恶多端的头目进行了严厉打击，这是完全符合国情民意的。

（江西省萍乡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安清帮在济南的活动概况

段子涵

安清帮一名安清道，又名三番子。据传说创始人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名杨莱如。他是山东即墨县人，明亡后在崂山从程杨旺学道，创立此道。初传布于燕、齐，后至长江流域和东北等地。安清原名“阖清”，是灭清的意思，是作反清复明之举，后被清朝利用，才改为安清。安清道徒均有标志，以青布包头，因此也呼之为清帮。

一、安清道的活动方式

按济南的安清帮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活动，就是互相联络，彼此吹捧，你给我介绍徒弟，我再给你介绍徒弟，谁徒弟多了，就能活动的开。收徒弟大略可分为两派：有坐地收徒的一派。这一派的人，多半是有职业的人，不是靠徒弟生活的，有几个算几个，不活动多收，多了怕落麻烦。也有为了政治或经济的目的活动着多收的，愈多愈好。这一类人是无职业的，多半是要人的，外人称为坐地虎（流氓），当他有了相当多的徒弟以后，自觉羽毛丰满有了势力，便纠众行恶无所不为，所谓义气为重，骗人而已。再一派是在当地活动不开，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树立自己的党羽和坑人骗财，或另有其他见不得阳光的目的，出外到各码头上去活动的。这一类人如同云游僧道一样，到一个地方不久住，收上

几个徒弟就走。他每到一个地方，先找熟人，如没一个熟人就先找一个茶馆坐下喝茶，倒上一壶茶，摆上两个茶碗，先满上一碗，端起茶碗来，用两手捧着，伸出右手三个指头，请三老四少们喝茶。这样一表示，如有在坐的同道站起来问：老大从哪里来？你得说是从杭州来。问到哪里去？得说到五台去（杭州是潘的家乡，五台是翁、钱、潘学道的地方）。继问老大贵姓？答在家姓某，出门姓潘。问向哪位前人孝祖？回答他老人家姓某，名字上是什么字，下是什么字。如忘了说不上来，就说在堂前少受前人慈悲，借前人的路走。对方听你这样说，就不再问了。仅问香头多高。回答之后，如对方与自己是平辈，彼此均以师兄称呼，可以交谈起来。如对方是晚一辈的，马上称师父，先说给师父见礼，这里就说香堂口见。如对方是长辈，也是同样的称呼。如果双方对问答都很熟悉，可就一问一答的多了。对方一听答的很熟，就知道是想在这里活动传道，除对你安置食宿外，并通知他那当地的徒弟来参见，很快的就传遍了。张罗着给你介绍徒弟。住上一个时期，收上三几十个徒弟，就要离开再到别处去。临走时同道们和新收的那些徒弟们，设筵送行，再额外奉送路费。这一类人称为跑海的。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至少可以骗得几十元，多者一次可骗到几百元，而生活又都由其徒子徒孙供给，不用他们掏一文钱的腰包。

他们骗钱的方式，并没有硬搞硬撞的手段。过去是徒弟吃老师，因收的徒弟多了，把财产都弄光了。后来是老师吃徒弟，人称为吃徒弟肉。据说一个安清道首，打着“义气”二字的旗号，一年三节可以收礼千元或几千元之多。如再加上两寿（夫妻两口的生日）的收礼收入就更多。另外，借帮丧助婚为名，叫徒弟们凑钱，从中再扣下一份，也是他们生财之道，有时甚至可以扣下很多钱。若遇上资本家请他们助威保镖，那就更有了钱门。只要他们给资本家出把力拼一拼命，资本家便会给他们许多钱。例如

1921年，济南花生税局投标招商包办（三年一次投标），因为这是一项投机发财的生意，每次投标的人，都是省会议员们的代表。1921年以前是一个议员的亲信包的，1921年投标则是省会议员国晋卿暗中包下来的，但前者不交代，并花钱招安清道首聂鸿昌出来抗拒，国晋卿没办法，便也花钱请出另一个安清道首鄢秋江来帮忙。鄢和聂原本是一套人，他俩预先协商好了，第二天鄢秋江便带领城里的道徒30余人，保护着包办人去接收花生税局，到达后，聂鸿昌的喽罗就乖乖的退了出去，国晋卿便很顺利的接收过去。其结果他们不仅得到了一大笔金钱的酬谢，而且还有好几个道徒得到了职业上的安排。他们对诸如此类的收入，名之曰吃炸酱，也叫吃包子。这是他们骗钱的方式之一。

还是在1921年间，省议会为争夺议长问题。田中玉包办议会，议员分化为两派，一是拥田派，一是倒田派。有一次省议会开会要选议长，倒田派。占多数，拥田派占少数，田中玉一方面指挥拥田派捣乱会场，破坏选举，同时又密派军警换上便衣包围议会。倒田派首领（天坛俱乐部）张思纬请了一个通字辈的帮徒袁景阳帮忙，但袁景阳是个军人，没有几个徒弟，势力单薄，又转请上鄢秋江，联络了50多个徒众给张思纬保镖。但由于拥田派的捣乱，倒田派议员也没选成议长就散了。听说事后张思纬对袁、鄢二人都请了一次客，送了几十元钱。并声称如议长选成了，给大家找点工作，结果议长没选成，即作罢论了。

二、济南安清道的兴衰

济南安清道的起伏兴衰，约有三个时期。在清末光绪年间，因庚子战役之后，复兴小粮船运了一个时期的粮，清帮又活动起来，在河路码头上的所有搬运工人，均是清帮道徒，外人很难插入。有一个张星垣，济南市人，是清帮通字班的，手下徒弟不少，充当

脚行把头，此人孔武有力，能举800斤重的石墩子，并能在身上玩花。黄台桥、小清河、黄台车站的搬运均归他包办。食粮、盐、炭、蔬菜、装卸火车、船只，所有费用除开发脚夫工资外，据说每月他自己的收入就有二三百元，不到10年即成了富家翁。不过在这一时期济南城内清帮并不兴盛。至宣统元年，因沂州地区出了一个人命案件。此案起因，是有一卖菜的喊“卖白菜帮”，触犯了清帮的忌讳。清帮徒不准喊白菜帮，卖菜的不服，遂起斗殴，结果清帮徒众把卖菜的打死，闹成重大人命案。清朝沂州官府除对打死人的判罪外，并通令缉拿清帮道徒。此案扩大到省，山东巡抚又下令在全省取缔安清道，并指令各县捕获。因此，当时安清道不得不暂时潜伏起来。这是清末一段的情况。

至民国成立后，安清道徒们又活动起来，但是收徒传道只在暗中进行，不敢明目张胆。清末民初在济南活动收徒的安清道分子（都是大字班）有四五个人：一、高保章，历城人，住千佛山下，务农，后迁移北京。起初济南道众对他不熟悉，所以他没有活动，至民国初年才露头角，但认他为师的人甚少；二、丁福让，原籍东平县人，移居济南，住洛口，船行出身，在洛口理门公所“当家”，在济南收徒不少；三、赵冠鑫，济南市人，住西司门口街（现省府前街），清末在布政司衙门内当房师，民国成立后移居徐州，在军队当司书，在济南收徒弟也不少；四、刚庆无，济南城内人，住南关永胜街，在清末移居台儿庄，他济南的徒弟不过十几个人。除此以外活动比较广泛的就数着通字班的聂鸿昌了。聂在前清末期就入了道，据说他有1000多徒弟，在通字辈里以他资格最老，连大字辈也对他很恭维。道里人常说：“在帮不在帮，得问聂鸿昌。”在他面前冒充是不可能的。他所收的徒弟极为复杂，干什么的都有。他是流氓出身，无文化无职业，专靠安清道为生活，专吃他那些徒弟。除聂鸿昌外，还有查瑞卿，他比聂鸿昌徒弟少，但名声与聂相等。查是平阴县人，在清末民初时，曾当过

胶济铁路警察，敌伪时期在伪警务厅情报处充任外勤股长（特务），率领一部分人专门为日寇搜集情报。他所带的人均是他的徒弟，因他有个股长的头衔，所以有一些小商人也拜他为师。此外还有一个柏锦章（柏俊生的父亲），是津浦站搬运把头，所带工人均是他的徒弟，依靠货栈和转运公司运输货物获收利润，除发给工人工资外，他每月有百余元的收入。在民初时有东把头西把头之称，东把头是张星垣，西把头是柏锦章。柏死后，其徒弟张冠甲继柏充当把头。张冠甲是悟字班的道徒，长清县人，为人粗暴，横行济南，没收过徒弟，一般人对他如敬鬼神而远之。他自幼就很泼皮，一年在万字巷因辱骂回民而被打昏两次，经人送回家中，苏醒过来，逼迫家人用门板抬回万字巷，仍是辱骂，从此他就在万字巷横行霸道，回民对他也得让步。后经济南戒严司令马良以扰乱万字巷市为名将其逮捕，押了半年，释放后仍是横行霸道，甚之较前更甚。在民国7、8年间，津浦胶济两站搬运工人有了组织，把头吃不开了，况且工人们对张冠甲之粗暴行为，早就不满，于是便把他取消了。不久中国银行在经二路纬六路成立打包厂，该厂经理祝燮臣为了镇压工人，又雇张冠甲到厂内去当把头，每月工资80元（其实每月收入有200元）。他每日出入茶馆酒肆，吃喝概不拿钱，娼家妓女任其蹂躏，无一敢示反抗，一般道徒更对他奈何不得。通字班的除聂鸿昌、查瑞卿之外，还有王春发、崔朝臣、郭兆福、庄捷三、丘凤阁、张杰三、马星南、勾瑞卿、鄌秋江等人，也都曾在济南横行一时，号称安清道二十八宿。他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不大清楚。只知道除马星南、庄捷三、崔朝臣有职业外，其他均无正当职业。如前所述，1921年因为山东巡抚下令在全省取缔安清道，因而安清道一度转入地下暂时潜伏起来，而1921年以后济南市出现储钱会风，安清道又一度兴盛起来。按这种储钱会，历史很久，发起人多为小商贩，他们因资本少周转不开，于是邀请几位比较富裕的人、或十人或数十人，每人10元或

5元，大者100元或50元，一次交给起会的人使用。之后再一月一次或两月或三月一次集会，起会人每次拿出第一次集钱总数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几交给其他入会的使用。第三次第四次亦复如此，直到大家都得一次为止。这本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有位吕竹年，是安清帮通字班的道徒，他名下徒弟不少，对此他看出了窍门，便先在他这些徒弟身上动手起了会，渐渐引起群众随他的会。一时外人皆称他为会王。后来群起而效，引起安清帮的活动，他们结合着起会，广收门徒。起了会赚了钱，便开钱号，出钱票子。一时济南市各饭馆里都成了摆会的场所，闹得乌烟瘴气不成样子。与此同时又来了一个厉太森，济宁县人，是济南警察所骑警队队长，也是安清道大字班的道徒，跑海来济，想活动收徒弟，有人说他不是大字辈，是扒的梳。后来他当了骑警队长，由他所率之骑警队员，均是他的徒弟（外界认他为师的很少），他带的骑警夜间在四郊巡行，昼间便出入茶馆酒肆，娼寮戏院。潜来济南的土匪，均与他的骑警有联系，有的土匪甚至就在他的骑警队住着，市面上的小偷也与他通气。土匪、小偷抢劫和偷盗的财物，都得给他一半。如遇上有势力的人被劫被盗必须破案时，他也可即时破案还赃，证明他平素就养着匪徒，专预备顶案的。例如在1923年间，胶济铁路张店站长葛某（不记其名）被架，土匪要3000元赎回，否则就撕票。路局无奈备款往赎，由说票人通知，言明在济南东舍坊圩子门外耿家林交钱交人，约定时间夜间12点后。到时正在办理接交手续时，正遇上骑警出巡到此，土匪认为是拿他们，当时就把葛站长打死。因此，路局悬赏缉拿匪犯。军政当局令厉大森即刻破案，否则以厉是问。厉奉令后，因上司追逼甚紧，便找了一个来济落网的土匪顶了案。他不但得到的路局赏金，同时他儿子还因此被委为路局稽查员，月薪50元。不意半年之后，该队又把真案破获，架票的原来是胶济路的某车站站长高良臣。由于会风风行一时，严重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安定，官府始严令禁止

起会，并将会首吕竹年逮捕法办，以扰乱金融罪名判处三年徒刑，至此起会之风即行消灭。而安清道又销声匿迹了，虽是还能暗中进行活动，但不如以前之盛了。

1933年军阀韩复榘掌鲁政时期，安清帮又一度兴盛起来，不但旧有道徒活动起来，同时文武官员也重视起安清道来。原因是曾充当过河北省督办的安清道大字班帮徒李景林到济南来，韩复榘支持他成立山东国术馆，传授武术。济南有人知他是安清道徒想认他为师，他拒绝不收，推举出个钱宝亨来，让入道者拜钱为师。过去对钱宝亨知者甚少，经李景林这一推荐，以后便成了赫赫有名的上流人物了。钱宝亨，北京通县人，文化不高，清末宣统年间，在北京办过《京都日报》，民国成立后加入社会党。民国2年曾谋刺袁世凯未成，逃亡上海，迨袁死后，他返回北京。他父亲是有名中医，素与北京同仁堂乐家交往。钱宝亨回北京后，他父亲对他的行为不满，不愿他住在北京，因此要求乐家给钱宝亨找一工作，使他离开北京。乐家派他来济南，与宏济堂乐家负责人乐敬宇接洽，派他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他对安清道大字班的身分本未曾吐露，经过李景林这么一推荐，他就收了几个徒弟（俱是些小资本家），但当时并没有大肆活动，到了敌伪时他才活跃起来，不仅勾结上日本宪兵队特务头子杨芝祥，而且经杨介绍又与宪兵队长有了联络。不久便与杨芝祥合伙成立了协和昌土庄，包销大烟土，帮同日本毒化中国，接着又组织安清道义会，回北京视家时，又与北京伪中国内河航运公会总副会长张英华发生关系（是同道，又是大字同辈），张又派他充当济南内河航运公会分会长。该分会成立时，张英华同王琦又亲来济南主持。该会在名义上是向船民收公会费，实际上是个变相的船捐局，剥削船民。成立有8个月，为济南铁路局接收过去，改为水运系。钱宝亨的这一系列活动，在一部分资本家中大大抬高了身价，于是有一些较大的资本家如晋鲁银行经理胡伯泉、储蓄银行经理孙月舫、济南

有名的资本家金小青等均拜他为师，听说还有些盐商也是他的徒弟，日本特务人员和伪组织机关职员拜他为师也不少。他由北京来济之初是赁房居住，至此便由他和徒子徒孙凑钱为他的广智院街修建了一处很像样的楼房，仅会客室就有两处，屋内应用的木器家具，都是预先设计好的。这一来他既有了住的，有了吃的，出入又坐上了汽车，气焰日高。有一次有人请他在百花村饭庄吃饭，天下了大雨，他叫百花村派人到某家里拿胶鞋，因没去拿，他大闹脾气，把百花村饭庄的人员骂了一顿，后来便指挥他那些特务徒弟，常到百花村去扰乱，闹得百花村经理卢秀斋没办法，托人向钱宝亨求情赔礼（卢是安清道通字班的道徒），经人领着向钱磕了头才算完事。又一次伪组织官员不知开什么会，伪省长唐仰杜到会时，全体起立欢迎，独钱宝亨坐在椅子上不动。唐仰杜对他极为愤怒，但是也无可奈何。他的气势之大可想而知了。钱宝亨发迹虽然主要是在日寇占领济南时期，但他开始收徒弟还是在韩复榘掌鲁时期。李景林虽然只抬出个钱宝亨来，但安清道却因此又一度兴盛起来。此次不但一般原有道徒活动起来，就连韩复榘的文武官员也重视起安清道来。甚至韩复榘也托人到上海请了一个大字班的张镜湖，想认他为师。张镜湖见了韩复榘就谢绝了，他说的很好："主席是山东最高的长官，我是山东人（滕县人，当过南通镇守使）不大合适，如主席升调他省，我可收为门生，主席既爱这个道，有此一缘，暂做记名徒。"韩复榘虽然没有入道，但他的一些师长如孙桐萱、李汉章、曹福林、展书堂等，则都拜在张的门下，个个都成了安清道徒。韩的民政厅长李树春本人没入道，但也叫他的儿子拜在流氓聂鸿昌的门下。由于军阀官府的支持和达官贵人纷纷入道，因而这一时期安清帮可说盛极一时。

三、“安清道义会”的组织活动情况

1937年济南沦陷后，由于日本人以迷信麻醉中国人民，提倡复兴各种会道门迷信团体，如一贯道、龙华圣教会、无极道、圣贤道等。比较稍为大的会道门都复活起来，安清帮当然也不例外。在1938年5月间，有一日本特务山口恭右，自称是安清道徒，与钱宝亨勾结欲组织安清道义会。他们先在宏济阿胶厂成立筹备会，开始征集同道会员登记。起先一般道友均持观望态度，前往登记的人不多，钱宝亨遂与日本人山口扬言说：我们成立这个会是为道友“安全”谋保障，有事我们两个负责。本来日本侵占济南后，日本宪兵队特务机关惨杀、逮捕济南市民，人人自危，生命财产无所保障。在这恐怖之下，钱宝亨这一说传布出去，济南道徒就动起来，但是登记的人仍是不多。道义会内部组织很简单，除由钱宝亨指定了10位筹备委员外，又派了办理登记的人员，均是义务职，会长是钱宝亨。入会会员发给证书证章，交工本费5角，开始在宏济堂阿胶厂，以后又移于林祥南街，日本人山口恭右也住于会内。这个日本人吸鸦片烟，除与钱宝亨接洽外，与其他筹备员很少谈话。钱宝亨到安清道义会就到山口住室内去，一同吸大烟。筹备不过两个月，因孟兆晋率领抗日军攻进城里，该会暂时停止活动。孟军退出之后，日本宪兵队特务出动，借搜索孟兆晋军事人员为名，乱捕、乱杀。山口恭右也奉特务机关任务，搜捕遗留孟军人员。事后山口回国，钱宝亨回北京看家，安清道义会的事就交查瑞卿临时负责进行。至同年12月间，钱宝亨由北京返济，北京伪中国内河航运总会委他为济南船运公会分会长，随他同来的还有北京总会副会长张英华、王琦（张宗昌的护路游击队司令，这时充任伪山东保安总司令），顾问日本人佐野，来济成立中国伪内河航运济南分会，所有内部办事人员均是北京伪总会委

派的。该会内部分总务股、业务股、会务股、保卫股、文书股。除保卫股长是由钱宝亨在当地选择委用外，其余均是北京总会委任的。这个会实际是安清道组织，会务股办理会员登记，非安清道徒不吸收。会员登记后发给公会证章证书，交纳登记费5角（后增至1元）。该会在小清河、黄台桥，黄河的洛口，运河的济宁，德县的卫河，均设有办事处，办理船只登记和征收公会费及保卫费（按运载货物运价抽收5%）。但所刮的钱均交北京总会，分会开支则再由总会按月发给，不准截留所收款项。船只登记后发给船民执照、船号牌，钉在船上，并发给小旗一个，上写中国内河航运公会字样，插在船头上以做标志。对不登记的船只，则不准载运货物。伪航运公会成立之后，钱宝亨所组织的安清道义会就并入航运会里面了。该会活动8个多月，即奉到北京其上级的命令停止进行，赶办结束，准备铁路局接收。经铁路局接收过去后改为水运系。航运公会职员铁路局继续录用。他们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从船民身上刮来的钱却达六七万元之多，使船民蒙受了很大损失。

在伪航运公会结束以前，有一部分道义会的道徒，对钱宝亨不满，认为他当上伪航运公会分会长以后，就不问安清道徒的事了，于是他们又结合了一些道徒，想复活安清道义会。其中有一个叫金祖德的道徒勾结日寇古屋猛（化名古友仁，是个中国通。年龄30多岁，说的一口中国话），到处联络，企图重组安清道义会。追伪航运公会结束后，由金祖德、查瑞卿、聂鸿昌、王春发等10余人同古屋猛邀请钱宝亨出来复兴安清道义会。第一次以钱宝亨为名召开了一个预备会，到会的有30多人。此时会章已经订好。而此次所订的会章与前次的宗旨完全不同。第一次的会章是张捷三起的草，我记得大致是尊重道德，崇尚义气，道友团结，共谋道友福利。这次所订宗旨，内容是拥护“新中国政权”（即日伪政权），以“畅达民意”，“复兴中国”，“振作安清道友”，建立防共

阵线，彻底反共，“团结安清道友”与“友邦提携”以达“反共救国”之目的。纯粹是卖身求荣，为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走狗效劳的反革命章程，是由日寇分子古屋猛操纵和制造出来的。有人曾主张再修改一下，古屋猛说业经日本军部参谋处批准，不能再修改。这次预备会钱宝亨又被推为会长，任聘三为副会长。任聘三，名鸿恩，山东德县人，军阀时期在浙江督军卢永祥部下充任卫队旅旅长，江浙战役卢失败后，他潜居天津。韩复榘掌鲁时，他与韩的民政厅长李树春有旧交，被委为枣庄公安局长，济南沦陷后又转回济南居住。任是安清道大字班的道徒，但最初济南道徒知道他的很少，在金祖德等活动复活安清道义会时，因钱宝亨还当着航运公会长，金祖德这伙便把任聘三托出来，以代替钱宝亨。但是任聘三新来济南，在道徒中声望不够，酝酿几个月也没办出个名堂。

1940年5月1日开复活安清道义会的筹备会议，到有140多人。大字班的有钱宝亨、任聘三，通字班的有查瑞卿等150多人，悟字班到会40多人。钱宝亨主持开会，古友仁宣读章程，首先成立了安清道义会筹委会（由17个委员和13个监察委员组成），又设立了会务，总务两个部，会务由郦秋江负责，总务由查瑞卿负责，这一来较第一期庞大的多了。筹备经费由古友仁担任，不足时再向他人募捐。虽有如此庞大的筹备机构，但道徒前往登记的仍是不多，道徒们对该会也不甚信仰。后来因为该会与日寇各方勾结，取得了日寇的信任，日寇给该会以很多方便：如带上该会证章出入城门不受日寇检查，到火车站可优先买票等等，因而登记道徒始逐渐增多，甚至连一些跑买卖的商人也托人介绍进道认老师。活跃了一个时期之后，钱宝亨因与任聘三不和辞去会长职，于是又推任聘三为正会长，查瑞卿为副会长。与此同时，该会又设立了参议会和谘议会两个组织，参议会邀钱宝亨为参议长，在济大字班道徒张征三、鲍玉铭、王大同、梁世栋等4人为参议员。

谘议会除原筹备会人员全体为议员外，又吸收在济通字班道徒王授廷、何闻天（历城县伪县长）、岳云亭等20多人为谘议。悟字班道徒虽因辈低不能充当参议或谘议，但可当联络员。其实参议会等于虚设，开会没有一个到会的，谘议会共有40余人，而经常到会的也还是那所谓筹备委员。此时的总务部也分为会计事务、文牍两个股，以查瑞卿兼部长（后改为主任），会计邢敬斋、事务韩友仁都是查的徒弟，会务部则仍由鄢秋江负责，其所谓工作有登记和审查会员两项，登记员有3个人，审查员有2人。长期到该会办事的人员，规定每月送车马费20元。该会内部组织经过一番整顿后，便于同年7月14日假北洋大戏院正式举行了安清道义会成立会，至此，济南安清道义会便正式落草降生了。这个成立会到会约有六七百人，其中除道徒外，还有汉奸政权机关和日寇占领军的驻济机关的负责人，汉奸市长朱桂山还在所谓成立会上讲了话。安清道义会成立两个月以后，收办道徒会员约有500余名，每月收所谓会费250多元（每人交5角）。在此之后不久，各县安清道组织闻讯也到济南接洽成立县分会，于是济南安清道义会便无形成了山东全省的安清道义会总会了。各县分会组织由各县自行筹备成立，但分会图章由总会发给，不准自刻。凡成立分会的县安清道，均需向总会交纳所谓补助金，大县每月10元，小县每月5元。据会务部统计，最后有40多个县成立了分会组织。

各县安清道义会的分会，统统被资本家、流氓、地痞、豪绅、恶霸之类所掌握，如博山县的几个主办人均是些资本家（不是煤矿经理，就是股东）。他们和日寇勾结在一起，都是日寇侵略军的帮凶，都做过不少的坏事。博山安清道义会成立时，就是我去指导的，也曾邀日本侵略军驻博山部队长菊池和汉奸政权的伪县长、警察局长之类参加成立会，菊池并讲了一个多小时话。

道义会自1940年5月重行改组后，比以前有所发展，但做坏事也就更多了，罪恶也就更大了。其创办人之一的古友仁以解决

道义会经费为名组织了一个“山东土产公司”，在日本占领军部领了一个专买证，统制牛皮买卖，不准其他皮商私相贩卖，所有牛皮必须卖给土产公司。牛皮行均与这个土产公司发生联系。有一天有一个姓魏的人（名字不详）坐在会门口哭，问他有什么冤枉事？他说：“我是卖牛皮的，从金乡县来，被土产公司查着，说我私卖牛皮，没收了我5张皮子，而每一张皮子能卖30多元，和他们争论，不但不还皮子，并且还挨了打！”大家听了，极为愤怒，又不敢去问古屋猛，只得找任聘三来。任聘三又找了古屋猛，最后每张牛皮只给了5元伪钞。后来我对山东土产公司了解了一下，据皮行一个姓左的（回民）说：类似姓魏的这种情况何止一二，光没收的皮子就有若干。此外，济南安清道义会的几个会首都接受日本侵略者的薪俸。任聘三每月200元，查瑞卿每月100元，金祖德每月100元。

济南道义会还发刊《道义半月刊》，才动议时大家均不同意，都说一没钱二没人，当时不能办。金祖德说古友仁有办法。隔了几天从日本机关报《新民报》中，请了一个周白采负责办理半月刊的事，每月送工资50元。《道义半月刊》宗旨是：本刊应时势之需要，为文化之前锋，以站在兴亚反共最前线上，向新时代前程迈进。内容除些会务新闻外，别无其他言论。有一篇《共产党的真面貌》，是转载抗日以前汪精卫的言论，忘了是在什么报上登载过的。周白采无耻的冒充是他作的。半月刊所登载的会务新闻中，如成立崇义小学、筹设小清河物产有限公司等，只是一种虚伪宣传，基本就没办，还有在“济宁成立水上警备队，交军方领导，均是道中健儿”，这件事连影子也没有。1941年秋间古屋猛回国，金祖德也撤出道义会。会务由任聘三和查瑞卿完全负责，又聘请王琦（山东保安司令）为副会长。

1941年1月间有一个天津商人范东升，带着款来济买土产。拿着介绍信来找钱宝亨，想入安清道义会好与土产公司联系。钱

宝亨叫找任聘三，接洽如何不知道，不几天范东升即被日本宪兵队捕了去，说他是河北省游击队的军需，带款来济活动，拘留在领事馆。后来天津柜上来人，拿着证明文件找任聘三设法营救，任聘三托古屋猛去办，人是被放出来了，然而被他们没收了1.2万元钱。听说古屋猛得了5000元，其余日本领事馆留下了。

古屋猛回国后，任聘三因和查瑞卿有矛盾不能解决，又声明辞去会长职务。查瑞卿是通字班的，道对他不大信服，所以到会的道徒渐渐少了。1942年夏间，日本军部又要用林祥南街道义会所用的房子，催迁甚急，无奈搬到本街路北一个小房子住，没住上三个月，日特朝阳公馆又要占用，道义会又迁移宁波会馆暂住。经过这一连串的变动，道徒到道义会的更少了。就是两个管理登记人还经常去，其余会计、事务早就没人了。查瑞卿也见无大作为，辞职到青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道徒们又推举王授廷为会长、马星南为副会长。王授廷并捐了200元钱作为会务经费。这个奄奄一息的道义会，至此又暂时复苏了一下。1943年春间，因所住吴子彬的房子卖了，要交给买主，要求道义会搬家。会长又无处找房子，敷衍了将近一年，道义会就无形解体了。道义会的始末就是这样。

四、道徒柏俊生和王大同的罪恶

在济南安清道义会成立之后，安清道徒柏俊生因和日寇勾结到处招摇撞骗，招收了一批徒弟，其中有济南最大的颜料庄股东狄连芬，还有裕兴颜料庄经理和股东（姓名不详）。他自己创立了一个安清道的组织（会名不详），并在日寇支持下办了一个新生小学校，他不仅让其徒子徒孙纳钱修建学校和购置学校的一切设备，同时还要他们给他自己建了一所住房；此外，他还办了一个《新生日报》，也是由他顶名由他的徒弟出钱。日寇在济南设立的劳工

协会，主要任务是给日本帝国主义招收华工到日本做工，实际是专门出卖中国人的汉奸机构。柏俊生是这个所谓协会的董事，当然也是祸首之一。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曾要查办他的汉奸罪，经何冰如给他疏通，介绍他与秦向村的胞兄结识，不仅没有被当作汉奸惩办，而且在国大代表竞选时，居然又通过竞选当上了国大代表，成了济南的一霸。他有一个婶母，据说平素到他家吃一顿饭，他都不高兴；但她死了之后，他为了借死人发财，便把尸体抬到自己家去治丧，发出讣告就2000多份，上自国民党中央下自济南地方达官贵人，都送挽联、挽匾和现金。出丧时第一台挽匾就是蒋介石的，送殡的汽车50多辆，他们都是达官显贵。这个恶棍终于在解放后被依法处决，济南群众无不称快。

安清道徒王大同，沂州人，乳名叫小羊子，乡里叫他王羊，是个大骗子手。最初他在济南市唱着耶稣教诗歌卖《时兆月报》，后来不知怎么弄到一封耶稣教某要人（姓名不详）的介绍信去见张宗昌，活动办报纸，居然把张宗昌说通了，于是他便以督办公署名义向各处募股。听说募了有10万多元，之后就在济南办了一个《世界真理日报》。出刊不久，王大同借赴上海购买机器为名，携带四五万元巨款逃走了。1938年济南沦陷后，他又露了头，成了安清道大字班的道徒，在济南、天津从事安清道活动。不久又在济南市骗去一曹姓寡妇的房屋100多间。后来他还办了一个大同中学，借以招摇撞骗。直到济南解放，这个恶棍才被镇压。他所骗的房屋也被收为公有，办了现在的丁家涯小学。

（山东省政协文史办　供稿）

我所知道的济宁安清帮及安清道义会

李鼎茂

安清帮的流传和发展

济宁是京杭运河的重要码头，漕粮运输的必经之道。明清时期舸舶往来，帆樯林立。安清帮的帮派组织早年多在船户，其时随漕运船只流传来济者络绎不绝。初到的具体时间虽无可考，但在清末民初当地入帮者大有人在。

民国初年在济宁帮辈最高的为“大”字辈（二十一代），当时较著名的，也只有西五里营谢武举的儿子谢元朋、竹货业的杨同恩、顺河楼茶馆的杨锡恩、大闸口瓷器店的孙永聚、坝口粮行的王中和、老洋桥摆渡口的老艄公魏某等少数的几位老人。

到了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原吴佩孚的混成旅司号长吴敬亭平地崛起，依靠帮派势力大肆活动，上通官府，下联八帮，三教九流，交游甚广，逐渐成了当地著名的“光棍”人物。他原是“通”字辈（二十二代），这时济宁的安清帮中他的上代人为数很少了。其平辈中如潘子和的第一旅副官齐华堂，北洋军退伍团长台永生，原二十旅连长李登峰，第三路特别侦探队长刘耀庭，后来的日伪县长李圣渠，东南关镇副镇长兼船员公会济宁分会长李泰运，以及西南关一贯道徒杨桐梅、曾昭华等，都与吴敬亭是门槛里的同代人。他们之间互相吹捧，互相引进门徒，各人都开山

门，摆香堂，大量收徒，培植党羽。接着粮行、鱼行、脚班、戏班等各行各业中的头面人物如刘裕泰、周茂森等，一时也风起云涌，都为安清帮“招兵买马”，扩大组织。到了30年代中期韩复榘主鲁时曾支持安清帮大肆活动。这时一班大资本家、作坊主、机关团体的中上职员，如恒顺成的经理王星垣、启明银号的经理李德宸、鸿兴隆帽庄的主人谢传勋等也多有拜师入帮的。而中小商人和社会各阶层的从业人员，为了上通下达，纵横得人，也都企图钻入安清帮内，以便广结人缘，取得事业上的顺手，一时安清帮又大有发展。这是安清帮在济宁活动最频繁的时期。

一幕“摆香堂”的闹剧

我是1923年（民国12年）加入安清帮的。因我家在北关开“和顺兴”粮行，当时正值军阀官僚横行霸道，欺压商民之时，本业内入帮者很多，我也为了求得庇护和安宁，便托人介绍拜在驻防济宁的二十旅连长李登峰门下入帮为徒。李为山东濮州人（今范县濮城镇），系当时负责济宁北城一带城防的下级军官，为安清帮内“通”字辈的“老大”摆过香堂，收了两批徒弟。我和王振起、伊居文、常广元、孙殿士等10余人，事前请好杨桐梅、曾昭华为引见师，徐益斋、史恩祥、杨玉建、蔺保泰为传道师。同时投帖拜李为“本命师”。经李师父的同意选好地点、确定日期后，才举行“开山门”、“摆香堂”拜师入帮的典礼。

“摆香堂”，是安清帮中收徒时的唯一隆重典礼，是很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场面。入帮的程序和典礼的仪式都是非常复杂的。入帮前我们这些帮外人被称为“空子”，若想入帮称为入“门槛”，必须先找帮中人带领，开明履历，经引见师批准后，再备正式帖子拜师。

帖子，必须用大红加花纸做成四摺柬帖。首页正面上写“信

守”二字，内写敬拜×××老师门下，下面写“自心情愿”4字。在师名旁边写师太、师爷、师父等三代姓氏。另一页写引见师×××押，传道师×××押。末后署名，某字辈门生×××谨具×年×月×日。

开香堂的地点我们是借用西关文胜街南头关帝庙内。此庙与该街路东孙殿士家（我们一同入帮）开的“孙家牛栈”对门。摆香堂请客的大厨房就设在牛栈里。收徒的师父称“老头子”，他的前人和同参师兄弟亦在事前请到，这些人称为“赶香堂的”。人到的越多，老头子的面子越大。其中有部分人对这项礼节是非常熟练的，称为“执事”。摆香堂的会场在前一日就由众执事筹备妥当。在香堂正中挂罗祖像，下设一桌供翁、钱、潘三祖爷神位，上摆烛台、香炉。在二门外另设一桌，也摆烛台香炉，为小爷位。并有准备好的红纸封头的线香若干支，名为“包头香”。经老头子和众执事共同商定日期后，通知入帮人于是日上午齐集孙家牛栈。老头子和引见师、传道师、以及他的前人、同参等赶香堂的人，到下午1时才陆续到达香堂现场。我们入帮的10余人和几个执事上午吃了顿便饭，等下午1时，全体入帮人就侍候在关帝庙门外，听到一声招呼便依次走入庙内，接着传命“关山门”。这时老头子居中坐定，赶香堂的人分立两旁。引见师引领入帮人鱼贯而入，首先向罗祖像磕3个头，再分别向三祖爷神位各磕3个头，向本命师、引见师、传道师，分别各磕3个头，然后向“六部”部长、师父的前人、同参以及各位赶香堂的人，逐个各磕3个头，磕头的规矩是，左手压右手，这叫以善压恶，磕头时必须对准手背。然后就在当中排列整齐，听候执事人高呼“跪下”，另一执事端一盆清水叫每人呷一口，称为“净口”。这时由执事中专管上烛的一人，双手交叉各持燃着的红蜡烛一支，用跳跃式的步子由后向前徐徐走到香案神位，面向大家，口中振振有词的反复唱着词曰：

“一对红烛两朵花，安清分帮不分家，义气千秋百年

至，千载万代是一家。”

经过唱二至三遍，已把蜡烛插在一对烛台上，继由司香执事将桌上的“包头香”打开燃着，再由师父向神位上香5支，带众磕3个头，然后入帮人跪在地下手中各拿5支香。传道师讲解5支包头香就代表“敬、学、吃、怕、求”5个字的意义：敬是敬“天地君亲师”；学是学“仁义礼智信”；吃是吃“金木水火土”；怕是怕“生老病死苦”；求是求“四季平安福”。讲完，老师坐在居中厉声问道：“你们入帮是自心情愿？还是受人所劝？”“十大帮规能遵守吗？”“如果违犯帮规家法从事知道吗？”众徒弟齐声回答：“入帮自心情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这时传道师（也称慈悲师）训诲入帮《慈悲词》，词曰：

进善门，归常处。进家礼，学仪注。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师父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字”大人不大，“字”小人不小。一心进帮，甘心情愿。求师拜祖，门下为徒。千万谨守帮规。祖师爷灵光普赐下来，若见前人，尊敬前人。若见小爷们，恩待小爷们。仁者仁也，修心在道，开发上坐，善门难开，善门难闭，修成道德者，在各人之心也。

接着另一传道师传谕本帮帮头、船只、旗号的《慈悲语》，词曰：

我们帮是嘉白为总帮，用水在浙江，满论船一百零八只，杭三分去四十二只，下剩六十六只，一只老堂，一只香堂，两只太平，八只停修，五十四只行运皇粮。平时打白旗红月光，初一十五杏黄旗，槎杆上红下黑。兑粮在浙江嘉兴府秀水、石门两县，共运粮一万四千五百担。头船当家的姓王上会下江；腰船当家的姓鲿上志下宝；香火堂当家的姓黄单字荣。这是我帮头旗号的海底，要好好记住。

最后由另一传道师宣读《十大帮规》：

1、不准欺师灭祖。　　2、不准扰乱帮规。

3、不准藐视前人。　　4、不准江湖乱道。

5、不准扒灰放笼。　　6、不准引水带线。

7、不准奸盗邪淫。　　8、有福同享。

9、有难同当。　　10、遵守仁义礼智信

违者斩首。

经过以上各位传道师的郑重“开法”后，每人发给一份折子，内部称为《通漕》，内写三帮九代的名称，《十大帮规》的条款，以及上述“开法”的内容，各种海底的盘答方法。这是很重要的帮内文件，必须秘密珍藏，绝对不许向外人传阅。领后全体再向祖爷神位、老头子、引见师、传道师等各磕3个头，就算大礼告成了。

整个礼仪就是以磕头为主，有人说，入帮的人就象“磕头虫”一样，每次磕头是“够不够，三百六”。不磕这样多的头就不能进入这个“门槛”。

我们拜师入帮、“摆香堂”的这幕闹剧就要闭幕了。从开始请人筹备，到事完处理善后整整折腾了四五天。我们所付出的拜师金、香堂杂支、赶香堂的三老四少、执事人等的筵席费、糕点费各项花销，每人摊了30余元（现洋）。老头子张罗开宴，共坐了20多桌。一场闹剧皆大欢喜，到此结束。我们也就从这时起，由“空子”都变成为帮内人了。

安清道义会及其头面人物

1938年济宁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大力组织各种帮会、迷信团体，用来麻醉中国人民，以便作为吞并中国的驯服工具。济宁宪兵队的三好、小屋等日本人，在1940年即怂恿吴敬亭组织安清道

义会。吴得到了日本宪兵队的支持，当然有恃无恐地大干起来。于是广收会徒，筹组机构，很快的便成立起一支人数众多的“安清队伍”。

济宁安清道义会正式成立于1940年10月20日，由第一任会长吴敬亭纠集各行业的会徒1300余人组成的，会址设在城里霍家街。内部除由吴会长掌管全局外，下设总务、联络、会计、登记四股，由夏笃忱、陈寿康、王子真、徐益宁分任股长，各负专责。后因吴卧病不起，又增设陈寿康、李子璋二人为副会长接办会务（吴病重后，公推陈为正会长，李为副会长）。

吴敬亭，原名文孝，济宁西乡人，兵痞出身，早年投入北洋军吴佩孚属下潘子和部当号兵，后提为司号长，潘垮台后即闯荡江湖，未入正业。吴由于处世圆滑，口才伶俐，待人接物颇能仗义热情，一时官商两面，三教九流交游十分广泛。在结识的人们中如遇有急难者，常不辞劳怨，热心奔波。每逢别人有棘手之事，亦能多方斡旋，全力相助。因而在亲朋邻里中颇得好评。他住在城隍庙街路南，早年不得意时曾借聚赌抽头维持生活。后被任为该街街长，更为一方所依重。30年代后，安清帮的势力逐渐发展，因他是“通”字班，香头较高，便广开善门，传道收徒。一时除本城工商各界上层人物外，连附近的金、嘉、鱼、邹、滕、峄各县的著名人士，旅居上海、南京的济宁人，当地道、县两署的中级职员等慕名投帖，辗转托人拜吴为“本命师”者大有人在。1941年他更异想天开，借修复城隍庙为名，联合当地部分地痞、豪绅各方募集款项，并带领几名徒弟迳赴上海，找到济宁籍的捕房包探头目满锡九、钱宪亭等协助募捐，还利用安清帮老大的身份到处“开码头”、“挂牌”，得到了“门槛里自家人”很大的一部分资助。

他这次是以“重修城隍庙”的名义去募化的，竟然饱载而归，对庙班当然要有个交代，但他们也从中捞到些油水。吴敬亭于

1942 年因病死亡。

安清道义会从吴敬亭病重到死亡，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部事务虽由后来增补的陈、李两个正副会长出面处理，但远不如吴的活动能力强，故有一个阶段已是名存实亡。

1943 年经日本宪兵队的人主持将该会重新改组，以刘裕泰任会长，高焕章（小闸口河东任城宾馆经理）、周茂森（济阳大街大亨粮行东家）二人为副会长，并在小闸上河西街 44 号设立会址，号召全体安清会员重新登记。同时设立屠宰业、竹货业、粮行业、车站装卸班、澡塘业，其他较大的还有顺河门码头、四关牙行货栈等所立的分会，分别委派了负责人，总计会员一千二三百人，其中以粮行、脚班、手工业者占的比数较大，而资本家、作坊主亦占相当的比例。从当时帮会人中的年龄看，老年占 30%，壮年占 50%，青年仅占 20%。这时已至日伪后期，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安清帮业已逐步走上了“日薄西山”的途径了。

刘裕泰字岱青，济宁南关人，童年即在坝口粮行扫脏粮食，渐长即在人和、德和等各大粮行内当支使的童仆。由于长期接触粮业的买卖行情、客商收购、运输的手续，故对粮行业务较为熟悉，成年后便独立当上“代买”、“外柜”，能代客代行的一切经营了。后经逐步发展又与张明宸、李子修等合资开设“九丰”的粮行。在当时粮业的生意十分兴隆。刘裕泰，仅是“九丰”股东之一，实在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乃毅然退出“九丰”独立门户，另开一处“裕泰和”粮行。从此他便成了该行独挡一面的东家经理。发财后，他便接交官长，走动衙门，胁肩谄笑，多方逢迎，遂致地位渐高。因他是安清帮“通”字班，到了吴敬亭病死后，他经运动取得日本宪兵队的同意，继任为济宁安清道义会的会长。从此他更是如虎添翼，仗着门下的帮徒众多在南关一带，俨然成了“坐地虎”、“地头蛇”之类的人物。他还经常与宪兵特兵狼狈为奸，任意敲诈勒索，栽赃陷害，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如日伪时期，刘

裕泰在澡堂里遇到越河涯皮行一个姓扈的，他便把一包“白面”偷放在扈的衣袋里，然后指使宪兵腿子对其搜查，结果刘又出面做人情，罚扈2000元了事。

1946年10月国民党占据济宁城后，刘裕泰进行反攻倒算，并命他儿子带领还乡团到处抓人，进行报复。

1949年粮食交易所成立后，人民政府为照顾他的生活，安置在四所接待组工作。但他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敌视人民政权，时刻梦想恢复他失去的天堂，以致引起了很大的民愤，经检举揭发后，于1951年4月被人民政府镇压。

（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王春台剿捕临沂安清帮始末

夏传玺

清末民初，安清帮（又名“家理”）在临沂城乡几度兴衰。笔者仅就所闻所睹清末宣统元年岁末，临沂西乡义堂街大地主、团练长王春台勾结官府剿灭当地安清帮的史实，述其一二。

义堂街一带“家理”组织兴起的始末

清末，义堂街西头有一个人叫刘安邦，原以种田为业，一家5口，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后来，为补家用，刘安邦于每年冬春青黄不继的季节，兼做“货郎”生意，走街串乡，接触了各种人物，其中有散处乡间的“家理”成员黄昌、段套、黄叉裤、王泗昌（混号“四条腿”）等人。刘安邦遂在他们拉拢下，加入了“家理”。黄昌是城西耿家埠（离义堂12里路）人。传说段套、黄叉裤原在运河拉粮船，后失散回乡。王泗昌是当地大地主王兆镇（曾做过知县）的本家。这些“家理”的头面人物，经常出入刘安邦家，并在他家“摆香堂”、议事、收徒。于是，刘安邦也就成了头面人物。当时，义堂、探沂一带“家理”势力发展很快，徒众一多，也就未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其中有的是种田的，如刘安邦；有当雇工的，如王钱，小时讨饭，长大后给人雇工挑水、打杂；有做小生意的，如曹二卖“发团”（当地一种用米、麦面掺合制成的发饼），张克昌卖杂货，张大卖包子，王德昌开客店等；另外，也有一些为害社会的不逞之徒，如徐常玉卖烟叶，暗

中同黄昌一起拐卖人口，张其公吸鸦片，刘三元、王永奎、李兴盛是地痞，另外，还有一些赌徒、窃贼，为了找“靠山”，也混入帮内。当时，一入了帮，就觉高人一等。他们把搭包束成三滴水的形式（这是他们的暗记），搭包下面插着三弯刀，有的还别着“马冲子”（一种短柄火药枪），结伙成群，招摇过市，十分神气。

由于人员成分复杂，又无统一的政治目标，所以“家理”的人，干什么的都有。如黄昌、段套、黄叉裤等人，有时纠合徒众，夜间到一些乡村中、小地主家里强行借支粮、款；有的干些鼠偷狗窃的勾当；如李兴盛等，公然干些拦路行劫的行径。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多认为他们是一些不守本分的人。有敬而远之的；有心怀怨尤但不敢形之于色的；最仇视他们的，是乡间深受其扰的中、小地主，他们很自然地就汇集在当地大地主王春台名下，成为“家理”不共戴天的死敌。

王春台剿捕“家理”的经过

王春台，是清末义堂街及其周围四井八乡有名的地主，家有好地 18 顷，又开着“隆源号”大杂货商店，还有酱园、瓷器店等各种铺号十几座，他还是城西一带地主武装“团练”的练长，可算是当时临沂城西一霸了。当时稍有些身分的人，巴结他犹恐不及，更不用说敢对他说个“不”字了。可是，黄昌、黄叉裤、段套等人，偏依仗“家理”势重，不买他的帐，有时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提名道姓地大骂王春台，这自然不能为他所容，遂萌杀机，暗俟时机。

宣统元年，王洪隆出任临沂县知县。王春台趁王洪隆前来拜访的机会，把当地“家理”中人狠狠告了一状。王洪隆回县后，即要王春台补了一张禀贴，历述当地“家理”聚众滋事、为害乡党、图谋不轨的种种“罪行”，上报拿办。不久，即任命王春台为城西 100 余村的团练长，并明令王春台指挥练勇及地主武装剿捕“帮匪”。此时的

王春台，骑上高头大马，身着练长公服，前护后拥的练勇一律着红色号衣，身带三弯刀、红樱枪、马冲子、土枪洋炮、火苗子等杂七杂八的武器，打出剿捕"帮匪"的旗号，正式向"家理"开火了。

宣统元年腊月初一这天，"家理"的首脑人物，聚集在刘安邦家里，见练勇及各村地主活动频繁，心知有异，但又不谙底细，因此，竟惶惶不安。到了晚上，黄昌、段套、黄叉裤、王泗昌、刘安邦等人，聚在刘安邦家里，一面吃酒，一面商讨对策，最后，也没有想出摆脱困境的办法，只好轮流到街头了望，一直熬到鸡叫，除了段套外，其他人都合衣睡下了。段套对他们说："睡觉时要把家伙（武器）抓在手里，一听到动静，就要拼死突围。"话音还未落，就听到外面一声炮响，震得屋顶直往下撒土。黄昌他们几个人同时惊醒。就听到外面高喊"拿帮匪"，"抓活的"。一时人喊狗叫，闹成一片。他们手足无措，只急得在屋里团团转。这时，只有段套早有准备，他手持双筒"马冲子"说："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有利，有种的跟着我冲出去！"说着就朝门外打了一枪，紧接着一个箭步窜到院子里，爬上西墙，又朝外打了一枪，跳出墙跑了。随后，黄昌、黄叉裤、王泗昌也逃了出去，剩下刘安邦、张其公二人，因是本村人，心想暂时躲一躲，事过之后找王春台陪个罪，也许就没事了。于是刘安邦翻了几道墙跑到村子后仓房的东大园里，藏到草垛里。张其公因吸大烟，四肢无力，行动迟缓，刚刚爬上墙头，就被爬在墙外一棵树上的张三瞄见，一马冲子，就打倒墙下去了。张三率几个练勇围上来，见其枪伤左肩，血肉模糊，气息奄奄，也就不加在意，掉头走了（天亮之后，邻居将张其公抬到家里，治疗两月有余，始愈）。天亮后，贡生的侄子叫做木土争的，左手持马冲子，左手执三弯刀，到处搜捕刘安邦。当他走到仓房门前，向高老头要钥匙，高说没有，他举起三弯刀，一刀砍断门挂，撞进园去。刘安邦被他从草垛搜出来，当即用刀背打了20多下，脊背上鲜血渗出衣外，围观的人无不下泪。后在练勇刘振德劝阻下，才停手，把刘安邦反绑了双手，押到孔家店里关押。后经王

春台审了口供，送往临沂，在县衙门前站木笼而死。刘安邦死后，其母悲痛而死，其妻被拐卖到关东，家破人亡。

义堂"家理"头面人物死散净尽之后，王春台和各乡地主，又大捕"帮匪"余党。王春台在南寺设下公堂，被捕者除了家属花钱求情，被王恩准重责四十大板"脱帮皮"之后始得释放回家者外，其余均被送县站木笼而死。在前后 20 余天时间里，义堂及四周村庄的"帮匪"如王钱、刘三元、徐常玉等共有七八十人惨死在县衙前的木笼里。义堂一带的"家理"组织，也就此沉寂下去。

这一事件的余波

黄昌、段套、黄叉裤、王泗昌等人逃出后，各寻生路。后来听说黄昌闯了关东，段套、黄叉裤跑到费县、平邑一带西山里创了土匪。传说当匪势大盛的时候，曾声言要带人围攻义堂衙，千刀万剐王春台，为"家理"徒众报仇。王春台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迁到城里居住，终于忧惧而死。王泗昌借助东埠王家封建势力的荫庇，王春台拿他没有办法。王春台死后，他遂又在四乡活动。

以上就是曾经轰动临沂城乡的王春台"剿帮案"的始末。我从小就常听人们传说，同时我母亲又是亲见亲闻。死里逃生的当事人张其公生前也常向我谈起，那时我已十六七岁，以此知之甚详。

1963 年 12 月　王西献整理

（山东省临沂县政协　供稿）

阳泉清帮三义堂

刘建功　李庆祥

“三义堂”是清帮在山西阳泉的堂口名称。

阳泉位于山西东部，太行山中麓西侧。北依五台、定襄；南接昔阳；东邻河北平山、井陉；西连寿阳、阳曲，石太铁路穿市区而过，交通便利，外地人多，盛产煤铁，商业发达，是晋东地区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七·七”事变前，清帮“大”字辈的温学曾，人称“混老头”，就多次来阳泉收徒，其徒弟赵棠荫、何炳田等是“通”字辈的。当初参加清帮的成员多是各行各业的包工头、窑主、班主和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大约1939年前后，赵棠荫和日本特务机关拉了关系，掌管了阳泉三义堂。随后赵棠荫又以“代师收徒”的名义，将日军陆军特务机关情报班班长内田义真，也作为“通”字辈的徒弟收了进来，并且还给他取了个中国的名字，叫“赵雷”。从1940年12月起，阳泉三义堂对外公开，改称为阳泉“安清同义委员会”，受山西省安清同义委员会领导，委员长是赵棠荫，副委员长是保炳田，顾问由进驻三义堂的日军陆军特务机关情报班班长内田义真（即赵雷）担任。安清同义委员会下设调查、总务、营业、生产4个部，职员白福来。内田义真担任顾问后，为了扩充势力，网罗人员，大肆活动，公开宣称：“入会外出受日军保护”，公开收徒，使一些大小特务纷纷入会，拜在门下。当时阳泉有名的汉奸特务杨楷、郭书田、王久祥等都是内田义真所收的“悟”字辈弟子。那时阳泉的粮食、食盐、洋布

很紧缺，他们为了笼络人心，规定凡清帮成员，合作社每月可卖给白面一袋及食盐、洋布等。于是又有不少大小买卖人、工人、农民，为了能买到一袋白面也都在了“家礼”，参加到清帮里来。此外，也还有些人，为了找靠山、仗势称霸，也参加到清帮里来，最多时约达千人左右。

1943年1月，安清同义委员会顾问又改换成另一个叫吉泽的日本人。组织机构由原来的4个部扩展为：交际、宣传、情报、总务、经济、文书、传道、会计8个科，每科都有科长1人，干事2人，经营有煤矿、合作社、娱乐场、赌博场等。在这些地方都安插有他们的耳目，勾结日寇汉奸进行情报活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派人进驻三义堂，改称为“进步委员会阳泉分会”。此后赵棠荫不知去向。

1947年5月，阳泉解放后，该会崩溃。

（山西省阳泉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关于清帮摆香堂详情

张俊德

清帮摆香堂又叫开山门，也就是收徒弟的仪式，事前约定谁拜谁为师，约好后再定时间摆香堂。如果徒弟多，就需要一个大的地点；如有10人“进山”，就得有三间大的房子。在房子山墙下摆上两张大方桌，墙上贴一张大红纸，上叠3个神牌位，供3位祖师，即翁、钱、潘。方桌上摆五炉六蜡，前边再摆个小香炉，名为子孙炉。再前是家法，炉蜡上盘绳绳，五炉里边是5柱香，3对蜡，用绳绳盘着，绳绳3丈3尺，3个钱拴另一端3尺上。在请香蜡时还要念词，香炉后摆设四色果供。

请香词：

一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在堂中，
弟子上香把祖请，迎来祖师潘钱翁。
二炉香烟举在空，三老四少喜盈盈，
祖师迎来上边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三炉香烟敬祖师，三老四少齐欢喜，
欢庆堂口多旺盛，今天是个喜庆日。
四炉香烟献堂前，三老四少尽开颜，
香堂口里人兴旺，福寿安康万万年。
五炉香烟献堂前，三老四少站两边，
小爷就在门外坐，大家一齐把祖参。

请蜡词：

一对蜡烛照堂前，三位祖师在上边，
弟子上香把供摆，潘门香烟代代传。
二对蜡烛照满堂，富贵荣华永世旺，
切记帮规与海底，忠教节义记心上。
三对蜡烛照四方，同心协力保家邦，
淫邪偷盗切莫作，扶老携幼理应当。

请家法：

小小家法森又严，帮规戒律切莫犯，
哪个不慎犯帮规，定请家法不容宽。

请绰绳：

红绒绰绳三丈三，留下三尺缚金钱，
金钱落到佛门地，富贵荣华万万年。

门外小爷位：

小爷本是门外客，门里门外都团结，
保护堂口多平安，看好山门不受劫。

以上数事做完，新进弟子拜祖，并拜三帮九代，之后散堂。第二天拿礼物拜师父母（到家），以后交给一个折子或手本，名叫海底，内容是：三帮九代的基本情况，三帮的船只旗号以及问答：

问：请问老大贵姓？

答：好说，弟子在家姓×，出外姓潘。

问：请问老大从何处而来，到何处而去？

答：弟子从杭州而来，到五台山朝祖。

问：请问老大带的什么宝货？

答：带的步香堂口的半步。

问：请问老大贵帮号？

答：本帮号，兴武六（开兴武四，或江淮泗，或嘉海卫）。

问：贵帮船只旗号？

答：本帮船共××只，××人，装载××斤，从××码头装

船到××码头卸货，××旗××雀杆。

问：请问老大排行几？

答：（如廿四的答法是）头顶吾字，脚蹬万字，怀抱学字。

问：贵师何人？

答：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姓×名×。

回问对方贵帮和排行，知道后就下称呼了。

出外办事，需要找人帮助者，或者浅着（就是困着，没钱了）需要告帮者，坐到茶馆里左手露三个手指、右手露四个手指端起茶来说："请各位老大用茶。"如果在帮的人，就会到你跟前去。摘放帽子要帽口朝上，袖口往上卷一半，搀手是左三右四，是代表三老四少。

（河南省周口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清帮“炉香证书”的式样及内容

张风云　整理

1985年5月19日，密县政协办公室给我们送来了一张清帮“炉香证书”，经请教大梁郑二老先生，他说：“清帮炉香证书，在早期可能有，30年代郑州帮进门时，发一个折子，上面只写引进师、本命师和传道师的姓名、住址、职业及其船只旗号，其他如帮规等是传道师口授，所以我没有见过。”

密县政协办公室在农村扒旧房时发现的这个“炉香证书”，其式样内容如下：

1. 炉香证书大小如八开纸，画成不规则表格式，表头正中是“义气千秋”4个大字；右侧是“一道同风”，左侧是“亲爱精诚”8个小一点的字；表格右线外是“义字第　字号”，表格左线外有“师父母寿诞民前　年　月　日　时”字样。

2. 表内最上第一行，正中是一个大字“潘”，说明清帮祖师爷姓潘；右侧有“忠教仁爱”及“安亲贰叁”字样。“贰叁”指入帮人是二十三代“悟”字辈的；左侧有“炉香证书”及“信义和平”等字样。

3. 表内有入清帮人进门时3个师父及其师祖的姓名、住址、职业及船支旗号内容：

①引进师父及师祖是杭三帮，引进师父叫刘仙洲，字景贤（上盖有小方印章），住河南淮阳移居郑县理门明善堂当家；师爷（刘仙洲的师父）叫刘瑞丰，字霭亭（无印章），住江苏徐州府南

关外西菜园刘家堂理门，慈善堂当家；师太（刘仙洲的师祖）叫马凤山，字鸣岐（无印章），住山东衮州府嶧县台儿庄，船行当家过方。

引进师父的船支旗号："满运船四十二只，七只停修，三十五只上坝，进京打白旗白镶边，阴月亮上红下黑，无油雀杆应名打湾，问郎带双扁毛为记。进京归三祖师所拉，长房拉二只八个窝子，二房拉九只三十六个窝子，本房潘祖拉二十四只二百二十七个窝子，共在窝子二百七十个，窝子兑粮嘉兴县，在北门外玉石码头，每船上粮一千四百二十五石。香火船在十九号进京，归朱杨二家所管，前半所当家姓郭，后半所当家的姓毛，所带的是紫珀琥金所，吃的是长流水，烧的是昆山柴。"

②本命师父及师祖是嘉卫帮。本命师父叫傅席卿，字儒珍（上盖有小方印章），住河南密县城北三里傅家门，师爷（傅席卿的师父）叫庞干臣，字三杰，住江苏徐州府铜山县城西决十里庞家村过方；师太姜廷枢，字已桓，住江苏清河县移居江北十里长街于六吉巷书班为业。

本命师父的船支旗号："满运船四十六只，十只停修，三十六艘行运，平常打白旗白镶边，阴阳月亮，初一、十五打白旗红镶边，半个月亮，本船无油雀杆，金钩如意头，又名打金棍，帮中混号死鹰膀子，兑粮浙江嘉兴府石门、同乡二县，每船兑粮二千二百二十五石，共兑粮四万五千石。头船当家姓李上彦下林，腰船当家姓王单字春，靠船太子码头，囤粮老牛寺，交粮通州坝北十余里小红桥，问帮不问所，问所海林所，吃的长江水，烧的昆山柴。"

③传道师父及师祖是嘉白帮，师父名叫魏兴杰，字斌臣，住河北省威县城东北七里赵村，现石门松乐寺当家；师爷靳福修，字瑞亭，住山东临清县三元阁过方；师太王鸿昌，住山东临清县城西北十八里姜家村过方。

传道师父的船支旗号："满运船六十六只，一无停修一无太平，香火船十九号，初一、十五挂十三太保灯笼一对，进京打龙旗，出京打凤旗，素日打白旗。兑粮嘉兴府秀水县石门桥上，共兑粮七县米，共兑粮一万六千二百石，吃的湘骨翻花水，烧的五湖四海柴。"

4. 十大帮规："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三不准提闸放水，四不准引水代锋，五不准扰乱帮规，六不准盗卖安清，七不准扒彼倒拢，八水准奸盗邪淫，九不准大小不尊，十不准记名收人。"

5. 十大要件："一要孝顺父母，二要为国尽忠，三要尊敬长上，四要兄宽弟忍，五要夫妇和顺，六要交友有信，七要和睦乡邻，八要正心修身，九要施行方便，十要惜老怜贫。"

6. 十大禁止："一、一徒不拜三师，二、父子不拜一师，三、不准拜墓为师，四、关山门不准再开，五、不准兄徒师弟，六、徒不收不准师收，七、本帮不引本帮，八、师过方不准替收，九、进会不准骂会中人，十、香高不准自高。"

7. 帮中十戒："一戒万恶淫乱，二戒断路行凶，三戒偷盗财物，四戒邪言咒语，五戒讼棍害人，六戒毒药害人，七戒假正欺人，八戒倚众欺寡，九戒倚大欺小，十戒烟酒骂人。"

8. 祖师爷亲训词："词尔后生，仔细听真，吾道宗旨，信义为尊，三一不二，枝叶同根，亲疏远近，从来不分，你今受戒，洁已修身，和平处事，忠厚待人，帮规宜守，国法须遵，勿负祖训，莫忘祖恩。乾隆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训。"

9. 进家须知："进家学口口，出家学长处，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师父领进门，修道在个人，安清如骨亲，远近不能分，五湖四海内，皆为一家人，前人德尊敬，后人得慈悲，字大人不大，字小人不小，禁止于帮规，甘心要尊守。"

10. 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如鹁鸽使呼吸、乌鸦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鸣、其众蜂见花而聚其群义也，羊知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罗网而为食、蝼蚁塞窝避水智也，鸡非晓而不鸣、燕非时而不至信也，以仁居其心，以义治其事，以礼持其身，以智明其礼，以信交真友，谨守五字，学圣则圣学贤则贤，不守五字伦常失矣。"

11. 三从："一从父，父慈子孝。二从师，师恩徒贤。三从兄，兄宽弟忍。"

12. 四德："讲公德、学道德、行善德、积阴德。"

13. 四正："存正心、行正事、亲正人、读正书"。

14. 四非："非礼勿视，非礼勿行，非礼勿为，右礼勿动，正心修身，克己复礼。"

在炉香证书表的最下面绘有江淮四帮、嘉白帮、兴武四帮、嘉海卫帮、兴武六帮、杭三帮等各帮船支旗号的图形，左侧以次是：中华民国　年　月　日记名；　年　月　日受戒；　年　月　日传法；上面盖有长方篆子印章（字看不清楚）；最后是悟字班弟子收执。

（河南省郑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

清帮双凤帮海底*

家 庙 源 流

左有青松绿柳，

右有天竺海棠。

头门一对匾：

万象春　一气千秋

　　百年如意。

义心堂　安清不离远与近，

　　一祖流传到如今。

二门一对匾：

天庆（庚）已供　莲花不离清荷叶，

　　三姓俱是藕中生。

---

* 此件由温州市博物馆胡珠生同志提供，未发表刊用过。文中错字处用（　）标注正字，脱字处用〔　〕标注补字或说明。行文排列及标注符号如原件，原文之繁体字、异体字均改简改正。

三门一对匾：

吾佛如来　父子大夫出入归海川地上，

　　君臣圣贤新民在尧舜天中。

四门一对匾：

如切如磋　九曲弯弯弯那王庙，

　　十层台台台北五台。

第五进藏经楼

内有金刚五部，祖师相家谱。

家庙序源流

“安清”二字轻如鸿毛，重如泰山。长即三江，阔合四海。师徒如父子，同事如手足，不可与人争论，义气当先。安清不分家，铁树不开花。你们在家否？依祖到天光。贵贤（前）人那一位？在家子不道父，出路徒不言师。

敝贤（前）人双凤帮头：

张上学下宪　温州永加人

师　爷

李上锦下云　浙江林（临）海人

师　太

王上金下玉　山东文杨县人

传　教　师

吴上炎下平　浙江瑞安人

师　爷

袁原名昆　直隶南宫人

爷　爷

张上进下山　徐州砀山人

师　爷

方上锦下志　安徽人

师　太

赵上德下城　山东人

香头多少高？

头顶廿三，身接廿四，拈下一会。

上廿四代

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道（通）悟觉（学）。

下廿四代

万象皈依，载律传宝，普门开放，发渡新迴，光照乾坤，公共进行。

罗祖名清，字洪元，官条秀山，是甘肃罗家庙〔人〕，明朝嘉靖皇帝驾下〔大〕臣。官居谏议大夫之职。因如来佛祇梦，弃职到北五台山其石庙阳硐修炼成迎〔道〕。后在杭州武林门外摘芦撑渡至江心，收潘祖为徒弟。钱二祖访闻，脚踏苇渡至单庵门口头，罗祖收他为徒。三人八拜结义，翁祖为大，钱祖为老二，潘祖为老三，可比树同枝叶。

三老：翁钱潘〔三〕祖

四小：朱道人　刘道义　黄道昆　石少祖

陆三堂：经堂：北五台那王庙

祠堂：杭州大主寿（寺）

香堂：杭州黄（王）师（寺）堂巷

十堂师：本命师　传教师　引进师

护法师　文堂师　武堂师

〔讲〕经师　站堂师　收堂师

十大帮规：一不可欺师灭祖，二不可藐视前人，三不可爬灰倒碴，四不可吃笼放水，五不可奸盗邪淫，六不可扰乱帮规，七不可江河乱道，八不可私卖安清，九不可欺大压小，十不可大小无（相）欺。

四大名山：金祖四川峨眉山　〔仇〕祖南京九华山　罗祖湖（河）北五台山　三祖杭州青龙山

四大名京：金陵南京　河南东京　四川西京　直隶北京

七省：西四省：陕西　山西　直隶　新疆
北三省：奉天　吉林　黑龙江

五河（湖）：太河（湖）　黄河（湖）　西河（湖）　洞庭河（湖）　濮（鄱）阳河（湖）

四海：东扶桑　南海　西昆仑　北海

三闸：镇江清闸　清江天妃闸　黄河溪口凤临闸

五埠：出京通州埠　黄河永镇埠　安徽五凤埠　川河淮安埠〔缺一埠〕

学仁义礼智信

清帮头共船九十九只半：六只停修，十二只上下海巡，八十一只进京装粮，半只名山香火船。

进四大名山烧香：进京打青旗，出京初一、十五打龙旗。白玉石顶、红木杆，琥珀云天索。

松江府省华庭（亭）外装粮，苏洲（州）太子门外兑粮，通洲（州）埠下粮，路过万朋，长流水烧遍地柴。

安清内营（客）：三帮、九代，三堂、六部，三闸、五埠，三老、四小，七飞禽，八走兽，十堂师。

三堂：前舱罗堂是罗祖兴业修道堂，中舱念佛堂是

潘祖传道堂，后舱和佛堂是安清运戴收徒堂。

香堂规则：香堂门口到圃团，九步按九叩首，一百廿八根半圃如一团，按老粮船分付，一百廿八帮半。香炉重一百廿八斤半，烛台一对重七十二斤半。三门锁：头门空门平浪锁匙，二门尚门顺风锁、如意锁匙，三门象门龙凤锁、太平锁匙。

总帮一百廿八帮半：苏州廿一帮，杭州廿一帮，宋（松）江九帮，常州十八帮，安微十六部，江西十九帮，河南九帮，山东十帮半，直隶一帮，铜盆马保四帮。

调查杭州廿一帮，湖州三帮，宁波二帮，台州二帮，温州二帮，处州二帮，金华一帮，嘉兴河一带，嘉海一帮，嘉白河一帮。

有船一只十舱、三百六十五粒钉，七千七百七十枚钉，装粮三百担。内有三粒极不在内。有眼无钉，拔板有钉，无眼跳板，无眼无钉。肩背拔板，足踏班头顶旺板。

六部：舵为吏部，锣为兵部，靠为户部、炼为刑部，短把为礼部，水篙为土部。

七飞禽：孔雀瓶、金鸡旗、仙鹤驾、龙凤尾、大鹏鸟、乌雀顶，橹雁翅。

八走兽：狮子头、虎头牌、黑铁狗，象鼻环、老鼠铃、大狗墩、白角兽、反斗麒麟。

按路七十二条半码头。好说："老大哥指教，小兄弟号德无能，香烟未尽，蜡烛未乾，小受敝家门义气，虽然访祖多年，小兄弟早到家门首，看上三个园头。在家多，出外少，不知家门规则，有事不到，请大哥勿怪责。"

出门遇英雄：乌猪多少重？三八廿八重。高姓？三八廿八日。台甫请教？那里来的？那里去的？前山经过，

后山经过，山前山后多有经过。看见什么东西？看见戏一台：头出打登州，二出宋江杀妻，三出桃园结义三兄弟。或年风起来，风风不是风，五百年前共一同。左手执把雨伞五斤四两，伞根一百廿八条半，右手抱包袱一个，内有什么东西？古饼三十六个，大哥相送。

大房称老管
二房称老窦
三房称师父

双凤

（浙江省温州市政协文史委　供稿）